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7—1931)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11

中共文献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一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7—1931)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1927~1931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1927~1931 N. ①K260.6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0271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编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开 23.5印张 589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元(第7—12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M·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B·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者说明

一、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1卷。本卷汇集了除丛书第7、8、9、10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以外散见在中文图书报刊中的部分有关文献资料，包括过去已经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

二、本卷所收文件主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献和档案。有些专题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不得不选用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性文章。

三、本卷共6个专题，各个专题以及每个专题内的文件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为适当集中，有些文件难免提前或移后。

四、本卷注释凡标明“编者”的，为本卷编者所加；其余均为原编译者所加。原稿中有明显文字错误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订正。为了统一起见，原稿中加着重号的字一律改为黑体字。

五、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姚金果负责选编。

目 录

编者说明

一、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方针的转变

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

(1927年8月7日) (3)

讨论国际代表报告

(1927年8月7日) (9)

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关于1927年8月9日布哈林

同志报告的决议(节录)

(1927年8月10日) (16)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联共(布)党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1927年12月13日) 布哈林 (22)

共产国际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1927年12月15日) (29)

附1: 纪念广州公社

(1930年12月12日) 雅罗斯拉夫斯基 (31)

附2: 纪念广州公社四周年

(1931年12月13日) 约尔克 (35)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8年2月10日) (43)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 (1928年2月) 罗明纳兹 (54)
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
(1928年2月) 米夫 (85)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1928年2月25日) (106)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
(1928年3月1日) 米夫 (112)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
中国问题决议案的
(1928年4月30日) (123)
共产国际对济南事变宣言
(1928年5月) (126)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

-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节录) (133)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
报告的结论(节录) (147)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年10月) 米夫 (185)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土地问题(节录)
(1928年10月) 米夫 (216)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1944年2月3日、4日) 周恩来 (222)

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

-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言(节录)
(1928年7—9月) (251)

共产国际的纲领——1928年8月9日在第六次世界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报告（节录） 布哈林（427）	布哈林（427）
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对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节录） 布哈林（434）	布哈林（434）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节录） （1928年8月29日）	（445）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节录） （1928年9月1日）	（458）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宣言	（470）

四、共产国际“左”倾指导与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 （1928年11月28日）	（4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29年2月8日）	（482）
共产国际十周年纪念宣言 （1929年3月2日）	（499）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 （1929年5月15日）	（50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29年6月7日）	（518）
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1929年8月）	（529）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	

(1929年8月5日)	(540)
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	
(1929年8月21日)	(558)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青工问题的信	
(1929年8月24日)	(565)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	
(1929年8月30日)	(567)
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社论)	
(1929年9月25日)	(572)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 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9年10月26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 ...	(578)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 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1929年11月15日会议通过)	(587)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 决议案	
(1929年12月14日)	(592)

五、中东路事件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	
(1929年7月12日)	(607)
撒翁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1929年7月28日)	(611)
中央答复撒翁的信	
(1929年8月3日)	(614)
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618)
南京在“耍弄手腕”(社论)	

- (1929年8月11日) (626)
- 是谁挑起冲突? (社论)
- (1929年9月6日) (629)
- 在莫斯科州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节录)
- (1929年9月28日) 李可夫 (633)
- 南京在耍弄新的诡计 (社论)
- (1929年11月30日) (644)
- 时刻警戒 (社论)
- (1930年1月2日) (648)
- 附 1: 关于中东铁路事件
- (1929年7月) 王正廷 (652)
- 附 2: 中东路之概况及我国不得不收回该路管理权之理由
- (1929年7月) 胡文柄 (654)

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赫达罗夫在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1928年7月11日) (665)
-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许勒关于中国和印度工作经验的报告 (节录)
- (1928年7月19日) (683)
-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节录)
- (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 (687)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报告
- (1929年7月9日) (689)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届二中全会宣言	
(1929年8月15日)	(692)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书	
(1929年10月)	(71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接读青年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来 函后的决议	
(1930年1月7日)	(727)

一、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 对中国革命方针的转变

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①

(1927年8月7日)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 C.P. 将不成其为 C.P. 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党的指导与国际的指导及群众要求差得如此之远，是非常奇怪的。

在国际中央看到的在现在中国环境中召集此会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困难的。假使反动的国民政府知道我们在此开会，必定要将我们一网打尽的。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的召集一些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我们要指出过去的错误，并须使此错误为大家所认识。因为过去不但中央的指导者错误而且各地方的指导者也错误。所以如果不将此错误使大家都知道都认识，仅有几个领袖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现在的问题，是否此会有改组指导机关（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与各地的隔离，今天的会仅有两个地方的代表参加。但因现处于秘密环境中，故可以叫以〔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政治局。此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权通告全党，指出过去的错误及将来方针，并有权可以召集代表大会代临时代表大会。^①

此临时中央政治局要得到国际的同意后，方能正式成立。

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要估计过去的工作。关于此点，常委已提出一个很详细的告同志书，同时又因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报告中，只能指出重要的错误。

在未批评之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党过去的指导是照多数主义及国际决议做去的，则现在的情势决不如此。这并非看过去主观的力量而是客观的事实。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经验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其他任何阶级却都不能及他的力量之大。中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薄弱的，如无国际资本的帮助，则他久已倒了。中国的资本多在外人手中，外国资本组织了中国无产阶级。故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小。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虽多，但事实上已证明了他们不能领导革命。这般农民、小资产阶级不是跟着无产阶级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在现在的阶级争斗中，中国无产阶级是以阶级的力量来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及他有力量。

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虽然，我们仍要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的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中他是革命的，现在已经反动了。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中国共产党两年来领导无产阶级已有许多争斗的经验，如果中央能有〔够〕正确的不动摇的来领导无产阶级，则中国阶级间的关系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不仅武汉即其他地方亦不会有此反动的局面。

要考察过去党的指导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四月一直到七月底

① 原文如此。

党的指导都是照着改良主义去决定他的策略。他不但对小资产阶级即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大的让步，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到现在他们要赶跑我们了，在街上杀戮我们了。我们的党为要阻止农民的运动，结果使农民运动遭了大的摧残，农民群众遭了大的屠杀。我们的党为要使工人让步，结果使工人运动大大失败。一直让步到党不能公开的成立。直到八月初南昌事变起，于是才开始有一坚决的转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后的情形一定与过去不同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此次事变，我们多少有点武器。因此，我们如果实行坚决的革命策略，现时的环境一定与从前不同。

拿中央的理论及实际来看，他简直是少数派的，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党，这是我们根据中国党决定各种问题而得到的结论。中国少数主义的基础是没有的，因为少数主义是建筑在工人贵族的基础上。如照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上走则可说无 C. P. 了。好在中国工人阶级无工人贵族的基础，故无此危机，这从上海广东湖北的争斗我们可以看出，从武汉工人革命性之充分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要不是照中央的指示而是自然的表现。好在中国党中央尚无集权的指导群众的力量，这实是过去的幸事。如此会是随便召集的，或群众与指导机关的意识是一样的，那召集此会为无意义。正因为群众与中央的指导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希望很快的得到党的指导之错误改换过来。

在那封信里（告同志书）指出之主要的有中国革命之性质及在革命中各个阶级的作用。这种作在^①过去中央的认识可说是纯粹的少数主义的。他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不知资产阶级当工人运动发展的时候必然退出此战线，这是在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明明白白指出的。现在有两条路：一

① 原文如此

是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一是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条路线我们要来找。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造出一些少数派的理论：以为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是冲突的，这我们根据上月中央给上海党部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信中说要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可以不需要坚决的阶级斗争，并应号召第二次“五卅”。这无异乎是要拿工人去牺牲。实则工运愈发展打击资产阶级愈利害，阶级斗争愈剧烈，也就“愈能打击帝国主义”。

关于此问题不但对于过去即对于将来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们要问：以后是否还应维持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总想戴些假面具，蒋介石一面与日美勾结，一面又要做反日运动。现在武汉政府现尚未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虽然我们明知他将来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现在我们应问：我们是否应帮助武汉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其实，如果C.P.党员来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则C.P.党员的身份必失去。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在经济上虽有问题，但在政治上是一致的。现在他们虽与帝国主义有纠纷，但此纠纷是逐渐减少的。他们怕工人阶级比怕帝国主义厉害得多。他们不惜如何与帝国主义妥协来压迫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来达到反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须知道，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

民族解放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

过去党的策略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比如说中央不要工人运动有过分的要求而要为反帝国主义来牺牲，并要与国民党组织强迫仲裁来制止罢工。对农民运动的策略也可说是变节的，在湖南

的运动的指导可说是改良的。

现在又说关于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国民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是他是多阶级的联合。蒋介石四月以前的国民党的指导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指导，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都赶出去。此任务在国民党下层的同志都实现了，但中央的策略却不能巩固此任务，将我们独立的政策及批评国民党的权限取消。比如联席会议中的决议说：联席会议的决议不能以联席会议名义公布，只能经过国民党公布。又如说：民族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并且还有教我们在报馆中的同志不要根据我们主义来作文章的事实。甚而至于工农运动也要国民党来做。这是非常错误的方法。在联合战线中我们应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评的自由。中央的主张恰与此相反。湖南则不同他能用联席会议的名义公布决议案。列宁说：如果在联合战线中不能独立的存在不能有批评的自由，则等于出卖阶级的利益。过去我们仅依靠与国民党几个上层的领袖的联合，这实在是一很好的方法，但是一个取消本党甚至国民党的好法子。

在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些同志说：要与国民党联合，必不能很自由的革命。好了，现在南昌独立了我们可以独立的自由的革命了。这个结论也是同样错误的，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有俄国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中的谭平山也要组织第三党来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第三党即是少数党。甚而独秀同志也说：如果留在国民党则不能有充分的表示，要有充分的表示则必退出国民党。这些都是非常不对的，至少现时不对。

南昌这次政策是对的。我们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几个国民党的领袖上，而要依靠到国民党的群众上面。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现既有一新的联合，我们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要坚决的批评。只有照革命的路线不怕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然后才能巩固革命。

再讲一讲中国党中央对国际的关系和错误的责任问题。有些同志说这些错误国际方面应当负责任的。关于这方面，我们要问一问国际有无一指令与现在的方向不同的。无论关于那一方面我都可以坚决的声明：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比如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尚未译出，许多中央委员还不知道。即第七次大会的决议都未传达到群众中去讨论。中央委员即知道了也只不过仅口头上的承认，甚至不接受。所〔以〕国际要唤起其所有的各国支部及中国全体党员来批评错误。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相信他有许多争斗的经验，我们应诚意接受他的指令，不然必遭失败。过去在西欧的党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国际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应当相信，接受他的指导，不然我们将会走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

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然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比如对工农下层领袖的说话以为不足听，所以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党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的正确。

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现在一定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在党之上的，或者他要非难我们今天选出的临时政治局。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然后党的指导才能巩固起来。至于其他问题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

讨论国际代表报告^①

(1927年8月7日)

东：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去，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中：国际代表起草的信和今日的报告完全是对的。过去也有许多同志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在〔去〕看更见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自今日始，已由〔早〕有由来。为什么现在才表现出来呢？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加剧的关系。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大家在理论上亦颇认识，但在实行上却大不同了，误解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理论。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中有两点：1. 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2. 土地革命，使同志发生问题。大家对这两点未认清。以前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中央对国际决议并未了解，以致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我们的党自从成立一直到现在可说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其中还夹着有些封建关系，和政客概念。每对一问题总是喜欢用手腕，利用某来打某，并非由于阶级出发点来决定一切问题。同时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了，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看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

要高百倍。荷波是个工人，他虽现已近乎知识分子化了，但他仍未脱离工人的意识。他曾对我说了好几次：他以为现在用不着这样看重小资产阶级，只要有力量，小资产阶级自然要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过去失掉了好多机会，所以我对国际代表的报告是完全同意的。

和：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直到现在，此错误我们实不能宽恕。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国际也有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 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中央不实行而且相反。2. 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南京如此广东亦如此，五次大会即指明此点，但大会后仍照此方针。第一个决议即是要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所以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当时政治局以为小资产阶级动摇，我们孤立了，实则农民已经跟我们来，我们何尝孤立。小资产阶级是全体的动摇吗？还是几个上层的领袖呢？政治局没有看清楚，所以当时政局的呼声便是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3. 素来党的指导即未建筑在群众方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通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导简直与国民党一样，并且还以小资产阶级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识为转移。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以为这样旧的指导人必完全去掉，必有组织上的恐慌，这并不是群众的忧虑而是上层的忧虑。我以为这不是恐慌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有政治的路线组织上则不成问题，我们应将此

点向群众解释。最后，我说的是：过去的党的错误未达到群众中去，这次的错误要传达到群众中去，使群众都认识此错误，然后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

达：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1. 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党以为农民暴动是原始的，这是逃避群众的争斗，完全走到不革命反革命的路上去。2. 国际是无错误的错的责任全在政治局。政治局完全带着国民党几个领袖的意识来成立党的决议，五次大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政治局完全抛弃了。3. 过去党的指导不好有绅士的气概。过去曾有群众忿怒欲杀上层同志的事实，如湖南有许多同志要杀夏牺〔曦〕，把夏牺〔曦〕也当一个劣绅看待。党对这些现象不能解决，只能当书生坐在屋中决定策略。

亦：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大会时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得太多，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不郎基主义的精神，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来工作。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1917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听说这次国际代表很有革命的经验，我们自然满意，并希望国际代表能

将此点转告国际。此外我还有一点意见，在告同志书中应加一点：指出过去党是不能争斗的这是在组织上的错误。还有一问题，即是党的指导的问题。五次大会时还是一些元老来指导这是大错的。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来作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领导这是很对的。

弼：接受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1. 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尽尽〔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忽记〔视〕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第一问题是北伐问题，国际代表 ROy〔罗易，下同〕主张深入，鲍罗庭主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武汉政府的封建势力为要扩张其势力是需要北伐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北伐但要借此机会来抓住群众。结果不然，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北伐结果，唐等势力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2.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告说 C.P. 与 C.Y. 意见冲突，主要的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3. 党怕群众，如对学生代表大会不召集是因为孙科反对。劳动大会如此，工纠之解散也是如此。因此党处处牵〔迂〕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4. 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芬：1. 过去党的错误问题。党的指导的意识不是建筑在阶级及群众之上的。五次大会是群众意识之表现，成立了许多正确的决议。但五次大会后，党不发展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仍然发展

上去，党连尾巴都跟不上了。特立^①说：土地革命无法做，如做，则不但国民党反对，即党内的群众也必有三分之二反对，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2. 第二农民问题，秋收暴动问题，同志有以为要秋收暴动则须解决武装问题，忘记了农民武装要在农民暴动过程中来创造。我们也不是定要在此暴动来得到政权，而是要以此暴动提高乡村中的争斗。3. 过去党对青年问题，党的指导机关忽视了，五次大会独秀对 C. Y. 说了许多消极的话，他对 C. Y. 并且有家长的态度表现出来。以后应积极的指导 C. Y. 工作。

秋：以为草案中应加增几点：1.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态度说得不详细。应加说明党过去只看见上面的小资产阶级领袖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如前之态度。2. 中央政策与国际政策中加说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 对国民党中央中应加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攻击平山的第三党的主张。4. C. P. 对于政权的性质为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的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这几点已与国际代表商议，现在只是文字的修改。

和：还加一点，关于土地革命的解释。老鲍的解释与国际的解释不同，中央政治局过去渐渐采取了老鲍的意见，现应加入说明此点。

迈：国际代表提议停止讨论。我意：1. 过去党的指导错误问题大家同意；2. 指导机关改选大家也是同意。所以可以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

D：大家都同意，结论自无甚说的。亦、和说：鲍罗庭，罗易，魏金斯基之错误，鲍的理论自然是错的，土地革命不是能在学校中可以训练得出来的。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魏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

① 即张国焘

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至于指导成份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作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新政治局提出正式七人，候补五人。

至目前状况的估计，现在又是一种情形：农工都遭了摧残，反动势力高涨，革命遭了一严重的打击和损失，但革命并未停止。现在仍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但由民权革命的发展中而发展的阶级冲突仍未消灭。

民族革命中有五矛盾：1. 上面说过我们仍要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此第一矛盾仍然存在；2. 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土地革命便是解决此矛盾之最好的方法；3. 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之改良仍未实行，因此，必然要号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4. 工农城市贫民必然起来反抗一切压迫夺取政权；5. 统一中国现在不但未做到，而且更加分裂了。所有德谟克拉西的五个任务我们未实现一个。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浪潮何时爆发？反动势力能维持到何时？这只有在革命中才可看出。现在我们的党尽力号召坚决的斗争。我们先要有一正确的策略然后才能作此争斗。如还有人主张第三党，我们要很坚决的处以党的纪律。

最后关于告同志书提议在原则上付一表决，文字上则可推出三人组织一小委员会去修改。

迈：照国际代表提议付表决：

决：

1. 全体通过在原则上同意告同志书的草案。
2. 以秋、迈、兆三人组织委员会修改文字。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全体联席会议关于1927年8月9日
布哈林同志报告的决议(节录)
(1927年8月10日)

十九、在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的策略时，可能有(实际上已存在有)三条主要路线，对这三条路线应予以客观地研究，因为它们对中国革命性质本身的评价是不同的。第一条路线(右倾路线，它已公开地、直接地发展为孟什维主义)的出发点是：在战胜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统一之前的所有发展阶段，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此目的应作出一切让步(制止并反对进行土地革命，制止工人运动，反对工人的“过分”要求等等，以便“不把资产阶级吓跑”)；第二条路线(托洛茨基路线)则是从原则上根本否定(的确，这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在革命任何发展阶段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建立联盟的可能性。它认为，同资产阶级联盟和妥协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等等，最后是第三条路线(共产国际执行的列宁主义路线)。这三条路线认为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实行妥协是必要的，但只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在一定条件下，这条路线同时认为，在发展的条件发生变化和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等情况下，必须与妥协决裂，并同过去的盟友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陷入右倾，这种右倾观点的依据是，完全不正确地把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对

立起来；右倾代表人物认为中国社会基本阶级力量是固定不变的阶级，他们不懂得在原先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之间的阶级矛盾的扩大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懂得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将发生阶级关系的重新组合，不懂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必将为争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必然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进一步演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最高一级组织中否定阶级斗争观点，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孟什维主义的轨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满意地确认，在兄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中这种右倾已经消除，领导路线已经摆正。

二十一、托洛茨基观点的依据形式上首先是同1905年的俄国革命进行类比。当时，与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托洛茨基路线最大的错误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季诺维也夫同志等）不懂得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和高举反帝斗争旗帜的国家的革命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别。其实，列宁曾经直率地写道：“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① 列宁接着写道：“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妥协、甚至）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 最后，列宁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210页。

^②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版，第4卷第275页。括号内的话在中文版中已被删去。——原编译者注。

又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①因此，列宁的观点根本不同于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对列宁最大的歪曲，它依靠的办法就是严重混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差别，这正是社会民主党这种倾向最为突出的一点。

二十二、共产国际路线的基本特点在于这条路线是建立在对不同的革命阶段和不同的阶级力量组合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国际主张在中国革命的发展时期，在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下述情况下给它以支持，即：（1）当它真正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2）当它不阻碍共产党人用革命精神教育工农群众和成立工农革命组织的时候；（3）当它不阻碍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并允许其巩固和扩大的时候。在广州时期和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叛变（这次叛变标志民族资产阶级已从革命阵营转到反革命阵营），一直是这样做的，在那段时期内，不仅中国共产党壮大了，而且工农运动有了飞速的发展，成立了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工会）和农民组织（农会和农民委员会）。在这个发展阶段，同资产阶级妥协促进了工农力量的增长。正是在这一点上，生活本身及阶级斗争的进程首先证明了列宁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策略是正确的。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因此，共产国际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的策略路线：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张作霖集团以及反对蒋介石这帮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斗争。留在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内的一部分激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表声明讨伐蒋介石，并允许共产党开展工作。共产党自应利用这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211—212页。

一点来组织对卡芬雅克^①的“反击”和动员群众。可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压力，阶级力量发生了新的组合。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也脱离了革命，并开始镇压工农运动。鉴于这后一阶段的情况，策略和口号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即：退出武汉政府；共产党人向这个已不再是“真正革命的”政府宣战。

二十三、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共产国际都及时地预见到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并认为必须使群众作好这一过渡的准备；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不仅必须独立自主地大力开展工作，而且要坚决批判自己暂时的盟友哪怕是最左派盟友的任何犹豫和动摇，不断积聚自身的力量——建立群众组织和武装部队等，建立强有力的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进一步发展革命和深入开展革命的据点。开展土地革命，农民从下面夺取土地，扩大工人运动，武装工农，促使国民党民主化并撤销其动摇不定的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便是共产国际提出的主要口号。

二十四、共产国际在引导革命前进的同时，坚决反对超越尚未完成的革命阶段。它正确地谴责了退出国民党这一群众组织的观点，当时如果退出国民党，就是把它拱手让给右派，并使共产党人孤立于国民党群众之外。共产国际还正确地反对过早地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一口号意味着越过武汉政府和左派国民党，而当时它们尚在奉行我们上述那种意义的革命策略。共产国际既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中的右倾分子以牺牲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利益来迁就自己动摇不定的盟友，同时也坚决反对联共党内某些反对派在理论上对资产阶级的直接吹捧（拉狄克关于广州

^① 卡芬雅克，1848年残酷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法国陆军部长，以后这个名字成为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的通称。——原编译者注

“工农政府”的论述等)或是制造关于中国革命的极端机会主义理论(如托洛茨基的“关税”论)。

二十五、尽管共产国际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中国还是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国内以及国际上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利。另一情况是工农群众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足够的力量来打败外国帝国主义、以张作霖为首的封建主义和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敌人的联合力量或互相配合行动的力量。最后一个原因是工人阶级还来不及建立起组织坚强、人数众多的共产党。从另一方面来说,必须承认,始终对共产国际指示采取抵制态度的中共领导对于中国工农的失败也应承担应负的责任。

二十六、中国革命当前时期的特点是:革命已遭到沉重的失败,与此同时阶级力量急剧地重新组合,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起来反对一切有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正转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即为实行工农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阶段。前阶段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不能解决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民族解放任务,因为它既然反对工农,就不可能彻底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它将越来越趋向于同帝国主义妥协,而且这种妥协实际上将使帝国主义的统治几乎原封不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解决革命的对内任务,因为它不仅不支持农民而且积极地反对农民,从而日益趋向于同封建主实现联合,甚至连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也不会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几乎不可能同农民妥协,因为在中国,如果不打倒土豪劣绅和小地主,任何土地改革也是无法进行的,而资产阶级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因此,可能性较大的前景是:革命的暂时失败将在较短时间内为革命的新高潮所取代。

二十七、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遭到革命的所有敌人集中火力攻击的政党。目前它面临的任务是极其艰巨、极其重要的。它首先要清除党内的取消派,清算党的领导所犯的一切错误,在共产国

际指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重建领导机构。从基层选拔有直接革命斗争经验的新的领导人到中央岗位；与此同时它还要在武汉地区建立党的地下组织。

共产党应当同那些把民族解放斗争利益同工农阶级斗争利益对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进行坚决的、经常的斗争。革命叛徒打着孙中山思想旗帜把自己伪装起来的（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等）大肆宣传的这些反革命思想，其目的是使人民群众服从于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领导。共产党应当广为宣传，只有在广大工农群众对封建主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革命统一，把中国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

其次，共产党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把工会和农民组织（农会、农民委员会等）保存下来，加以巩固和扩大。

共产党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发动左派国民党的基层来反对其上层，在这方面大力开展运动。党应同时坚决有力地展开关于苏维埃的宣传。如果共产党使国民党革命化的尝试失败，如果使国民党民主化，把它变成最广泛的群众性工农组织的行动不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革命趋向高潮，那么必须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苏维埃。

同时必须尽一切力量开展土地运动，采用一切可能采用的手段武装工农，为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打下基础，党应当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以揭露蒋介石和武汉的背叛行为，毫不留情地剥下他们的一切画皮，要以工人阶级真正先锋队的精神行动起来，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引导最广泛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前进。

（章任贤译）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在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1927年12月13日)

布哈林

八、殖民地问题与共产国际

.....

现在我们谈谈中国的目前状况。中国革命不仅没有死亡，而且我认为可能出现一种新情况，即我们完全有可能正处在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前夕，这股革命浪潮已经建立在别的基础之上，是其他阶级力量推动的，具体地说我们将面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的发动。出现新高潮的这种可能性是以中国目前已形成的情况为基础的。首先谈两句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分子是否已经奴役了中国，按照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了中国问题呢？他们是否已经打败了反帝运动呢？只要这样提出问题，便可以明确地回答他们：他们并没有摧毁中国革命。的确，帝国主义分子占领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和经济据点，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英国人重新获得了他们在汉口的租界，而抛弃了英国代表奥马利同原武汉政府代表叶夫根尼耶·陈^①已经签订的协定。日本则悄悄

^① 即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友仁。——原编译者注

地下手夺取了满洲和内蒙古，并且在那里站稳了脚跟。现在日本在对满洲和内蒙古的关系上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1. 有权修筑连接南满铁路的六条铁路支线，完全享有南满铁路的专营权。

2. 日本人有权在满洲和内蒙古从事牛羊繁殖。

3. 日本企业有权开发满洲和内蒙古的森林和矿藏，以保证日本经常得到木材和矿物的供应。

4. 日本人有权在与中国人同等的基础上在满洲和内蒙古各地定居。

5. 日本人有权在满洲和内蒙古各地占有和买卖土地。

6. 日本有权在满洲和内蒙古所有地区设立警察部队保护自己的臣民。

7. 日本人应享有在这些地区开发任何地方资源的优先权。

8. 在满洲和内蒙古的中国军队中，中国人应当只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9. 日本人应享有在满洲和内蒙古各地修建学校和庙宇的权利。

10. 满洲和内蒙古应当受到保护，防止可能发生任何政治骚乱，任何外部军队，不管是中国军队还是外国军队，都不准进入满洲和内蒙古境内。”

这些极为苛刻的要求实际上把这两个地方一点点表面上的独立自主权也化为乌有了。我认为，在所有帝国主义集团中，对中国进行最大掠夺的恰恰是日本，它非常谨慎从事，在外交上比较少讲空话，很少采取各种各样使人注目的姿态，等等，但是事实上它在中国所掠得的东西最多。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断言，帝国主义分子未能解决全中国问题。他们在中国是一支被仇视的力量，他们一块块鲸吞中国，在那里驻有舰队，占领了部分地区，但是，尽管甚至采用了各种帝国主义手段，也还是谈不上什么他们“安

抚了”这个国家，也谈不上什么他们打断了中国革命的脊梁骨。原先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现在是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解决了这个中国问题呢？我认为，资产阶级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客观矛盾的发展不仅不允许当地软弱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而且事实上已经使堕落到依附于半封建军阀机构的中国资产阶级越来越软弱无力、四分五裂，不可能成为一支统一的力量。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下：拥有各色政治领袖的各种军事集团分裂成独立性很小或只有半独立性的各系将领，因此我们有根据说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现在那里的实际情况是，在华北、华南和华中都各有其集团。

这里举例来说，我有一份关于中部各省情况的综合报告：

“朱培德已据有江西。

程潜想占有湖北，但遭到挫败。

谭延闿看来正觊觎湖南。

胡宗铎正在湖北扎根。

白崇禧在南京。

陈调元在安徽。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浙江。

陈铭枢在福建。

黄绍竑在广西。”

南方也在发生同样情况。广州就有四个不同的集团。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与此相同。你们可以看到反革命势力正发生非同寻常的分化，非同寻常地分裂成许多派系。

这一时期在基层、在工农群众中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的中国同志们虽然在萨柯和樊塞蒂被杀害，美国实施白色恐怖时也举行过游行示威，可是在自己“家里”却“习惯于”如此残酷、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其罕见的白色恐怖。那里已经有成千上万我们

的拥护者牺牲了。那里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我们的同志——党员和我们的直接追随者大量地被肉体消灭。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那种暴行和白色恐怖的种种可怕情形，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反革命所采取的斗争手段的特点。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发生了这种种情况，要说我们的运动目前已被扼杀却是绝对错误的。相反，最近以来我们看到运动有重新活跃的某种征兆。我们看到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扩大。不久前我们收到了关于鄂北暴动的报告，一支农民队伍在暴动中占领并控制了一座城市。我们看到许多省都掀起了风潮，在广东省，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就有五个县是由农民苏维埃控制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农民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发动了真正的消灭地主的斗争。在那里大约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鼓掌、有人在座位上喊道：“少了，还要多一些。”）

在这个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了。

最后，我们现在还看到整个广东省，特别是在广州周围，已经形成非常紧张的局面。

根据许多材料可以断言，在中国正酝酿着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

敌人企图不仅采用白色恐怖手段，而且利用蒋介石和其他将领们任命的“领袖”所领导的黄色工会来摧垮和瓦解工人阶级。这里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也表现出极其伟大的英雄气概，他们献出了无数优秀的儿女，不管白色恐怖如何猖獗始终捍卫着自己的组织，并打击黄色工会的领袖。那里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敌人成批杀害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同志也用直接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将领们派来的黄色“领袖”（全场活跃）。那里斗争的残酷是前所未闻的。最近期间，上海、武汉、广州的罢工工潮高涨，而且工人的斗志非常旺盛。此外，还要指出，在

广东保存有叶挺军队的残部，这支部队在一旦广州发动事变工农行动顺利的情况下，可能起到某种军事突击力量的作用。

这就是中国形势的概况。

如果归纳一下我所说的一切，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帝国主义分子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其次，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自己的方法，即用扼杀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分子结盟和妥协的手段，不仅没有沿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前进一步，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自己反而日益分裂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现在分散到各个军队派系中去，这些派系目前从表面的社会现象来看已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正在争夺能保障生活直接来源的地盘，因为他们需要生存，需要养活自己的军队。而这些军队都是相当庞大的。南京集团有二十七万人，唐生智一派有十五万人，广东有数万人，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大量财力，这一切只有依靠对居民的残酷压榨才能维持下去。各派系之间为争夺每一个比较富裕的、有一定钱粮储备的省份而纷争不已。这样一来，这些大军阀集团连同那些被内部矛盾搞得晕头转向的资产阶级领袖们一起开始腐败了。

仍然存在着工农两大阶级，对于这两个阶级来说，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不会发生矛盾。仍然存在着两支社会阶级力量，尽管遭到极其巨大的损失，但并没有被粉碎。现在这两支阶级力量正在发展壮大、组织起来。因此我认为，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景方面，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产生悲观情绪。

至于所有这些过程在政治上或政党关系上的表现，我在这里只需简单讲几句。国民党包括其所有各派，作为革命力量早就不再存在了。这一论点是有充分根据的，因此我认为，关于这个论点无需多说了。从另一方而看国民党作为一支较大的反革命力量，也正在逐渐不起作用。这不是说，国民党“洗手不干”反革命了，

而是说，斗争本身的逻辑已把重心转到军事集团，而国民党各派五花八门的残余已成为这些军事集团的点缀。因此，这个一度相当强大的组织，现在已瓦解了，完全消失了，甚至作为一支反革命力量也正趋于消失。

不言而喻，苏维埃口号是我们当前主要的口号，中国革命发展得越快，这个口号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极其痛苦的阶段，目前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虽然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清洗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路人，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我们的队伍和被从肉体上消灭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仍以极大的英勇精神把自己的组织团结起来。目前党员约有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共青团组织约有一万五千人。最近期间我们对共产党的上层进行了清洗，其中包括谭平山因在土地问题上实行机会主义政策而被开除出党。我再重复一遍，尽管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党内的团结却是无可怀疑的。不用说，今后还会有各种摩擦，可能遭到局部的失败等等，但是按照目前阶级力量组合情况，我们党内团结情况，我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对中国大革命的前途感到悲观。

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从中国革命斗争今后顺利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中国革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提出了殖民地问题。我们以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接触过这个殖民地问题。从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原则性分析来说，我们对殖民地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但是，社会各阶级互相交错的全部复杂性，领导如此巨大殖民地革命的任务的全部复杂性，只是到最近才非常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我们具体地探索了整个殖民地革命的许多问题，而且在这同时，我们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十分清楚地看到，在确定我们具体的政治策略

时需要多么谨慎小心,需要多么认真地考虑某个国家发展的特点。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共产国际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 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1927年12月15日)

全世界的工友们！

全世界的被压迫民众们！

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士们！

广州在革命斗争之中，顿开一新的局面，广州的工农夺取了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鲜红旗帜已经在南部中国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揭起来了。广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实在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事实。

为反对工农，一切反动势力：列强帝国主义者，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军阀，及喋血的刽子手，都动员起来了，他们以最残酷的手段夺取广州。他们把广州包围得如铁桶一般，使广州与全世界隔绝。资产阶级的电报机关传出，红色的广州已经失陷了，现在正在大批的屠杀工人与共产党员，但是中国革命工人的红军已经突出重围，准备卷土重来。

假使这种消息是确实的，我们可以断言，反革命势力在广州的胜利必不能保持得很久。

广东省五县的苏维埃政权仍未被扑灭。新的争斗必然重复震动起来。革命运动并不因为局部的失败而便遭挫折，而必然比较以前更加扩大起来。资产阶级的军阀与反革命的刽子手必定要根本铲除，帝国主义的强盗们也难免被驱逐出境。但是他们现在还正在派兵遣将，企图扑灭中国英勇的工农革命。

赶快起来——赞助中国的苏维埃！

阻止派兵，派军舰或输送武器去扑灭中国革命！

拒绝搬运军用品上船！

一致动员起来，要求帝国主义的军队立即从中国撤退！

广州苏维埃政权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5期)

附 1:

纪念广州公社

(1930年12月12日)

雅罗斯拉夫斯基

三年前，1927年12月11日，“在革命搏斗的光荣城市广州，工人和农民夺取了政权。苏维埃的旗帜——革命的红旗——在华南首府上空高高飘扬。”^①广州公社存在了三天（准确地说是58个小时）——12月11—13日，随后被淹没在千万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泊之中：他们被肆意凶狠报复的军阀、为所受的惊恐而报仇的店铺老板和各色反革命分子所枪杀、处死和在街上被残酷折磨。

正如1905年十二月起义以后孟什维克诬蔑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说根本没有过任何起义，而且“本不该动用武器”一样，如今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也把广州起义说成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发作，是一种盲动。但是，正如1905年十二月起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样，广州起义“作为中国工人伟大英雄主义的典范留在劳动者的意识之中”^②，同时也是在中国的重要首府之一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尽管广州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只存在了三天，它过去是并且一直将是“革命的新阶段即苏维埃阶段的旗帜”。广州起义的伟大意

① 共产国际1927年12月15日的号召书。

②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工人和劳动者的号召书》。

义就在于，“广州起义是捍卫革命成果和使革命深化的一次英勇果敢的，完全必要的一次尝试，并直接转为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①。

托洛茨基分子试图贬低这次运动。他们所使用的论据，正是列宁1916年就爱尔兰起义答复卡尔·拉狄克时曾经表示反对的那些论据。

列宁写道：“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一切成见的一部分小资产者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堂、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就可以产生社会革命，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大概，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就是社会革命吧！只有根据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笑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②

实际上已滑到反革命一边的口头“革命家”托洛茨基，也可能还有陈独秀和其他叛徒，正是带着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在诬蔑广州运动。而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广州工人无比英勇果敢的精神是一种极其壮烈的，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因为在广州起义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阶级，作为为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封建主、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行动。如果说广州起义向反革命派表明了起义的方向并从而引起了对共产党人的更加疯狂的恐怖行为，那么与此同时，起义还向群众表明：在中国无产阶级也同样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2卷，第350页。

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

但是，掩饰广州运动的错误对于革命事业则是有害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指出了其中主要的一些错误：

“没有在工人和农民中，也没有在敌军中预先进行充分的工作；对于参加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党团组织本身对起义准备不足；全国性的领导中心完全不了解广州的事态；对群众的政治动员很差（未举行广泛的政治罢工，在广州没有成立经过选举的苏维埃作为起义的机关）。”

除了这些错误和缺点之外，还有过一些重大的失误。广州赤卫队没有利用已经夺到手的武器（三十门大炮和大量机枪）；把一些没有解除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留在广州市内；未能切断广州国民党人同广州以外反革命军队的联系；没有镇压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需要费用而对银行毫不触动。还有，革命的广州军队没有吸取街垒战的经验把广州政权维持得更久一些。马克思就巴黎公社指出过的一系列错误又再次重复出现。对于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主要的一条是起义既已开始，就应当坚决果敢地进攻）认识不足。对于“起义是一种艺术，必须认真加以研究”这一点也领会得不够。

中国同志所以犯了上述种种错误，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广州起义前中国共产党很少吸收工人入党，而中共的思想家中有不少“左”倾的和右倾的机会主义者，这只要举出谭平山和陈独秀就够了。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中存在有“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对群众工作（如对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工作）认识不足，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过分夸大，等等。只有坚决克服上述种种摇摆不定的现象才能帮助中国革命走上更加宽阔更为正确的道路。

但是，“遭到失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中国革命并没有被消灭，它依然存在。它拥有经过国内战争

严重考验的革命红军。它积累了大量的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革命经验。它已经有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有苏维埃在活动。恰好是现在，在广州公社三周年之际，国民党将领在帝国主义者支持下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和各种武器对中国革命的红军部队进行征剿。但是，帝国主义的任何力量，国民党的任何军队（他们已被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识破和万分憎恨），一句话，任何反革命力量也无法摧垮和阻止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将吸取革命的重大教训，届时“广大工农群众未来的起义将按照经过考验的完全正确的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并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成为中国的胜利的十月革命”^①。

乌传袞译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集》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书》。

附 2:

纪念广州公社四周年

(1931年12月13日)

约尔克

“历史上一些伟大战争和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无不是先进阶级在吸取失败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不只一次地而是多次地冲击后赢得胜利的。”

——列宁

1927年12月12日广州工人在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次革命的变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海员、印刷工人、人力车工人、装卸工人等等组成的赤卫队及站到革命一边的教导团的参加下以及广大城市贫民阶层的协助下完成的。

广州苏维埃政府存在仅仅数日。但是这一新革命政权却显示出它确是真正的劳动者的政权。广州苏维埃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关于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所占一切土地、无偿地分予农民以及废除一切盘剥性债务和租赁契约。广州苏维埃还发布了关于没收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房屋并让劳动者迁入其中居住的法令。除奸委员会在工人帮助下，特别是在妇女的帮助下逮捕了许多出名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的人民的敌人近七百人。

广州苏维埃成立后几个小时就发表了致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和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充满兄弟般情谊的书信，宣布它忠于争取

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事业。

尽管广州公社实行了真正的革命政策，尽管赤卫队和工人表现出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但这个英雄城市遭到在帝国主义舰队积极支援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八方围攻，公社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失败了。

白色恐怖在广州以致全国蔓延，其猖獗程度前所未有的。起义被镇压后几天之内，仅仅一个广州就有六千多人被用最野蛮的方式杀害了。工人被活活烧死或机枪打死。

但是，无论是血腥恐怖，还是中国和帝国主义报刊拼命散布的关于广州公社的极其卑鄙无耻的诽谤也好，都不能帮助地主资产阶级抹去群众对十二月广州起义的怀念。国民党无力作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公社是革命的新阶段，即苏维埃阶段的旗帜。广州公社提出的口号第一次向全国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形式的苏维埃问题。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从公社建立的头一天起，就猛扑过来镇压红色的广州。正因为这样，刚刚得势的中国反革命肆无忌惮地实行恐怖政策。

广州起义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的作用，因为在这次起义中，正是无产阶级肩负起了把革命推向高级的苏维埃阶段的使命。

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所以能实现，其原因在于，中国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土地纲领和为完成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所进行的忘我斗争，调动了最广大的贫下中农的积极性。

现在的苏维埃运动是1927年广州公社的继续，这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结果。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之中，提出了苏维埃口号，它在残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不懈地工作，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曾出现了无数次的工农暴动，湖南、江西、广东、江苏的贫下中农

群众奋起反对地主的奴役。湖南萍乡的煤矿工人，水口山矿的矿工，湖南大冶工厂的工人武装起来并到农村同起义农民会师。游击队的不断增加。江西和福建的山区，在东江流域的广东、海南岛，在广西西部相继建立小块苏区。在几十个县里建立起了新的革命政权机构（苏维埃）。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爆发的苏维埃起义，证明了整个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也反映了这一运动的弱点。运动应该紧密联系起来，有组织地开展，必须把运动引向广阔的道路，使其与大工业中心城市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同国际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于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了这一使命。目前，在通过共产党越来越有计划实现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苏维埃运动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甚至得到帝国主义广泛支持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也对这一运动无能为力。

江西的苏维埃经受住了三次大的“围剿”。现在连白匪军指挥部门也不得不“承认”江西红军最近获得的秋季胜利。南京政府军令部长何应钦对英国报纸的记者说：“为了消灭红军——一致努力也得有一年时间。因为共党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政府，更糟糕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实际上已被苏维埃化。”（《华北先驱报》1931年11月）

合众社10月17日消息称，“领事馆的通告指出，现在共产党人控制着整个江西并指出湖南很快要步江西的后尘”。

同时，苏维埃运动在湖北、安徽和河南获得了显著进展。红军第二和第六军在击溃国民党军之后，占领了武汉附近的几个县城。“过去红色政权只控制湖北的东北部和南部，而现在湖北北部也出现了红军的强大力量。现在湖北除武汉外已没有一块平静的地方了”。（《大公报》1931年10月14日）鄂豫皖边区有五个县在红军手中控制，河南有四个县建立了新的苏区。甚至在北方，晋、陕和绥远交界地区也第一次出现了一批苏区，建立了红军第二十

四军。最近几天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个政府现在代表着不少于六千万加入苏维埃组织的中国劳动居民。

王德威尔得曾预言：“苏区的共产党将象广州和上海的共产党一样被镇压。”现在这一预言破产了。托落茨基曾发出可怜的革命嘟囔，说什么中国的苏维埃只是一种“装饰品”，“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是一种虚构，是自欺欺人。”（《不断革命》）这种说法同样被彻底戳穿了。

中国的苏维埃现在已成为普遍的事实。广州公社的口号在千百万工农的革命实践中已变为现实。

自广州公社陷落至今，已四年过去了，四年间，南京反革命势力一直统治着中国，因此，非苏维埃地区变得腐败之风盛行，一片衰落景象。国民党恬不知耻地要人相信“中国已经统一”。可是，国家依然像过去一样，为各军阀所割据（有广州“国民政府”，有西北的阎锡山政府和冯玉祥政府，山东还有个韩复榘政府等等）。

国民党竭力吹嘘其外交上的“成就”，吹嘘和帝国主义签定的新的可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的协议和条约。“签订过三十个光荣条约”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几乎成了民族英雄。但是，骗局很快就被揭穿。最近四年以来南京在各方面系统地推行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政策，同帝国主义一起反对中国的苏维埃，反对工人运动和苏联，这一切的一切就直接为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和瓜分中国提供了基础。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统治，使中国人民群众无力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进攻并使国家处于奴役地位，这一点现在连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十分清楚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刚获悉满洲被占领的消息时，便严厉抨击了昨天还为他们所崇拜的偶像王正廷。现在广大工人群众已认识到，国民党是使民族蒙受耻辱、满洲沦陷和中国被瓜分的主要罪魁祸首。现在他们正在“推翻国

民党政权，是国家争取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的口号下投入反帝运动。

国民党曾向农民许诺实行土地改革，向工人许诺实行劳动法。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对工农的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统治阶级却将打击的矛头转向了劳动人民。

地主、高利贷者和军阀急于要保住自己的财产，使其所受危机的影响并使自己在1925—1927年革命中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于是加紧压榨农民，向他们征收高额地租、提高利息和增收新的税捐。对农民的这种掠夺，造成了1929—1930年的大饥荒，在中国一些主要省份受害者达七八千万人之多。1931年的大水灾是国民党官吏多年来掠夺从农民那里征收来修建堤坝的资金造成的后果。根据最保守的计算数字，这次水灾仅在一个华中就使3万人丧生，1千万人无家可归，3千万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商业报道》1931年10月12日）。南京政府企图把造成这次人民遭灾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说什么“红军炸毁了堤坝”（《商品贸易》周刊1931年10月30日）。但是，连顽固的帝国主义报刊也不相信这种笨拙的和恬不知耻的谎言。

由于饥饿，流行病到处盛行。据最新消息称，河南、山西和陕西淋巴腺鼠疫和痢疾猖獗，在河南有五十个县鼠疫传染。据陕西省统计，西乡县已有二千人死亡（《华北先驱报》10月20日）。

在中国历史上大的自然灾害如水灾、饥饿和流行病等时有发生。这是由于对农民实行封建和高利贷掠夺造成的结果，是封建制度发生危机的表现。但是，在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力的情况下，在苏维埃革命已在国内几个省份获得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发生类似的危机，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现在，中国的劳动群众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沿着苏维埃道路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

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在成长和发展。苏维埃运动进一步扩大,红军屡屡获胜,大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特别是政治罢工日益高涨,饥民和水灾灾民自发地采取大规模行动,以及广泛的反帝运动不断扩大,上述种种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占领满洲以后,全国掀起了反日和反帝示威游行、罢工、抵制日货以及群众性抗议集会的浪潮(9月26日上海20万工人、学生和职员举行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0月7日南昌有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成都、广州、济南、北京等地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帝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潮流,一方面卷入这一运动的有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他们暂时还跳不出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范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抵制日货,通过这种办法,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着实发了一笔财(《商业报道》1931年11月9日指出,中国的纺织业工厂主们,在抵制日货期间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扩大了生产)。

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尚未摆脱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还抱着某种幻想,指望在美国“民主”和国联的帮助下,有可能使国家获得民族解放。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现在的反帝运动。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帝斗争仍在重复过去历史阶段的做法,停留在1919年反帝运动水平上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反帝运动已经远远走在前头,将为实现中华苏维埃而斗争的口号作为具体的行动纲领提了出来。正因为这样,工人和共产党员参加并领导的全民反帝运动必将超出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将矛头既指向帝国主义,同时也指向国民党,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工人和共产党员控制了1931年9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反日群众大会。当时,一批先进工人在参加集会的20万工人、职员、学生和城市贫民支持下,把国民党的主席团赶下了台并在共产党提出的口号下主持了整个的群众大会。

无怪乎蒋介石下令对“捣乱反帝运动的分子要像镇压土匪和赤匪一样进行镇压”。无怪乎对工人的反帝行动实际上采取了最残酷的镇压措施（在上海、广州和其它一些地方都采用机枪扫射、逮捕和屠杀等）。

只有在工人和共产党员参加之下，运动才能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领导他们，并带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具有民族思想的阶层一道前进，使反帝运动转到反帝和反封建的苏维埃革命的轨道上来，才能为现在的反帝运动开辟唯一的革命的前景。这一前景之所以能变为现实，是因为无产阶级正通过苏维埃运动，使贫苦的农民后备军参加到反帝战斗中来。

“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斯大林）。这个真理现在已为千百万革命工人所理解，他们通过日常斗争的体验确信站在地主、高利贷者和本国资本家背后的是十分强大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现在处于苏维埃革命阶段，它要同时解决两项任务：消灭封建压迫和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也是现阶段革命伟大力量之所在。但这同时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就是要围绕反帝反封建革命口号，将极其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组织起来。

广州公社的经验对现阶段革命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须知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广州苏维埃与农民暴动地区相隔绝，事先对群众缺乏有力的政治动员，对黄色工会采取的策略不当，因此，未能使这些工会的群众起来反对其反革命的领袖，等等。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这些任务：即使城市和农村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问题，控制住黄色工会群众的问题，善于对极其广大的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同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苏

维埃革命的胜利结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领导下，定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光荣地完成广州公社开创的事业。

(胡树林译，马宝华校)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8年2月10日)

一、中国的军阀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

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的崩溃更加急速。江精卫派自从武汉政变之后，一步一步的反动，从“分共倒蒋”（宁汉政府合并的时候），进到“汪蒋合作”；从“分共以后，要做纯粹三民主义的工农运动”以及“二五减租”等等，进到封闭省港罢工委员会，进到提议“停止民众运动和对俄绝交”。这一派在广州暴动之后，可以说已完全消灭而归并到蒋派：军事上张发奎的势力几乎已被黄绍雄、李济琛所消灭，他们除依附蒋派外别无出路；政治上汪精卫被逐，而何香凝等归降到蒋派。于是开始蒋派与广西派的斗争。现在广西派占有两广；并且已从湖北攻入湖南。蒋派占着浙江、福建、江苏以及江西。同时江苏的上海仍旧在广西派之手，广东派的买办资产阶级予广西派以相当的赞助，他们又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老走狗如傅筱庵等已倒台了）。湖南之内有唐生智的残余军队，还有程潜等的湘系军队，广东之内有钱大钧、陈铭枢等蒋派军队。蒋与广西派的争斗，便是争广东，争两湖，争上海的斗争；广东的蒋系军队要想夺取政权，是在他暗中联络张发奎、黄琪翔对十一月十七日打倒黄绍雄时，就可以看出的，现在陈铭枢、钱大钧军队（还有范石生、方鼎英的杂色军队）与李济琛、黄绍雄之间酝酿着斗争。不过最近李济琛让陈铭枢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似乎这是他们对蒋的一种策略，他们要腾出时间来准备，扩

充自己的实力。两湖之内，程潜、陈嘉佑等军阀（还有方振武、邓宝珊等军队在豫鄂之间）是与桂系军阀相仇视的，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当然蒋介石要利用。现在桂系要教陈嘉佑做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带着缓和斗争使不立时爆发，以腾出时间来准备的策略。上海呢，从蒋介石要重新登台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蒋派与桂系一直是暗斗的。蒋派在上海资产阶级之中，也有一些勾结，这就是浙江商人虞和德等比较工业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是有亲日倾向的，他们在上海现在是失势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暗中是赞助桂系一派的新买办资产阶级，同时也就反对蒋介石的攫取上海，这是最近《字林西报》公开的警告蒋介石的。蒋派与桂系争上海的争斗，迟早是要爆发的。

此外，蒋介石现在把持了南京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和最近所开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差不多完全是蒋介石派清一色的。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与中央政府，还部分的依赖冯玉祥、阎锡山拥戴。他不得不高唱北伐——帮助冯玉祥。但是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是有冲突。北伐实际上是停止了。阎锡山是打败了。蒋介石是要巩固他在南部的势力，不愿立刻往北打。只有冯玉祥是不能不打，河南的情形是非常之坏。而且他的背后又有于右任部下的邓宝珊以及方振武等。他独立不能战胜张作霖。北伐大致是停顿的。

南北各省的军阀，分裂混战，这是一般的情形。

帝国主义要在这些混战的军阀之上，做支配者。最近，帝国主义者提议督促南北合作起见，开关税会议。北京政府并且提出实行关税自主，提议实行——二五的关税“国定”税率。

各省军阀的统治是异常的动摇不稳定，内部之冲突是非常之厉害。

各省军阀统治之下，财政的恐慌达到极点，纸币价格低落不堪，两湖、广东、河南、直隶、山东、东三省，无往不是如此，他们还要滥发无限的不兑换券（只有浙江一隅比较好些）。

各省的经济恐慌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中失业的众多为从所未见，乡村中农民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各省军阀的军队日就崩溃，兵士索饷的哗变，或者简单的掠夺已经常常听到。

国民党军阀与国民党军阀的统治^①，一般都是动摇的。

二、豪绅资产阶级的进攻与工农革命潮流

广州暴动之后，豪绅资产阶级的进攻，便乘胜的急遽起来：

（一）广州的工会全封闭，屠杀工人到五六千；最近还有许〔多〕机关被破获，拘捕四五十人。

（二）武汉已经公布命令，取消一切“共产时代”工会所订的条件。最近一月以来被捕被杀的工农及共产党员，在全省算来，总在一百二三十人以上。

（三）上海的阴历新年，也是有极大的资本进攻，要取消工会的一切条件，要自由的雇用与解雇权，现在已经大批的开除工人店员。单是新年被开除的，总数在二千以上。

（四）湖南在战争的时候，长沙的共产党机关破获很多处、被捕的据说有一百人以上，被杀的已有十人。

（五）其他江西、安徽，差不多没有一省没有极严厉的白色恐怖。

（六）对于农民，则江浙屡次严令禁止抗租，两湖则已明令“照旧交租”，说是依佃业双方自由意志的协定，就是抛弃政府规定减租额的政策。

国民党便是这种豪绅资产阶级进攻的政权。

国民党最近中央会议，更明显的要抛弃一切“共产党式”的组织和办法，正式取消工人部、农民部，正式“暂停”民众运动，取消各地一切党部，要由蒋介石的新中央另派人去办理。总之，凡

^① 原文如此。 一编者

是有一丝一毫“非军阀式”的组织方式和方式，虽然是极表面的民众运动，也要取消。

这种反动之中，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呢？

自发农民暴动正在蔓延发展。

山东的饥民骚动，河南、直隶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骚动，奉天通化大刀会已经占领三四县。这些运动表现北方军阀统治的崩溃，一般民众的反对军阀战争。

国民党治下，尤其是广东，在广州失败之后，各地的农民仍是奋勇的起来：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还存在着，他的周围潮梅，惠来，五华，紫金等处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北江的乐昌、仁化一带有农民暴动；南路海康(xaN Kah)等处也有农民暴动；西江广宁等处有农民的斗争。可以说，广东各县农民都在与豪绅民团等搏战之中。

广东还有琼崖岛上极大的农民暴动，农民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在几县之中成立起来。

现在可以说：广东有两个区域农民有自己政府和军队：——一是海丰，一是琼崖。

湖南的南部宜章等处有叶贺的残部，已经和当地农民联合起来实行暴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地方（茶县到万安、遂川一带）也有以前湖南的农军及安源的武装工人，和农民联合暴动，万安及遂川的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湖北的东南中各区都有农民的武装斗争。

江苏、浙江有些县份之中有爆发这种斗争。

就是职工运动虽然处于城市中极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仍旧有不断的经济斗争。

广州失败之后，不过一礼拜，而工人的经济斗争又有开始。武汉有些纱厂罢工。上海的罢〔工〕及“劳资纠纷”，差不多每天都有。

革命的潮流显然不是低落的。豪绅资产阶级因为内部的继续不断纠纷斗争，以至于混战，因为一般的全国的经济危机没有出路，他绝不能在屡次残暴的压迫工农革命运动之后，找着丝毫“改良主义”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般工农群众的生活恶化，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都在苛捐杂税之下。广州暴动开始了苏维埃暴动，开始了工农兵三大力量联合革命的序幕。一般民众的出路，是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在农民的自发斗争——甚至不自觉的攫取地方政权——之中，是很明显的。阶级斗争已经到了最剧烈最残酷的形势。

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农民的自发斗争，已经很多处进于群众的剧激进攻，杀收租人收税人，杀债主，杀豪绅，进而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有好几个地方，进于割据的局面，而建立苏维埃。这些地方之中，只有广东有广州市的工人能够起来做他们的领导者，工人群众已经是感觉到力争政权的决心。其他地方，武汉、上海，甚至长沙，却都还没有进到这种程度。

第二，是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广东、两湖在军阀崩溃上，在农民斗争的程度上，在一般群众的情绪上，是很有开始暴动夺取一省政权的可能，而在江浙情形便不同。中国条件之下，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是许多半独立性的区域，各区的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是受工农革命潮流的强弱而异其动摇的程度——开始于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但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自然必须有比较全国范围的发展，尤其必须有上海——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如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形势，自然使我们不能不想着如何联络呼应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切实深入

上海无产阶级群众的问题。

四、工人运动中的问题

因此，工人运动现在对于我们党是很严重的问题

(一)如何取得群众深入群众。赤色工会一律遭着极严重的禁闭、残杀，凡是非国民党旗帜的工会及一切种种工人团体，都遭着禁止。现在在上海的“工人总会”——蒋介石派工会，开始以小惠引诱工人。国民党工会的办法是如此的！凡是非国民党的工人的一切斗争，都称之为共匪，资本家因此将这些工人整批的开除，如果是经过国民党的工会，那么同样的斗争，他们可以给工人一些欺骗的应允，或者还有一些小惠，例如被捕的人可以由他们保释，开除的工人可以得些偿金等等。在这种白色恐怖和强迫的诱骗之下，工人群众逐渐的畏惧斗争，要想在赤色工会之外，另找一种比较不危险的组织形式。最近上海工人之中，甚至工人同志之中，有一种兄弟团、姊妹团的组织。他们找一定人数，大致都是很小的团体(三五十人)，他们相约互相帮助，其中一人吃亏，则群起拥护，这一团体以外，他们不管；他们讨厌共产党召集他们去开会，讨厌罢工，这些同志有时竟说：“现在不能暴动，你们(党)什么时候暴动我们是来的；你们要我们来开会罢工发传单，我们是不来的——这要砍脑壳的。”

湖北则失业工人已达十六七万，这个数目已经有不少时候了。那地方也有与上海前一时期相像的现象。大致工人之中有两种情绪：少数急进的分子是要实行恐怖主义，甚至一切争斗，小小的经济争斗，都要求党另外派人去暗杀某某工贼“然后再有办法”；多数群众是畏惧与共产党相接触。

广州工人的情绪，在暴动之后，却还是好的，与上海不同。

我们在职工运动之中，必须在争斗的进程里，1. 创造群众的赤色工会——秘密工会，同时，这就是说必须在斗争中引进更多

更广大的党外群众，利用种种可能的公开形式，去领导工人斗争；2. 必须不断经常宣传我党的政纲，从劳动问题上的政纲，一直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必须很有耐心的与群众解释。这两种任务是非常主要的。

五、农民问题

我党土地问题的党纲，固然已经很明显。一般的我们是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但是关于自耕农的问题，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形：一方面如江苏等处，贫农（小自耕农）是很多，最小的自耕农有只有三四亩的，甚至一二亩的；这些贫农、失地农民、雇农等等，听见“租田当自有”的口号觉得不够，因为这个口号只有利于佃农，而这些地方的佃农，又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完全解成租田当自有，所以这些地方的贫农是要求公分。别方面山东、河南等省的有几个区域私有田地较多的自耕农多，其中有许多表示反对分配土地。

至于海陆丰的经验，则自耕农表示不愿意铲去田茖，表示不愿意焚去地契。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存在已过三月。最初农民起来是杀豪绅地主，焚地契铲除田茖。东江几县苏维埃大会决定将土地收归公有，由苏维埃分配土地，发给土地使用证，令一般农民都焚去田契。但是后来执行这种议决的热心，比较的低落下来，海陆丰区域内实行分配土地的并不多。一般雇农的情形如何，还没有详细报告。

如果完完全全的分配土地不能立刻执行，那么，同时就发生雇农的问题。这就是说，在海陆丰等处，一面要更坚决的执行部分的分配土地，一面要组织雇农工会，颁布保护雇农的条例。其他各地农民暴动尚未胜利的地方，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依照当地情形！有必要时，必须领导雇农的斗争。

这种情形，使我们要极注意的审查这一问题：是否须要对完

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土地不但禁止买卖,并禁止雇佣),拿这一口号做中心党纲,而对于情形不同的农民斗争发展程度较差的区域,提出过渡的口号以发动自耕农,同时在这种斗争过程中组织贫农,——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北方农民斗争(河南、山东、直隶、东三省),大半还是原始的宗教的大刀会红枪会等。他们的发动是反政府反军阀战争反捐反税。这运动之中,还有豪绅分子的领导。我们在他们之中的影响虽然已经有些,但是还很弱(河南红枪会在农民暴动时——大致是十二月——已经表示中立,但是亦有很多受豪绅指导而反对的)。这里,虽是没有找着相当的方式,——虽然原则上我们是主张争取他们的群众。

六、兵士运动问题

军阀军队的崩溃,已经是开始了。我们的兵士工作可惜也只是刚刚开始。除广东以外,可以说还没有工作。这一问题是非常严重。没有兵士的参加,工农暴动的胜利是很难能的。

现在的情形是:(一)财政经济的总危机,兵士欠饷的日多,所以自发的简单的兵变,没有政治意义自然还居多数;(二)因为半年来白色恐怖,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执委等,有许多被驱流落而去当兵。客观上兵士工作的可能是很多的。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对于兵士的口号也已经有决议(在广州暴动大纲上)。只是这一工作组织上还太弱,再则这一工作尤其必须有相当的经费。

但是,兵士问题之中始终有很大的困难。

大多数的军队,除掉湖南唐系军队之外,始终是大多数非阶级化的群众,而且他们的驻在地点,都是外省。这些分子——多少是与生产脱离的。他们是所谓普通的穷人。简单的“土地分配给兵士”的口号,不能够十分吸引他们。因为当地农民暴动,不能分给他们土地,他们也无从立刻取得资本和农具,他们自己不

愿做什么工作，他们的“解放”是拼命的方法居多——掠夺，爱成土匪；再则地方观念使他们与当地农民相隔离（海陆丰的经验是如此）。

如果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和一般贫民多少非阶级化的贫民（连兵士在内）联合，那就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必须有更进一步的决定。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争斗方法，也有极剧烈的爆发，要号召一般贫民群众去摧毁一切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征发有产阶级财产救济贫民。同时，要求主客观上组织力量的异常强大，一等到有比较大的中心区域，所谓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建立时候，恐怕非部分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不可。

这一问题我们还没有确定的见解。

而且暴动胜利之后，我们自己军队的组织也成问题——恐怕初期仍旧不免带雇佣军队的性质。

七、党内问题

客观上说须阶级的不稳定与农民自发暴动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实在有很大的弱点。虽然，我们在八七会议之后，竭力求改良党的情形，但是至今没有多大的成绩，尤其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我们最好的党部受着很大的摧残。

现在：（1）白色恐怖到处摧毁我们的干部，江苏已经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简直丧失大部分的干部，书记被杀，北方顺直也是如此；（2）城市中组织有削弱的趋势，有流动“过门”的现象，尤其是上海；（3）乡村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个人领袖；（4）群众，尤其是上海，觉得党是他们之外的组织，希望党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救济问题。这些现象自然各是不好的现象。

必须努力使党能发展而深入工农群众，提拔新的工农分子到干部中来，实现必须的民主主义化（在可能的条件之下）。

这种党主观力量的生长，能不能赶得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是

一切〔个〕很严重的问题。

再则党内还有许多问题：

(1) 马哈衣主义。便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例如广东省委(李)^①、将广州失败原因，完全归到知识分子的成份上，主张改组党部为第一任务。其他事实不多举了。

(2) 原始的民主主义化。民主主义化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就是反对集权，主张“下级群众”不满意的政策便要改，下级不满的人，上级要立刻撤换。主张机关要对群众公开说以前的党是知识分子的，现在工人群众应当夺回来(北方)。

(3) 先锋主义。C. Y. 的先锋主义仍旧存在，中央虽然尚好，但各地 C. Y. 反党的空气，还是存在着。

(4) 盲动主义。最早上海有以暴动响应无锡的倾向，而方法便是以硬打手段逼迫工厂罢工。后来湖北 C. Y. 又主张在唐倒时立即暴动。湖南十二月十日暴动又是只有军事准备——军事阴谋。其他各省，往往 C. Y. 地方报告已决定暴动(江西，河南等)——然而 C. Y. 地方来信并没有提及。这种不要群众的以暴动为目的的倾向，至今还没有完全去尽。

(5) 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同时有些同志怀疑革命之高涨，重新从造党再说，或者主张兼〔简〕直要提出革命低落时代的口号——就是把现在的口号降低。

(6) 革命性质问题的疑问。有许多同志以为现在既然提出苏维埃革命，那当然是社会主义，不会是民权主义独裁制而是无产独裁。

(7) 因此关于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也有许多意见。一种是说

^① 关于李的问题因时期太短，不多说，材料已另送上并见毛辨函，中央已三函去纠正，并已令李来此讨论。

当初不应该加入国民政府。一种是说一切错误来源都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虽然还没有讲到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一种是〔说〕早就应当实行苏维埃革命（有人公开说反对派是胜利了）。一种是说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根本是反革命的，他的主义也是反革命的。一种是说国际也有许多错误，因为他尽许多力去帮助国民党。一种是说八七会议不举起苏维埃旗及没有一切他的口号是“机会主义”^①。

这些问题与过去的问题，因为秘密状态及工作忙碌还没有讨论终结（同时党中借口于各个同志过去参加总的机会主义错误，时时有互相的攻击）。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

^① 此句原文如此。——原编者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1928年2月)

罗明纳兹

—

显然，在日内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工作中，中国问题即使不占据中心地位，也必定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之后的九个月期间，中国国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中国革命出现了如此急转直下的突变，以致各个阶级的作用和它们的组合都发生了变化，因而最后，迅猛涌现出来的事变揭示出革命过程的一些特点和新形式，使得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现在竟具有十分新颖的内容和意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能只限于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局部的“暂时性”问题作出决定；它必须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会讨论过的那些问题，全都重新提出来。问题并不在于撤销或“修正”（这个词的一般通用的含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和决定，因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已经证实了它们的正确性。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革命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着，因而昨天完全正确的东西，今天竟然是有所不足的了。共产国际基本上正确地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一般任务、性质和发展趋势。然而，即使这些一般的决定，今天也应当有所改变，因为中国在1927年四月和七月事变之后所进入的新

的历史时期，展示出丰富的新内容、意外的独特斗争形式和斗争力量的对比。革命的实践丰富着革命理论，并推动着革命理论向前发展。目前，若是对中国问题仍抓住陈旧的一般公式不放，即使这些公式曾经一时是正确的，那也意味着把革命理论从行动的指南变成死板的教条。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不只是策略上的问题，而且一般的问题（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都会重新地、不同于以往地提出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需要极其重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决定着中国共产党长时期的整个战略方针。单单这一项任务本身就已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何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还面临着许许多多“暂时性”问题，这些问题使这项任务更加复杂了。目前，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呢？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还是革命的发展出现了停滞？那些几乎每天都从中国来电中获悉的消息——罢工和起义，是那些分散和撤退的革命阶级的后卫战吗？它们是开始出现革命斗争新高潮的信号吗？特别是，广州十二月起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革命低潮中盲动的范例”，还是日益发展的群众革命运动在反动阵营中打开的一个大缺口？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巩固和加强了吗？如果没有，那末，为什么在几乎整整一年里，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惨重呢，这些问题使全世界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群众焦急不安，期待着共产国际现在给予解答。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和事变的整个进程，将有极其重大的直接的实际意义。这个解答将决定中国共产党最近整个时期的策略。而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虽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虽然它的队伍在白色恐怖的打击下大大削弱了，但它在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却起着巨大的、独有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劳动群众唯一的革命政党，而且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力量。中国整个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个力量的行动方向。这已为过去的全部经验所完全证实。1927年4—7月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危急时期，公开抗拒共产国际的路线和要求，实行了极端机会主义的、半孟什维主义的策略，因而束缚了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使群众的队伍混乱起来。中国共产党八月会议以后，纠正了这个时期的错误，撤换了党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蓄意偏离共产国际给它规定的路线的危险，可以认为是消除了。现在，整个问题就在于，这条策略路线将是怎样的路线。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必须通过一些至关重要的决议，以便最直接地声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斗争的结局。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工作中，中国问题将占据最主要的地位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地位。

每当共产国际面临目前中国问题这样复杂而又困难的任务时，通常总是要通过各种见解、观点和实际提案的冲突与斗争，任务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之前为中国问题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对于许多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原则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中间显露出意见分歧。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展开的争论，毫无疑问会引起我们党的广大党员群众很大的兴趣。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向《布尔什维克》的读者介绍那些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解决的主要争论问题。然而，这篇文章并不企图淡漠地、不偏不倚地阐述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中出现的各种观点；本文将尽可能地不以论战的方式、而以实证的方式来阐明和维护有关中国问题的一条明确的路线。

二

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最确切地客观上查明每个历史关键时刻的阶级对比和具体特征。我们布尔什维克要按照一切

科学的政治论据，永远力求忠于这个绝对必须照办的要求。”理解一切历史时期的性质的关键，首先就是阶级的对比关系。因此，应当依据这个准则来研究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民族资产阶级已从革命阵营完全、彻底地转到地主军阀反动派和外国资本的阵营中去。但是，从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是非常错误的，而且经常是不完备、不确切的。我们来列举几个错误结论的例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米夫同志同我争论的时候，说过下面一段话：

“不能从政治舞台上撤除(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恰恰是(1)资产阶级还能通过民族主义途径把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群众，以及关系重大的中国农民阶层带领起来。争取这些群众，争取这些还处于资产阶级分子影响之下的农民阶层——这个斗争向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是：要忘我地进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尽力促使那些在社会上同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力量摆脱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把广大群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再也没有比米夫同志的这些论点更谬误的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坚决、彻底地向外国资本投降了。它恬不知耻地叛卖了民族革命的旗帜。它完全公开地与帝国主义者达成“交易”，以便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而且，在这种“交易”中，帝国主义者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交易双方，而是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和阿谀奉承的奴仆。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过份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在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上，起着卑贱的奴才作用，中国南方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直接依据帝国主义者的命令，同苏联断交了，这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遭受了损失。中国南方与苏联断交，会大大削弱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的地位，这个行动仅只有利于外国资本，对于这一点，未必

会有人怀疑。^①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早已消失无遗了。总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公然的反民族的性质。要想证实这种情况，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和事实。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引证公认的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两个官方声明。请看蒋介石 12 月 13 日对外国记者所作的声明。

“我现在的信念是：我们不应当仅限于同苏联断交，而且还应当同其余大国联合起来，以便同共产党作斗争。”

请看那个直到最近还企图以坚信孙中山遗教的“左派”、激进“国民党人”自居的汪精卫，由于刻骨地仇视工农运动，而在 12 月 1 日说了些什么。^②

“我们依然坚持以往的观点，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今后将不会再像我党处于共产党人影响之下时那样的强硬了。以往的对外政策，在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影响之下，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外国的特征。现在，和共产党人决裂以后，我们将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我们的行动取决于各个大国的行动。今后，我们将不再使用以往的那些排斥外国的口号，斗争方式也将有所改变。”

详尽地论述这两个声明，是没有必要的。既然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们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什么别的，

① 前几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报道：在汉口，“根据中国当局的命令”，封闭了苏联商务代办处分处，驱逐了它的工作人员。同中国广泛进行贸易活动的苏联商务代办处，是在中国同苏联断交之后，根据中国商人的要求，在整个华南地区保留下来的。如果它们现在被封闭了，那是由于军阀当局骇人听闻的横行霸道和英国资本的强求而造成的，因为英国资本在资产阶级和地主反动统治时期随心所欲地主宰一切。

② 这个令人厌恶的丑角的“左派”词句，使得某些共产党员（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我们这里，在苏联）迷惑起来，继续认为汪精卫是激进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国民党内一个应受“十分重视”的“独特派别”的代表。

而只能叫作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卑鄙的背叛。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殖民瓜分的计划，不仅不会遭到中国资产阶级任何严正的抗拒，而且还会直接由中国资产阶级经手来实现；假若其他力量和其他情况（这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没有阻碍计划实施的话，那这个计划早已实现了。米夫同志无可挽回地搞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成了反民族的因素，它的政策是直接叛卖民族运动的利益，而民族运动本身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因为它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农民。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就必然要带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米夫同志认为存在着危机，说什么中国资产阶级还能通过“民族主义途径”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城市贫民群众(!!)等等带领起来，他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也许米夫同志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在或将要进行广泛的民族主义宣传，以便欺骗劳动群众。可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声明，以及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舆论的全部宣传活动，完全推翻了这种推断。即使资产阶级想要利用民族主义宣传来争取群众的信任，那它也不能稍微广泛地开展这种宣传了，因为，第一、它担心别把自己的帝国主义保护者惹火了，而第二、这种宣传不可避免地会整个扭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仅就抵制洋货这个政治运动来看（它开展得并不经常，而且软弱无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久以前，当“左派”人士汪精卫和张发奎企图在广州开展抵制洋货的运动时，他们立即叫广州商业局“安分一些”，因为商业局曾对这个运动提出异议，其借口是“日本已从上海撤走自己的军队，因而抵制日货就毫无意义了”。米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竟如此歪曲中国的真实情况，以致难于找到对这种歪曲的任何解释。也许，米夫同志需要这种歪曲，以便得出十分虚假的政治结论，并据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

的任务是，在斗争中（米夫同志甚至强调说——在忘我的斗争中）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要知道，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充满了以往历史时期的全部内容，而这个时期在1927年4—7月已经结束了。这个斗争以资产阶级完全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告终，从而也就解决了应由哪个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问题。1927年7月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各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联盟中是唯一的领袖和领导者。今天的问题不是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历史上解决了，而且是彻底地解决了！），而是扩大、加强和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因为革命运动在自发地、极不平衡地发展着。

当资产阶级还参加革命运动，而且竭力保证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时候，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是中国革命过去的、业已消失的阶段中的情况。在新的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领导权。谁若是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一窍不通。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论米夫同志的错误，看来是易于理解的，因为这些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而且这不只是米夫同志一个人的毛病。我们在罗佐夫斯基同志这样出名的政治活动家那里，也能看到这种错误，不过它表现得多少有点隐蔽罢了。1927年10月4日，罗佐夫斯基同志向哈尔科夫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①中有下面一段话：

“最近几年，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除了买办资产阶级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了，我在中国曾经听到这样一整套论断，说什么中国没有大资产阶级，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一些外国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必定是小资产阶级。这种论断无疑是不正确的，它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中国，有自己

^① 这个报告转载于1928年出版的《论中国》文集中，我们从那里摘取了这段话。

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业的、工业的、金融的。你们可以在上海看到上百家中国的民族银行，当然它们没有汇丰银行那么大；一些规模很大的商号、工厂，掌握在中国资本家手里。从上海起，沿着长江两岸，在各大工业所在地，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使用大量工人的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以便由它自己去剥削工人阶级。它希望中国能取得独立，能关税自主，能有稳定的货币制度；它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还希望能摆脱掠夺性的军事制度。它极力想把中国从外国大炮威胁下解救出来，以便把国家变成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它可以起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现在，因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已经控制了全中国。”

我们所以要从罗佐夫斯基同志的讲话中引用如此冗长的一段话，就是因为这段话好像是综合了我们通常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所发生的一切错误。因此，我们至少也要谈谈这些错误中的一些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不知道罗佐夫斯基同志在中国从谁那里听到否定中国有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苏联，相当普遍流传的一种“论断”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在大规模的商业中，以及在金融和银行事业方面，一切经济命脉都是由外国资本来掌握。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的工业部门（丝织业除外），外国资本不在那里占据统治的地位。甚至在纺织工业中，根据日本报纸 1927 年 12 月份显然已经缩小了的数字（因为其中没有计入外国人对那些形式上属于中国人的企业的投资），外国资本也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四。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外国资本在纺织品生产中所占的份额。通常，中国企业的机器装备是比较昂贵的，而开工率却大大低于外国工厂。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烟草工业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更大。大资本主义类型的面粉厂和榨油厂，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属于外国资本。在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中，尤其是在采矿和冶金部门，中国民族资本的作用

是微不足道的。海运和河运业也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而铁路运输业,外国资本至少也占有百分之八十。至于金融和银行事业,仅英国汇丰银行一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比中国所有的民族银行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这家银行专门经营食盐专卖和关税的收入;它控制白银(中国的基本货币本位)的价格和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它左右着中国金融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几百个中国的银行机构和工商业机构的生存。罗佐夫斯基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威力入了迷,而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对于上海的中国的银行,他认为需要指出的仅仅是:“当然它们没有汇丰银行那么大”!其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而是一个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在上海街头看见许许多多中国的银行招牌而得出的极其肤浅的印象。而罗佐夫斯基同志所谈的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况,即使对于最轻率的旅游者来说,也是看不到的,因为任何一个顺着长江旅行的人,决不能在荒无人迹的两岸上“看到”岸上所没有的东西。整个长江流域,只有在上海(恰巧它位于长江的支流上)和汉口^①可以“看到”大的资本主义工业,而这些工业大部分属于外国资本。毫无疑问,罗佐夫斯基同志在描述自己对中国的观感上太入迷了,也显得太过分了。

当然,中国有大民族资产阶级。不过,不能把它和美国、英国或德国的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并且要依据这一点(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受外国资本的压制)对它的社会经济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据说,罗佐夫斯基同志恰恰也是这样做的。例如,罗佐夫斯基同志在谈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问题时,为了证实中国有金融资本,就曾援引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上百个上海的银行。不过,把中国的银行资本与现代金融资本(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相提并论,就等于把现代银行家与高利贷者相提并论。而“在银行家

^① 如果南京的几个轧棉厂和1922年关闭的湖北省太平工厂不计在内。

和高利贷者之间，有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别和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的差别。”（马克思语）

中国的银行资本只不过是高利贷资本的一种形式，是它的一个变种。谁都知道，高利贷资本是在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关系占优势的地方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我们不能在本文中稍微详尽地谈论高利贷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①我们只指出一些基本因素，因为它们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有直接关系。第一、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外国资本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为外国资本行使买办的职能。中国的银行大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买办代理机构。外国资本与中国高利盘剥的联系，决不意味着高利贷资本变成了现代的金融资本。相反的结论倒是比较正确的：外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往往行使高利贷资本的职能。^②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其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力求保留中国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而这并不妨碍它违反自己的意愿去破坏这种生产关系。

第二、在中国，无论在农业中，还是在整个工商业中，高利贷资本都占据主导的、支配的地位。中国民族工业自然要按高利贷利息的条件，从中国的银行取得流动资本。在中国的情况下，极高的利率使借贷的资本具有高利贷资本的性质。根据这种情况就可以想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多么不发达。谁都知道，“国内利率的高低，对于工业发展的水平，乃是相反的关系”（马克思语）。此外，还应补充一点：甚至中国的大企业，也是依据高利贷资本所固有的原则来经营，而不是依据资本主义核算的原则来经营。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只是要指出，这种

^① 这个问题，在马基亚尔同志阐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了极其详尽的探讨。这部卓越的著作很快就将出版了。我们也从这部著作中借用了一些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结论。

^② 外国资本在中国大都行使商业资本的职能。

情况乃是中国企业主经常更换的原因之一。一般说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迟，在中国尚未来得及形成稍微固定的企业主阶级。因此，几乎每个中国资本家都与地主土地占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还未曾切断它与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的血缘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完全不是罗佐夫斯基同志所描绘的那种欧洲的类型。它是中国社会中最不成熟的、落后的阶级，它还没有度过中国旧社会的婴儿时期。革命的爆发，正值中国资产阶级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它还没来得及定型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立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消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中那些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即排除那些阻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也阻挠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以革命方式解决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这条道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乃是它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独立阶级进行社会和政治自决的一条唯一的道路。不过，历史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两面夹攻的地位。民族革命产生了这样一些力量，它们不仅能摧毁旧制度和消灭反动阶级及外国资本的统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发生极其尖锐的冲突。由于有了年青的中国无产阶级（它不只是民族工商业、而且首先是外国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民族资产阶级就遇到了自己的最可怕的死敌。随着提出共产主义口号和阶级要求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或则在革命中丧失一切，或则向反动势力和外国资本投降，借以至少保住自己的现状。资产阶级迫不得已，向那个它最先起来反对的旧制度投降了。

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地主军阀反动势力和外国资本的阵营中去，从它自己这方面来说，并不是相机行事（因为相机行事在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地方才能采用），而是向旧制度完全不可避免的

投降。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在革命尚未解决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之前就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下的投降，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的最大的破产，注定了它在社会政治上的退化和腐朽。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摧毁了1927年4—7月的工农群众运动，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因为这截断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对于这个情况，罗佐夫斯基同志也是不理解的。他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希望中国能取得独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还希望能摆脱掠夺性的军事制度”等等——这种论断，是庸俗而又肤浅的。何必要管谁希望什么呢！在社会斗争中，起作用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或那个阶级不得不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官僚等等的政策，是完全投降的政策。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罗佐夫斯基同志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动阵营里起着首要的、领导的作用——他所作的这个结论，也是完全错误的。恰恰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在外国资本和地主、军阀反动势力的同盟中，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占从属的地位，它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无论是在反动阵营里，还是在中国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在日益减小。只是在一个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不断地增长：它在疯狂憎恨被压迫阶级的运动上，在血腥镇压运动的方式上，在企图收买、腐蚀、瓦解工人阶级的干部上，在恬不知耻地把革命口号和孙中山学说用于卑劣的目的上，胜过了它的反动阵营中的一切同盟者。不过，这是历史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创造性”活动而提供的唯一的方面。

列宁说过，在革命时期，“各个阶级在决定社会生活形式上，都极其有力地表现自己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对中国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的改造方面，看来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它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乱抓一些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最

落后、最过时的形式，把它们当作最后的希望。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力求在全中国巩固和保持旧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没落了的政治制度。因此，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是在不断加深和加剧那些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因此，它使得中国革命必然进一步持续地发展下去，而不管要经受怎样的挫折。民族资产阶级在决定中国社会生活新形式方面，是一个彻底的破产者，中国资产阶级目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完全排除了以改良主义方式解决这个伟大国家面临的那些历史任务的可能性。能够决定中国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只有两种力量，当然它们是各行其是：或则是国际帝国主义，或则是依靠中国农民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帮助的中国工人阶级。

三

1848年12月，马克思概括总结普鲁士革命时，以严厉的词句描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

马克思写道：“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表明，在德国不可能有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立宪君主制的资产阶级政权，能够有的只是主张封建专制政体的反革命，或者是拥护社会共和政体的革命。”

谁都知道，马克思错误地否认了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在发展上有采取妥协方式的可能性。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或是恩格斯，一看清德国在1848年革命后稳步地走上了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就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恩格斯论述 1848 年革命时写道：“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对于大决斗业已开始这一点，是不能抱任何怀疑的，这个斗争必将构成一个漫长的、有巨大变动的革命时期，但这个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恩格斯接着写道：“可是，历史表明，我们是错了，我们当时的观点是一种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在 1850 年，当德国以及整个欧洲表现出明显的工业高涨时，马克思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这样发展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实际革命问题”。“只有在发生新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有新革命。不过，新革命的来临，也和新危机的来临一样，是毫无疑问的。”看来，德国资产阶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够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对整个德国社会制度进行逐步的、极为缓慢的改造。由此可见，德国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而马克思在 1848 年却曾否认它能完成这项使命。但是，不应忘记，只有通过 1848 年后席卷了整个欧洲（直到俄国）的经济革命，才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

我们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的论点，并不是要把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和现代的中国的类似之处加以比拟。^①不要说其他的差别，下述情况就可以说明作这种类似之处的比拟是错误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且中国事变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爆发的。我们所以要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是为了从他们的观点中找出在某些历史时期不能妥协地解决社会矛盾的出发点之一。否认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它的力量

① 如果要作这种比拟，就得把马克思对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论述多少加以改变，以适用于四月和七月事变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得在其中更加突出一切否定因素，并删去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对于保守派的革命性的一切说法。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保留一点革命性和独立性。整个的马克思的描述还得增加这样一个系数：“越往东，资产阶级就越卑鄙”。这个系数的大小，完全符合于中国在东方的遥远位置。

——这个出发点，我们要完全加以运用来论述中国的现状。我们解释了马克思的论点，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

中国资产阶级从1927年4—7月到1928年2月的全部历史表明，在中国不可能有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改良主义方式解决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的一切途径，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下面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则把中国完全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的牺牲品，或则大大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的革命（它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的争论中，这个观点遇到一种所谓先验论的反驳。他们反驳我们说：不能认为中国不存在改良主义的、妥协的发展道路；这样地提出问题是错误的，非列宁主义的；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哪条道路必能取胜，改良主义道路还是革命道路，这取决于斗争；可以认为革命道路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改良主义道路。

我们认为，这个论断，虽说头头是道，一本正经，但是它并没有说到正题上来。列宁确实这样提出过问题：在革命时期，“历史本身会提出互相斗争的力量要解决直接道路或曲折道路的选择问题”。（列宁认为，历史的曲折道路是妥协的道路：“一切曲折的历史转变，都是妥协，即新旧之间的妥协，那时，旧的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全否定新的，而新的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全推翻旧的。”）“革命时期大都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相互斗争的社会力量在较短的一段时间里，要通过冲突来解决相当长期内国家发展的直接道路或曲折道路的选择问题。”但是，列宁只是在妥协道路已经实际显露出来的时候，才提出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列宁在1907年写道：“当客观局势要求走上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此而进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了的曲折的转变。俄国革命的进程，就完全是从这方面来确定的。”

中国事件的全部进程，4—7月事变之后形成的整个具体情况，以及从那时起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表明以妥协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历史性任务是不可能的。用列宁的话来说，中国革命的进程，就完全是从这方面来确定的。由此可见，先验论的见解对我们提出的论点的反驳，是完全错误的。而客观的现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派胜利以来，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方面是否有所进展，哪怕是只前进一步，哪怕是只解决一项任务？所谓历史性任务，我们指的是（按本文的前后关系）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即：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各种压迫，打破社会经济结构中一切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半封建的、亚细亚式的隔阂，彻底摧毁旧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和新的强盗般的军阀统治制度，把全中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整体，等等。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不仅在解决这些任务方面毫无进展，而且在它统治的几个月期间，中国反而大大后退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反革命胜利之后，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地位增强到了多么大的程度。可以大胆地说，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们蒋介石、白崇禧之流统治下，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情况，还是从来没有过的。然而，问题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地位加强了，日本正确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策略中反革命转变的意义，乃对满洲和蒙古下了毒手。不错，日本向张作霖提出的那些要求^①（关于保障它在满洲和内蒙的“权益”），中国北方当局在形式上并未予以承认。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日本人以秘密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要求，逐步地把中国这两个地区变成自己的实际的殖民地。关于另一个掠夺者英国的当前计划，英国政府委派的研究英国在长江流域贸易前景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最能说明问题

^① 布哈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这些要求。

了。这个委员会由一些最著名的英国商人组成，由驻北京公使馆的商务参议布雷特领导。布雷特委员会的工作报告⁽¹⁾之所以令人非常注目，不只是因为它揭示了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计划，而且是因为它提供了华中商业状况的值得注意的情景。这种情景坚决地粉碎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因为他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情势下存在着经济稳定的趋势，中国的工商业危机不过是一时的现象，随后在最近时期，必将出现新的经济高涨。现将布雷特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摘引几段如下：

“在长江流域所有最重要的开放港埠，商业都处于萧条状态。在镇江，中国军队仍然占领着英租界，没有劝告外国商人在城里居住。据一些外国商人申述，中国商人不偿还他们的债务，甚至很多人竟把外国商人交给他们的储备用的物资偷走了。

“在南京，根本没有商业。在芜湖，商业经营是极其有限的。九江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金融和货币的困窘，以及沉重的捐税，影响着商业往来。中国的银行纸币贬值百分之五十五，而当局却迫使商人按正常行情来接受。在汉口，政局的不稳定，不可思议的苛捐杂税，以及货币的困窘，使商业几乎陷于停顿。在长沙，货币的情况比汉口还要坏。纸币迅速地不断贬值。长沙商人们有两百万袋大米，但是，他们不愿接受纸币出售大米。在宜昌，没有任何商业往来。重庆的情况多少好一点。不过，航行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杨森坚决主张自己有权征用任何轮船作为军用。对于重庆来说，有利的方面是那里没有发行新纸币。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农业丰收。不过，农作物的销售也是困难重重，这是由于银币不足、货币和金融困窘、以往的商业周转组织瓦解、外国公司采办机构解体、捐税沉重以及军事当局干涉商业活动而造成的。”（引自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通报。）

(1) 1927年11月底，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表了这份报告。

这样描述之后，工作报告开始论述英国利益的问题：

“英国的出口商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储备物资被军阀没收了，和他们签订契约的中国当事人拒绝偿还债款，因而商业活动，甚至现金交易，都由于沉重难忍的捐税、货币的困窘以及其他各种无穷无尽的阻碍而难以开展。航运事业也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在长江上游，没有军舰护航，船只是不能航行的。由于在长江流域，英国各公司大都是上海总公司的分号，所以可以断言，上海总公司也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商业之所以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形势，政治形势若不能好转，就不能期望商业有重大的改善。也许，长沙、宜昌和重庆的情况，最近会有点改善。不过，整个说来，那些导致商业破产的原因，还在继续起作用，只有两个途径可以大大改善现状。

“第一个途径，就是大规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个途径是等待，只要在长江流域能逐渐成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政府就行，而且外国的影响和列强局部的严厉行动，也能够加速这个政府的成立，只不过是作用不大罢了。”

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是，大规模武装干涉，即彻底的殖民奴役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早已准备就绪了，而且局部地已经走上实现的道路。中国南方政府与苏联的断交，是外国资本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个断交可使帝国主义者更加易于进行武装干涉。不错，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计划，还得克服这样一些障碍：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国际无产阶级的抵抗和自身队伍中的矛盾。帝国主义究竟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必定要在全世界社会斗争的舞台上解决。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去执行武装干涉的任务，使他们得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自己的计划（日本就是逐步侵占满洲和蒙古的）。

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的统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局，也是如

此。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不仅一点都没有解决，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大言不惭地宣布减租百分之二十五这一唯一的改革，也彻底地破产了。在中国，对于这次改革，现在连提都没有人提了。资产阶级**完全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地主阶级和半封建的、亚细亚式的土地关系。米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可能走“斯托雷平”式的道路。这是一个在中国问题上一向会造成错误的**十分重大的错误**。布哈林同志简短而确切地回答了米夫同志：“在中国，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在中国的各主要地区，没有走这条道路的经济基础。”要知道，问题不仅仅在于缺乏土地，因为布哈林同志已指出，土地可以调配，问题也不仅仅在于缺乏斯托雷平式改革所需要的纯属经济上的前提。问题就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性质**，因为这种社会关系排除了一切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能性**。问题还在于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因为它完全不能担负起把资本主义前的土地关系改造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任务。

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农村中深刻的、长期的农业危机在不断加剧和发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对于这种现象的评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十一月全会的论述，主要之点是：中国农业的衰败和破产情况在继续发展，而且愈益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1927年比较“好的”收成^①（当时，“只有”直隶和山东两省饥荒普遍存在，而在中国其他省份，“只是”那些完全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破坏的地区，饥荒才是严重

① 在中国，“好的”收成的含意，可以按照1927年饥荒的程度来判定。不久前，《泰晤士报》报道说，1927年中国的饥荒程度被夸大了，饥民“没有超过四百万（11）人”。根据后来的消息，这个数字应当加大到九百万。而我们这里却有一些“聪明人”，他们竟说：认为中国农业危机惨重，真是“太夸大了”！

的)，并没有缓和农业衰败的趋势。由于“好的”收成，农民不得不向地主交纳更多的贡租，不得不清还土地占有者和高利贷者的债务，不得不按最低价格把农产品出售给采购商人。由于“好的”收成，军阀向农民征收的税款提高了一、两倍。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军阀对农民的掠夺，官僚、豪绅等等对农民的压迫，竟采取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形式，达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农民完全失去了正常再生产的劳动条件。在有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之下，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竟过着长年忍饥挨饿的生活。除了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对农民进行骇人听闻的直接剥削和军阀对农民的产业进行掠夺（不仅征用生活用具和耕畜，而且征用农民劳动力）外，农民经营的土地日益分割零碎，灌溉和排水工程设施遭到毁坏（以往，这是政府当局关照的对象，而现在听天由命了），自然灾害频繁出现，金融混乱，商业组织和农产品销售市场解体，盗匪横行，等等——这一切也促使农业迅速衰败下去。或许，只有工农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才是摆脱这个危机的唯一出路。

然而，中国的农业危机会引起总的经济危机：商业的、工业的和金融的。上面我们引用的布雷特委员会工作报告中的片断，就描述了中国主要经济区——长江流域的商业状况。要知道，全中国的商业状况都是如此，除了满洲和一些次要的开放港埠。192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而1927年以前，它是一直直线上升的。^① 现援引上海英国领事馆商务秘书A·乔治1926年的工作报告的片断，可据以概略地了解中国铁路运输的状况。

“在最近十二个月期间，除了满洲之外，所有铁路网都停止了

^① 例如，从1922年开始，机器设备的进口，从四千一百万美元降低到1925年和1926年的七百万和八百万美元。可是食物的进口却逐年增加（1913年进口五百万担大米，1922年已经上升到二千二百万担），这是中国农业长期衰落的一个明显标志。

货运。铁路的机车车辆陷于难以描述的破烂状态。有些路基很快就不能使用了！根据交通部外国专家美国人贝克的资料，中国北方的铁路运输，从1924年9月起至1925年12月止这一期间，即十五个月以来，一共损失了约八万万银元。”1927年，铁路运输的状况更加恶化了。目前，中国的铁路网（满洲除外）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商业航运，特别是河道的商业航运，也大为减少。至于中国工业（不仅民族工业，而且属于外资的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从1924年起，它就进入了日益严重的萧条时期。在纺织工业中，这种萧条表现得特别明显。1927年，在现有机器纺织业的全部纱锭中，有三分之一停产了。许多大型纺织企业在1927年关闭了。中国的丝织工业，由于日本丝织工业不断加强的竞争，特别是由于人造丝的进口，而具有彻底衰落的危险。中国的工业危机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具有极其深刻的、本质上的性质。在战争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业，现在已不能（特别是在缺乏关税自主的情况下）经受欧美机器生产合理化的现代工业的竞争。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商品流转失调，由于内战频繁、农民破产、金融混乱而造成的市场极度紧缩，中国工业也遭受了损害。这一切就是产生目前情况的原因，要想消除这种情况，只有进行胜利的革命。

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始终没有能力消除或减轻任何一个引起总危机和中国经济衰退的根源。^①

① 有些同志无论如何都要显示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的稳定趋势，说什么中国北部出现的不是危机，而是经济上的高涨。要知道，第一、就整个中国北部而论，这种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满洲出现了经济高涨的局面（在满洲，对内和对外贸易、工业、铁路运输和农业都有所发展）。第二、满洲是一个正在开拓的地区，它具有尚未开垦的肥沃土地和大量的森林和矿藏资源。第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满洲四分之三的区域实际上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第四、在中国北部无尽无休的战争，大都由满洲担负开支。这已开始对满洲的商业产生影响，在满洲的货币急剧贬值中表现出来。不过，最重要的是，满洲的主人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日本帝国主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在其统治的九个月期间造成了怎样的政治结局。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已经作了完全正确的回答。因为目前我们正着手谈论争论最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觉得用布哈林同志的话来回答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比较好。

布哈林同志问道：帝国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吗？他说：“可以断言，帝国主义没有能够解决全中国的问题。……过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解决了这个中国问题吗？我觉得，它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知道，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之间客观矛盾的发展，不仅不能使软弱无力的当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解决中国问题，而且实际上还导致了企图依附于半封建军阀机构的中国资产阶级更加软弱无力，分化成为几个集团，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力量。^①目前我们看到的局势是，各种不同的军事派别有其不同的政治领袖，它们分散成为一些不大独立的军阀集团，这就提供出根据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

① 无须证明，我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所持的观点，是与布哈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相一致的。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只是重复了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中所包含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和阶级力量的瓦解和分裂的思想，也许在措词上过于粗率了。我说过，资产阶级在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应该承认，在大会的讲话中，对于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资产阶级？”我回答说——“有个别的资产者，有个别的资产阶级集团”，这样的回答，毕竟是相当不恰当的措词，不过，这个回答实质上表明了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所维护的那种思想，在本文中，我仍然维护我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持的观点。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比布哈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更进了一步。我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定型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立阶级就参加了革命。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使得中国资产阶级甚至丧失了有可能形成为独特的阶级的机会，而注定了它要处于这种发育不全的低能状态。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一个自为阶级”——这个问题，是一个额外的问题。在评价资产阶级的作用这个主要问题上，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是相当涣散的。”

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的另一处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即通过压制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结盟和妥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它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更加分裂了。现在，它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到各个军阀集团中去。这些军阀集团目前从社会现象的表面上看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彼此竞相争夺维护自身存在的直接资源，因为它们需要生存，需要供应自己部队的需要。……这一切需要大量的资财，这一切，只有采用极力压榨老百姓的办法才能维持下来。对于每一个有粮食和大量金钱储备的比较富裕的省份，军阀之间都要你争我夺。因此，这些大军阀集团及其陷入内部矛盾困境的资产阶级领袖，就日益腐败下去。”对于这样的分析，是不能不完全赞同的。我们认为，需要对这个分析再补充几笔。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政治上瓦解和腐化的明显表现，就是国民党的崩溃和彻底分裂。在革命初期，国民党是一个实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独特的政治组织。它曾经是一个革命联合的政党，同时也是一个民族革命政党。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派使国民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不能把它变成自己阶级的政党，因为资产阶级本身还不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统一的阶级。现在，在中国南方，有多少“国民党”就有多少彼此敌对的军阀派系，它们的数目在不断增多，已经达到两位数字。每个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毫不留情地惩治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国民党党部（其中，枪毙和驱逐是军阀“清洗”国民党常用的方法），而且擅自委派国民党党部的成员。国民党党部变成了各个军阀手中无所作为的宣传鼓动机构，不起任何政治领导作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的衰落，都没有像国民党在反革命政变后衰落得这样快、这样惨。国民党的旗帜早已成为血腥恐怖手段、极端贪污受贿和军阀横行霸道的标志。

资产阶级地主阵营瓦解成为许多彼此敌对的军阀派系，引起

了中国南部和中国中部接连不断的内战。连那个最初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南北两方的战争，现在也退化成为通常的军阀内讧了。其实，从政权的社会内容来看，中国南北两方已经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异。由此可见，整个中国已成为强盗般的军阀掠夺战争的场所，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统治之下，这种战争是摆脱不了的，也是无法摆脱的。

军阀战争引起了军费开支的大大增加，老百姓已经完全无力承担这笔军费了，而且国家经济也遭到了破坏。1907年，中国政府每年的军队开支为三千六百万银元，而现在，仅仅军费一项，每年就超过十万万万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军阀的腰包，他们私人的积蓄达到不可想象的数字。（张作霖一人就至少掠夺了一万万万元！）在军费开支上，至少应当加上这一项：维持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官僚行政机构的费用，以及完全无法计算的实物征收，确切些说，即军队在驻扎或路过地区对农民的掠夺。目前，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新旧军阀的新军队都在又快又多地发展着。十五年来，全中国只有山西一省没有发生过战争。1927年，山西省督军阎锡山参加了反对张作霖的斗争，因而现在，山西境内有十五万军队，交战双方都在大肆进行破坏。甚至在四川、云南等等边远的省份里，情况也和山西省一样。

有些同志十分迷恋于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相联合的论点，提出了证实这种论点的如下论据：现时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大都是所谓做给人看的、虚假的；事情很少发展到真正武装冲突和流血战斗的程度，往往只是一些不流血的军队演习；因此，中国社会生活表面上发生的战争，并不损害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亚细亚式的专制就是如此，它的上层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政变、叛乱、兵变），而下层，在农村中却没有任何变化。亚细亚式专制的本性就是如此，上层的变动并不改变其社会内容，而在农民的内部，无论是社会状况，还是政治状况，都不会发生任何变革。”对

于这种“意味深长的论断，应当把它看作是力图使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相联合的一种论证。

难以找到比这种论断更荒谬的了。如果这样论述现代中国的内战还算正确的话，那就不拘什么都能这样来论证了，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地主反动阵营中不存在“联合的趋势”罢了。尽管军阀之间的战争具有不流血的性质（实际上具有十分流血的性质），这种内讧的斗争也会削弱和瓦解反动派，而不会加强和聚集反动派的力量。这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地清楚。事实上，上述论断中对现代战争性质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不错，马克思在说明亚细亚式社会的停滞本性时曾指出，在这种社会里，甚至社会生活上层所发生的极其重大的事件，也不触动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不过，要知道，马克思所谈论的亚细亚式社会，是指这种社会还处于独自生存的时代，那时，现代资本主义尚未渗入到这种社会的毛孔中去破坏其停滞的结构。马克思在自己的“论述印度的信件”中，就直接谈到英国资本主义渗入印度而引起的社会革命问题。怎么能把早已过去的时代的规律搬到充满热火朝天的伟大社会革命的现代中国呢？当然，在中国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它具有半封建生产关系的丑陋形式；至于说什么中国社会的停滞性质及其不受社会风暴影响的不变社会结构，那简直是荒诞无稽之谈。比如说，军阀之间的战争就是现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动荡、即人民群众的革命暴动的主要根源之一。

现在应该作出一些结论了。

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分析（我们暂时从这个分析中有意识地删除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式和力量问题），使我们得出的一般结论如下：

一、在中国，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如何稳定的问题，同样也谈不上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相联合的问题，这些现象在中国甚至连一点趋向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外国资本

和地主军阀反动派的阵营中去，并没有使这个阵营团结和巩固起来，而只是加快了它的分裂和瓦解的过程。^①在政治中，并不像在算术中那样，力量通常的合成，并不总是数字的加大，并不总是力量的增强。从算术方面看，资产阶级转到反动派方面以后，反动势力增强了，而革命阵营的力量就相应地减小了。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们要回想一下列宁在1905年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如果资产阶级离开民主革命，那民主革命的规模会削弱吗？”列宁说：“实际上，只有当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一起开展革命行动的时候，才会开始出现真正规模的俄国革命，只有那时，这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期所能有的真正最大规模的革命。”暂且不谈这个一般的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和1905年俄国革命究竟有多少可以相提并论之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情况若是同1905年俄国革命时的情况相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在宽度和深度上都大得多，而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上的矛盾也尖锐得多。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直到这个同盟还没有阻碍发展和组织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之前，都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它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从一开始起就束缚了中国革命的真实力量，不让它稍微扩大一些。中国革命阵营摆脱了这个不能贯彻始终的、时时刻刻都落后的、阻碍整个运动前进的同盟者之后，更加强大了，而不是衰弱了，革命的规模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因而革命斗争转为更高、更尖锐的形式了。可是，民族资

① 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方面去，暂时加强了反革命阵营，瓦解了群众运动的队伍。但这个暂时现象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因为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由于这种错误，造成了民族革命阵线的分裂，这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使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拍了头。

产阶级转入反动阵营之后，反动阵营的力量加强了吗？不，没有加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入，加大了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增添了分裂和瓦解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资产阶级地主阵营的分裂、瓦解和腐化的论述。某种政治制度联合，只有在社会经济关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我们看到，只要政权掌握在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稳定的因素。

二、在中国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在相互斗争的阶级的力量对比中，没有任何因素可以用改良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那些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分析，完全证实了我们这个论点：或则完全彻底地变成外国资本的殖民地，或则进行胜利的工农革命——只有这两条道路能使中国摆脱目前的危机。当然，第一条道路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过，这个“发展”只能靠中国人民遭受彻底的奴役和破产来求得，只能是国家进一步衰败的结果。弗朗茨·梅林以及后来列宁都说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乃是一个极其丑恶的行径。但是，帝国主义却准备使中国的发展比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普鲁士的发展更加丑恶千倍。帝国主义并不直接马上破坏殖民地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而是令人苦恼地、缓慢地来进行。它依靠着这种生产关系，利用着这种生产关系，它通过这种生产关系来榨取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以便使这些血和汗转变成为黄金。

不能排除这条道路，它是可能的、但是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中国国内的斗争，而且也要靠整个世界舞台的斗争。走胜利进行的工农革命道路，可能性要大得多。

三、共产国际一向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势必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分析，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阶段来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它已经是有所不足的了。目前，如

果不大大越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范围，革命就不能解决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当前的阶段和过去的阶段一样，革命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土地革命和推翻外国资本的压迫。若是从**目前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中抽象地理解这些任务**，那这些任务本身还没有越出它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要想解决这些任务，中国无产阶级就得依靠农民，就得不仅要**以实力粉碎中国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粉碎外国资本的反抗，而且也要粉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这是新阶段的中国革命不同于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差别之一**。列宁在《两个策略》一文中，提供了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内容的这样的公式：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列宁把**用强力粉碎资产阶级反抗的任务**，列入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无产阶级已不能给自己提出“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的任务。现在，它已经不得不“**用强力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按其政治内容来看，今天已经越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范围，必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从一开始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要知道，社会主义专政的全部政治内容，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能够造成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唯一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当还没有必要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苏维埃口号就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要回想一下共产国际是怎样解决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中写道

“在今后的发展中，标志着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须是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但是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资产。一切工厂，一切资本主义经营的河运和海运事业，一切银行、大规模商业企业、大住宅等等，统统收归国有，这是苏维埃政府必然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如果革命政权连这一点都没打算做，那它将来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暗中破坏，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抱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当然，他们不能做到废除一切私有制和一切私营商业。毫无疑问，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即使在最彻底地实现没收大资本家资产的情况下，也将比我们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宽广得多。当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苏维埃中国来说，有相当大的困难，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我们苏联要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列宁早在1916年就已写道：“所有国家都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的，然而它们所要走的道路，并不完全一样，每个国家都有其某种独特的民主形式，都有其某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有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用同一的阴暗的色调为自己描绘这方面的远景——再没有比这样做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际上更荒谬的了。这是一幅极其少见的拙劣的画图。”毫无疑问，苏维埃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有其独特之处，这使它不同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这一切是无可争辩的实情。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中国在劳动人民争得苏维埃政权之后，立即采取一些确实有效的初步革命措施的同时，不能不走上这条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今天革命转变的社会经济目的，就是要把亚细亚式中世纪的残余从中国社会基础上清除出

去，其目的不是保证资本主义在国内的自由发展，而是使国家转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有人对这个观点提出一些反驳意见。对于其中某些反驳意见，我们认为需要简短地谈一谈。

第一个反驳意见。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不得不实行的那些措施（将银行、工业、运输业等等收归国有），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其实，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也是可能发生的；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此，而在于革命政权的政治性质：在中国将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整个问题就在于此。我们觉得，这个反驳意见并不像它显示的那样强烈。关于中国革命专政的政治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国有化”的可能性问题，这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即使资本主义工业、运输业、银行等等的国有化，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现的，那它因而也必然要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

第二个反驳意见。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除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外，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和组织性的程度。可以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觉悟上今天已经达到了能顺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要想带领全体农民去**战胜和粉碎**资产阶级地主反动阵营和外国资本的反抗，要想争得苏维埃政权，中国无产阶级就应当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就应当大大增强自己的组织性，从而也就能解决它着手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问题；第二、无论是在战胜敌人方面，或是在国家转上社会主义发展轨道方面，中国无产阶级都不能缺少整个国家工人阶级、特别是苏联工人的大力的全而支援。决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孤军作战。列宁对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

的可能性问题，并不是那样提出的。

第三个反驳意见。不能说中国革命已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这岂不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然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都还没有解决。我们认为，这个反驳意见也是不正确的。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都还没有解决。从这一点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实“没有完成”。

但是，如果革命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变革方面的决定性步骤，那么，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不能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已属于完结了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转变所采取的形式是新颖的，迄今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过的。难道马克思主义就决定不许承认和研究历史过程的新形式吗？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质。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的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那些打算把中国革命的发展塞进死板的理论公式的人，并没有妨碍我们想起列宁最爱重复的哥德的一句话：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暗的，而生活之树却是万古长青的！”

(译自苏联《布尔什维克》(БодьшеВик)杂志，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1928年第3—4期，第86—107页)

邹宁译

(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

(1928年2月)

米 夫

极其独特的中国革命局势的急速转变，对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的评论，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也必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见解。对于这些争论问题，我们也想提出一些看法。然而，我们决不企求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详尽的解答。我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只是提出其中一些最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有助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全会去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在专门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广泛地讨论了中国问题，本文中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这些会议的材料。要预先说明，我们不想去分析那种过高地估计反动势力的联合、不重视维护革命形势、提出争取合法要求和争取民主自治等等任务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必然导致在中国取消苏维埃口号。这种充满机会主义发霉气味的观点，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预先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因此，我们主要是要分析其他一些普遍存在着的、相当多的人支持和坚决维护的观点。而且，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观点的代表者，已经把争论问题的讨论，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小会议室转到《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版面上了。

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分析的这些观点，概括地可以表达如下：这

些同志是以目前中国正在经受的经济危机为根据：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由于没有任何与反动势力相联合的迹象，由于资产阶级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因而这就免除了任何妥协途径的可能性，有助于劳动群众进行斗争。因此，这些同志认为，我们在中国将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不断的革命，举行必然的、刻不容缓的起义。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必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革命就立即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了。

在下列段落里，我们要指出那些在问题的提法上被否定了的，而我们却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能只限于提出批评性或辩论性的意见。我们想尽可能提供关于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完整的概念，尽管这是草率地总结整个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和顺便地谈谈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也是罗米纳兹同志在其论文中提出来的）。

一、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

要依据对中国所经历的一般情况的分析，来解决所有策略上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了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性质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掌握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为了对政策进行科学的论证，绝对必须考虑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点。把我们的分析限定在只考虑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上，那就完全错误了。中国革命是殖民地的反帝革命。在评论目前的革命阶段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既要提到中国国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也要提到在中国国内有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

我们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冲击帝国主义堡垒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最近事变的结果，在这方面形成了怎样的阶级力量对比？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的地位加强了还是削弱了？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正是外国资本

成了整个中国反动势力的组织力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中写道：“比较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如果不直接和间接地得到外国干涉者的支持，那它是不能对中国革命群众造成巨大威胁的。这些外国干涉者集中自己的武装力量，封锁港口，把各个革命中心隔离开来，供给反革命军队经费，企图瓦解革命军队，不断施加外交压力，在革命政府统治区支持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组织外国和当地资产阶级进行生产、商业和信贷上的暗中破坏活动，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者疯狂地力求造成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混乱，力求镇压农民运动和孤立苏联。”

帝国主义是整个中国反动势力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不得不经受多么大的艰难，因为它所反对的是特别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帝国主义，而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即对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我们过去却宁愿估计不足，也不肯估计过高。因此，显然地，我们应当从评论中国革命的国际条件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来着手我们的分析。要知道，中国革命遭到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却是严重的失败。这加强了帝国主义的地位吗？这使得外国资本的力量占有如此的优势，以致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问题在最近期间从日程上勾销了吗？

甚至最肤浅的分析也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我们遭到了失败，但整个来说，帝国主义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更快地削弱了自己的地位，更为加深了自己的矛盾，中国的革命形势问题一点也没有从日程上勾销。

我们来看看一些材料。谁都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1927年与上一年度相比，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已公布的海关关税的征收数额，1927年为九百六十七万七千英镑，而1926年为一千二百十六万五千英镑。如果注意到每年银价贬值约百分之十，那么，这个差数就更大了。再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品的

输出几乎仍然停留在去年的水平,因而几乎完全依赖缩减进口,即靠减少外国商品的输入量来降低对外贸易的总交易额,况且,设备的输入量还多少超过了去年,所以减少输入量主要是缩减棉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输入。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虽然中国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失败,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善帝国主义的状况,丝毫也没有缓和世界资本的市场问题,谁都知道,市场问题,对于世界资本来说是我们这个时期最尖锐的基本问题之一。

这在英国特别惨重地反映出来。它的经济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中国市场的紧缩,对于英国的影响特别严重。不错,革命的局部失败,使英国得以再次获得汉口的租界,得以强制国民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关系。但这不应当使我们产生错觉,以为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加强了。我们所指出的它的对外政策上的成就,是建立在日益腐朽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也可以说明,英国为什么在寻求出路中要采取极端的手段,因而更加响亮、更加坚决地提出广泛干涉中国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本身上就应该看出,这不是英帝国主义有力量的表现,而是它日益衰弱的表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整个来说,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英国),不仅没有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而且它们的地位更加动摇、更加削弱了。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从整个国际情况来看,它目前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可借以断定外国在华资本(它会长期推迟中国革命)的稳定性已有所加强、有所巩固、有所增长。

不过,这个情况并不是很单纯地存在的。中国革命的国际条件,也是受辩证法的矛盾发展规律制约的。即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的力量在日益衰落,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必定在中国沿着这个斜坡滑下去。一些经济材料,首先是对外贸易额的资料,使我们看到另一种趋向在发展。今年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美国增加了对中国的贸易额(顺

便说一说，这是唯一的一个在1927年增加了贸易额的大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据第一位。如果再加上美国十分显然地日益增大对日本企业和银行的投资，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下列值得注意的结论：第一、过去太平洋上的主要矛盾——美日两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缓和，而美、日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剧；第二、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更加具有侵略性，美国（有可能）将继续与日本协调起来。这种业已出现的趋向的发展，表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在不断增长，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向越向前发展，中国的革命斗争就更加复杂化，因为代替腐朽的英国，将出现一些更加强大和旺盛的、更加圆滑的敌人来对付中国革命。

从这两种趋向着眼，我们觉得我们应当着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力量在不断削弱，这主要表现在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削弱了。这个趋向毫无疑问地有助于我们的斗争，它会加剧帝国主义地位的不稳定性和维护革命的形势。但我们不能闭眼不看那种相反的趋向，即美国在远东（其中也包括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积极活动。在这方面，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意味深长的。美国资本同意大大增加南京政府的关税收入，给予贷款，由于停止“英美烟公司”的罢工而给予几百万元——所有这些事实，可表明美国资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采取最初几项比较断然的措施。另一方面，日本必定要立即把自己的对华帝国主义政策同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吸收美国资本和日本一起在满洲建设铁路，最后，蒋介石与冯玉祥建立同盟，日本人允许冯玉祥军队进入山东省——所有这一切，反映出美帝国主义的趋向，这个趋向虽然尚未彻底形成，但毫无疑问地已经显示出来，它并不违背日本资本的利益，而目前还符合日本资本的利益。

显然，美国资本的政策，与英国奴役中国的方式多少有些不同。美国本身在经济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它不像英国那样十分注

重维护帝国主义者的一切特权，彻底地奴役中国，但它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还是能从外部建立自己的统治，不过采用的方式多少不同于英国罢了。它能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一些让步，不错，它还能为中国缓慢得难以忍受的、但终归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一丁点出路。美国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协助了民族资产阶级（显然，使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从属的地位），并同中国农村的富裕上层密切勾结在一起，因而它能够使中国走上“妥协的”道路，即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诚然，只有在革命遭到比较长期的失败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条道路。不过，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它只表明有这条道路的苗头，而并不表明能够走这条道路，这个在美国主导下要把中国变成美日两国资本的殖民地的趋向，并不意味着制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的，这个趋向要求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要以缓慢得难以容忍的速度进行，而且要以劳动群众（首先是贫苦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遭受残酷的经济破坏和家破人亡为代价。另一方面，这个趋向也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多少有些根本的改革，彻底地破坏中世纪的关系，解决土地问题，缓和矛盾，改善群众状况和松弛革命斗争。不，这条道路将使矛盾更为加剧、更为尖锐，将唤起一批又一批中国劳动群众去争取苏维埃道路——这是一条唯一能够根本解决中国社会一切矛盾的道路，是一条唯一能使群众获得进步和福利的道路。

然而，帝国主义趋向的发展（在美国主导之下）——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唯一可能有的“妥协的”道路，并不是不存在的。像罗米纳兹同志那样的人，对于这一点是不会轻易置之不理的。罗米纳兹同志写道：“没有任何因素足以使中国走妥协的道路”，可是，没过几行，他又对自己的话作了更正，他说：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它是可能的，但是可能性很小”。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思想混乱。不应当随意把这个问题简单化。

罗米纳兹同志为了否定妥协道路的可能性，列举了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面临的前途，或则是完全变成殖民主义的牺牲品，或则是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要知道，中国变成殖民地，即帝国主义意向的加强，这也正是唯一可能的妥协道路。第二、罗米纳兹同志引用列宁的话来否定妥协的道路。列宁“只是在妥协道路已经显示为现实的时候，才提出妥协道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问题”。可是，要知道，任何人都没有断言，在中国，妥协的道路可能取得胜利，而且，不能认为这条道路在现实中完全没有显示出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帝国主义意向的初步行动。这种行动足以表明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完全赞同布哈林同志在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不能认为，妥协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是不存在的。这样地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哪条道路能取胜，妥协的道路还是革命的道路，这只取决于斗争。应当认为革命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妥协的道路完全不存在。

争论这个问题的用意究竟何在呢？这样地提出问题会得出怎样的政治结论呢？结论是这样的：虽然美国的意向只是刚刚开始显露出来，但我们目前在中国的斗争却已处于比较艰难、比较复杂的境地。虽然帝国主义基本上还没能大大加强自己的地位，但我们目前已不能只是同旧势力作斗争。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把那些过去一直袖手旁观的广大群众吸引过来，要把那些比我们过去准备向帝国主义及其唆使的反动势力进行冲击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动员起来。

否定妥协道路的可能性，这是把局势看得简单化了；这是一种似乎要取消同强大敌人进行尖锐而激烈的斗争的论点。我们不必去竞争，我们的敌人软弱无力，我们已稳操胜券——这就是否定妥协道路所必然导致的看法。布哈林同志说：“这是革命的宿命论，这是忽视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巨大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最近期间在中国将充满苏维埃意向与帝国主义意向之间

的激烈斗争，而且美国帝国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而只会使斗争更为加剧，从而使苏维埃意向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其结局当然是：革命，苏维埃道路必定胜利。不过，这个胜利的期限问题，将取决于斗争的结局。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尽可能早日取得胜利，使这个“结局”早日实现，为此，决不容许轻视敌人，决不容许回避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我们不仅要动员中国劳动群众的一切力量，而且要动员整个共产国际的力量，以便真正彻底地、真正顺利地对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冲击。

二、各阶级的重新组合

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各阶级的重新组合，以及中国社会内部形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使我们深信：斗争条件对于我们更加复杂化了，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艰难了，我们在中国的敌人强大了，从而我们要想对反动势力的进攻和冲击取得成效，就得把超过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更多的力量投入战斗。

近一年来，中国革命出现了各阶级的重新组合。首先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民族资产阶级投奔到军阀地主反动阵营中去了。只有分析中国社会的新因素、考虑到那个为粉碎群众运动而建立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然后我们才能认清解放运动的前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已指出资产阶级的背叛，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和反革命集团力量的一定的增长”。而罗米纳兹同志对这个问题却作出不同的回答：“在中国，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相联合的问题。这些现象在中国甚至连一点趋向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外国资本和地主军阀反动派的阵营中去，并没有使这个阵营团结和巩固起来，而只是加快了它的分裂和瓦解的过程。在政治中，并不像在算术中那样，力量通常的合成，并不总是数字的加大，并不总是力量的增强。从算术方面看，资产阶级转到反动派

方面以后，反动势力增强了，而革命阵营的力量就相应地减小了。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认为，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受自己的革命急躁情绪的支配。事实上，在过去，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反动派的斗争。而资产阶级背叛以后，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和军阀地主反动派联合力量的斗争。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忽略的普通算术，也可表明反动势力有所增长，工农斗争复杂化了。但是，这里并不仅限于普通的算术问题。要知道，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一般地离弃革命、一般地投奔反动阵营，它的背叛使工农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例如1927年4月蒋介石和李济深的背叛，其结果是工农运动各中心遭到破坏，群众受到镇压，革命力量陷于瓦解，共产党的队伍陷于溃乱。这种情况，既出现于上海、广州，也出现于许多省份。国民党左派的叛变，决不意味着大中资产阶级和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一般地脱离革命阵营，他们宣称：“弟兄们，工人和农民们，我们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发展革命吧！我们将在一旁注意地看着你们。”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远非算术上的转变，不允许我们玩弄辞令，不允许我们低估敌人的力量和我们失败的程度。只有仔细地研究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我们才能为劳动群众进行卓有成效的、胜利的活动做好准备。

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是有其限度的，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更具革命性的联盟。当然，任何人都没有否认过，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会使斗争更加尖锐化，会唤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群众，因而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团结。最后，任何人都没有断言，反动势力的阵营（包括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地主）是完整坚强的。显然，争论并不在这里。那些把这个问题转移到这方面来的同志，只不过

是掩饰意见分歧罢了。我们所看到的反动派阵营是否比过去强大了，目前我们反对反动派联合力量的斗争是否比过去困难了——这个问题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可是，怎么又能说资产阶级地主同盟会分裂呢？这就使罗米纳兹同志感到惶惑不安了。这仿佛与反动势力的联合和加强的概念相矛盾。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面对着日益发展的工农革命，反动派势必要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摧毁工农运动。可是，反动势力并不是完整坚强的集体。在其他问题的面前，又显现出某些互相抵触的反动分子的阶级利益和军阀利益。反动派的组织力量是帝国主义。然而，帝国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殖民地革命威胁着各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时，它们就会团结反动派，可是同时，它们还力求保持各自的特殊地位。目前在中国所形成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特别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方面，所谓桂系（白崇禧和李济深）在政治舞台上起着作用，它与英国资本有联系，主要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蒋介石和冯玉祥集团，它与美国资本和日本资本有联系，主要代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这两个集团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尖锐斗争，十之八九要拼个你死我活。因此，革命危机显现得越小，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得越厉害，而革命的发展越猛烈，它们之间的矛盾就越缓和（退到次要的地位），就越能把反动力量联合起来去反对革命阵营。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不能认为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灿烂的阳光，中国革命的敌人完全瓦解、崩溃了，中国无产阶级可以投鞭断流了。

可是，罗米纳兹同志在其整个论文中，恰恰是企图证明中国革命事业是个很普通的、并不复杂的事情。在其长达二十余页的论文中，他总是围绕中国资产阶级问题打转，千方百计地贬低中

国资产阶级，极力证明它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甚至说它尚未形成阶级。

这个论点并不新鲜。罗米纳兹同志对罗佐夫斯基同志的讽刺是徒劳的，令人惊奇的是他说罗佐夫斯基同志只在中国听说过这个论点，而且据说共产国际也持有这种论点。这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中国存在着资产阶级，而是认为它比较软弱无力，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并曾预言它必将转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就是罗佐夫斯基同志曾经提过的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的论点，按说，罗米纳兹同志也应当知道这一点。罗米纳兹同志的论点，完全否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存在，而且谈论了无产阶级“自然”要起领导作用的问题。在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必同谁去争夺领导权了，无产阶级也就“自然”要起领导作用了，这一点，只有期待历史来给我们证实了。这个论点并非偶然产生的，它是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实际领导人和过去领导上整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鼓舞者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论点。这个论点削弱了斗争，掩盖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矛盾，导致了这个“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由于它知道它是存在的，所以它也就更加有头脑了）主导革命运动。恰恰是这个论点成为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上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在广州没有资产阶级，因而共产党的领导者没有准备群众去进行斗争，抛出了李济深中立化的口号。在上海没有资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者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没有唤起群众去反对业已成熟的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因为他们绝对相信蒋介石不会反对群众，而且不会夺取群众的武器。这种对资产阶级的存在估计不足，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反革命性质估计不足，甚至在那些力量对比上远远超过反动派的地方，也都导致了革命接二连三的失败。

罗米纳兹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坚持了这个论点，支持了过去的机会主义领导。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

上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产儿。它早就应该离开革命统一战线，早就应该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去，因为它本身已经解体了，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它的各个集团和派系处于各个军阀的压制和指挥之下。”随后，斯大林同志问道：“那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了？”他回答说：“资产阶级只剩下了某些个别资产者。”

后来，在随后的文件和发言中，罗米纳兹同志实质上并没有放弃这个观点，只是企图用响亮的空洞词句来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他的报告里，以及在结束语中，也和在上述的论文中一样，罗米纳兹同志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打圈子，并没有下决心揭示和弄清这个问题，而只不过是掩饰自己的观点罢了。但是，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的整个论文中夹杂着下列的论调：“资产阶级迫不得已，乃投降了”，“它是中国社会中最不成熟、最落后的阶级”，“它还没有来得及定型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立阶级”，“它的投降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的最大的破产，注定了它在社会政治上的退化和腐朽”，“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派的胜利，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因为这截断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无论是在反动阵营里，或是在中国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在日益减小”，“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保留一点独立性”。

罗米纳兹同志就是企图依靠所有这些论调来缓和与稍微修正自己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只是在一个地方（而且是在注释中），就资产阶级问题他顺便说：“我仍然维护我在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所持的观点”。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详细地分析罗米纳兹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观点了。

“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定型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立阶级，就参加了革命。”这种毫无根据的论点，真使我们感到有些惊奇。显然，罗米纳兹同志并不想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可

是，既然否认资产阶级存在，而又说它参加了革命，这就使我们不能理解了。其实，资产阶级并非无意识地听命于其他社会力量而参加革命。要知道，它不是一般地参加革命，而是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它不仅不把领导权让给无产阶级，而且总是把无产阶级当作危险的竞争者看待。回想一下 1926 年 3 月 20 日广州的反革命政变吧！最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掉其阶级理智，并不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和地主建立同盟。其实，在我们俄国，1905 年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就是在地主专制制度的庇护下投敌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死亡。列宁写道：“资产阶级自由派在经济上与地主土地所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利益是互相错综在一起的，因而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来说，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而不去消灭它，乃是一种安稳的最好的办法。绝大多数自由派资产者认为，极其缓慢的、甚至慢得难以察觉的改革，也比消灭好。可见，在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这个阶级不能有另外的论断。”

列宁在另一处写道：“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阻挠群众运动，有意识地维护那些人所共知的、最主要的中世纪制度，以便据以反对群众，特别是反对工人。”

从我们所引用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决不像罗米纳兹同志那样，仅仅从资产阶级投奔地主反革命阵营这一事实上就认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死亡了。相反地，列宁正是在这里看到了自觉的阶级政策的表现，因为这个阶级正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方面去，这只能证明它有阶级洞察力。资产阶级本身无力单独对付日益增长的革命，因而与地主和军阀结成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这样做，有助于它摧毁对它有重大威胁的群众运动，因为它认为，群众运动比保持帝国主义奴役和中国中世纪制度，威胁更大。

由于从政治力量的估计上贬低了中国资产阶级，罗米纳兹同

志也就犯了对中国革命斗争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的错误。因此,既然这个论点过去导致了共产党滚入机会主义的泥坑,那么现在,它也只能使劳动群众对反动派进行力量薄弱的小袭击,而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强有力的冲击。

罗米纳兹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肤浅认识,不可能使他正确地提出利用反动阵营中的矛盾的问题。有必要回想一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列宁的策略要求我们利用反动阵营中和资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切矛盾,要求我们不仅不要忽略纠集起来的反动势力之间的阶级界限,而且还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极力动员我们的力量去战胜更强大的敌人。而否定资产阶级的存在,否定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影响、它的力量和它的某种十分有限的独立性,是与这个任务相抵触的。罗米纳兹同志的论点,对于中国危害尤大,因为在中国,我们碰到的是极其顽强的敌人,在那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唤起千百万依然袖手旁观的劳动群众去进行斗争,挖掘新的革命潜力,把绝大多数仍然保持中立立场的和一部分处于资产阶级影响

之下的城市贫民、流氓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引上革命的大道。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提出这项任务，但这项任务却引起了罗米纳兹同志不可原谅的歪曲和不可理解的批评。当时我们认定，流氓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和中国农民阶层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还处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因而我们的任务是，使资产阶级与这些同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社会力量隔离开来，把广大的革命群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可以完全证实我们的见解。千百万流氓无产者在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效劳，组成雇佣军队，在他们的帮助下，反动派会摧毁我们的力量。资产阶级还能使大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群众跟着它走。甚至连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也都显现出它的影响。洛阳工人们俯首听命于冯玉祥。成千上万的广州机器工人手执武器反对广州苏维埃。遗憾的是，这一切还远非我们的见解的唯一证明。我们曾亲眼看到，英美烟公司工人的罢工，是根据中国资产阶级的指使爆发和结束的。而且，尚未完全消除的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可证明资产阶级甚至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中都有影响。最后，还有一个事实，即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南昌向汕头进军时，走了一千余公里，在所有村庄看到的只是荒废的房屋和患病的老人，这是由于反动分子向中国农民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种恶魔，因而农民都因害怕而逃走了——这也向我们表明，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革命工作要做：弄清楚劳动群众的想法，使那些同我们在社会上有密切关系的人脱离反动派的影响，动员真正广大的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

罗米纳兹同志还是由于他所固有的肤浅认识，而对这一极其重大的任务置之不理。罗米纳兹同志硬说我有这种观点，似乎我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在继续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因而教导我说，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反革命，这个争取领导权的斗

争是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特点。他曲解了我的意思之后，毫不费力地去证实我歪曲了革命的实际情况。而实际上，我所谈论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忘我斗争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那些同我们在社会上有密切关系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忘我斗争的问题，因为他们目前对革命斗争大都抱袖手旁观的态度，而且有一部分人还处于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的影响之下。

罗米纳兹同志对这个任务漠然视之、草率了事，只是以一些讽刺性的意见来支吾搪塞，而没有极其热心、坚定地提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共产国际十分清楚，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为反民族因素，它不仅不能继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而且它已完完全全把民族利益出卖给世界帝国主义了。但是，即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会完全认清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徒嘴脸，从而无论如何也决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实际上放弃了民族主义，因而口头上也必定会放弃民族主义宣传，放弃利用自己影响群众的这个手段，那就太可笑了。只要指出反对苏联的斗争是在“反对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只要指出一切反革命政变和对共产党的袭击是在反对民族革命叛徒的口号下、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国民党的中国独立自主纲领的口号下进行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显然，实际情况和这种口号之间是有极大差距的。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于那些革命胜利有待于他们参加的人们来说，还是很不清楚的。

蒋介石和另一个反革命小丑在发表对外宣言时说，南京头子们将不继续采用老办法来反对外国资本的统治——这种论调使罗米纳兹同志陷于困窘不安状态。在这里，罗米纳兹同志竟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利用民族主义宣传来影响群众的政策。这

样简单地估计形势，简直是太幼稚了。中国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招牌欺骗了群众，并将继续欺骗群众，其目的是与真正的革命解放运动作斗争。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同我们在社会上有密切关系的人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揭穿资产阶级狡猾的政客手腕，使它露出假民族主义的真面目，借以把一批又一批的劳动群众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

这里，我们要结束有关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了。我们最后来分析一下在中国目前业已形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十分明显，最近一年的革命唤起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去进行斗争，把他们组织起来了，使他们革命化了。同样很明显，这些群众取得了革命策略和革命斗争方面的巨大经验教训。但是，除了这些收获外，除了劳动群众在最近几个月的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一些由于革命遭到局部失败而产生的很严重的缺点，必须指出反动派的力量有所增长，反动阵营有了某种程度的团结。考虑到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必须积极开展工作，以便增强自己的力量，组织后备的力量，吸引新的战士加入进攻中国反动派阵地的先进队伍的行列。

三、关于不断革命论

我们来谈谈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中国当前局势的分析。经济危机的确使中国农业陷于苦难之中。中国工业经受着极其严重的萧条。金融瘫痪状态日益加剧。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几乎停顿了。国内斗争也和军阀内战一样，使中国整个经济生活的危机更加尖锐化。资产阶级地主同盟一直没有作出任何的改进，反而使中国经济更加紊乱了。政治生活的脉搏继续紧张地跳动着。工农的阶级斗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并没有削弱，继续在这里或在那里以公开的武装冲突形式出现。斗争在继续着。革命斗争

继续不断地、更加集中地爆发出来。这一切使我们认为，在中国许多最主要的省份里，即在那些革命运动规模最大的省份里，仍然保留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中国日益发展的革命的性质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具有纯理论的性质，因为拟定革命任务，拟定我们整个策略中的基本口号和基本方针，都要依从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确认，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不断革命。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罗米纳兹同志在发言中热烈响应和支持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显然，不断革命这个术语，原是马克思提出的，但是它与托洛茨基对这个论点的解释毫无共同之处。而另一方面，只有列宁对于那些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必须消灭中世纪制度残余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才是对马克思这一论点的唯一正确的发展、唯一正确而具体的阐明。因此，使我们感到有点惊奇的是，罗米纳兹同志不提适合于中国的革命转变问题，而捧出比较笼统的提法——不断革命论。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的学说，是革命策略家们手中的锐利武器。它可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各种不同阶段的革命性质和任务，它是掌握正确而坚定的阶级政策的枢纽。目前提出不断革命论，就等于我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见解上向后倒退一步。诚然，我们在目前所占的优势还很小。可是，如果注意到，我们过去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主要就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且我们党内多年的斗争都与这个术语有关系，那就似乎没有十分的必要来卖弄这个专门术语了。不过，我们立刻就能猜到，究竟为什么有些同志需要用不断革命论这个比较笼统的提法来代替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学说。这个关于革命问题的比较笼统的提法，可使他们在其理论体系中得到充分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竟使他们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结束了；中国革命已经超过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关于这一点，也和其他有关问题一样，罗米纳兹同志在其论文中，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写道：“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按其政治内容来看，今天已经越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范围，必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更加露骨。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目前，它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说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工农革命，若是从其形式、内容和阶级动力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称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着，又说什么，“目前中国革命已经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的错误显得特别明确，因而我们不难证明这个观点的谬误，也不难证明持这种观点的人必然会陷入矛盾之中。

列宁在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别时写道：“恰恰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考虑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别，他们把第一种革命进行到底，也就为过渡到第二种革命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列宁曾经无数次指出这两种革命的差别。“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中，也总是能显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因为一般说来，农民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不过，布尔什维克考虑到了，无产阶级能把整个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团结到自己这方面来，能使中农中立起来，能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差别，就在于此。”

我们看到，列宁在指出这两种革命的差别时，认为农民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我们和整个农民一起进行革命，我们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可是，认为中国革命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罗米纳兹同志却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在一份重要的

文件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农民阶层，还没有表现在自己是积极的反革命力量”，“目前农民运动的目的首先是反对地主、豪绅、军阀和高利贷者”，因而“农民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力量参加革命”。这种对农民和对革命性质相抵触的观点，显然是力图改变共产国际以往根据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学说所作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决定。

罗米纳兹同志在其论文中写道：“能够造成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唯一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这就使他陷入另一个矛盾之中。罗米纳兹同志的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与他自己的关于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发生了根本的矛盾。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政权，只有民主主义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才能产生这一唯一的形式。怎么能够同意罗米纳兹同志所说的这个转变已经发生了呢？列宁写道：“要知道，正是由于苏维埃能够团结工农群众，并把他们吸引到政治活动中来，所以它才是无与伦比的最高民主形式和类型，苏维埃可以显示出‘人民’最关心、最敏感的群众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增长与提高的程度。”因此，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教导我们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能设置人为的万里长城，“除了按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及其与贫农的联合程度外，不管按什么其他准则把两种革命分隔开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歪曲，使它庸俗化，都是自由主义变相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中国苏维埃要把工农群众吸引到政治活动中来，把革命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借以创造出使民主革命顺利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前提。

罗米纳兹同志整个论点的依据是，我们不能仅限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共产国际在提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时，

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先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如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在中国真的已经结束了，那么，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早就应当提出来了，而且中国革命队伍中那些进行斗争的劳动群众早就应当围绕这个口号联合起来了。

因此，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根据需要修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次全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中国革命在第一阶段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并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趋势。^①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最近阶段，革命的基本内容，即最主要的革命口号应当是：消灭帝国主义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口号并不意味着在以后的阶段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当然，不是的。只有今天和以后的斗争，才会决定我们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到怎样的程度。

（译自苏联《布尔什维克》（Болшевник）杂志，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1928年第3—4期，第108—122页）

邹宁译

（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第32—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① 顺便说说，我们要指出罗米纳兹同志在其论文第一页上，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大转弯。他开头说：“共产国际基本上正确地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一般任务、性质和发展趋势”，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和决定的正确性，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所证实。而在几行之后，他却宣称：“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不只是策略上的问题，而且一般的问题（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都会重新地、不同于以往地提出来。”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所提出之草案)

(一)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的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革命为“无间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脱洛茨基一九〇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无间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杀，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 (二)

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在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分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极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

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自然无疑的，因为社会阶级的联合变更，而有相当的反动势力之结合 (Consolidation)：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帝国主义者不但表现攫取中国经济权利的高度的积极性，并且增高自己对于中国的政治势力。反革命的这三个主要力量，协同的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同时这反革命的营垒之内，也有极剧烈的内部斗争，一方面表现于中国互斗的各派之利益自相矛盾，别方面也反映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

(三)

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不但英勇的广州工人之暴动，而且许多省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各县的暴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江西、湖北、河南，甚至山东、满洲北部诸省），再则军阀军队中兵士群众的愤激而倒戈也日益发见，这些都指出革命的高涨——走向新的高潮。经济状况之急剧的恶化，财政的紊乱，军阀混战的破坏，空前的政治压迫，都必不可免的推动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去。

(四)

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他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他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现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在极厉害的白色恐怖之下，表现相当的挫折。

(五)

这一切形势，可以确定主要的党的策略路线，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他不能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

(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他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且（为反对黄色工会的警察式的国民党式的机关起见），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必须同时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这是对于党有非常之大的危险的。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同样，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农民协会，农民委

员会等等)，特别注意贫农之中的工作，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份。有系统的日常不断的执行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这在现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七)

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不做工农的群众暴动，而去玩弄暴动，这是消灭革命的“正确的方法。”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Coordinated)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必须经常的不动摇的去组织农民的发动，党应当预先便注意中国各省区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不同的条件，首先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之内估计到。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

(八)

革命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竭尽全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他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这在共产国际以前的议决案就已经说过，可是他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

形势的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之恐怖方法，沉溺于乡村中的游击主义），以及组织上的动摇。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的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应当是党的当前任务。

（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反对组织新的仿佛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或者所谓“劳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有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等）是有组织这种新党的企图，其实这种新党，将要是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蒋介石或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反对工农运动中的右倾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而这种斗争，将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愈加坚决的战胜“左倾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不对机会主义余毒有任何让步，而愈有成效。

（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

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十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实行自己的天职：严厉的反对社会民主派及脱洛茨基派的造谣，他们说：“中国革命已经消灭了”，这种造谣诬蔑，不过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工作更加容易，帝国主义本来只想完全镇压中国的工农运动，而中国的工农运动却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竭全力赞助中国革命。现时这一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干涉中国加紧的时期，所以各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赞助尤其必要，尤其重要。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更加要力争撤回驻华海陆军，反对割据中国领土，瓜分中国领土，反对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世界的工人首先便是共产党员，要努力执行无产阶级团结之天职，实行帮助中国英勇的无产阶级。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

(1928年3月1日)

米 夫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①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问题扩大预备会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专门委员会都对对中国问题作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全会通过的决议总结了长期以来的讨论，对中国革命阶级斗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决议估计了当前阶段的形势，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谈谈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就中国问题作出的极其重要的决定。

全会首先不得不回到**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是因为中共中央十一月全会确定了中国革命是不间断革命的方针；二是因为一些同志所持的立场。他们认为必须修改共产国际过去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决议，坚持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经结束，中国革命现在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这些同志断言：“革命具有不间断性”，“中国革命现在已不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工农革命。如果就其形式、内容和阶级动力而言，那么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9日—25日在莫斯科举行。 —
原编者注

如果把这个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将会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造成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个观点想要说明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它错就错在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脱离了“中国革命，即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民族特点”，这是与列宁学说相违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正是布尔什维克注意严格地区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将前一种革命进行到底，即为转变成后一种革命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这就是全会必须强调“目前时期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无论是从经济观点（实行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或者从政权阶级实质的观点（工农专政）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尚未完成。这个决定，一方面证明了共产国际以前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中国革命在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个决定提醒中国共产党不要仓促地、过早地、错误地估计中国革命和由此在策略上作出不正确的结论。



现在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如何估计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革命低潮和高潮的迅速交替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925年夏季，革命高潮波澜壮阔，波及上海五十万无产者，推动了广大劳动群众，促使军阀部队开始革命化过程。1925年底和1926年初是革命处与低潮和反动派暂时得势的时期。具体表现在工人运动遭到扼杀，国民党被击败，军阀头子吴佩孚和张作霖实现联合，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也是上述情况的反映。

1926年秋季的北伐显示了革命浪潮的再次兴起，它极其迅速地发动了民众起来革命。千百万中国工农投入了革命斗争，团结成冲锋陷阵的大军。为肃清中国封建残余、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争

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日益激烈,到1927年夏季已达到顶峰。然而在这个时期,在向强大敌人的搏斗中,革命没有从自身获得为胜利完成革命所必需的力量。随着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阶级力量的分化又把中国资产阶级抛到世界帝国主义所支持和组织的反动阵营中去。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聚集了反革命力量,使工农遭到惨重的失败。他们摧毁了革命中心,扼杀了群众运动,破坏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杀害了大批组织工农斗争的领导干部。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结束了,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浪潮平息了,但是,任何失败都不能磨灭中国革命取得的一切巨大成果。过去的事件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大规模政治发动的重大尝试。这些事件使无产阶级在全民族斗争中上升到领导地位。这些事件成为劳动群众的组织性得以提高的强大动力。广大劳动群众从这些事件中获得了革命阶级斗争的丰富的、难忘的经验。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作用不断提高并大大加强了。

同时,革命阵线的分化,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资产阶级的投奔反动阵营,都有助于将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阶级的分化把各个阶级的情况全都揭露给人民。在尖锐的斗争中对国民党上层军事将领具有革命性的错觉业已消失了。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一切无产阶级斗争的敌人已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了反革命本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被从运动中清除出去。工农行动的方法及其组织的生命力经受了检验。革命的纲领逐步形成,工农群众的政治口号更加激烈。整个革命运动上升到建立苏维埃的新阶段。具有种种丰富阶级斗争经验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正在投入到当前的斗争中去。



尽管我们现在不是处在蓬勃的全民族革命高潮时期,我们仍

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反动时期将是极其短暂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革命不久即将出现一个更有力的和取得更大胜利的新高潮。

这个庞大国家整个政治生命的脉搏继续加快跳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一方面，反映出帝国主义的虚弱。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大大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地位。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世界帝国主义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竭力恢复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激起更多的劳动群众奋起斗争，使他们受到革命斗争火焰的洗礼。另一方面，联合起来反对工农运动的反动阵营由于内部矛盾而开始分化，开始分裂成无数敌对的军阀集团。连年内乱再加上经济危机和群众的不断破产。

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比前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工业进入了极度萧条时期。纺织业约百分之四十的纱锭和布机没有运转。煤和金属的开采量急剧下降。企业和商行倒闭。中国冶金工业仅有百分之三十的设备还在使用。从1926年12月起，上海四家最大的糖果厂暂时停产。萍乡煤矿停工，北京煤业辛迪加的开采量锐减。

铁路被毁，许多铁路完全停止运行。农业情况逐年逐月每况愈下。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灌溉系统遭到破坏。东京杂志《中国生活》（1927年9月17日）指出：“政治动乱的这类事实阻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并且由于连续多年的内战和匪祸这种人类的灾难，由于地方官员的失职和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旱、涝、虫害），出现了荒芜土地的面积逐年增多的趋势”。

经济作物生产缩小，农产品出口下降。侨居国外的人数不断增加。1925年居住国外的华侨有八百一十七万九千五百八十人，而1927年增加到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人。越来越多的地区受灾歉收。直隶省十个县和山东省三十个县1927年遭受干旱。八百万人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

这种情况还要加上财政崩溃和中国货币急剧贬值。我们只要

注意一下因内战连绵而消耗于军费的庞大数字就可以明白财政瘫痪的原因。

下面表中军队人数增长和军阀军费开支增长的数字可以雄辩地说明这一点。^①

年代	军队人数 (万人)	军费开支 (万元)
1907	/	3,700
1910	/	10,200
1918	129	20,300
1925	193.3	60,000 (据不确切统计)

1927年的统计资料现在还没有。专家们认为,1927年的军费开支不会少于七亿元。无论如何,越接近十亿元就越符合实际情况。

这些庞大的军队和数亿元的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压在劳动群众的肩上,最终将破坏中国的经济,首先是中国的农业。

因此,民众迅速地趋于穷困,以致一贫如洗,以及他们同样迅速地奋起革命,就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促使劳动群众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唤起更多的士兵为工农革命事业战斗。

所有这些条件决定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更大的高潮。目前许多事实不仅说明敌人力量减弱,而且还说明农民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华南许多地区农民成功地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华中各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连那些过去农民没有参加过斗争的地区也动起来了。甚至在满洲土皇帝张作霖的世袭领地的中国北方,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二万四千人的“大刀会”正在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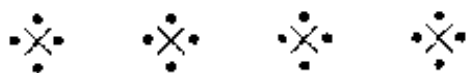
^① 表中的数字引自施泰因教授的著作。——原作者注

他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哪怕把下列事实简单地综合一下，也可以看出农民的积极活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广东省，海陆丰地区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在广东省北部粤汉铁路沿线地区，农民队伍占领了四个县，同时这个运动还继续向湖南和江西省方面扩展。汕头和潮州附近的一些地区，除了县城之外，都在农民政权的控制下。广东南部的遂溪、海康县和海南岛也都在农民革命政权的手中。在湖南省，除了南部以外，茶陵、永兴和酃县地区也都举行了农民起义。在江西省，根据地方同志的来信，永新、莲花和全南县组织了苏维埃政权。当然，这个运动在很多地区还存在政治觉悟不高、组织性不强的现象。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农民运动的开展，它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

尤其重要的是：士兵响应农民运动的起义浪潮与农民斗争的高潮，两者汇合起来。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士兵叛乱。而目前军阀部队的起义运动则完全出自其他原因。以前的暴动是由物质原因造成的，主要是因为拖欠薪饷。这些起义与当前开展的农民斗争有紧密的联系。农民运动对士兵的影响越深入就越有力量。军队纪律涣散，开小差现象增多，出现了部队倒向起义农民方面的事件。

在广东省，广州起义后约有一千名张发奎所部的士兵转到海陆丰农民一边。湖南唐生智部下的几个营，打死了自己的指挥官，投奔农民。这种分化和士兵哗变的现象在白崇禧部队中也有发生。的确，这个过程目前的发展还极其缓慢。但它反映了劳动群众中的深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不断增长。



经济发生危机，资产阶级和军阀反动阵营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民众陷入毫无出路的绝境，农民运动和士兵哗变不断增加，所

有这一切都有利于革命浪潮再次兴起。所有这一切说明：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即低潮和高潮的迅速交替以及反动时期的短暂，在这一次仍然会显示出来。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中国革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里是指运动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同时也是困难）之一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比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更多地完成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譬如以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来说，这个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至今未能完成，现在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就落在了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这一任务到目前尚未完成，就更深刻地影响到革命运动发展的极不平衡状况。

中国由于被帝国主义划分为各国的势力范围，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而被军阀上皇帝所统治。这就是解放运动常常不能成为全国的行动，而只是地方性、局部冲突的原因。各省的历史特点和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因素。

1925年夏季著名的上海五十万无产者大罢工^①在其他工业区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并且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任何响应。1927年春，上海工人的胜利起义^②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进行的，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敢于采取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大部分省份的农民还刚从政治的沉睡中觉醒过来。最后在1927年夏季，当湖南的农民运动已发展到夺取土地和组织分田运动的时候，邻省的农民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比较坚决地提出减租的口号。

中国目前时期的革命运动也有这种不平衡的痕迹。当前阶段的特征是在工人运动相当低落的情况下展开了农民斗争。工人阶级首先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并在农民没有及时支援的情况下

① 指“五卅”运动。——原编译者注

② 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原编译者注

坚持了一系列的战斗。正因为如此，它才承受了反革命的沉重打击。残暴的反动派惨无人道地镇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切活动，杀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数千名广州、上海、武汉的无产者在反动刽子手的屠刀下丧生。在长沙全部领导成员被枪杀。反动派使用前所未闻的白色恐怖手段扼杀了工人运动。但是反动派的一切努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快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不但没有使工人阶级对政治斗争丧失信心，反而更加激怒了工人阶级，加强了紧张气氛，为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准备条件。

但是，在估计目前时期的中国革命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当前运动的特点，即工农运动的浪潮是此起彼伏，不相一致的。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就能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那些策略问题了。执委会全会是这样阐述这些任务的：“党应当准备一次普遍的新的革命高潮。这个高潮必然会向党提出一个直接的实际任务，即组织和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为只有通过起义和推翻现政权才能完成革命任务。因此，党在现阶段的全部工作重心应当是：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提出党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统一全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推翻现政权，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组织苏维埃，用这些口号把他们团结起来。当前整个形势的最大危险在于工农运动的先锋队由于不正确地估计当前形势和低估敌人的力量，可能会脱离群众，远远地跑在前头，从而分散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被各个击破。”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在通过的决议中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加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影响；提出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口号更加广泛地发动工人和农民；更加周密、更加广泛地组织群众作好当前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强调，不允许对劳动群众以强迫的方法代替说服的方法。在最近几个月革

命运动的实践中就遇到过这种事例。



对中国整个形势的估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制定的最主要的策略路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决与盲动倾向和以起义为儿戏的现象作斗争的任务。我们从中国各地得到的许多报道和材料证明，中国共产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的。例如：一个同志写道：“河南省委根据中央制定的起义的政治方针，把河南省划为几个区，规定1927年11月10—17日为各区起义的时间。”这个同志接着叙述了这些起义是怎样由于缺乏充分周密的准备以及这些尝试与对整个形势和群众情绪的分析完全不一致而终于失败的。

在长沙，这种过早的盲动的结果使共产党的组织遭到彻底破坏，湖南省委成员及其书记王一飞被杀害。湖北省委在三个月内三次决定在汉口起义，而每次又自己取消了起义的期限。上海的同志，不考虑具体形势，表现出主观的革命急躁情绪，也沾染了盲动思想。在农村地区，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不是准备大规模的运动，而是热衷于分散的、注定要失败的游击斗争。

中国共产党应当克服这些有害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国共青团中尤其严重。相当数量的共青团干部受了一种理论的毒害，认为“中国不可能有不合时机的起义”。这种情绪在中国共青团的远远没有肃清的“先锋”思想中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共产党的前机会主义的领导为这种倾向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共青团以它是反对机会主义的发起人和起义的倡议者而自傲。在许多地方它要摆脱党的领导。不久前，中国共青团甚至提出过组织“青年共产党”的问题。

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应当意识到共产主义先锋队脱离工农群众的危险。应当根除盲动情绪。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坚决果

断地提出了这项任务。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同时提醒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要过头。在反对“左”的盲动倾向的同时不应当忽视对前机会主义领导的死灰复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基本上被党克服了，但是在一些地方仍然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总之，党的健康思想使我们相信，党是能够完成这两项任务的。

必须认为部分知识分子脱党，某些取消主义情绪以及甚至要建立新的“工农”党的企图都是党内生活的新动向。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某些原共产党员（谭平山等）企图组织新的所谓‘真正共产主义的’‘工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党的活动进行无情的斗争。”

对于这个党我们还没有详细的、充分可靠的材料。只知道以谭平山为首的、因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出党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反共产国际的新党。现在他们正在着手制定纲领，建立组织机构。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党只能是反动派手中的工具，因此，消除它的影响，揭露其反革命本质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近几年的事态发展使中国无产阶级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多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中国的整个形势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新的、强有力的革命高潮。首先应当仔细研究和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

共产党尤其应当十分认真地考虑广州起义的经验。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所指出的广州起义的错误，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更有准备。

新的高潮将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些极其复杂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党不会对这个高潮的来临感到措手不及。只要团结自己的队伍，以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丰富

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去带动劳动群众，对发展工农革命将起巨大的作用。研究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中国的无产阶级就一定会在新的高潮中向全世界作出英勇奋斗的榜样，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高和平译，章任贤校)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 中国问题决议案的

(1928年4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余毒。党只有在这种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务：组织并教育劳动群众，以造成革命斗争之胜利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之必要的条件。

现在，争取群众的工作，建立城市乡村的群众组织，以及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奋斗，是最重要的工作，是斗争胜利的必须条件，亦就是准备工农总暴动的胜利之必须条件。党在城市之中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更切实的找着新的真正群众的工作方法，改造党部的组织方式，以至机关布置的适当秘密工作，都是极重要的任务。政治局特别决定要常委在最短期间定出适当

的工作计划，各地党部尤其应当特别规定适合当地具体条件的办法而切实执行。

赤色工会的工作，是城市工人中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之根本工作，必须切实运用各种无党工人群众的组织方式。至于加入黄色工会的问题，则必须是真正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方能加入，而且尤其要有确定明晰的目标：取得其群众而打倒其欺骗群众的领袖之信仰（例如广东的机器工会）。至于国民党的官僚工会（如改组会或上海工统工总，整理委员会等），凡系纯粹的官僚机关而没有群众者，则宜领导群众去反对他们，明显的提出“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反对任何机关的委派工会”之口号，努力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秘密的群众工会，不断的暴露国民党官僚工会及黄色工会机关的罪恶。

乡村及外县的工人运动，中央曾经屡指示其重要。各地党部必须切实的进行组织城镇以至乡村手工业工人，乡村的无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政权的乡村，并应组织雇农工会。一般在暴动之前，必须努力组织农民，使暴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些群众组织（乡村手工工人，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等）能够迅速的联合起来组织代表会议（苏维埃）而为指导暴动的机关。

再则，兵士运动是异常之重要，必须加倍的努力，去破坏敌人军队，以至更多的吸引兵士群众到革命的方面来。

现时反动势力虽然联合一致的反对工农及共产党，然而不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之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而且财政上经济上很明显的趋于更大的崩溃（许多工厂停闭，新的税捐，内外借款的无着和困难等等），所以反动政权是不能稳定。同时工农斗争极普遍的发展，扩大到许多新的省区，引进农民中的新的成份，日进于更高的阶段（土地革命之深入）。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亦就明显的指出劳动群众中之新的成份（兵士）日益引进于革命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用〔应〕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客观上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在发展，是在艰苦的奋斗，一开始便不能不很快的转入武装的斗争。必须要努力增高农民运动政治觉悟的程度。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

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无间说”认为“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确是要跳过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民权独裁制）而直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如果移到中国革命上来，是显然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

中央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对济南事变宣言

(1928年5月)

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

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

全世界的劳动青年!

全世界的兵士和水手!

武装瓜分中国,已经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据山东。世界的资产阶级将中国工农的民族革命运动沉溺于血海以后,现在正着手武装干涉以至公开征服中国。日本很迅速的利用其战略上的便利地位,首先发难,准备改变山东为现在满洲的地位,就是说,将山东改变为日本奴役的殖民地,为日本帝国主义黑暗的反动的根据。日本所发难的战争,可以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者重行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战,为流血的残忍的征服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世界大战。只有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密切的英勇的团结,才能够免除或延缓这种天陷地裂似的大祸。

日本天皇政府发动此战争,并不是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三番五次将其自身出卖给帝国主义,现在他只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罢了。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在山东在满洲都发动一市侩的和强暴的战争,反对中国人民。日本是第一个公开瓜分中国的,这因为日本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他要保持其统治地位,必须借助于对外的战争。日本的法西斯蒂残忍的镇压劳动运动,枪毙农民,工农的战士下狱者达数千人,这样,他就不能利用国会来欺骗群众,藉掩其专政的真面目。最近国会选举是在野蛮的恐怖之下举行的。

恐怖尽管怎样野蛮，但是在选举当中反动派决不能阻止工农的联合战线，决不能阻止领导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公开争斗。

左派工农党（劳动农民党）在选举当中得到票数，比上次市议会选举增加了一倍。资产阶级的反动，虽然有改良派的领袖帮忙，仍不能制止劳动者的呼喊。

日本资产阶级以压迫群众的手段，来答复这次选举，不仅一向秘密不合法的共产党再被压迫，而且封闭工农和青年之合法的群众组织。在政府保护之下，贵族的黑色队公开的刺杀或鞭笞那不同意于反动的人民。

但是工人争斗的情绪则丝毫未减。共产党也能在恐怖之下保持其势力。几十万工人参加五一节的示威运动。罢工运动也没有停止。农民的怨望与日俱增。秘密的劳动农民党组织以及左倾派职工会等之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

田中政府虽然购买议员，但国会里半数议员还是反对他的，他只能靠刺刀力量来维持，可是刺刀力量也开始发生动摇，于是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就加紧白色恐怖，藉以保持军队的纪律。日本天皇政府要巩固其军事专政，要转移日本劳动者对于政治经济危机的视线，就想在山东造成一乐意的和光荣的胜利。

日本的工人，农民和兵士！你们的第一个革命的任务，就在于阻止那架在中国人民头颈上的日本大刀！你们首先就要在日本发动一有组织的群众的牺牲的斗争，来答复日本的暴力占据山东。建立、巩固并扩大你们的革命组织！更自信的更有把握的高举共产党的旗帜！驱逐欺骗的，说假话的，在紧急关头保护反动势力的改良派叛徒！逼迫帝国主义者撤退驻华及其他殖民地之一切海陆军队！运用群众斗争的一切力量与手段制止运送军火，派遣军队来压迫中国人民！暴露新的市侩的远征军之真相，务使政府派到中国去的每个兵士，都能变为帝国主义的一个仇敌，中国革命

的一个光明磊落的同盟者，和推翻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真实的战士。

军阀以及资产阶级的整个队伍是劳动者的敌人，他们正准备着瓜分中国。中国革命的刽子手——北方张作霖，南方蒋介石，西方冯玉祥，以及他们三人的手下军官——都同样地邀请帝国主义者来做他们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助手。他们都是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希望中国的被征服要对于他自己的主人更有利益些。

张作霖公然参与日本对山东的侵略。蒋介石一年来的卑鄙的卖国的行为是准备并促成这次侵略。因为要同帝国主义妥协，中国的资产阶级便以杀戮拘禁工农领袖的手段，葬送了民族革命运动。

反革命的国民党，暗中与帝国主义勾结，所谓“铲共”就是替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山东，资产阶级的真相就全部揭穿了。

中国的劳动群众将在中国推倒反动的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设独立的革命的中国。只有组织工农的苏维埃政府，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地位，铲除其政治的及经济的根基，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之下，领导民族革命获得胜利并开辟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只有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恢复、巩固提高你们的组织的阶级觉悟，更密切的团结于共产党。

蒋介石部下的兵士们！你们记住这个资产阶级走狗，去年将革命的上海白白送给帝国主义。

田中部下的兵士们！你们记住这个专政军阀是你们的阶级的最恶毒的仇敌，他在日本将工农绞榨死并践踏在足底下，将你们的父亲和兄弟关入牢里，侮辱你们的妻女。

中日两国的兵士们！你们不要停止你们弟兄般的革命团结，虽

任何牺牲，亦所不惜。打破两国的反革命战线，团结你们的力量，拥护中国革命！

屈服中国，接着就瓜分中国——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在华政策。这个市侩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中国的民族革命。日本占据山东，就是开始实现此计划的第二部分，其他的帝国主义强盗，尤其是英国与美国，将继日本之后，提出他们抢掠中国的要求。

英国鼓动日本的抢掠，为的是要在军事胜利上得到如意的打算。撤退驻华印兵之必要，香港英国兵士之怨望，印度革命高潮之重新开始，英国无产阶级最好的一部分之团结和奋斗——这些都使英国感受扩大军事行动的困难。但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日益衰败，他觉得不能放松其殖民地的占领。包尔温政府在工党和工团总会的资产阶级领袖的拥护之下，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来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藉以恢复和巩固其在印度与大西洋的地位。

日本占据山东，又将加紧美国的军事活动。华盛顿政府公开的要重新分配殖民地，为获得其新的商品市场及原料产地。美国帮助南京政府，对山东事件抱“不平”，这只是表现美国帝国主义将用种种方法获得他自由抢掠中国的机会而已。

共产国际屡次警告说：帝国主义之进攻中国人民，乃是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步骤。日本现在开始瓜分中国是趋向大战争的第一步。世界大战祸，飞跑似的将要来到。对于苏维埃联邦压迫之加紧，乃是重行划分地球的抢掠计划的一部分。苏维埃联邦的存在，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高照灯，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军事阴谋的残酷暴露者，他对于那些挑动大战争的人，自然是很危险的。

全世界的工人们，你们要用新的力量来拥护中国的革命，反抗强力瓜分中国！为实现“凡是兵士所有枪炮不打中国革命”的口号而奋斗！注意将要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万不可相信第二国际与亚姆斯德丹国际之甜言蜜语的假话，他们已经秘密地准备

着重演一九一四年的背叛！努力工作，勇敢的准备着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中国革命万岁！

打倒瓜分中国之帝国主义的侵略者！

帝国主义军队的兵士们站到中国革命一边来！

有组织的抵抗日本强盗的劫掠！

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准备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的战争！

社会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西欧局扩大会议

(摘自《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2期)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 上的政治报告（节录）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

一、中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么？

同志们，我现在说到第三部分，就是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的问题。

我开始就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一般说起来，究竟是否有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这个问题决不像开始一看那样简单的。许多人以为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就是在这个革命中工人占有主要的指导作用的革命，以为这样便已经够了。但是，这是不正确的意见。或者工人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工人阶级已经得着了政权，然而没有能力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么，革命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决不像许多人所说的一样，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将工厂制造厂土地等分配了就完事。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国家中，在俄国在中国以及在许多其他的国家中，以为将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了，将土地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分配了是社会

^① 即布哈林。

主义，将工厂作坊分配了是社会主义，将米店的仓库打开平均分配了是社会主义，将从店铺夺来的商品都平均分配了是社会主义。但是这决不是社会主义。这不过是将全国的财产，土地，私有物，店铺，商品……等等给了总平均的分配罢了。在这里与社会主义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没有。社会主义不是这样解释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时候，所有工厂制造厂等等都应受工人国家的支配管理。大家都知道真正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分散财产的。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在一个国家中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种建设的条件就是大工业发展的程度。假使没有大工业，假使没有经过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来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假使生产是散漫的，假使存在的有数十万数百万的小企业，假使没有大工业，使他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财产，使他成为一个整个的并可以按照一定计划来进行的，便没有社会主义的前提。假设他在这种条件之下，即使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那么，他在第二天能做到什么呢？他想组织这些手工作坊么，但是手工作坊有数十万数百万怎样可以组织呢？当然是不能组织的，因为他不能计算，他可以生产好多，应常用什么样的总计划，他们中间应当怎样分配工具等。既然是这样散漫的经济，则不能用一个总计划或总管理来联合他们，因此便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一切都胜利，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建设，仍是一点社会主义气也闻不着的。在这种国家中，即使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他最后仍是不免于失败，因为他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几十几百万小企业中，他是不能进行有组织的经济的。假使工人阶级不能组织自己的经济基础，他没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则他最后便没有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保持自己的政权。或者他不能执行社会主义的利益，他可以执行另外的利益，另外的任务，则仍是等于工人阶级失却了自己的政权，而执行别个阶级的利益，工人政权仍是变成了另外别的阶级之政权。因此，当着我们指出在某一个国家能否产生社会主义革命，或有无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可能的问题，就是说，在某一个国家是否有使他不独破坏旧的，则我们绝对要研究在这个国家中是否已有了物质的经济的最低限度的前提，使工人得政权以后可以继续前进而组织自己的经济。

当着在我们苏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与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事实的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我们国家中是有这些条件的，在我们这里是有这些最低限度之东西，在这个最低限度之基础上我们是可以组织经济的，我们国家的经济事实上也是逐渐前进的。但是，同志们，我们在过去以及现在都承认我们所有的已经是这种建设之最低限度的条件了，若是我们国家经济比较事实再有三四倍的落后，而又没有其他各国之工人阶级的经济帮助，则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中必不会放在议事日程之上的。我们在这十年中间，一定是已经倒台而失去自己的政权的了。我们没有倒台，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国家的大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质的经济的建设前提。

假使我们说到中国，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最低限度是有很大的怀疑，我们很怀疑中国无产阶级能依靠着中国经济而自主的在中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之大工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的比重是要比较俄国更不顺利些。假使在中国没有组织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国资本，则中国经济还要更为薄弱些。固然，即使在俄国，若没有外国资本之侵入，仍然也是没有事实上那样大的大工业与其他经济之相互的关系。但是，在中国这种物质前提要更为不好些，因此我们更比较可信的说，中国工人阶级即使在已夺取了政权的时候，仍然单独不能做这件事的，他一个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或者简直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他不能像西欧一样，不像对于以前沙皇的俄国一样，也不像在现在的苏联一样。

中国的同志们，你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应当很清楚的细看事情的本身，不要有一个表面是社会主义的，而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一个很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就是将社会主义认为是平均分散主义。以为平均分散，彻底的平均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每种分散的行动都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更有些对于农民，就是说，对于乡村小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估计，社会主义的性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说，这里我只想特别指明一句，若是机械的将西欧及苏维埃联邦的经验，很呆板的搬到中国去，则完全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在我们的运动中，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都有一很大的危险——列宁当时也指示出来了的——就在于将俄国的经验机械的直接转运到其他各国去。我们的影响，我们革命的影响自然是很大而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们是自觉的指导和。指导所有各处的革命过程，我们绝不能机械的死板的将这一国的经验搬到另一国去。将这一国经验应用到那一国的时候，应当研究分析所在国的特殊的一切发展的条件。假使我们来分析中国发展之特殊条件，假使我们站在研究中国能否有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否有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的问题观点上，则我们应当说，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可以使革命真正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说，使革命的结果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条件就是当着这种发展是依靠着其他国家之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是那一国的无产阶级呢，是苏联的还是其他更大更进步技术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这要在斗争中来决定，要在实际事变中来说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要空想，也不要过于看重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仅只有这个条件之下，可以真正的使中国将来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使这种革命可以担保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二、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我们现在问：中国革命究意是什么性质的呢，不是问他的将来，而是问他的过去与现在。

在共产国际最后的一次执行委员会上，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革命现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阶段。这个名词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引起了很大的误会。我认为中国革命现在及过去的性质，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解释，是决定正确策略，了解中国事变的基础。

我开始要说一个时常可以遇见的很多的很热烈的反对的意见，他的话大概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仍是资产阶级的，这不是什么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应当用什么样的关系对待他呢？并且还有一个时常反对我们的论调说：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为什么我们的斗争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既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什么要没收地主的土地？为什么要破坏私有制度，因私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基础？表面上好像这里有很多的冲突矛盾一样：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他的领袖又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又要破坏土地的私有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混蛋的事，去完成什么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什么鬼蛋又需要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呢？

这几个问题，好像是彼此相冲突，我认为应当说明的。我首先想说在现在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事，这些事最好是用事实的例子来说明。现在中国每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都知道革命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不仅是反对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并且也是反对中国资产阶级。这很明显的，现在是由土地上赶走地主，是要推倒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势力。谁也知道现在革命动力是工人农民，或者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关于动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争

论的。大家都明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是有领导作用，而农民是他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就数量之比较说来，则革命中之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工人很无疑问的只占了少数。还有是大众都明了的，现在革命所能做的最大的事件，能使革命传播到最远的地方而能为革命之基础的——一方面是土地革命，就是要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要问同志们，工人阶级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是不是可以的呢？这不是可以的吗？假使工人阶级引导广大的农民阶级，赶走了一切地主，夺取了一切土地，使土地都归农民分配，这里是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所不应该做的事吗？这里难道有什么不好的吗？我想这里都是好的。假使工人阶级引导广大的农民来赶走日本人英国人，将他们的统治根本铲除，这里有什么不好呢？我想这里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有好的。假使我们党定出工农专政的任务，就是说主张工人与农民两个阶级的政权，这里有什么不好的吗？我想，只有好的，没有不好的。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是否社会主义，这是否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我答复说，无论就那一个问题说，这都不是社会主义。首先我们说政权，我们现在的企图是工农两个阶级的专政，但农民并不是无产阶级。不错，农民是工人阶级之一个最亲近的同盟者，农民在世界各国，特别在中国，都是进行自己经济的小的或最小的私有者。

目前我们应急于进行的，首先要分散地主的土地，要赶走一切地主，逼他戴高帽子游街，这是很好的，这是应该做的，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每个小的私有者都想夺取比较多一点的土地，使自己的经济比以前要好些扩大些，我们要利用这个企图，利用这种农民的力量来赶走我们主要的敌人——地主，而且打击了他们之后，不要使他们的财产和特权仍留着一半或多少，要非常彻底的来打击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在于肉体上都完全不存在，使他们永远不能翻身，这

是土地革命中之一个最大的任务；但这是小私有者的大革命。工人阶级应该起来指导这个革命，但是这个革命的内容是肃清封建制度，可并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乃是肃清资本主义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而建设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彻底破坏与肃清封建制度，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吗？一点也不是的。我们主要的同盟者是农民，他是我们的兄弟，他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阶级，他很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他在中国那样的国家中，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革命力量，他是现在中国革命中之最主要的群众，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小私有财产者，他本身是不希望任何社会主义的。他希望社会主义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是当着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向他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有利的时候。我们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年了，但农民到现在仍然不是任何的社会主义者，农民开始将自己经济转变为合作社的集体的形式，仅只在国家帮助这种经济。我们到现在仍然还有时与农民发生小的矛盾。自然，小生产者决不能在一个短的时期中，便愿意组织自己的经济来经营大的生产。在中国同样也会这样的。

许多人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分散财产，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资产阶级散布许多空想的谣言。资产阶级，尤其是地主，见了什么可怪的事情都以为是社会主义，所有一切于他们不利的东西，他们都称为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将一切东西，都装到“社会主义”这个盒子里来。女人将头发剪短了一点，这件事或者很好，我也不反对，不然，你们要说我是反动派了，但是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社会经济的建设。同样，资产阶级看见男女的关系比较自由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说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里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也没有的。

农民是要彻底赶走地主的，至于资产阶级反对地主的时候，他一定还将地主的特权保留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其他各国是反对过

封建势力的。在中国于相当阶段以前，他也是反对封建势力的。但是到工人农民这种反对封建的斗争也动摇了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势力的时候，如在没收了地主的银行，资产阶级因信用，抵押……等关系，也要忍受相当的损失的时候，在这时候资产阶级怎样对付这种反对封建的方法呢？当着他自己的特权自己的财产也受着一部分之损失的时候，自然，他们对于工农之彻底肃清封建余孽的方法便表示反对，便造出谣言，他说，这是社会主义，赤化，共产党，布尔塞维克，苏俄……等。我们应当明了，这只是他们仇恨我们的话。我们应当认清白，这并不是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与农民的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工人一个阶级的专政而引导农民，这里没有平分政权，乃是一个阶级对政权之独断而使农民跟着他的，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农民是一个小生产者的阶级，他们本身是不企图走向任何社会主义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中，农民的数目非常之多，工农专政的政权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许多人以为“小资产阶级”这个字，是一个骂人的名词，这完全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只是说不是大资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完全不是用来骂人的，这乃是一个很正确的经济学上的名词。我们可以用混蛋，王八蛋等等许多骂人的话来骂资本家，但“资产阶级”这个字的本身，是指一定的社会阶级，他占有生产工具以剥夺工人阶级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乃是一个小私有者的阶级，其中大多数群众是完全不剥削他人之劳动者，他们不是寄生虫，不是剥夺者，乃是劳动群众。农民不是依靠工人，不是产业工人，他是另外一个阶级，他有点与工人阶级不同的自己的特点。工人阶级生活于大工厂之中，他日常所看见的是机器，大生产，他的任务乃是想使这个生产变为更大的形式，他企图这样，乃是社会主义的。而小私有者或最小的私有者都是希望着改良他自己个人的经济，他想在自己的经济中可以收获多一点穀，他想在出卖农产品的时

候多得一点利益，他想由他的那块土地上发财，这是他的思想，这是他的企图。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目前我们要尽量扫除封建势力，只有我们转变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再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话。

三、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目前的两大任务

我们不要站在感情用事的观点上来看“小资产阶级”这个字，那是糊涂，我们说“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小私有者之阶级性的经济名称。正因为现在中国的情形是这样，在国内之主要任务，一面要赶走帝国主义，另一面要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与进行土地革命，又要推倒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因为他客观上是拥护封建制度的。现在在中国，若不动员广大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则决不能赶走帝国主义。除了反对封建势力以外，并且要反对资产阶级，非此不足以完成土地革命。但这种斗争是否直接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呢？斗争的本身是否为社会主义的呢？不是的，一点也不是的。现在工人农民以及我们指导工人阶级的政党，摆在自己前面的任务，并不是要直接使一个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要崩溃资本主义而组织社会公共的经济，这就是说，在现在革命的基础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是什么样的呢？难道无论什么性质也不是的吗？不会有一个革命，他一点性质也没有；就是不会有革命，他一点任务也没有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呢？他的斗争的任务是肃清封建势力，完成土地革命与赶走帝国主义。但这些任务都是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之外的。他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以外，他乃是用了很彻底的很激烈的方法来肃清封建制度而完成这个任务，他只是用了马克思列宁时常所说的急进的平民式的方法。这种与封建制度之彻底的平民式的斗争，是可以由反对资产阶级之方向而进行的，但他在客观经济内容上是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围以外。他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是因为他的

任务只在于肃清封建制度，而不在于肃清一切大资产阶级。他还不是企图一个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不是在革命胜利第二天便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问题是这样。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或由于对“小资产阶级”这个字之感情用事的了解；或由于过于看重了农民的作用而认农民为社会主义者；或由于将工人阶级与农民混合，甚至于将农民抬得比工人还高；或者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将土地革命看成了社会主义。所谓农民的社会主义，就是将土地平均分散，其实这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没有的。

有一种意见是在书上时常可以遇着的，例如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平等的。这句话是对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最后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平等的。但是平等却有各种不同的样式。我们现在可以很平均的将一切东西都分散了，平均的将机器分散了，你拿一个螺丝钉，我也拿一个螺丝钉，你分得这房子中的一块砖；我也分得一块砖，虽然这里平均分配是很困难的，许多东西是不能这样分割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没有真正的平等。我们若想用分散的方法来实现平等，结果只是将一切都破坏了，而什么东西也没有造成。在我们中国的某几个苏维埃区域中，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形，将店铺封闭了，将其中的商品货物分散了，但是这里一点社会主义也是没有的，因为在这里并没有组织社会经济。假使在我们分散了一切东西之后，大家都成了一样的小私有者，大家都有了一样多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的東西，以后怎样呢？他们要生活了，他们要彼此买卖交换了，他们要企图扩大自己的个人经济了，他们有的要发财，有的要破产了——于是另一方面仍然是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里就是问题的实质。一切小资本家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是希望着再多一点财产，变成一个更大一点的私有者。因此，平均分散土地的本身绝对没有破坏什么资本主义。相反的，他还造成了在另一个时期另外一个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

件。没收地主土地这件事，已经在许多其他革命中施行过的。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是没收了一切土地，赶走了一切封建势力，并且当时打倒封建势力是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代表大资产阶级之政治势力的基浪特党人，完全被别人打得粉碎。小资产阶级的专政在当时无产阶级帮助之下推倒了资产阶级。分配土地是彻底的执行了。但以后这个封建的肃清，只是打开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土地的买卖存在，一切商业关系存在，一部分小的私有者，逐渐变成了大的私有者，由此便产生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并不像以前那样半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不在于平均分配一切生产，而在于组织大的社会经济。有这种能力的，仅仅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可以教训农民，但是必须在自己的统治建设了几十年之后，我们革命中的经济就是这样明显告诉我们的。我们国家中虽然已经造成了社会经济及国家大工业之企图，但是在这十年专政之后，我们都没有将农民教训成社会主义者。因此，很明显的，假使说现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那简直是疯狂的胡说，是糊涂，是闭着眼睛而不顾事实的乱吹，是不明了现在在中国之中心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与农民共同夺取政权。中国党离这种任务是很远的，并且在很快的时期我们还不能完成这种任务的，在完成这种任务之前，我们还有许多血要流的。我们现在为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任务而斗争，这种任务并不轻于其他任何的任务。因为只有这种任务的解决才能允许再向前进。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一种任务之完成是要动员广大的群众，作严重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要建设工人阶级与农民之民主的平民的专政。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之一个必经的条件，由工农专政转到无产阶级专政之必经的条件。

在我看来，现下有许多同志将现在中国发生的事变与社会主

义混淆在一块。老实说，我直接间接的反对这些同志，因为他们脑中的确有些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因为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所了解的东西，实在完全不是社会主义。假使我们将摆在我们面前的小资产阶级的任务认为是社会主义，则便是蒙蔽了这些任务的真相。假使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则就等于在我们肚腹中像肉包子一样的，装满了一肚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我们固然说这些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决不能由此便说他不是进步的。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也应当参加这个伟大的非社会主义的革命。他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无论在那一分钟都没有失去他的伟大的意义，他是值得工人阶级帮助的伟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

四、中国革命发展必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我们应说明的，在中国革命之过程及其发展中，其中已有了使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必不可免的转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分。在革命胜利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巨大的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在中间一定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在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发生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譬如在反对帝国主义之斗争过程中，我们也要没收大资本家的企业，这种没收之继续进行，一定使无产阶级被迫而不得不自己出来组织生产，就在这个中间使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

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可将这些事件看成目前的任务，这种任务还要在现在中国革命经过几个阶段之后。现在统一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只是在几县很小的苏维埃区域是不能作算的，这里还不能说真正的土地革命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你们在报告中还提出土地问题需要解决的。拿起中国的地图来看，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我们还需要好大的努力才能将地主推倒，将资产阶级的政权推倒，请你们计算一下，还要做多少

工作，才能完成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我们自己是应当明了革命之转变的前途的，为的要党不至于走到不正确的方向，使党的群众不要提出当时他还不能解决的那些任务，使我们不要费一些冤枉气力，使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等。土地革命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核心，赶走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核心。我们目前的工作，就在这里。不必去想两年以后怎么样，只要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现在实际策略的问题上。

一个同志问我，我们打倒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之后，对于他们的经济势力怎样办呢？在相当的时间以内，我们打倒了他的政权之后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我们在俄国革命之工农民主专政的问题是怎样说的呢？我们在当时并没有提出没收大工厂大制造厂的问题，假使我们在一九〇五年得着了政权。我们一定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只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威廉第二式的外国敌人，反对一切散布全国的反革命残余，也要与资产阶级进行严厉的斗争，打倒他在政治上的势力，在最后被逼迫着或者也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没收。或者在打倒了一切封建势力，完成了自己之历史的任务以后，在当时的基础之上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可能的，在中国或者可以这样，理论上是不能免除的。到那时候，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可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而要一些新的动力，但是我们很相信不会这样的。为什么这样相信呢？在所有中国革命发展的时期，在战争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的时期，西方革命转变的时期，这样都不是笑话而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亲爱的同志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这需要一个长的时期，而不能立刻可以来到的，这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之转变。这并不是我们开始便可以走到的，这乃是我们最后要走的道路。革命是可以这样胜利的，我们的任务也是要引导革命使我们可以走到这样的胜

利。当着我们前面摆着策略问题，问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应该集中注意到土地革命，赶走一切帝国主义与引导工人阶级及农民夺取政权。这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内容。

(录自《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节录）

（二）在现在国际状况之下中国革命有无胜利的可能？

现在我想说到问题的本身，首先我就要答复许多同志所给我的，以及在讨论中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要将这些问题集在一起，我不是一个问题一个答复的来说，而是将他合成一个系统加以说明。我开始说到中国革命之国际性，因此说到中国革命有无胜利之可能的问题，因此也又说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之帮助的及指导的作用问题。有个同志问我说：中国革命若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能否得着胜利？或者，另外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提得更为切实些，但内容是一样，他说现在的国际工人运动，首先是西欧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发展到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自然很难给与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那样有力的帮助，因此就要问：在这一种国际政治状况之下，中国革命即使在他的德谟克拉西的（民主的）阶段之上，究竟有无胜利的可能？

同志们！假使我们现在答复这个问题，说是不能胜利的，则在我们前面便摆着很悲观的结论。自然呵，也不能故意的自慰，不能因为我们所希望的是另一样，便不照着事实去妄加说明。但在我们分析了事实，比较了中国所发生的与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实，估计了将来应当卷入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力量。同志们！我们应当要说，我们并没有任何根据任何理由可以对于这个问题抱着黑暗

的悲观的观点。为什么呢？我们在苏俄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虽然有很多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进攻，但我们终于保持自己的胜利。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能保持胜利，主要的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身，在他的斗争中是内部破裂的。第二，因为我们的党能在很广大的疆域以内动员很广大的群众。假使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或者以前的俄罗斯帝国在疆土上像奥国或者中国的好几省那么样大，则虽然在帝国主义营寨中有那么样的破裂，我们也未必能保持着胜利。我们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当时有了这几种条件的凑合，我们胜利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营寨中有很剧烈的斗争，破裂；又因为我们的工作与斗争都在一个很广大的疆域以内，虽然当着我们的敌人将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工业中心各方面都包围起来了，但在敌人背后之一块很大疆土以内，如西伯利亚，已经爆发了革命的民众运动。

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是这样：中国革命已经惊醒了比较广大的民众，虽然尚不十分充足，但他可以惊醒（并且一定要惊醒）世界人类中之一部分最广大的民众，在数量上还要超过当时的俄国。帝国主义国家在现在并没有直接破裂，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发生相互的战争；但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有一个优越的地方，就是他在地理上，完全与其他的帝国主义相隔离着，仅只一个日本在旁边，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地方；并且中国革命也发生于一个很广大的区域以内。自然呵，海道可以使帝国主义容易派遣军舰；但是另一方面，全国交通的不便，农民区域范围的广大，距离铁路的遥远，若想包围他，则有如当时日本包围西伯利亚之一样的困难，自然，这也同时是中国革命中之一个很大的弱点，甚至于仅就一点说，中国工商业城市都带着海港的性质，还有其他许多的弱点。但是所有这些条件的总和，绝不能对于中国革命的事件，便存一个没有希望的心理。相反的，我们可以说人口数量的繁多，土地版图的广大，与许多其他殖民区域（印度，南洋，印度支部）的接近，纵

然当着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还没有发展到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候，也是在中国的前面，开展了很广大的胜利的前途。

另一方面，一切中国革命之继续的发展，自然要反映到西欧及其他各地之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是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

（五）对现在革命形势之估计及我们现在的任务

现在我说到在许多同志的讲演中所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革命现状之估计的问题。但是我又有一点普遍性质的话是首先要声明的，就是所有出来说话的同志，或者是许多出来说话的同志，在讨论中都没有走向正确的道路。这种不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同志中间可以时常发现的，就在于过量来分析字面。在这里我们发生了什么争论呢？我报告时说过，我们现在是站在两个革命浪潮之中。你们争论的是什么呢？你们争论的是：有没有低落，高涨，波浪，高潮……等等。有没有浪潮波浪，与高涨与低落有什么区别？浪潮是什么新名词呢？还是照旧日一样的了解。照我的意见，你们对于这些争论，结果只是一场糊涂。以后我又看见一个同志找出了一个新的定义——“革命的高潮”。我们要问：波浪或者浪潮与高潮有什么区别？浪潮又与高涨又有什么区别？或者我们还可想出几千个名词，来找他彼此的区别，我们可以说，除了浪潮以外，我们可以想出许多的名词，到那时候我们有——浪潮，波浪，高潮，浪花，高涨……等等。结果，我们的分析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步，什么是浪潮，什么是高潮，什么是高涨等等，这对于诗人或者是很好的东西，但不是对于政治家有用的，因为这些字仅能表示着一种半艺术的意义，而不能确定出正确的政治内容来。不应该由分析字而分析名词来出发，这样只是自寻烦恼而不能找着真理。那个对于浪潮这些字分析得最好，让他去分析罢！

这并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现在的事是要分析在中国发生的是什么，这才是主要的。现在中国发生的是什么呢？当你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去分析字面，而要去分析实际的事实，应当由分析这些事实出发，然后对于所有在中国所发生的事，面给他一个共同的总括的估计。在这里讨论的中心，一方面是专在讨论字面上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失败是口头上的，而在事实上是高涨的。还有一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了，他也说失败只是口头上的，他简直说：“表面上是失败的，而事实上我们一切事件，都是很顺利的”。但是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情形是：失败是事实上的，而高涨是口头上的，这句话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事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应当说的，有一个很大的成见，就是以为好革命家一定要说他那个国家的革命再过五秒钟就可以成功。这是绝对的妄谈。其实好革命家的任务，完全不在这里。关于这一点，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向你们说明。

革命最激烈的形式，不是国内战争吗？这是对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国内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之最激烈的形式，党就是指导国内战争的力量，是一个进行国内战争的无产阶级的组织。

假使现在正是国内战争正是革命暴动的时候，假使在你们面前有一大支军队，你们要指导这种军队来进行国内战争，假使有一个指导这一支军队的将军，他时常向兵士说：不必顾及任何条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进攻，不必看敌人有好多枪械，不必看敌人的军队是怎样布置等等。你们可否说这个将军是很好的？他时常都说，敌人样样都没有，我们件件都好，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将军？他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进攻而决不退却，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将军？他说：我们时常都应该上战场上去，不要计算敌人的力量，不要停止，不要补充预备队，不要在后方动员群众来帮助自己的军队，他在失败后，剩了五个人的时候，还在向这五个人说：“我们尚在活着，我们还要进攻”。这样的人，我们是否说他

是一个很好的将军呢？我想，我们对于这样的将军总不会说他是一个拿破仑，而要替他找一个另外比较更普通的名字罢，这是绝对明显的事。

政治的斗争也是这样，假使我们要遇着了这样的将军，我们一定要骂他是一个混蛋。假使有这样的将军，他只是说进攻而不计算敌人的力量，虽然他将要自命为顶坚决的，顶勇敢的，很左倾的，但是我们将要向他说：你也不是能干，也不是左倾，而是一个简单的混蛋莽汉！我们一定这样来告诉他。在军队中是这样，难道在政治上不是这样吗？当然也是这样的。聪明的将军并不是要他时常很左的，并不是要他今天也暴动，明天也暴动，后天也暴动，过四天五天也是要暴动，聪明的将军乃是要他时常能估计到敌人的力量。假使这种将军，他今天也在说暴动，明天也在说暴动，只是说敌人很弱，没有力量，我们很强，这种将军有什么用处呢？只说我是口头上失败了，事实上虽然我的面目打到不成样子，但我仍是胜利，这简直是笑话，是绝对不能这样说的。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在于他时时刻刻都要喊叫暴动，今天要暴动，明天要暴动，后天也要暴动。假使有人说，我们没有枪械，没有武装，没有群众，怎样能暴动呢？今天我面上还有血，怎样能暴动，让我将血洗干净了再说。于是就要骂他：这是没有胆子的东西。就是有个人很委屈婉转的说了这一番话，那么，立刻要骂他：哎哟！你这狗头，你这机会主义者！哎！你这取消派等等。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党中大概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了。现在中国的状况是这样，工人阶级被打倒了，这应当承认的。有句很好的俗话说：“败军善于学习”，列宁时常重复这句话，假使你们的将军已经打败了，而你们妄自高大的不承认。你们反要说，我们战胜了一切，破坏了一切，不承认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于补充自己的力量，不愿意去学习，则你们会有第二次的失败，以至于最后的将你们的运动完全消灭，这是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之决议案的意义。这时候我们转身过来了，我知道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唉！共产国际开始变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己从前的态度了，以前他告诉我们：暴动，暴动，而现在却说：收集力量，补充预备军，寻找工人来添补自己的队伍，在这种群众组织中工作，注意一切小的问题以扩大我们的工作等等。这样，共产国际已经变更了自己的态度”。这种见解，只有那些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可以说出来的。这些小姑娘们——中国的也罢，俄国的也罢——她看见说了另外的几句话，便说共产国际已经变更了他的态度，每一个比较聪明的人都不应当有这种见解。在失败之后，我们身上现在还有数十百个创伤，现在若仍要暴动，简直是以革命为儿戏，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假使那个拿出这种观点来，不管他自命为左派，右派，或是其他什么派，都表示着他是一个很简单的蠢汉。在这里我应该要说的，工人同志有时是了解得很好的。在你们大会上有许多工人同志都说了话的。一个工人说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有一次的罢工，工人很勇敢的出来反对厂主，结果，使工资加了五个铜板；此后，工人又出来很勇敢的反对厂主，结果，加了一百，罢工胜利了。事过之后，党部书记又叫举行新的罢工，但工人知道再多是不能得着什么的。他叫工人再去干，工人反对，但是结果仍然干了，干而失败了；失败后，将共产党员都由工厂中赶出去。并且在这件事之后，工人再不信任他们了，这就叫做不会指导斗争。在这个情形中是工人预先看见必要失败的。暴动的事也是这样。大家都暴动过了，暴动失败后的第二天，又有人去叫他们明天再暴动，他们不愿意暴动，于是用力量号召他们，命令他们，压迫他们，用各种方法去恐怖他们；结果，使这些人又去暴动一次，又去受一次更严重的失败。同志们，这样的政策是要不得的。我再重复的说一遍：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受了严重的失败，只有瞎子没有看见这件事。南昌暴动是失败了，广州暴动又是被压迫下去了，还有数十百个其

他的农民暴动，都是失败了，我们好几万党员都被他们枪杀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不可以不明了需要改编自己的队伍，补充他，巩固他，然后再去冲锋。只有那些不以这为预备进攻的，以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再干了的人，才是右派，变节者，机会主义者，不中用的东西……。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我们由直接暴动转变到集聚力量，并不是为的不再暴动。我们之所以将我们的路线转向夺取群众，正是为的预备更有成就的真正的群众的暴动。我们总要这样，即使有人说我们是抛弃了从前的路线；不错，暂时我们是抛弃了的。从前我们的政策是说明天暴动，而现在我们说，明天在全国范围内还不能暴动，我们要开始准备我们的力量，到了我们力量准备好了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再暴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各处都不能有个别的暴动，并不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说。但是在我们党的整个口号方面说，暴动由直接行动的口号变为宣传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根据日常的生活状况，每日向工人去说明，去宣传，告诉他若要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改良，只有你能明白暴动的必要。我再重复去说一遍：暴动的口号是现在向群众宣传的口号，现在不是一个直接行动的口号。要向工人这样宣传，不要像一个小孩子，而定要像一个真正的指导者一样。这没有一点什么羞耻惭愧，或不正确的地方。假使你们做一个结论：哎哟！算了罢！做不到的，一切都完了，不要干了，离开党，避开工人阶级，这便更坏了。应当一千倍的勇敢些，到工人中间去，去夺取他们的信仰，要整理与改造自己的队伍，这就是去预备真正的斗争，真正的暴动。问题就是这样。你们所说的波浪与高潮以及其他的东⻄，都是些字面上的，要这些东⻄做什么，而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者对于诗人是有意义，而对于政治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很肯定的说：在现在失败以后，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新的高涨的，这是事实。无论在那里，当着高涨的时候，绝不会有这种情形。像许多工人同志在这里说的，工

人疲倦了；北方的工人甚至于希望张作霖；在上海广州等大工业中心中，工人的组织都被破坏了；从前我们在那里有几百几千人的地方，现在只剩了二三十个，有的甚至二三十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昨天我们由湖北得来的消息，那里仅仅有中央最近才派去的一两个同志，因为那里在这以前，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组织同样被破坏了。同志们，那些以为现在还可以叫工人举行暴动的人，只是表示着他脑中仅有国民党遗传下来的残余，可以下命令叫工人去暴动。大家都要知道，群众暴动只有当着群众自己相信的时候，当着群众已经沸腾得如水一样的时候，才能举行。到那时候，你才能指导他。若群众不愿意暴动而你勉强叫他暴动，则结果无论如何去暴动，也不能得着胜利，这就叫没有直接革命的高涨。应当一万个记着，让你们怎样来称呼现在的形势——高潮也罢，高涨也罢，其他什么鬼东西也罢——但是，我们应当要说，在许多严重的失败及大破坏以后，现在并没有强大的直接的群众运动。因此，提出直接暴动的口号，便是糊涂。因此，任务的重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放着。谁不明了这个，结果他一定会倒台。

同志们，关于盲动主义说了很多，并且也可讨论关于盲动主义之来源的问题；是否由于党中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贯的理论呢？还是由于不断的革命论呢？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我想对于这些问题都给以圆满的答复。我的观点之不同，仅在于这里，就是不能将这—个解释与那—个解释对立着。譬如有的同志出来说，盲动主义是由于某种理论而发生的；另外一个同志说，不是的，盲动并不是由于某种理论而产生的，乃是由于我们党内之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产生的。我们来争：由某种理论呢，还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呢？亲爱的同志们，不能这样提议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的表现。举例来说：正确的革命策略是由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定呢？还是由于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使他成为最革命的阶级呢？怎样能这样提

出问题呢？事实是这样：无产阶级是因为他的社会实质的关系，使他成为最革命的阶级，因此，他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多，则他施行的政策也更为正确。我们说机会主义的来源是一样，说他社会基础是一件事，同时，机会主义可以表现于某种理论或某几种尚未综合而可以综合的理论上。在这里对于盲动主义，我以为首先要握取他的最主要的地方。盲动主义之最主要的基础就在于他想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来进行暴动。今天有了四支手枪，十个人，便以为可以暴动了，这什么暴动也不是，只是简单的阴谋，说不上什么群众的暴动。盲动主义的特点就在于没有群众而举行暴动，这就是盲动的实质。盲动主义并不在于他举行暴动；暴动在某个时候是应该举行的，应该勇敢的坚决的彻底的向前进攻，这并不是盲动主义；这种行动，假使是群众做的，我们指导群众，我们是暴动群众的领袖，此之谓真正暴动。假使只是几个人，后面没有群众，发出暴动的口号，参加的只有几十个普通人和两个兵士，再没有什么了，这就是盲动。在现在这种阶级斗争非常严重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党又是这么样的薄弱，盲动主义可以使我们的党逐渐的完全破坏，一点也不存留，我们的干部被拔去了。我们党的中坚分子被枪杀了，暴动之最好的干才，被敌人处死了，情形就会是这样。不仅你们党中，在许多党中，在所有共产国际中都有这样的病态。这个同志觉得愈是左愈是好，另一个觉得愈是右愈是正确。但是真正的真理，也不在左，也不在右，也不在高，也不在低，也不是任何其他的空间名词所能形容得出来的。真理乃在于当时的政策是否适合对于敌人力量及所有环境的正确的估计。我又要说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例子，在我前面一道沟，我现在应当渡到对面岸上去，最左的策略是跳过去；假使我有很好的腿，我又会跳，自然我就可以跳过去，我也应当跳过去，因为这样我便可以很快的过到河的对岸。但是我的敌人已经将我的腿子打伤了，而我的左而的朋友却喊着说：

跳！快跳！左腿先跳！自然，我是跳不过的，我只有跌到沟中去的可能，那时候，他还要笑我了。在这时候我应当找梯子，甚至于找十层梯子，将腿紧系一下，扶着梯子做十步走，无论如何，我终要渡过这道深沟。假使我差一只腿而硬要勉强的跳，那么，只是将自己的性命丢了。我不跳，你要说“哎，你一点也不左，太右了，你连跳一下都不愿意！”让你去说罢，喜欢怎样说，你便怎样去说，只不过表示你蠢罢了。

同志们，正因为由这种观点出发，国际执委第九次会才叫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他的政策。自然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几个同志不能明了的，站在进行斗争之正确的战略观点上，在这许多严重失败以后，我们应当集聚新的力量，退后一步，而补充自己的预备队，整理自己的干部组织，采取正确的政治路线，以预备新的力量去进攻。那一个反对这种观点，应当向他解释，告诉他，说服他，指出他的错误，在这种新的态度上去争取群众，这就是第九次执委会决议的意思。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同志们问：所谓不断的革命论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党，特别对于年幼的党，不应当故意由西方搬一肚子的新问题新名词过去，这样，仅只是将脑袋弄得一塌糊涂，而又要费很长的时间，像我这样的来慢慢的解释；但是在另一方面说：我也应当给以简单的解释，为什么不断的革命理论是不正确的呢？因为这种理论只是指出了革命的向上的路线；现在对于中国党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国党不看见许多失败以后的低落。这种低落将要延长几个月呢，还是一年呢？我不知道，这要看你们的工作做得怎样，看你们怎样去缩短这个期限。许多同志由这种不断的理论而又造出了新的理论，以为失败只是口头上的，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很大的胜利，他不管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都被人割去了。假使由这一个观点出发，说革命是无间断的，这就是说革命的发展是向上的是前进的；由这种观点

出发，则他就使人不能看见现在革命正是间断：我说革命现在是间断的，并不是说完全死了，乃是说革命已经受了那样的失败，使着我们现在不能进攻。什么时候有新的高涨，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很快的。但是在目前没有什么革命的直接高涨，并且也不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只腿被打坏了，我们只有一只腿是不能进攻的。假使是无间断的，假使我们的腿没有打坏，则我们便不用什么梯子，便可以跳过去，也用不着一点迟疑了。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他的错误在于他观察事件，只是站在一个抽象的名词的观点上，并不因为“不断”这个字不好，或者因为其他的不好，乃是因为这种理论不适合于我们应当认得很清的具体事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之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很正确的认识环境，不要夸大了危险，也不要看小了；有时候我们同志看小了危险，有时候相反。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曾说过：我们这里还不好，那里也还不好，敌人这里还好，因此，现在不要暴动；过了几天，他又说：固然我们那里还不好，但是这里好了，重要的城市中心在我们手中了，群众跟着我们了，应当开始暴动，无论如何再不能迟缓了；列宁当时完全是对的。但是到了布列斯特和约（一九一八年，德国向苏俄进攻，苏俄向德国订的和约——译者注）的时候，当时我也是耀武扬威的说：我们要进攻德国帝国主义！但是列宁说：你是个糊涂虫，你不看见军队破坏了，农民饥饿着，农民不愿开战，工人也饿着，应当先用力量使他们兴奋起来，以后再进攻。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的进攻是对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的退守也是对的。在我们这里当时也有过那样的聪明人，他说：哎哟！在十月时候的进攻，以后又退守，你们看呵！他的政策也被自己改变了。但是，列宁是一个真正的好将军，他答复说：不错，昨天我们进攻了，今天我们要退守；只有糊涂虫，他每天都要进攻，或者每天都退守，或者

每天都暴动，这是些鬼话。这样的字，我们可以将来写出来，堆一箱子，但是对子实际革命的行动，是没有一点帮助的。

因此，我们由上面的分析，一定要做出结论说：现在的工作中心应当夺取群众。你们脑中还有一个不正确的观点，我在这里并不想骂你们那一个，这对子年幼的党是完全不奇怪的。一个同志说，来到莫斯科之后，他看见共产国际执委并不想分析一下每个人的头脑，不错，我们是不想分析的。我说到你们党内问题的时候，我再说你们每个人是在想彼此将你我的头脑分析一下，关于这个我以后再说。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你们中间曾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张国焘说：“我当时想暴动是很危险的，但我不敢说”。他并不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小姑娘，你看他也是这样高这样大的人，为什么怕说呢？因为说了就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我对于他是很明了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说，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错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不守纪律，并将他开除出党籍了。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不要乱说什么机会主义者，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假使一个不愿去枪毙女人，你们也要说他是机会主义，关于这我以后再说。要说到那许多名词区别的时候，说什么波浪呵，浪潮呵，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航海学上的名词，他们彼此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中国离海很近，或者你们对于这些是知道得更清楚些。但是由这中间决不能找出什么聪明的政策。要知道许多严重失败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革命的高潮，群众还没有起来，城市的工人还在消沉着，农民运动在有几个区域中固然是发展的，但是他还不成为一个普遍于全中国的运动，因此，我们政策之最重要的地方，要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夺取群众，不要口头上的，而要事实上真正的去反对机会主义，要知道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一个同志说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在某地方枪毙了一个女同志，仅仅为的她是地主的女儿，虽然她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彼命去枪毙

的同志说：我不愿意枪毙她，因为没有原因，于是就有人说他：哎哟！你不想枪毙她，你害怕，你是机会主义。这个人说我不愿意枪毙她，因为没有原因，于是他就被认为机会主义了。这简直是用字面来开玩笑，这种盲目的乱用名词去开玩笑，乃是真正的严重的政治家所不容许的。这是应当老实说的。照我的意见，为这样的事不能枪毙的，需要打一顿屁股（这句话应当从艺术上精神上去了解他，而不是说的肉体）。这样不能造出党内之任何意见，这样不能进行斗争的。我们现在是要预备暴动，我们要认清时期，到了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在此之前，我们是要用尽所有的方法来组织群众。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某几种条件之下，也不能拒绝个别的行动。关于这几种条件，我下面便说。

关于我们主要任务的问题，我已经给了完全正确的答复。我的答复是：暴动由一个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变为宣传性质的口号。我们要宣传，为着实现工农所要的权利，赶走封建地主，统一中国等等，必要工人与农民争取政权，必要武装暴动；暴动是一定要宣传的，暴动在今天是不能成为直接行动的口号的。但我又说过了，在几个例外的特别的情形之下，党可以发出直接行动的口号或者可以帮助暴动。当什么时候呢？是当着在比较大的区域中，群众已经沸腾到自己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站到斗争之中，我们不能放弃群众面不去指导，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当指导这种个别的暴动，使他成为更有计划的更有组织的，使他尽可能的与其他的口号发生联系，使他尽可能的不致于失败而得着胜利，使他能消费很少的力量以得着胜利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有许多偏僻的地方是正式军队一时不能走到的，我们只拿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验便可以知道。我不能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无论在那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有总暴动。我要特别指示出这是有条件的，中国党大会也该这样指出来。我今天说

了你们不要说浪潮浪花等等的名词，但我恐怕过了今天以后，那个提了浪潮这个字，他又被骂为机会主义者。我今天说了你们不要乱用“机会主义”这个字，但我又恐怕你们因此而做个结论：无论谁无论怎样都不要说他是机会主义了。政治家知道一切话中要怎样去了解，什么不能做，在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用不着，什么时候有利，什么时候有害，每一种结论，都是在一个相当程度以内是对的，应当知道到了另一个条件的时候，则他或者成为不正确的了。或者在有其他条件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完全不正确的，但是他一半的力量已经消失，另一半力量仍然存在。应当估计到注意到这些各种不同的变动。当着我说你们不要乱用机会主义这个字的时候，你们不要由这个话做出结论，说从此不要与机会主义奋斗了。假使还要与机会主义奋斗，那么，便应当武装自己，便应当自己明了究竟什么是机会主义。当着我说直接暴动是可以发生而且应当指导的，我又很怕中国同志一定要问我说：你又这样说，又那样说，说得一塌糊涂，你们一定要问我说：“老实说，干呢，还是不干？”我答复说：“照一般的道理说，不能干；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下面，可以干。”因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滑头，所以我还要说一遍，假使你们将这个例外当成了道理规则，那么，你们便要离开了共产国际；我怕你们根据这种例外而又曲解了党的正确路线，将例外当成真理。假使我们对于群众自己举发的暴动而不加以帮助，这又是离开了正确的共产党人的路线。生活不是个赤裸裸的圆球，生活更不像个人一样，将裤子脱了便把大腿看得清清白白，圆的光的滑的等等。

生活并不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圆球，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有各种的倾向，各种的条件，各种完全不同的种类，因此很多的时候发生各种的例外。我再重复的说，假使我们遇着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当着群众喊叫着道：开始暴动呵！在这时候，我们不能站在旁边，我们应指导这种暴动。但

不能说暴动就是我们目前的直接任务。我们根本的任务是在于夺取群众，只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行暴动，同样也是要夺取暴动中的领导权。我已经说到，我们一般的政治路线，主要的策略是将我们直接行动的暴动口号取消；暴动的政纲，在宣传暴动及预备暴动的意义上说，仍然存在。这是已经很明了的，这不明白还要怎样可以明白呢？这是很明显的了。因此，现在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将要这样说：我们在失败之后，应当停止说暴动这句话，用不着暴动，这都是空的，工人阶级不能由暴动得着什么的，我们跑得太向前了等等，这才是机会主义的路线。我们的路线乃是说，我们失败之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只走在尾巴上，我们没有指导群众，这是我们共产党之重要的错误。在失败之后，假使我们看不见失败的结果，不去计算他，当做没有失败一样，这便是同样的错误。相反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集聚自己的力量，补充自己的预备军，尽量的去组织群众，要在这些工作做了之后，再来根据过去我们所得的经验，根据我们脑中所有的计划，根据我们在这个时期所可以学得的一切政治智识，根据我们所预备革命高潮时期的组织，根据已经牢固了的群众——根据这些东西，要下我们的总攻击令。

（六）党内生活及群众工作

现在我说到关于夺取群众之几个最基本的条件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与我在所有的结论上一样，要尽量利用在你们演讲中所有的材料。我不是要重复这些事实，乃是要说明在你们的讲演报告中所说的意思。

同志们，我首先要说几句关于你们党的话。自然，我的任务不在于要将你们的党骂一顿，这样是不对的，骂是不加说明的，而在这里是需要说明的。你们的党因为没有经验的关系，自然无条件的做了许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如像向忠发同志，他不是

个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但是因为没有经验的缘故，做了许多右倾的错误。我应当向你们说，你们每个都是因为没有经验而做了很多的错误。我也是做过错误的，很大的很严重的错误，也是因为没有经验。每一个人，他活到几十岁，许多东西不是预先可以知道的。许多东西我们只有在生活经验中，在实际行动中可以知道的，无论从什么书中都是学不来的，只有在生活的教训中可以学得来。书籍仅能帮我们减少自己的错误，能帮我们学习在实际生活中，首先便可以学得的东西。群众更是完全由实际生活中学习，而不是由书中学来的。我们只能帮助群众对于这些生活的教训，应该怎样去领略，悟会，了解。

我曾与你们讨论过关于敌人之力量的问题。我说你们中间会有几个人说敌人的力量并不是很大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存在得有冲突。说敌人力量弱并不是真实的；说敌人内部有冲突，统治阶级内部在斗争，这是真实的。为什么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斗争呢？因为中国事实上不是一个国家，乃是几个很大的国家，具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条件，有时各地之彼此的经济联系是非常薄弱，全国铁路很少，交通不便，因而也没有全中国之统一的市场。很大的地方影响，地方的冲突，各处都表现得中国之完全的不统一。各阶级又生活于各个不同的条件之下，如你们的资产阶级，它也是生活于各个不同的条件之下，他们系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派别。因此，资产阶级之内部利益也是彼此不同，因为不同就发生了彼此的斗争，就跟着各种帝国主义而分头跑了。

我还在报告中就已经告诉你们了，用什么东西我们来战胜敌人呢？用群众以及我们自己的巩固。但是在工人阶级及我们党内部同样受了这种中国散漫状态的反映。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部有许多很像国民党内部那一样的斗争，这是实在的。这里我也承认这样说是夸大了一点，是加了一点色彩，但是我们总要说，在我们党内是有些派别，有时是很难用政治去加以解释。你们大会开

始的时候，在选举主席团的时候，便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或者在选举中央的时候又要重演一次。因为在你们党中实是存在得有这种小的派别。这种派别之成立，在相当的意义上说，还是由于中国之地理的及政治的条件。你们的演讲是这样的在那里写着：广东派与中央联合起来，另一个说直隶派是拥护中央的；还有说这一派与这一区联合起来了，那一派与那一区联合起来了，与第三派，第四派等等。这是事实。这是我们党中的分离主义，地方主义，省治主义，或者是其他的“主义”。假使我们再注意中国党将来发展的条件，前途还有很恐怖的很紧急的斗争，我们可以说这种样子很像国民党的现象。

你们都知道，假使我没有记错，在广东曾发生过了这样的派别的斗争。一派人想根本消灭广东党部的几个上层负责的人，因为他们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广东的这几个上层分子也想根本消灭这一派人。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生于工人阶级内部了，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这里有一位同志在你们大会上演讲，他说：“现在我说到我们这个区域中的党内状况”，这位乃是湖南的农民，“我们党内的工作是不大好的，假使有同志做了错误，上级机关不去纠正他的错，而去将他拉来处以死刑算了”。照这样看来，假使瞿秋白不与张国焘同意，那么，他就应该将他的头砍下来；或者反过来他将他的头砍下来。我们因这个可以想到汪精卫的宣言说胡汉民错误了，胡汉民的宣言说汪精卫错误了。都要做错误，都要因别人的错误而割取别人的头，来这样辩论。假使将这种办法搬到我们党中来了，那么，让你们到那里争吵辩论，中国的情形将要没出路更没出路的一天。假使要这样，还不如陈独秀。陈独秀决定去做中国的文字改良，或者去写地球的历史，或者去研究海马，或去研究腌香肠是应该怎样配合，或者去吟月中玉兔诗——这总是比较砍头有利益些，但是这已经离开政治了。假使不愿意离开政治，你们便应该知道夺取群众的主要条件，是围绕着你们

的党，要的是党而不是什么英雄的集会。英雄或者能够英勇的死——虽然他有时也还是不要鼻子的——但他不能整理党内的生活，使他不发生裂痕。你们知道，就是很壮勇的死了，总不如将事情做好了得着胜利以后再死。你们能要使着敌人多死一点，而我们自己要尽量活一些时。值得我们首先给以严重注意的，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发展党也不能发展革命的，这就是要尽量打破地方主义，打击派别，打击排除异己（惩罚与我意见不相同的人）的心理。自然，我是很知道的，国内战争继续这么长久，人们都习惯了一切的恐怖状态，大家的脾气性格都变焦燥了。我们可以说出千百个原因出来。这些我们都知道，我已经很冷静的研究了所有这些特点。我可以同样很冷静的断定说：假使党内保持着这样的状况，则无论什么样的革命，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什么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什么浪潮，高潮，什么鬼都不会有了的。这是可以完全断定的，这些东西正是表示着失败，正是表示着失败以后的象征。我应当向你们说的，就是在我们党当失败以后，一九〇七年的时候，也是同样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我自己看见过的。那时候我们的武装纠察队变成专门注意小抢夺的东西，以后彼此抢杀，大众拿着毛瑟枪来彼此算账，但这乃是失败的现象，这乃是党的腐化。

假使党的指导同志也有了这种意思，假使他们不能给这种现象以严重的打击，这种现象便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悲剧，可以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东西，以至于使整个的党完全消灭。你们看，儿戏暴动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有几个同志说：“得了中央的命令教我们暴动，但没有什么可以暴动，枪是没有的，于是我们带着一盒火柴，烧房子去”。难道这算得暴动？为什么要去烧房子呢？房子是应该抢过来的，应该烧的是他的房主人。难道你们以为中国的房子愈是少，则中国群众的生活便愈是好吗？我想，你们也未必这样想呵。暴动变为火柴式的儿戏，因此可以枪毙同志，因此

可以使同志牺牲，这是一种很大的笑话，同时也是很大的悲剧。同时党内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无组织，无训练，因为党内的争论可以打破头，无论他带了火柴没有，这总是一件糊涂的事。这一次大会应当用很坚决的手段来停止党内的纠纷！这一种乱闹的方式是小团体式的，将一切争论变成了这样的斗争是很野蛮的。政党必需要取得群众的信仰，共产党人之一切的行动应当是群众的模范，这里火柴式的暴动以及这种党内斗争是不能在广大的无党群众中取得尊敬信仰的！因此，首先应当停止在共产党中的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形式！中国之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打倒这种现象！

我应该要说的，党中的上层知识分子是更要注意这点的。假使在他们中间还发生了这样彼此无原则的斗争，则我们定要号召，动员，帮助工人去反对他们！工人是没有知识分子那样好斗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时常都不需要斗争，有时非用斗争不可的。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所有的党内斗争都不是因为原则的政治观点不同。说到政治这些东西，则大家都说彼此同志，乃是因为各种派别不同而斗争。假使在你们中间有像统治阶级（国民党）中间那样的斗争，则使工人起来反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是必要的。我要说这些话还有一个原因，要使你们了解这些东西，使你们在选举中央的时候，不要重演在这个大会所已经发生过的那种现象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很少的，应当要宝贵所有的每个同志，只要他不固执过去的错误，只要他帮助正确的政治路线。假使他不固执自己的错误，则过去的事我们不用再提了。应当善于估计每个同志，看谁是站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谁已经不固执过去的错误了。不要将一些小斗争小派别当着儿戏，要抛弃这些东西；假使党的上层领袖只像个国外的小组织一样，假使他们还要闹那些意气的斗争，则党不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之一个群众的政党的。那么样，则无论什么党的群众组织也不会有的。假使是因为没有政治路线，那又另是一回事，但政治路线是有的。我们现在所说的

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并没有人愿意出来说话反对呀。因此，大家对于这种基本的组织前提应当注意。

与这有关系的，还有党内生活中之第二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处分（惩罚）制度。我们之中有人做了错误，则他便要受处分，从枪毙开始，这种办法是极蠢的，由此是不能得着什么的，做这种事的简直是发神经病的混蛋！或者你们还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因一点小的错误便立刻取消他的工作，这照我的意见仍然是不对的。例如在广东暴动后所有的那种处分，将一切莫明其妙的人，都一扫描尽，这种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自然呵，取消工作，将他送走，有时候对于一切党都是必要的，但是却不因为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因为某个人有系统的不进行正确的路线，破坏纪律，组织小组的斗争等等。到那时候，这种手段才是需要的。假使一个人做了一点错误，他便如在尼姑庵中的尼姑一样，因这一点错误便要处分，取消工作，则在中国这种没有经验的年幼的党中，你们便会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中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内，一定要处分好多人，中央完全被掩护着而没有人批评了，以后群众便要喊着说：你取消了我的工作，你自己也做了错误，你也应当滚蛋。于是我们到那时连党都不会有了的。彼此相互来取消，中央从上面来取消群众，群众由下面来取消中央，结果怎样呢？这种现象曾为普列汉诺夫很聪明的说过。普列汉诺夫说：无政府主义者有两条政纲，第一条——无论什么也不要了；第二条——谁人也不能委托他去执行前一条。这种状况乃是由上面所说的那种危机中产出来的。党现在处到这一种状况之中，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发展的。我还要说的，你们还需要稍为扩大一点党内的德漠克拉西。你们是书记好像皇帝及上帝一样，有一位还在这里说，我在你们大会上像上帝一样，我也是穿着皮鞋来的，我今天第一次听着说，上帝穿着皮鞋走路。但我可以仿拟你们脑中所想的书记：省委的委员说不用暴动，党的群众说不要暴动，工

人也说不要罢工，但是书记一人却还是说，必要罢工，暴动。书记要尽量好一点，就是人数少一点也是好的。好书记应当知道，当着任何人都不愿意暴动都不愿意罢工的时候，你自己还要暴动罢工，这就是糊涂，这就等于抱着自己的头来钻这块玻璃窗。

同志们，关于党的问题我继续还有几点要说明。关于指导及命令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我还要重复一遍，所有的同志应该明了，党在工人阶级中，并不是发布命令叫人服从的，并不是像军队中的排长连长一样。这样并不需要很大的智识，而党则需要很大的智识。党的智识是这样：一切党的机关——特别是他的指导机关——在每一次的行动中都应当明了群众的心理，要明了群众为什么而行动，怎样能接近群众，怎样能说服群众。仅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可以取得群众。自然呵！改正过去之大的缺点，大的错误，仅只有当着党的指导干部工作到非常成熟的时候才可以。因此，在你们形成指导的时候——更明白的说，在你们选举中央的时候，要使每个真正有能力的同志，站在正确观点上的同志，可以仍然在指导机关中工作，要宽宥他过去所做过的错误。只要他现在不固执己见便可以了。我说“宽宥错误”，这几个字或者是不大好听的话，是我们普通的时候所不说的，应当去在旁边的。仅是那种现在还固执己见而不改正过去错误的，这种人可以妨害党的指导。但是有能力的人，观念很清白的人，做过实际工作的人，可以帮助党的人，只要他不固执自己过去的错误，便应该有他的工作地位。不然，则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中还不能造成很好的很坚强的指导，因为大众都做了错误的。假使你们总是彼此不相融合，那么只有现在将一切事不做，而等待着新生下的新少年。这些人将是很干净的，吃了白米长大的，他们在武汉时期也没有做过错误，因为在武汉时期他还没有出世。但这还得很长的时间来等候呀！我想在这个时间以内，你们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想许多其他的东两，还要想革命转变等等。我得了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

出席你们这个大会中之最温柔的，最和平的一个同志，是瞿秋白——我认为他是你们这个大会上之最温柔和平的人——他昨天还出来很郑重的回答是否应该枪决另外一个同志的问题。或相信他一点没有想到，问题的本身就提出得非常奇怪的，再问下去便没有出路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党因为年幼的关系，便比较别的党要做的错误多些。但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计算这些错误，而在于说服这些还没有觉悟的人，而在于给一切人以可能，使他明白了他过去实在做了错误，使他能知道我们现在所指出所努力的路线，是最正确的政策。

同志们，你们要注意所有的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党与上层同志之关系上的，党与一般党员群众之关系上的，党与非党群众之关系上的，对群众用强迫方法使他参加革命运动，盲动主义等等——都是彼此互相联系的，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我虽不说他是一种政治方向，而是某一种的——我不知道能否译成中文——情绪。(Yuona cmpoeune)

事实上，假使我们以为“命令”这个字，是很有力量的，假使再加以手枪或者步枪，于是一切问题都很简单了。反对机会主义吗？将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枪毙几个，将其余的机会主义者按倒在地打他们几百板屁股，于是机会主义便消灭了。事实都很容易做了，发个革命，将某人用拳头照背脊上打一顿，于是群众都去暴动了，一切都像军队中一样，照着命令去做。一！二！三！一喊，口令一下，于是在这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便成功了。事实就是完全不能照这样的。中国人民不是军队，并且更不是服从中国共产党之命令的军队。中国党并不是一个军官团（就这个字的本义看），党应该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相信党的指导，使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外来的力量，乃是自己之最好的力量，自己阶级中的头脑。

假使站在这种党内工作的观点上来看，则对于其他的事件，对

于组织群众，对于盲动主义，对于群众运动，都是同样的关系。我没有任何中国同志那样客气，我可以很率直的说，这都是些国民党时代的残余。在那时候，鲍罗廷解决问题，只要同那一个说一说便可以了事，现在则这套把戏是不能玩了，这样是不能解决党内的问题了。现在要发动群众，要在党内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上，使大家都明了究竟是一回什么事，为什么要这样的政策等等。只有国民党有这样的情形，他可以今天发布命令停止群众运动；明天可以发布命令解散群众运动，因为群众运动有害了；后天又可以发布命令群众去革命。这并不是革命，乃为“朝中政变”，乃是军事阴谋。军事阴谋是一事，群众运动又另是一回事。假使在我们的指导之下有几十万军队，有机枪，有飞机，有大炮，那么，自然我们要别一种方法去革命。那么，我们便打到大城市中去，没收大企业，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帮助农民暴动等，但我们这些东西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要到各个地方发动群众，由群众中造成军队。怎样能发动群众呢？要说服他们。有个同志他很兴高采烈的说了一件很可痛的事，他号召工人去暴动，工人笑他。当着工人笑我们的时候，这算是最不好的样子了。当着别人用鼻子哼我们，我们还可以忍耐，这还是英雄，但当着工人笑党的时候，这便不知道叫什么了。要这样了解呵，应当使工人不笑我们而信仰我们。当着你说工人现在还笑我们，这就是表示在你们前面还有大洋一样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做了之后，才能发动群众，才能指导他们去斗争。因此，我说无论用什么样的命令是不能发动群众的。因此，在工人运动中，我们必要尽量向一切可能的有空的地方去，尽量宣传他们，煽动他们，然后才能引导他们斗争。

在这里首先应当抛去这样的观点，以为共产党无须乎注意小的问题，小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事实上共产党员在各处都是非法的，为一点很小的事，发传单，贴

标语，开会……，都可以立刻宣布死刑。关于这，不用我细说，你们比我知道还多些。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样去做群众工作，这个问题应当仔细的想想，在提出职工问题及农民问题的时候，更要具体的讨论。但是现在关于这几个问题之一般的路线，却有几句话要说。

我们认为在工人阶级中作工的一切共产党的组织，以及一切同志应当利用工人运动之中之一切小的甚至于最小的事件，来使他们向前进行。假使在某个工厂中发生了工人对工作时间之一点很小的不满意，则做共产党员的应当去活动，做事要非常慎重，不要立刻表示你是共产党员，应当乘机进行宣传煽动，应当尽可能来扩大小的问题，使他成为阶级斗争。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散布一切小的传单标语，只要有小胜利的可能便要引动罢工等等。共产党员应当钻入一切有工人的组织中，弟兄会也应当加入，文化团体也应当加入。假使敌人所组织的某个团体，其中有相当的工人，则共产党党员一定要加入这种团体，不要使他知道你是共产党，以致明天便将你捉去了。我们要在这里面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在里面组织秘密的小团体，秘密的印刷标语传单，要根据某个工厂，某个生产，某个地方之工人的直接需要来做工作，要不辞任何的劳苦，要做一切虽然很小的工作。

我在我开始作报告的时候，同志们，我就向你们说过，将来伟大的新的高潮之来，或者发生于我们完全不能料到的那个地方，这是完全可能的。例如，我觉得现在中国之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便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日本现在已经开始来分割中国，因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工人，农民，贫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是开始兴奋了。我们此时的任务要尽量的批评我们的敌人，暴露我们的敌人的罪恶，指出他们是民族利益的叛徒，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妥协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真正的没有任何政党，没有任何政治派别，没有任何一般人，能和我们这样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这种机会是

不能错过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权利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交给任何人，无论是资产阶级，无论是谭平山的党，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自己活动。

关于恢复群众运动的口号，我们的态度是这样：我们不要直接而要间接的帮助对国民党之请愿运动。我们不要做这种运动，乃是要利用这种运动来揭破国民党以提出我们自己的口号。我们不应当向国民党喊：哎，让我们进行群众运动啊！我们乃是要揭破国民党，我们要说国民党破坏了群众运动，屠杀了群众运动，说群众运动现在是必要的。共产党要注意一切群众的要求，虽然是很小的，更要注意那些要求，如工人出版自由，工人集会自由等等。这里一点也没有机会主义，说机会主义者提出这样的口号，简直是混蛋。假使你们一次二次三次的去向工人提议了之后，到了工人自己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们又不上这条路而丢弃这个口号，这是政治错误。应当利用一切问题来进行宣传与煽动，总要使着大家知道所有这些要求仅只有武装暴动，推倒了国民党的统治以后，总能实现。同志们，在我们革命中之宣传与煽动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时期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我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监狱中坐着的时候，这已经是二十年以前了，我遇着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印刷工人，他因为推行革命的宣传，给农民拿起棍子将他的眼睛打坏了。他跑到乡村中向农民说：打倒沙皇！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农民是很迷信沙皇的，于是拿起棍子来便将他的眼睛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接近群众的方法太糊涂了。我们对农民说：你为什么辛苦啊？因为我的土地很少。你们那里的地主有土地吗？有的呀！有好多？好多。沙皇有土地吗？有好多？很多！啊！沙皇也是个地主呀！再问他地主怎么样，于是他自己渐渐的自己喊：打倒沙皇！你见了一个信教的人向他说：没有什么上帝！他一定打你的耳光。你要慢慢的告诉他，向他解释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则或者结果他也可以加入反宗教同盟啊！一切都要看对他的态度怎

样，这种态度在各种条件之下对待各种群众是各个不同的。在几年以前，当着群众发展的时候，群众自己很活动的时候，自然我们在这个广大的潮流中想领导群众是不很困难的。但是到了现在，经过几次严重失败之后，每个工人的脑中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他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失败呢？有人以为或者我们以前所走的道路是不对的，有人以为这是某人某人的罪过，有人以为这是共产党之怎样怎样的捣鬼，有人要怀疑暴动等等的方法。更或者有人要开始说：“一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好的，但是我今天要能够多赚五个铜板却比较更好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知道是那天的事情，而我今天想多得五个铜板，想多做一点工作”。假使共产党员听到这些话便跑去指着工人说：“哎唷！你蠢到这样！猪，你，机会主义者，你，糊涂蛋！你连社会主义都不要，只想五个铜板”！这便是绝对的错误，不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工人。我们要告诉他：“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助手，我帮助你争这五个铜板。但我的意见得了五个铜板之后还不够，还要加一角。加了一角之后，我说我们要这个工厂中比较自由一点才好，这必要推倒资产阶级，想推倒资产阶级必要推倒国民党。你想生活好一点吗，想看书吗？这必需要另外一个社会，这必须推倒国民党的统治，不然国民党干涉我们”。不要把工人看成一些糊涂虫，什么事都不懂得，不要像一个贵族官僚的眼光去看工人。我们要希望在工人阶级中能起一个指导者的作用。即令工人是已经被迷惑了，不觉悟，不明了，如像有几省的工人说共产党主张公妻，主张妇女裸体游行，共产党如洪水猛兽一般，那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工人还是觉得非常糊涂的。我们对这种工人需要一种特别的态度。工人之无智识，不是他的过错，乃是他的缺陷，我们正是要与这种缺陷奋斗。只要你们有一点点的可能，也要渐渐的在斗争的经验中，引导他们跟着我们走，来进行以后一切的事。假使我们不能利用一切小问题，从各方面将工人阶级推向前进，则我们简直是个加工制

造的双料糊涂虫。同志们，我告诉你们，无论那里，只要那里有相当的工人，没有共产党员不应进去工作的道理。共产党员应该到处加入一切的团体，去进行自己的工作，到处去组织自己的秘密小组织，到处去树立自己的影响。在现在特别要注意职工会的工作，就是我们敌人所组织的工会，只要那里有相当的工人，我们都应该进去作工的。自然，我们加入这种组织中，并不是想占取他们中间的指导机关，而为的是找着与工人发生关系的机会，与他们在一起，去慢慢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这种工作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在那时候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你是共产党员，而同时要很有系统地进行工作，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自己的工作与建设自己的组织。我们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我们的组织完全破坏了，但是经过两三年之后，则所有的空隙我们都填满了。我自己当时在莫斯科禁酒社里作工，禁酒社是我们的敌人——莫斯科的商人——为在工人中间宣传禁酒而设立的组织，我以小学俄文教员的的名义加入这个组织，其实我所教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也是参加一切教授会议，与这些大商人们计较金钱的数目，有时所计较的钱，乃是他们应当拿出来点神灯来发展教育的。我秘密的进行我自己的工作，谁人也不知道。只有我坐到牢狱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个人都要这样做的。要巩固自己之秘密组织，要加入一切有工人群众的公开的组织。

与工会同时存在的还有兄弟会及其他半封建式的组织，这里我们也是应当进去的。中国工人现在有的是互助的基础而结合成为一个小团体，因为他们害怕加入公开的工会。这种奇怪的乱七八糟的组织形式，虽然说起来好像是可怜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走进去而占领着自己的地位。这好像是一种很粗的很下层的，而同时又是很精细的基本工作。真正革命者，决不在乎他喊着一样的口号，真正革命者乃是能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仍能钻到各个地方去，虽然在那里能得着一个工人，我也应当去，因为由这一个

工人可以集聚成为将来的干部，成为以后的小团体，可以因此而更去夺取其他的群众，建设我们的组织，巩固我们党在某个城市中的基础，以此来复活工人运动，来号召工人群众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我们要在自己的口号之下，在最后必须以武装暴动推倒现在之统治的口号之下，来进行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七) 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土地问题

同志们，我预先声明，请你们原谅，就是我无论如何总是还有几个问题使我不能答复。你们看得见，我已经说得很长了，我是尽可能的用极通俗的话来解释我们关于几个首要问题的观点，次要的问题我已经丢下了。我在这里已经说了许多实际的问题，我认为必是这样，才能使你们明了我们政策的基础，才能使你们在大会之其他议事日程上，关于职工运动，军事工作，组织问题……，能根据我们政策之一般的基础而说明更具体的问题。

现在我想说到你们自己之相互关系，以及共产党对各个阶级的关系。在这里我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非常严重而又使人容易糊涂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对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自然大家都明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是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我们与对方的关系是不用说的。他是我们最有害的敌人，我们只是预备着根本消灭他们。至于对付转变到反革命营垒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我所赞成的条文还要比较瞿秋白同志在他的结论中所说的条文更为严厉些猛烈些。应当直接的说，这是我们之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我们已经向他宣布了拚死命的战斗。至于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却有几点要说明。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要表示在相当的程度以内所必要的“谦让”，就是我认为我自己还不是一个很大的中国专家，不敢说对于许多微细的专门问题都不会发生错误；假使我所说的有与事实不符合的地方，同志们可以改正。我们或者可以因为不真实的报告，对于事实之不正确的知道，而做出错误。

自然，虽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国际上各国的经验，但是或者还可以发生这样的错误。

我认为在这里面之问题的重心是说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至于我们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则需要特别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之所以大，乃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其本身并不是一色的东西。所谓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些什么人呢？这里有小手工业者，有不雇佣劳动者的店主人，并且也有雇佣一两个工人，雇佣一两个小孩的店主人，这里面也有些小商人，不雇佣劳动的，又有雇佣几个店员的商人，这种商人在每次商人店员冲突的时候，都直接关系到他的利益。这里有许多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许多小富户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般站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商人，他经营农业生产品及工业生产品的交换，卖面包，卖乡村暴动用的火柴。你看他们也能供给共产党中之盲动主义者的需要。总之，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是一层很大的群众，他有很大的意义。仅只就数目上说，他在阶级生活上便已经是有意義的了。我想，首先在我们前面便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很严格的将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和没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别清白呢？我觉得应该分开的。所谓应该分开并不是站在道德上说的，并不是说这一个好些，那一个坏些，乃是站在政策的观点上。为什么站在政策的观点上便应该分开呢？因为这一种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他直接在工人运动威吓之下，则是不能成为我们的可靠的同盟者的，就是说他能否成为一般的同盟者，也是很大的问题。假使在我们党前面有了选择的时候——应当帮助这些小商店小作坊中之工人运动呢？还是应该牺牲一点工人的利益来拉拢这一层小资产阶级呢？很明白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与工人合作来反对这些小店东小老板。为什么这样？自然是不难明了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些小店铺小企业中的工人总算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总是我们比较可靠的

基础，总是我们自己直接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中的一部分。假使阶级斗争的形式将在我们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与店东拉拢牺牲工人利益，还是与工人合作呢？则无论这时候的这一层小资产阶级是怎样在我们前面动摇，我们不加任何争论的，用不着多说的是要去帮助工人来反对小店东。

还有一个问题是比较更复杂而不能立刻简单解决的，这就是时常有这样的情形：工人对这些小东家提出很大的要求，小东家不能接受这些要求，甚至于破产也不能支持这种要求，于是工人不得已，便自己将这个店铺拿过来大家分了他。在这个状况中我们怎样办呢？在一般的说起来，在现在苏维埃区域中，我们时常将小店辅夺过来分了，以后货物也不能得着，商业也停止了，这种政策我觉得是不正确的，这又是糊涂的政策。为什么这种政策不对呢？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中，我们自己还不能组织任何生产，就是要用我们自己国家的机关去经营商业，也还是不成，也还是将来的事。破坏一切小商店，就是破坏一切商业关系，而使自己陷于更困难的地位，使自己不能供给当地人民所需要的生产品。在苏维埃区域中，我们自己要负一切事件的完全责任。因此要非常慎重，在苏维埃区域及没有苏维埃的区域，有非常大的区分。在有苏维埃的地方，有无生产品以及生死饥饿的问题，我们要对当地人民负完全责任。一切困难是要我们担负，人民是要问我们、问苏维埃政府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能够停止的商业，仅只是当着我们自己可以组织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假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去组织，则我们现在便不要破坏，我们可以说得很多，但是若照这样做了，则我们便没有商品流通了。然则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以为在苏维埃区域中我们的政策应是这样，我只说一点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假使我们能组织协作社，或者国家的商业机关，或者其他的方法能维持商品的供给，那么，我们便可任意的没收一切。但若是我们尚不能代替这些小商人，因此我们普通不

能用这种方法，而应当给他以相当的自由，否则我们便不能维持供给问题。这个问题还要求特别的研究，因为我只说了一个原则上的。

假使不在苏维埃区域中，那里的店员及工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说：算了吧，将这个商店打了他。我以为假使群众的心理若是这样，假使他们正在打这些商店，则我们除了帮助他们以外，没有别的什么可做，我们不能说，我们站在小东家这一方面而不站在工人方面。

我们不能出来阻碍群众的要求，自然，我们所尽量做的，在有的时候我们要出来说的是：提高工资，承认工人的监督权等等，假使可能，还是要引导他们走这条道路。这比完全毁坏或者平均分散这个店铺要好些。因为一切分散的本身，都是再造成一些小资产阶级，使着以前的店员变成小的店主人。以前是个比较大一点的东家，现在成了数个小的商人。这里一点共产主义也没有，乃是很简单的资产阶级的分配。但我们在工人前面不能公开的这样说，这样说，便似乎表示我们是在阻碍群众运动。我们在这里要尽量指导这种运动，使他带着最高的组织性，使他夺取得更多的东西，就是对于这些小主人，我们也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如像工人监督市场，监督价格等等。要使着这种运动不简单的分散店铺就完事，而是要为下一革命阶段，造成一个相当的组织前提，要训练工人在他们这一个社会范围之内，一城中，一县中，很有组织的发动，范围无论他大小，或是区，或是州。这种工作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以为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就是这样。

在这里还有所谓城市贫民。这不是无产阶级，同时也不是流氓无产阶级，这是些很小的商人，他从来也没有剥夺过别人的，这是一些城市的贫民。我想，这种人在许多地方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取消他们在苏维埃中的选举权，更不能预先将他们当着我们的敌人看待。相反的，共产党应当企图夺取这

一般的群众。我关于这只能说出非常原则的话，如像我们对待这股人的口号，主要的大概是反对借贷资本，反对高利贷，我们要帮助他们组织协作社或者生产组合等等。在未夺得政权之前，我们应当尽量的拉他们到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帮助他们与大资本家争斗，与高利贷争斗，我以为对待城市贫民是这样。

至于农民土地问题，则没收土地问题我已经说过，关于这些问题不必答复了。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将来在你们土地委员会中应该很详细的讨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的地主在土地数量上是不很大的。你们想夺取农民，那么要使中农——农民中最多的群众，在革命后能得着比较多些的土地。但问题的困难在这里，你们中国有很多没有土地的贫农，乡村中的流氓无产阶级，过去现在的兵士等等，将使所有的土地以所有的人来平均分配，则或者要得出这样的情形，就是中农在革命以后，将要比革命前的土地还要少些。但这又是不可以存在的现象，我认为必要避免这种现象。我关于这个问题很详细的想了一想，但我终以为需要从别的方面来解决。譬如我们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可以创造大规模的工业形式的社会工作，将这写在我们的党纲上。还有在我们建设军队的时候，我们要吸收一些进去，我们还可以将许多人民移到边境去，而在本部不给他土地。请你们想一想，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推倒了地主，结果因为领取土地的人民太多了的缘故，使着每一个农民所得耕种的土地反比革命前要少些。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想若是帝国主义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能强迫这些在革命中没有得着土地的农民来拥护革命呢？这将是很困难的。固然在我们手中有另外的方法，在中国这样国家中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与着土地问题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还有关于税的问题，或者会有这样的情形：我耕种的土地少了，但我的生活将要好些，因为我要少完纳几倍的税，这或者是中国之土地问题中的一个很大的救济。因此，我们也要估计到这些环境，以

便在这个上头来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但无论如何我应该要使你们注意，不要很轻易的任意的提出使土地仍然旁落的要求。怎样能以避免呢？只有我们预先想出许多办法来安置这些离开了生产过程的人——流氓，兵士等等。这种方法是要给他们许多非农业生产中的工作，我想有许多的社会工作，如修路，筑堤等等，还有在我们的军队中也可以安置一部分，这些方法对于我们是一点不奇怪的（瞿秋白说：——孙中山也是这样提议的）。他这种提议很好，我们也是要以这样提议，不过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之基础下说的，不是站在全民的观点上说的，因此，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

固然，由湖南和还有几个别省来的同志，说共耕也是一个出路，说共耕是大家共同耕种，并可以提高生产力等等。我应当说，我很尊重共耕这件事以及由湖南这位同志所作的报告，但我对他仍然有几点怀疑，说什么八小时的工作制，说一切都是很好的，这是我所怀疑的，我觉得事实上不会像说的这样百分之百的完善。自然啊，我们应当尽量用这种共耕的方法。中国之一切民族生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利用而使他做做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但要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而不能像有位同志说，在现在不必注意自耕农，这句话是不对的。他们变成合作社的会员或是共耕的分子，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以前总是需要我们对于他有很大的注意。

这些都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之一些大概的说明。

（八）苏维埃区域中之红军问题

现在说到关于在你们苏维埃区域中所有的红军，我不必说关于在军阀之军队中必要的工作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同志们都说过了，都说得完全正确的。我也不必说到在军队中的组织问题，建设支部的问题，因为这些在我们讨论到组织问题的时候，再去专门研究。我只说到我们现在所有的红军问题。我应当说的，共产

国际实在给了中国一个训令，这个训令对于有几个同志没有发生好的印象。我们发去了这样一个训令，说中国的红军不应该集聚在一个地方，而应该在几个区域中。我不知道是否我们错误了，但我想没有错误。但是我想向你们解释，究竟为什么我们发出这样的训令？我们发了这样的训令，以后事实也证明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集聚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总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第二天则这样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这样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后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或者说：“红军是好的，但是难得维持他。他也不与城市发生关系，他又没有银行，又没有商品。”你们想想，到这时候便该知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以为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虽然红军在开始是因为农民而反对了劣绅土豪的，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开始表现过了。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区域中，还是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当着他住在这一区域的时候，他可以变成农民的自卫军，来保护农民，来尽一个人民自卫军的作用，以后再继续前进，去进攻另一地方的地主，土豪，劣绅，于是在那里又可以吃一吃鸡而到别处去。这样也可以变成组织的连系，时去时来，都带着一定的任务。不然，便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喝个精光。这就是我们这个训令的解释。减轻这种困难究竟

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争论，但我认为是对的。我所以要加以说明的，是要使同志们明了国际这个训令的意义，并不像有几个同志所说的：哎呀！共产国际想解散我们的红军了，因为他只想做群众工作而不做暴动了，无论如何总是很大的机会主义。我说同志们可以相信这里一点机会主义的气味也嗅不着的，这里或者可以嗅一点农民的鸡味，因这点鸡味可以与农民发生相当的误会。

（九）结 论

在结论上我想说几句关于共产国际的话。我老实说共产国际是做了错误的，关于这点错误许多同志都说过，但是同志们都是很狡猾很客气地说出来的。一个同志说：“你们马林怎样怎样说，这一个又是怎样怎样说的，这怎样解释呢？”问题是说得非常之精巧。一个同志的结论是很对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不错，不但如此，我们还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不派代表比较派那些做错误的代表还好些。你们问我：“你们可否给我们派一个不会做错误的代表，或者一个很少错误的代表？若是在世界上不能找着一个从来也不做错误的人，则给我们一个做错误做得最少的代表。”我们的答复便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想了几年了，但我们还没找着一个可以派去的人。因此，国际执委决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就是要将你们的代表派两个到莫斯科。这样便是经过你们的好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和我们共同来实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

同志们，我还有一句话要说，我以为在你们这次大会上所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要注意提高党内之一般的理论水平线的问题。要发行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书籍，我以为你们应当发行许多很通俗的小册子。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许多重要问题的书籍，如不断革命论，革命中之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阶段等等。这些东西应当散布在党的干部分子中间。但是你们还没

有很通俗的为工人写的东西,没有这些是不能传播正确的思想的,不能教育广大的党员群众的,我以为这也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任务。关于直接暴动的问题愈是严重,则在直接暴动之前愈是应该利用机会,以提高一般党员的政治水平线,这是一定应该做的。应当使我们所得着的这些经验为全体党员所了解。这自然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做,例如假使我在你们大会上不是这样通俗的说,则我大概要少费十倍的时间,这是绝对明了的事。我们有时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写来说,就是因为要使他更通俗的缘故。我认为你们中央委员会应该要做这一件事。

同志们,我以为你们在这个大会上所表现的,大概总算一致的,这并不是那一种的一致,如像“我与以前一切同志的话都同意”,而事实上一点也不一致的同意,这一种形式我以为是外交的,现在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乃是我们找着了全党将一致通过的政治路线。我们所有负责的同志以代表大会完全自信的接受了这种政治路线上,在这种路线上要巩固要团结我们全体的同志。

我应当说,这种狡猾的政策,欺骗的政策,外交式的奸诈……对待我们阶级的敌人是完全可以用的。而在这一点说来,中国共产党员实在完全是一些忠厚长者;不独中国共产党员,就是罗易,他将共产国际之秘密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但是冯玉祥一面在枪杀工人,一面还给共产国际打个电报说,我完全赞助共产国际,世界革命万岁!而我们的人却拿着自己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很真诚的给他们看,这种人完全是做得糊涂,愚笨;共产党的政策是不能这样的。

但是在我们党的内部,在我们自己的干部中,我们必须建设更密切的关系。我知道你们中间的纠纷并不是立刻可以消除得尽的,一定还有许多做朋友,做仇敌,彼此扯后腿的勾当。但是要有正确的意旨,要用所有的力量来肃清这一切纠纷,而大家走共

同合作的路。我再重复地说，应当抛弃各种成见，抛弃这些难以想到的话。在我们脑中不要藏留任何印板式的意见，这些印板式的意见时常是没有包含什么实际意义的。一切共产党员不要像那些弄把戏的人一样，不要故意由个人口袋中连续不断的扯出许多怪物来，一个不断革命论，一个机会主义，又一个不断革命论，又一个机会主义等等。不要像玩把戏一样，他肚中可以吞一把刀子，故意使别人发奇，其实这不过是野蛮罢了。应当使着全党都能明了这些很简单的很基本的东西。在这一个阶段上，我们已经被打伤了，失败了，我们现在首先应当强健自己，聚集自己的力量，整顿我们的队伍。并不是为的坐在那里不要动，是为的发动群众的更大的力量，来引导他们反对封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者。要知道，不要尽闹关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笑话，不要抱住革命这个字去清谈。要知道，决定革命的是群众工作之广大的发展，是广大的群众运动。在中国住着非常广大的群众。我在你们大会上出席了三次，三次我都指明这一个中心的任务。所有的同志都应该注意怎样能团结中国之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有的同志都应该注意怎样使我们共产党变成广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切小派别，小纠纷——无论他是由哪一些最好的同志所组成的——都应该取消，应该使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政党，要能够引导广大的数万万农民。只有这样，你们的党总能完成了你们历史的任务，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的事实上（不是纸上，不是新闻上，不是演词上），继真正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应当明了，并且应当记着，关于革命速度的问题，关于期限的问题，什么时候总有真正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用决议案可以解决的，不是用讲演谈话可以解决的，乃是要阶级斗争的实际行动去解决。当着“中国”问你们什么时候引导他们上战场的时候，问你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胜利的时候，你

们应当将我在大会上的话答复他们。你们应当说：当着我们健全了的时候，当着我们组织好了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便引导一切群众去上战场，到那时候我们才不会成一个“败军之将”。只有我们将群众团结好的时候，这些群众总能去上战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保证着我们全世界的历史的胜利。在你们这个古文化的民族中，你们的胜利将是以英勇的中国无产阶级为领袖，以中国共产党为领袖。我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你们走向这个全世界的历史胜利的大道。巩固着我们的队伍，勇敢前进，高举着我们光荣的有价值的共产主义的旗帜！

(录自《党的生活》第3期)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年10月)

米 夫

1. 写在正文之前

现在我们收到了关于几个月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某些文件。这些文件并不完全，没有描绘出代表大会的全貌，但是现在就可据此对于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做出总结，现在就可以把大会通过的基本决议付诸讨论了。

大会召开时的形势是：反动势力猖獗、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丧失了，群众运动遭到镇压，中国统治阶级的地位大为巩固，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一再打击，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大为减少。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

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影响代表大会的整个工作。尽管存在的是革命失败的形势，但从第六次代表大会本身和大会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毕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在反动势力的残酷打击下，在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中，在秘密的地下状态的环境里开过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它对中国解放斗争的所有迫切问题做出了回答。中国革命诸课题得到了热烈而全面的讨论。来自中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代表参加了讨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于过去革命时期全

部经验的批评性的再认识是在最大限度地遵循党内民主原则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热烈讨论议程中各项问题时，特别可喜的是与会工人代表的积极性。党的前几次代表大会上工人的数量只占百分之几。此次代表大会工人占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些工人不单纯是观众和听众，不，他们在探讨和制订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中最积极地参加了讨论。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特点是工人中坚力量在发展，工人有积极性、工人领导干部数目在增长，党的领导中工人成分的比例在提高。这一切都表现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进程中。

代表大会详细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听取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报告，听取了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工作报告，代表团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报告。就以上这四个问题展开了普遍的、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其结果是制订并通过了总的政治决议案。然后，大会注意力转向讨论工会运动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专门分析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此外，党的建设问题的几个委员会也开展了工作。这些委员会活动的成果则使大会就妇女运动、宣传鼓动工作和党在苏区的工作分别通过了决议。

党章也经过仔细加工和修订。这是因为旧党章有若干处提法不清楚、不确切，有一些地方则是因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建设的实践。在这一方面，过去的党章从第一条开始就有其不适合之处。例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条是：“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①。这一条里没有向党员提出在党的一个组织里担任工作

^① 这不是中共六大党章的第一条，而是二大党章的第一条。（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究竟是作者引述二大党章但在说明时误注为六大党章呢，还是欲引述六大党章而误引了二大党章呢？从前后文看，显应系前一种情况。故“例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的“六”，疑系“二”书之误。——原编者

的要求，它使这段文学很象乌尔托夫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很清楚，党不能原封不动地沿用自己的章程，应当以共产国际章程为范例予以修改。

第六次代表大会还就党纲通过了决议。实际上，在此之前党一直没有党纲。唯一的党纲草案还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那也只不过是个基础，尚待再行讨论。况且那个草案也是错误百出的。无论在理论部分，还是在实践部分，这个纲领草案都表露出明显的缺陷。举二三个例子就可证明我们的看法。比如这个草案指出未来中国的国民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①，但不强调革命的民主性，关于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基本任务问题的决定也不正确。草案中写道：“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的正面对人，更是列强与军阀，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②。

过去的草案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在日愈高涨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只对工人阶级的作用做了如下说明：“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③很清楚，据这样的方针，党纲实践部分中提出的要求就是残缺不全、远非彻底的，根本没有提出完全消灭外国资本统治的任务，也没提出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任务，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封建制度等。代替上述内容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限制外国企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27页。——原编者

② 同上，第527—528页。——原编者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28页。——原编者

业和银行的发展”^①和要求“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有组织协会的权利”^②等要求。很清楚，靠这样的纲领，党不能生存；提这样的要求，党不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动员广大群众。我们上面指出的过去党纲草案的缺点说明了在六大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但是，第六次代表大会并未准备通过党纲。因此它做出了一项决议，委托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拟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以便经地方组织事先讨论后，提请第七次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不久前闭幕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极有利于中国党完成制定党纲任务。我们希望本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能完成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其委托的任务。

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专门性决议，我们想谈谈大会关于广州起义的决议。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纪念12月11日英勇的广州起义一周年。

“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贫苦的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企图推翻一切恶势力而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事业。因此，不但中国的共产党，以至于各国共产党要直接的纪念他和研究他的教训”^③。

2. 革命的各阶段

在说明上述情况之后，我们就转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心的那些最主要的问题上来。我们已经指出，此次代表大会是在同中国解放斗争前几年的特点截然不同的形势下召

① 党纲原文是：“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28页。——原编者

② 党纲原文为：“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见上引书第529页。——原编者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76页。原引文下引号脱漏。——原编者

开的。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应该调整自己的工作以适应新的条件。因而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也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任務，在于领会过去的阶级斗争极为丰富的经验，考虑和认识充满极为重要事件的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一切教训。这个清醒的分析应该帮助党培养自己的力量去迎接新的决定性的搏斗。现在我们来分析这种经验，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从前一时期解放运动的阶级斗争中吸取了哪些最主要的教训。

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视为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不同的，彼此各异的时期，因为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和各阶级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革命的进程。代表大会制定了最主要的阶段，最主要的革命转折点。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各种阶级力量也进行改组，阶级力量的改组则影响和决定了个别革命阶段的性质。据中国文献既定的划分法，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了中国革命三个最主要时期：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从阶级内容来看，每一个时期都是根据中国社会的这些或那些阶级参加革命阵营的情况加以确定的。

实际上，以强大的革命高潮为开端的广州时期，其特点是在反帝斗争中建立了除无产阶级和农民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全民革命统一战线。在这个时期革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北伐战争所向披靡；帝国主义由于不断受到打击，不断衰弱下去；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同时，在统一战线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暗中进行着日愈尖锐的斗争。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组织性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随着反帝斗争的尖锐化，广泛的革命战线的主要组成部分间加剧了磨擦，加深了矛盾。人们都知道，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产生的阶级力量的分化把中国资产阶级抛向了帝国主义阵营。

因资产阶级的叛离而遭到破坏的民族统一战线让位于就其性

质说是工、农、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更加革命的联盟。革命从自己的第一时期即广州时期转入了第二时期即国民党左派的时期。但是在武汉重新建立的革命中心并未存在很久。武汉这个中心远非由无产阶级分子领导，它在帝国主义联合力量、当地资产阶级和中国军阀的直接压力下，越来越倾向反动势力方面。这个中心出现伊始，就对抗土地革命的发展，而从长沙许克祥反革命叛变以来，武汉中心则保护了反动叛乱分子，公开反对起工农群众来了。

武汉中心沿着反革命的道路越走越远，最终倒入蒋介石反动派的怀抱。从阶级观点看，武汉国民党的叛变和转入反动阵营，说明中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已跑到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营垒中去。然而工农并没有不战而退，他们仍然希望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南昌起义的烽火和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秋收起义，就是武装捍卫革命成果的尝试。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失败了。它的失败主要是由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而决定的。但是运动领导人的错误策略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南昌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次起义的基本意图本应是支持农民自下而上地实施彻底的土改。可是运动的领导人提出的是极为残缺不全的土地口号，而且就是这些残缺不全的口号在南昌军队活动的地区也是贯彻得很不坚决的。起义军队与农民运动之间没有建立牢固的联系。这表现在只进行了薄弱的试探工作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南昌起义军所经之处旧的政权机关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破坏，也没建立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以代替之。同时，还有一系列纯属军事战略上的错误使南昌起义失败的一连串主观原因不断增加。

结果，南昌起义这次尚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继续革命的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中国革命的第二时期即国民党左派时期便以这次起义而告结束了。第三时期以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的广州起

义为其开始。苏维埃的旗帜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里变成了实际行动的口号。广州无产者为树起苏维埃旗帜而进行的英勇尝试，其世界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是广州起义并没有开创中国革命高潮的新时期。相反，起义是在革命力量遍遭失败和退却的情况下，在革命浪潮低落的情况下进行的。如大会决议所说，广州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起义失败后，革命被迫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英勇忘我的广州无产者失败后，反动派更加嚣张，反动势力更加团结，其地位更加巩固。这个不长的第三时期结束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3. 失败的客观原因

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上，千百万群众与压迫者的历史性大搏斗，其结果并不利于劳动者。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革命虽然已取得初步成功，虽然革命已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地初步有所发展，但究竟为什么还是失败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教训，没能缄口不提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指出了前一阶段中国革命还没有能力克服的一系列客观困难。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了中国革命失败的五个最主要的客观原因。首先强调的是中国革命的正面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大。对于这个敌人在中国的力量我们只会估计不足，而不致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外国银行和工商企业掌握着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外国资本的统治遍及中国的全部经济。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这个国家内部建造和巩固自己的阵地，它把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变为自己政策的传播者和自己统治的辅助力量。为卫护自己的特权，帝国主义者使海陆空军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国际帝国主义很快就动用自己全部经济和政治实力来镇压中国革命，充当一切反动势力的煽动者和组织者的正是帝国主义。它向民族资产阶级讨好或做出些小

让步，以这样的办法分裂了革命统一战线。它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收买中国军阀的政策。它组织经济封锁，靠武装力量对战斗中的阶级施加直接压力，在关键时刻则使用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就这样，帝国主义对于胜利发展的中国革命形成了最严重的困难之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不良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国际帝国主义力量过大所致。

除此以外，还有下述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虽然国际帝国主义并不是浑然一体，虽然个别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处于矛盾之中，但在中国革命面前，帝国主义基本上结成了统一战线。它的力量没有被分裂，没有被互相间的磨擦所削弱。中国革命发展的国际形势中的这些不利因素，不可能不影响中国劳动群众英勇斗争的结局。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再次证明，国际因素在任何一场革命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且回忆一下 1905 年我国革命的经验。列宁不止一次指出，1905 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外国资本给予俄国沙皇制度的援助。“1905 年 12 月之后，沙皇黑帮政府已不能维持，即使现在，没有全世界资产阶级以贷款形式提供的援助，它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全世界资产阶级向沙皇这个明显的破产者提供几十亿的贷款，不仅仅是因为前者像任何债主一样，为高额利息迷了心窍，而且还因为它感到自己会在俄国旧制度打败革命势力时得到好处，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是无产阶级”。^①在另一篇文章里列宁简单总结我国 1905 年的革命时写道：“当廿世纪初日俄战争和 1905 年革命极为有力地打击了沙皇制度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便跑来相助，以几十亿贷款支持它，竭尽全力限制革命火焰蔓延和恢复俄国‘秩序’……欧洲资产阶级曾帮助沙皇制度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11 卷，上册，第 12 页。——原编者

镇压革命”^①。

现在看看我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不难置信，中国革命没有我国1917年革命所特有的那许多优越之处。列宁强调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利用全世界两大帝国主义强盗集团的殊死斗争，这两大集团还不能联合起来对付苏维埃这个敌人。”^②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即我们引述上段话的那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一个很有远见的思想，它在中国近来的事件中得到证实，即：我国十月革命所特有的有利的国际条件是难以再现的。

中国革命不仅不是在帝国主义的力量因其互相争斗受到削弱的世界大战的形势下开展的，它甚至不是在战后国际资本难以治疗创伤的危机形势下开展的。中国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地位大为巩固和稳定并且能用全部实力武装起来对付中国革命的形势下爆发的。

但是，国际帝国主义强大的联合力量，并没有把他们在我国革命胜利进行的道路上遇到的客观困难克服净尽，必须指出确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内部因素。紧接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可指出解放运动初期阶段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这个情况。中国资产阶级参加反帝革命斗争不能不认为是肯定的事实。在反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本应彻底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哪怕这种革命性是很有限的、暂时的）。同时，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斗争这个事实本身也不可能不包含着它必然脱离革命、必然跑到反动营垒中去的情况。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革命力量的暂时失调，使革命地位暂时削弱。在革命斗争和革命风暴最激烈的关头，资产阶级的逃跑会增强国

① 同上书，第268—269页。——原编者

②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7卷，第153页。——作者

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使反动派更紧密勾结起来。

当然，阶级力量的分化最终还是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了更革命的联盟。暂时的革命同路人这样就不再会阻碍和削弱革命的进攻。这无疑是有利于革命的。各阶级的总分野已完成了。可是，革命阵营中有过资产阶级参加，尽管它起了阻碍作用，后来又起了叛徒作用，但它的存在不可能不对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造成复杂的客观情况。

这类困难还应包括另一批同路人即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不稳定性。这些人的动摇，其作用也不小。中国的特点之一，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占有土地，这些分子同时又以中介人和经济代理人的身分同外国资本的利益相联系。所以很清楚，农民运动的高涨，土地革命的深入，就像反帝运动的激化一样，都会使这些阶层发生动摇，离开革命投入封建资产阶级阵营。况且还有工人运动的加剧，中国无产阶级要求的提高。中共中央代表在报告中援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对小业主和小老板的要求也提高了。已发生过手工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达十六倍的情况。乍看起来，许多人为这些高要求而吃惊。但是薪金本来太低，即令能提高十六倍，那工人们每月也不过才挣到几块钱。工人们理应为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而进行斗争。但这时商人和小业主见到工人如此坚决，就关闭了店铺、商店和工厂。在关键性的革命时日，在最尖锐的关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内发生的这些情况，势必对解放斗争的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最尖锐的革命动荡时期所起的特别作用而出现的客观形势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再看看在中国整个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军事因素。军队有特殊的雇佣性质，这是中国军阀制度的特点，这种军队的军官都是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士兵是从脱离了生产过程而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

系薄弱的流氓无产阶级中招募来的。这支军队是中国反动派手中一个驯服的工具。靠这支军队，反动派不止一次地打败了革命力量。在许多地方，拥有军队使反动派在武装力量上占到大为有利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势。这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的失败的第四个原因。

最后，第五点，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大家知道，即使在我国1905年的革命中，不平衡性也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905年时，俄国工人阶级在强大的农民增援力量未及出动之前就被打败了。沙皇制度击溃了工人阶级的先头部队，就把力量转去对付农民，而且没有特别费力就把为时稍晚的农民风潮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既表现在地域上，从各阶级参加解放斗争的观点看，也表现在政治上。在近几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明这种不平衡性的许多例子。上海无产阶级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成熟并举行了胜利的武装起义，在这个关头，其他城市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则显得大为逊色了，而农民则刚刚觉醒起来去参加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当南方省份的革命高潮波澜壮阔地发展，这些地方的农民赶跑了地主和劣绅、没收了土地并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在华中，特别是在华北，农民还不是处处都敢提出减租和减少赋税这样温和的口号。革命运动的这种不平衡性削弱了革命力量，有助于反动派镇压群众运动。

这就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五个最主要的客观原因的全部内容。还可以补充一些次要的原因。这样便可以指出地理因素的特别作用，因为这个因素虽在一定情况下加强了革命阵地，在多数情况下却是削弱了革命阵地。中国的分裂状态，交通不便，没有集中的政权等情况使革命运动易于出现一定的分散性，而这些因素却使反动派能够更容易地将农民队伍和斗争中的工人各个击破。还可以指出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组织性不够强和年纪较轻。

但是这几点就其本来意义和重要性来说，则远逊于我们已全面阐述的前五个原因。

4. 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

虽然这些原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还是强调“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①共产国际代表在报告中也试图说明机会主义最重要的表现。他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三个最基本的缺点，说明机会主义如何背离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在讨论中发言的所有同志都同意他的说明。作为机会主义的第一个表现，共产国际代表指出了共产党缺乏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应表现在哪里呢？应表现在党的明确的政治立场，党的特别的政治面目，特别的要求、斗争口号和方法上，这一切使共产党得以突出并使其区别于其他政治团体。共产党的独立性要求党对自己的同路人、暂时的同盟者持批判的态度。共产党应当对同盟者的摇摆不定进行无情的批判。既然对手半途止步不前，党当时就应十分果断地揭露它。既然同盟者已开始偏离或已经偏离总目标，党当时就应对同盟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距离这些任务的完成还很远。忽略这些任务的情况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活动中。这第一个最大的缺点本身就注定革命会遭到一定的失败。第二，机会主义表现在不了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了解在政治路线和策略口号中做出相应改变的必要性。党的领导本应预见到阶级力量的必然改组，应积极准备应付转变关头，预见到今天的同盟者明天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当时不仅不应让敌人使我们感到束手无策，而我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0页。——原编者

们倒应该做好准备和分配好自己的力量，以便坚决回击反动的图谋，尽可能预先做出决策，使斗争的结局有利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没有完成这些最起码的和必要的任务，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工农的英勇斗争遭到了失败。

机会主义的第三个表现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去促进群众运动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阻碍了运动。共产国际代表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所谓的全民族联盟中出现一定的裂隙，或者让我们党和工农群众间出现裂隙，如果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那么哪种情况对我们更加危险，哪种会好一些呢？”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支柱是群众；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联合群众，吸引他们参加运动，发展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不是阻碍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最应担心的是在党和群众之间出现裂隙。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想提起列宁的两段很重要的话，这两段话至今还没在我们的书刊中引用过，这两段话里以纯粹列宁主义的天才预见性确定了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就应当执行的策略路线。列宁在谈到1905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的策略中曾写道，工人阶级“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工人阶级既反对米留科夫又反对孙中山的这些特殊任务”。^①另一段引文我们是从列宁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借用的。关于我们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列宁在该小册子中写道：“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束缚’。”^②

即使进行最肤浅的分析也不难信服，列宁提出的论点规定了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册，第280页。——作者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79页。——原编者

一条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坚持这样的路线。工人阶级不应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束缚自己。工人阶级不该为迎合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理解而放松阶级斗争，不该当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中国的米留科夫式人物的尾巴，而应该与他们分道扬镳，去引导孙中山的信徒们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参加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自己特殊的独立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中没有运用列宁的这些指示。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布尔什维克式的坦率态度指出了下述情况，这是完全正确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底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①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②当时的领导做出了限制群众运动的决议，做出了解除工农武装的决议，它没有去进行斗争，而是向反动派投降了。这就是为什么六大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在革命紧急时期接近直接叛变的领导——的看法，对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5. 八七会议和十一月全会

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在端正布尔什维克路线方面、在克服过去的机会主义策略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确，这次会议上还多少散发出左派国民党的气味，有某种左派国民党的幻想。土地问题在会上的提法不够急进。但这并不能贬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完全赞成这次会议的基础

① 此字以下作者删去了三句话“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击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0页。——原编者

② 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0页。——原编者

本决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撤换了过去机会主义的领导；它根本改变和纠正了过去机会主义的路线；它十分肯切地承认并强调指出了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八七会议把土地革命作为劳动群众斗争的中心口号和根本关键提了出来。八七会议采取了推翻反动政权、准备和进行多次武装起义的果断方针。八七会议的最大功绩是它通过了上面我们指出的那些决议，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面临垮台、失败和在政治上灭亡的威胁。八七会议把党从机会主义的泥潭中挽救出来。八七会议在党的队伍的布尔什维克方面将占有最为显著的地位。

第六次代表大会正确指出，中央十一月全会继承了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全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形式提了出来，把土地问题提得更加深入。最后，全会采取了提升工农担任领导工作的果断方针。但同时，十一月全会的工作中也还有某些不足之处。尽管全会提出了急进的土地口号，但在土地纲领的理论部分，全会却把中国各种关系的主要形式说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就好像把压制全部经济的封建主义从日程上取消了。此外，十一月全会不正确地使用了“无间断的革命”这个术语。这次全会上存在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革命正沿着上升的路线不断向前发展。这说明过高估计了我们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这样的方针促使当时在许多地方已开始出现的盲动主义倾向更加活跃和发展。虽然十一月全会也指出了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准备的武装暴动的必要性，但它并没有全力以赴果断地批判盲动主义倾向。

十一月全会之后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中共中央的工作特点是，中央委员会没有十分坚决地把党的政策方针扭转到争取群众和发展反帝斗争这一方面来，中央委员会没有开展足够的活动去克服盲动主义情绪，没有开展足够的斗争去反对许多地方组织对工人阶级态度上所采用的强制性办法。广州起义是在革命总退

却时的一场后卫战。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予以充分而及时的评价。广州暴动失败后，随即弄清了情况，知道反动势力已巩固了阵地，革命被迫转入地下，当时就应当从直接武装暴动的策略急剧转向争取最广大群众的艰苦细致的日常工作。当时就应该转而采取一定的防御和有组织的退却。正如列宁在这种形势下喜欢说的，应当退却，以便后来奔跑和向前跃出更大的一步。在这方面，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反对未经准备的暴动，提出了发展和扩大反帝运动的任务，决定对盲动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但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却都是明显不够的。正如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领导同志们没有正确估计中国革命失败的程度，没有正确估计广州起义之后形成的客观形势；他们过高估计了农民运动的某些成绩并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从农民游击斗争发源地传来的，不能说明中国解放斗争总形势的那些情绪的影响。

6. 对当前时期的估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对当前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决定下列各点：中国革命的高潮是否现在仍在继续，中国革命的浪潮是否现在仍继续上涨，还是说我们已进入一个就其性质讲多少有些不同的时期。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这次全会的决议中指出，上一个革命高潮结束了，新的高潮还没有开始；中国革命正处于介乎新旧两个高潮之间的转变时期。

起初并非所有的六大代表都同意这个估计。与会的一位青年团代表在发言中涉及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正在进行革命浪潮的高涨过程。革命正在向上发展，不过它还没有达到全面高涨。但我们当然不应等待全面高涨，我们现在就要斗争”。

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也大略是用这种精神回答这一问题的。湖北代表试图从“高涨”和“浪潮”两词定义的区别中找到答案。他说：“高涨和浪潮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起浪时可能没有风，但没有风就高涨不了”。接着，这位湖北同志指出中国没有革命的风，他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是高涨，而仅仅面临着革命浪潮这个事实。

代表大会刚开始时，的确有些同志例外，他们在对于当前时期的估计上表现了很大的混乱，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上了不正确的方向。他们不分析形势，不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去分析概念——什么叫高涨，什么叫浪潮，上升的浪和下降的浪有什么区别，什么是细浪等等，企图在这些词的区别中找到中国革命运动当前阶段的正确定义。这些同志企图用一词一义，用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的表面现象，来取代对中国现状的分析。

但是大多数代表（到讨论行将结束时则是所有的代表）都无例外地在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大会通过决议说：“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①况且大会也不可能做出其他估计。的确，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某些地方游击斗争的发展确实很激烈。但是这不能说明普遍的形势。对中国普遍形势的分析是估计当前时期的基础。而多数地方，特别是工业中心的状况，却说明群众现在受到压制，不能被吸引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现在局促于个别地方，在隐蔽地发展之中。在这方面看不出革命高潮的征兆。相反，革命不得不全线退却，把过去已争取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1—302页。——原编者

到的阵地让给了反动派。

但是，如果现在没有高潮，那么有一系列原因将引起革命浪潮必然的新勃兴。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至今还未解决；国际帝国主义不想也不会放弃任何特权，因为放弃就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剥削体系的破坏和消灭。此外，中国不仅没有摆脱正在破坏着中国经济的经济危机，而且近期内将越来越难于摆脱它。资产阶级不能用改良主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也没有能力使引起革命震荡的基本动力减弱下来。群众的处境不仅得不到改善，而且会越来越恶化，农民破产的过程加剧了，加快了。赤贫的农民越来越不可能在工业中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机会。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失业增加。因此，从农民和中国无产阶级方面来说，一次新的革命爆发正在发展和酝酿之中。国际帝国主义的抢掠行径将越来越强烈地煽起革命情绪。最后，各派军阀集团间的倾轧和内哄必然导致反动阵营的削弱，利于革命力量的突破。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新高涨的最初的征兆目前已经表现出来。大会指出了因日本占领山东省部分地区而出现的反帝运动的发展。接着大会又指出上海罢工运动已有一定发展，罢工浪潮在增长，这在广州是特别清楚的，尽管那里不久前遭到了失败。最后，大会提请注意现在军阀队伍里发生的、性质与过去的士兵举事不同的士兵哗变。因不发军饷，因条件艰苦，中国军队的兵士，不止一次地起事反对指挥人员。现在，土地革命和农民游击斗争的影响已波及到士兵群众，后者已与贫苦农民有所接触。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已发生许多起士兵倒戈反对指挥人员和投诚到战斗的农民群众方面的事件。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了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些中国革命运动未来高潮的局部征兆，同时告诫全党不可对其估计过高，强调因夸大这些征兆可能出现的危险性。从这些征兆还看不出真正革命高潮的全貌。参加抗日运动和罢工斗争的群众数量还很少，而特别

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受到破坏后还没有复元。可是中国新高潮的到来，其标志应首先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7. 争取群众的总路线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现阶段做出这个估计的同时，还应表示同意〔共产国际〕九次全会的决议，全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地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①

共产党不应因过去群众运动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在争取群众方面，还不能认为我们的现状是完美的。东部几省^②的一个代表在讲话中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大部分劳动群众相信国民党，他们等待蒋介石的军队前来，以为蒋能拯救他们免遭北方军阀的压迫。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还相信北方军阀，努力支持他们的争斗，企图帮助他们战胜南方力量。“这些工人害怕共产党，犹如怕洪水猛兽。他们说共产党宣传共妻等等”。

这位同志说，东三省的许多工人对张作霖抱有希望，说张兴建了一些工厂，所以破产的农民能在那里找到工作；他又说“工人怕我们，怕我们为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想掌握运动领导权的时候，他们就四散跑开了”。

东三省农民的情绪对我们更加不利。“关于农民，没什么好说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3页。——原编者

^② 从上下文看，应为东三省。——原编者

的。因为既然产业工人都这样落后，那么农民就更难接受我们的革命鼓动。”别人会对我们说，劳动群众的这种情绪对全中国来说没有代表性，说这种评价只适合于东三省，因为1925—1927年震荡全中国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波及到这里。但是，我们也能从各省代表的发言中举出不少例子，说明必须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把广大群众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一个上海同志指出了上海的四月罢工，说有一万多工人参加罢工，党只忙于起义，并没有领导起义。这个同志又举了有二万工人参加的日本纱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没有共产党参加和领导。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冯玉祥在洛阳讲话时，农民和工人跪着听他的演说。最后是我们进军南昌时的体验，当时，在共产党军队进村前，许多农民整村整村地四处逃散，害怕共产党军队，就象害怕洪水一样。这一切说明广大群众还受着反动分子的蒙蔽，他们还受着与我们党格格不入的思想的支配。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力量为将来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进行尖锐斗争的同时，在准备反对这些强大的敌人的同时，只有把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斗争，才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统治。党现在应该利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士兵和军官之间的每一个冲突，使这些阶级冲突激化和深化，把广大群众争取过来。党应当旗帜鲜明，利用国际帝国主义一切横暴不法的行为把反帝运动领导起来。

8. 确定革命的性质

党对于解放运动的目的和前景越是明确，党对于取得所期望的胜利之路的认识越是清楚，它的这条总路线就将越是顺利地得以实施。争取群众的斗争顺利与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以对形势的清醒估计为基础的）党的策略如何得以贯彻，党的口号是否完全符合实际。中国有句谚语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以必须使中国共产党不是蒙起眼睛来走路，而应该使党在

决定自己的任务时，在实际工作的一切方面都以正确而清醒地分析形势为出发点。这一点的前提则是要克服和消除党内现存的会把党推到有害的乃至毁灭性道路的那些错误和情绪。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重要功绩就在于它指明了一切危险的动摇行为和错误，告诫党不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轨道滑到与我们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阶级思想的轨道。

首先，中国共产党应该对革命性质，对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第六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前的决议，即已所知道的，确定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是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功绩也在这里，它指出了个别同志现持有的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一系列不正确看法。同时又点出了引起这些不正确看法的原因。

某些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国际条件出发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了不正确的论断。他们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反帝的，又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既然国际革命又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他们就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现阶段就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鉴于这种情况，大会决议中强调必须从革命的国际条件的观点把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与后来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加以区别。第六次代表大会论定，“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它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之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①

如果说中国革命在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中，起的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辅助力量的作用，那么在后来的发展中即革命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97页。——原编者

第二阶段中，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就将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组成部分。

可是，如果说一些同志从分析革命所处的国际形势及其国际意义当中得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不正确结论，那么其他许多同志则通过其他途径得出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这些同志以小资产阶级幻想为出发点，把全面彻底平分土地理解为社会主义。他们觉得似乎如果提平分土地的口号，那么革命就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了。这番议论向解放运动现阶段提出了没收和平分土地的要求，这是不对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只是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认为现阶段加强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淆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①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发动农民反对地主，而不是在斗争中让农民分化。这就是为什么第六次代表大会把没收地主土地交由农民代表苏维埃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但是，如果到现在认为没收全部土地的口号是正确的，那么当时根据这一点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是不对的。不能用平分土地来取代社会主义。这个混乱现象是由于看重了农民的利益，看轻了工人阶级利益而产生的。

中国革命现在面临的不是没收和剥夺中国资产阶级财产。现阶段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完全消灭取缔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平民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应该向自己提出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的任务呢？否。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政权，应该准备力量去推翻这个政权，但是在经济上，党不应该提出把属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尽行没收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现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原因。

在确定中国革命性质当中的第三种错误，是因不正确地理解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6页。——原编者

无间断的革命而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不久前刊出了一篇文章，论证中国革命现在已处于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文章说，中国革命不断发展高涨，就性质论，现在就已经接近社会主义革命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正确指出，当斗争中的群众应集中精力于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统治时，这股有害的危险的潮流却不顾及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跨越整个的，可能是很长的历史时期。

但是，如果从今天的具体任务出发，代表大会在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时做得正确，那么它就不会闭口不谈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前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回答今天的问题时，就务必把今天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的下一步发展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发展趋势的指示是正确的。有一系列因素利于这个转变过程并能加快转变的速度。还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中，无产阶级就逐步居于革命领导地位，在这个时期就已争取着领导权。另外，中国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失败、彻底灭亡的时期发展的，这也不能不使革命的发展更加容易。最后，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存在的情况下发展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为中国革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可能性，所有这些因素必将对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速度产生良好的影响。

应当把转变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那就不对了。很清楚，我们将指出在实施这个或那个阶段任务时的交错现象。据各种情况所见，还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不断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某些措施就将含有社会主义成分。例如，在大会上关于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这个问题的许多发言中就强调说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说什么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中国无产

阶级一个工厂也不能触动，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开始时才能着手将其收归国有。许多发言都指出革命不会那样公式化地发展。实际上，工人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显然会促使资产阶级的个别派别怠工、逃跑和关闭工厂，促使他们组织反对革命政权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去接管被抛弃的企业，不得不在后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破坏后者的经济实力，摧毁他们的阴谋抵抗，没收属于他们的工厂。最后，随着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还要转而全部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但是，现在没收资产阶级工厂的任务不可能，也不应当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提到无产阶级面前。

此外，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一系列任务只有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第六次代表大会告诫说，对于划分阶段持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有危险的。革命——这是一番生气勃勃的事业，是一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速度和快慢问题的解决，将首先取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性的程度。

从确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出发，从革命的基本任务出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十个口号，党应在这些口号下去争取群众：

1.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2. 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3. 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4. 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5.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6.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7.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
8. 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9.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0.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①

9. 盲动主义倾向的危险

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又点出了对于中国解放斗争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些有害倾向。大会指出盲动主义倾向是特别危险的倾向。盲动主义情绪曾在许多地方组织中扩散，至今在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中也还没有消除。例如，一位福建代表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抱怨说，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使党完全没有准备，使一系列盲动主义的起事遭到了失败，湖南省的一位农民举了一个未及时举行武装起义的例子说，结果有八百多农民遭反动军队杀害。最后，一位湖北代表介绍说，关于起义的指示是机械地执行的，没考虑到形势和群众的情绪。这个省的领导同志不但没有提出组织群众的任务，而且决定完全停止工会工作。他们认为在起义和准备起义期间，需要的是军事组织，不需要工会。结果是没有枪，没有群众，少数几个同志带上火柴和棍棒就去放火烧房，还满有信心，自以为是在对工农革命尽义务。反动派没费什么气力就镇压了这些风潮。起义的结果使湖北党组织惨遭失败，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这些盲动主义的事实，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的实践中找到。江西省一份共青团的指令中写道，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提出进行协调一致的经过准备的武装起义的要求。在广东省委6月19日的决议中我们见到一个关于必须在该省各地区积极准备和开始武装起义的指示。这个决议指示说：“必须全力制造兵变；必须特别努力在大城市煽起兵变”。^②很明白，关于起义的这些指示不是从清醒的分析形势和正确估价中国现状中得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承认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盲动主义倾向危险的那些决议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98页。——原编者

^② 未核对指示原文。——原编者

是完全正确的。

有个别代表曾试图讲清党内盲动主义情绪散布的原因。例如，一位直隶代表认为盲动主义的原因在于党受到农民情绪的影响。“如果党不是在农民当中，而是在工人当中发展起来的，那么盲动主义可能不会流传这么广，因为城里的工人终归是觉悟高一些，谨慎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对的。这些盲动主义的倾向和情绪渗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它们不仅仅来自因前一段斗争感到绝望故铤而走险的农民群众，而且流氓无产阶级群众也以这种思想传染着共产党的个别队伍，第六次代表大会十分准确地指明了盲动主义倾向在理论上是怎样形成的和在实际中应怎样克服。

“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人要去进功〔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无往不是武装起义，否认日常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动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起义，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①

盲动主义倾向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它使中国共产党脱离正确的轨道而走上为时过早的、未经准备而注定要失败的行动的道路。党应当十分果断地克服那些失掉阶级的分子的影响，应当克服这种与无产阶级纪律和组织性相敌对的思想。当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应当利用流氓无产阶级群众，他们人数众多，没有出路，所以将起不小的作用。因为农民破产的过程不断发展，因为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4页。——原编者

失业日愈严重，这些流氓无产阶级群众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些群众是革命能力最大的后备力量，但是要领导他们，不要受他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无产阶级应当去带领他们，而不要做他们的尾巴，应该使流氓无产阶级的运动具有最大的组织性和阶级觉悟性。

中国革命面临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场革命应当消灭封建主义和打败国际帝国主义这个劲敌。某些同志表现了革命的急躁情绪，他们想，这个任务解决起来特别简单，——带上火柴，拿上两根棍子——帝国主义就消灭了，土地革命就完成了。实际上，在中国消灭封建制度，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一样，都要求最大限度地做好准备，动员广大群众，进行顽强的斗争，把千百万中国工农吸收到运动当中来。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无产阶级和农民方能摧毁阶级敌人的统治。

这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斥责盲动主义倾向的原因。党应该准备起义，没有别的出路去解决斗争中的各阶级间的矛盾。没有革命行动，不用武力去推翻反动政权，任何一项革命任务都不可能得以实施。但在目前形势下，在全中国范围内，党只应该去宣传起义的口号，在总的形势改变之前，不将这些口号转变为实际行动的口号。

10. 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党内的不正确态度

现在我们看看代表大会针对几种不正确态度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做出的那些决议。这些不正确的态度在许多地方不仅存在于党和工人阶级中间，而且存在在共产党内部。在这方面湖南省一位代表的发言很说明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党内现在形成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特别严重的不足之处。他说：“如果某些同志犯了错误，那么上级机关并不想改正他们的错误，而是干脆把他们杀死或枪

毙。我举几个例子。二月份，在一次大规模暴动之后，有一个大地主出身的女共产党员被枪毙了。她是个共产党员，我们的一个好同志，北伐以后她在我们省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党员，可是因为她出身地主家庭，就把她枪毙了”。接着，这个农民又讲述他如何从区委接到再枪毙两个党员的命令。他表示抗议，区委书记回答说，你怕枪毙吗？如果怕，那你自己就是机会主义者。从这次大会的资料还可以看出，一些同志曾试图借助武力解决汕头组织内各派的分歧，企图将持有不同想法的人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以解决党内争议和分歧。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内类似的相互关系是不能允许的。党应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应当克服意气用事和派别主义成分，应当最大限度地实行党内民主的原则，对一切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实行集体讨论的原则。党无论如何不能对无意犯有错误或就争论问题坚持个人意见的同志进行肉体上的迫害。

代表大会同时指出，必须克服对待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这种作风表现为党对群众发号施令，而不领导群众，在许多地方党用强迫的办法代替说服的办法。如果说国民党企图向群众发号施令以阻止群众运动，那么共产党人持枪威胁强迫工人罢工或参加武装行动的情况则是常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报告中把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尖锐。他对于党脱离工人阶级的危险性，对形成这些关系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说那时党就将象雇主，而工人阶级就成了被使唤的。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其前提是把工农中甚至最落后的队伍也吸收到解放运动中来。党应该唤醒阶级自觉，应该说服和发动劳动群众去斗争。使用命令主义的办法，只能使党在实现争取群众的任务时遇到困难。

11. 机会主义复活的危险性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了克服盲动主义倾向和克服因不正确理

解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而出现的各种倾向的必要性，同时大会强调了机会主义现象复萌的危险性。下面的两个因素使以往的机会主义的摇摆现象可能再次产生。这就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愿意把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广大的阶层吸收过来参加斗争；另一方面，如我们上面已说过的，为了不混淆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基本矛盾，党认为现在就激化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是为时过早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危险性，即遇到贫农与富农发生冲突时，或在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害发生冲突时，党组织应付不了局面，故为了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继续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阵营内，就会再行缓和工人和贫农的阶级要求，再行压抑和调和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强调，尽管无产阶级和农民愿意吸收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斗争，但终归“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发生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方面，而反对剥削者阶级”。^①

近来重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危险就更为明显了。因领导同志前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为削弱。这有以下情况可资说明。不久前中共中央发出的第54号通告，在十七条口号中我们就能见到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气味的要求。第一，提出了恢复群众运动的要求。关于恢复群众运动问题的措词，说明这是针对国民党的。群众不会把运动停下来。在反动派的压力下，运动的形式和运动的广度改变了，但运动并没有消声匿迹。国民党确实是禁止群众运动的。如果为了把国民党作为群众运动的敌人再次予以揭露而向它提出它不可能实现的恢复群众运动的要求，那是妥当的。但是国民党在这方面已充分地自我揭露了。向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能是在劳动群众中制造幻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5页。——原编者

想,使他们以为还有可能在国民党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群众运动。关于开展群众运动并使其具有一定合法性的口号,不应当向国民党提出,而应直接向群众提出。

第二个口号称为由群众掌握政权。通告内接着就说破了这个口号的内容:“农村的、县城的、城市的政府由工人、农民、士兵、商人、学生和贫民代表选举”。^①显然,中国同志以这个形式提出与组织政权有关的口号时,是想用南京当政者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谈话与自己民主政权的理解相对照。但是他们自己却取消了苏维埃的口号,对这个口号的宣传,我们一分钟也不能放弃。这件通告的作者把所宣传的政权的基础扩大了,因此用民主政府取代苏维埃的口号就更加危险。中国同志显然对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幻想,没有考虑到已发展很深的阶级力量的分化,所以他们预想组织一个能代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利益的政权。

忘掉苏维埃的口号,其内部含义就在这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这种十分荒谬的做法,必然引起背离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错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党应该得到足够的诫示。

现在,我们把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在克服有害倾向中的基本任务做一个总结。基本任务是争取群众。对于那些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轨道而走上邪路的一系列危险趋势和倾向,中国共产党革除和克服得越是迅速,党的基本任务就完成得越快。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就是对革命性质、革命各个别阶段的性质,有一个明白、确切的认识,就是要正确估价运动的现阶段和由此而提出的基本策略任务。另一方面,争取群众的斗争越是顺利地得以实现,盲动主义的倾向就克服得越快,对待工农群众的国民党式的作法也就克服得越快。党应该机警地注视,不使过去导致中

^① 参见《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1928年6月21日)。——原编者

国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重现。

我们认为，提出了这些任务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助于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党用前一段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丰富了自己，它一定能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沿着宽阔的革命道路去夺取新的决定性的胜利。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8年第39、40期合刊，第9-27页。

李玉贞译 郑 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 土地问题（节录）

（1928年10月）

米 夫

一、土地问题

第六次代表大会十分注意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改革土地关系，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的土地革命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但是，代表大会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弄清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要明确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任务，就必须对限制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羁绊加以分析。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完全弄清楚。我们记得，早在1912年列宁就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那篇著名文章中指出，封建主义是引起中国革命的经济原因。他写道：“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①

这种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说法，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因为中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原编者

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它必然这样走。”^①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消灭土地制度中一切中世纪残余的任务，应当根据六大决议实现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推翻农村中的地主豪绅官僚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武装去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中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政权。

第二、立即无偿没收地主的地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

第三、祠堂、寺庙、教堂和其他的公共土地以及该地区的荒田沙地，都归农民代表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各地农民使用。

第六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还规定，留有一部分土地和垦殖用地，宣布一切高利贷借约概作无效，销毁一切田契和其他剥削契约，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政权所颁布的捐税，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决议中还规定了在国家帮助农业经济方面所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办理土地工程；改良扩充水利；防御天灾；办理移民事业；办理低息信贷；组织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统一币制等等。

与此同时，六大规定：“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②

最后，我们要指出，六大决议向党提出的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去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告诫他们以及全

^① 《中国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决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5册，第327页。此处俄译文与中文有出入，现照录中文。——原译者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决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5册，第328页。——原编者

体贫苦农民，放弃那种无法消除群众贫困的小生产幻想。党应当宣传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铲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和结束劳动群众的贫困。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主要决定就是如此。

二、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定

现在，我们来研究中共六大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如果说土地决议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一个最迫切问题上的总战略方针，那么，讨论农民运动问题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党在解放运动新时期所面临的具体策略课题。中国共产党应当总结近几年来极其丰富的农民斗争经验，应当研究农民运动发展的全部特点。近几年，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普遍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农业则表现得更甚。农民赤贫化过程加快了，而且规模惊人。军阀战争频仍，农民群众状况极端恶化。

随着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参加了解放斗争，这个斗争的性质更加激烈。革命斗争地区扩大了，农民的要求提高了，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更尖锐了。甚至在国民党叛变，资产阶级跑进反动阵营的初期，农民运动也没有削弱。相反地，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在一些地方还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许多地区，农民们夺取和分配了地主土地，杀死土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当六大开幕前夕，中国总的形势不利于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破坏了革命中心，农民斗争的发展受到压抑，在农民群众缺乏组织和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农民运动变成分散的、游击性质的斗争。

由于农民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农村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界限。的确，农民运动的经验表明，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地主的斗争中，农民基本组成了统一战线。但在土地革命发展过程中，贫

苦农民和中国农村的富裕阶层之间出现了阶级矛盾。为此，党应当解决工人阶级同中国农民各阶层的关系问题。六大决议提出的党的策略路线为下述公式：“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①同时指出，为了不抹杀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这个基本矛盾，在现阶段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合时宜的。

熟悉列宁关于在民主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提法的读者，对中共六大决议可能感到有点惊讶。大家知道，列宁提出过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问题。在中国，由于某些特殊情况，这个提法要做一点修改，在俄国，富农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他们同利用封建剥削制度建立自己经济实力的地主阶级是对立的。但在中国，富农比较少地采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是比较多地代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中国富农在多数情况下是小地主，他们对中国农民基本群众采用更苛刻、更残酷的剥削形式。因此，必须修改列宁的提法，使之适应中国条件。

在富农尚未丧失革命的可能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应当尽力吸收富农参加农民反对军阀、地主、豪绅的共同斗争。当富农立场动摇时，中国共产党应当提出中立富裕阶层的任务，而不应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最后，如果富农已成为反动势力，共产党就应当把反对军阀、地主和其他封建势力代表的斗争同反对富农的斗争结合起来。既然贫农和中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群众和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就应当使中国农村的这些阶层同工人阶级建立巩固的同盟，以保证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根据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所做出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就是如此，现在阐述党对平分土地口号的态度。我们已经指出，第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原编者

六大代表大会提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将其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口号做为当前迫切的任务。而且，我们还指出，平分一切土地，其中包括农民的土地，特别是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可能触犯广大的中农利益，现在不应做为首要口号提出。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如果这一口号为多数的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①第六次代表大会还强调，必须对这个口号持批评态度，不支持与这个口号有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幻想。

六大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的部分要求和这些要求与中共土地纲领的宣传相结合的问题。六大做出决定：“在运动薄弱的区域或暂时失败的区域，党应当赞助农民所提出各种部分的要求（减租减息，抗捐等），并领导这些运动发展到较高的程度。”^②

六大指出，农民运动能否进一步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农民协会的巩固和扩大，因为农民协会能团结千百万农民群众，并使之做好准备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党应当在通过农民协会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时，加强对“红枪会”和“大刀会”一类群众性农民组织的工作，这些组织在多数情况下受地主、军阀的影响，但却能在中国农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不小的作用。依据六大决议，共产党在加强对农民组织的工作时，应特别重视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农业无产阶级中间的工作。党应当考虑妇女和青年在农民运动中的重大作用，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吸引到农民革命组织中来。在贯彻党的加强农民组织的整个方针的时候，应坚持不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决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5册，第329页。——原编者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5册，第330页。——原编者

懈地巩固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作用。

六大十分注意讨论游击斗争的经验问题，指出必须克服以往游击斗争中出现的许多缺点。这些经验说明，游击行动经常与农民群众没有足够和必要的联系。群众常常持旁观态度，不了解游击行动的任务，因而认为这些行动纯属土匪行动。另一方面，游击运动有毁坏城市和无目的烧杀等倾向。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游击斗争的分散性和缺乏组织性，必不可免遭到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六大决议在最大限度组织和准备农民武装斗争方面的基础。这些决议的实质就是支持、加强和团结农民游击运动。党应当尽力把这个运动纳入有组织地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轨道。党应当把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协调起来。党应当根据群众要求，在他们最大限度地参加解放斗争的基础上，保证农民运动，其中包括游击运动的发展。在游击运动控制的地区，党应当力争建立工农红军正规部队。“这方面的成功可能成为革命新高潮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六大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主要决议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决议考虑了以往斗争的经验，这就是在农民斗争的新的特殊环境中提出的对于所有亟待解决问题的回答。这些决议将有利于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一步团结和动员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事业。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8年
第43期，第38—47页。
王福曾译 郑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①

(1944年3月3日、4日)

周恩来

同志们：近半年来，大家都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在学习大革命时期的文件中，大家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看法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些我已经忘记。现在在延安还有十个同志参加过“六大”，我同有些同志谈了一下，不过没有都找到一起对一对。我分六部分来讲，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

^① 这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

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

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到“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与第三党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拼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

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内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吴铁城、马超骏、古应芬。刺廖仲恺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

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孙文主义学会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品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

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三、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像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

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

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

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对“八七”会议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第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

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第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

自己的力量。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拚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琛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

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四、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

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〇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〇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

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

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但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

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五、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的，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

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像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他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当时提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对的，并且写在决议上了。可是如何去争取？是组织赤色工会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还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六大”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后来在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上，决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是错误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是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人组织差不多都被摧垮了，即使有留下来的工会，会员数量与党员差不多，已经很少。当时存在的还有这样几种工会：一种是原来的工会，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了记，成为合法的组织；一种是原来的工会，没有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记，也还存在；还有一种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中有的还是有群众的，再去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

经很小，应该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确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与中国党内对工人运动“左”的倾向和职工国际一贯的“左”倾是有关系的，对后来党的职工运动过左起了很大影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农民运动。“六大”写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两个决议。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

第四，关于苏维埃问题。从决议中看不出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第五，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都是要反对的。但“六大”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看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第六，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权主义斗争，“六大”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第七，关于军事运动。“六大”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

是一个偏向。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官是反动的。但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六、“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一) 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影响。“六大”是直接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翟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

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翟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二）代表成份。今天看来是不很健全的。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份。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

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的活动。

这是三个主要的弱点。代表成份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加之在领导上又没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

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但当时对选举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等得票是很多的，而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等犯过错误的，票数最少。

(三)大会时间。大会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讨论问题。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对许多决议的讨论也不充分，只是所谓原则通过交委员会在文字上修改。如果时间多一点，可能好些。

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

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六大”正确的东西属于这方面。“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言（节录）^①

（1928年7—9月）

第二次会议（7月18日） 布哈林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

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问题

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中国执行中的错误

在转入一般地分析我们的基本任务之前，我想再谈一下殖民地运动问题。我要谈谈中国和印度，但是只限于讲几点意见，因为这些问题在讨论纲领时，特别是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还要部分地提到。

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我们和我们的反对派有过范围十分广泛的原则性争论。现在，我们可以再次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是事实。这次失败是否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错误策略有关系？也许，与资产阶级缔结联盟实际上是不明智的，也许，这是我们的

^① 本次代表大会的资料，是根据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编译的，文末所注页码是原书页码。——原编译者

一个根本失策之处，是这个基本的错误又引出所有其他错误，从而逐渐地、一步步地导致中国无产阶级失败的吗？这个问题，我们大概要在大会专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十分详尽地加以分析，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极其认真地加以阐述和探讨。但是，我想，分析一定会证明，错误完全不在这里。

整个说来，错误并不在于基本的策略方针，而在于政治行动和中国实际执行的具体路线。第一，在中国革命初期，即与国民党合作时期，错误在于我们党缺乏独立性，在于我们党对国民党批评不力。我们党居然由同盟者变成国民党的附庸。第二，我们中国党不了解客观形势的变化，不了解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因而铸成错误。例如，某些时候可以和民族革命资产阶级一起走，但在某一阶段又应当预见到行将发生的变化，对此应有所准备。在缔结任何联盟时，都应当看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以便准备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各阶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看到，中共的中央委员会，部分地还有我们驻中国的代表，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没有看清这个转折，因此，当以往的同盟者变成凶恶的仇敌时，没有及时应变。第三，因此，我们的党有时就起了阻碍群众运动、阻碍土地革命和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这些错误是难以挽救的，当然也就促成了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在屡遭挫折之后，党纠正了、而且相当果断地纠正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这一次同往常一样，有些同志又陷入另一极端；他们没有充分准备就仓促从事起义，暴露出明显的盲动主义倾向，这是低劣的冒险行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策略上的转变，但是在方向上不同于西欧各党。

如果运用“左”、“右”之类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法国和英国是“向左”转，而中国是“向右”转。但是，要事先声明，我不是这种术语的崇拜者。术语是蹩脚的，往往不能说明问题。分析并不是为了说明策略“左的”或“右的”特性，而是说明策略正确与否，是否符合客观形势。

中国革命高潮必然到来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高峰时期已经终结，以联合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新的伟大革命高潮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已经开始。

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以往斗争的全部经验证明，没有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现在已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各个击破地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为了实现这个必要的任务，党就得由尽快起义的立场转变到有所准备的立场，即转变到最有胜利把握地准备群众起义的立场。我认为，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大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我希望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符合这个决议的精神。

（同上，第 46—48 页）

第三次会议（7 月 19 日） 布哈林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续）

五、我们的基本任务和缺点

要多一点国际主义观念

……但是，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观念实在太少了，不适应于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当前任务。最近几年的经验已暴露了这种缺点，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一点完全公开讲出来。同时，要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这才是克服这个缺点的重要前提。

在英国罢工期间，我们就已肯定认为，许多党未曾尽力支持

英国工人阶级，这一点已记入共产国际扩大全会的决议中。除少数几个党，首先是联共（布）以外，其余所有的党给予英国无产阶级的援助，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国事变期间，也出现了几乎是同样的情况。保卫中国革命的国际运动的规模，与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和各党的革命职责不完全相称。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至于报刊方面，也没有充分报道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中国工农运动布尔什维克化的内容。没有见到这方面有过多多少少深入而系统的工作，没有开展相当广泛的政治运动。曾经想方设法来克服这些缺点，但又缺乏坚持不懈、有条不紊的工作，结果各党在重大运动期间也就未免穷于应付。

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

……这里出现一个战争问题。几乎所有党内问题，其中包括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问题，都要牵连到这个问题。资本的进攻和资产阶级备战有密切关系，这是由于需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稳定国内环境，创造对付工人的可靠条件等情况引起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一些日常问题出发，同时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共同口号和任务。一定的政策和策略艺术就在这里。这就是提出重大政治问题的依据，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艺术就在这里：从日常琐事出发，提出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艺术，如果我们不能应付裕如地对待重大国际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防止战争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应该了解，并写在我们的决议上。战争问题，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问题——这是一些核心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有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是各党、即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中心任务。

（同上，第49—51页）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

现在我来谈另一个问题——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分析大体上还算正确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谈谈秘密工作了，就应该提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任务了。至于谈到秘密工作，在许多国家中，我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波兰有，巴尔干各国有，意大利有，现在日本也有，而且中国有更丰富的经验。有些党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对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件大事。要知道，同志们，目前我们党所遭到的进攻正有增无已，我们的法国兄弟党已然感到迫在眉睫。对我们党的攻击必将日益加剧。毫无疑问，在战争爆发前夕，甚至在这之前的若干时间内，一系列的特别法必将向我们党猛袭而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应当预见到这个情况……

（同上，第56—57页）

六、共产国际中的倾向

右倾和“左”倾。右倾是主要危险

同志们，现在谈谈共产国际中的各种倾向。不久前，共产国际中的主要危险，来自所谓“极左分子”，他们企图另建国际组织。在联共（布）党内反对派被击败以后，这种企图随之化为乌有了。但是，以所谓“列宁崩得派”的垮台为其顶点的反对派，其覆灭过程本身却使我们得出某些结论。我们肯定地说，托洛茨基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有的同志从灵魂深处就认为，这种说法是过分夸大了。但是列宁崩得派的历史表明，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已经跑到社会民主党人那边去了。当时，这件事是偶然的吗？不，这并非偶然现象。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极左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如果通观共产国际整体，则当前右倾是主要危险。我所分析的稳定时期，议会主义残余，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工会工作的某些特点——这些都是构成这种危险的主要因

素。这种危险在各个党内有各自的形式。它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为一心一意地向往合法化，害怕党打破资产阶级合法化的框子，甚至在非要冲出这个框子不可的时候，亦然如此，对资产阶级的法律俯首听命。右倾还表现在忽视加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上，比如，在罢工时期，应该举行罢工的地方却不举行罢工。这个倾向还表现在对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路线上，即对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斗争不力，还表现在党缺乏国际主义精神上。我们看到，甚至一些基本上执行正确方针的党，也把国际主义义务置诸脑后，如同过去对待中国革命那样，这毫无疑问是货真价实的右倾。这种倾向在工会工作中也有所表现，在那里，一般的工会纪律有时竟高于我们党的纪律。我再谈谈其他各种表现形式。由于不了解党和工会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有时党居然以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身份去直接指挥群众，而不采取说服方法，不去做细致的工作。还流露出某些根本违背统一战线策略的倾向。

中国在愚蠢之极的右倾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左”倾。目前“左”倾具有盲动情绪、盲动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说来，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是右比“左”更甚。……

(同上，第58—59页)

许勒作关于青年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

殖民地的青年运动

……

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我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工作经验。

首先谈中国。总起来说，在那里，我们在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曾有过极为良好的实际经验。中国共青团经历了蓬勃发展的过程。我举几个事实为证。

共青团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于1920年在中国建立，最初只代表人数很少的小组。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时，已发展到二千九百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九是大学生。后来，1927年7月达到三万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八是大学生。由此可见，团员数目逐年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而青年工人和农民的比例提高了。1927年7月，在所谓武汉时期，我们的组织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取得某种合法权利。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明当时中国共青团的发展情况。然而，我觉得下面的数字一定会使大家感到惊讶。1927年7月，我们曾有过三万五千名团员。以后，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时期，成千上万的同志被处死、砍头、溺杀。我们的组织成了极端秘密的组织，人数自然也就减少了。1927年8月，团员人数降到一万五千人。有些同志甚至认为，当时团员人数不足一万人。不过，无论如何也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1927年11月，共青团组织又增至二万人。而在1928年3月，在继续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国组织竟达到三万三千人。（掌声）广东省组织还不计算在这三万三千人之内。在这个省的一些地区，我们建立了革命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地方自治机关，还有四万五千名共青团员。由此可知，我们在中国就有七万多名团员。但是，即使不把广东的四万五千名共青团员计算在内，在当前中国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下，这里居然能有三万三千名年青的共产主义者，这乃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这说明，甚至在极严格的秘密条件下，我们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仍有很大可能争取青年。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七万名中国共青团员中间有多少大学生呢？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农民。这就是

中国共青团数量上的增长情况。

现在再谈谈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问题。我只想简要地说明共青团在中国革命时期的立场。北伐时,共青团完全支持党的政策。共青团和党站在一起支持北伐,它和党没有重大分歧。但是,早在北伐末期,即1927年初,在党的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国民政府的错误和偏向暴露出来以后,共青团就提出了警告。1927年3月,工人占领上海时,以及在反对蒋介石叛变的斗争中,共青团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表现得非常英勇,当然,它毕竟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一切都决定于党的领导。在武汉,我们已看出共青团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这个时期,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青团的指示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能以为,中国远离这里,中国共青团都是一切自作主张,只不过将情况上报青年共产国际。不言而喻,工作的重担落在共青团的肩上。但是,我们与中国共青团的密切联系却从未中断过。我们在中国有自己的代表,中国共青团也有代表驻在我们这里。因而,特别是在所谓武汉时期,有过极其密切的合作。就在这个时期,共青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为一方,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

当中国共青团看到党的领导日益屈从于国民党、屈从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时候,共青团和我们的代表就提出警告,以应付行将发生的背叛,而且共青团还发表了相应的声明。当时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共青团的警告,对它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的革命政策所抱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起初,陈独秀声称,根本用不着共青团过问。后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本人要向政府进言,不仅没给他发言机会,而且使共青团旗帜鲜明的革命呼声,在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所设置的泥潭中淹没无闻。这种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绝不是党和共青团密切合作造成的,而是相反。它们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我们有权说,在武汉时期末期,中国共青团不仅没有参与中国党领导上的背叛政策及投降活动,而且相反,它

竭尽全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当共产国际着手清洗党的领导机构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时，共青团也起了巨大作用。共青团不仅提供了政治上的帮助，而且还向党提供新生力量，协助充实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干部和领导。

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中国共青团的错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年青的中国共青团缺乏经验，共青团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另一极端。再者，不能不指出“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两个极端倾向的表现。我们所理解的“先锋主义”，就是不承认党的领导，企图对有组织的工人实行政治领导，从而有取代党的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已无可救药，党已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共青团应当完全担负起整个的领导。我们谴责了、而且也克服了这种偏向。至于“盲动主义”，这不是共青团所独有的错误，而是最近期间，即这年冬天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犯的错误的。这个错误显然是危险的，但是现在也克服了。

最后，我们有权指出中国共青团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它由学生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运动，由年青的、缺乏经验的小组成长为组织严密的共青团，由人数不多的小组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并在犯了种种错误和过失之后掌握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由中国的经验中取得重要教训，就是说，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在殖民地也同样能够建立起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这个问题以前仅仅是讨论的课题，而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我们看到，在殖民地可能建立共青团，而它甚至在非法存在的条件下，也可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同时，我还想谈谈国民党青年组织的情况。早在1925年，就有几个国民党人提出建立国民党青年组织的建议。当时，中国共青团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机会主义分子图谋建立一个机会主义组织，以抵消共产党员在青年运动中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也讨论过，而且有些同志认为这种组织有助于更

加广泛地吸收青年。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最后决定是由中国共青团自己去做的，即继续坚持反对立场。我们现在可以说，当时不同意建立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组织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好处，而只会有害处。它势必很快就成为国民党机会主义领导手中的工具，用以在殖民地国家最棘手的青年运动问题上和我们作对。同时，我们现在已发展成为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性联盟，这多多少少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国民党组织的缘故。

(同上，第 77—79 页)

第十次会议（7 月 26 日）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加藤（日本）：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防止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机、捍卫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是当前世界无产阶级的三大任务。日本党代表团不仅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而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积极活动，我们党也完全认识到自己在执行上述任务中所承担的特殊责任。

年青的日本资本主义产生伊始就具有军国主义性质。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裂》一文中评述日本帝国主义时说过，在侵略中国的军事政策上，军事垄断取代了金融资本垄断。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十分发达，国家资本达三十五亿日元，也就是说，占私人资本（七十亿日元）的一半。从去年 4 月爆发财政危机以来，私人大资本的集中加剧了，大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直接联盟更加巩固了，它形成了军事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在政治上只能导致战争。此外，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手里的国家政权，越来越具有反动性，而国会越来越成为欺骗和压迫人民的机构。工

人阶级力求废除君主制度，因为日本天皇又扮演了新的角色，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打算把清朝的废帝溥仪扶上满洲国的宝座，以代替被害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

谈谈日本干涉中国的问题。今年3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日本共产党发动了袭击，把成千上万的工农积极分子投入监狱。他们把五万五千名士兵和五十五艘军舰派往中国，将满洲和山东省置于他们的军事统治之下，实际上已把这两个地区变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这样来扼杀中国革命，并向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自1928年春起，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狼狈为好，图谋破坏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日本和美国的对抗尖锐化了。日本撕下了“对苏友好”的假面具。

日本帝国主义确实是亚洲的反动堡垒。日本共产党的国际义务，就是要使中国不留一名日本士兵，使日本资产阶级干涉苏联的企图化为泡影，并且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日本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

在日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共产党就不可能壮大起来。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沆瀣一气蓄谋入侵中国，挑动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在日本社会民主党内有三派。一部分人拥戴铃木、安部等人，依靠右翼工人组织和社会民主派。他们和国际劳工局（阿尔贝·托马）有密切联系。在中国，他们和蒋介石配合默契，奢想建立泛亚洲国际。这是一些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和沙文主义者。

第二部分人是所谓中间派群众组织的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与群众完全相反，在共产党员大批被捕后群众向左转时，却急忙向右转。

第三部分人是脱离共产党的取消派。他们是：山川均、荒畑塞村、土界利彦、猪俣津南雄等。他们责备共产党在群众面前公开

出现是出于群众的压力。他们当然会投靠社会民主党。日本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比较公开地以工贼、战争挑拨者、保皇派的面目出现，而且支持干涉中国。

结合共产党面临的国际任务，应当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土地革命问题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在日本，虽则含义不同，但农民问题也有着重大意义。日本资产阶级在干涉山东以后，在农村大肆进行沙文主义宣传。它企图在农民中间散布幻想，似乎干涉中国有助于解决日本土地问题。通过革命的群众运动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应当在日本农村不遗余力地宣传无偿没收大地产。我们深信，特别是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强大的资产阶级军队的国家里，把军队中的工作和农村中的工作结合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使命。

(同上，第 285—287 页)

第十二次会议 (7 月 27 日)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斯特拉霍夫(化名，中国)：同志们，因为纲领和殖民地问题还要专门讨论，我今天只对总提纲简要地提点意见。先谈国际性问题，再谈中国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有一系列重要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知道，中国人一般都有点“民族局限性”的缺点，虽然中国共产党内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知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因此，我只是提出一些国际问题。我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但是，仍想谈谈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的形势。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我们面临

着战争危机、反苏战争的危机以及干涉中国革命的危机。

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

农民的作用，不论在东方和殖民地国家，还是在欧洲国家，对将来的战争都是举足轻重的，一般说，不会亚于农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1914—1918年）所曾起过的作用。这个问题同共产国际的整个策略问题，即同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策略问题有关。许多同志，特别是罗马尼亚、波斯、保加利亚等代表团的代表们已经提及这一点。我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建议在提纲中更确切、更清楚地阐述这个问题。

至于殖民地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清楚的。现在，殖民地农民广泛赤贫化，许多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农民起义频仍，欧洲各国国家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这种有组织的资本，必将变本加厉地剥削本国的、特别是殖民地的农民。如果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那么殖民地和许多东方国家，即所谓农业国，恰恰就是原料产地。由于殖民地国家中的土地逐步兼并到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农民乃丧失土地，东方各国的土地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我们亲眼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中心课题，是目前时期革命的主要内容。如果发生战争，尤其是太平洋发生战争，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农民就一定会表达自己的要求。

现在我谈提纲的第三点。这里对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作了精彩的分析。我认为，似乎应该更详细地分析所谓太平洋问题。现在大家都认为，或者说，最低限度倾向于这种看法，一旦战争发

生，远东将会起到第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年）巴尔干各国同样的作用。太平洋问题涉及到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印度。这里是世界矛盾的总汇。由于日本干涉济南，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虽则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尚未发生，但是，日本、英国，现在又是美国（美国支持蒋介石）所操纵的中国军阀间的混战已在进行。我认为，这就是应该详细剖析的太平洋矛盾的问题和课题，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党还很年青，不具备国际经验，还不能独自剖析具有这样重大国际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意义，它不仅对殖民地、而且对欧洲和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是当今世界霸主，它将在太平洋战争中起主要作用。

中国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会期间，未曾收到有关国际问题的任何决议。我们只收到最近一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而那也已是会后两个月才收到的。我们代表团在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时，对于其中提到法国党内对第九次全会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持有某些反对意见这一点，我们不了解内情。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些过去从未能找到的资料。这样我们才碰到了直接涉及中国的远东问题或太平洋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在大会上提出来，还需要通过书籍或小册子广为传播。如果不能在大会上提出，那么今后执委会就应当向所有与太平洋问题和印度问题有关的国家发出指示。

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不错，提纲中提到了战争，提到了保卫革命，并且还有一个特殊问题——保卫苏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当时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承认苏联。只有在中国革命蓬勃发展、开始威胁英国之后，英国才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而这是不久前，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提纲中还是应该

提出第三时期，但是，要更详尽、更准确地指出，列强何以在现在认真准备反苏战争，而不在我们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等等。这些问题应当有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对于那些缺乏国际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各党尤为必要。

现在我再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姑且不谈我们领导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我只是要说，这次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强大。帝国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国内反革命力量的实际组织者。1927年初，中国革命战争高潮时期，没有得到西方（如德、英等国）无产阶级的强大革命运动的配合。印尼和印度也未发生殖民地起义。即使当时发生这种情况，其规模也不足以造成对我们的声援，就更不必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上升的形势，而英国总罢工已是失败的局面了。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向我们每个兄弟党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即在第三时期，可能发生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时期，西方和东方要协调一致地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其次，必须指出，由于阶级力量经历了重大改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现在更加增强了。我们多次谈到的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广州起义以后，中国革命抛弃了任何右的和左的国民党的旗帜，现在正在并永远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知道，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呈现出消沉情绪，当然，目前它已不像城市工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的恐怖时期那样突出地令人感觉出来。但是，农民自1927年秋开始到现在，从没有停止过地方性的起义。他们建立的区、乡苏维埃有一百三十个。其中许多遭到反动派破坏，但是也有一些保存下来，或又重新建立起来。保存下来的苏维埃，驱逐了本地的地主豪绅之流。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的城市起义（如广州起义）不

能取胜，如果胜利又得不到巩固，那么中国革命能否（哪怕是在几个省内）胜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因此就要求我们加紧做好工会的群众工作，以使工人运动恢复元气，以使中国工人阶级能够真正领导农民。关于我们的错误，现在我想讲几点看法。我们不去计较别人要对我们的错误承担什么责任，我们也不想文过饰非。对我们至关紧要的是，应该弄清楚我们的错误究竟在哪里。问题就在于，在武汉时期，我们对待农民的策略，以及我们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人插话：对！）如果过去我们说过，甚至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是必要的，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变成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期，本来是联合小资产阶级，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却变成了小资产阶级。再者，也不能说，既然我们应当和全体农民建立联盟，或更准确地说，和农民的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建立联盟，那么我们就应该变成农民。我们曾经有过，或许直到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既然农民群众要求平分土地，那么我们党，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应当同意这种纲领。他们真以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要贯彻这条路线，我们就得有独立的阶级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领导中国农民。谁都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已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阶级，完全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依然是革命的动力。革命斗争的矛头不仅是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要指向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不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不推翻国民党政权，不打倒一切军阀，不完成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解放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力争在城市中建立立脚点，争取群众，为新的高潮做好准备，因为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任何途径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我只是要说，

目前中国反动政权保持“稳定”是可能的，其他一切情况也都是可能的，但是，要想使中国资产队级（即使有美国资本的帮助）完成中国的土地改革，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的形势是，赤贫化在加紧发展。在南方，各地农民起义屡有发生，有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农会。在北方，运动具有原始的、半宗教的农民战争形式（北方农民起事，多数被富农、甚至小地主操纵，他们暂时也反对军阀）。农民问题，就谈这些。士兵问题不可忽视。士兵也就是破产的农民，他们既不能到工厂做工，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就是这些农民和士兵——汪洋大海般的群众，现在每天都在威胁着土豪劣绅，使他们丢魂丧魄。只有彻底消灭农民和士兵，才可言消灭革命。但是，当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挺身起义的时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挡得住如此广大群众的。显然，由于中国的这种形势，军阀混战必将持续下去，必将成为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产物。但是，如果有国际背景的军阀混战继续打下去，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和军阀齐心协力仍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即使是用改良方法去解决农民问题，那么这一切还不意味着目前的中国革命已然胜利在望。不，我们的敌人十分强大，他们虽然彼此火并，但同时又组成统一战线镇压我们，他们用白色恐怖，用你们西方同志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扼杀我们的运动。我们这里还在奢谈法西斯主义是何许物，工会官僚和国家官僚的结合又是何许物，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我们太熟悉了。中国之所谓工会，本来就是遵奉国民党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类的旨意建立的。它们干的是白色恐怖勾当，而我们所知道的意大利做的那些“小事”，它们是决不干的。它们在杀人，它们在杀工人，在广州三天之内就杀了五千七百名工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杀人，而是施展亚细亚式的残暴手段。我无法用俄语来表达这种恐怖，因为对应的汉语词是难以翻译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我们必须

工作。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准备新的高潮，因为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因此，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对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评价，是正确的。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这个任务也就是为今后必将出现的新高潮，即为准备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在新高潮必将到来的情况下，我们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党在必要时机做好起义准备，因为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手段，才能打倒整个国民党败类。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完成和解决中国革命任务。我认为，提纲应当明确规定我们的任务，若是笼统地谈工农的群众工作问题，那这个任务对一切时代、对一切党都是适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曾指出，现在必须明确规定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必须强调指出，现在，在两个革命浪潮之间的时期内，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党的责无旁贷的、刻不容缓的总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或者起码在较大范围内，准备必胜的、有组织的武装起义。

因此，在工人、农民和工会中间做群众工作、巩固党等等，乃是头等重要任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清形势。

最后，我谈谈倾向问题。有人认为，如果说西方各国存在着右倾危险，那么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就有“左”倾盲动主义的危险。不错，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动主义危险。大家可以看到，倍受压迫和贫困破产的广大群众，往往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我们党应当坚持布尔什维克路线，领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不是跟在他们后面跑。但是，在济南事件以后，当城市反帝运动开始有些活跃，小资产阶级群众趋向“左”倾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发生新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抬头。阐述这个问题的文件，是我们在听过布哈林同志报告之后收到的。我们的文件指出，近来在6月底，有些同志认为，现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应该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应该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还不止于此，

而且居然还通过党的组织作出了这样的决议。何谓恢复民众运动，大家昨天可能看到了《真理报》的报道，目前，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要求“恢复”或“重建”（两词汉语含义相同）民众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当国民党还革命的时候，它设有工人部、农民部和妇女部、民众运动委员会、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等形形色色的组织。现在，这些东西早已无影无踪了。广州起义以后，各种力量两极分化，国民党乃明令禁止“民众运动”，取缔了上述各部，而现在资本家、银行家和“第三党”，却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将要推翻他们，需要下点功夫美化和粉饰国民党制度，为其恐怖政策开脱罪责。“虽然我们搞反共的恐怖活动，但是你们不是看到我们开始组织工会了吗？”正是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恢复民众运动。可是，我们的同志却要提这种在工农队伍中产生幻想和造成混乱的口号。我们应当号召群众起来争取自由，而不是“号召”国民党恢复它的“民众运动”。至于国民会议，这个问题大家是很清楚的。即使我们依旧不提苏维埃口号，难道能够不提武装起义问题，不提坚决战胜国民党和军阀问题，反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口号吗？不管召开什么名目的会议，现在一概不能提这个问题。召开这个会议的必然是军阀，而参加这个会议的必然是一切残渣败类、各式各样的“军阀走狗”。一切军阀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完全可能同时是某某“工会”的代表，但是，他们一定是李济琛、蒋介石或别的什么人委派的。现在我们决不能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的口号。否则，就可能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看来，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右的倾向。（有人插话：对！）

最后，我要说，我们指出新高潮的一些征兆，指出它的必然到来，决不是聊以自慰，而是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包括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力量。这不

是笑谈！必须指出，我们应该锤炼我们的党，应该动员整个共产国际，以准备迎接远东的革命高潮。

因此，我向大会呼吁，号召一切外国同志关注远东问题，并尽可能改进我们之间——中国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世界性的太平洋问题的重心之所在。今天我们在报上看到，英美正向满洲渗透。我们知道，日美英之间的矛盾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美国金融资本很可能企图借助于日本染指满洲、蒙古和华北。美日之间也可能爆发武装冲突。总而言之，我们共产国际各党对此应有充分准备。

(同上，第 390—396 页)

第十三次会议 (7 月 27 日)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李光(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中国革命不是偶然的。蒋介石早在一年以前，即 1926 年 3 月就打算叛变了。我们党曾经多次警告说，反革命事变已迫近，然而仅仅局限在口头上。党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因而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发生大屠杀时，陷于张惶失措的境地。4 月 15 日在广州、7 月 15 日在武汉，党也遭到猝不及防的袭击，党在当时实质上帮了国民党领导人的忙。党取消了工人纠察队和青少年组织，而且压制土地革命和长沙工农起义。党的政治局表现了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这就是当时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认为，共产国际代表有过错，但是，我们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也有错误。我们党当时的领袖陈独秀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一严重错误，因此，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指示。

1927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建立“工农”政府的决议。这条武装起义的路线当然是正确的。

武汉的同志们原拟在1927年8月30日举行起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他们更为周密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是直到9月10日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工作。几十万农民在浏阳和耒阳起义了。湖南省委不仅没有帮助起义者，相反地还破坏了起义，因为领导铁路工人工作的工会部反对铁路罢工，致使军阀得以迅速派出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但是，12月10日省委未经任何准备就举行了暴动。鄂东的负责同志并没有发动农民起义，借口说今年年景很好。不过，在12月份，一些共产党员曾试图发动起义，而且还打算在1928年1月再次举事。应该说，中央委员会纠正了这些“盲动”错误。

南昌起义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在于同志们没有土地纲领，没有吸引农民参加武装起义。

广东省的农民军队也曾动员起来举行起义，但是，这里也没有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党在汕头遭到失败后，海丰、陆丰、海南岛和广东其他地区的群众发动了武装起义。

此后，国民党加紧迫害，查封工会，废除劳资协议，逮捕和枪杀之事有增无已，汪精卫瓦解了同帝国主义坚持斗争达一年四个月之久的香港工人。

广州工人终于认清国民党左派也是军阀手中的工具。1927年4月至12月间，广州多次发生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广州工人的革命热情达于顶点。与此同时，爆发了张发奎（据认为属于国民党左派）和李济琛之间的军阀战争。工人们觉悟到必须摆脱开自己的反动的领导者，因而去年12月11日广州工人举行了起义，夺取了政权。这次起义使整个东方和全世界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印象。广州起义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坚信，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广州起义以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农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深入了。广州起义期间曾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盲动。

现在谈一谈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曾指出,中国革命现在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直到新的革命高潮出现之前,武装起义口号将是一种宣传口号。我们的任务如下:

一、加强反帝斗争,组织工农和小资产阶级;

二、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军队,以期在一省或数省夺取政权;

三、加强城市工会运动;

四、反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

我想再补充一点。我们的反帝工作开展得不够有力,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现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多多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土地革命在深入发展,它动摇着反动统治的基础,缩小着帝国主义的剥削范围。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应当力戒烧杀抢掠的错误。

组织工会运动是我党最重要任务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十分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且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在土地革命期间,必须逐步加强城市工人组织。有些错误不应再犯,如:工会干部随意发号施令决定罢工与否,又如在事先未征得群众同意就干出与群众鄙弃的法西斯工会搞联合之类的蠢事。必须彻底弄清楚工厂委员会的问题。还必须同轻率解释统一战线口号而造成的错误作斗争。

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千百万群众,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深入到他们中间去。我们应当寻求组织工人的新方法,培养积极的工会工作者。还必须划清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界限。

新的革命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滚滚而来，它向我们提出认真做好准备工作的任务。我们应当同盲动主义作斗争，我们应当知道，盲动的危险尚未根除。不久前在中国有人决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恢复群众性的国民党、争取言论自由之类的口号。

这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我们必须象反对盲动主义一样地同这种机会主义作斗争。

再谈一点关于国民党和“第三党”的问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我们应当知道，孙中山的所谓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我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加强居民中的一个阶级，而把其他一切阶级置于它的统治之下。“民权主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而有利于建立最反动的专政。“民生主义”的本质是改良主义的，会把工人引入歧途。这就是孙中山的主义。现在，就我们所知，国民党已归附于第二国际，这样它就完全肯定了自己的反动性质。

至于第三党，它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因此，我们对它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讲一点白色恐怖问题，白色恐怖使中国牺牲了三十一万工农和两万共产党员。它现在依然在中国逞凶，因此，我们必须与之展开最坚决的斗争。白色恐怖就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讯和杀人方法：电刑拷问、杀头、肢解人体等等。我们没有把这些材料在西方工人刊物上发表，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因而帝国主义就可在这点上有机可乘，混淆视听。

讲几句中国党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党应当多关心中国革命。它们还必须极其有力地组织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向中国派遣帝国主义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者所实行的白色恐怖。必须在这方面定出具体措施，建立各党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我已经说过，我们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状况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希望各兄弟党向我们多通情报。

(同上,第419—421页)

东巴尔(农民国际共产党党团):……农民国际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这个国家中的强大的农民运动完全是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在处理东方工作问题上有某些倾向妨碍着农民国际的工作。这是必须指出和坚决纠正的。对于这一切,我不拟多说,但是,这正是我们同一些正在进行群众性农民运动的国家联系薄弱的原因之一。应当说,在执行这个任务当中,农民国际党团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足够的关注。现在,国民党制度已暂时得到稳定,这就提出一个建立农民斗争合法形式的问题。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发展成为游击战争,被迫转入地下,因而极难动员农民群众和开展农民工作。我们认为,即使根据局部需要建立农民合法组织,也有助于我们保存干部,有助于重新联合被打散的农民协会,以便组织他们迎接未来的战斗。

……

(同上,第446—447页)

第十四次会议(7月28日)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张彪(中国):我们由于不懂外语,因而参加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和提纲颇感不便。

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出的基本路线。我的发言主要谈中国问题,我的任务是对中国现状作一简要叙述。

首先从山东省各次事件谈起。日本军队占领山东和满洲,派兵血腥镇压济南居民,这些事件说明了什么?这些事件说明,全世界帝国主义组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行动达到

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干涉的程度，达到了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领土的程度。

日本在武装干涉问题上如此胆大妄为，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中国革命的暂时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次叛变造成的，因而帝国主义才有可能大胆而长驱直入地占领山东乃至满洲。

其次是由于英美关系的变化。必须指出，英美联盟的关系已变为英美冲突。在这点上表现出，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与1921年华盛顿会议时的情况相比有某些削弱。另一方面，英日之间在中国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帝国主义强国在合伙瓜分中国领土：华南归英国，华北归日本，这就是日本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武力占领山东和满洲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华北的工农运动和反帝运动发展不力，不能阻止日本在华北推行侵略政策。与此同时，英国在华南，虽然没有实行公开占领，但已几乎是居于垄断地位。英国将军阎李济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因而就加强了它在华南的地位。美国当然感到难堪，不甘心就此罢手。

因此，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就加剧了、尖锐了。英日推行公开瓜分中国的政策，而美国则推行“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这个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美国企图通过所谓统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英合伙瓜分中国领土。但是，英国在华南、日本在华北有实现其剥削计划的雄厚基础。在这方面，美国未免相形见绌。要英国，特别是日本向美国稍作让步，使后者得以在中国加强自己的基础，这种可能性很小。

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都不会允许中国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府。这两个帝国主义强国力图把政府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使之成为它们各自独家的工具。另一方面，美国却希望有一个所谓的统一政府，以实现其在中国全国范围的剥削计划。

美国会不会除上述政策以外利用日本企业向中国输入资本呢？这种可能性一般说很小，因为日本在中国问题上不愿作美国手中的工具，不愿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剥削者，美英之间也是这样一种关系。

如果是这样，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那么要问：从中国国内形势看，这样统一的全国性政府能否长久地站住脚呢？不错，国民党据有北京和天津以后是壮大了。但是，随着这种壮大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阀间矛盾的扩大和加剧。如果说，国民党各派系军阀曾经有过共同的敌人——张作霖，那么后者失败以后，共同敌人的威胁已大大减弱了。

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将领会议上，军队裁员成了主要问题之一。最近，蒋介石的参谋长就裁减军队问题向南京政府报告称，中国现有正规军二百二十万人，满洲的军队还未计在内。根据蒋介石的参谋长的报告，军费年度开支达七亿二千万元，但是，中国全国的收入仅有四亿元。如果这四亿元全部充抵军事开支，尚缺三亿二千万元。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军事开支不止七亿二千万元，而全国的收入也不足四亿元。

国民党各派系军阀(他们代表互相争夺的社会各阶层利益)裁减军队数额的可能性甚微。相反，事实证明，这些军阀目前正在你争我夺，拼命要把俘虏张作霖的兵员并入自己的部队。可见，他们的军队数额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仅只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国民党军阀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扩充军饷来源，必然要争夺下去。这种争夺不可避免地要由政治形式转变为公开的军事形式。因为国民党军阀需要大量金钱供养部队，所以不可避免地必须加重对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剥削，此外，他们今后又必然发不出军饷，而且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发饷了。这种情况将进一步促使工农兵群众和大部分城市贫民阶层走向革命。他们将给国民党统治以沉重打击。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府和确立所谓和平秩序，以实现由美国领导的广泛投资的统一帝国主义计划——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但是，美国是决不会轻易从有四亿人口的中国退出的，因为这四亿人是一个广大剥削对象，而且中国有丰富的原料资源。因此，美国就不能不和日本以及英国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未来战争的最大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的核心问题。

再者，因为国民党的形势不能稳定，则就有另一种前景，就是内讧的前景，就是向劳动群众扩大和加重课税的前景。

那么，所谓“第三党”能不能成为解救和统一中国的强大政党呢？对此，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

谭平山、邓演达、陈公博等人领导的派系带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性质。我们应该同他们作斗争，以防止落后阶层受他们的影响。

这个“第三党”暂时还只是搞宣传和玩弄军事阴谋的单独集团，没有任何群众基础。

只有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才能把中国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第三党”各派系可资利用的客观可能性——在群众中散布幻想，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幻想甚至在落后阶层中间也不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因此，“第三党”的客观前景极为渺茫。在估计中国革命前景时，“第三党”是不足为虑的。

广大工农群众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坚决进行革命斗争。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地把工农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革命没有止息。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说，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也断言，中国革命已经消亡。这种幸灾乐祸是持久不了的。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

在近期内即将到来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过去时期比较，必将更加广泛、更加激烈。

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土地革命依然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扩大农民运动。但是，由此而产生的中国革命不是纯粹的农民革命。这种纯粹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它表现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领导的现阶段中国革命，就是工人和农民为争取彻底的土地革命，为消灭封建残余，为把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去，为民族解放，为统一中国，为推翻现存的国民党政权，为实现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斗争的中国革命。

当前的斗争，不仅是反对国民党，即反对地主、土豪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直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势必比以往时期的斗争更为严酷。这场斗争，不仅要依靠中国国内各革命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而且要依靠各兄弟党的支持，特别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图谋干涉中国的时候，要依靠各兄弟党的支持。

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认为必须指出，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在望。还必须指出，在这个新的革命高潮中，阶级斗争将更加广泛、更加尖锐。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明确、更自信地理解自己当前的任务，为了使各兄弟党立即开始采取实际措施积极支援中国革命，应该指出这个趋向。

我想再强调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以往的历次决议，还是布哈林同志的提纲，都提到必须争取广大群众，以便组织和实现中国的武装起义。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将千百万群众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必须提醒大家，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党的领

导成分、政策和日常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党有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以后又有过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战斗的党。这个党经历过严酷的浴血的阶级搏斗时期。它曾领导过三百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和上千万有组织的农民。这个党现在正经受着艰难的白色恐怖的考验，因此而牺牲的有两万六千多人，坐牢的有六千人。党虽然处于地下状态，却仍然是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的党。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使党的领导能保证利用每个时机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我们党不久前犯了所谓“左”倾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刚刚克服，现在又出现了右倾错误，正如斯特拉霍夫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的，这个错误表现在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民众运动之类的口号上。由我们方面提出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是错误的。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没十分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的内容。这个口号如果是国民党人提出的，那它的意义不过是国民党人想在国民党机构内恢复工农部门，但是，这个口号如果是群众提出的，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大家都知道，群众性的工会、农会是被国民党查封的。过去争取到的条件被国民党剥夺了。因此，群众提出恢复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要恢复过去的自由和争取到的地位。以前，当我们党没充分重视群众工作时，同志们建议参加群众性的争取恢复自由的斗争，是为了引导群众去反对国民党，是为了增添这个斗争的内容，并且赋予这个斗争以反国民党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提出口号的话，我们就应当提“群众自己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口号。

举个例子说。铁路属于国家。但是，铁路工人有五、六个月领不到工资。请问，我们是否应该带领群众为向国民党机关讨还拖欠而斗争呢？是的，我们应该。不过，这个斗争应该具有群众性、革命性，而不是象第三党所想做的那样，具有和平的性质。这就是说，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坚决而勇敢地走在群众

运动的前面，以组织和扩大群众运动，把局部行动转变为群众性的强大行动。这样一来，群众就不会对国民党抱任何幻想，这在客观上就是对国民党的有力打击，因为国民党连工农群众局部的微小的要求都不可能满足。

正如布哈林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水平十分低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如果我们党能遵循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广大群众的正确策略路线，在工业企业中打下自己的基础，如果我们党能够提高党员群众的理论水平，那就一定能完成党所面临的任務，即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

(同上，第449—454页)

洛米纳兹(苏联)：我想就中国问题讲几点意见。提纲中关于广州起义有以下一段：“大会认为，企图把广州起义看作是盲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掩护战，尽管领导上有重大错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

提纲中的这段文字，由于将成为六大决议，所以具有重大原则意义。这不仅是对托洛茨基反对派诽谤的应有回答(他们宣称，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组织的盲动和冒险。这种说法和社会民主党毫无二致)，而且这段文字果断地制止了我们中间、共产国际队伍内的动摇，即制止了在评价广州起义上的动摇。在最近一期《共产国际》上刊登的雷贝尔格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窥见这种动摇走得有多么远，这篇文章的全部奥妙莫测之处，就在这样一条深思熟虑的结论上，说什么：好的起义就是结局好的起义，而坏的起义就是结局坏的起义。关于广州起义，雷贝尔格同志特地写了下一段：

“广州起义遭到了而且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其原因就是：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广州和广东省起义的取胜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十分有利于起义，起义的时机

(12月11日)选择不当。”

同志们，向六大提交的提纲关于广州起义是怎么写的？提纲说，党的领导在准备起义过程中和在起义的当时，犯有重大错误，但是，广州起义本身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必要的、正确的。否则，就是盲动，雷贝尔格是怎么说的？他说，组织起义本身就是广州共产党人的绝大错误。雷贝尔格宣称：

“起义领导者所犯的军事上和组织技术上的错误(诸如计划考虑欠周，没有夺取军需和枪支弹药仓库，不善于设置街垒，没有使用解除武装的步兵和炮兵兵力等)，无疑对广州斗争的结局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这些错误比之于前述的客观原因毕竟仅仅有从属的意义，而并非决定性的意义。”

如此看来，主要错误就在于组织了起义。这个观点，与我向大家读到的六大提纲中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这里，雷贝尔格同志除去“盲动”一词而外，什么都说了。如果在社会基础不够广泛、起义条件不成熟、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利于起义的情况下去组织起义，如果起义过早，那就是盲动。我必须申明，这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所有不成功的起义，特别是1905年12月起义、1923年汉堡起义、1924年爱沙尼亚起义，一律叫做盲动。照雷贝尔格的逻辑，这些起义比之于广州起义更应该看作是盲动。

读雷贝尔格同志的文章时，我就断定这位雷贝尔格同志准是佩佩尔同志的化名。(笑声)雷贝尔格同志的全部论点，和佩佩尔同志为反对广州起义提出过的种种理由何其相似乃尔。

我为什么又要提到佩佩尔呢？因为不久前，佩佩尔同志曾经笔调委婉地、勇气十足地在美国的《共产党人》上宣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不折不扣地、完完全全地采纳了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人家都知道，佩佩尔同志对于广州起义问题是这样

一种意见：在广州起义发生前他反对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过程中他反对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后他还是反对广州起义。（掌声）他之反对起义的全部理由，就其实质和形式而论，现在都已原原本本反映在雷贝尔格同志的文章中。反正不管怎么说，雷贝尔格不是佩佩尔，而是另外一个同志吧。这也无济于事。佩佩尔同志颇以为自己有功的是，他早在广州工人起义之前就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指出广州起义不可避免要失败。同志们，我并不想做绝对的推论，也不想给佩佩尔同志以孟什维克的称号，我只想提醒一下，1905—1906年间俄国孟什维克反对十二月起义时也用的是同样的论据，说是起义过早了。他们也表白自己有功，说是他们反对过早的起义。

关于这一点，我来引用一小段话。

列宁写道：

“普列汉诺夫开玩笑地曾把自己比作罗马统帅，后者曾以过早地发起战斗的罪名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可是，假若我是‘儿子’的话，在革命力量已经超越政府力量的决战时机，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或按罗马方式，杀掉）要同反动势力妥协的‘爸爸’，并安心地让未来的非难之神们去判定，我这究竟是杀死叛徒、处决他的行为，还是一种犯上的罪行。”

雷贝尔格和佩佩尔同志对广州起义的评价，与提纲中提出的评价毫无共同之点。

为了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要开脱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而尽责难别人的错误，我要坦率地声明，我在第九次全会以前犯过严重错误。这一点，要在这里讲明。我的错误在于，我认为广州起义不是一场掩护战，不是总结整个一个革命时期的最后一幕的斗争，而认为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开端。事实驳倒了这个观点。事实证明，广州起义是许多革命战斗总链条中的最后一环。这些革命的战斗在1927年中期风起云涌，继而渐趋低落，终于以

最后有力的一跃——广州起义而告终结。

广州起义以后，开始了镇压。我的错误在于，我没有正确估计广州起义后的形势，仍然认为今后必须坚持广州起义以前的那种直接进行武装起义的路线。现在完全清楚了，这条路线在广州起义后已没有基础。第九次全会，以及草拟的六大提纲，完全正确地提出了武装起义的口号目前只能是宣传口号这个问题，而且只有在那些出现了自发农民运动的地区，共产党人才应该领导农民起义的中心，才应该在那里站稳脚跟，不断壮大。但是，武装起义的口号，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基本上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如果有人说，据此理由就大可不必发动起义了，因为在1927年底，早在广州起义之前不是已经开始镇压了吗？这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共产国际路线的一种不能容忍的歪曲和颠倒。我想引用一小段列宁的话，这段话恰恰与此类问题有关。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早在庸人们十分驯顺地效忠君主的时候，就已开始唤醒人民，敲起警钟。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走上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以揭露一切社会庸人和政治庸人的调和主义幻想。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离开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他只是在一切可能性都已消失的时候，在走上捷径的希望一点都不存在的时候，才离开这条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以鄙视的态度来答复那些无数的革命叛徒对他这样的喊叫：“我们比你‘更进步’，我们首先放弃革命，我们首先‘服从了’宪法。”（掌声）

我觉得，中国同志可以有充分的权利用列宁这些话回答那些责难他们草率从事和不合时宜地发动广州起义的人们。当革命高潮暂时还有一线希望持续下去的时候，就应当象去年12月中国同志那样去行动。现在，情况已经更加明朗了，已经完全肯定中国的发展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革命道路前进，而是按照列宁常喜欢说的所谓历史的迂回，即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现在，当然就完

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同上,第467—470页)

第十五次会议 (7月28日)

讨论布哈林的报告

陈宽(音,中国):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和报告。我只想简要地谈一点,即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国际任务。我们大家都知道,防止战争危机的斗争、保卫苏联、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和瓜分中国的斗争,是现时期国际共运的中心任务。但是,实际上,几乎共产国际所有的支部对这些中心任务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不仅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东方各兄弟党,而且指的是对这些任务说得多而做得少的西欧各兄弟党。在这次大会上同样也有所表现,即参加讨论共产国际任务问题的发言者,很少谈到如何实际支持殖民地革命运动。

在所谓战后第二时期,发生了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在世界革命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具有更加重大的国际意义。但是,我们的兄弟党对此太不关心了,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才有可能在上海三次起义时刻畅通无阻地向中国调遣战舰和军队,轰炸南京,发动对中国革命的总攻击,此后又胁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新军阀们就范,与此同时又镇压了上海工人的英勇起义。如果不把苏联劳动人民给予中国革命的全力支持计算在内,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样的时刻,全世界无产阶级有效地、有力地支持中国革命本来可能创造出一个无比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全新形势,可是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的兄弟党却是通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决议较多,贯彻决议的行动较少,而行动无疑地才是他们的责任。因而帝国主义军队不仅迄今仍有可能留在

中国,而且不达到真正着手瓜分中国领土的目的是决不会罢休的。广州十二月起义,它虽然是劳动群众在革命失败时期的英勇抗议,它虽然有一系列要由中国共产党负责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但是却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时期。广州起义的国际意义是不容置辩的。起义本身虽则以失败告终,但是,广州工农兵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的苏维埃,和南北方广大劳动群众记忆殊深的苏维埃思想,作为起义的总结,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迅速发展。西欧和美国的兄弟党不仅没有支持这次起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同志企图否定这场革命斗争的意义。我首先指的是佩佩尔同志,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不遗余力地把广州起义描写成过早的起义,描写成随后一个时期一切盲动错误的根源,此种观点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论点如出一辙,区别仅仅在于佩佩尔同志没有敢于得出最后的结论。

现代国际形势的紧张,甚于以往任何时代。在我们而前有两种选择:或者我们为保卫苏联、为中国革命、为防止战争危机而进行必胜的斗争,或者由帝国主义者取胜。帝国主义者正千方百计地暂时缓和自己之间的矛盾,以期瓜分中国和挑起反苏战争。如果我们大多数兄弟党在这方面不大力进行工作,依然故我,满足于作决议、发呼吁,那么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一旦爆发,就会使我们措手不及。

一些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持有极其肤浅的错误见解。譬如,佩佩尔同志在议论广州起义和中国革命的时候,常用这样的理由来加强自己的结论,似乎帝国主义者、土豪劣绅、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军阀们紧抱成团,牢不可破,似乎他们之间不存在矛盾。佩佩尔同志把这点说得如此神乎其神,就象他在这次大会上渲染美帝国主义的发展一样,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佩佩尔同志忽略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不容置辩的领导作用,他对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发展视而不见,他一切都忘记了。因此,他认为,

在农村中，在现存的反动制度下发展农民自治运动的建议是可行的，这就不足为奇了。而在中国工农革命群众的眼睛里，这种看法只不过是第三党领袖——潭平山、邓演达之流论调的翻版而已。

最近一期的《工人画刊》(责任编辑是明岑贝尔格同志)，由于疏忽大意，我们却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的背面题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此期杂志的这幅照片下面，还有这样一句题词：“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青年，将遵循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学说的精神，继续奋斗。”这类宣传不仅歪曲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面目，而且容易使各国工人产生一种不正确的、模糊的印象(明岑贝尔格同志说，这是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政治错误，他已经做了更正)。此等妄说比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的在中国还到处是长辫子和缠足的胡诌报道，更要荒唐。所有同志都清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失败者。

谈一点关于共产国际东方各支部之间党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在东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中，理所当然地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中国共产党和这些国家兄弟党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群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极为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共产党的发展，注视着朝鲜和满洲的朝鲜共产党人的活动，注视着中东铁路的事态，注视着印度罢工浪潮的发展，注视着安南共产党未尽令人满意的工作，注视着印尼共产党与当地华侨的关系以及其他情况。这些兄弟党在过去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帮助，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

和这些兄弟党之间或则没有联系，或则仅有极少接触，这个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这个缺点应予坚决克服。

我们认为，只有当中国革命、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和印度革命——这是同一链条上的三个最重要环节——同时获得发展的时候，东方革命才能胜利。共产国际东方各支部，必须在这次大会上建立实际的联系。共产国际和东亚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共产国际不仅应当一如既往地政治上和组织上领导运动，而且应当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给予更大的帮助。必须一方面要向那里派出能实际胜任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机会参预共产国际的工作。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能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胜任如此繁重而又复杂的工作。客观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国际在东方革命运动的工作中更前进一步。

最后谈几句共产国际各支部内各种倾向的国际性质。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已形成国际现象，这已经是历史事实了。不过，一个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总要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其他兄弟党。布哈林同志已经谈到，战后第三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群众的“左”倾。随着工人阶级内部力量对比的激烈变化，共产党的某些领袖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例如，中国有些人就站到盲动主义一边，自我孤立，脱离群众，另一些人畏惧敌人，过分强调合法斗争的意义，因此就会犯明显的机会主义错误。比如有个别中国同志坚持由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意见，又如某些德国同志认为，只有取得改良主义工会工人贵族的同意，才能举行罢工。佩佩尔同志甚至断言，中国必须在反动的白色恐怖制度的条件下发展农民自治运动。佩佩尔同志向我说过，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是采纳了他佩佩尔同志的政治路线。我看，那些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很可能就采纳了佩佩尔同志的观点，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这种右倾危险，在一旦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的情况下，可能更为有害。同志们，我们要记住1914年宣战时的惨痛失败的教训，我们要以最大的精力共同反对我们队伍中的国际性的右倾危险。

(同上，第559—562页)

少先队员(化名，中国)：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青年共产国际活动的专门报告，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已说明大会十分重视青年运动。但是，也必须指出，各共产党对共青团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十分不够，这也是事实。

我们基本同意许勒同志的报告。但是必须指出，青年共产国际没有全部完成自己的任务。由于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正在发展，青年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意义增大了。过去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青年共产国际在贯彻新的工作形式方面，在深入开展青年群众工作方面，以及在组织青年争取自身利益方面，没有根据新的条件及时改变方针。

我们现在日益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青年的作用和任务尤为重要。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必须首先根据客观条件采取相应的新工作形式，以便争取广大工农青年群众，引导他们进行积极斗争，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强行瓜分中国领土。

许勒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党不够重视青年工作。不仅如此，甚至有些地区参加工会的青年不能享有与成年工人同等的权利。

如果这样一种轻视青年的态度还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那么这就是地道的社会民主派的倾向。这不仅是错误，而且简直是耻辱。

瓦西利耶夫同志在讲话中谴责青年共产国际，说它搞政治过头了，轻视组织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以中国共青团为例，事情不完全象瓦西利耶夫同志所想的那样。不

错，中国共青团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从来也没有忘记和轻视过组织任务以及在劳动青年群众中开展工作。此外，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青团积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其领导成员的机会主义错误，积极参与完成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必须承认，中国共青团是做得正确的。

许勒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并强调了中国共青团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功绩。报告人丝毫没有夸大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有些同志对此却讳莫如深，说根据报告人对中国共青团的评价好象是降低了共产党的意义，而提高了共青团的身价。

且不论这个观点是怎么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观点不正确。党应该把共青团看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把共青团的工作看作是自己全部工作的一部分。把共青团组织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的观点，不应该在我们队伍中存在。

当然，中国共青团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它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同党的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这个缺点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共青团队伍中，还有“左”倾的毛病。加强对团员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把这些任务和日常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当前中国共青团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共青团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活动用于实际执行争取广大工农青年群众的方针，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并在斗争中把青年团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应当为广大工农青年所熟知。

布哈林同志在报告中仅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有“左”倾危险，但是，事实表明，由于纠正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又出现了右倾。当然，我们应该继续同“左”倾危险作斗争，但是，

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右倾的危险。右倾比“左”倾更危险，它可能要重蹈机会主义错误。

尽管中国共青团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年青的革命者，一定能够和前一时期一样顺利地完成任务。

(同上，第568—570页)

佩佩尔同志(美国)的声明

刚才洛米纳兹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论点，说我认为广州起义是盲动。可他却拿不出我的一篇文章、我的一次讲话作证据。

我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次讲话，已散发给出席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的全体代表。我不得不在这里引述几段我的讲话。

“关于广州事件应该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我们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广州起义持肯定的态度。这个论点应该是我们评价广州起义的原则论点。广州起义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起义被镇压下去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机会和那些直接参加起义的同志们交谈之前，我就尝试着对起义作了一个扼要的评价。当时，即在那天晚上，我写了如下几行字，并且至今仍赞同这个观点：

“‘广州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具有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豪迈的业绩，而且表明中国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程度。’”

接着写道：

“资产阶级只会记录革命的失败，却不愿知道，在远东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何等重大革命成就。广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现在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个事实有着象征性的意义。孙中山的广州现在成了列宁的广州。”
作为评价广州起义的结语，我写了以下几行：

“严重的失败不是最后的失败。它是未来胜利的源泉和保证。”

我就是这样评价广州起义的。那是在失败的时刻，而不是在胜利后的次日。我认为，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这样那样地重新考虑对广州苏维埃的评价。

在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前夕，我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讨论会上的报告，开头也是用的这几句话。这个讲话已印了几百份。我作报告时，洛米纳兹同志在场。在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中，我直截了当地反对那种不仅谴责广州起义的错误，而且谴责起义本身的观点，我是这样和洛佐夫斯基同志争论的：

“最后，对于洛佐夫斯基同志的言论，还有一点小意见。洛佐夫斯基同志方才关于广州起义的说法是不对的。他攻击了起义本身。这是不对的。可以而且应当攻击起义的错误，但不是起义本身，不是工人们的斗争。”

作这个总结发言时，洛米纳兹同志在场。因此，我敢断言，洛米纳兹同志刚才说了假话，有意识的假话，硬说我曾经认为广州起义是盲动。这是假话。这是有意识的假话，而且不是第一次假话。但是，应该希望，这是洛米纳兹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短暂的、然而并不十分顺利的巡回演出中的最后一次假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以世界五大洲和共产国际所有五十个支部仲裁者面目出现的洛米纳兹同志是如何实行自我批评的。他在这里一字不提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曾经批评了他的中国不断革命论。这是托洛茨基的理论，这是有害的观点，这是一种同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犯的错误的相类似的错误。

（同上，第571—573页）

洛米纳兹同志的声明

我发言时已申明，佩佩尔同志对待广州起义是这样一种态度：佩佩尔同志在广州起义发生前反对广州起义，在起义过程中他反

对广州起义，在起义之后他还是反对广州起义。我断言，证据可以随手拈来，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特别是全会前夕讨论会的所有参加者，对这些都是记忆犹新的。佩佩尔同志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广州起义是盲动，他缺乏这个勇气。但是，佩佩尔同志设置了一切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广州起义是盲动，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结论。我今天没有说过，佩佩尔同志说广州起义是盲动。我说过，我引用了雷贝尔格文章中的一段话。这个雷贝尔格断言：“广州起义遭到了而且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其原因就是，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广州和广东省起义的取胜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十分有利于起义，以及起义的时机（12月11日）选择不当。”

我引述了这段话，这段话里为了得出广州起义是盲动的结论，该说的话都说了，唯独没说出盲动这个词。随后，我又说，这个雷贝尔格可能是佩佩尔同志随便用的化名，因为佩佩尔同志和雷贝尔格的论点在本质上、甚至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佩佩尔同志刚才说了什么呢？他引用了自己讲话中的几段话，说是在起义的时刻他站在广州工人阶级一边。难道他应该站在张发奎将军一边吗？这还不够！但是，佩佩尔同志在刚引用过的那个讲话中，在他自己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备案的无数文件中宣称过，他在起义之前就反对起义，而且说他是正确的。说他认为广州起义为期过早，没有必要的社会基础。遮遮掩掩是无济于事的。盲动一词是没有说过。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这个事实，佩佩尔同志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在本质上就是对盲动的一贯评价。

佩佩尔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宣布，我离开共产国际这个事实，应当看作是共产国际的莫大幸运。我不理解。我的工作问题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更不是佩佩尔同志的事情，而是党的事情。是党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佩佩尔同志。但是，要说佩佩尔同志留

在共产国际内工作是共产国际的莫大幸运，我倒表示怀疑。（掌声）

佩佩尔同志还捎带要求我说一说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我在第九次全会之前说过，中国革命正在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奇怪的是，佩佩尔同志竟就这个问题向我发难。佩佩尔同志在他读的那段引文中就说广州起义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笑声）。他比我勇敢多了，我说的是正在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他却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了。于是，佩佩尔同志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恬不知耻地谴责我有托洛茨基主义之类的论调。

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我在中国问题讨论会的辩论中间就说过，佩佩尔同志是一个能干的人，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只是他的作风，他的蝇营狗苟的作风，迫使人们不能象看待一个严肃的政治家那样来看待他。

（同上，第 573—574 页）

第二十一次会议（8月4日）

讨论战争危机问题

田中（日本）：提交大会讨论的战争问题提纲草案，阐明了反对战争的基本路线，而反对战争乃是国际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提纲指出，现在，帝国主义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和阶级战争之间是彼此密切关联的。提纲还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的马列主义斗争原则，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发展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这个提纲是世界无产阶级手中的强大武器。

我代表日本代表团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并承担贯彻落实的责任。

我们看到，英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对中国实行军事瓜分。正因为如此，中国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必争之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侵入中国领土。这是日本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必然结局。因此，资产阶级反对党民政党实际上是支持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资本主义的日本从世界大战以来，开始迅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了贪婪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不满足于凡尔赛条约和华盛顿会议所划定的势力范围的强国之一。国内资源贫乏，土地问题尖锐，群众贫困造成的市场缩小，人口过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推动着它采取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就是这些情况，促使日本剥削者去侵略中国。日本资产阶级已经把满洲和蒙古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变成自己真正的殖民地。日本在华的投资约有二十五亿日元。但是，1925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这场革命对于日本来说，远比它的掠夺勾当中的对手——美英资本，更为危险。因此，帝国主义的日本带头发动反动战争，公开武装侵略中国，把满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926年日本军队侵入上海，1928年干涉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抢夺山东铁路和青岛海关税收，谋杀张作霖，借口“满洲独立”阴谋全部夺取满洲政权，抢占满蒙四条铁路，等等——这一系列的蛮横行径，完全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最近，日本把五万军队和五十五艘战舰派往中国。由于国民党叛变了革命事业，它公开侵略中国的步调加快了。日本和英国狼狈为奸，以厚颜无耻的主子自居收买国民党军阀，以驱使他们血腥镇压中国工农群众，并加强对群众的压迫。但是，日本对出卖本国无产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相反地，不久前日本又一次表明了它的坚定的对华政策，拒绝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这一切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斗争，才能获得解放。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加剧了美国、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这一情况，在日本公开侵略中国之后，张伯伦声明否认日本对满洲的“特殊利益”。这就证明，三个强国之间的矛盾是何其复杂和尖锐，也证明，一旦爆发帝国主义战争，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征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帝国主义者早已预言，美日为争夺中国和太平洋必将发生战争。如果研究一下日本战略形势和技术状况，那么就不能不推翻这一论断，即日本的军力不足与美国匹敌，因而决不敢冒险与美国公开冲突。相反，为了征服中国，日本已有所准备。日本军阀现已在讨论在美日宣战一周内占领全中国的措施。

美国、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不排除它们对苏联、对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劲敌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持敌视态度。日本资产阶级一方面垂涎三尺地注视着苏联的富饶资源，一方面却又认为：“苏联在五十或一百年内不会垮台”（现任邮电大臣久原声明。此人去年曾访问苏联），而且对苏联貌似友好。但是，不言自明，既然日本过去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反革命斗争中曾一度充任指挥者的角色，现在又在以英国为首的反苏阵线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必然会准备对苏战争。最近，日本资产阶级在袭击共产党人之余，又开始掀起反苏的挑衅活动。还应指出下列情况：一、日本正在进行对华战争，而且力图挑起世界大战；二、因瓜分中国而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工农革命斗争、与保卫苏联的战争密切相关。这两个情况再次证明提纲草案关于战争临近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再简要谈一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备战的情况。军事预算在迅速增长，1928年可达四亿九千二百万日元，即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七。现在发狂般地忙于实施建造飞机和军舰的庞大计划。日本也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殚精竭虑地筹备全国的和全部工业的军事动员。

建立在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并且由处于愚昧奴役状态中的陆

海军军人所拥戴的天皇制，是日本陆海军的最高权威。这个军队现已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其他一切非官方的军事组织也变得更加反动了。日本统治阶级利用这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军事组织从事国内战争。

日本无产阶级极不善于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革命斗争，也极不善于从事制止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这是由于，第一、它对于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体验较少；第二、日本共产党还很年青。

日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竭尽全力掌握提纲中所阐明的反战原则。我们已经在群众当中做了反军阀主义的宣传。近几年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组织了反对日本干涉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的群众性斗争。但是，不仅我们的宣传工作薄弱，而且我们也没有在瓦解资产阶级军队和建立无产阶级自卫军方面做过有条不紊的组织工作。对广大青年群众的工作，也做得很不够。今后，共产党应当和共青团密切配合进行这一工作。我想，提纲中应加进一小段对青年进行反军阀主义宣传的内容，工会中反军阀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也不够，这是我们的重大错误之一。自1927年春起，日本工人阶级群众斗争史上开始了新的时代，组织了自卫军，从而开创了我们对军队的工作。反军阀主义的斗争更加巩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团结。

日本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他们的欧洲同伙完全一样。他们是天皇的奴仆，冥顽不化的民族主义分子，苏联最露骨的敌人，蒋介石的好朋友，侵略中国的公开卫护者。

不久前对日本共产党和三个群众性组织的打击，是日本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准备战争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是压不倒的。相反，我们会更加壮大。日本共产党面临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战争祸首的任务。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绝对必须集中我们的力量在军队中开展顽强的

工作，以有力的斗争来保卫苏联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的和系统的合作，形成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我们日本共产党人将力求顺利实现大会的提纲。

(第2卷第137—140页)

第二十二次会议 (8月4日)

讨论战争危机问题

斯特拉霍夫(化名,中国):在以战争危机为中心内容的战后时代“第三时期”,太平洋战争是对我们,特别是对中国工农和对苏联的一种威胁。顺便提一下,我根本没有说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之间没有区别,虽然布哈林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认定,我说的“第三时期还是应当在提纲中加以说明”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过,为了强调指出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必须更清楚、更确切地分析:一、资本托拉斯化、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技术发展等等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对于农民阶级分化的影响,对于农村阶级力量改组的影响;二、这个新的时期,即西方和美国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存在着反苏战争危机的时期,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对于东方各国农民的影响;三、无产阶级在未来大规模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问题。

在中国,由于日本干涉济南,战争实际已然开始。除日本以外,英国、现在又有美国,都支持这一伙或那一伙中国军阀为扩大或保持各自“势力范围”而进行混战:张作霖、冯玉祥(日本),李济深、白崇禧(英国),蒋介石(美国)。帝国主义者或幕后操纵、或公开支持他们混战。在中国,这是不足为奇的。这在

我国已经持续二十年了。但是，现在由于世界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英美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主要矛盾，而世界资本主义同苏联的矛盾，以及同中国革命和其他殖民地起义之间的矛盾又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对抗因素，所以帝国主义者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统治中国的斗争（部分地是通过军阀进行的斗争），就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太平洋战争，准确点说，还要导致印度洋战争。英国现在正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缅甸和同广州湾遥望的新加坡，而美国——则在菲律宾。至于日本，它已据有满洲南部的奉天省和华北的山东作为军事基地。这个形势必将导致不可避免的战争，必将导致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比1914—1918年战争更为可怕的战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反苏战争、反对中国革命和反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战争可能交织在一起。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互相争夺，过去是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北方各派军阀；而现在，在国民党叛变后，则是通过国民党军阀进行的。在这些战争中，中国工人和劳动者以及中国士兵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在日本干涉济南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次就枪杀了五六千中国人。连年不断的中国军阀混战，使千百万中国农民和工人遭到戕杀、破产、盘剥，被拉去当壮丁、充苦力（现代中国的封建军事徭役）。如果一旦爆发太平洋战争或中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国际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进攻中国工农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共产国际各支部必须严肃而系统地准备应付这个战争事变。

中国已经在进行着“内部”战争。这种战争实际上是国际大战的演习。中国工人在1924—1927年第一次革命高潮期间，在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斗争中，表现了强大的力量。现在他们就是各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反对沉重的军事课税，反对国民党的军事派款的领导者。由于组织上的薄弱，他们还暂时不能把这个斗争发展到

群众性斗争的规模。最近以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游击活动的影响下，反动军队的士兵也开始（当然暂时数量很小）转到工农革命方面。至于农民，在北方，他们组织“红枪会”运动反对战争，在南方，则通过农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战争。农民起来抗捐、抗“军差”、抗租、杀地主和高利贷者。这个运动暂时是分散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还较薄弱，这个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配合得不好。但是，这是中国必不可免的国内阶级战争的演习。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号召中国工农和一切劳动者团结起来，把国民党军阀战争转变为国内阶级战争，转变为工农兵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军阀的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太平洋战争一旦爆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前列。那时，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必将拿起武器，打碎帝国主义的枷锁，并消灭那些革命的叛徒，即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的政客和刽子手。

比特尔曼（美国）：……殖民地运动的发展，主要是中国革命的发展，拉丁美洲反抗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以及美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广大工农群众的觉醒，是第三个因素。最后一个因素——并非最次要的因素，就是苏联的日益强大。而且这里还应该指出两点：首先是苏联政治上的巩固和经济上的发展；其次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加强和发展对美国劳动群众的强烈影响。因此，认为战争的威胁仅仅是美帝国主义胜利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缩小之间根本矛盾的结果，那就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

中国是美帝国主义当前玩弄的另一大赌注。在中国问题上，我们要分清几点：一、当前，美帝国主义在和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招牌下参预瓜分中国，为此目的，它就利用中国资产

阶级；二、我们应该承认，只有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极其密切的合作，中国才能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斗争。

目前，最突出的特点是，正在导致战争的美英、美日在华冲突日益激化。尽管如此，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还坚持这一观点，即就中国当前形势看，引人注目的不是美日之间的冲突，而是合作。在5月底以前，我们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决议，认为美日合作是当前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劳斯顿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中声称：“美国是日本当前的坚定盟友。”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一年以前在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以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按英国的立场行事，在中国为英国卖了力气。因此，我们开展了反英运动而不是反美运动，进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目前，中央委员会又如法炮制，根据日美在华合作这个错误分析，在防止战争危机的斗争中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因而，劳斯顿同志在报告中只用几句话谈到中国，认为“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态度是虚与委蛇的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同志们，我认为，劳斯顿同志应该在报告中作一点自我批评。

几乎所有在这里发言的各党代表，都分析了本党在反对战争和反对军阀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我们党的代表却没有一句自我批评。而如果执行这种政策，就无法动员我们党去进行防止战争危机的有效斗争。

劳斯顿同志报告的基本缺点是机会主义错误，即在于，一方面不善于发现战争的真正的发动者，另一方面又不善于发现能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发动者的力量。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这个错误合乎逻辑地来源于劳斯顿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的总方针。这个错误应该纠正。共产国际不能让我们党在这个关键时刻漫无目的地航行，不能让我们奉行如此的理论和如此的方针。我们应当使我们党不再重复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在南京事件的决议草案中所散布的

那种论点。这个决议草案中有如下的话：

“在英国的影响下，并且违背已作出的声明，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真正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我们要求我国政府不再追随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如南京事件所表明的，是恐怖、贪脏受贿和滥施军事暴行的政策。”

（同上，第 153—157 页）

李光（中国）：在 1914—1918 年战争期间，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一般中国人民，都认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无关。在 1914—1918 年间，中国人民把德国看作是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因此对德国寄予同情，而且希望德国成为战胜者。而德国则认为中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国人民当然不能了解当时战争的性质。这是由于对国际环境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所致，自然，就更谈不上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了。资本家便利用战争形势，靠输出原料以营私肥己。他们乘机发展了本地工业。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大上涨。

现在，世界战争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殖民地遭到了更为深重的压迫，情况当然就发生了变化。战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因素，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者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很清楚，战争危机问题，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是事关重大的。中国共产党近十年来，在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也做了大量工作。

我要说一说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军和瓦解军阀雇佣军方面开展工作的情况。1924 年，孙中山提出关税自主要求时，英帝国主义派军舰到广州沙面，进行军事示威。同年 9 月，沙面外国企业中的工人宣布罢工，反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因此，由香港派来军舰加强对外国人的保护。1927 年北伐期间，汉口四面受困，断绝了经济来源，帝国主义者加强了租界的警戒，并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召来大批军舰，而实际上是向革命群众和向当时的

国民革命政府示威。针对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外国士兵中间散发各种外语的告示、传单、小册子等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阐明士兵群众与革命人民团结的必要性。此外，我们派了懂外语的宣传员，到外国士兵中进行宣传。这个运动实际没收到很大效果。但是，这个工作毫无疑问在外国军队中唤起了对中国革命运动一定程度的同情。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我们在印度籍的英国士兵中做了相应的工作。结果，有一部分士兵拒绝反对罢工工人，并开始公开向罢工工人表示同情友好（例如在深圳等地区），英国指挥官得知此事，把这部分士兵解除武装，遣返印度。开展殖民地军队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经验表明，这个工作可以使帝国主义疲于奔命。我应当说，党并没有广泛开展这一工作，因而成绩甚微。

现在简单说说党在瓦解中国军阀军队方面的工作。1925年5月，杨希闵和刘震寰二军阀企图在广州发动叛乱。工人们，特别是运输工人用全面罢工来对付叛乱，海轮、江轮的海员也奋力抵制反动军阀的图谋。杨希闵和刘震寰打算把滇军由云南经香港运往广州。海员工会决定拒绝运送这批兵去广州，工人们也全力贯彻这一决定。香港政府不顾工人反对，以武力威胁工人，强令他们运送军阀军队。但是工人不怕威胁，给予军队指挥部的一致回答是：只运平民，不运军队，决不能让他们去执行消灭广州革命政府的任务。结果，香港政府没有办法调军队去广州。继而，1926年，军阀孙传芳在珠江地区与革命军队作战时，企图靠上海知名买办何友安（音）的船运兵。珠江的海员工会作出决定，拒绝运兵，并通知全体船员宣布罢工反对孙传芳。结果，兵未运成。我认为，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参考这些反战经验。但是，在反帝和反军阀斗争方面，我们的工作还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这是今后必须改正的。

我建议：一、关于战争危机问题，必须搜集关于战争灾难的

各种材料，印成传单或小册子散发给各国工人；二、最大限度地加强瓦解帝国主义陆海军的宣传鼓动工作；三、要特别注意对铁路工人和海员的工作，因为他们同准备和进行军事行动有直接关系。

（同上，第163—164页）

第二十三次会议（8月6日） 讨论战争危机问题

安多尔（美国）：美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于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抗议。目前，党在前进，在按照自己固有的传统精神，按照列宁主义精神向前发展，准备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胜利斗争。

美国工人阶级沉缅于和平主义幻想。和平主义的错误一度在我们党内有过反映，但是已经克服了。党可以自豪地指出，它为了反对金元帝国对尼加拉瓜和中国的血腥干涉而提出的口号是失败主义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尼加拉瓜不要帝国主义战争！我们要华尔街在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中失败！水兵们，现在就要把你们派到尼加拉瓜和中国去，你们要站到尼加拉瓜革命和中国革命一边！”还提出了美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完全和尽快独立的要求。号召把近期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这就是共产党全部竞选纲领的基础。

我们党内的反对派是否提出了一些反提案呢？它什么也没有提。我们的反对派责备党，说党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仅仅是英国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是，我们的竞选纲领却说：“华尔街的金元和舰队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新的领土上……美帝国主义和日英狼狈为奸，干涉中国。关于美国是中国友邦的说法，纯属一

派胡言。美国支持日本在满洲的统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巨额投资。日本干涉中国，在目前则又是迎合美国在远东做金融霸主的愿望。夺取巨大的中国市场，已愈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

因而，美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单独行动，而且还和日本合谋进攻满洲和山东。因此，党不仅谴责美帝国主义本身的罪行，而且还谴责它助纣为虐的罪行。

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正在全世界进行着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我们党内的反对派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

美国共产党在反战斗争中的主要任务是：……

五、必须在侨居于美国的华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中间，大力开展工作。必须帮助旅居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提高自己的教养和政治水平，以使他们能接替在国民党血腥恐怖中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须同拉丁美洲、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建立最密切的合作。

六、必须更加重视对夏威夷的华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当地居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必须在夏威夷和菲律宾群岛建立革命工会。应当更多地关注菲律宾共产党的建设和巩固。

(同上，第177—178页)

陈宽(音，中国)：帝国主义镇压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战争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法国对叙利亚和摩洛哥的军事讨伐，1927年帝国主义者轰击南京，以及日本对山东和满洲的军事干涉。第二种形式是隐蔽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帝国主义者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1925—1927年间，利用军阀陈炯明和吴佩孚镇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就

是帝国主义阴谋伎俩的鲜明例证。近来，国民党军阀也以镇压革命为己任。第三种形式是帝国主义军队与当地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共同镇压殖民地运动，例如，1927年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通力合作镇压上海起义，帝国主义以舰队支援李福林和张发奎，轰击革命军队和切断水路交通，镇压广州起义。

由于争夺殖民地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分为三类，即直接、间接和综合三种形式。1914——1918年的战争和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属于第一类。利用各国内部彼此混战的军事集团，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间接形式。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就是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形式的明显例子。将来战争一旦爆发，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要利用中国军阀的军队作为自己的主要兵力，来保卫重要战略要点和占领新的地盘。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同盟国列强都已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

在帝国主义殖民战争时期，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任务是：一、在帝国主义军队内部进行失败主义宣传；二、组织民族革命军队，以进行革命斗争；三、进行帝国主义军队和殖民地革命军队之间互相友好的宣传；四、变殖民地掠夺战争为国内战争；五、反对诸如保卫祖国、保卫侨胞、殖民战争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手段之类口号；六、无产阶级应当阻止向殖民地派遣军舰和运送帝国主义军队，应当反对增加军事预算，反对延长兵役期限等等；七、必须派遣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到帝国主义驻殖民地的陆海军中去，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必须派人到殖民地各兄弟党中去，帮助进行反帝工作；八、如果帝国主义军队中有从殖民地招募来的人员，如印度人、安南人和非洲黑人，那就应选派这些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员到这种军队中去做工作；九、应当加强对海员和海军部队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会大大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且对于防止反苏战争或防止反殖民地革命的战争，也是极其重要的；十、必须阻止向殖民地反革命军队运送军

事物资、调遣技术力量和指挥人员；十一、在殖民地国内战争期间，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反对帝国主义向殖民地的反革命政府和军阀提供贷款；十二、必须阻止在殖民地的租借地、铁路和江河等处进行备战活动；十三、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进行大屠杀，反对一切旨在帮助反革命政府镇压人民群众的措施。

对待帝国主义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还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作为补充：一、应将帝国主义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使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一败涂地；二、必须通过斗争防止混战中的当地军阀取得帝国主义的援助，必须在战争开始前阻止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的一切战争准备。这两项措施以及上述各项措施，都应当尽可能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爆发后付诸实施。

在准备国内战争方面，除提纲提出的四点以外，还有一点建议。在殖民地国家和使用雇佣军的国家中，军事组织和训练在无产阶级群众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学会许多军事技术手段，然而镇压起义的军事技术也在迅速改进。我们在起义期间的策略，必须做如下补充：起义开始时，我们应当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要一出现失败的征候，我们就应当迅速而果断地退却，以保存参加起义的群众和武器，准备再战。1927年7月起义期间，这种方法得到了极为巧妙的运用。但是，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虽然我们一部分军事力量撤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义，可是，另一部分部队由于没有系统的撤退计划而遭到消灭。上海起义也犯了类似错误。

中国革命是民族战争的光辉范例。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广东和北伐时期，曾两度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投入公开的战斗。但是，斗争的主要领导权两次都掌握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两次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犯了许多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影响了我们对待民族战争的态度。这是因为，虽然在形式上统一广东的战争和北伐

是反对军阀的战争，但是，在实质上应当是动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全部基础的斗争。因而，在香港罢工工人的支持和帮助下，统一广东的战争有力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依靠武汉工人的帮助和湖南、湖北两省农民的积极参加，北伐军才能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因为这场国内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并取得了农民的支持，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客观任务就是：建立本阶级的军队，扩大工农军事组织，以协助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忽略了这些任务，虽然北伐的客观条件相当有利，党没有利用国民党军政机关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做军队的工作。党也没有做过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任何尝试。党没有认识到，国民革命军的雇佣性质是危险的根源，以及整个这样的军队可能轻而易举地变为军阀手中的工具。我们党主要是关心在上层将领中间进行政治钻营，认为促成各军阀结为同盟就是自己的中心任务。党没有把主要精力去做组织和宣传广大士兵的工作，也没打算以吸收工农参军的方式改变军队的雇佣性质，党不了解，武装工农和教会他们掌握军事对于革命是何等的重要。党没有培养懂军事工作的干部。党也没有准备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对于分散孤立的、因而必然失败的农民起义，没有做过任何组织工作。这些错误乃是无产阶级在北伐期间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武汉步南京后尘转到反革命阵营时，我们党在失败关头只依靠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予以英勇回击（南昌起义），而未能继续前进，把此次回击转化为摧毁资产阶级、军阀和地主政权的国内战争。

起初，我们有贺龙和叶挺所部士兵一万五千名左右。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善于工作的士兵党支部和军官党员，也有参加起义的武装工农。虽然土地革命是南昌起义的目标，但对于革命的发展却毫无建树，在革命军队由南昌向汕头历时五十天的南征中，我们所经过的地区都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军队不仅没有完成工农军

队所应做的工作，而且甚至没有取得农民游击队应有的战果。在这支军队失败之后，叶挺余部一千多人与海陆丰农民会合，才得到了正确的领导。从这时开始，它就开始执行游击队和红军的任务。叶挺的另一支部队也约有一千人，由朱德指挥，沿着广东、湖南和江西边界行进。当地的一些农民队伍也会合进来。这支军队就这样变为一支很大的游击队，它帮助湖南南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并建立了许多地方苏维埃。另一支在广州起义时倒戈到我们方面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是由军官教导团组成的。这个队伍约有一千人，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撤向海陆丰，与上述部队会合。所有这些军队构成海陆丰地区红军的骨干力量。这个地区的城市失陷以后，这支红军分编为一些游击队，向四面八方扩展自己的政权，并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直到现在，这些部队仍是参加广东东部农民起义的最得力的军事力量。

除上述长江和珠江河谷地区大股革命武装部队以外，还有许多游击队。这些队伍是由国民党军队中投向我方来的。它们分散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和河南各省，帮助这些省的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还有其他一些用缴获反动军队的枪械武装起来的农民军队。这种情况，在海南岛进展得很顺利。这里大约有一千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集中的红军组织。中国许多农村的农民只有一两支步枪或者更原始的武器，因而想方设法从正规军手中夺枪。

城市的主导作用较差，工人组织在组织上和军事上软弱无力，这是苏维埃政权地区农民游击队和红军的最大弱点。这些部队虽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然而却不能领导和协调城乡斗争。因此，这些部队只能继续从事游击战争。它们已经建立了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但是，还没有充分力量去发动国内战争，以推翻中国反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过去我们认为，只有东方国家的党对军队工作不够重视。听

了大会报告和讨论，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兄弟党也没有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中国起义的经验指出，如果我们不能砸毁帝国主义军队的基础，那我们的反军阀斗争终归是徒劳的，得不到胜利成果。

中国军队有两个特点，可以使我们的工作较之西方国家军队工作要好做些。首先，欧美军队的组织严密，士兵待遇较好，一般不利于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中国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中国军队成份大都是流氓无产者，少数是真正工人，但士兵的生活水平毕竟远低于贫苦的工农生活水平。根据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的报告，中国现有八十四个军，计八百个师，二百二十万士兵，每年军费开支达七亿二千万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未计入此数。其实，上述军队年度收入不足四亿元，由于收支差距过大，大部分军阀没有钱满足军队开支。因此，军阀们声称要削减军队。但是，他们在振振有词的同时，又彼此虎视眈眈，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冲突。一方面，许多军阀我行我素，不发兵饷，甚而为了一己私利侵吞兵饷；另一方面，为了争夺地盘，他们又大肆招兵。结果，军阀间斗争加剧，工农的灾难深重，士兵的生活忍无可忍。在这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中国士兵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前景。他们饥寒交迫，每况愈下。全国的经济萧条，农村的凋蔽，失业现象有增无已，使得士兵除去自身的不幸而危险的行当而外，无法找到生计。与此同时，土地革命深入，武装起义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得到了工农的支持，这一切都给士兵留下了强烈印象。军队中阶级分化过程迅速发展，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士兵们迟早要转到革命方面来。

其次，这样一些虚伪、错误的口号，诸如“消灭常备军和警察民主化”、“人民卫国军”、“红军该死”、“退到农村去”、“拒绝开枪”、“拒绝当兵”、“以罢工反对战争”等等，在中国工农兵中间没有市场。相反，中国工农群众很清楚，不粉碎中国地主、资

产阶级和新军阀，就没有希望取得和平。工人和农民只有经过军事训练，建立起精干的组织，才能消灭所谓的革命军和乡村警察这样一些武装敌人，只有通过罢工和武装起义，才能建立起红军，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和真正的和平。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广东许多地方的失业工人自愿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遭到反动军队镇压失败以后，农民群众开始自愿组织游击队，推进土地革命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引起了反动军队内部的瓦解。士兵和乡村警察投效农村游击队的情况，屡见不鲜。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雇佣性质，在那里，要比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军队，更难于开展工作。但是，殖民地国家的雇佣军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雇佣军大不一样。对中国士兵进行工作，要比对义务兵役制的军队进行工作容易得多。因为工人和农民易于参加殖民地的雇佣军，而且也易于对士兵做革命工作。

根据我们的兵运工作经验，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兄弟党，一方面要尽力对无产阶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念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自己的兵运工作。这个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必须有步骤地派遣党员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小组进入军队（这一点在实行征兵制的国家中比较容易办到），特别重要的是，要深入到军队中的战略机关；二、如果不能以士兵身份参军，那就应当在军队中找到后勤部门的某种工作，或者找到便于做宣传工作的临时工作；三、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四、要更重视在海军中建立和发展组织；五、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应作为经常性的日常工作来做。尤其要重视争取改善士兵生活待遇的斗争，有时它比政治斗争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个斗争是使士兵认识自己力量的最好方法。

“人民卫国军”的口号，只能在阶级分化尚不突出、革命运动尚未达到民主革命阶段的殖民地国家中提出来，而在那些革命已

然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国家，“人民卫国军”的口号，无异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应该抛弃这个口号。应当以赤卫队和农民卫队的口号代替这个口号。那些经过民主革命阶段、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人民卫国军的口号也不适用，因为当实现了工农专政或革命处于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阶段时，革命政府应当建立由工人赤卫队和农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工农红军。

中国资产阶级和新军阀的国民革命军，已完全蜕变为反革命力量。我们对待它们的策略，同对待帝国主义军队的策略一样。我们应当在这些军队中进行失败主义的宣传，并在它们失败的过程中，吸收革命的士兵加入我们工农军队。我们不能奢望国民革命军会整个地转化为革命军队。

在提纲中，我们应当像那段专论帝国主义反苏伎俩那样，加一段专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问题。

在日本对山东和满洲实行军事干涉面前，南京政府一方面压制群众的反日运动，另一方面又企图使美国反对日本，虽然可能它又已在同日本秘密谈判。因此，不仅工农群众对这种可耻行径不满，甚至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流露出一不满迹象。这反映在以下情况上：“第三党”分子要求重新恢复民众运动，要求这个运动能得到国民党的领导，并使其有可能发展。他们指望利用民众运动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讨价还价，同时，还可借此安抚要求革命的群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是积极参加一切反日运动，因为这是群众性的运动；揭露南京政府的真正政策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这就是我们参加反日运动的目的；同时，共产党要尽力揭发第三党的叛卖行径，因为它千方百计以假革命的要求蒙骗群众。我们应当向群众证明，既然反动政府掌权，他们就只有一条出路：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希冀反动政府明令群众运动合法化，这完全是幻想和徒劳的。我们应当把这一宣传同工农和贫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口号结合起来，以便同

帝国主义者作斗争，以便夺取政权。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军队中加强宣传和组织工作，因为济南惨案和反日运动已经深深惊醒了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士兵。

在战争必将爆发、我们不得不应付各种形式的法西斯反动势力之前，在这种必不可免的情况发生之前，我们应该有所准备。首先，我们现在就应当使我们党的工厂支部转为半公开状态，以备必要时完全转入地下。其次，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建立秘密地下党支部，以破坏帝国主义军队的基础。

(同上，第181—188页)

第二十九次会议 (8月14日)

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 革命运动的报告

.....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运用已经取得的革命经验

一个没有学到任何东西的人

有关中国革命经验的最主要部分，我们已在提纲草案中说过了。我想强调指出，我们大家都从中国革命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这一点呢？在整个广大的苏联领土上，不管怎么说，我只知道有一个人，中国革命对他无所教益。这个人的名字——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叫托洛茨基。当然，这次他又想教训我们了。但是，这只能表明，他毫不健忘，但也没学到任何东西。

谈一谈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和普通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多大区别的国家。他看到的是，那里仅仅有或几乎仅仅有资本

主义的关系。而那里一切别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他的论点。甚而他根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政策的实质，因为这就会再次提出民族问题，那同样也不符合他的论点。他总是想比别的所有人都过激些。他想立即在中国开始纯粹的社会革命，而我们在这个农业国家里，却把工农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过渡形式来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宣传。这就是我们号召劳动群众为之奋斗、而且群众已然为之奋斗的革命。我们所说的这个过渡革命；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革命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不够激进的。他坚决否认它。他武断地声称，中国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政治前提，马上就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中国的几亿农民，在他看来没有特殊的意义。更有甚者，现在他给中国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同“富农”作斗争。他突如其来地发现了其他任何人在中国所未能发现的一点，这就是在中国农民的行列里，有一个很大的“富农”阶层。这个中国的“富农”，照他的说法，是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通和最可恶的一种剥削者。因此，托洛茨基要求，那里的革命运动要从建立“贫农委员会”开始。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俄国）的贫农委员会只能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1918年年中出现，那么，在中国，它在土地运动再度兴起时，就可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立即登上舞台。消灭富农将是中国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这就是说，在中国的日程表上，甚至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应是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对于1917年10月俄国革命都还不成熟的那个口号，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却应当在中国“土地运动再度兴起时立即”提出来。同志们，这不是狂热到无以复加的小资产阶级极端革命的主观主义，又能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从主观观点看，这是什么货色？但是，我十分清楚，类

似的言论在实践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客观意义。硬要推行这类货色，就是引导革命或者说一定会引导“再度兴起的土地运动”走向迅速失败的最好方法。在中国现阶段提出这个口号，只能起离间的作用。只有那种在客观上精于此道的人，才在主观上无法理解由于自己实际反对苏维埃政权而罪有应得地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送去流放，对于一个过去的革命家来说，这乃是人间的奇耻大辱。而直到现在，这个人还喋喋不休，这就更有充分理由来揭露他的面目了。

中国革命的若干教训

我们从中国革命中取得的一般教训，其中最主要的，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独立自主政策的必要性，关于不懂得革命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有一个过渡过程而造成的错误，等等，已在决议草案中提到了。但是，除去这些一般结论之外，中国革命当然还有大量的专门课题，诸如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组织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和起义的新经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第一批苏维埃的经验等等，仍待专门探讨。

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否正确的问题，在决议草案中已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及时地、清楚地看到这个联盟必然破裂。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才算了然。假定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像现在容易做到的这样（事后的结论），清楚地掌握了这个全过程，那革命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发展趋势呢？即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运动怎样才能够以及应当怎样更好地为下一个阶段作出准备呢？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如发展土地革命、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共产党争取对革命过程的领导等等，其提法是正确的。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还指出了一些重大的组织任务，特别是指出要在国民军内加强革命运动的阵地，尔后再建立单独的工农革命军。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是有案可查的。

至于这些指示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令人满意的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在这里多谈。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

组织任务

关于苏维埃，我们遵循的是列宁的遗训，而不是托洛茨基的谬论。在苏维埃尚未能组织起来的阶段，在建立作为起义机关的苏维埃的时机尚未到来的阶段，怎样去完成在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曾经完成过的任务呢？这就是在运动的准备阶段，在掌握政权阶段之前，在直接起义的前夕，以何种组织形式来吸引群众的问题。运用哪种组织形式可以动员广大群众，即不仅能动员无产阶级，而且又能动员农民呢？而且，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它们会成为松散的组织，但群众却根据选举或其他理由确认它们是自己的代表机构）必须是这样的：它们不仅能吸引革命的群众，而且能吸引不革命的、甚至改良主义的和怀有敌对情绪的群众，以便在这些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以便使这些被吸收进来的有组织的群众能亲眼目睹我们这场对敌思想斗争，从而使群众摆脱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这就是工农兵革命联盟的最初组织形式，这就是以后应以苏维埃形式固定下来的那个联盟的最初体现。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而在武汉时期，则应当到国民党左派内部去工作，以便争取群众，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但是，应当以怎样的组织形式来加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并没有详细说明。此外，共产党人还应当到其他现有的群众组织中去工作。在武汉时期，斯大林同志当谈到“未来苏维埃的预备成份”时，特别强调工会和农民委员会这样的群众性组织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组织在运动的准备阶段，应当看作是动员群众的最重要的实际组织形式。但是，是否还有能达到同一目的的其他组织形式呢？这些组织形式当然也应当成为

“未来苏维埃的预备成份”，这就是说，这是一些在夺取政权的时刻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苏维埃的组织形式。

有些同志曾几何时设想过以工农党代替上述组织形式。现在，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看到，切不可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推荐这样的组织形式。这种工农党极容易蜕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党，很容易脱离共产党人的影响，因而不利于同广大劳动群众保持接触。哪怕有一点念头想要以这一类的党来取代真正的共产党，那也是绝对错误的。我们主张同农民建立联盟，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各阶级的大杂烩。

在提纲草案中，我举出了其他一些形式作为例子——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读一个有关段落：

“举例说，由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工会这样一些松散组织形式的代表参加、经过精心筹划而定期召开的联席会议和代表大会，这可能是适宜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由这种会议选举产生的共同革命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各种群众行动，组织与会者向工农群众作报告等等，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共产党能够对这个运动起领导作用，尤其是在革命高潮时期，那么重要的是，党不仅要以共同口号的形式去建立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在直到可能着手组织苏维埃之前，还要在它们之间建立适当的组织联系。”

完全可能，适用于各国和各种条件的统一组织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各个国家所采取的形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因而，应当是有伸缩性的。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但是，这项任务至关重要，必须在大会提纲中提出来。

殖民地国家革命工人运动的特殊困难

在中国，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整个无产阶级都取得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在这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远远地走在现阶段的印度无产阶级前而，虽则印度工业比中国发达。我们在中国非常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高潮期间，一个月内取得的革

命经验，能比通常情况下几年积累的经验还要多。印尼的革命工人运动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南非的革命工人运动也有了牢固的根基。但是，其他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尚处于幼弱的初期发展阶段。

要想了解组织革命运动的全部困难，首先是建党的困难，就得重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特点。首先，这几乎都是第一代无产阶级。大多数人来自农村，而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还要回到农村去。他们主要是纺织工人。在他们队伍中间，熟练工人甚少，而女工和童工较多。殖民地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那里的劳动力异乎寻常地迅速消耗殆尽。所以，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头等重要问题的职业病问题，在殖民地国家只不过是次要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据说在印度平均寿命是二十四岁，而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寿命要高一倍。各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颇难组织。它行动单纯，易于冲动。这个无产阶级容易领导，但也容易被引入歧途。

……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经验比较丰富的党，当然，它是功绩昭著的。除苏联共产党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英雄和烈士为数最多。成千上万的中国同志表现出，他们能为革命事业而斗争。但是，在革命的形势下，能斗争总是要比善于掌握克敌制胜的艺术容易些。我现在说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以往的错误，而是这个党的目前状况。数字告诉我们，这个党大小约略相当于德国共产党。当然，应当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还很年青，它没有那样的革命老传统，它没有经历过多年的布尔什维克的锻炼等等。因而，如果考虑到这个情况，那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目前，拥有十万或者更多一些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其状况怎样呢？中国同志自己说，大部分党员不是工人阶级成分，而

是农民，(皮亚特尼茨基马上说：“百分之八十。”)我们兄弟的中国党有这样的社会成分，当然是十分不正常的。党应该做更加扎实的工作，以便通过布尔什维克化教育来造就党的未来的干部，首先是由工人阶级中选拔党的干部。

除了这一必要的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工作外，党应尽力关心工会工作。同样，党也应当对反动工会做坚持不懈的工作，因为它们拥有工人群众。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必须在这一工作中坚决摒弃那种对工人实行任何强制的方法。

遗憾的是，这种方法在中国运动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声誉。这种方法为害之甚，不亚于机会主义错误。确立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联系，为了吸引和争取工人转向工农革命方面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以及揭露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改良主义——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决不可轻视的迫切的重大任务。

.....

(第4卷第19—25页)

第三十一次会议 (8月15日) 斯特拉霍夫作关于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

本来我想在报告里谈谈目前形势的问题。但是看来，在这次大会上将充分讨论殖民地问题。《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里也写了这一点。我认为，殖民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问题着眼进行讨论：1) 殖民地革命的特点；2) 革命动力；3) 殖民地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4) 殖民地的土地问题；5) 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库西宁同志的提纲所涉及的，就是这些主要问题。所队，如果我

只谈目前形势，即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派别的话，那我就不能论述这些基本问题了。

我们把中国革命称作伟大的革命，但是，你们都知道，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一个还很年青的共产党。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便可以看到，我们犯了多少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武汉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引为借鉴。

首先，我认为必须阐述作为殖民地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列宁说过：“必须宣布一切被压迫民族享有自由，即享有自决权，这对于以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1848年在德国，1905年在俄国）取得胜利，是至关紧要的，同样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也将是至关紧要的。”同时，应该提起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从一开始活动就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提到全世界运动的面前。但遗憾的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考虑到这种形势的全部重要性。它还没有充分掌握这一思想，即：虽然我们的革命是在中国进行，但这场革命同全世界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关于中国革命，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好像中国革命发展独特，纯粹是“中国式”的，中国是真正“难以捉摸的国家”，不单单欧洲的同志们感到中国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中国同志有时也会怀疑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独特的中国条件。

首先应该彻底搞清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年轻的中国党首先应该找到这个难以捉摸的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社会发展的共同性。这一点，对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的文化、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认真研究过的国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应该证明，中国并非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

正是因为以前我们总从似乎中国特殊这个前提出发，所以经常听到中国没有封建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甚至没有无产阶级的

各种论调。结果得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中国革命已持续了十八年，并正在曲折前进。军阀混战，人民举行起义，地主的房屋着火，一句话，存在着一系列革命形势。而且这些都发生在似乎没有地主、没有农民、没有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中国。革命是有的，但是反对谁呢？整个共产国际都清楚，这场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比方说，在四川省，一个军阀同另一个军阀打仗，乍看起来，这种厮斗还不能叫做反帝斗争。对于这些现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至今还没有充分了解，也还不能解释其原因和来源。

我们什么时候加入国民党的？是1923年夏天。那时候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它在广州有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的是杨希闵、刘震寰及一系列其他军阀的势力。这些军阀在孙中山主义的旗帜下，反对被称作北洋军阀的北方军阀。那时候断定说孙中山反对北方的战争具有革命性，这点对不对呢？是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时应该解释清楚，北方和南方有哪些军阀，为什么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为什么这种争斗又具有革命性。为解释这一点，我应该从中国的封建主义谈起。

人们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仔细研究。不应该否认，过去中国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根据这一点，连中国存在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现象也否定了，说什么它们被亚细亚式的专制暴政所代替了，那就错了。要知道，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农民和地主间的斗争。这场斗争证明，在中国，旧式的亚细亚式国家，即由集权政府、君主、皇帝统治的国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国家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这是问题的政治方面。至于其经济方面，那么，中国早就存在土地私有制。当然，一般说，中国没有西欧式，或象俄国曾存在过的那样的地主。但是，即使在中国，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大地主经济，可是现在和过去也还是存在占地达五万

亩的大地主，他们是靠租佃制度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

既然农民和地主之间已经在进行斗争。那么就不能再否定中国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从经济和政治观点上，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讲，中国只存在亚细亚式的专制独裁或帝制的残余。官员大量占有土地是得到政治上保证的。的确，以前占有大量土地的现象并没有地主经济的典型特点，也没有作为正式政权在其地段内直接进行统治。大土地占有者乃是御前军役贵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占有者在地方上没有权势。甚至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过去的习俗，即官宦、地主有审判其农民的权力。连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江苏省，也还保存着中世纪的封建剥削方式的残余，即典型的封建剥削方式的残余。不能把这些剥削方式简单地称做亚细亚式，应该研究其阶级实质。官宦，首先是地主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军役贵族。官宦们同为其劳作的人相比，享有非常大的特权。官宦们在中国起领导作用。他们是中国最大的地主，而在帝国主义渗入后，这个统治阶级又同清王朝站在一起，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变为广泛意义上的买办。姑且称他们为国家买办，因为形式上“国有化”的全民财产，铁路、矿山、银行、大工厂、重工业和大地产——都集中在他们手里，特别是在北方的省份山东和直隶。北京政府依靠的正是这种搞买办的官宦，并代表他们的利益。

这种官宦还叫做北洋军阀集团，因为北洋（北方）曾有一所类似蒋介石的黄埔学校那样的军校。在这所学校里，也和在日本军校里一样，接受教育的是过去的贵族，即过去的文官现在变成了军阀的武官。北洋军阀，从袁世凯到吴佩孚、冯玉祥，他们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不只是社会联系，还有组织联系，甚至裙带关系，他们是同学等等。在这个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时期，中国开始了反对这个阶级的革命斗争。

工人、手工业者、苦力、农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由于国内贸易和一般货币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他力量也参加了斗

争，其中有高利贷者、商人和小地主，他们在帝国主义者渗入之后也开始经商，主要是从事原料买卖。这些比较新的、由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势力，客观上都在反对垄断卖国大权的北京政府。因为那时广州、福建、四川的地方军阀，也想找到机会剥削农民和工人，但是，北京政府骑在他们头上。袁世凯独吞了北京政府从各省收来的所谓关税和盐税“余额”。于是，斗争就开始了，因为地方军阀不想把这些余额交给北京政府。如果以前能说，掌权的不是军人封建主，而是“文人”封建主，那么，现在这些“文人”已丧失了任何势力。这些文人封建主中过去势力最强大的，已开始转变为军阀。还在清王朝灭亡之前，总督们已有或大或小的独立势力。法国人把汉字“总督”译成法文的“亲王”。江苏、湖南等省的总督都扩张了自己的势力。现在，军阀已变成这样一种势力，它辖有经济基地，形成发达程度不同的地方市场，不受北京的约束。所以，很清楚，这些封建主必定要同官宦的中央政府作斗争，必定要反对全国性的买办，孙中山依靠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南方各省的货币关系比较发达。军阀是那里的地主，又兼做生意，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同时还保留中世纪的剥削方式，开始反对北京政府的，就是这个地方资产阶级。

虽然革命浪潮在底层也已开始高涨，但是，孙中山为进行反对北方的斗争，还是首先注意已由地方政权和封建资产阶级聚集起来的那些军队的力量，而且封建资产阶级还向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干部。为什么是最“可靠”的呢？因为孙中山认为，组织军队不应该利用自觉发动起义的人民群众，而应该利用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样的军队他可以任意安排，因为这样的军队由绅士、地主领导，同这些“懂礼貌的”人打交道，总是要比同那般“乌合之众”好商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必去唤醒农民和工人阶级这样危险的力量，因为存在着许多破产的农民、土匪，这些人容易被组织到雇佣军中去。最初在孙中山领导下反对北方的，就是

这些所谓可靠的豪绅、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力量。中国的豪绅在目前还不等于富农，不知为什么《真理报》有一次把他们误称为富农。这不对。

就这样，军队中的这些豪绅和地主便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开始活动了。当然，他们不能不引起群众运动，因为这场斗争已经是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

中国革命中开始出现了新生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们知道，当战争在孙中山同北洋军阀间进行的时候，打着护法旗帜进行斗争的孙中山，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当然，除此以外，他为了耍手腕，也用了一些漂亮的政治词藻。后来爆发的被称为五四运动的1919—1925年的革命学生运动，可以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时期，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已开始积极活动，近百年来在西方和几十年来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过程都开始出现了。这里有白话文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小组、巴枯宁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正是在这个时刻，还十分年轻的、人数不多的中国无产阶级，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19年发生的上海无产阶级第一次罢工是反对日本的：抗议日本占领中国的青岛港。确实，罢工是在商会的领导下由工头们组织的，是在学生会领导下组织的。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因素。罢工首次在上海持续了七天，所有的外国工厂都关闭了。

从那时起，罢工运动不断发展。1921—1922年发生了海员大罢工，迫使英国人签定了在太平洋上航行的轮船的集体合同。同一年又发生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它奠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会运动的始基。

虽然在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遭到严重失败，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工人罢工运动开始广泛发展，并把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全新的力量纳入到中国革命中来。

就这样，在中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参加革命了。这里用不着讨论，是否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生活本身已经表明，在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接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接近必定是暂时的。问题仅仅在于，应有什么样的战略路线。同资产阶级联合和协作的条件已由列宁准确而明白地制定了。他已指出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搞联合，以进行反帝斗争。这些条件是：1) 共产党人应该有独立性；2) 共产党人应该有组织工农群众的可能性；3) 资产阶级应该真正进行反帝斗争。

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就已存在，所以现在否定这个可能性是毫无意义的。这里用不着去驳斥那种错误的想法，即根本就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合作，象托洛茨基理论所企图证明的那样，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已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国革命从第一天起就要反对资产阶级，就要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要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那时民族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掌权，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而中国革命发展的全部历史也会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但我要重复说明，问题根本不在于能否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而在于无产阶级应如何进行斗争，使这一斗争指向帝国主义，同时使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失去活动能力。在民族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唯一的、很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主要注意力应在同盟者农民身上。

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过，以为对农民没有明确的态度，无产阶级政党就能在殖民地真正贯彻共产主义政策和策略，那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列宁教导说，在殖民地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那里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必须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合时，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把着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便从共同斗争的第一天起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失去活动能力，从而把农民引

向前去。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标志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立即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势必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搞各种名堂争夺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争取掌握群众。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想、现在仍想利用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

1925年五卅以前（1925年2月），上海的日本纱厂里已有过罢工。日本企业主同工人签定合同后，拒绝执行，因此，示威工人和厂方发生了冲突，而且，日本人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当局，主要是英国当局，为了防止工人和学生为抗议枪杀工人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在南京路上开枪射击示威群众，四名大学生被打死（5月30日）。尽管在上海，政权实际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次枪杀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立即发动了上海的、然后是全国的工人群众。在这些日子里，上海成立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小商人组织的联合机构，简言之，成立了一切工厂、学校和商店罢工组织的联合会。在中国，这一切都叫做罢工。为领导总罢工，组织了“工学商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递交给上海英国当局的十七条要求。

代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参加了这一运动，但它的参加只表现在它……保持沉默。起初，商会甚至反对这个运动，但在群众压力下，它只好宣布罢市。货币交易和交易所交易全部停顿了。一切买卖全部停业。商会沉默了不过一个星期，可是，它一表态，就原形毕露了。商会同外国人本着这种精神开始进行谈判：似乎说工人提出了过激的要求，他们（商人们）主张缓和这些要求。商会代表们申明：“我们只要求让我们的代表进入上海市租界工部局；我们只要求开会讨论关税率、讨论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至于说外国军队撤离上海，罢工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那么，上海商会早已将这些要求抛到一边去了。商会代表在北京外交官员参加下同外国外交人员的谈判中，故意

忽略后几项要求。半小时之后，上海商会的那位代表，十分坦白地同一位共产党员、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谈话，向他宣布说，不能要求罢工自由，因为如果有罢工自由，那么你们工人在中国工厂里也会罢工。

此后，工会委员会和商会间便立即出现了一系列冲突。事态发展越来越激烈。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先在地方范围内试图“调停”使工人运动就范。上海的革命组织开始被封闭，不仅是工会，而且连学生会、当时也进行反帝斗争的小商会也开始被封了。不应忘记，上海五卅事件对中国革命有巨大意义。这是独特的中国式的1905年1月9日。虽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想阻止群众进一步开展运动，虽然上海资产阶级劝阻工人先在日本工厂、后在英国工厂停止罢工，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运动蔓延到全国。到处都有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革命运动在广东的广大群众中发展的规模特别大。香港罢工几乎持续了两年。这次罢工期间，广州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罢工委员会，它是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第一个国民政府的基础。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斗争，如果没有城乡广泛的革命运动，那就不会有国民政府。广州工人参加了斗争，组织了纠察队，并着手没收香港的英国货物，——只是在这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国民政府。甚至孙科也承认这些事实。罢工中建立了群众性的组织机构，罢工和广东省日愈增长的农运浪潮并行涌泻。恰好是在这个时刻，孙中山军队内部、国民政府军队内部开始了大改组。这时候黄埔军校也已开始工作了。该校有相当强大的左派组织，下级军官中有共产党员。就是省港罢工和农运的这些补充力量，成了第一个广州国民政府的基础。从五卅到1925年秋，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蜜月”期。然而，即使在那时，尽管存在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经常出现尖锐的、明显而公开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国民党内部的相互关系上有反映，在共产党和左派为一方同右派为另一方的冲突中，也有反映。最

后，这些矛盾发展到明显破裂的程度，引起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的政变，破坏了民族统一战线。这样，阶级关系便影响了民族统一战线。总称为“三·二〇”的整个事件，就导致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还在1925年秋，就已开过西山会议。这次会议是极右派对民族统一战线、对广州国民政府、对发展工农阶级运动表示的一种“抗议”。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实已经说明，过去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即豪绅和地主的那些势力，已经感到群众运动在增长，懂得他们应准备进行一定的反击。西山会议派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反共斗争的领导权，坚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排斥出去。除西山会议的右派之外，国民党内配合这次西山会议，开始形成以戴季陶（右翼国民党人）为首的所谓“新右翼”，他的著名小册子《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乃是向共产党进攻的开端。他的理论实质是，说什么共产党不应盲从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总想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戴季陶劝共产党人暂时自愿退出国民党，答应此后国共之间将建立良好的友善关系。就是这个“友善”的诺言，使他的立场同西山会议派（老右翼）的立场有了某种区别。

新联合形式的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否接受这个建议。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们不想退出国民党，而将在国民党内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

在作出共产党人不退出国民党这一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另一决议：邀请戴季陶和其他新右翼分子（他们与西山会议派不同，坚持说有决心保持同共产党人的“友善”关系）出席1926年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可见，党那时遵循的战略方针是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起，一定要同它在一起，暂时只应进行反对“劣绅”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恰好是在这个时刻，共产党人犯了一个大错误。

这时汪精卫、蒋介石等人领导下的国民党左翼，在群众的直

接压力下，曾打算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对地方上的豪绅和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左派也想采取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路线。恰好在这个时候，胡汉民、熊克武和其他人被捕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其政策的主旨是尽可能地迎合共产党。因为左派自知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他们只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而共产党人是这些群众公认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罢工委员会及其所领导的几万工人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共产党领导着农民进行反对地主和民团的武装斗争。黄埔军校——国民党军队指挥人员的后备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民党军队思想的代表者，其内部却已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甚至那些预见能力不如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掌握国家机器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最清楚共产党的实力和能量。他们也看到了国民党左派所处地位的弱点。因那时有一种是公认的说法：国民党左派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同共产党联合，而不是相反。

迎合共产党人并与之妥协的策略改变的时候，恰好共产党人也开始改变对戴季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共产党人只希望能维持民族统一战线，甚至未提出自己的任何要求就表示愿意向以戴季陶为首的日益寡廉鲜耻的“新右派”分子让步。

左派开始动摇了，而“新右派”开始抬头。黄埔军校的分化加剧了，自称孙中山派的戴季陶集团强大起来。“孙中山派”加强军事训练，积极同军阀们勾结，并转而逐渐对工农采取攻势。他们认为，以往的全部政策是过于极端的政策，左派也开始同意这一点。甚至共产党人自己也觉得政策的确“有些冒进”。在共产党员中间，开始有人散布这样的论调：“是否应当缓和工人运动，是否应当减弱农民斗争、限止工人罢工”等等。这些论调不但没有受到反击，反而常常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

共产党人的策略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对于蒋介石搞的3月20日事变，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蒋介石见到共产党人

的动摇政策，便鼓足了劲，决心搞政变，此后又开始纠集力量准备继续进攻。事态全过程向我们指出，与资产阶级同路时，与资产阶级联合时，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资产阶级随时都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变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应该记取，任何让步都换不到资产阶级的友谊或友好关系。只有基于开展群众工作、群众活动、群众斗争的独立的阶级路线，才能在一定条件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共同参加反帝斗争（这也只能做到一定的限度），才能在群众压力下迫使它表示让步，而不是友好。

3月20日之后，南方和北方的反动势力又猖獗起来。北方张作霖手下的名将郭松龄，曾起义反张作霖，他被打死了，起义被镇压下去。当时的红色分子冯玉祥退出了天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失去红色将军冯玉祥的控制后，决定开枪扫射北京3月18日游行的学生。我们曾经怎样评价这个时期的革命形势呢？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轻信了蒋介石宣言的真实性和他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蒋介石高叫，必须象过去国民党人服从孙中山那样服从共产国际，共产党人就幼稚地信以为真了。从南到北，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的这种种企图，被评价为革命浪潮的低落，虽然当时工农运动不断加强并有向上的趋势。根据这一“革命低潮”的理论制定出了即使在确有低潮的情况下也是错误的策略。这个策略的实质是迁就3月20日事变的条件，委曲求全留在国民党内。5月15日会议通过了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决议，使3月20日事变合法化了。而共产党人则努力迁就3月20日事变的条件，把这一决议看作不能逾越的界限，只求不破坏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及其日益寡廉鲜耻的朋党们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向戴季陶所作让步的结果。

说到群众，那他们不能容忍3月20日事变。在一段时期的低沉之后，上海又涌起了席卷一切的新罢工浪潮，广州的工人运动规模更大。工人们在广州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它在广州起义

期间成了苏维埃的基础。农民们组织了省中心机构。广州提出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和减少地租的口号。所有这些新的革命行动,都是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活动同时进行的。那时候,中国的,特别是广州的小商人,脱离商会,单独组织起来,并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个运动就是所谓左派反对蒋介石运动的基础。只是因为这种种群众运动,国民党左翼才对蒋介石进行抨击。国民党左派提出实行民主的口号,以对抗军人专政的口号。接着,同年10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党部的联席会上通过了一整套纲领,这套纲领后来就成了武汉政府的行动纲领。纲领中涉及了地租问题、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日、甚至政权形式问题。纲领规定,在北伐军到达某县或某省时,立即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并将政权移交国民会议,因为已决定,政权不能归军队总司令蒋介石。

左派反蒋斗争一直持续到上海事变。这一过程证明群众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最广泛的发展。以前曾经打算利用广大国民党员进行反军阀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转到了豪绅和地主方面,转到军阀方面。这说明,3月20日之后,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两派或两翼。一翼是豪绅和地主,即所谓的老右派和新右派——以蒋介石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另一翼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间的斗争不断尖锐、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上海事变。

在某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一点仅从下述情况便可看出:湖南、湖北、江西的一些县,在南方军队占领武汉后,政权掌握在农会或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手里。这类群众组织在自己的辖区内为所欲为。工人纠察队,甚至儿童团员都逮住了自己的主子——豪绅。甚至有一次,一部分群众捉住一个军阀,因他逮捕过农民,就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以儆效尤。这种专政势必扩大,并从非法政权发展为合法政权,即使武汉政府都受其辖制。蒋介石很清楚地看到新专

政的萌芽，看到这个专政对于武汉政府有何影响。这就是他为什么执意不肯去汉口，因而也不承认武汉政府所建立的一整套制度。蒋介石不肯前往，但却在军队的武力掩护下暗中纠集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力争迁都南昌，即迁往蒋介石的大本营，建议将其政权合法化。武汉政府在群众极大的压力下采取了勇敢的做法，保留了都城汉口，不去蒋介石的大本营。现在，与蒋介石的大本营——右派政权的中心——对峙的是武汉政府，其领导人在此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劳动群众的运动。

于是对于以武汉左派为首的革命联盟，再次形成了空前有利的历史时机。蒋介石疯狂地纠集其势力以尽快到达上海，同他的发祥地有亲密关系的上海资产阶级凑在一起。这次在上海他没能轻易地马上抓到政权。

蒋介石来到之前，上海已建立了工人、学生和小商人的政权。这就证明，上海工人组织得更严密，已有更多的革命斗争经验，其做法也不象汉口工人那样，单纯等待南方军队到来。上海工人用两百支手枪和步枪打了北方军阀的八千正规军，夺得了武器，并组织了两千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工人队伍已装备了机关枪和小型迫击炮。所以，这支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是一支能够反击蒋介石的可畏的力量。为了解除这支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首先要把他的军队中“不可靠的”部队调出上海。为了解除工人的武装，蒋介石拼命忙了二十天。为此目的，他散布了种种诽谤工人的流言蜚语，同时为了蒙蔽工人，他又讨好奉承他们。只是在得到上海商会代表的钱并确信武汉政府领导人漫不经心之后，蒋介石才决定解除工人的武装。他满以为靠这些钱就能取得南京和浙江的其他军阀的支持。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拿定主意采取解除工人武装这一步骤。决定解除工人武装等于向武汉挑战，因为武汉承认了起义后所产生的政府，以此表示赞许亚洲第一次胜利的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知道，他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就是对民

主的武汉开衅，可是武汉政府的领导人竟至如此鼠目寸光，直到这时还没发现自己作为左派政权所遭受的致命打击。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是十分残酷、十分尖锐了。最初提出的口号反映了争取政治影响的斗争，可是现在实现这些口号，要通过两个营垒的斗争：一方是蒋介石总司令，另一方是依靠武装工人的国民代表会议，这是上海的情况。武汉怎样呢？也是这样。

汪精卫假惺惺地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了一番，“决心”同南京决裂，武汉被迫同时一方面对付蒋介石，一方面对付张作霖。汪精卫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地方上与蒋介石有联系的豪绅的进攻，害怕到极点。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本应开展土地革命和群众斗争，激化阶级斗争。但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受了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影响，也开始说，可能工农确实过火了。当时甚至有这么一种意见，说我们似乎过于侧重开展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认为群众对反帝运动认识不足，因而党就应该搞第二次“五卅”，让我全民族子孙感到国耻而忘记阶级斗争的激化……

各地的共产党人，即当地的农民，已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武装起来，在可能的地方夺取政权。

可是有些共产党人，准确些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却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认为革命应该经过宣传阶段，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农民有革命的权利。群众已冲到前面去了，而领导落在后面，还想把群众拉回来。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懂得，他们已习惯于同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思想。共产党人已经在反对蒋介石、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了。如果这一运动继续发展，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论如何不能维持在过去的范围内，可是党的领袖们还在想，为了维持现状，稍微停顿一下群众斗争的发展也未尝不可。

汪精卫回国后马上懂得了，帝国主义者把他当作政府首脑，向

他施加压力，蒋介石也在攻击他，而另一方面，他看到，汉口商店纷纷关门，罢工、罢市，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农村在进行夺取土地、反对一切土豪的斗争。汪精卫开始劝说共产党人：对不起，群众应该先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是说：“打倒帝国主义”，就可以向工农解释，应当帮助我们国民党打张作霖和帝国主义的其他代理人，这就是反帝斗争。你们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同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作斗争，因为大家都认为，也应该认为，北洋军阀是卖国军阀。而我们，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人呢，这都是好军阀，不卖国。左派反蒋运动开始后，最近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只打劣绅。汪精卫来汉口后开始指责共产党人：“我们已同你们说好，只反劣绅，可是你们共产党人说要反对一切绅士。这不行。”什么是劣绅和开明绅士呢？小绅士反吴佩孚、张作霖，反旧官僚，他们都高喊：“世界革命万岁！”也喊：“打倒劣绅！”而当工农喊起“打倒乡绅，乡绅没一个好人”时，汪精卫害怕了。另一方面，因为汉口的工业无产阶级几乎专门反对帝国主义企业主，因中国工厂主很少。所以帝国主义者关闭了企业，离开了汉口。十二万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和城市中的斗争开始针对商店老板，所以，出现了商店店员的处境和前途的严重问题。整个工会运动最后的结果几乎就是商店店员罢市。于是，汪精卫去找所有的商人搜罗材料。然后，他到共产党的会上说：“诸位都看见了，商人们关闭店铺，甚至小商人也受店员罢市之累。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也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你们搞的罢工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你们的开路先锋（青年工人）不干活，在场房里搞体育活动。不能这样做。你们已经打算创建社会主义了。你们不是自己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还没到吗，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要没收企业和汉阳的一些工厂呢？”共产党人辩白道：“这不是我们，而是工人自发地进行没收，因为工人想干活，可是老板关闭企业。于是我

们去领导运动，并在工会参加之下，正确地组织这些工厂的管理工作。”汪精卫反驳说：“你们骗我们，我们有共产国际的决议，上面写着，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许你们已经收到了密电，说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此后，汪精卫改变了策略，他没有反对没收土地、工厂等等，不一般地反对工人罢工。他提出了一系列这类性质的建议：不要这样没收土地，要规定谁、在多大程度上对土地的私有应受到限制；不要这样罢工；不要这样反军阀和反帝。他的目的昭然若揭：把革命挤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它，把它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总之是对革命进行控制，而控制者则由小资产者——汪精卫来充当。

对此，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同意了，其政策的英明之处就在于“可不要同汪精卫吵翻了”。早晨共产党人答应了汪精卫，晚上汪精卫就来说了：“你们答应阻止工人抓人，可是五分钟以前就有一个工人抓了老板。怎么办？你们先许愿，接着就欺骗我吗？”照直说吧，共产党人的处境的确尴尬，共产党人想作出让步以恢复同国民党原有的良好关系，撮合已遭破坏的统一战线。但是一无所获。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共产党人一直想维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可是这又不可能，于是就打算至少要维持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且必须与之共同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过去曾有一种意见，也算一个“学说”，认为中国只存在小农经济，没有地主。后来忽然谈起土地革命，于是只好划定，多少亩是小地产，多少亩算大地产等等。而把农民和农民的“财产”忘记了。全部原委在于中国没有大地主经济，存在的是地租制。同时，甚至连最小的地主，他们在城市或农村供职或任教，每月也只有二、三十元的微薄收入，这些人也主要靠地租收入生活，并且更用心地去榨尽农民的血汗。至于划分谁是大地主，谁是小地主，对于农民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农民反正都是耕种租来的那

一小块土地。别管是向大地主还是向小地主租地，他照样得交租、还息。他耕种的那一小块租地的地产性质问题，对他没有什么大意义。

我在意识到中国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之后，曾在一个委员会里同谭延闿、唐生智和其他人讨论过多少亩地可定为小地产的问题，但是谁都从来没去过农村搞清事情的确实情况。

由于党张皇失措和帝国主义者的压力，由于整个客观形势给武汉政府造成的困难，所有同情蒋介石的势力、豪绅、地主开始在武汉政府内部准备反革命政变。首先在武昌附近发难的是夏斗寅，接着是1927年5月21日长沙许克祥轰动一时的政变。湖南也重演了上海、广州惨案，逮捕和枪杀了共产党员以及几千名拥护党的工人。在反革命公开的武装叛乱期间，在农民建立自己的队伍攻打长沙城期间，共产党人还在对农民说：“解散回家吧，等着武汉政府解放你们，相信这个政府会镇压地主的反革命势力。”同样的事情，在江西和湖北也发生了。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情况在广州和上海发生得更早一些。广州李济琛政变后，在五华和海陆丰农民举行起义时，在广州发生铁路工人和机器工人反对李济琛的起义时，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毫无作为。中央委员会简直是怕沾边，所以工农遭到了失败。获悉广东工农在组织队伍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他们请到武汉来，但是未给他们任何指示，未告诉他们应如何进行反对李济琛的斗争和怎样在农村和各县城巩固力量，以集结兵力重新向李济琛发动进攻。

最后，共产党人决定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有两个共产党员在那里担任部长：农业和内政部长——谭平山，劳动部长——孙少哲^①。

即使在解决退出政府问题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还以为这次退

^① 此处有误。应为：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编者

出应是一种手段，旨在缓和同汪精卫的关系。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留在武汉政府内，会给人以口实，说武汉政府是“赤色”的；如果共产党人退出，这必将缓和政府的处境，人们便会将其视作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

在这些致命的错误之后，共产党人决定宣布退出政府，但仍然留在国民党内，开展了反对武汉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运动，并开始号召群众展开反对在南京的武汉政府。

这个政策中有了某种新内容。由于共产党人继续在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贺龙和叶挺的起义失败了。国民党时期就此结束。这是党的领导最薄弱的时期，那时党的领导不了解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中的策略。共产党人后来纠正了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当然，不能断言，如果共产党人没犯这些错误，那中国革命一定就胜利了。还必须估计到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独特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应该看到，封建资产阶级有一整套雇佣军队，这支军队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其驯服的工具。所以，当斗争在以工农为一方向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为另一方——这两种势力间开始发展的时候，革命的敌对营垒拥有相当大的、不易击败的军事实力。

武汉政变后，有一班庸人开始解释，说过去的一切失败都是因为国民党内有共产党人。现在，上海、南京、武汉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反共了，看来，国民党的统一出现了，也就是说，反对阶级斗争的“国民”革命到了鼎盛时期。不言而喻，所谓统一的形势，并不象市侩之辈所想象的那么美满。反动派确实在纠集势力，而且在争取消灭武汉革命中心时忘了自己的内部矛盾。但是，武汉革命中心刚一消灭，国民党内部就暴露了各派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因为国民党军阀们代表着不同的反动社会势力：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等等，他们在各省都有自己地方上的巨大利益。

反动派感到，由于革命失败解除了对它的束缚，它能自由行动了。于是，它转入全线进攻。最反动的右派西山会议派，在南京掌了权，狂傲声称：“我们是最先反共的。连蒋介石都反对过我们西山会议派，江精卫那时反我们特别厉害。现在你们自己明白了，为民族、为国民党、为着共同的幸福，必须反对共产主义。”当然，西山会议派不只是因为这一点掌了权。广西派（西山会议派）早已开始同英国人勾搭。李济琛和其他人，即所谓的桂系，代表地主豪绅中最反动的分子，同广州和上海的买办多少有些联系。英帝国主义者违背蒋介石的意愿，把李济琛扶上台，因为蒋介石这时已开始真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多方勾结了。另一方面，蒋介石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无论如何总想表现一点革命性，为此目的使用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词藻，并力图以此把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1927年9月1日，蒋介石答应实行关税自主。英国人所不能原谅的正是这一点。桂系应英国人之愿，赶走了蒋介石。

汪精卫也参加了反蒋斗争。对于那个时期的汪精卫，蒋介石过分“军人气”，是过分独立的军阀，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当时的格言是：“即使没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也能完成土地革命，给工农安排好生活。为此必须赶出共产党人，让蒋介石服从武汉国民政府。”小资产者汪精卫还在其主子——大资产者和自由主义的地主面前耍了一点威风，而这些人中心却是在南京蒋介石的军队大本营里。汪精卫感到，背后支持他的是在湖南和长江流域有利益的军阀唐生智。汪精卫以反蒋斗争的思想家出面，也代表这个军阀的利益。除桂系外，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还有汪精卫和抱住武汉政府的旗帜不放的一切散兵游勇，另外，国民党南京时期以前的主宰者孙传芳，也已开始反对南京方面。同共产党人决裂后，国民党内部暴露了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南昌起义，其背景是长江流域国民党军阀激烈争斗。

国民党的混乱和冲突时期，继其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之后接踵而至，这一时期就是广州起义的准备时期。

当时国民党内部根本没有联合起来。即使有人曾想在上海召集有汪精卫、蒋介石和李济琛参加的会议，那也仍然谈不到联合，因为南京、武汉和广州各自为政，任何一方都不愿向对方让步。这些派系间的角逐开始了。

汪精卫来到上海，开会了。孙科的第一句话是：“汪精卫这个混蛋。”李宗仁接着说：“汪精卫要是来开会，我就逮捕他。”汪精卫于是马上为自己提出在上海言论自由的要求。恰好在这些日子里（1927年11月中旬），广州发生张发奎事变。关系更尖锐化了，因为此次事变是反李济琛的。彼此都想逮捕或推翻对方，哪能谈上什么联合？汪精卫在为自己争取在上海言论自由的同时，却向广州发出指示逮捕共产党人。汪精卫的“左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广州事变（汪精卫部的黄琪翔反对桂系的黄绍竑）后，广东省个别县的小军阀间开始了一系列冲突。李济琛被迫去上海，黄绍竑——到广西。广州附近象其他各地一样，农民纷纷起事。还在张发奎事变之前，海陆丰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所反映，在南京开始议论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问题了。武汉也是这样。恰好在事变之后，汪精卫发布了减租及其实施办法的决定。汪精卫打算证明，即使没有共产党人，小资产者也能实现土地纲领。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正讨论“劳资仲裁”法。参加讨论的每个人都力争提出比较激进的对付工人的办法，因为尽管在长江流域并没有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在湖南、湖北等某些地方，当时正有农民起事。所以，在国民党军阀的这一“自治”时期，革命于屡经特别惨重的失败后正欲重新振兴。直接革命形势的来临在广州更加明显起来。贺龙、叶挺在汕头失败一个星期之后，广州便开始了罢工者和海员的大游行。

从这一天，即从10月14日开始，直到广州起义，罢工从未停止。这个时期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

这个口号是在共产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左派决裂之前，工人自己提出来的。还在共产党尚未最后决定如何对待汪精卫之前，群众就提出了“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因为党内甚至有过同张发奎和汪精卫开始谈判的想法，就在不久前还有些人认为需要同张发奎搞军事联合。但是，工人们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反对汪精卫。

广州起义前形成的整个形势说明，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应该认真仔细地研究广州起义，以便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只是在武汉政变后，党的领导才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开始大力反对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这才转入另外的轨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也被承认了，而且决定在湖南、湖北举行一系列地方性起义，因为那里确实具备相应的条件，应该举行起义。

认为当时中央委员会不知道起义一事，实际上是错误的。决议是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18日或19日通过的。决议的要点是认定广州起义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当时要求很好地组织起义，以便把全体工农发动起来，预先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把广州本地的群众组织起来，起码要组织工人代表会作为未来起义的机关。这一切并不是说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没犯任何错误。可以指出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应该确认这一事实：这个决议是党中央通过的，是由广州的省委执行的。

汪精卫还在广州起义之前就知道在准备起义，再说，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即将举行起义一事，已是满城风雨，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共产党人已得到一定情报，知道12月10日或12日反动派准备袭击工人组织，正酝酿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因为那里有一

个很大的共产党支部。正因为如此,预定的起义日期提前了。

广州起义被镇压后,12月13日和14日在广州四郊爆发了一系列准备程度不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省委在某些县里组织的,在佛山、铜鼓等地,也爆发了一系列有工农参加的起义。在那里,即小城市里,一切获胜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这些起义失败了,因为主要中心广州已被击破。

上述情况确实证明党对广州起义做了一定的准备。如果估计到党的现有力量,那么广州本地的准备工作是以最快速度进行的。广州斗争的领袖,起义期间被杀害的我们亲爱的张太雷同志,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之内,简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激烈的巷战前夕,当然是无法马上组织选举运动的。于是举行了有一定合法性的工人代表会,有七、八十人参加。会议选出六个同志进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此外,建立了士兵支部,在广州地区的农民中进行了选举。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因存在时间短,的确没做许多事情,但它确曾是起义的机关。它的作为不大,是因为那时在起义期间,一般说难于任命或选拔人材。这个时期发生了汽车司机罢工,其他工会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还有对起义持中立立场的一些小厂的机器工人也举行了罢工。然而动员更加广泛的群众,更好地组织这些群众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描绘了清楚的画面,证明工人们多么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选出了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及以它为代表的司令部。现在,起义过后,却有人说,什么群众大会,只召集了很少的人。但是,应该说,起义司令部门前两天里一直有四、五千工人挤在那里,要求发放武器。告诉他们,你们去参加群众大会吧,去大会上欢迎新政权,但工人们喊道:“不,先发给我们武器”。想确定起义人员有多少枪的时候,数目字报到了八千至一万,看来,至少有七、八千支枪,因为有很多枪已打坏了。参加起义者总数不下三万人。这个数字是参加者自己说的。对于广州来说,这就不少了。在群

众自己要求武器的情况下，问题就只在于如何更好地组织这些群众，如何直接开始进攻主要敌人。

除了政治上准备不足和总的组织工作准备也不足外，广州起义期间我们的主要错误还在于，起义开始后选择的主攻方向并非敌军重点的地区。这一次攻击就耗费了很多时间——几乎十二小时。这就给李福林以时间，使他把部队调过河来，而我们则处于防守地位了。主要错误就在这里。

至于有人说中国机器工人反对起义，这种对待机器工人的错误态度，已有不下五年的历史了。在这方面，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呢？这里应该提醒的是，在左派政府时期，共产党人在这些机器工人，即工业工人中间曾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兵工厂里有一个很大的支部，广州有三条铁路线建立了支部，它们在机器工人中享有威信。但问题在于，除了铁路工人、兵工厂工人等参加的这个机器工人的赤色工会外，还有另外一个机器工人工会存在，更确切些，汉语名称可译为：机器工人协会。不能把这个组织看作工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协会是广州的一个国民党员（最右翼）组织的。他本人是个大资本家，掌握着几家工业企业，同时又是高官。广州的机器工人很多。孙中山当政的第一时期，当大规模整饬城市的时候，需要这样多的机器工人。可是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电灯按好了，电线接通了，这批工人也就失业了。资本家黄金荣把他们组织到反动工会中。李济琛发动了1927年4月15日政变后，赶走了所有在职的机器工人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的所有会员、铁路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并代之以反动工会会员，仅仅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广州起义前，我们在机器工人中间没有势力。我们几千名同志被逐出企业，广州几千名真正的无产者被赶到街头。但是，这是在起义前很久，4月间的事。严重的、真正的错误在于此后我们没有很好地对取代我们同志的那些机器工人做工作。认为在起义期间机工队伍是反对我们的，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因为

反对我们的不是机器工人，而是这个资本家——机器工会头子的雇佣兵。机器工会内经常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这是一些雇佣兵，其中确有一些真正的工人，但是资本家发给他们很高的工资，还是在孙中山时代，他们就是资本家掌握的反对工人运动的工具。就是这个“工会”，在广州起义期间反对过我们。但不是所有的机工都反对我们，仅只是这支“敢死队”反对我们。其他多数机器工人保持了中立。

广州起义前五个月，罢工的机器工人曾要求国民党政府没收小厂，并将其变为工人的集体劳动组合。当然，国民党不会同意。起义后和起义期间，机器工人们读了共产党关于大企业国有化和必须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宣言。于是机器工人们就开始议论了：我们没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大糊涂了。我们在五个月内未能实现我们的要求。可是，如果起义胜利了，我们也就满足了。这就是在起义之后马上开始在机器工人工会中组织支部的原因。当然，人们会说，这已经太晚了，但是，俗话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广州起义之后，广东许多地区的游击战争仍在广泛发展。广州市所有的组织都被破坏了。广州工人开始往其他城市写信。工人们在寻找党。工农在起义以后开始大批参军，共产党人收到那里的来信：“你们为什么不组织我们？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你们？你们知道，现在的活动是多么秘密。现在，在城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党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广州立即出现了这种形势。

广州起义之后，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这次失败比武汉那次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时刻，正值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在国内也不能达成协议，而帝国主义者却已动员了一切力量镇压起义。英国公使亲自向李福林提供援助。英国舰队运送李福林的兵，因为中国海员参加起义了，所有船只停运，李福林只好求助英国舰队为其运兵过河。当然，帝国主义者的兵力大大

超过起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大，不仅因为它有舰队和士兵，还在于它已开始从政治上组织国民党的反革命力量。

广州起义后，汪精卫派作为中间派马上就销声匿迹了。汪精卫走了，汪精卫派彻底向蒋介石投降了。蒋介石得逞了：他把西山会议派赶出了南京政府，把李济琛等人争取过来，同他在“新”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纲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这样，便出现了运动的彻底极化作用。一方面是反革命阵营的某种联合，另一方面，在革命营垒里已经兴起了苏维埃的旗帜。革命力量——工人、农民、甚至还有雇佣兵，集聚在这面旗帜之下。农民不但没有离开革命，而且开始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广州起义还有一层意义，即它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向士兵群众提出了新的思想：士兵——这部分最驯服的、无私的群众——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进政府。广州起义后，士兵哗变不仅更加频繁了，而且转入到更加自觉行动的阶段。这些行动扩展到海陆丰、海南岛及其他地方，那里的士兵纷纷转到起义农民方面。这一切都说明，广州起义把反动派推向某种联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总的来说，起义并不是革命的失败，但从这时起，开始了革命低潮。我们知道，广州起义后，全国范围内的恐怖马上就加剧了，马上就各种法令和命令取消了仲裁和已签定的一切劳资合同。工人阶级的一切成果都被断送了。取消了减租的法令。反动派在镇压广州起义后开始加强其势力以进攻工人。对工人的这种进攻，不仅发生在中国范围内，而且也发生在“国际”范围内。在广州起义之后，马上在上海召开了各国商界代表会议，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协会——英、日、华纺织厂主联合会，以共同进攻上海工人。在这一切之后，蒋介石得以把自己重新置于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劝住了李济琛不要妨碍“北伐”。一次新北伐开始了。但是这一次“北伐”是要在全中国建立国民党的反革命制度和国民党的反动政

权。这一次国民党的战争，对于工农群众来说，已经不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战争了。

蒋介石想利用新北伐，通过夺取老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办法实现其“完成国民革命”的宿愿。这就是蒋介石从以前的“民族主义”所保留下来的全部内容。反动派需要他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没有他的漂亮的空话，没有他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反动派无法混日子。蒋介石作为军事独裁者也是有用的。虽然广州起义后工人运动在各地，起码在大城市里已被镇压下去，但是就是在这一局势中，反动派仍然忧患新的浪潮、新的高涨。因为在纯粹由国民党统治（蒋介石政变后）的几乎整整一年里，国民党的口号一个也没兑现。恐怖加重了。国民党刚开始迫害共产党的时候，小资产阶级还可以这样想：也许，没有共产党也真能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也许，确实是共产党人煽起的阶级斗争在妨碍革命。而在国民党统治整整一年之后，在广州起义遭到最残酷的镇压之后，小资产阶级群众不但没有争取到对其所许诺言的实现，反而处于更加恶化的境遇。广州起义后，李济琛马上就打算毁掉在广州的1925年上海惨案遇难烈士纪念碑，打算出卖粤汉铁路并授命将其与广九铁路接通，换句话说，就是把整个广东省卖给英国人。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看见了：蒋介石在准备新北伐的同时，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约。正在这个关头，恰好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反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击沉中国轮船，然后，日本警察在厦门逮捕了中国公民。福州附近中国渔民遭到暴力残害。所谓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所有这些事件毫无反应，也不敢抗议。就是在这个时候，掀起了新的反军阀浪潮。农民起义又在广东、江西、湖南爆发了，甚至连江苏都成立了地方农民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开始没收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等等。而且，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南方。“红枪会”、“天门会”的队伍起事，总的说，北方有一系列这样的农民起事。这一运动使军阀

们失掉了基本财源——税收。这些行动造成了对豪绅和地主的威胁。虽然这些农民起事对革命胜利并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但对豪绅、地主和蒋介石来说，却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就得发布命令，禁止士兵到农村去分土地，因为唐生智军队里发生了这种情况。

开始北上时，蒋介石向人民许下诺言，说什么占领北京后，完成国民革命后，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要取消，不会再有民族压迫等等。可是，实际上，蒋介石打算同日本军阀协商，让他调兵北上，以保证战胜张作霖，其目的是为了成立真正的国民政府，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帝国主义承认。这对蒋介石是最重要的。他甘愿放弃任何关于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论调，只要外国列强承认他就行。蒋介石就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某些权益问题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了谈判，这对于谁都不是秘密。这些事情当然不能对士兵们讲。士兵们以为，蒋介石有国民革命军，既然现在他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那么，到济南后他显然一定会开始实现“打倒日寇”的口号。蒋介石来到了曾发生“济南惨案”的济南。在济南蒋介石又说，他没有错，是共产党人错了。的确，共产党人“错了”，因为他们的宣传，他们过去在军队政治部里的工作，对士兵发生过影响。我们在山东的同志能够讲述，撤退的命令在士兵中引起了多大的愤懑。士兵们愤怒他说：“蒋介石是我们的领袖，领导过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可是现在，他抓我们，关押我们。这是为什么？”所以，济南事件后，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下降了。

为了挽救局势，国民党本来应该谈论国民会议和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了。可是，它搞出什么结果了呢？除了对工农大搞白色恐怖之外，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我们看一看，到底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回事。国民党说，应该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人取消了一个已到期的条约。但当日本人不同意这一做法时，过了一

星期，蒋介石就声明说：“我们谈谈吧，在外交谈判期间，你们的条约自然还有效。”这样，便可以谈上一年，不平等条约一直生效。至于关税自主，那么，应该说，甚至连我们的报纸也常常错误地阐述这个问题。1925年底，就关税自主问题开过一个会。当时，列强由美国领头签署了一个条约，规定从1929年1月1日起为中国提高税率。现在我们的税率定为百分之七点五，可是从1929年1月1日起，按条约规定，税率应提到百分之十二点五。现在美国说：好吧，我们实行吧。蒋介石就把这个称为关税自主。如果说到真的关税自主，那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这么轻易地同意的。帝国主义者现在的做法很聪明。他们大力援助中国政府，向它提供款项发放军饷等等。蒋介石完全满足于这一点，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要求。事实上，关于反帝斗争的一切高谈阔论，现在已化为乌有。国民党要那民族主义还有什么用呢？现在，为了民族主义，禁止一切阶级斗争。现在，为了民族主义，提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正是在这个口号下，南京政府同苏联断交了。现在，为了民族主义，禁止一切民间组织，更不必说工会了。现在，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制度，就象意大利的一样。谁是国民党员，谁天天反共，谁在会前好好地背诵孙中山遗嘱，他就受到称赞。谁要是不时时讲反共，他本人就是共产党人。如果工人们想集会或建立工会，那他们毫无可能这样做。如果乡村的农会掌握在豪绅手里，也就是说豪绅给“农会”一块牌子，这个农会维护旧的剥削方式，为这些豪绅收租，那么，有这个条件，就允许农会存在。可是，如果这个农会反对高利贷，不同意天天往上海报纸发电报骂共产党，那么，这样的农会毫无疑问应该封闭。为了这个“民族主义”，国民党无所不为。国民党人援引孙中山的话说，为救国，工农和中国公民都应该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了取得全民族的自由，即为了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这是必需的。现在，民族主义成了被歪曲的民族主义。蒋介石和国民党把民族主义用来

为本阶级的狭隘利益服务，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他们向人民许诺，中国将实行关税自主，民族解放实现后，一切都会很好。这就是全部内容。从这个方面，也仅仅从这个方面，这个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民族改良主义。在中国，民族改良主义这一术语，还在1925年就在我党出现了。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现在也有一定的意向，企图通过折衷、妥协等途径对本国的国际地位进行民族改良。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追求的和将要追求的就是这一点。而工农和一般劳动群众，既然参加民族革命，他们应该争取的就是民族革命，而不是民族改良。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在一定时期之前，共产党人可以有若干时间与民族资产阶级同路。但当资产阶级事实上已转到帝国主义一边之后，这种民族改良主义已无点滴革命性，因为改良主义已在帮助帝国主义巩固其在中国和殖民地的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用民族改良主义巩固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好象在向帝国主义声明：“如果你们将径直在殖民地进行统治，工人和农民必定会把你们赶出去。还是给我们，给资产阶级一点权力吧。当然，不能，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要有些改善，以便让中国人民看到，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时，人民便会安于现状，你们的统治就会更牢固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也还存在着“第三党”。这种民族改良主义，一方面表现为殖民地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表现在真正特殊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和“第三党”都想带领人民群众跟自己走，特别是想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是：不单是组织工人群众，争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广大群众，抓住任何不满情绪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地主，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所推行的政策；此外，共产党人还应该为反对民族改良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改良主义面斗争，当然更应当反对居统治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这样做，

任何群众工作都不会有成效，因为在“第三党”提出的口号下，我们将只能帮助小资产阶级政党巩固其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样，我们只能重蹈过去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也就是说，希望无论如何要联合小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合胜于农民的“无政府主义”的支持。单单是逐渐把工人组织到工会里，吸引他们参加反帝运动等等，这是不够的，这样说是对的，必要的。可是，如果有人说，“我们争取到群众以后再看是否面临起义的问题。现在就组织农民游击队——这是无政府主义，等等”，那我们就要反驳他：目前，农村到处都在进行农民的真正武装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农民剥掉地主的皮，要么相反，这与那里是否存在苏维埃，或是只有农民队伍、“红枪会”、半宗教性质的秘密组织，是毫无关系的，请看看四川、湖南、江西等省，那里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对下一问题应有明确回答：你对为争取土地、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反对军阀的军队而进行斗争的农民持什么态度？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想，只有当我们对这个问题持真正布尔什维克态度时，我们才能彻底消灭我们现存的盲动主义情绪。

近期内当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来临的时候，我党的总路线应是争取群众。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集聚力量。它应集聚力量，这不只是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会运动，而且还为了把群众从过去无组织、无计划的起义引导到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只有这样的起义，才能彻底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豪绅和地主的统治，也只有这样，中国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只有在不仅发生革命，而且革命获胜的时候，只有当革命在个别省的主要中心获胜，特别是，当全国性起义胜利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才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应该很好地了解，作为革命动力的阶级力量已

进行了重新组合。这一重新组合发生得很快、很复杂、很彻底。但是，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内容仍然没变，因为目前中国根本没有统一。有国民党。如果以前全中国叫中华民国，那么现在就叫国民党。本来么，直到现在我们还说中华民国，可是每个省都有各自的主宰者。现在全中国叫国民党中国，可是每个省都有独立的国民党。五个大军阀是这些“国家”的头子。除了这五个大统治者外，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统治者。有摇摆于这些大军阀集团间的小封建主、小主宰者。根本没有国家统一！不会召开任何真正的国民会议，因为参加这个会的反正都是国民党指定的人。

不推翻同封建或半封建式的豪绅土地关系紧密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有任何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甚至连汪精卫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客都说，可以没收大地主的部分土地，但不能反对所有的地绅，即不能反对中世纪压迫的这些代表者。绅士是一个英语词，在中国革命文献里它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固定地指中国的官员阶层。地绅是在一定地方握有实权的人。他可以不经任何审讯把你关进监牢，他可以用竹条打你，因为他穿长袍，因为他是高等（层）人，因为他是地主。他同衙门，即同官吏相勾结，一块吃吃喝喝。以前，每个地绅甚至还有那种特权，考中之后，他就能收受任何一个村子的礼品，所有的人都应该养活他。这就是中国式的绅士。可是现在连汪精卫都不想反对所有地绅。地绅有包税专权。如果连汪精卫都不想消灭这种状况，那民族资产阶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把农村所有的乡绅关系马上都消灭了，那它就没有任何生存手段了。为什么？因为它的一切经济来源都在农村。如果贫农，或一般说农民举行起义，夺走土地，那民族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除了工业以外，它从哪里得到收入呢。而工业还遭受着外国资本的沉重压力，发展民族工业特别困难。

在各殖民地，在土耳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现在都是从

专政而不是从民主来着手的。如果它掌权，那它就采用专政方法来控制各种民主选举等事。难道能在土耳其进行选举吗？难道在国民党制度下的中国能进行选举吗？当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工业总是要发展，那它必定要设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工业，才有希望抗得住外国资本的竞争。正是这个原因，迫使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马上就尽力设法建立牢固的政权，以镇压劳动人民的一切阶级斗争。它不能容许这种阶级斗争和民主。

我认为，关于民族改良主义——它有时也意味着民族法西斯主义——这一问题，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最尖锐、最全面地在本次大会上提出来。（掌声）

（同上，第79—105页）

第三十二次会议（8月16日） 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 革命运动问题

赫列尔（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党团）：库西宁同志在报告的开头，对于提纲草案，特别是对草案中所欠缺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例如首先提纲中没包括这一基本任务（这是列宁的遗训），解决殖民地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最大的中心问题。他还指出其他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等等。

……

资本输出不是次要的或偶然的事情，这也是当代的一种方法。同时，当然不能认为，似乎其他的方法就不能再用了，相反，我们处在较早期和较晚期方法的综合时期。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资本输出的办法。如果我们以中国为例，那我们能看出，日本正在

“不慌不忙”地用一切手段——商品交换、商品输入、资本输出——掠夺中国，并从经济上进行剥削。而对于英国，在中国起头等作用的则是金融资本。正因为如此，所以英国才在中国推行这样的侵略政策。侵略性和力图使用暴力，是资本输出的特点，因为要保证长期借款及所得利息，务必使战舰处于戒备状态。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和借款的这些办法，提供了修筑铁路的可能性，这始终同占有大片领土相联系。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能如此牢靠地渗透到该国的经济中去，并使其俯首听命。经济统治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政治统治。资本输出的侵略性是很重要的特征，离开这一特征不能理解殖民国家现阶段的发展。

……

同一章中另一说法，也不完全妥当，这种说法也与这一基本错误有关，即，一般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生产……这对于二、三十年前的条件来说，是正确的，而对于当代条件则不然。请到中国的上海、香港、爪哇、夏威夷或菲律宾群岛、南非等地去，到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去看看。在那里你们会见到，与技术落后的作坊和工厂并存的，是用美国或欧洲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企业。要知道，现代帝国主义把最新技术、合理化方法同掠夺性的低工资和对雇佣工人罕见的剥削结合起来，这才是有代表性的。例如，在1925年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期间印制的传单里，工人们指出，他们看管的织布机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前，每人看六台织布机，现在——八台，十二台，甚至十六台，而工资没动。

……

因此应该说，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加以对比，本身是完全合适的……库西宁同志说：已经多次指出，不能机械地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搬到其他国家，也不能生搬到印度。但是，我仍然不能放弃这样的印象：在对待自治运动派的态度上搬用对待国民

党的某些经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存在的……

(同上，第124、126、131页)

沃罗夫斯基(化名，中国)：我只谈两个问题：首先是广州起义问题，其次是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危险问题。

广州起义是关于殖民地问题讨论中特别重要的课题，因为在起义期间建立起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它向我们表明苏维埃对于组织和领导起义以及在东方建立苏维埃政权中的作用。佩佩尔、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们对广州起义极尽诽谤之能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公开言论上的大同小异。一些人宣称，起义为时过早；另一些人认为，起义的社会基础较差，还有一些人，即托洛茨基分子，说起义纯属冒险。大会应予以澄清，并保卫广州起义，因为广州起义在东方革命运动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同这一切机会主义言论作斗争。

广州起义是在广州工人、农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请允许我向大家提供几个事实。首先，广州起义是广州以东的海陆丰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三个月之后发生的，是在广东东江地区和北部地区多次农民起义之后发生的，是在海南岛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

广州市内从10月14日起，就发生了群众性的工人斗争。海员罢工爆发了；他们不顾白色恐怖，于10月14日举行公开集会，并且顺利实现了全体广州海员的全天总同盟罢工。他们夺取了工会会所，驱逐了李济琛指定的改组委员会，组织了不仅有五千名海员，而且还有五千名省港工人和罢工者参加的游行。这一天，广州各革命工会高擎红旗分别在政府大厦前面、在警察岗哨前面严肃行进。旗上大书标语：“释放政治犯”、“工会和农会自由”、“恢复以往的一切劳资合同”、“保护罢工权利”、“打倒新军阀李济琛、蒋介石、张发奎”、“打倒改组委员会”。

海员运动发展成为全体广州工人争取取消一切工会改组委员

会、争取释放政治犯、争取工会自由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断发展，结果举行了有九十多个工会参加的会议。会议是以一直处于严格地下状态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召开的。会议决定收回会议大楼和驱逐改组委员会。这九十多个工会至少代表十万工人。张发奎果然开始逮捕工人和镇压我们的运动了。但是，铁路工人不怕迫害，于11月1日在汪精卫官邸前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让那些被李济琛开除的铁路工人恢复工作。汪精卫身负平息群众骚动的特殊使命来到广州，他下令拘捕工人，结果有约六十名工人被捕。尽管如此，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工人又一次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红旗再次迎风招展。从这以后，广州街道上就开始接连不断出现游行示威，汽车司机开始息工，一千多名机器工人罢工，印刷工人工会恢复了，此起彼伏的小规模经济纠纷有增无已。广州郊区和市区也不断举行群众集会。

运动在持续发展，结果就在广州工人的斗争发展到白热化时刻，爆发了广州起义。

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起义的组织工作并非在爆发前一两个星期内才进行的，而是早在4月14日以前，也就是说早在李济琛在广州采取反革命行动之前，就已开始酝酿。但是，在起义爆发以前，李济琛就得手扼杀了它。随后，广州工人指望靠武汉政府的军队筹备起义。而当这个政府转向反革命一边时，他们又期望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开进广州。但是，这也落空了，广州工人终于懂得了等待外援终归是徒劳，而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

起初，赤卫队有五千人，在汪精卫查禁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后，只剩下二千五百人。这对广州工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为了组织起义，成立了特别队，以破坏敌人“联络”，侦察情况，实行红色恐怖。组成了专门汽车队调运军队。炸弹的准备和军火的集中都已就绪。士兵中也有了起义的组织，应当说，这些组织的力量是颇为薄弱和有限的。还在士兵中间散发了传单和宣传品。

农民也在准备起义。向海陆丰发出了指示，要求准备向广州进军。还号召东江地区的农民在12月13日起义。西江地区的农民也接到通知，要求做好准备。共产党人领导的叶挺余部约有一千人，也接到向广州挺进的命令。

我们还应该反对这样的论调，说广州苏维埃不是选举产生的。广州苏维埃是在起义前三天，由七十多个工会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的。当时做这件事情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组织近八十人参加的会议，真是谈何容易。如果有哪一位同志声言这次会议没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就要回答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比这更有代表性了。

广州起义失败于缺乏坚强的领导。政治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都极为薄弱。在夺取广州政权以后，我们的军事领导集中力量攻占仅有一百人守卫的敌军司令部，而忽略了我们原定组织两支队伍立即进攻河南的计划，但是，我们却集中力量去攻取司令部。这就是我们由全面进攻转向攻击局部市区的原因。战斗持续了两天，因为在广州的狭小街巷内极难行动。我们本应孤立这个据点，而集中力量组织队伍进攻河南。这就是广州起义的基本错误。另一个重大错误是不善于组织退却。我们没有能够动员足够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起义，因而，我们就顶不住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佩佩尔散布的只有两千工人参加起义的谰言是毫无根据的。

时间不多了，我现在谈谈中国共产党内的危险问题。我们听说，党纠正了机会主义错误之后，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但是，这不符合事实，因为甚至到现在我们还在强调，党内依然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某些掌权者依然坚持这个方向。比如，上海一些很有影响的同志就持有一种理论，说革命破灭了，说“农民起义中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这些起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无产阶级可能丧失革命领导权”。他们提出的口号声称，现在不是大

规模斗争时期。他们断言，现在是搞小规模斗争时期。

这些同志还说，我们应当共同呼吁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这些持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甚至提出和官方工会建立统一战线的口号。

我现在把这些最为明显和典型的机会主义倾向摆在大家面前。我再说一句，这些倾向还有很大影响，甚至已影响到政治局。不久前，政治局居然作出决议，认为我们应当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应当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一些同志认为，我们过去曾经有过机会主义倾向，而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有力斗争。我提请大会关注我们党内的这个真正危险。盲动主义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消除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

（同上，第 141—144 页）

大村（日本）：总的说，日本代表团同意库西宁同志所提出的提纲草案。我认为，这个提纲清楚而真实地分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提纲根据中国大革命的经验，展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

.....

现在，我要稍微谈谈某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中国大革命首次的和最重要的教训，应该成为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态度的基础。提纲说，如果认真地分析问题，便可知道，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愿望，无论如何也不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着改良主义立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是不对的，它拒绝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所起的客观革命作用。但是，当我们同自己队伍中的反对派进行斗争时，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却谈论得过多了。中国大革命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时，我们应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将来同它决裂。

昨天，斯特拉霍夫同志作了一个十分重要但并不十分成功的报告。他没有充分分析中国革命的各不同阶段。为什么中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他没有充分分析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失败，不仅从国内来看，而且从国际范围来看，首先就是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对帝国主义者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应该首先进行分析，但是，斯特拉霍夫同志很少提到帝国主义者的作用。至于中国革命的成绩，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尽管暂时失败了，却首次争取到了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它吸引了广大的农民力量，最后一点是，中国产生了有经验的共产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成绩，我们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失败时，应该考虑到这些成绩。

斯特拉霍夫同志关于我们战略路线重心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的战略重心不应在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的协议或联合，而应在于我们与农民的联盟。我认为，应该不断加强宣传与农民的联盟，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过多地讨论了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问题的重心在于我们与农民的关系，因为有一次列宁说过，既然我们同作为整体的农民共事，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既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是核心的、最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对农民的态度就应该成为基本因素。

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国革命中吸取相当多的教训，首先，斯特拉霍夫同志毫未谈到组织方面的不足和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党本来就应该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必然背叛，并准备好未来同国民党决裂，但是，斯特拉霍夫在这方面谈得很少。

提纲中关于殖民地革命中的战争问题，提得很少。第一处是在第二章中提到了东方的一系列革命战争。第四章末论述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还提到武装红军的问题。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在革命过程中可能发生同帝国主义的公开战争，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出关于备战和民族革命军队的问题。但是，决议在分析

革命的第一、二阶段时，并未提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缺陷。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曾经满怀中国国家统一和反帝斗争思想的国民革命军，在革命过程中自己竟变成了帝国主义军队。中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对付这种危险性。我们在军队里有强大的政治机关。就拿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军队为例，这个军队里我们有强大的政治机关，但当他们背叛民族革命事业时，共产党支部却丝毫不能有所作为，或者是试图进行一点小小的抵抗。这说明军事准备问题是何等重要。

再就是必须吸取广州和上海起义的教训。整个共产国际都应该研究这些教训。类似1917年那种无产阶级得到武装的情况，将来只能作为特殊情况出现。一般说，未来工农不会有武器。所有共产党人都应当认真研究上海、广州的英勇起义。

……

（同上，第148—152页）

第三十四次会议（8月17日）

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

周小妹（音，中国）。我想谈谈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现状。许多人觉得，广州起义后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减弱了，运动完全停止发展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广州起义之后增强了，党影响的增大，表现在广州起义后马上有大批新党员入党。党员数量比广州起义前的时期增加了。工人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上海棉纺企业从未停歇的罢工运动，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尽管国民党政权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这一运动仍在扩大。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表现了积极性。近一个月来，因不满

于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反帝运动正在发展。小资产阶级过去对国民党所抱的幻想,目前因国民党公开投降帝国主义列强而破灭了。

国民党及其政府需要大笔经费维持日益增加的军队和官僚机构。这种形势迫使军阀们增收过高的捐税。因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抗捐运动日益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危机还表现在军阀们几个月、有时一年多不能给士兵发饷上。大家知道,因此发生了一系列反军阀、反军官的士兵骚动。士兵群众要求发放欠饷的斗争还会加强,因为军阀们收税并不是为了发饷,而首先是为肥实自己的腰包,这就加深了士兵的不满情绪,所以,我们有一系列事实,说明士兵的骚动从一个部队发展到另一部队。有过这样的情况:军阀派去镇压农民运动的士兵,倒向了农民方面,毫无疑问,这场士兵的运动还将发展,而且将越来越具自觉性。

最后,我国农民运动在华北也有了发展。象“红枪会”、“大刀会”等原始的农民组织,尽管组织得不好,也仍然在破坏着军阀统治的基础。农民不断地进行抗租斗争。大家都知道,华南农民的游击活动一直在继续着,不断转变为农会领导的组织日益完善的行动。这些起事消灭的是土豪和地主的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虽则条件艰苦,华南一系列地区内仍然存在着苏维埃,并继续扩大其影响。

群众运动活跃的这些征兆,证明共产党的影响在逐步扩大。这种形势直接或间接地同各派系军阀间的不断混战有关,而且也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危机有关。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前途问题。我已说过,存在着群众运动活跃的一些征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面临革命浪潮的新高涨。暂时还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应该肯定地说,新的革命高潮是必然要到来的。这个高潮必然到来有以下根据:第一,革命的客观任务尚未完成。现在国民党所实行的统一只是虚假的统一。

实际上，代表各派系军阀的国民党，不能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帝国主义列强讨好国民党的各派系，向它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微不足道的让步，然而，帝国主义绝不会向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因为那种让步不可能不牵动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利益。国民党不可能统一中国，其部分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为巩固自己在华的统治及扩张势力范围而互相争斗。第二，国民党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连农民要求减租百分之二十五都不能满足。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象斯托雷平那样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中国没有革命前俄国那样的闲置土地。同时，农民群众日益加强同城市无产阶级的联系。无产阶级的代表者领导着农民的斗争，在他们中间的影响不断增长。第三，国民党制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乃是土豪、地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然而；国民党政府并不统一。它非常分散，每个军阀集团都有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则向中央政府闹独立。这就是国民党专政与西方法西斯专政的区别。国民党谈不上稳定，因为它的内部派系势必将加剧相互间的争斗。这就是决定中国革命新高潮必然到来的那些主要情况。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党策略路线的问题。根据上述中国状况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发展改良主义，那就错了。相反，正是因为目前还没有革命浪潮的新高涨，才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发展民族改良主义。

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正试图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让步，以“安抚”人民群众并欺骗之，用这样的办法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彻底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等等，都是由对于国民党制度的某种不满情绪引起的。这个运动远不够坚决，还可能以同国民党的勾结或妥协而收场。这更加说明共产党必须有独立的策略路线。党应该开展日常斗争，建立更广泛、更坚强的工会组织，并

领导其斗争。党应该领导反帝运动和广大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抗拒捐税的斗争。党还应该领导军队的起义，把士兵们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经常性斗争转变到公开倒向革命工农方面。党应该特别关注农民反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争取没收地主土地、消灭土豪地主政权的斗争。党应该有系统地领导游击活动，并采取措施加强现有的苏区。党应该把武装起义作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即推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唯一方法，要开展广泛的鼓动和宣传。党应该进行揭露民族改良主义的运动。最后，党应该进行斗争反对所谓的“第三党”，这个党被称为国民党左翼，其代表人物是邓演达、陈公博等人，它只能扰乱广大群众的革命意识，所以起的是反动作用。只要顺利完成这些任务，党就确实能争取到群众和准备好更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只有具备这个条件，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党才能做好行动准备，并克服一切机会主义残余。这些残余可能采取的形式是，不惜任何代价联合小资产阶级，并轻视对贫苦农民的工作。

第四，关于妇女运动问题，我想说几句。我不必证明妇女在革命运动中起着巨大作用。我们中国妇女积极地以战斗姿态参加运动。上海无产阶级的三次起义，女工们都积极参加了。她们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大家都知道，工人纠察队为反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了激烈斗争。女工们在上海罢工运动中经常起领导作用。农村的情况也是这样。女农民不仅参加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而且积极参加游击队的活动。她们执行卫生、保卫等勤务。广东省的海陆丰、海南、深圳等苏区，妇女们积极参加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妇女运动，在苏区破坏了一切旧的偏见、传统和家庭压迫。但是，党应该比过去更加注意对劳动妇女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当前，妇女运动的中心口号应是所有劳动妇女都要参加推翻土豪、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现政权的斗争，参加土地革命。必须强调指出，劳动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已经在这个口号下进行

斗争了。妇女之所以有积极性，正是因为有苏区所实行的措施（例如，妇女有土地使用权，有参加苏维埃的权利，婚姻自由，平等的受教育权，消灭家庭中的奴隶制残余等等）。毫无疑问，由于有这些真正解放妇女的措施，妇女将更多地参加全中国的革命斗争。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党内状况问题。我觉得，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各殖民地的共产党，都还十分年青。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往往不理解、也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些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还很强。经验证明，机会主义的错误，例如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发生过的那些错误，与联共（布）的反对派有共同的思想根源。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该强调巩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问题，并保证这样领导它们，即帮助这些党沿正确道路前进，并正确解决自己的任务。只有在解决各种任务时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最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新的斗争，才能引导他们走向胜利。

（同上，第 203—206 页）

第三十五次会议（8月17日）

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

刘阳（音，中国）：这次大会全面提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问题，这个事实证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当前，在世界资本主义正经历深刻危机的时刻，具有重大的意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早已强调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意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青年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库西宁同志的提纲中和许多同志的报告里，却没有十分严肃地提出或根本没有提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青年运动问题。我认

为，这是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各种提纲和报告中的一个重大缺点。

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基本政策，就在于一成不变地阻挠和遏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以保证帝国主义在那里的垄断地位。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是明明白白而不容置疑的，没必要专门讨论。工业发展停滞，当然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殖民地工业没有任何发展。相反，我们看到，在中国，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轻工业得到广泛发展。轻工业的发展刚好符合宗主国的要求和利益。随着轻工业（棉纺、丝织等工业）的发展，童工在生产中的数目也逐渐增长。青年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过去曾经起过、现在也仍然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他们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近五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可说明这一点。因此，如果共产党人轻视青年在工人阶级斗争中、在整个为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的作用和意义，那是不能允许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农民普遍贫困的结果，造成了大量失业青年。这种情况就使资本家有可能更变本加厉地盘剥童工的艰苦劳动。特别是我们看到，企业主雇用失业青年到自己家里充当奴隶使役，但是，又给这种境遇巧立名目，叫做“童工养成制”。同时，由于民族工业发展的局限性，大量失业的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乃是帝国主义一贯采取遏制殖民地国家工业的结果。于是，许多青年游离于社会之外，脱离了生产过程，终于落入军阀之手，当兵卖命，或者径直沦为土匪。正因为如此，劳动青年问题对于殖民地、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迫切的意义。

至于谈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和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某些区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革命解放运动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时期，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中

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常常动摇于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尤其在革命深化和剧烈转折时刻，往往转向反革命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必须研究这个经验。

在民族运动统一战线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分裂革命青年的统一组织。例如，在1925—1926年间，国民党青年部就曾企图建立自己的青年组织，以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抗衡。当然，它是不能得逞的。但是，这是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东西。由此得出结论，共青团必须反对建立和共青团平行的独立的青年政治组织的任何企图，因为这种组织可能严重妨碍共产党加强对青年的影响。

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专门报告。我不再谈这些问题，因为我完全赞同报告人的分析和结论。但是，我要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不仅对中国党至关重要，而且对一般殖民地国家的党也至关重要。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的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我要提醒大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时期犯了重大错误，它没有为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坚决斗争，它不去推动、而是遏制群众运动的发展，它不理解革命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变，没有为这个转变做相应的准备工作，没有及时改变策略口号，等等。中国革命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固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这一原因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客观原因。但是，应当极其严肃地强调主观方面的失败原因，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在领导阶级斗争方面还不成熟和缺乏经验，一般可能会犯类似的错误。

同志们，过去的斗争经验表明，工农青年和士兵十分积极地参加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意义极其重大。遗憾的是，我们的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为了今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必须记取这个教训。经验表明，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青年运动，只有在考虑青年的特殊利益并为其实现而斗争时，才能得到广泛发展。尤其是，经验向我们表明，不坚决争取改善青年的经济和劳动条件，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和真正坚强的无产阶级基地的建立是不可思议的。不去为实现青年的这些局部要求而进行日常斗争，不要说建立真正的群众性的共青团组织，就是一般建立工人阶级广泛的革命组织，也是无从谈起的。尽管由于白色恐怖，青年组织遭到破坏，工人和农民青年组织依然在发展。共产党人对青年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我同意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提纲的基本路线。它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尽管如此，提纲中还有许多重大缺点。譬如，提纲中没有研究中国革命以往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教训对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宝贵的。

我应再一次强调指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没有提出青年运动的任务问题。这是第一点。其次，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的任务问题这一部分，现在看来，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再者，提纲中没有谈及反帝运动的任务。这也是提纲的最主要的缺点之一。我认为，大会一定会考虑这些问题，一定会正确地决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任务，特别是一定会制定出发展和加强青年运动的正确路线。

(同上，第 270—272 页)

第三十六次会议 (8 月 18 日) 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 革命运动问题

佩佩尔 (美国)：

.....

现在我来谈第二个主要问题，即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这个问题也有普遍意义。正如帝国主义对待一切殖民政策的基本特点是相同的一样，我们同样可以肯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切殖民地必不可免的阶段，是一切殖民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自然，在不同的殖民地，这一发展阶段各有特点，其具体形式迥然不同，具体的过渡步骤在此一时期或彼一时期、在此一国家或彼一国家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切殖民地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新西兰的一位同志责备库西宁同志的提纲，认为提纲对殖民地估计不足。这完全是奇谈怪论。库西宁同志提纲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殖民地革命斗争的细节问题。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中，在巨匠的这部不朽杰作中，已经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我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论点。库西宁同志提纲的重大功绩，就在于演释了列宁提纲的凝炼的内容，并根据近八年来的经验使它的原则具体化、通俗化（按这个词的）褒义来理解）了。

在我们的时代，不研究中国大革命的经验，就不足以与谈我们殖民地斗争的任何实质问题。要想研究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因此，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两个历史性的错误。从党在领导方面的错误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孙中山主义时期，第二个时期则称之为不断革命时期。第一个时期，党的领导以孙中山主义为旗帜犯了错误。第二个时期则以不断革命为旗帜，他们不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而是信奉托洛茨基的谬论，犯了错误。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错误是：1. 不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乃至发展到投降；2. 低估土地革命，乃至发展到共产党人去压制起义的农民。这些错误

的根源是什么呢，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理解无产阶级抗衡资产阶级的独立作用，他们不理解在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时刻，已经出现了新的时期，即由所谓一般民族革命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原机会主义领导，忽略了这一转变，这就是它的历史性错误。

第二个时期的错误完全相反。如果说，第一个时期党融合在国民党之中，那么第二个时期，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提纲所正确指出的，党脱离了群众，党和无产阶级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党的领导基于中国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这是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基本错误。所以，当时党的领导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几乎不存在资产阶级。第一个时期共产党是资产阶级的附庸；第二个时期威胁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是忽略了有资产阶级的存在、有最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主演者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这两个错误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孙中山主义时期和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时期有以下共同特点：无论在这一或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错误地估计了该革命阶段。在第一个时期，当一般民族革命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它没有看到这个转变。在第二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实际还没有完成时，党的领导就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然开始。可见，无论哪个时期都错划了阶段。在第一个时期，没有看到新阶段的来临；在第二个时期，当革命还停留在前一阶段时，就认为新阶段已然出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充分地理解革命的该发展阶段，乃是两次错误的共同特点。当然，无论哪一次错误都是根本性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八月会议上纠正了第一时期的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撤换了原领导。新领导当然没有重犯这些主要的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又纠正了

第二时期的错误。这次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深刻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我认为必须详细谈一下不断革命论，看看这个论点是怎样针对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不仅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月提纲提出来的，而且是洛米纳兹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上百般坚持过的。洛米纳兹同志提出了什么样的原理呢？他提出了两条原理。现引述一段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国问题会议上所作报告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工农革命，从形式、内容和阶级动力的角度分析，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现在已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

“革命具有不停顿、不间断的性质。”^①

洛米纳兹同志所说的原理有两个论点：

1. 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2. 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

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越过整整一个革命阶段，也就是说，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洛米纳兹同志说，中国革命的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完全正确，但是，他又说这个革命的内容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内容，则又是根本谬误的。

洛米纳兹同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的态度相似。托洛茨基的理论也包含这两点：承认不断革命和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决议，否定了不断革命论。这个决议写道：

^① 本段文字译自英译文。——原编者

“中国革命当前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不断革命’的看法(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想要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又把革命看作是‘不断’革命的倾向,这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犯的类似。由于这样地提出问题,就取消了中国革命最大的民族特点,即半殖民地革命的特点,因而,这个错误就更为有害。”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就是这种看法。可不可以说不断革命理论本身是错误的呢?不可以。不断革命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提出来的理论。那么,洛米纳兹同志的理论错在哪里呢?如果照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去理解,那就不是不断革命理论本身的事了。他们说过,我们应当反对结束革命,我们应当不断奋斗,以求把革命完完全全进行到底,把政权移交给更彻底、更进步的阶级,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理论中的不间断性的观点。但是,把不断革命理论与跳越一定的阶段混为一谈,与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混为一谈,并且象洛米纳兹同志一样提出不断革命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就意味着犯了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相似的错误。

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库西宁同志的提纲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的回答。提纲以列宁提出的原理为依据,遵照这个原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社会内容就是土地革命。跳越这个阶段,就是不了解农民的作用,就是重蹈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历史性错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大多数居民是农民的国家里,这是非同小可的错误,这个错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在任何一个农民的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这都是不能允许的。中国和印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不仅轻视农民的作用,而且是轻视革命的反殖民主义性质。为此,我想引几段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

委会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

“什么是土地革命？它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

斯大林的论断很精辟。要更清楚而准确地阐述这个问题，确非易事。在中国（在印度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也就是土地革命加上反帝斗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对于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一窍不通。谁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谁就对于反帝、反封建残余斗争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导致对俄国的农民作用估计不足，而洛米纳兹的不断革命论，则导致对中国的反帝斗争估计不足。

这个观点和列宁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断，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在 1905 年说过：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①

可见，列宁是在这个意义上赞成不断革命，即我们不应当半途而废，但是同时他又反复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列宁的措词是相当严厉的。列宁称之为冒险主义。列宁把缄口不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阶段的行为，称之为违背科学良心，追求廉价的声誉。由此可见，列宁所主张的是遵循马克思精神的不断革命。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毫不容情地反对托洛茨基的

^① 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 版第 1 卷第 634—635 页。——编者

观点。

为此，应当弄清楚中国究竟有没有资产阶级的的问题。这个问题乍听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共产国际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不仅在前面提到的中国问题会议上讨论过，而且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也讨论过。在这个大会上，洛米纳兹同志矢口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据纪录记载，洛米纳兹同志有如下的一段话：

“国民党作为政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时，斯大林同志打断洛米纳兹同志的话问道：

“那么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

洛米纳兹同志毫不含糊地答道：

“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是个别资产者。”

在这句话后面纪录上写着，“笑声”。我想，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也会衷心地跟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发笑。说中国资产阶级只剩下个别的资产者，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是，如果留心一下洛米纳兹同志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1927年12月，也就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最为嚣张的时期，那么洛米纳兹同志的这番绝妙“理论”就更值得令人深思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国问题会议上，布哈林同志评论洛米纳兹同志异想天开的“分析”时，说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洛米纳兹同志又在重弹鲍罗廷的机会主义阶级分析的老调了。鲍罗廷说过，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级的轮廓。洛米纳兹也说有阶级的轮廓。”

总括上述种种，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洛米纳兹同志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十一月提纲中也部分地流露出这些观点)究竟性质如何？从他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 轻视中国革命的殖民地特点，以致对反帝斗争认识不足。

2. 否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特点，以致不可避免地对土地革命认识不足；

3. 否认中国存在资产阶级这一事实，以致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认识不足，因为反对不存在的敌人确实是强人所难。

所以，这三点的含义就是：对反帝斗争认识不足，对土地革命认识不足，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认识不足。能不能认为洛米纳兹同志三位一体的高论是“左”倾观点呢，我相信，世界代表大会不致如此天真，认为这就是“左”倾观点。如果说，“右的”和“左的”的术语还多少有点用处，就象参加军队集训的新兵必须弄清楚向左右转一样，那么就应当说，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右倾观点。依我看，洛米纳兹同志的错误绝非偶然，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指出的，他对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认识不足，也不是偶然的。这个错误是他的整个“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洛米纳兹同志对世界范围的反帝斗争认识不足。我记得，布哈林同志在会议日程第一项总结讲话中，曾经不得不反驳洛米纳兹同志的观点，因为洛米纳兹同志断言，有着头等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重大矛盾。布哈林同志已经一再证明，一些同志由于否认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否认正是这些矛盾决定着、加深着和加剧着各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因而他们对战争危机认识不足。战争危机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就是当前最大的错误。怎样认识对战争危机的估计不足，这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布哈林同志在讲话中已经指出，当前对战争危机的估计不足，是共产国际内右倾危险的最鲜明的表现。

凡是以个别国家的国内矛盾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的人，不但在战争危机问题上，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此，我想引述一段斯大林的话。斯大林同志的提法，可以说是列宁主义基

本论点的最好表述。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写道：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纯粹是某一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破裂的结果。”

这个提法是正确的，但是既然这个提法正确，那么它就在根本上推翻了洛米纳兹同志的观点。斯大林同志由此而得出了必要的结论，他说：

“正因为如此，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的统计数字，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不了解帝国主义的、象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大家看到，洛米纳兹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尽管充满了极左的虚张声势，但一定会导致不是真正“左”的，而是右的立场。

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认识不足，会得出什么样的策略结论呢？会得出十分重要的结论。中国当前的形势是：国民党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面前已经暴露出它那付阶级敌人的面目。但是，它那帝国主义同盟者的面目是否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揭穿了呢？还没有。中国的广大群众还以为国民党仍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某种斗争。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对民族革命的背叛，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尽全力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应当比过去的斗争得力一百倍。但是，硬要把不断革命论强塞给中国共产党，否认中国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进而否认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象洛米纳兹同志那样提出直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切就意味着我们向中国同志提出了一个坏建议，一个必然轻视反帝斗争的建议。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不进行殊死的反帝斗争，也就不可能顺利开展同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应当如何分析这条路线的

不同意见，是右倾还是“左”倾？我坚决认为，这是右倾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对主要敌人估计不足。中国当前时期的特点是，帝国主义者一心一意要瓜分中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的干涉，并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借助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干涉。这是新情况。在这种形势下，过低估计反帝斗争，就是看不到中国资产阶级阵线中的隐患，就要因此而犯下可怕的（而绝不是“左”的）错误。

列宁在 1905 年写道：

“托洛茨基独出心裁的理论，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吸取的是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去夺取政权，而从孟什维克那里吸取的，则是‘否定’农民的作用。

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在帮助俄国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因为他们把‘否定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搞革命。”

洛米纳兹同志象当年托洛茨基否定土地革命的意义一样，否定反帝斗争的意义。这种否定态度必然会发展到“不愿意”发动中国人民群众去进行反帝斗争。

现在谈下一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广泛阐述一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但是，我只想一般地说明我认为列宁著作中所包括的关于转变问题的基本思想。列宁的这些基本思想，似乎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在依然存在封建残余或民族压迫的国家，该国的革命要经过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2. 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3. 只有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可能胜利；
4. 消灭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土地革命，在殖民地国家还要消灭帝国主义统治，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和经济的实

质；

5.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是资产阶级的，甚至土地国有化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这场革命的动力已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了；

6. 我们应当在革命不能半途而废这层意义上为不断革命而奋斗。但是同时我们又应当弄清楚革命的各个时期、过渡阶段的不可避免性；

7.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甚至在中国这个有万里长城的国家里也是这样；

8.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下述的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即前者转变为后者，后者又顺便解决前者的问题。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后者巩固前者的成果。阶级斗争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以及前者向后者转变的速度，仅仅取决于客观条件；

9.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内容。

这就是列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犯了一系列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机械地割裂开来。这种割裂必然会发展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应当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只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部任务以后，才能考虑组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2. 把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内容的性质问题同革命的阶级动力问题混为一谈。孟什维克的观点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不清的基础

之上。按照孟什维克的观点，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革命的动力应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

3. 有些人认为革命的动力既然是无产阶级，那么革命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则又犯了相反的错误。这个观点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这个理论可以大胆地叫做反过来说的孟什维主义；

4. 苏维埃问题也可能是产生各种错误的根源。一些同志认为，工农群众建立苏维埃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使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当然是个错误，因为苏维埃既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形式，也可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

5. 革命所采取的斗争手段也可能成为错误地判断革命性质的根源。由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经常运用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工人游行示威、无产阶级起义作为斗争手段，一些同志就以此为依据，认为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因而犯了错误。要知道，列宁早已指出过，以无产阶级为主要动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斗争的手段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不过，这一情况本身并不能改变革命的社会实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何时结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对这个问题，不能机械地回答。按照列宁的意见，在俄国，农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迟迟到1918年夏天建立起贫农协会以后才算结束，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般说，当政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手里，而仅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手里的时候，当无产阶级开始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着手实施大工业国有化。掌握经济命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算开始。土地国有化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这项措施还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范围内。甚至大工业的国有化，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

征。譬如，可以预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要把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大企业收归国有。但是，这还不能使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国家政权的阶级内容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内容。只有当国家政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时，革命才会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果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还是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落后的殖民地都将是这种情况，只有依靠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只有取得资本主义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成就，只有依靠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帮助，才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我想再谈一谈广州问题。在会上，涉及广州起义和涉及我对于广州起义的看法的各种发言中，有许多谬误失实之处。也有人企图歪曲共产国际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因此，我不得不在这里重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国问题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原则。洛米纳兹及其一派人大做文章，说我似乎曾几何时对广州起义持否定态度。几个月前，还是这些同志，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非但对我、而且对包括布哈林同志在内的别的同志，大加责难。我要摘引一段布哈林同志在上述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布哈林引了一位同志的话：

“‘要找到一股推动力能够再使脱离群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我们党的一部分人扭转身来面向群众，这是一桩费力的、然而终归是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位同志说的是党和群众之间有一条鸿沟。我姑且作一点让步，就算这个情况有百分之五十不符合实际吧。”（纽曼和洛米纳兹插话：“百分之百地正确。”）

布哈林接着说：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在讨论和制订我们的策略时，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洛米纳兹插话：“对，要是一贯反对起义的话。”）

你们看，洛米纳兹同志在责难布哈林同志，说他一贯反对起义，这是闻所未闻的责难。布哈林同志在讲话中，关于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说了以下一段话：

“谈几句关于广州形势和广州起义的教训。一些同志十分尖刻地攻击佩佩尔，但是，他的话有许多地方是正确的。纽曼报告中的一个基本论点认为，似乎广州起义的失败，只应该归罪于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原因。我认为这不正确。这样地分析形势，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没有实现胜利起义的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才正确。”

关于广州起义准备不足问题，布哈林同志说过：

“现在谈谈组织准备不充分和时机选择的问题。我认为，佩佩尔同志刚才讲的意见是正确的。我认为，佩佩尔同志中肯地指出了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影响下的工人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他的功绩。他就某些组织问题和强制罢工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这是他的功绩，可以说，这是‘孟什维克倾向’。从杜撰和臆断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才能使这一切自圆其说。”

纽曼同志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仲裁者自居，却得到布哈林同志如此的驳斥：

“我认为，不能这样提问题：象某些文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就是纽曼，普列汉诺夫主义就是佩佩尔。在啤酒店和小酒馆中，可以这样论证问题，但对于正经人来说，这就有点可笑了。”

至于洛米纳兹和纽曼二同志无中生有，说我似乎反对过武装起义，布哈林同志当时在讨论会上就曾申明：

“说佩佩尔同志要回避武装起义，这是不对的。佩佩尔历来没说过任何类似的话。”

我想布哈林同志上述的一段话，足以揭露一些同志在广州起义问题上的诽谤中伤。

我深为惋惜的是，没有能够在这里阐述广州起义的正反两个

方面。它的肯定的一面，在于广州起义代表着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发展阶段，在于这是这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地国家在苏维埃旗帜下的第一次起义。我在我所有的文章和讲话中都这样地评价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一切相反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有丝毫的愿望去引述我关于广州起义的言论和文字，而只是没完没了的毫无根据的责难。同时，我也批评过否定的方面，批评过党的领导在广州起义中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洛米纳兹和纽曼同志本应首先负起提供这样的策略的使命。但他们迄今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以及经第六次大会通过作为文件基础的关于世界形势的提纲，批判的也就是这些错误。我看，当初在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象我这样一些同志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

(同上，第 314—325 页)

第三十七次会议 (8 月 18 日) 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 革命运动问题

洛佐夫斯基 (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党党团): ……

虽则提纲中多处提到中国，但是，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国际路线方面的经验，研究得并不充分。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中国的事态在亚洲各国人民中的反响，尤为重要。中国近三年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必须要下大功夫予以研究。它的国内路线，尤其是它的对外路线，都应加以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应当促使我们特别重视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中国所犯的错误，别的国家是不是引以为戒了？没

有。其实，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保持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在共同战斗的风暴中开展工人的经济斗争，为直接改善广大群众物质状况而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取消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运用民族革命运动以争取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必要条件。中国革命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今后应引以为戒。中国共产党，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长期以来把农民运动视为开展民族革命的障碍。中央委员会附和资产阶级造出来的过激论，它非但不去领导农民起义，反而和国民党一道制止和平息农民起义。这个反面经验有没有国际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必须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党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同盟，才能解决本国面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坚持不懈地巩固自己队伍，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是可以允许的，而同农民的合作则是必需的。第一种现象是暂时的、偶然的，第二种现象则是长期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而且不应该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利益而牺牲农民的利益，这在中国已是前车之鉴。

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组织工作，以便巩固党和工农组织。强调这一点，对各殖民地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应当由群众运动的基层、自下而上地选拔新的领导者，同时从一切组织中把资产阶级分子，哪怕是民族革命分子，都清除出去——应当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这项刻不容缓的建设工作。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领导，这就是殖民地国家的党应当重视的工作。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足可借鉴。无论是中国的党，还是中国的工会，十中有九掌握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手中。环境越险恶，领导层就越不稳定。要让更多的工人充实到党的各级组织中去，要让更多的工人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去，要让更多的农民到农民组织的各领导岗位上去！这就应当是我们的口号。我以为，按

照这条路线去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可能有所裨益……

纽曼(德国)：我们有充分依据把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作为本届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基础。八年来，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丰富的经验，首先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说，中国革命经验的全部特点、全部细节，毫无例外地证实了这个提纲的正确性。中国事件的主要经验教训，首先证实了列宁提纲的基本观点，即殖民地革命不仅是一般的世界民主运动的直接组成部分，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殖民地革命不单纯是数量上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股独立的行动力量。殖民地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革命进程，是一种促进因素，是一支推动力量。里亚赞诺夫同志于1925年6月14日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论述中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1853年，中国反对外国资本的革命运动破天荒第一次兴起，据那时一位德国收师的记述，开始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含混不清的口号（这倒是一个奇妙的现象），马克思对此作了如下有趣的评语：“的确，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有关，正如中国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有关一样。”

马克思的反驳无疑是正确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对英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而通过英国，对欧洲又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段著名的话就是他的回答：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①

马克思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②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卷第6页。——原编者

② 同511页注。——原编者

在，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世界革命的新形势下，又在千百次地证实着这个预言。殖民地革命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动乱的促进因素，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反过来也会引起殖民地人民的起义。

我想再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纲应当着重阐述。这个问题是列宁在他的提纲中特别探讨过的，这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我以为，近几年殖民地的革命经验，责成我们在提纲中首先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并且把它作为我们对待一切殖民地革命的战略出发点。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认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他同时又向各共产党提出任务。他说：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于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这番话比经常引用的关于跳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说法，讲得更为明确，因为这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意思，列宁在这里不仅描述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解释了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我认为，这一点是列宁的一条最勇敢的思想。这就是列宁超过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某些观点，给马克思的理论增添了新的一页。在这一点上，列宁超过了马克思。但是，这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应当责无旁贷地执行列宁这一教导。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提到首要地位，但又不是庸俗地理解

^① 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卷第336页。——原编译者

为跳越过这一个或那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而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远景上去理解，是为了纲领性地规定一切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进程，那我们就能得到比不久前更加切实的保证，使殖民地各国共产党避免沾染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它们不致陷于诸如孙中山主义、甘地主义之类乌七八糟的大杂烩之中。

我们应当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认为，殖民地各民族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盟友和有肤色的辅助部队。共产国际认为，这是我们要使之走向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世界居民。这不是我们在殖民地的援军，这是世界的农村，这是世界的外围地带，我们要象引导宗主国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一样去引导这个地区走向社会主义。

1858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还有一点指示。马克思在信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能否单独在欧洲坚持下去。在最近一次俄国党的讨论会上，又有人提到了这一思想。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

“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的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①

同志们，我认为，这段话圆满地回答了我們正在讨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最为关键的就是马克思在1858年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暂时能在地球上这一小小的角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依然是向上发展的趋势，这场革命就有被镇压下去的危险。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不管这些国家多么落后）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前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在七十年前，世界革命的发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上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它必将磅礴于全世界，因此，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348页。——原编译者

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被数量众多的落后国家所淹没的危险，也就不存在了。

显然，现在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是无可置疑的。现在，黑格尔哲学在我们这里已没有市场了，中国哲学在我们这里也不再有了。现在，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哲学，它不但普遍适用于欧美，也适用于殖民地国家。这一关于世界发展的总论点，对于培育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独创精神，以及对于培育无产阶级的独创精神，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有实践的意义。我们应该从这一伟大的论点出发，制定殖民地的工作纲领：我们各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初期，就应该象中国、印度等殖民地的党一样，为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的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解决这个不少党的领导因之碰壁的难题，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问题。当然，如果认为，似乎列宁所瞩目的远景就是今天马上就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也是极庸俗的理解。如果我们今天就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已然完结，这当然是托洛茨基的论调，这是错误的。我们经过分析，这里可能有托洛茨基式的错误，也可能有另一种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指出了这个错误。决议写道：

“……如果仅以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性质这点为依据，而把中国革命的任务局限为：1. 消灭帝国主义；2. 消灭封建残余，那就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如果不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就不能消灭帝国主义。”

我们现在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革命如果不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能否在现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在现阶段就必须提出关于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库西宁同志的提纲有许多地方需要认真修改。但是，

提纲的第十六节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清晰而明确的说明：

“现在谈的第一和第二类国家（指中国和印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历史意义，乃是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

我认为，提纲这一段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阶段的提法，即中国和印度的现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这个提法是正确的。唯有这样，我们各党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我们一项也没有解决。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赤裸裸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北伐到武汉政府时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革命阶段。现在，在广州起义之后，在资产阶级叛变之后，我们必须找出和研究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往各阶段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区别不同阶段的一切具体标准，失去认识那些给革命工农造成巨大流血牺牲的转折关头的一切具体标准。

正如第九次全会的提纲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正处在苏维埃阶段。但是，这个苏维埃阶段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而这种政治形式的根本内容构成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这场革命正在突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子，虽则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尚在进行中间。这就是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问题上常遇到两种错误，一种是托洛茨基的错误，只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忽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种错误是只看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忘记越过这个革命的界限，忘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观点是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相违背的。大家知道，列宁早在1905年《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就写道：

“……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①

当然，这不是托洛茨基的思想，而是马克思的思想。

“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②

谁要是不理解这一点，谁要是现在在中国仅仅说我们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谁要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现在正处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那他就要犯错误。关于这一点，列宁在1921年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写道：

“……考茨基……之流……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③

毫无疑问，这一定义是关键性的。后者，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前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我认为，还必须指出，我们是怎样理解“转变”这一词的。许多同志，包括殖民地各党的许多同志在内，过于刻板地理解这个词。如果列宁提到这一点，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既然是由于经济的内在规律所致，由于革命的自然规律所致，那就可以自动发生，不需要战斗的阶级的促进了，他说的恰恰是，斗争，只有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列宁的“转变”一词，无疑是指革命的自觉转移，是指把革命积极地推向更高级的阶段，革命不

① 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卷第634页。——原编译者

② 同上，第634—635页。——原编译者

③ 同上，第568页。——原编译者

是象树木那样生长，不是按照生物学的规律那样生长，而是要有无产阶级这个克敌制胜的动力去发动它，去推动它，并促使它前进。当然，这不是按自由意志行事，而是在一定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根据现实条件来行事。无产阶级就是依靠这些力量解决问题的。斗争，只有斗争，才能解决向革命的更高阶段过渡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何时才能完全成熟，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答案取决于斗争。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时机，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仅仅取决于各阶级力量的斗争，取决于工农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等斗争的成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各阶级力量在革命中的组合问题以及工业化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印度，如果我们想正确地了解各阶级力量的组合，就必须从各该国的经济入手。中国经济极为多种多样。列宁曾经谈过俄国经济的多样性。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一切自然经济形式，中国农村手工业形式，与此同时还有现代资本输出形式（中国向马来群岛输出的资本达一亿元），即最多种多样的经济形式。俄国经济的多样性较之于中国，约略相当于英国古典资本主义较之于俄国经济。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待极其复杂的阶级组合情况的。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欧洲各国所不能匹敌的多样性之中，哪一种经济形式占统治地位呢？是资本主义形式吗？共产国际提纲的回答是：否。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托洛茨基在自己的笔记中对此大加讥笑。他问道：怎么可能一边大谈封建残余，一边又把这些封建残余称之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呢？残余怎么能占统治地位呢？

我以为，这里没有矛盾。实际情况表明，封建残余是国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难道西方渗入的资本没有能够使中国的资

本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吗？绝对没有。因此，应当着重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情况。进入中国的资本不是工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没有在中国另建新的形式，而只是利用旧有的经济形式。由中国榨取的商业利润，没有用来在中国建设工厂，而正如马季来尔在其论述中国的书中所指出的，商业资本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却用来在日本、印度和美国建起了工厂。这时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现阶段，金融资本在殖民地的作用究竟怎样？

列宁只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要点。他首先从宗主国的角度分析了金融资本时期。但是，关于金融资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外围地区、对于殖民地的作用问题，他也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指示。希法亭在其题为《金融资本》的著作中，谈到资本输出对殖民地的作用问题。大家讨论纲领问题时，曾列举理由着重指出，此书颇不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讨论印度问题时，我就发觉有人想证实：资本向殖民地国家输出，必然要产生工业，而工业的收入有利于该殖民地国家。但是，希法亭却恰恰指出，在有利于从属国的各种资本的转移中间，是有差别的，并指出，资本输出纯粹是为输出国的利益服务的。这就是资本输出的特征。希法亭指出，资本输出，甚至即使以工业资本形式输出，也不能导致国家工业化，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导致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国家一比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些欧洲从属国，如比利牛斯半岛、瑞士，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一切必须条件（有铁矿、原料、初级形式的资本、劳动力），为什么资本输出没有使这些从属国建立起机器工业？即没有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生产呢？为什么这些国家仅仅有原料工业？希法亭指出，这是由资本输出的规律决定的。他认为有这样一种发展类型，而且印度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资本输出最初始于向运输系统的投资，后来转入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再后是它的最新时期，即转向原料领域。殖民地就是宗主国的原

料供应地。不管怎样闪烁其辞地渲染，这绝不意味着工业化。我们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是否就是“国家的工业发展”？我认为，不是。工业化的含义是（这里当然是指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情况下；工业资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它统驭一切其他经济领域。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业资本概念，即农业经济以及其他一切经济生活形式都服从和隶属于工业资本的统治。这种工业化要求铲除农村的封建残余。这就是说，要进行土地革命。

这就是金融资本在殖民地所完成的职能吗？不是。这一类的论调是错误的。罗莎·卢森堡就有这种错误。罗莎·卢森堡在论述资本积累的时候，关于殖民地问题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正确的东西。但是，她把这个过程描写得过于肤浅。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资本主义不仅在瓦解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而且要彻底战胜它们并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第三者”逐步消失殆尽，这样就产生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因而就得出这个糟糕的理论。我们从各个角落批判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但是，究竟什么东西对殖民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罗莎·卢森堡错在哪里？错在她竟然认为资本主义全盘消灭了资本主义前的各种成分。实践说明了什么？实践说明了相反的情况。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渗入并没有消灭各种非资本主义形式，而是发展了它们。金融资本没有把非资本主义形式变成资本主义形式，而是彼此和平共处。金融资本可以破坏它们，但却不能产生更高级的生产形式，根据这种研究问题的正确的、原则性的观点，就应该推翻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说法。要说明这一点，还有一条理由。如果本涅特同志在这里维护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印度工业化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印度正在实现工业化，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去否定中国工业化的说法。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不是在衰落，而是在上升。

这样，就会产生马克思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那么实际上就存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被孤立和被排挤到一个小小的角落的危险，就存在着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危险。但是，不会有这种危险。因此，我认为，本涅特同志和一些英国同志的观点是同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教导背道而驰的。当然，理论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事实解决问题。

再谈几句关于中国各阶级力量正在进行组合的问题。如果抛开个别的夸大说法，那么许多人为之辩护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而且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特别软弱的论点，已被中国的发展过程所证实。我们有什么根据说中国资产阶级软弱？首先，可以拿中国的工业发展情况同印度相比。我已指出过，印度工业已有发展，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部分地要依靠中国，要以牺牲中国的工业发展为代价。现在我们看到印度的工业发展远比中国快。印度有八百万纱锭，中国只有四百万纱锭。印度煤产量比中国高三倍，铁产量高一倍。这就是中国工业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外国金融资本的霸主地位，中国工业的软弱性，外国垄断银行事业，一句话，一切经济命脉都操于外人之手。再者，既然资本主义还在发展，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还这样软弱？殖民地的一个普通规律是：资本主义在那里的发展要比当地资产阶级快。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它在那里的投资额不成正比例。但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同本国资本和外国对华投资的总和成正比例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比资产阶级快。从社会观点看，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强大。但是，不应该让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相比，而应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这个三位一体的联盟相比。这一条规律无疑乃是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软弱和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赋有特殊的领导作用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何许物？这不单单是工业资产阶级。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其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商业资产阶级，即兼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资产阶级。这个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按照算术计算和本身意义来说，要比工业资本强大得多。但是，这个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不是就意味着和代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不是。它的主要阶层反对革命。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代表者，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许多论述，高利贷资本在旧的社会制度时代即已出现，它不能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和破坏旧的社会制度。高利贷甚至不具备现代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只消引用《资本论》中的一句名言就够了：“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与社会的整个经济发展成反比。”这适用于一切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它作为革命力量时所表现出的特殊软弱性，它的改良主义，以及在整个资产阶级内部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其根源盖出于此。

最后再谈一点，即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中提到的所谓“地区性”问题。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前的资本形式，存在着高利贷资本，由于商业资本所起的作用，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串通成一个整体，它与封建残余串通成一个整体，工业资产阶级部分地同农村高利贷资本有联系，与农村的封建残余有联系，这些都是事实。我举文献中提到的一个事实。亿万中国资本输出到马来群岛，再把利润转回中国。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资本在中国工业领域内寻求出路。但是，外国资本堵住了它的路：资本在周转中变为商业资本，变为高利贷资本。那些返回中国的资本又转到中国农村高利贷者手中，用来奴役农民，用来加强封建关系。这个现象绝不是中国一国的现象，而是国际的现象，是殖民地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许多问题。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资本主义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但同时它又垄断着经济命脉。这岂不自相矛盾？在封

建主义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有这样一些同志（并不单单是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反对派的拥护者），我们认为，现在在中国，封建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他们则持不同意见。由于时间有限、问题复杂，我就不再详谈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了。我只想提醒一下，马克思的学生，精通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列宁曾经说过，中国现在存在着封建主义。他说：

“在中国，在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里，客观条件只能将一种一定历史范畴所特有的压迫和剥削形式，即封建主义，提到近五亿人民生活的日程中来。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生活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中国农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于土地的依附，乃是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者就是封建主。”

由此可以引出什么结论呢？

“必须消灭封建主义的一切表现和各种形态。”

由此就可以得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极其明确的结论。

再谈一谈殖民地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几点最关键性的特征。我们都知道英国和法国的古典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都知道1905年和1917年俄国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革命。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所有这些阶段的革命，其区别是：以前历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然在旧社会的内部孕育成熟。法国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例子。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实质上已经成熟。资产阶级的任务仅仅在于夺取政权，并使这个政权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仅仅需要推翻和改组上层建筑，使现状适应新的形式。我们是否在印度和中国看到某些类似之处呢？没有。这种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处于封建主义发展阶段。历史上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仅仅需要夺取政权。它早已掌握了经济权力，而中国资产阶级则必

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最后的结论：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一般殖民地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具有相当程度的软弱性。资产阶级作为一定经济的代表者，它的软弱性是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形式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可能仅仅是一种例外现象。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情况就曾经是这样的。中国革命的结果如何？这里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们归纳到革命经验中去。中国资产阶级甚至没有来得及解决其面临的任何一项任务，就彻头彻尾地变成反动力量了。这个情况，我们在法国等等一些国家里没有见到过。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解决了自己面临的一部分任务。当时，尽管存在着封建沙皇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当时，俄国已经成了头等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资产阶级甚至没有完成一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就变成反动派了。于是，我要提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根据设想，中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能够自行解决革命的任务，哪怕是采取妥协改良的办法？我们没有理由这样设想。我们不能陶醉于革命的宿命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从分析经济出发，从清醒地估计各阶级力量出发，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纯粹帝国主义的道路，是被瓜分的道路，也就是一条备尝艰辛的、缓慢的资本主义变革的曲折之路；或者是另一条路，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直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大家都在议论波拿巴主义问题。参与议论的一些同志认为，只有封建主义经济完全消灭，才能谈得到波拿巴主义。他们认为，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儿和继承者。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可以提另一个问题：既然资产阶级如此软弱，那么为什么它还起过革命作用？为什么它能够在一时期内起过革命作用？这个问题也应该回答。它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帝国主

义压迫太甚，它不能不前进几步。5月30日，在它开始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工农群众就动员起来了，斯特拉霍夫同志在他的精采发言中引用了一个中国谚语：巫师造魔鬼，魔鬼挣脱了他的摆布，吃了巫师。挣脱了束缚的殖民地的力量，对待工业资产阶级就是这种态度。

在中国，革命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革命“气味”曾经维持多长时间？如果从它作为革命的因素登场算起，那就是自1925年5月30日始，至1927年4月14日止。如果从反封建斗争最紧张时期即北伐算起，那么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是从1926年7月始，持续到1927年4月14日止。自从斗争真正开始以来，自战争开始以来，自直接的反封建斗争开始以来，历时整整十个月。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气味”持续十个月。嗣后，它就成为了采用反动的中世纪刑法的血腥的刽子手。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坚信，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非但在较长时期内，而且甚至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起革命作用。在这点上，我坚持提纲中的合理意见，即提纲的基本点我同意，但要稍作修改。应该删掉一些东西，因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已经把它删掉了。

印度资产阶级，由于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况大体相同，从一开始就得走上背叛的道路。我们不妨现在就向印度的同志说明：印度资产阶级一定会背叛你们。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党。中国最糟糕的事情，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中国党未曾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一点，一定要大声疾呼。共产党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最重要的教训反复申明，民族资产阶级一定会在革命运动伊始就出卖你们！

关于今后的前途问题，再说几句。现在，在我们经受了这一切体验之后，中国的形势如何？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了团结民族运动的策略。需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策略对谁有利？我们

两者之中哪一个得利更多?由于我们在某一时期支持了资产阶级,由于我们在十个月内曾利用过他们;资产阶级是否实际上也利用了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得失如何?对资产阶级又得失如何?这里起码有四个任务:第一、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第二、消灭封建主义;第三、实现国家统一和建立国内市场;最后一点,但是并非最次要的一点,就是夺取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有所得益,虽然这仅仅是一部分,是岌岌可危的一小部分政权。这个合作政权得失如何?资产阶级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的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建立了有四百万人参加的农民组织。我们首先得到的是:工农群众的独立斗争,工农的独立运动,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个策略是否正确?失败是否就是策略的错误?绝对不是!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虽然正确,然而也遭到了失败。中国当前的形势怎么样?如果从纯经济的角度看,现在面临的是最深刻的经济危机。

1927年的对外贸易没达到1926年的水平。发生了财政危机和深刻的工业危机。重工业瘫痪,全国煤矿几乎全部停产。丝织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农业危机越来越尖锐。最近一期俄文杂志《新东方》出现了反对洛米纳兹同志的论战,因为洛米纳兹同志的文章指出了危机的征候。杂志认为,洛米纳兹同志的错误是仅仅研究了行情。我们必须提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是危机现象还是行情现象?中国的农业危机是这样的危机:它不仅在毁灭粮食,不仅在毁灭生产资料,甚至在毁灭生产本身的条件。由于军阀混战和饥馑,农民不仅被抢走了粮食和生产资料,而且动辄被夺去生命。

这就是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达到中国现代史上最高潮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个什么东西?是行情的危机,还是结构制度的危机?这是结构制度的危机。

还有一个情况也很重要：正如同志们知道的，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市场。但是，现有市场已同世界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农业的某些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受到压抑而陷于绝境，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中国农业两个传统的重要部门，制茶业和丝织业，日益凋敝，中国制茶业由于印度、锡兰茶叶的竞争遭到破坏。中国的丝织工业受到排挤，一蹶不振。中国丝织品的出口一落千丈。为什么呢？这不仅是印度竞争的后果，而且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理化现代企业生产的廉价人造丝的影响。输入到中国的人造丝与日俱增，正在摧毁中国的丝织工业。这个情况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造成的。由于德国工业，即德国化学工业的竞争，靛蓝的生产被完全挤垮。德国化学工业向中国输出，完全压倒了中国靛蓝。同时，不要忘记，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旧仇，没有不平等条约，没有租界，已经超过战前向中国出口的水平，而且还将充任英国资产阶级买办的角色。农业危机是不是结构制度的现象？是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而造成的危机是不是结构制度的现象？是。有没有消除这些危机的前景？没有！因为要消除危机，必须以完成革命的各项任务为前提。

有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本想谈一下，现在暂且撂下不谈。最后只想谈一下中国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中国党今天在会上受到攻击。我不想再评论佩佩尔同志的讲话。佩佩尔同志今天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根据企图再次挑起争论，因为这些问题早已由共产国际以前的历次决议解决和处理了。没有任何人谈过和提过这些问题，因为早已由第九次全会解决了。我觉得，他企图从根本上把这些问题同第一项目程所讨论的问题扯在一起。我认为没必要再去详细探讨这些东西。但是，他在这里攻击中国党，责难中国党，说它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犯了孙中山式的错误，在第二阶段犯了托洛茨基式的错误，那么，党的工作中还有哪些是正确的呢？这种评价是错误的。党纠正了它所犯的严重错误。党在犯过种种

错误之后，又继续沿着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国党为了殖民地各国未来的战斗，象交纳党费一样向共产国际的武库贡献出通过实践得到的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有：关于工农群众的独立组织问题；关于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独立的革命起义以及当时如何在中国实现这些起义的问题；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刻，双重政权的成员问题——采取上海工人代表机构形式或是采取武汉时期的其他各种形式；关于农民起义的策略和技术装备问题（农民起义在印度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再者，就是如何在反革命包围下建立苏维埃制度问题，等等。有人责难我们党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是农民，说十万党员中有九万是农民。（佩佩尔：“难道这是我说的吗？”）

我不是说佩佩尔同志，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革命的主力。我说的是另一个提出这个责难的同志。这个责难提得对。但是，这个情况表明，现在中国农民虽则极其缓慢地认识到共产党是自己的党，但他们已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举行起义，这个情况也表明落后的农民是接受党提出的口号的。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起着重要作用，证明党已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

再谈谈中国党内右倾分子的错误。他们究竟错在哪里？右倾分子作出了制止工人斗争的硬性决定。他们发出了数不清的文件反对农民的过激行动。中央委员会6月1日的指示反对这些过激行动，反对农民独立起义，反对土地革命，反对这一切东西，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我们应坚决指出，党的农民政策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下方针：平息一切对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土地所有者和对军人所采取的过激行动。”

平息过激行动，这就已经开始堕落为反革命的右倾错误。共产党的农业部长有一道命令宣称：

“必须纠正农民的一切幼稚病。特别是应该把一切脱离正确路

线的分子，把一切危害大多数农民分子开除出去。至于涉及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和惩治土豪劣绅，则应当遵照政府和党颁布的指示行事，即把他们送交政权机关，而不得任意行动。”

因此，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向工农群众讲明：要谨慎从事！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就是坚定不移地平息过激行动。

中央委员会最后一个文件，即6月3日的决议，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

“武汉的工人队伍应予解散，或编入军队，以避免误会。”

这就是旧领导的路线。新领导上任后犯了盲动主义错误，对盲动主义错误放任容忍，轻视工会工作。对盲动主义方针的错误，应当给以无情批判。为这些错误涂脂抹粉，对这些错误容忍姑息，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应当承认一点，盲动主义错误和机会主义错误后果相同，但是根源有别。有位同志说得完全正确，他说，不应该把这些错误看作腐败的象征，而应看作是幼稚病。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错误方针就是偏袒资产阶级，压抑无产阶级。新领导现已纠正了盲动主义错误。我不打算谈广州问题。关于广州起义不是盲动的说法，现在已成了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不过，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肯定广州起义是一个极为了不起的事件了。共产国际将来应该指出这一点。广州起义对于一切殖民地运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广州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法令宣称：

“土地、和平和自由，只有通过工人的手才能得到。今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义每前进一步，都恰恰以广州起义的结局为起点，以‘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为起点。”

在结束发言时，我一定要再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斯特拉霍夫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说，在俄语中找不出用来表达中国党工作条件的词句。在

我们的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词藻，在我们的术语里没有这样的概念可以表达那些白色恐怖的手段。我们党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压迫下工作的。既然我们研究兄弟的中国党的活动，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党做了巨大的工作。第九次全会提纲通过以后，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提纲开辟了一条什么道路？现在，当镇压广州起义的胜利者转向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应该建设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建设中国党。应该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应该紧缩战线。共产党的领导再也不能落在机会主义政策代表者的手中了。不久前，香港总督代表来广州，命令在各主要街道用黄沙铺路，要用过去迎奉帝王的礼仪迎接他。那些黄沙铺路的街道，正是几个月前死难的赤卫队员们尸骨枕藉的地方。

但是，尽管现在困难重重，仍然有种种迹象表明，新的起义正在到来。仍然是在广州的街道上（岂止是广州，还有上海），仍然是在共产国际、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引导中国的工农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同上，第 368—393 页）

第三十八次会议（8月20日） 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 革命运动问题

洛米纳兹（苏联）：

.....

现在谈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在讨论中间，库西宁同志提纲中的有关段落受到了十分正确的批评。我只想补充几点。

首先，我认为，库西宁同志对这一情况强调得不够，即殖民地的工业资产阶级极其软弱，它只占整个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

殖民地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买办资本最强大。特别是第十八节^①，库西宁同志的这个错误最为明显。我先不提这一点，以免分散大家精力。但是，我认为，最为明显、最为危险的错误是在第二十一节和以后各段中，库西宁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就是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阵营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对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库西宁同志的提纲把资产阶级作用问题的全部重心都放在论证这种可能性上，而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是历史上形成的。然而，形成这种可能性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了。

库西宁同志在论证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转入革命阵营的时候，矢口不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的历史作用，矢口不谈印度的具体历史事件和埃及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没有必要担心工农革命运动的那个时期已成历史的陈迹了。早在1920年，列宁同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已强调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殖民地国家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了，而且这个资产阶级正在同帝国主义一道反对殖民地国家的工农革命运动。

库西宁同志把历史上曾经是正确的事情推演到将来，而丝毫不谈这个发展阶段已告结束。当然，个别的例外可能会有。但是，不能依据例外得出规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把重点放在论证过去时期曾经正确的真理上，这个错误更大。我认为，库西宁同志根据这种分析而得出的那个策略结论，也是不正确的。

库西宁同志认为，在民族改良主义者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革命统治集团之间划等号是极左错误。这正确！我说，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彻底倒向反革命阵营以后，就象中国曾经发生过的

^① 指1928年8月14日库西宁在共产国际六大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报告中的第十八节。——原编译者

情况那样，也不能在它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之间划等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利用敌人阵营中的一切矛盾。反革命阵营，甚至在民族资产阶级彻底转向这个阵营以后，也要由于矛盾重重而分崩离析。各殖民地的革命政党应该考虑这些矛盾。但是，库西宁同志进一步的结论不对。库西宁同志的原话是：

“……说自治党人、华夫脱党人和其他各党已经在劳动群众面前暴露了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是民族运动的反革命叛变者，这不正确。为了在劳动群众面前揭穿他们的真正嘴脸，还需要做大量的共产主义的启蒙工作，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去取得大量的新的政治经验。一言以蔽之，需要经过一整个的准备阶段，我们不能把这个阶段的种种困难置于不顾，我们不能对这个阶段的各项任务掉以轻心。自治党人、华夫脱党人之流还不同于中国的国民党，还没有出卖民族解放斗争……。”

我认为，必须坚决批驳这个历史性的论断。会上列举了印度、埃及的情况，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在反对群众革命运动。这一点也很适用于印度尼西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伊斯兰联盟”。这些叛变事实已成了历史的铁案。不能再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自治党人和华夫脱党人并没有出卖民族解放斗争，认为他们还在两个阵营之间摇摆。

认为必须“在现阶段集中主要火力攻击的不是他们，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当前直接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主义统治集团”。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

1905年我们党进行反对专制制度之际，专制制度是必须摧毁的主要敌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是集中火力针对立宪民主党。1917年我们批判的火力主要对准孟什维克，因为1905年的资产阶级和1917年的孟什维克是我们要推翻的那个制度的主要支柱。为了发展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必须使共产党人坚决

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这方面来，即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提纲中的策略结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错误的，必须彻底修改。

我简要谈谈小资产阶级的问題。我以为，库西宁同志在提纲的第二十四节中，把殖民地的整个小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算作革命动力，这是错误的。库西宁同志说：“一般说，我们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把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样看作是革命的动力。”

这是错误的。必须从一开始就强调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特殊作用。我们不能毫无条件地把它看作革命动力，而应该把它同农民，这个殖民地的真正革命动力严格区别开来。库西宁同志在后面的叙述中已经有所区别，但是，从一开始就提出这个论点，这就授人以柄来歪曲我们在许多殖民地国家的路线。

最后，关于划分阶段问题。提纲中的各阶段又分时期，时期再划为一定的小阶段。

同志们，我觉得，这种分法太公式化。首先是费解。我现在声明，有一个段落我拜读四遍也不懂。我认为，这个提纲是为比我们这些大会代表知识稍浅的人写的。举例说，有这么一段，“但是，与此同时，可能有这种情况，革命的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的转变过程或多或少地要中断一个短时期，以致只有在新的浪潮到来时，第一阶段才结束，甚至可以预料，革命高潮的各个浪头来势不太猛，持续的时间不太长，而其中有两个或几个浪头要持续到第一阶段结束。”

即使最细心的阅读，也是极难理解。我们殖民地的共产党人极难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阶段、时期和小阶段。

但是，这种划分方法的主要错误在于，殖民地的运动根本不会按照这些时期和阶段前进。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革命走过一条独特的道路。难道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也必定要按照中国革命的

道路前进吗？库西宁提纲原样照抄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且是不加批判地原样照抄。我认为，其他国家的革命道路一定完全不同于中国。列宁曾多次强调过，各国的革命都具有独创一格的、与众不同的、标新立异的特点。关于东方问题，列宁曾教训苏汉诺夫说，这里的革命道路是社会民主党的现代蠢才们不可能想象的道路。列宁反对为各国的革命运动制定任何共同的模式。我们知道，埃及、印度、中国等国的革命运动是各自按不同的方式发展的。

其次，这种划分方法的政治错误是：第一阶段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在第一时期还参加民族革命运动阵营，第二时期大民族资产阶级就毅然决然地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集团串通一气了。“它的反对派立场现已消逝，而它血腥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立场则突现出来。”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作用发生了如此变化，它已经脱离了同民族革命阵营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同盟而转向血腥镇压、疯狂反对工农运动方面去了。同时，工农革命在第一和第二时期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甚至在第二时期也还没有掌权。共产党人只是到现在才开始提出政权问题。可见，工农革命阵营在第一阶段的失败似乎是注定了的。我认为，这就是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确曾有过这种发展情况，即起初资产阶级甚而领导了民族革命阵营，以后又转向反动阵营，并得手击败了工农阵营。但是，这些都丝毫不是客观上事先注定的。如果不是中国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党人就能够把第二时期（或把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过渡）转变为压倒资产阶级的胜利，那么情况就不会是资产阶级以“血腥手段”镇压工农而是工人农民来收拾地主和资产阶级了。

我认为，这是过分宿命地、盲目地抄袭中国革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党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就是不要再让其他国家重现这个

工农遭到血腥镇压的第二时期，而在第一时期就去扭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脖子。

因此，我认为必须指出，我们中间几乎公开地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注定要失败的。例如，中山大学所属的一个研究所出版的《中国问题资料》上，有一篇杨晓仁（音）的文章。这篇文章谈蒋介石何以能在上海成功地发动反革命政变。杨晓仁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在上海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犯了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令人尊敬的编辑部对杨晓仁的分析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却声称他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就看不到1927年4月我们在上海没有取胜的可能。这家学识渊博的杂志的学识渊博的编辑部，拿这些胡言乱语来反对这位同志，而这位同志只不过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即如果共产党没有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如果它及时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那么，蒋介石发动四月政变就可能自食恶果，虽然这个革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中国问题资料》编辑部借用帝国主义的言论来证明宿命思想，认为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一切应该如此。如果事先就注定了革命必败，那么干革命还有屁用？研究历史的错误还有屁用？这种宿命的观点同共产国际的观点、同我们党的历次决议毫无共同之处。

我本想再详细地谈谈另一个问题，但是我只有几分钟了，只谈几句吧。

《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署名林河源（音），我只想读其中的一段，这一段不需要解释。我认为，我们俄国同志有时为了要论证一些最庸俗的东西，而借用体面的中国人名字做笔名隐蔽自己，这是不对的。其实，即使这位俄国同志写上自己的真名，也没什么不好，林河源是这样说的：“农业发展的革命道路，若是通过消灭地主垄断土地的状态，通过全部土地交付农民自由使用来实现，这就是中国农业以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形式所走的农

场资本主义（‘美国式的’）的发展道路。”这种令人嗤之以鼻的离奇的废话，却当作在中国问题上的新发现，由《共产国际》给我们刊载出来。的确，林河源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立即作了种种的解释。但是，这种中国农业俨然要走一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类比法，是抹不掉的，尽管他又想掩饰这种提法，说什么列宁关于俄国农业发展问题的说法，是完全在另一种情况下提出来的。类似这种向现代中国兜售资本主义的行径，必须宣布对其进行无情的斗争。

最后，我趁结束发言的机会，答复佩佩尔同志几句话。佩佩尔同志在这里花了不少时间谈了我的问题。我现在提出佩佩尔同志的问题，并非由于佩佩尔同志的辩驳和对我的个人攻击，使我感到自己受到委屈和污辱。

如果说，不管自己多么不愉快，不顾代表大会多么不愉快，我不得不向佩佩尔讲几句话，那是基于以下理由我才这样做的。第一，在代表大会上，反对佩佩尔同志的斗争，不仅有我，而且还有几十位代表，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同佩佩尔进行斗争，其激烈的程度并不比我低，这种斗争不是个人恩怨或清算个人旧账。我和佩佩尔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旧账可算，这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健康的革命抗议，这是对那种体现着佩佩尔同志人格的机会主义、非原则性和卑鄙的政治钻营的抗议。

如果问题只是牵涉到佩佩尔个人的品质，那就听其自便好了。但是，佩佩尔却把这些品质毫无限度地表现在政治上。佩佩尔同志的这些政治品质受到虽说不是全体代表，也可以说是大多数代表的尖锐抨击，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一点上，仅仅在这一点上，我才理解同佩佩尔的争论在各方面都是一桩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第二，佩佩尔今天发表了一个政治性声明，我不能不予回答。佩佩尔声称，似乎布哈林同志批驳了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对战争

危机估计不足，贬低了国际矛盾的意义，折衷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和国内矛盾的相互关系，似乎这个批驳是针对我的。佩佩尔有什么理由作这个声明呢？一个失意的人要施展卑鄙险恶的手段——只有这一点，才可能是佩佩尔同志作这个声明的理由。我在大会的发言中强调过，当前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点就是战争危机。布哈林同志所批驳的折衷论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从未讲过。无论在任何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我过去和现在同我党出席六大代表团所通过的路线和决议从未有过任何分歧。

第三，我不能不哪怕是简短地答复一下佩佩尔。由于我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分歧，由于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之前在中国问题上犯过错误，他竟干了已有半年之久的纠缠不已的投机活动。在准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过程中，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持的中国问题会议的讨论过程中，我在许多问题上（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关于中国的当前状况等等）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同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随后的决议发生相当尖锐的分歧。自从我们党的领导和共产国际通过这些决议以来，我是完全彻底地照办的。这一点我已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声明过。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以后，中国发生的情况证明，我在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有许多观点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既向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向代表大会声明过了。既然佩佩尔意欲借此理由投机取巧，我就应该作如下申明。

只要我自信我的观点正确，在没有就这些争论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决议以前，我就尽自己之所能，当然也不顾情面，在自由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不象佩佩尔那样，要看风转舵，看什么人，也许是很有权威的人，对争议问题表示了什么意见，我不善于在一天之内或甚至在一小时之内就改变自己的观点。任何人没看到过，任何人也绝不会看到佩佩尔和哪一位领导同志有过争论。

显然，佩佩尔的原则性和脊梁骨都不太坚强。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中国问题会议上进行讨论时，佩佩尔起初再三论证，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而一听到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佩佩尔在四十分钟内就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立场。广州起义问题讨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认为，广州起义是冒险，他对待广州起义的态度，就是普列汉诺夫反对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论点的翻版。佩佩尔不管怎样辩解，这个可耻行径是抹不掉的。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去谈那些“细节”，如提出以农村自治的口号代替苏维埃的口号，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合法共产党的建议之类。佩佩尔在一昼夜之间就自然而轻松地对这些孟什维克式的建议拒不承认了，正如同他拒不承认自己别的极端过激的建议一样。这个人居然还敢于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批评别人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和过失！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

佩佩尔对于我的种种愚蠢荒唐的责难（责难我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的殖民地性质估计不足，甚至指责我右倾，这一点似乎指责佩佩尔他自己），只能让那些关注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人们一笑置之而已。

（同上，第447—452页）

陈宽（音，中国）：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问题，是我们在处理殖民地民族运动时亟须重视的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发展和失败的经验证明，在一定的革命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可以起革命作用。同时，殖民地各国资产阶级或迟或早要走上反革命道路，这也是必然的。但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有一个变化过程，一方面由于客观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要竭力维持政权，就故作姿态，如提出国家统一的口号，

或者要求解散军队，或者要求关税自主，借以达到掩盖其反革命角色的目的。有一些同志因不了解事情真相，而提出关于资产阶级可能发挥革命作用的问题，并进而提出关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稳定的问题。譬如，国民党以武力占据北京以后，一些中国的和外国的同志经常提出下面几个问题：

1. 国民党还能否在中国的反帝运动中起重要的革命作用？
2. 国民党政权能否稳定，它能否实行改革？
3. 在国民党政权下，“第三党”能否发展，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组织能否公开活动？

在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时，我们不能离开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去研究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正如同我们不能离开帝国主义者去孤立研究殖民地本国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一样。在殖民地本国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肩上。这些革命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土地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苏维埃政权，保持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一分钟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尽管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之间，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以及各个新军阀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尽管本国资产阶级在客观上还在致力于民族独立，它终将不可避免地要实行镇压工人运动和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

这是因为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两种抉择面前是软弱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的恩威并施，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它必然要转向反革命一边。在日本的威逼政策和美国的收买政策面前，不仅受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印度资产阶级要走这条道路，而且受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也要走这条道路。因此，依我看，认为已经背叛革命的本国资产阶级还能起反帝作用，这就暴露出没有充分理解革命已由一个阶段转变和过渡到另一阶段，没有充分理解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作用。

这个错误乃是机械地理解各阶级的革命作用和革命动力的结果。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应该同时回答。如果我们承认国民党政权可能稳定，那么必须具备下述任何一个条件：1. 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政策得逞，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这样，国民党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工具；2. 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维持其独立的政权；3. 中国工农革命遭到彻底失败，而且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可能得到发展。

但是，事实首先告诉我们，世界革命已达到第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有着自身的新的内部矛盾，帝国主义由于要重新瓜分殖民地，正处在新的冲突的前夕。新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向左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就没有根据认为帝国主义者能够安安稳稳地把中国完全变为殖民地。再者，日、美之间在中国的冲突，如同在整个太平洋一样，愈演愈烈。这个冲突也鲜明地表现在不久前国民党北京第五次全会上爆发的左右两派的冲突上。左派拥护美国，力主支持抵制日货运动。右派和中间派主张同日、英帝国主义者妥协，因而主张制止普遍的反日运动。这个冲突是有象征性的，这意味着受帝国主义者唆使和利用的中国各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在迫近。第二，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的国民党乃是帝国主义者庇护下的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资产阶级羽翼未丰，而且憋气十足。这些都是事实。所有这一切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绝无力独立维持政权。第三，不仅世界革命在迅猛发展，中国革命尽管遭到严重失败，也仍在向前发展。农村的土地革命汹涌澎湃。革命的士兵运动在日益壮大。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对于革命来说正是火上浇油。经过反日运动锻炼的城市贫民，逐渐走向同国民党相敌对的立场。尽管遭到资本主义进攻和笼罩着白色恐怖，工人阶级又重新聚集力量，准备投入新的革命浪潮。在广州起义中升起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下，

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养精蓄锐，准备领导革命。远离中国的兄弟党同志，也许不十分了解这些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就可以看到关于镇压农民起义、士兵哗变，以及殴打城市工人的大量报道。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没有被彻底粉碎，它还在向前发展，它正在消耗着国民党政权，正在消耗着这个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稳定的。

既然三个条件之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具备，我们就不能说国民党有实行改革的可能性。中国的情况是，不仅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工人丝毫没有参预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自由，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而且连反帝运动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这表明国民党制度没有任何改革的迹象。第二国际恰恰在现在邀请国民党参加它的大会。显然，事情不在于第二国际欢迎改良主义的国民党加入它的行列，而在于它要招揽屠戮中国工农的刽子手入伙，以推行帝国主义列强的和平主义外交。因而第二国际就对国民党卖力协助帝国主义搜刮中国，从而使工人贵族大捞实惠这一点表示感激之情。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三党”问题。这个组织是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既然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反动，苏维埃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快，既然我们已进入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那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终归要靠拢“第三党”，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第三党”的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要防止苏维埃革命，它就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革命的政策。它不同意直接的土地革命，但是它维护农村地方自治的要求（我们的佩佩尔同志也维护过这个政策）。它不会去引导工人实行武装起义，而仅仅提出恢复群众组织的要求，并希冀实现改良主义的纲领。如果“第三党”一旦能够公开活动，它的妥协政策推行的结果，将

使它在客观上变为国民党的左翼。这个政策的成果，如要求恢复群众组织之类，我们通过国民党左翼近来的活动已经领教过了。但是，如果“第三党”不甘做国民党的左翼，那么，它就要处于国民党反对派的地位。这样“第三党”的前途便岌岌可危了。因为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就会自然而然跟着无产阶级走，“第三党”发展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我们指出了帝国主义者无法把中国完全变为殖民地，指出了本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取得独立自主的稳定，指出了“第三党”朝不保夕的前途，因而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和工农组织绝无可能从事合法活动。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不这样看。

由于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中国革命依然在前进，这就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别无他路可走，而只能去组织中国群众准备新的革命浪潮，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这个豪绅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各兄弟党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国民党对各殖民地所起的反动作用，同欧洲的法西斯分子毫无二致。三十一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其中的六千名共产党员已成了国民党的牺牲品。它的残酷性打破了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分子的纪录。国民党不仅为了讨好其帝国主义主子而统治中国，而且它的反革命行径也是东方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样板，策动它们去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共产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仅要同西方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且还要同东方的法西斯主义即国民党作斗争。

(同上，第 480—484 页)

第三十九次会议 (8 月 21 日)

斯特拉霍夫关于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的结束语

我上次的报告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谈起的，而现在我的结束语则要从亚细亚恐怖的问题谈起。在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嚣张一时的白色恐怖应当使我们得到教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中国这样残酷的恐怖，这样残酷的专政。然而，我们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却很少注意中国革命的教训。因此，我的发言要分三部分讲：1. 关于中国革命的教训；2. 中国代表团委托我发表一项简短声明；3. 我想谈一下关于殖民地问题中的几个共同点。

一位日本同志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指出，我们在支持殖民地起义、支持殖民地的反帝革命战争的时候，应该重视创建军队的工作，重视对士兵的工作，重视创建反帝军队的工作。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向中国提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的运动，那怎么能够创建军队呢？以前，北伐是完成革命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就支持它，而现在，蒋介石同张作霖以及其他军阀之间火并，酿成了民不聊生的战争，有助于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我们应该确定对待这种战争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向农民队伍和游击队做工作，领导广大士兵同他们的官佐和将领作斗争。这样，我们就可能实实在在地创建哪怕是小股的红军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已在我们中国南方活动。“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口号，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口号。

另一位同志在这里指出，我们过分忽视中国党在组织方面的缺点。我认为，有些具体条件对我们影响较大。由于我已作了书面报告，而且我还有一本题为《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些材料尚未译为外文），所以我的口头报告就不多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我想作一点补充。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有过机会

主义这个政治派别，后来又有过盲动主义。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党在组织上的缺点就在于：我们过去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一种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坏的态度。我们过去是一种国民党豪绅的态度。当我们党内机会主义猖獗的时候，我们下命令不准罢工，我们下命令让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我们命令工人不许惊扰汪精卫而去和他求得妥协。而在盲动主义时期，我们又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一味要罢工，摆出一付拼命蛮干搞革命的姿态，认为每天都可以发动罢工和起义，我们到处发指示，要求发动起义和宣布罢工。我们把这种对待群众的态度叫做“衙门式”的态度。这种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使党脱离了群众。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所增长，但在组织上脱离了群众。这就是主要缺点。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份，我们的农民占百分比最大，这是事实。现在，我们有十多万党员（武汉时期我们有五万七千名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拒绝吸收农民入党。相反，我们应该注意，要尽可能扩大群众性的农民组织，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扩大工人组织并吸收工人入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份。现在，我们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一个村或一个县的地方起义取得胜利，就立即组织苏维埃，所有苏维埃的成员就立即集体入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里有这种说法：既然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意味着党的专政，意味着省委、县委和书记的专政。因此，我们盛行着一种口号，叫做“一切政权归书记”，一切政权归党。我们在多数情况下是苏维埃的形式与党等同，党和苏维埃混淆不分。我们的工会是这个情况，农会也是这个情况。如果非党农民革命分子能够真正吸收到农民组织和苏维埃中来，那就表明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具有更强的组织能力，这就是我所能指出的主要缺点。我认为这并不多余，这对其他党也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相信，其他党党内也常有过分集权的现象。党内如果有这种现象

存在，取代群众组织的倾向就会特别盛行。

但是，当然不能说我们一切都不好，不能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不能说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佩佩尔同志语）。（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组织遭到重大损失，这完全是事实。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这不容否认。就是在武汉事变以前，我们党也是采取了同孙中山主义分庭抗礼、针锋相对的态度，在发动千百万群众（农会会员有一千万人，工会会员有二百八十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不能令人信服的是，说什么我们摆脱了孙中山主义之后，又马上转面陷入托洛茨基主义。这是诽谤。如果要吸取中国革命的教训，我向大家重提一下列宁的话。列宁说：

“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它可以引导农民群众去争取民主。革命淘汰掉小资产阶级分子，使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反革命使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再企图向极端害怕群众斗争的自由派去寻找领袖和同盟者。凭借这些事件的教训，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向这个黑帮地主政府说：斯托雷平先生们，就照这个劲头干下去吧，我们将收获你们播种下的果实。”

列宁这段话是针对俄国革命说的，也可用于中国革命。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要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如果我们谈论一下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如果佩佩尔也甚至声称，我们在武汉政变以后，又陷入不断革命论而犯了错误，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是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发动广州起义的吗？其实，托洛茨基认为，广州起义是十足的冒险，是地道的盲动，虽然他又说明，

这个盲动，这个冒险，照他的说法又是“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佩佩尔同志认为，我们在广州是按照不断革命论行动的，那么，他自己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了。佩佩尔责备我们不重视反帝运动。的确，中国党在前一时期组织工作不力，而且没能充分重视发展和领导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但是，如果象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

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不能把土地革命同反帝革命对立起来。佩佩尔同志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话。斯大林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土地变革。但是，佩佩尔同志没有再往下引述。然而，斯大林同志多次说过，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和争取土地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佩佩尔同志不愿意说这一点。这和他建议在共产国际提纲中写上中国或东方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也就是说，没有封建主义的论调，如出一辙。

佩佩尔倒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效法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俄国土地国有化时说过，俄国的土地关系颇类似古代中国，就是说土地早已国有化了，何必还要再搞土地国有化？他甚至援引我国王安石（宋朝宰相，力主变法）的例子。因此，佩佩尔早就应该公开反对土地国有化，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现在，他把土地革命同反帝运动对立起来了。他接着又说，中国出现了不断革命。

这个术语的意思是什么？难道广州起义时，我们提议没收一些工厂企业，这就可以叫做不断革命吗？难道这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吗？如果佩佩尔是这种看法，那他的观点当然就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了。托洛茨基恰恰就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宣布国民党各派不受法律保护之后又搞了盲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宣布整个国民党和国民党各派不受法律保护，那么，这已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如果可以这样理解佩佩尔，那他自己就应该承认，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佩佩尔引用布哈林同志的话，说布哈林赞扬了他。但是，他不想去引用布哈林的另一段话。这段话说：

“不能说：要么实行武装起义，要么做工会工作和反对盲动主义。

“而要这样做，就要同一切否定起义口号的人以及稍稍倾向于否定起义口号的人作最坚决的斗争。”

再往下听：

“佩佩尔同志的认识错误在哪里？这些错误是：1. 他没有弄清楚（按照他的说法）农民运动的规模（确切地说，是农民斗争在反帝革命中的作用）；2. 他企图在政府的政权方面提出人为的口号作为最低纲领。”

照佩佩尔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之类，而照布哈林的说法，就是“可以解释为取消苏维埃口号”。

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他说“中国革命现在趋向于低落”，说现在中国“革命”呈现“退潮”等等，但是，他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和托洛茨基相比，佩佩尔别具一格。佩佩尔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既然中国土地革命一无成就，那么就搞‘宪政’吧，就选举农民的民主自治吧。”

这就是中国代表团委托我在这里作的声明。

我们应该把中国革命以及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在内的一般殖民地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说，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主要是推翻半封建土地关系的任务，迄今尚未完成。

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看到，当殖民地革命接近关键时刻，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

在中国农村，地主和农民正在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实行有豪绅在内的自治呢？这怎么可能呢？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我们应当尽可能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教训。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各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如果醉心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立场，醉心于所谓反帝运动，而不是去革命、去斗争，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和农民建立起应有的关系。

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工业化、非殖民化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为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它的反对派立场或叛卖性。为了这个策略结论，我们有必要作一分析。如果我们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谈起，说英国当时有过这种工业化，那么现在中国和印度也要用这种工业化方法，那就是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了。那么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根本不存在了。帝国主义

侵入殖民地有重大作用。帝国主义扩大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增强了商品周转。但是，应当知道，商业资本在殖民地的发展不可能走与欧洲相同的道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革命和战争本身是最高危机的表现。中国内战和世界大战在这方面都要起重要作用，起着上次世界大战所曾起过的作用。欧战期间，由于商业资本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印度和中国的工业有所增长。但是战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压榨中国和印度，农业危机愈演愈烈，这些国家的贫困现象有增无已。我国持续十多年的军阀战争也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即便我们在上海建立一两个新工厂，而与此同时内战频仍，几百万人死亡，商业萧条，铁路破坏，这样一种境况又有什么国家工业化可言呢？因此，中国久经战乱和革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民族化”。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经不起国家竞争，抛弃了工厂，蜕变为买办。我国同志们可以举出数不胜数的这种独特的非民族化的例子。另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去从事极其特殊的投机生意，一种政治上的高利贷。他们向一些省政府提供大笔贷款，因为搞工业得不到利润。再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转向农村，即在发生起义的地方购置土地，因而，既加强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依从关系，又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依从关系，从而加强了封建的剥削方式。比如，上海一些工厂主，把自己的工厂卖给外国人。国货在中国很有信誉，但实际上那已经不是国货了。这些工厂虽然有中国工厂的招牌，但厂子已经不是中国的了，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了外国工厂的管理人员。如果日本人、美国人买了中国丝织企业，能说这就是工业化吗？不是。美国人买了许多中国小工厂，但是这些企业没有发展。近来上海市场上出现了美国人造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的背叛乃是历史的必然。革命和内战总要（即令是暂

时地)破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于是,力量单薄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同更强大而稳定的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携起手来。提纲指出了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局限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首先必须证明,是什么经济原因(比如战后中国和印度有哪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某些革命性。

现在开始了另一时期,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化瓦解的时期,它不可避免地转向叛变的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民族革命。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占了统治地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它十分软弱,甚至在它干反革命勾当的时候,也要依靠豪绅以及一切地痞流氓的支持,而且主要的是它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指挥下才能有所举动。这一点特别重要。

现在我们有一个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据今天报载,蒋介石政府对各个军阀一筹莫展。冯玉祥拒不参加中央全会,也就是不同意妥协,那么蒋介石就只好向他妥协,向地主豪绅妥协。这种所谓资产阶级领导权,打个比方说,不过是怕老婆的丈夫而已。据此看来,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名无实。据我们的消息,中国资产阶级不久前召开了会议,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但是主要的一条要求是关于清还军阀的欠款问题。没有提任何民族方面要求,没有认真议论关税自主和统一问题,即令谈到这些问题,也是装潢门面。这就一针见血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资产阶级想以此强调指出,如果政府打算取得国外信贷,它就应该首先表明具有清还内债的能力,即能够清还国内的债务。资产阶级引证苏俄因不清偿债务而得不到信贷的先例。如果南京政府和其他政府打算取得美国的贷款,那它们就应该首先偿付各军阀欠中国银行界的巨额款项。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反对派立场的代价。

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印度的特点。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是照此办理的。当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

就想从帝国主义那里捞点油水，但是，当群众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它由于利益所系一定会转向帝国主义方面，以求得到它们的支持。即使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者，那也不会比社会民主党对欧洲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更高些。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向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们要挟：如果你们不作出让步，不减少驻军，不让我们从海关收入中得到实惠，我们就无法对付布尔什维克，我们就无法镇压起义，起义的工农就会让我们同你们一齐完蛋。

难道这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吗？它只有反革命作用。印度资产阶级甚至在反对宪政的运动中，也是这样做的。

民族改良主义的根源，在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民族改良主义还有变成民族法西斯主义的趋势。民族法西斯主义表现在，以民族的名义镇压一切最起码的阶级斗争。我们不仅应当反对民族法西斯主义，而且还要注意它的另一方面。民族改良主义一贯标榜它主张改良，主张改善中国和各殖民地的国际地位等等。它想以此来蒙蔽小资产阶级群众，利用他们为其私利服务，使他们不至于去参加革命。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有可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去进行反帝斗争，有可能引导他们采取一般游行集会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可以象蒋介石、李济琛一样同我们一道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之类口号。我们应该毫无条件地在这个运动中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然而，我们不能愚蠢到只局限于发动贫农群众和城市贫民去参加游行。我们应该由这种初级的行动起步，发动他们参加更重要的活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里。因此，如果认为我们的任务仅仅限于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那么，我们当然就能永远保持同小资产阶级的巩固联盟。但是，由于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实行联盟，特别是当农民起来参加土地改革和参加起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受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同由此产生的危险作

斗争。共产党应该是独立自主的组织，有独立的路线，它不仅有批评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且还有批评小资产阶级空想、小资产阶级政党空想的自由。这是十分具体的东西。东方国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极其强大，我们还应该注意同所谓“东方”思想，即甘地主义、孔孟学说、中庸之道、勿抗恶之类思想作斗争。这些东西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作用不小，有时甚至对工人群众产生很大影响。反对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斗争应该是我们各殖民地的头等任务。反对民族改良主义是我们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实行领导的前提。我们应该通过反对小资产阶级空想的斗争不断前进。否则，我们还会象八年前中国大革命之前那样徘徊不前。

我认为，我们应得出以下结论。1. 当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抵制它的影响，并使其无法影响群众，而当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参预政权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政权。绝不能支持这个资产阶级！2. 共产党人应有独立自主的组织，应有独自的路线，有抗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路线。“宪政”思想，同民族改良主义合作的思想，是不能允许的。3. 代表大会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我们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恐怖，而且也没有必要。应加强当前的工作，研究每个国家的问题，研究太平洋地区的问题，研究如何帮助各年轻的党的问题，研究如何协调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行动问题和如何协调我们的工作，以便使欧洲的无产阶级在支持殖民地反帝起义的同时，也进行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者的斗争，进行反对民族法西斯资产阶级的斗争。

应当肯定地说，西方的革命工人是反对国民党的，中国工人和农民愿意听到这一点。但现在对此感受并不深。难道国民党的恐怖亚于法西斯的恐怖、亚于林奇审讯黑人、亚于对萨柯和樊塞

蒂的迫害？必须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法西斯的本质。

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

当然，我们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民族解放事业，我们走向了另一极端，否定民族斗争，即否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是的。恰恰现在就应该宣布，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一般劳动群众才是殖民地民族革命思想的代表者。因此，我们将支持旨在反对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运动和起义，支持旨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之流的运动和起义。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才是唯一正确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就在于：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

“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那些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部分小资产阶级带着其全部偏见面爆发的革命，没有不觉悟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专制、民族等等的压迫，社会革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想法，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腐儒的可笑观点，才会把爱尔兰起义斥之为‘盲动’。希冀‘纯’社会革命的人，是永远等不到这场革命的。那样的口头革命派是不理解现实的革命的。”

我认为，马克思在很久以前抱有这样的理想，他曾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能够发生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若是果真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如果这曾是马

克思的理想，那么我要说，现在这个理想已变成现实了。现在我们在中国、叙利亚、摩洛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印度以及在一切东方国家看到的，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现在有这种战争，将来还会有这种战争。而当出现这个“再版”时，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叶公好龙。这就是马克思对待农民战争的态度。我认为，他的话指出了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对待一般殖民地起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表明它对广州起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请允许我引用下述的评语结束我的发言。

“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让以坚定不移的和久经考验的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有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有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参加的未来的起义，成为战无不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吧。

“独立的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被压迫各民族的战无不胜的起义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掌声）

勒梅列（主席）：现在佩佩尔同志发表声明。

佩佩尔：洛米纳兹同志对我发出了离奇的责难。他声称，我历来没有胆量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辩论。为回答这种奇怪的责难，我要作如下申述：

第一，这违背事实。我曾经有幸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而且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列宁一边）这样的领导同志辩论过。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我曾就进攻的理论问题，为德国三月起义的错误进行辩护的问题以及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问题，同他们有过激烈争论。我认为，当时我的争辩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绝不会因为同列宁有过争论，也就是说同实实在在的“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有过争论而感到自豪。在共产国际内，我和洛米纳兹同志对于“勇气”的看法有分歧。

第二，从何时起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的斗争成为判定一个共产党员的作风正派和有革命精神的标准？就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凡是同社会民主派、同机会主义以及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同志，我们就认为是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对我来说，用下述标准来判定是否是革命者的做法，是新鲜而又独特的。这个标准是：“他敢不敢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作斗争？”这就是我和洛米纳兹同志对于共产国际领导的评价上的第二个分歧。如果象洛米纳兹同志这样独出心裁地看待一些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相互关系，那就不知道可能要闹出什么偏差了。

现在顺便提另一个意见，我想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再强调指出，不是我，而是洛米纳兹同志在这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挑起了关于评价广州起义的论战。在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时，他第一次发言就发了难。不是我，而是他绘声绘色地在这里提出了广州问题，而且开始重复他那过时的、陈腐的观点。不是我，而是他居心叵测地在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中提出“盲动”问题。至于我谈到广州起义问题、谈到洛米纳兹同志的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观点，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他和他的同伙竭尽全力来歪曲和败坏第九次全会的决议，才产生了这种情况。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一次最重要的军事行动，这完全正确。但是，与此同时，第九次全会也批评了领导在起义中所犯的错误。第九次全会着重批评了以下几点：

1. 工人未经充分准备仓促起义；
2. 对农民的工作准备不足；
3. 对敌军的工作准备不足；
4. 对待黄色工会会员的工作方法有错误；
5. 在党和共青团的内部对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充分；
6. 党的中央委员会对起义一无所知；

7. 对群众的政治动员工作不力；
8. 没有进行广泛的政治罢工；
9. 没有建立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
10. 起义领导要对其错误向共产国际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可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提纲中关于广州起义至少有十条中肯的批评意见。然而，硬把这些批评性意见曲解成认为广州起义是盲动，未免荒唐可笑。大会通过的关于世界形势的提纲，肯定了第九次全会决议对广州起义的正确评价。提纲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是一次后卫战，而不是盲动。同时，提纲还坚决指出，起义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原来的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理应受到批评。提纲指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又陷入另一极端。（喊声：“这简直是辩论，这不是声明！”）同志们，我只是在引述第六次代表大会提纲的内容。希望不至于有人会在这里反对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提纲说，新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充分抵制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情绪。（有人插话：“这不是声明！”）

不，这是声明。我提出声明是因为有几个发言人企图在这里抹杀事实，企图根本歪曲第九次全会和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最后，我想再指出一点，斯特拉霍夫同志采取了一种错误做法，他把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性斗争同领导的错误混为一谈，这是完全错误的。其次，闭口不谈领导在广州起义中所犯的错误，反而抹杀广州起义的巨大历史意义，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要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为鉴戒，而且要以领导的错误为鉴戒，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新的、战无不胜的起义中吸取这些教训。

（同上，第492—503页）

第四十次会议（8月21日）

中国代表团的声明

彼得拉舍夫斯基（化名、中国）：我受权发表中国代表团的声明。

1. 佩佩尔同志的最后声明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似乎不重视广州起义期间的领导错误。这不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中央最近的一项政治决议、斯特拉霍夫同志的报告以及另一位中国同志——领导起义的唯一幸存者，都严肃分析并公开承认了这些错误，这是事实。领导广州起义的同志们所犯的错误已在实践中完全纠正了，这也是事实。

2. 佩佩尔同志又老调重弹，说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佩佩尔同志的观点。这纯粹是假话。当时，他提出的是农村自治的口号，而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他提出的是共产党合法化的口号，而不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现在，中国有几位领导同志提出恢复民众运动，召集真正的立宪会议，这就有点佩佩尔的气味。这里在客观上有一种合法主义倾向，因为这个观点虽然是无意识地提出来的，但是同托洛茨基的意见不谋而合，即按照自上而下的路线搞革命。这些“合法主义者，虽然也空谈广州公社社员的英勇精神，但是一如既往，评价不高。

3. 佩佩尔同志说，不仅需要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精神，而且需要认真地调查党所犯的错误。他还顺便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孙中山主义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托洛茨基主义时期。但是，千百万工农群众在所谓的第一时期组织起来了，这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吗？难道共产党不是一支组织力量吗？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份文件肯定过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佩佩尔同志以托洛茨基全部论点为依据，把广州起义描写成盲动，只不过没有公开讲出“盲动”这个词罢了。

(同上, 第 529 页)

附录: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代表国家	有表决权的代表	有发言权的代表
.....
26. 青年共产国际	
27. 中 国	28. 刘瓦卓 (音) 29. 方天林 (音) 1. 陈 宽 (音) 2. 杨 清 (音) 3. 苏兆征 4. 张 彪 5. 王 申 (音) 6. 张 成 (音) 7. 许 英 (音) 8. 王 昌 (音) 9. 尹 深 (音) 10. 王 琪 (音) 11. 张 春 (音) 12. 李 深 (音) 13. 陶 志 (音) 14. 邵 全 (音) 15. 屠大奎 (音) 16. 廖 梅 (音) 17. 余 飞 (音) 18. 斯特拉霍夫 19. 少先队员 20. 毛涛庆 (音)	1. 唐 清 (音) 2. 于 生 (音) 3. 柴大奇 (音) 4. 王 富 (音) 5. 涅姆采夫 6. 郝 (音) 7. 秦 (音) 8. 梁一采 (音) 9. 王 (音) 10. 邓叶超 (音) 11. 沃罗夫斯基

(同上, 第 153—154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共产国际的纲领

——1928年8月9日在第六次世界大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报告（节录）

布哈林

.....

（四）世界革命的多样进程

一、苏联的经验

在草案中，我们非常注重世界革命进程的多样性质的问题，同时我们想显出证明这一点的辩论。我们的论据是说世界经济的相对统一，是革命之世界性的原因，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是世界革命进程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根据这个论据，我们描写各种不同形的国家。在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加重苏俄的任务，他方面加重殖民地的任务。现草案与前草案不同，就是新草案有特别的一章讲到苏俄，而且更加注重殖民地问题。从纲领结构的观点看来，就只这两点已经创出我们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间之鸿沟；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绝不提起苏俄；就以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面论，他们所取的态度，也与帝国主义者所取的态度，真难看出分别来。有几位同志以为在纲领中特辟一章来讲到苏联，这未免浪费笔墨，形成这纲领草案的太特殊的俄国性。许多俄国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我却不赞成这个观点。我以为我们必须单独的讲到苏联。单独的讲到苏俄这是

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把苏联从世界现象，世界发展的一般接触上给隔离出来。

刚好相反，我们从世界经济全部的相互关系的观点，从国际劳动运动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说：“单独的”讨论苏俄，我们是说在纲领草案中，给了这个题目一个显著的地位。这是绝对正确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局势之中。现在的局势并不能认为是狭义的“结合”两个字。譬如战争危机的问题并不与经济情状有什么关系，它并不与某某国的商业兴衰的问题一样。战争危险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恐慌的发展上，占有最显著的地位，我在别一报告上说过，这个问题是最近将来的事件发展之枢纽。他方面我们党所堆蓄的建设工作的相当经验，必为他国的党所应用。有人说过：我们的经验有国际的意义；在“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一章中，可以详细的论到。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就详细的，又很谨慎的，讨论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等问题。

但是有许多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经验，我们不能够无条件的，直接就应用到别国去。把我们的经验，全部的以综合的结晶的形式（自然不是直接把这经验应用到别国去），交给全世界革命的劳动阶级，这是绝对必需的。

目前一般局势下苏联任务问题，苏联对别国无产阶级及殖民地的义务问题，以至别国无产阶级对苏联的义务问题，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这是绝对必需的。当这问题首先需要最大限度的清楚讲出来时，我们是不能隐晦它，而且不应以外交的态度去讨论它的。

这些考虑都使我们不得不为苏联问题，特设专章。

二、殖民地的任务

殖民地问题在本草案上加以非常强度的注重，较之前草案有

过之无不及，这也是必需的。在草案中我们叙述殖民地运动的任务，不只从世界革命进程的观点，同时是从我们将来建设工作的观点上叙述。草案中含有几处一般原理，如殖民地与产业国家比较起来，则殖民地为世界农村，产业国家为世界城市。我们从将来的观点，考察世界经济的一般情形，我们得到什么结果？我们有强大的产业国家，从阶级的观点上看来，它们代表产业阶级的中心。我们可以说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是最大的城市，而殖民地范围或殖民地就代表庞大的农村，产业中心的乡村范围。在纲领委员会中，德夫莱士（Defriozze）同志就提到了各部分无产阶级中间所存在的恐惧：譬如英国无产者，就会不放心革命进程宽广的发展于英国殖民地或英国自身的时候，英国无产阶级就得不到殖民地之助来养活自己，除非粮食还是要由殖民地进口。所有这些恐惧与问题，只要把产业国家与殖民地间的将来关系问题，弄得清清楚楚的，就没有事了。从经济的观点上，我们与殖民地人民的亲爱关系，是必须由维持强大产业中心与庞大农村的经济关系来决定。从阶级的观点上，这又成为维持世界无产阶级与世界殖民地农民（假如可以如此说）间之关系问题。

于是一切的特殊问题，——列宁主义问题，我们辩论很久的问题，现在具有着世界范围摆在我们的面前。假如我们很“大胆”的讲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的行动计划，那末，一方面产业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农民；这两方面的经济关系问题从经济的及阶级的两种观点看来，自然就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纲领中，我们必定提到非资本主义底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就是殖民地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这是在第二次大会时列宁所提出的问题。我想在这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讨论两个问题。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已经长足发展的殖民地，在这类国家中，我们就讲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然而这类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发

展得不充分，若没有外来的赞助，无产阶级更不能够指导社会继续的沿着社会主义的路线发展。我们不能单单因为我们同社洛斯基主义辩论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就推论说，每一国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假如有人这样说，那就是把我们的观点，蠢笨的解释了。每个国都只用他自己的原料来建设社会主义，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相当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产业集中等，是必需的条件。没有这些前提，要梦想在这国建设社会主义，完全是无用的。譬如中国革命，我们就说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必然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但这是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能够不需助力的，单独的，建设社会主义了呢？我想不是的。中国的局势与俄国的局势有些不同的。中国的经济组织是不同的。那是说，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看来，我们必须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连接起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劳动阶级能够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但是还不能够孤立无援的就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这里我们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某国的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上的援助问题。这是指经济落后的国家而言，虽然那里资本主义是存在的，无产阶级是有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却是不充分的。

三、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可是，在资本主义才到胚胎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前期的形式依然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深入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国家中，那就有不同的问题了。在这类国家中，“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以这类国家而论，外来的助力的问题是什么意义呢？这不是说，一个劳动阶级，援助已经达到相当发展阶段的另一劳动阶级。这是产业中心的劳动阶级与农民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产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劳动者的关系，作为讨论的一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着的国

家，与领导农民的中国无产阶级有相当的关系。这里我们和负有独立领导任务的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的形式。但是在无产阶级不代表重要部分人口，或无产阶级简直尚不存在的国家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产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那些国家就没有联系的形式，所以那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就又不同。中国的情形是这样的：从中国内部的观点看来，我们说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发展成为社会革命。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说法应用到游牧民族，或纯粹的农业国家上。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来，关于这样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讨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发展或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这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不同了。

为什么呢？从这样国家国内的观点看来，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的转变，因为国内没有无产阶级，内部的先决条件是缺乏的。这些国家中没有人能够把历史的方向转过。但是我们说这个革命发展成社会革命仍是可能的，但这仅仅是传统的说法，真实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说，在最后的分析中，别国的产业中心，就会把农民引入革命势力的轨道之中。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苏联是很大的农业国家，但是也有产业城市。在农村苏维埃中，这自然没有工人。假如农村苏维埃从城市苏维埃隔离开，则苏联所有仅是苏维埃农民民主政治。可是农村苏维埃与城市苏维埃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苏维埃国家的一般组织中，附属的单位（农民苏维埃——译者）是占次要的部分，而城市工人苏维埃取得领导权，更高的权力是又在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有最后决定权；苏维埃制度的结构，是这样筑成的。因为有这种的素质，农民单位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成部分。只有由这样的关系，我们才能使农民来参加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应用到全世界。我们可以把上述的国家与世界产业城市，或产业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殖民地农村，作一

个相类似的譬喻。革命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条件下，我们要把这些区域联合成一统一的联邦，或者是其他的联合形式；纯粹的农业区域，如过去的殖民地之类，他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任务，就与现在苏联的农村苏维埃在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中的任务，恰恰相同的。这些农业区域，既然卷入一般的发展进程中，向社会革命发展的进程就发生了，这不是因为在农业区域中有无产阶级的活动组织，而是因为与别国的无产阶级把农业区域引进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创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你可以讲这是“未来的音乐”罢，因为现在没有这个形势呢，但是我们必须想到未来。

四、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

我可以试论世界无产阶级胜利之发展进程，而且说明列宁所论及的主题，即共产国际要证明之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亦即所谓“非文明”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非文明”民族的名词并不是我们的名词。我们的任务，是在发展殖民地的落后人民，及引致他们来参加这个总运动。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比以前更清楚的观念。假如在纲领中，我们讲到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讨论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关系，换言之，即讨论世界无产阶级与世界农民的关系。我不在农民这一点上特别讨论这些分化的情形，并不是我看轻了这个题目，其实它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在决议案中，我们常常讨论到，而且在草案中也是讨论的。但是我刚才说明的这论题，直到现在才宽泛的加以讨论，所以我们在纲领草案中要更特别的讲到。

分析殖民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个论题，与我们现在更尖锐的提出殖民地问题这件事实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这种事实，又与列宁所说的有密切关系。列宁说：无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的长期间的世界斗争的胜利结果，是为吸引殖民地无数人民加入此

斗争的过程所决定。这样巨大的群众力量，无产阶级以及部分农民的巨大预备军，从世界的观点看来，是决定的力量。假如我们说无产阶级领导世界革命，则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是解决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世界农民的问题。所以殖民地问题是很尖锐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世界革命进程中，世界无产阶级的暴动与殖民地国家的土地革命的总和，成为最重要的动力，而且是我们胜利的保障。

（摘自《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

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
对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节录）

布哈林

.....

（二）资本底稳定与对于第三阶段底争执

——第五次大会与稳定的问题

同志们,我先讲我们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和我们主要的争执问题——第三阶段问题。你们知道,在第五次大会上还没有用到“稳定”这个名词。第五次大会对于经济的和政治的一般情形是如何估计的呢?第五次大会之关于世界经济的提纲曾肯定了世界经济底崩坏;在提纲中直接说到世界经济之崩溃,金融之紊乱以及欧洲经济之危机。我们在当时的经济提纲中曾说到欧洲的经济是在无出路的循环中进行着,而它不会由这个危机底状态中逃避出来。那时我们亦提到世界农业危机之发生以及资产阶级毫无能力消灭金融的紊乱等等。

在季诺维也夫同志(Sinowjew)的报告之后,第五次大会曾通过一个策略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中之整个政治分析底实质是什么?所谓的“德模克拉西和平主义的时代”之存在是这个议决案底主要的原素。

那么,估计当时情势的结果我们肯定了世界经济之崩坏,欧

洲经济之不间断的危机，以及当时政治的上层建筑——“德模克拉西和平主义时代”底成立。“德模克拉西和平主义时代”的表现，英国的“工人政府”，法国“左派联合”之胜利，丹麦的“工人政府”以及其他各国之种种不同的混合政府之趋向。这是一般的情形以及第五次大会的判断。这里无一个字说到稳定。这个名词“稳定”一九二五年才开始来到我们范围内。

在第五次大会上——我再重说一遍，以注意及整个情势中之显著的转变——还无谈到稳定。说出这事实有何意义？应该把他提出，以明显的显露出自第五次大会从客观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底意义。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我们提纲底第一部分提出了第三阶级底题目。我们在联共代表团中亦曾对于三个阶段的题目辩论过，并把他更具体化了一些。自然这三个阶段底分析并不是经过联共代表团通过之后便成为不可再辩驳底证据了。我们需要在更具体的方式内再来分析他。

为什么否认第三阶段之成立便是错了呢？

在提纲内说到：

自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工人运动曾经历过种种的历史的变化，这种变化正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一般危机底种种现象。

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行动底阶段，他的最高点是一九二一年，这个阶段的结束，在一方面苏联战胜了内部的反革命以及外来之武装进攻底力量，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立了共产国际，他方面是西欧无产阶级受了重大的打击。这个阶段底终期是德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三年之失败。而这个失败正造成了第二阶段底出发点。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制度渐次的有了部分的稳定，“恢复了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之一般的进攻以及在屡次失败中的减弱了的无产阶级之防御斗争；他方面苏联内部经济之迅速的恢复，

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了伟大的成绩。最后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苏联经济差不多同时超过了战前底水平线（所谓苏联的“改组时期”，Rekonstruktionspeyiode 之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在改新的技术基础上继续增长）。第三阶段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是技术之迅速增进的时期，加特尔和托拉斯（Kaitelle, Trust,）继续的发展，而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同时又是世界经济底矛盾之强烈发展的时期，此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危机所决定的（市场之窄小，苏联，殖民地运动，资本主义之内部的矛盾）。

生产力之增长与市场之缩小，这个冲突在第三阶段中特别的尖利，因之不可免的要发生新的变化，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伟大的阶级斗争。一切国际的冲突愈发的尖利（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间的冲突，军事的占领中国北部是瓜分中国，以及帝国主义者间斗争底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内部冲突愈形强烈（工人群众之急进化以及阶级斗争之尖利化），殖民地中的运动亦愈发的扩大（中国，印度，埃及），这个阶段必不可免的要加紧资本主义稳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继续发展必要使资本主义的稳定动摇，要使资本主义之一般的危机更特别尖利化。

反对分列这三个阶段的人说，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简直的无有分别，因之分出第二与第三阶段来，是不对的，多余的。

我们假定他们没有分别，但是世界经济之超过战前水平线的事实，应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底事实。为什么？让我把他很通俗的再讲一下。这件事底意义是，表露了世界生产力发展底动力。在未超过战前水平线的时候，可以说这国或那国中之生产力底增长，完全是偶然的性质，这种增长不是准则的，对于这个时期是没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世界经济，或这个世界经济之资本主义的势力已超过了战前底水平线了，已开始在一个新的

基础上发展了，于是就应该有一个很细心的判断，对于我们昔日的判断，应有实质的更改。我们并不是这样的近视，不能不看见这种事实的实质，不能简单的把他放过去。

因此，客观上在我们前面摆着这样的差别，技术上以及经济上是这样决定的，我们绝不能沉默与否认。

有人说第二与第三两个阶段无有分别，但是就发生了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于一般情形的估计变更了呢？这并不是我们特别的聪慧，而是因为局势变更了。这个进程的开始时已含有稳定之萌芽的现象，我们有很慎重的理由可以将他或多或少的认为偶然。现今我们无有这种理由了。这幅图画是已经很清楚了，现今事实已说出很明显的话，因此亦决定了对于现今情势有另一种的估计。

很多同志们否认第二与第三阶段间的区别，但他们同时又说到国际的冲突已经显著的尖利化。

但是这个“冲突之尖利化”从那里来的呢？它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这两个观点是不相容的。在局势中并无有若何区别——而同时又承认冲突底尖利化，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尖利化建筑在那里呢？有人说，在局势中毫无若何分别，但是在中国进行着新的战争。是否可以说这完全是些小事呢？不对的，这完全轻视了战争底危险和正在进行着的战争。“在局势中没有什么区别”——但反苏联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准备着。这是什么，——也是一件小意思？我们相信这是现在整个世界政治局势中之主要的要素。若是我们这样的瞎眼看不见这些“小意思”时，那么我们便无一点价值，也绝没有能力说什么领导。欧洲底经济还在地下呢，或者已飞快前进了，在中国已是否演出了一个战争，帝国主义者是否已准备着攻袭苏联，……若是以为这个局势中完全与先前相同而无任何区别时，那么这是什么领导者啊！若是我们没有能力看出这些新的事实，我们便成为事情做完了的人。如此我们新的策略路线（在英法）亦是不可不了解的。若是我们认为只是旧的局势，

那么新的策略路线便是多余的。

我在此处已举出了反对第三阶段之主要的理由。但是还有其他的论调，差不多是以下的形式：第三阶段还没有出现，但我们不妨先说说它。我想也把这个“论调”严正的分析一下。

首先我须回答波兰代表团的女同志科斯特鲁蔡娃（Gevassin Kostroyewa，以下简称科同志，译者，）科同志说：

“对于战后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间之区分的特殊性，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战后发展之整个恢复时期的前提。什么对于第三阶段是特殊的呢？有一件事实是最主要的就是在稳定过程之发展的基础与生产物强大发展的联系上所积聚的矛盾，这些矛盾渐次的向外伸张，于是动摇了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

简直的我不懂得这种言语形式底逻辑。不是技术的发展，而却是“矛盾”！这些矛盾从哪里来呢？科同志说到“与生产力之强大发展”相联系的矛盾。我问你，科同志，生产力之强大的发展若无有技术的进步是可能的么？我一直到现在，很多别的同志亦是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认为生产力是工具，劳动和劳动力底总计。所以不能把“生产力之增长”与“技术之进步”分开讲。这是错误的，理论上毫无根据。提出现今时期中之生产力底强大发展，而却否认这个时期中的技术之伟大进步；承认了与生产力之变化相联系的矛盾之异常的尖利化，而同时却否认这生产力之变化；这在逻辑学的观点上真有些特别。

对于这个问题之第二个辩驳者是中国同志斯特拉霍夫（Straohow 假名，以下简称司同志，译者。）他说，我们不懂得这个问题，因之我们相信，这第三个阶段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赞成，在提纲中提到他。

谦逊是一个“美德”，有的共产党员亦需要他，这个我可以完全同意。但是，同志们，我不能承认，这里一切都有了根据。当司同志说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无有分别的时候，旁听席中有人嚷

着说：“很对”。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这个插语，总之他欲证明他的特殊的逻辑的能力。若是生产力之发展与技术之发展间有密切的相互的关系存在时，那么很显而易见的在逻辑与发言间不常有一个这样的相互的关系存在着。

司同志在他的讲演的末尾说，在提纲中应该把第三阶段叙述出来。但是第三与第二阶段若无有区别时，亲爱的司同志，为什么要费这个心力去叙述他呢？难道我们的纸无处用吗？这也不是逻辑的高峰，若是说：第三阶段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提纲中应该提到他。有时在提纲中说到实际上无有存在的事物，这个我承认。但是若以为这样的提纲是策略上的根据——我们无一个人相信。若是第三阶段果然不成立时，那么最好在提纲中不说到他。若是你提议把他仍搁置在提纲中，如此是表示出，你不是纯粹出于本心，而只或感觉着，这个不幸的第三阶段可以会“有益的”。它毫无怀疑的是“有益的”，它将帮助他规定出正确的策略。

列出第三阶段来有什么意思？这个“整个的哲学”底意义到底在哪里？它的意义是：我们由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稳定并不是今天或明天就会在世界经济中消失的，这个应该加力的说出来。正是由此出发我们的代表团才说出第三阶段来。

.....

（六）几个策略的和党内部的问题

策略的转变与右倾的危险

现在对于几个党内的问题说几句话。同志们。很明显的，极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托洛斯基的反对派失败之后主要的危险毫无疑问的是右倾的危险。从现在时机内之任务的观点上以及未来的观察上这个危险是很大。

在这里常常从现今局势的观点中说到这个危险，如关于德国党之工会工作，捷克的党之红色日，法国党内有反对我们“新策

略”的反对派等等。右倾的危险是一个事实，不只在现今局势之观点上，即在未来局势之观点上亦是一个危险的事实。我们不应不注意它。

拿捷克的党的问题来说。党要动员群众；但是证明它无能力来作。这是未来的事件之一个不好的试验。已经诊断了内部的病症，这个病是很严重的。我们应用冷清的头脑计算一下。我并不特别的赞成对于右倾或左倾狂吼。我的意见是，共产国际在去年作了一个大的——大的而不是小的——转变，第一关于英国的和法国的党。洛米那则同志说只有一个小的左的转变，特别是在英国的党中。谁熟悉英国党的内部生活，他便会了解，我们已折断了一切在英国工运中所有的遗传，这些遗传都是对于我们的党亦有很大的影响的。（听众：在法国亦是如此。）是的，在法国亦是如此，但是我不能同时叙说两个国家。在英国工人阶级中之最强大的遗传是“统一组织工人。”这个“统一”是改良主义者手中之强大的将牌，它们在此口号之下来欺骗群众。以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党”这个“统一”是把无产阶级从改良主义者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最大障碍，改良主义者已公开的实行分裂政策，他们一方面藏在警察背后，他方面藏在统一的吼声的背后。这种遗传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已这样的深切，就是有的我们最好的同志亦认为反对包尔温政府面同时又反对工党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最大的危险为包尔温政府，只有经过整个工人阶级之联合战线才可以打倒他。但是整个的工人阶级又在工党掌握中，我们只有与工党共同进行以及由他的帮助才可推翻这个政府。

这是最初的观点。由此产生了党大会中所通过的口号“工人政府，在工党执行委员会监督之下。”后来英国同志在国际执委的影响之下，作了一个大的转变。若是已经达到一个这样的转变，如何还看不出他对于党的整个生活有何意义。我们无有经过多余的吼声和同志们的烙痕面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经过了长久的真正的

共同的讨论而实行了他。虽然有些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争执，但这个策略已很稳固了。这个策略的变更是英国工运史上之伟大的事件。

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党内亦有深厚的议会主义的遗传。前几个月譬如在“忠实于国家”之问题（关于拘捕问题）中，这个议会主义的遗传不是明显的表露出来吗？这是偶然的吗？这是一个浮面的现象吗？不，这个趋向在党的干部中已很深了。两个月以后，我们有一个大的路线的变换，提出“阶级反对阶级”和“不投社会党的票”等口号。同志们，这不是小的，而是在法国党的策略上一个显著的转变。这里也无有经过多余的吼声而实行了这个转变，得了党员群众的拥护，对于怀疑者充分的解释和对于反抗者积极的奋斗。实行这个转变时并不是无有争论，无有内部的冲突和困难，但是法国党所采取的转变是一个原则上的转变。他是法国党自成立以来党史上原则上的转变。我自然不愿说英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已实行了一件“英勇事业”。若是我们完全客观的观察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承认他是两大党之策略上显著的转变吗？我相信，这是应该承认的。那么这个转变对于右倾的危险不是一个大的打击吗？自然是。这个转变不是一块试验纸，用他可以认清一切隐密着的右倾危险吗？他毫无疑问是的。由此解释了右倾的反对派，由此亦解释了对于这个策略之正确性的种种怀疑。这个对于反对此策略的一个解释。在英国党和法国党内反对右倾的最好的方法，便是坚决的应用这所谓的“新的策略”。

我已经说过，右派的危险在将来还可增长。为什么？我刚才所举出来的列宁的论文中之现象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刊物的一部分是不能适应局势。这不是绝对的不可能。这个错误的观点将要走多远呢？不只是我们的刊物，有的党的组织亦会如此。在现今有直接战争危机的时期中我们应该决定策略之种种变更，但是有什么样的保证，可以使我们党不至有相当的徘徊？我们的策

略,我们对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立场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需要有种种的变更。但是使我们的党不至于分裂的事实和现象的保证在那里?这样的分裂,八成是有可能。第一他将从各党内的极右派中出发。若是我们要分析现今的局势和我们的期望,则我们应在党内的路线上抽出结论来,我们应该在整个的战线上,在整个的路线上向右派进攻。

党内的问题

我们绝不能容忍隐藏着右倾危险的破坏纪律的事件。我们应该坚决的与他奋斗。同时我应该说:在党内反对右倾之坚决斗争的问题以及刻苦的战争并不是取消了党的统一的问题以及此斗争中之机巧的领导问题。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右倾的危险。我们在提纲中要求他们坚决的与此右倾危险奋斗。我们要求他们消除对于右派危险之调解的论调。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在每个方式之下和用一切的方法,把一切站在爱森党大会议决案和共产国际决议案之基础上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共同的与右倾危险宣战。(听众:已如此作了。)联共代表团委托我——关于德国党的事——声明,我们反对把爱维尔同志(Ewert)从领导机关中排挤出去。我应该说,德国同志们还无有若是的意见。但是我们在大会上应该造出使内部指导机关不至分裂的前提。一切同志们应该站在严重的纪律和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事。若无有这样的前提,则不能领导政治的斗争。继续的分裂,指导机关以及党内的分裂,将会有不幸的结果。所以我相信,纪律是对于有效的工作之主要的前提。我们已经特别明显的看出这个问题在波兰是怎样的严重的问题。巩固统一和纪律,在革命事件之胜利的发展中是绝对的需要。最近我们在共产国际内有种种危险的情形。这些危险的情形,如其他党所经过的一样,对于工人群众有一个坏的印象。只有在一个一定的坚决去实行共同一个的政治路线上方能消除这个危险。这

个对于继续的发展是主要的前提。德国党内的少数希望更换指导机关，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这样作：这样会引起了德国党内的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拥护德国党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尔曼为领袖的中央政治局。我的意见是，这样的问题，如党内部的民主问题，新的党的干部问题，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线，活跃下级支部以及群众工作种种问题，应列为党的主要问题。党应该尽量的学习正确的政治生活，削除一切无原则的分子。拿波兰的党来说，虽然党内无有大的政治的意见分歧，然而党内已经发生了派别斗争。拿现今的美国党来说，最近——至少我们大家都这样的感觉——美国的党已开始削除内部的倾轧不和，但是那里又从新起了斗争。这个斗争已这样的“活跃”，有人竟想利用现今的情况以把此斗争引向最尖锐的形式去。在那里有一种显著的政治的意见分歧吗？我以为美国的党内之意见分歧并不显著。这种意见分歧可以形成派别吗？我以为不是如此。拿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估计来说。一部分人说，美帝国主义已很显著的强大，而其他反对此意见者说，这样主张的人是与美帝国主义作广告。这样不应该说。如是不会得到好处，而亦不会解释这个问题。我应该说，在近的将来的美国将有一个革命的局势。我公开的这样说出来。世界上无有一国的资本主义比美国的强大，他已达到最高点。若是同志中一个人说，一个直接革命的局势是不大十分可能的，这又有什么特别不好？但是若是说，在美国工人群众中简直的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这就真不好了。如我所知，无人这样的说过。失业是一个事实，美国工业中之变迁亦是事实，但是美国之不熟练工人中的酝酿更是事实。那里有使共产党发展的基础吗？有的。因此便可以发生一个激烈的派别斗争吗？自然不能。应该用一切方法预防这个斗争。

我认为最困难的是捷克斯拉夫的党的问题。我们或者还无有整个的材料以正确的分析那里的情势，而规定适当的方法；但是

红色日的历史，的确是有病象的。不但在捷克斯拉夫党的指导机关内，即在党员中在整个的党中，亦有不好的状况。从政治路线的观点上，从党对于社会民主党遗毒之主要态度的观点上，他是有不好的状况。在大会上或大会以后很迫切的需要特别把捷克斯拉夫的问题讨论一下，不只对于指导机关，应该对于整个的党定出适当的方法来。最近我们在捷克斯拉夫党内可以看出种种的错误。譬如在工厂委员会法则的草案中，在选举总统中投玛萨理克(Massaryk)的票，以及在其他问题中，都表现出错误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党的消极政策所致。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已经不只是消极了。因之我们应该特别根本的分析，定出好的方法以使党健壮起来。

现在的时机中我们应用一切的方法，坚强我们的行伍，因之我以为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很主要的任务之前，就是党的理论上的教育的任务。我们以前没有充分刻苦的对于我们的党实行理论上的教育，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力提高党内思想上的水平线。思想上的斗争和理论上的讨论，是我们党的任务之一。这完全适于我们整个发展的一般的路线。因为，若是我们应该准备战争时，就须在我们自己的工人中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中间，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但是我们只有很少的宣传和煽动和出版物。我们不能只用吼声来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走入我们影响之下。所以在战争愈来愈近的时期中，我们应该把党的内部生活，敏捷的坚强起来，提高普通党员的积极性，造出增进思想和提拔新干部的前提。列宁同志说：若是你们大家不特别的和顺，把“聪明”的人们驱出去而只留下顺从的“混蛋”，则你们一定会使党破产。我认为，列宁同志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在党的机关中需要强大的能手。一只手，他绝无能力把每个“工贼”都从我们运动中赶出去。同时我们在党的指导机关中却需要帮助这些“已唤醒的”党员，把他们领到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之正确的路线上来。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3期)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节录）

（1928年8月29日）

五、殖民地国家和中国革命

25.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目前明显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义和革命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运动（墨西哥、尼加拉瓜），南美的反美运动，叙利亚和摩洛哥的殖民地起义，埃及和朝鲜的经常骚动，印度尼西亚的起义，印度革命危机的增长，最后，中国的大革命——所有这些事件和事实都说明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反帝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26. 在这些事实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的大革命。它的浪潮所波及的群众，直接的有几千万，间接的有几万万；人数如此众多的群众第一次轰轰烈烈地参加了反帝斗争。中国同印度支那、印度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大大地提高了中国革命的意义。最后，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民主性质，它之必然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这一切都必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27.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同时按其现阶段的客观内容，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必然要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随着广大工农群众之被发动起来，随着土地革命之真正开展（在这场革命中贫民打倒了地主、土豪、劣绅），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通过一

系列的政变终于倒向反革命营垒，同封建主结成联盟，同帝国主义强盗实行妥协。

因此，要反对帝国主义，就非开展土地革命不可，非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可，非反对地主（土豪劣绅）和军阀不可，非反对军阀混战不可（这种混战使人民群众惨遭浩劫，使帝国主义者的阵地得到加强）。中国只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并免除农民空前沉重的捐税负担，才能得到解放。不取得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胜利，不没收土地，不对外国企业、银行、运输机构等等实行国有化，中国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这些任务只有通过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胜利起义才能解决。

中国革命的现状，具有下列特点：尽管帝国主义者、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内部矛盾，但它们已经结成联盟，并使无产阶级和农民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干部；工人运动还没有从失败中完全恢复元气；在一系列地区农民运动正在继续发展；农民起义取得胜利的地方，建立了农民政权机关，局部地区建立了农民苏维埃，共产党巩固起来了，它的内部团结加强了，它在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增强了。总之，鉴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的发展不一致，必须肯定，当前时期是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时期。

28. 在印度开始了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它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独立展开进攻（孟买的纺织工人罢工，加尔各答的铁路工人罢工，五一游行，等等）。这个新高潮在国内现实状况中有它深刻的根源。战时和战后很快发展的工业化速度，现在已缓慢下来。英帝国主义的政策阻碍印度工业的发展，并使得农民丧失土地、一贫如洗。由于企图通过一次敷衍了草的土地改革，来建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大农阶层，作为英国政府和本地封建主义的支柱，于是

广大农民群众更加贫困了，他们所受的剥削更加沉重了。对工人不仅实行残酷的剥削（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半奴隶制的形式），而且竭力提高劳动强度。虽然工会组织还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中，但无产阶级在反对这种野蛮剥削的斗争中，正在摆脱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影响。农民运动在1922年由于甘地的叛卖行径而瓦解，并遭到封建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现在它只是慢步地走向必然到来的新高潮。自由派民族资产阶级（印度自治党的领导集团）由于英帝国主义不肯让步而不得不重新变成一个相当奉公守法的反对派，虽然它进行了一些反英活动，但实质上却是牺牲劳动群众来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发展过程，也推动城乡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破产的赤贫农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才能击溃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妥协派资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开展土地革命，突破帝国主义在印度的阵线。把零星的共产主义者和各个共产主义小组联合成强大的共产党，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到工会中来，并在工会中不断进行斗争以彻底揭露工会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并把他们从一切工会组织中驱逐出去，——这就是印度工人阶级的必要任务，是争取印度独立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必要条件。

29. 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和印度革命形势的必然加剧，可能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形势，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冲突的发展，它们对苏联实行封锁，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世界之间斗争的极端尖锐化，——这一切都一再证明了当前时代的共同特征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六、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和基本任务

30. 制止日益临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和瓜分中国，保卫中国革命和殖民地起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

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应当把解决这些任务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日常斗争(它从属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结合起来。

31. 必须一贯地、时时刻刻地进行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反对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威胁。要展开这一斗争,就非坚决揭露和平主义不可,因为和平主义在目前条件下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用来准备战争和掩饰备战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要展开这一斗争,就非揭露“国际联盟”不可,因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和平主义”的最主要的工具。最后,要展开这一斗争,还非揭露社会民主党不可,因为社会民主党用和平主义的旗帜帮助帝国主义掩饰准备新战争的真相。经常用事实来揭露“国际联盟”的工作;一贯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并据此来揭露“本国”政府(在议会中提出质询,举行街头群众集会来支持这种质询等等),不断说明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军备、关于化学工业、关于军费预算、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和阴谋、关于帝国主义者在中的作用等问题;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现实和平主义者”关于超帝国主义和“国际联盟”作用的谎言;经常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秘密准备发动这次大战的情况;反对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并宣传共产党的口号(首先是使“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陆海军士兵中间展开工作,建立秘密的支部,在农民中展开工作,——这一切应当是各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基本任务。

32. 如果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意味着苏联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败,工人运动将倒退几十年,全欧洲将处于最残暴的反动统治下。如果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一系列的革命,工人阶级争得了许多重大成果,那末,苏联无产阶级的失败,将在历史上揭开反革命空前野蛮恐怖的新的一

页。可见，保卫苏联不能不成为注意的中心。因此，在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力量勾结起来阴谋反对苏联的时候，对苏联命运的关心，要求我们进行系统的工作，准备把反苏战争变成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国内战争，变成保卫苏联的战争。

33.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都要求提高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事实表明，各国共产党还没有能胜任这些国际任务。早在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已经指出：“共产国际内几乎所有的党都没有能充分发挥力量支持英国罢工和中国革命。”以后的事实表明，这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认识不够。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没有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动员能力。代表大会提醒各国共产党注意，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纠正这种缺点，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工作（在报刊上广泛进行说明，出版宣传鼓动的书刊，等等），必须拿出比以往多得多的力量来对自己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战斗训练**。

34. 支持殖民地运动，尤其是对于压迫殖民地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反对干涉中国，反对镇压一切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在陆海军中展开工作，坚决支持殖民地起义的人民，——这一切都是最近必须采取的措施。代表大会同时责成执行委员会用更多的力量来严密注意殖民地运动，并相应地改组和加强主管这项工作的各个部门。

代表大会也特别着重指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南非）大力组织黑人运动的必要性。为此，代表大会要求最坚决无情地反对所谓“白种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

35. 在即将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展开决战的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总的策略方针应当是：反对任何想使工人组织“长入”资本主义的私人组织或国家组织的打算，反对工会同托拉斯结合起来”，反对“工业和平”和强制仲裁，反

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反对托拉斯。各国共产党应当向工人群众进行不倦的解释工作，说明关于“工业和平”、强制仲裁的宣传是同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先锋队、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36. 由于工业加紧托拉斯化，由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加强，由于国家组织和托拉斯组织日益同改良主义工会机关结合起来，由于社会民主党宣传新的、彻底资产阶级的、积极效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必须加紧对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政党”展开斗争。其所以需要加紧斗争，是因为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变化，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它已经进入了更“成熟的”（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发展时期。因此，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制定的策略。这一策略在法国的选举和英国的运动中经过了考验，并被完全证明是绝对正确的。

37. 这个策略改变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而绝没有改变它的主要内容。加紧对社会民主党展开斗争，是把工作重心坚决转移到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上。它并没有取消，相反的倒是加重了共产党人的义务，要他们把真正受骗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区分开来。同样，争取群众（包括还跟着资产阶级政党走的和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群众）的口号，不仅不应当从日程上取消，而且更加应该成为共产国际全部工作的中心。

关心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群众的哪怕是最琐碎的要求，深入到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工会组织、文化组织、体育组织等等），加强党在工厂和大企业中的阵地，特别是在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农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中开展工作，而且一定要把各种琐碎的日常要求同党的基本口号联系起来，——这一切都应当是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真正争取和动员群众。

38. 在工会运动方面，代表大会坚决号召各国的党最大限度地加强这条战线的工作。目前，更加应该尽力扩大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影响，因为在许多国家中，改良主义者正在加紧把共产党人（以及一般左派）开除出工会组织。共产党人若不保持必要的阵地，就可能脱离工会内有组织的无产者群众而遭到孤立。因此，共产党人应当在工会中热情而耐心地进行日常的工作，以便在广大会员群众的心目中树立起威信，使他们确信共产党人是经验丰富的精明能干的组织者，是不仅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且为工人群众的任何日常的局部要求而奋斗的战士，是能很好地领导罢工斗争的人。

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和革命的工会，只有同社会民主党和政治上被收买的工会官僚展开激烈的斗争，才能在共产党的这些战斗中起领导作用。为了在争取群众的工作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特别重视下列工作：在罢工斗争中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群众工作，加强工会中的党团，等等）；善于领导罢工的进行（建立罢工委员会，利用工厂委员会）；向群众解释每一次经济冲突和罢工的政治原因及其成败的条件。

在资产阶级国家、企业主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结成了统一战线并力图通过强制仲裁来共同绞杀罢工运动的情况下，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发挥群众的力量和主动精神，在形势有利时，甚至不顾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意图而举行罢工斗争。

不要被改良主义者的开除共产党人和分裂工会运动的挑衅活动所吓倒，而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改良主义者的突然袭击，同时必须尽力反对投降的策略（如“不顾一切”要求统一，拒绝保护被开除的同志，不去大力反对强制仲裁，无条件地服从官僚主义工会机关，削弱对改良主义领导的批评，等等）。组织那些尚未参加组织的群众，夺取改良主义的工会组织，组织被开除的工人，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如在工会运动已经发生分裂的国家里）把已经

掌握的地方组织联合成革命的工会组织，——这一切就是当前日程上的任务。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争取一国范围内或国际范围内工会运动统一这一工作中放弃主动权；他们应当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分裂政策展开坚决斗争。由于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大力开展工会中共产党党团、工会反对派、革命工会的工作，大力加强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和活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各国共产党应当支持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和拉丁美洲工会书记处的工作，因为它们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争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而奋斗。

39.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开展，青年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战争的危險日益滋长，——这一切都非常有力地提出了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问题。代表大会责成青年共产国际研究本身的策略和工作方法问题；在这里，一方面必须更广泛地影响青年工人，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吸收他们参加组织，更加敏锐地和积极地反映他们的经济、一般文化和理论的需要；同时要保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战斗的政治面貌。

鉴于青年在生产中比重的增加，必须加强工会各小组的工作，同时应该在青年没有参加工会的地方，设法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青年团体，为实现无产阶级青年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进行经济斗争，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在特殊情况下独立进行罢工，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求接受青年参加工会，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深入到有青年工人参加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如工会、体育团体等等)，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工作，坚决改变策略和方法以加强群众工作，——这一切应当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不解决这些任务，青年共产国际就不能组织真正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运动。代表大会一方面认为采取这种加强群众工作的方针是必要的，同时要求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更加系统地帮助和更加经常地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加紧注意对工人子女的工作，以及共产主义儿童团的活动。

同时，代表大会委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国际妇女书记处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女工和一般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并在这方面利用女工“代表会议”的经验。

40. 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在农村广大劳动阶层中进行的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法国和德国大选的结果，代表大会决定加强对农业工人和小农的工作。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到加强农民工作的必要性，并且指出，这一工作在大多数共产党中遭到忽视。代表大会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来开展农民工作，特别是在农业国中（罗马尼亚，巴尔干各国，波兰等），同样也包括在法、德、意等国。代表大会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来活跃农民国际的工作，并要求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支持这一工作。

41. 代表代表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种种措施来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中进行解放斗争的各种组织，动员广大劳动群众保卫中国革命和保卫苏联的各种组织，以及援助白色恐怖下牺牲者的各种组织。必须加强和改进共产党人在“统一派”、“反帝大同盟”、“苏联之友协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际工人救济会”等组织中的工作。各国共产党必须大力帮助这些组织，协助推广它们的报刊，支持它们的地方分支机构的工作，等等。

42. 特别是在可能发生战争的前景下，迫害的加重和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就在各国共产党面前提出一项任务：需要及时提出和研究关于建立秘密机关并由它来保证领导将来的战斗和保证党的路线和行动统一的问题。

七、各支部的工作总结、成绩、错误和任务

43. 代表大会肯定共产国际在工作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极重大的成绩。这里包括：共产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了，它第一次传播到南美洲、非洲、澳洲各国，以及一系列亚洲国家（在日本，共产主义的阵地有了加强，在中国，共产主义得到了传播）；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资本主义还局部稳定、社会民主党还相对稳固，共产国际的影响扩大和深入了（如在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处于非法地位的党成长了，它们在骇人听闻的警察和法西斯恐怖打击下继续前进（一方面是意大利和波兰，另一方面是中国和日本），而中国的恐怖统治具有空前未闻的大批屠杀的性质；最后，各国的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经验丰富了，内部团结了，内部斗争克服了，在共产国际内部托洛茨基反对派也被击败了。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一些共同的缺点：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还发挥得较差，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主义，这表现在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的意义估计不足上；工会工作薄弱；不善于在组织上巩固政治影响的增长，党员的人数没有发展；许多党对于农民工作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工作不够重视；党的机关和工作方法存在其种程度的官僚主义现象（同群众的联系不够密切，吸收新党员不够积极，基层支部的工作不够活跃，把重心放在党的专职人员的工作上）；党的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相对地说还较低；由于在生产单位支部的基础上改组党的工作远未完成，所以同大企业的联系较差，等等。

.....

54. 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一系列最沉重的失败，这是同过去所犯的一系列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有关的，例如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放弃了独立自主和批评的自由，不懂得革命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不懂得及时准备反击的必要，以及阻碍土地革命的

开展。在失败的打击下，这个英勇的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但它的领导陷入了另一个错误，没有充分地防止那种明显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以致在湖南、湖北等地举行了没有成功的起义。另一方面，某些同志陷入了机会主义错误，开始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代表大会认为，把广州起义看作盲动是完全不正确的。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去一个时期所进行的一场英勇的掩护战，尽管在领导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它终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阶段的旗帜。在目前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也就是在工农中进行群众工作，恢复他们的组织，利用各种不满情绪来反对地主、资产者、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开展革命斗争，为此，必须大力巩固党本身的组织。群众起义的口号应变为宣传的口号，只有在群众真正准备就绪和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成熟的时候，它才在更高的阶段上，在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工农专政的旗帜下，重新成为直接实践的口号。

.....

八、为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团结而奋斗

58. 在资本主义国家稳定时期的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在苏联改造时期的困难情况下，在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它们还企图形成国际性的组织。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从极右翼到极“左”翼）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批评苏联的专政，污蔑说这一专政或多或少地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力图使国际无产阶级丧失动员力量。在各国支部里，这些观点有的是同极右派的观点（法国的苏瓦林集团）、有的是同极“左”翼的观点（德国的柯尔什、马斯洛夫）一脉相通的。所有这些派别在托洛茨基主义的鼓动和纠集下，形成了统一的集团，但是当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联共（布）党内失败后，它就开始迅速瓦解了。同时，这个集团在西欧的基本

核心，即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纲领并形成独立政党的所谓“列宁社”，已经暴露出它公开充当社会民主党奸细的真面目，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直接加入社会民主党，即投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公开的凶恶的敌人。

59. 目前，由于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社会民主党的直接影响，在各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离开正确政治立场的右倾。其表现就是：“合法主义”的残余，过分奉公守法，对罢工运动的“尾巴主义”，对待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态度（例如，在法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违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决议的现象），对国际事件反应较慢，等等。这些右倾偏向，在存在比较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显得特别危险，因此反右倾的斗争应当提到首要地位，这也要求不断反对对党内右倾偏向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但同时也存在着“左”倾偏向，其表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企图否定统一战线策略，不理解工会工作的全部重要意义，采取空谈革命的政策，而在中国，还表现为盲动主义的倾向。

60. 代表大会责成各国的党对这些偏向进行斗争，但首先要通过说服的方法来斗争。代表大会认为，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提拔新工作人员等决议，在许多重要的国家中，没有得到执行。代表大会认为，在整个国际局势极端复杂和可能发生急剧的历史转折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提高各个党的理论水平，特别是它们的领导骨干的理论水平。鉴于有必要加强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并保证它同各国党的紧密联系，代表大会决定由各主要的党选派有威信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经常的领导工作人员。

61. 代表大会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继续维护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的团结。只有首先在同心协力地工作和通过党内民主的方法消除分歧的情况下，才能最好地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并解决最近的将来的伟大任务。目前我们党内生活中

出现的重大错误（官僚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国家里党员人数减少，基层组织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等等），只有在更广泛地发扬党内民主，从而提高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克服。这不但不要取消，相反的却要求大力加强党内铁的纪律，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下级机关和其他党组织（议会党团、工会党团、党的报刊等）无条件服从党的中央领导，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巩固党内的无产阶级纪律，加强党的团结，消除派别斗争，等等，这都是无产阶级战胜帝国主义所策动的一切势力的必要条件。

（录自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殖民地 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① (节录)

(库西宁的报告提纲)

(1928年9月1日)

一、引 言

.....

2. 中国革命具有头等重要的国际意义。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是中国革命浪潮空前高涨的一个信号。中国几个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和英国殖民地香港，都成了革命群众罢工斗争的舞台。这场斗争掀起了反对中国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农民群众运动的浪潮。并得到了它的响应。早在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阵线的最初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就力图把革命斗争只限于执行一些民族运动的任务，如反对军阀、抵制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等等。几乎是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同时，反革命势力就已开始纠集自己的力量（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北京开枪镇压学生示威游行，国民党内形成右派集团并开始反对广东、广西的农民等等）。1926年夏北伐开始，连克许多省份。许多派系的反动军阀纷纷溃败，群众运动也随之迅猛发展（占领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上海举行了总罢工并发展成武装起义，农民

^① 1928年9月1日第四十六次会议上通过。——原编者

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4月^①的上海起义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使当地的资产阶级完全倒向反革命阵营，并引起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

工人夺取政权的独立行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并发展成为土地革命，使那个由国民党小资产阶级派别领导的武汉政府也倒向反革命阵营。可惜，革命浪潮已近尾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曾打算通过一系列起义（贺龙和叶挺的起义，湖南、湖北、广东、江苏的农民起义），从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夺回政权，以防止革命的失败，但是没有成功。这个革命浪潮的最后一次强烈冲击，是英勇的广州无产阶级的起义。广州无产阶级试图在苏维埃的口号下把土地革命同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结合起来。

……

7. 迄今为止，帝国主义在多数情况下都做到了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然而，所有引起革命运动爆发的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无论在中国和印度，或者在任何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世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同殖民地人民独立发展之间的客观矛盾，丝毫没有消除。

……

8.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力量（苏联、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为一方，帝国主义力量为另一方，在两方之间形成了一条战线，这在世界历史的当今时代，具有基本的、决定性的意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解放运动日益团结在苏联的旗帜周围，它们吸取了沉痛的教训，确信除了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以外，除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以外，别无生路。……同苏联以及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结成联

^① 应为3月。

盟，使中国、印度和其他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群众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阶段，甚至完全越过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阶段，独立自由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

.....

二、殖民地经济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特点

.....

13. 既然殖民地绝大多数居民务农并生活在农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农民进行剥削所采用的掠夺性形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由于帝国主义的干预(苛捐杂税，从宗主国输入工业品等等)，农村在被卷入货币商品经济范畴的同时，也发生了农民经济赤贫化和农村手工业破产等现象，其进展速度远远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的情况。与此相反，工业的缓慢发展，又大大限制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旧经济形式的迅速解体与新经济形式的缓慢发展之间的这种严重脱节现象，造成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的“土地极为紧张”，农业人口过剩，地租猛涨，农民的耕地极度分散。同时，旧的封建或半封建剥削和奴役的一切负担，名目“翻新”了，但丝毫也没有减轻，它们仍象过去一样，统统压在农民的肩上。资本主义通过它的税收制度和商业机构控制了殖民地的农村，引起了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变革(如取消了农村公社)，但丝毫也没让农民摆脱资本主义前的奴役剥削形式的束缚，而仅仅让这些形式具有货币的表现形式(如徭役和实物地租部分变为货币地租，实物税部分变为现金税等等)，这就使农民更加贫困了。高利贷者前来“帮助”处境穷困的农民，掠夺他们，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如在印度和中国的一些地区)建立以抵债为基础的世袭奴隶制。

尽管各个殖民地、甚至同一国家的各个不同地区，在土地关系上有各种差别，但是农民群众的贫困境况几乎到处一样。这些

国家的农民，部分由于不等价交换，部分由于直接受剥削，无力在技术上或组织上提高自己的经营水平。他们的产品产量和他们的消费水平都不断下降。在这些国家里。农民的赤贫化是普遍现象。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农民的赤贫化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现在农村里主要的都是些经常挨饿的、无地或几乎无地的穷苦农民。在那里，大地产几乎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毫无联系，它只不过是向农民榨取地租的手段。而且在劳动农民和大地主（如中国的大乡绅和印度的柴明达尔）或国家之间，往往有许多层承租人和转租人以及寄生的中间环节。对这些国家的农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古老的人工灌溉系统，由于帝国主义的干预，起初是逐渐废弃不用，后来虽然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重新修复，但要利用它，对农民来说是过于昂贵了。歉收成了越来越频繁的现象。任何天灾和瘟疫，农民都无力抗御。广大农民群众被赶出了生产过程，城市里毫无就业机会，在农村也难以找到工作，于是就变成可怜的苦力。

农民的这种贫困状况，对工业来说，同时也就是国内市场的危机，这种状况本身就成了国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无论是印度、中国、埃及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都感到农民的贫困是它们扩大剥削的障碍。但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同大地产以及农村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而，指望它们实行任何较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

三、中国、印度以及类似的殖民地国家中共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

16. 在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中国和印度，生产力发

展和劳动社会化都处于较低级的阶段。这种情况和外国的压迫,以及封建制度的和资本主义前的关系残余的严重存在,都决定了这些国家现阶段革命的性质。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的阶段。根据这一点,可以规定下列任务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同的基本任务,即(1)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铁路和银行等收归国有);使尚未统一的国家实现统一;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剥削阶级的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2)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的和殖民地的剥削和如役下解放出来。实行土地国有化;采取根本措施改善农民处境,以便建立城乡间尽可能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3)为了适应工业、运输业等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无产阶级不断成长的形势,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加强共产党,建立党在劳动群众中坚强的领导地位,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4)实行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妇女平等权),政教分离,消灭种姓隔阂;对城乡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等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把自己的全部基本任务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其中哪些任务只能由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这些都取决于工农革命运动的进程,取决于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者、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成败。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特别有利于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因而只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才能充分保证殖民地的解放。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要求具备起码的前提,例如国家工业发展的一定水平,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坚强的共产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群众中拥有巨大影响的坚强的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可是在这些国家里,这却是一个极其缓慢、极其艰难的过程,除非在这些国

家的客观条件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速了这一过程。

17. 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主要在于它同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有机的联系。在所有的殖民地，以及在帝国主义已经采用赤裸裸的方式进行奴役从而引起民情激愤的那些半殖民地，民族因素对革命过程有着重大影响。一方面，民族压迫加速革命危机的成熟，加深工农群众的不满，易于动员工农群众，并使革命的爆发具有群众自发的力量和真正人民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民族因素不仅能影响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而且能影响所有其他阶级的立场，使其在革命过程中有所改变。首先，穷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有相当多的人接受积极的革命力量的影响；其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立场同独立国家资产阶级的立场（例如，1905—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的立场）相比，多半具有更大的两面性，并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愈加动摇。极其重要的是，应根据具体情况来仔细研究民族因素的特殊影响（因为民族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殖民地革命的特点），并应考虑到该国共产党的策略具有哪些民族因素。

在先进殖民地国家中，除民族解放斗争外，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因此，共产党人应当极其注意农业危机的发展和农村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应当从一开始就把工人群众的不满和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引导到自觉革命的方向；引导农民运动去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反对现存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即封建和半封建关系的束缚，因为这些关系使农民经济衰落、破产和崩溃。耕作的极端落后，如役性租赁关系的盛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这一切都是殖民地农业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一切也同殖民地农业生产以及帝国主义建立并垄断的世界市场中高度有组织的交换形式，有着极端尖锐的矛盾。

18. 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不都是一致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商业资产阶级（所谓买办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资本利益效劳的。就其总体而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坚决维护反民族的帝国主义观点，同帝国主义的封建同盟者和当地的高薪官僚政客一样，反对整个民族运动。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尤其是代表当地工业利益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站在民族运动一边，但同时又特别动摇，倾向妥协，这一派可以称之为民族改良主义（或用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的术语，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处于革命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中间状态，1925年以后在中国确实看不到了。那里的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起初由于形势的特殊，都居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地位；随后，他们就完全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在印度和埃及，我们目前看到的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更为动摇的、在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搞平衡的运动。

对帝国主义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既符合殖民地全体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同帝国主义制度的整个本质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各种民族资本家根据自己的直接利益，大多数同帝国主义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可以直接收买很大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甚至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资本家获得某种买办地位，也就是商业经纪人、剥削者帮凶、被奴役人民的监工的地位。然而，类似奴隶主的最高垄断剥削者的地位，帝国主义总是留给自己。独霸，“自由”而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对“独立人民”的统治权，所有这一切，帝国主义是永远也不会自愿让给民族资产阶级的。在这一点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客观上是带根本性的。在这方面，帝国主义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是投降。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软弱无力的一方，一再向帝国主义投降。

但是，只要群众发动的阶级革命的危险还未直接成为现实、还不尖锐、还没有造成威胁，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彻底投降。这些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方面，为了免遭阶级革命的危险，另一方面，为了在对付帝国主义时能加强自己的地位，它们就要争取小资产阶级、农民和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在争取工人阶级方面（尤其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觉醒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很少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它们极力要争取农民的支持。但是，这方面正是殖民地资产阶级最为薄弱之处。要免除殖民地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只有通过土地革命。然而，中国、印度和埃及的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的直接利益，同土地所有制、高利贷资本和对整个农民群众的剥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它们不仅反对土地革命，而且反对任何坚决的土地改革。它们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只要它们公开提出土地问题，就会引起农民群众的革命风潮，加速革命的进程。这样一来，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几乎不可能下决心去实际解决这个重要而难于解决的基本问题。

相反，民族资产阶级却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大唱高调，装腔作势，企图以此左右小资产阶级群众，并迫使帝国主义作某些让步。但是，帝国主义者却把僵绳越勒越紧，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无力作出稍为有力的反抗。因此，每逢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时，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打算加强自己的民族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又散布可以同帝国主义和平妥协的幻想。可是，无论对哪一方面，群众都必然要感到失望，从而逐渐抛弃自己的改良主义幻想。

19. 如果不能正确估计这些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基本动向，该国共产党就可能在战略和策略上犯严重错误。尤其可能发生这样两类错误：

(1) 不懂得如何区别民族改良主义派和民族革命派，就可能

对资产阶级采取尾巴主义政策，就不能十分明确地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界限，就会使一些最重要的革命口号（特别是土地革命的口号）等等模糊不清。这正是中国共产党 1925—1927 年所犯的主要错误。

(2) 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不同于封建、帝国主义阵营，它在小资产阶级、农民、以至部分工人阶级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至少运动初期是如此，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低估这种意义，就会导致宗派主义政策，使共产党人脱离劳动群众，等等。

无论发生上叙哪一种情况，都是因为如果没有充分注意执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早已规定的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在本民族内部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任务。不进行这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达到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战略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它有机的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更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了。

20. 在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小资产阶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包括各种不同阶层，它们在民族革命运动的不同时期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手工业者受到舶来品竞争的损害，对帝国主义抱有敌对情绪。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剥削帮工和学徒，他们对具有阶级自觉性的工人运动也抱有敌对情绪。手工业者多半自己也同时受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因此这个阶层具有很大的两重性，地位极不牢靠。这就决定了他们摇摆不定，而且往往受到空想主义反动分子的影响。城乡的商人通过商业和高利贷同农村的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抓住旧的剥削形式不放，认为这些形式比扩大国内市场的前景更为有利。可是这些阶层也不尽相同。商业资产阶级的那些同买办有某种联系的阶层，其立场与经营范围主要限于国内市场的那些阶层的立场，

就不相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等，通常不仅是小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最坚决的代表，而且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的客观利益的最坚决的代表，在民族运动初期，他们还经常是民族意向的表达者。他们在运动的表层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总的来说，他们不能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表，因为他们出身的那些社会阶层，往往同土地所有制有联系。革命浪潮的不断高涨可能把他们推向工人运动，但同时，他们也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带了进来。其中只有某些人能够在斗争过程中同本阶级决裂，领悟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任务，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的积极捍卫者。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思想粉饰成社会主义的、甚至共产主义的，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过去曾起了革命的作用，在印度和埃及这些国家里，今天他们仍部分地起着革命的作用。群众运动可能把他们吸引到运动中来，但也可能把他们推向极端反动的阵营，或者还会促使空想主义的反动思潮在他们的队伍中传播。

在殖民地城市中，除了这些阶层以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城市贫民阶层：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手工业者、街头小贩、失业的知识分子、做临时工的破产农民等等，他们的处境客观上决定他们倒向革命一边。此外，殖民地城市也同农村一样，有人数众多的“苦力”阶层，他们是没有经过工厂生产训练、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半无产者。

除了无产阶级，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也是革命的动力。千百万广大的农民群众，甚至在最发达的殖民地，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某些殖民地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千百万忍饥挨饿的佃农和小农被贫困和各种资本主义前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逼得走投无路，其中不少人丧失了农具，无法耕种租来的土地，他们被赶出生产过程，贫病交加，坐以待毙。他们和雇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最重要的同盟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

得解放，而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残余，农民的阶级分化过程比较缓慢。但在这些国家中，市场关系毕竟相当发达，致使农民在阶级关系上已不再是一个单一成分的群众了。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中，特别是在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里，已经可以看到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剥削分子，他们通过高利贷、商业、使用雇佣劳动、出租土地、租入土地、出租牲口和农具等等方法，来剥削雇农和农民。无产阶级在农民反对地主斗争的初期能够领导全体农民，这一般说来是可能的。但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农民中一些上层分子就可能转向反革命阵营。无产阶级只有为实现农民的局部要求和彻底完成土地革命而忘我斗争，只有带领广大农民群众通过革命来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赢得对农民的领导权。

.....

四、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

.....

41.共产党人必须提出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实现殖民地人民的国家完全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动员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工农群众。为了反对血腥镇压殖民地起义，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民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加紧军事侵略，反对新的武装掠夺，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一贯的、有组织的和忘我的斗争。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吸取全部教训：在共产国际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做到了充分动员群众来切实保卫中国革命，打退世界帝国主义的不断进攻。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帝国主义者正在进攻“自己的”殖民地人民，以迫使他们“就范”，这就使积极支持殖民地革命的任务成为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注意和斗争的中心。

.....

共产党应当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殖民地政策的斗争看作自己反帝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都投票赞成拨款给本国政府以进行战争，镇压争取自由的殖民地人民……他们赞成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殖民地起义（英国工党领袖为干涉中国作辩护，荷兰社会党发表声明为镇压印度尼西亚的起义作辩护）。

.....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只有在自己队伍内部大力宣传，阐述共产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观点，彻底铲除这个问题上的一切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残余，批判一切可能出现的偏离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倾向，才能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成功。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宣言

(致中国的工人与劳动群众)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于伟大革命之先锋部队——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为无产阶级所领导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作坚决斗争的几千百万中国劳动群众，表示热烈的敬意。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对于你们过去的悲惨的损失，深表哀痛，但是对于你们的胜利亦无不欣喜而羡慕。帝国主义在华之倾覆，帝国主义战线最重要部分之破裂，自然需要牺牲与勇敢，中国的劳动群众对于革命主义之忠实与大无畏之精神，以及不顾死活的英勇斗争，全世界无不为之惊叹。几十万的工人和农民牺牲于反抗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之斗争中，牺牲于卑鄙的国民党的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但是革命是开展起来了，革命的部队是坚强起来了。永久纪念着牺牲于斗争当中的同志啊！参加斗争与发展革命红旗的战士，应得最大的光荣。

中国的工人们！反抗世界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斗争之领导，是需要最高的阶级觉悟，需要切实明了革命的动力与革命道上的障碍，需要各处斗争之方法的正当选择。中国革命之胜利，只有应用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才有可能。为了启发土地革命，为要领导几千百万的散漫的农民群众并使其不遭失败，为要谨防不可信任之小资产阶级同盟的一切动摇不定，并于其表示些小背叛倾向时，就给以无情的扫荡，中国的工人就组织了明了其历史使命的整个阶级，并建设群众的共产党。中国的青年无产阶级在最残酷的剥削之下在帝国主义奴隶监督人的虐待之下，已经不是笨拙的群众，他与他的政党共产党已成为世界革

命第一等重要的原素。大会对于所属的中国部队，中国共产党，之空前迅速的发展，及其在战线上之英勇作战。勇敢的暴露并改正他自己的错误，表示非常满意。

被压迫的国家，没有如革命的中国这样的引起争斗的。如上海，汉口，海陆丰与广州，不仅引起了战争，而且给了我们历史当如何获得的教训。中国革命争斗的经验已经成为东方全体劳动者的普遍经验。印度的无产阶级正进入革命争斗的新局面，他不仅计及一九二二年时印度资产阶级之可耻的投降的教训，而且计及国民党之各种各式的背叛。沉溺于血堆中之印度南洋的群众暴动，现在也依照中国的教训，重整其新势力，重行武装其新队伍。无论何处，如高丽，如埃及以及其他国家，凡农民群众，看见中国革命的先例，知道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与无产阶级作密切的联合，才能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无论何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有觉悟的标出民族革命争斗的局面，在电柱上书写《广州的英勇》与其最终目的的兴奋标语。国际帝国主义到处攻打中国的革命工人。第二国际企图以卑鄙的改良主义来毒害民族的解放运动，他对于中国革命，非常害怕。上海广州和汉口的工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方各处反帝国主义的胜利的革命争斗之出力者。

亲爱的同志们！国际无产阶级很明白你们的争斗将倾覆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轰动队。你们目前的任务是很大，但是你们的困难也是有增无已，你们重整你们的队伍，发动新力量，吸收新分子，仍在敌人的统治之下，在帝国主义经常的炮火之下，在中国政府野蛮的恐怖之下，准备未来的攻击。资本主义国家之革命的无产阶级明白其历史的任务，在你们的争斗中将给你们以革命的帮助，虽极大牺牲亦所不惜。共产国际指明：今日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工农革命的援助，虽然有许多个人代表的英勇奋斗，如此尚不充分。第六次大会认为

为援助民族革命的争斗与加速中国革命之胜利，必须有无产阶级之国际力量的组织，此乃大会最大任务之一。

广州的暴动，在工人想来，是中国工人之最大英勇的例子。下次工农广大群众的暴动，就在于坚强的正确的应用列宁主义且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拥护之下发动起来，获得中国胜利的十月。

独立的中国苏维埃联邦万岁！

被压迫民族之胜利的暴动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

(摘自《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8期)

四、共产国际“左”倾 指导与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

(1928年11月28日)

半年来反动政治在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下和反动阶级内部矛盾中变动着。日本出兵满洲山东以及济案发生、英国对日采取相当的协调，盖日本之行动一则可以转移二年来华人仇英运动，一则可以给在政治军事上声势渐张之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以打击，因此英国有暂时对日协调之必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必须扶助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蒋介石（当时是南京政府之唯一支配者）于济案后，转而勾结美帝国主义，这是客观的必然。这正当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前，其时，南京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这时期是民族资产阶级很活跃的时期，全国财政会议，裁兵会议，交通会议，裁厘会议，都在这一时期召集的，同时还向民众作了许多改良欺骗的宣传。但五中会议因为地主买办阶级占着优势，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取消政治分会，财政统一等）不能通过。接着，国民政府也不能不改组。现在的局势是：胡汉民、戴季陶占住了中央党部，南京政府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西山会议派，桂系）与民族资产阶级（蒋系）相持的政权，而地主买办阶级占着优势。英国在南京政府中比力美国起来，暂时占着优势。但这决不是说，美国或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消极退让，恰恰相反，美帝国主义正在极力扶助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客观上的需要，也逼得地主买办阶级对美帝国主义的投资不能不垂涎（伍朝枢使美孙科在美进行借款）。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冲突虽根本不能消除，然而美帝国主义势力已一步迫进

一步地伸入中国，极力以财政资本引诱中国资产阶级甚至买办豪绅好发展他的垄断政策给日英在中国的特权以严重的打击。为共同对美，更联络〔系〕到世界问题上，英日对华外交上已采取了调协的策略。日帝国主义表面上对南京政府没有直接命令的权力，但在国际关系上以及满洲山东的占领，直隶的包围，日本并没有减低他与英美共同支配中国局势的地位；无疑的日本必然继续开展其在北方的特权，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扶持更强有力的工具（阎已亲日冯玉祥逐渐亲日）以达到其直接命令中央政府的目的。在如此国际帝国主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互相竞争冲突的中央政权之下，地方政权被各派新旧军阀所割据，新的军阀战争，以地主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为骨干而剧烈的酝酿着，后面隐藏着帝国主义英日与美国的两大对垒的操纵，因此（上述种种）反动统治不能走向统一稳定而必然走向分裂崩溃。

资产阶级需要争取群众，尤其是为要消磨革命分散革命力量和打击豪绅地主阶级。其争取群众的策略是“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实行的方式，第一为宣传，如革命评论派与第三党的种种宣传，这是从政治上取得群众，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也有些影响（《革命评论》每期曾销行到五万份）。第二便是组织上争取群众，经过党部指导（指导委员）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反日会等；主要的是以统治阶级的法律范围（合法）群众的行动（请愿，调解，仲裁，劳资合作等）消灭群众革命斗争，这在江浙各省也养成不少工人群众的合法观念。资产阶级仍在这样的继续努力着，并渐有相当影响到其他各省。

在严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工人经济斗争有复兴之趋势，大小城市都陆续有部分的工人斗争发生，对国民党的欺骗逐渐打破。湘鄂赣粤的农暴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有几处（如赣西朱毛区域）斗争比前更为深入；北方几省的农民反苛杂运动也不断发生；湘鄂桂豫陕甘晋鲁等省普遍的天灾必然成为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

火线，斗争区域农民群众对于党的信仰大部分很好。几个月来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因为生活痛苦而动摇，零碎的逃兵和哗变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小资产阶级从“五三”以来即从国民党的怀里动摇起来。城市的反日抵货运动还继续着。但是这些现象，只能算作新的高潮必不可免要到来的薄弱的象征，因为有下列的严重的弱点：（1）党的主要的口号还没有深入群众，多数群众虽然不满意国民党，然而其政治意识还是模糊动摇（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仍在活动以他的动摇的政治影响群众）；（2）群众本身组织大量非常薄弱（工会的组织少而弱，许多斗争的乡村，群众自身没有组织）；（3）工农士兵群众的斗争大半是自发的零碎的随起随落；（4）一般城市工作没有做起来，大工人区域如武汉天津广州都已破碎不堪；（5）反帝运动（反日）被资产阶级领导去而不能发展（工人阶级无力领导）；（6）根本的原因由于党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不能把党的政治传到群众组织群众争取多数群众于党的周围。

然而客观的环境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告诉我们革命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主要的是要无产阶级政党有正确的策略和工作路线以推进革命的微波走向高潮。中央忠实的在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和第六次全国大会决议之下工作，主要的是肃清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残余，在一切劳苦群众前而扩大党的宣传揭破统治阶级的罪恶特别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宣传奋斗，参加一切在反动领导下有群众的组织以夺取其群众；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建立群众独立组织，纠正过去组织上的错误（如委派命令等制度）；注意各种群众工作互相影响推进而有配合的发展。——这些是党争取群众的主要策略。下级党部对于这些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执行，多难得正确；有些地方盲动主义尚未能肃清）有些地方则又有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有的拒绝参加一切反动派领

导的组织，有的却走上合法运动；对于群众斗争，有的只顾扩大，有的却忽略各部分的联系；对反帝运动或则根本忽视或则不认识职工运动为反帝运动的基本及反帝运动与一般群众工作的联系，而幻想反帝运动单独走向高潮甚至误认反帝运动为工人运动的前提；对士兵运动或则根本忽视，或则把士兵运动看做中心工作而发生士兵运动的盲动主义。因此中央又须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和工作路线上不断的纠正各地党部或左或右的倾向和种种错误。

同时党的组织上的弱点，更是党目前的严重问题：第一党的工人成分缩小。全党工人成份最高数量不过四千人：江苏 1500（上海 1300），广东 1200（香港 600），直隶 240（唐山 100 天津 20），湖北 80，河南 100，山东 150，江西 60，满洲 97，浙江 30，福建 60，山西 80，四川 40，云南 20，陕西 10，广西 20，南洋 400；第二没有能起核心作用的产业支部；第三城市支部固然非常之少而弱，乡村支部则大多数散漫无组织。因此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常常成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执行的障碍。因此中央在组织任务上，要坚决的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力求“党产化”，“党员职业化”，同时在积极的政治教育和工作路线上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并改正组织上许多非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残余。

几个主要的地方党部的现象也可简略的叙述一点：（一）江苏——几个月来政治上尚没有大的错误，但党的宣传没有深入群众，上海工人群众虽多厌恶国民党，但也多不敢接受我们的主张，三个月来比较热烈的工人经济斗争，在我们影响或领导之下的只有一部分店员或手（工）业工人，几次纱厂罢工（沪西）和最近邮务罢工，我们都无力领导。反帝运动，因为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事实上被资产阶级领导去了。党和群众的组织路线，还在开始改变。外县工作，渐次纠正了盲动主义，而注意了群众的日常斗争和组织工作。（二）广东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还继续总暴策略，在

国际九次扩大会决议案到中国后，省委还决定夏收总暴动，虽经中央极力批驳，当时仍未立即改正。但事实上暴不起来，省委此时的政治路线又转变到“取消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如事实上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如以反帝运动农民运动为工人运动的前提，如群众运动之合法倾向及注意经济斗争而放松政治宣传等等，别一方面对士兵运动却坚持“兵变主义”经过中央历次的说服并派巡视员指导，最近已逐渐改变过来。广州几次破获所余无几。香港群众工作和党的基础都很弱，外县重要区域都遭极大的摧残。不过非暴动区域的工作都有新的发展。

(三)湖北——武汉三镇屡次被破坏，现仅汉阳有百余同志的组织，武昌群众工作刚起来，又被摧残下去。外县尚有六千党员，三十五个县委，农村群众斗争有复兴的现象，群众组织却极少。同时党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及小资产阶级意识所表现的恶现象，都足以防〔妨〕碍新的政治工作路线之执行，而亟需积极的予以纠正。

(四)直隶——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在政治上极端的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打青白旗欢迎冯玉祥）的主张同时存在于指导机关与同志脑中。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中央对二月改组会的工作曾有告顺直同志书给以纠正，但省委并未接受，而对上面种种不好现象省委及和森同志都未使中央知道，一直到六次大会中，中央巡视员到北方才知道此种情形而召集扩大会面予以纠正并改组省委。新中央接受巡视员和省委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召集和森同志讨论后，给以更正确的指导，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整理顺直党部创立无产阶级基础，积极工作深入群众以与一切的错误倾

向奋斗，并派巡视员帮助顺直工作，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要求中央全体会追认。现在顺直工作内部纠纷仍未刷清，而新的工作人员及中央巡视员又多犯有取消命令等严重错误，中央正在努力给以纠正。(五)湖南——三月大破坏后曾停顿两个月，五月中央派人恢复省委，全省关系渐次恢复，并引进了许多工人分子担负各级党部指导工作，朱毛处也给了许多指导，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安源工作复兴起来，正在可以开〈始〉争取广大群众的工作，七月底又被大破坏(省委以至特委及重要县委)，现在方在恢复关系中。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再则浏阳平江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始终未被摧残下去。

中央回国后三个月中，各部各委组织已渐次建立起来。政治上已有五次通告，主要的是指示争取群众的策略和方法，纠正同志中各种或左或右的倾向。中央发了告同志书指出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积极的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唤起全体同志团结于六次大会精神之下。此外组织，职工，宣传工作，士兵运动，济难工作，秋收斗争，年关斗争，都有极详细的通告。中央理论机关报(布报)已出一期，鼓动报(《红旗》)已出二期，党内训练教育刊物正在编辑，宣传部对各省宣传鼓动工作，依据实际材料，不断的给以指导。工委正在准备召集全总扩大会议。中央回国已与江苏省委及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直隶，河南，浙江，满洲，山西，广西，福建等省委代表讨论过各省工作计划。对于全国工作的布置特别注意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青岛，满洲等产业中心尽可能予以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中央首先派人巡视顺直和广东，现在已开〈始〉上海巡视工作，中央委员及健全工作人员都参加重要支部，中央对重要省份的指导，尽可能实行巡视制度。各省代表会渐次召集，重要省份

中央派人出席指导。中央准备于今年内召集中央全体集〔会〕议。

（这一报告是很简略的，但已包括有各种事实，下月当有一系统的分类的长篇报告寄上）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29年2月8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过你们的政治局底报告与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按即一号至十五号——译者),以及各地党部工作报告等材料之后,我们感觉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局势之变迁,所决定的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批准过的新策略,在根本上新中央虽能运用遵行,但是全党整个的执行程度仍然非常薄弱。譬如从你们的报告与通讯中,可以看出,在党内仍在有普遍的散漫与无组织的现象,这对于党的工作发展大有妨碍。因此必须很快的使全党对于党的路线有清晰的了解,在最短期内克服这种现象,并须以伟大的贯彻精神与坚决的态度,鼓励全党党员群众,完成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

现在的危险,我们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很深刻指明,就是有一部分的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期受党指导而同情于党的工人对于革命的前途是很怀疑的。在现在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这种危险非常严重。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发生的消沉与犹豫的心理,是过去得很漫〔慢〕。因为反革命进攻的结果——对于党的组织与黄色工会的打击,在许多懦弱的人们中很容易发生超过实际情形以外的悲观,甚至于以为革命运动已经完失望而消灭。另一方面,在国内战争停止之后,全国一部分经济的活跃,造成了发生幻想之相当的基础,以为在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健壮”,开辟了中国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新

的革命高潮将不会发生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延长到遥遥所期。

这种观点，对于现在的环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知道促成革命高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统治阶级绝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观点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肯定的，他不仅只有理论上的根据，而且在详细的研究了最近一年内的事变之后，已经找着了许多具体的证明。

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可以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平的解放出来。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大家又公认中国某种的形式上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实际上是搪塞了“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的口号，而把中国束缚得更紧。特别英国在南部日本在北部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由这些事实上来看，如其说，以“外交方法”来乌托邦式的解放中国，不如说是在瓜分中国以准备着与此相密切联系的前途——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互斗。

自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是巩固的，而且也不会巩固。这里首先就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假使没有这一竞争，则日本在自己积极用兵于中国北方的时候，绝不至于半途动摇，而且英国（其他各国也是一样）也绝对不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与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不应当夸大这种事实的意义。

在中央第六十五号（第三号——译者）通告上，认为美国与英日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冲突，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英日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应用这种政策的方法。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原则，绝不是使中国有脱离殖民地的政策，这

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这种假面具可以帮助遮饰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为在现在的客观条件之下,美国需要应用比较英日不同的帝国主义的策略。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将政策的重心用在取得经济的统治权以及在财政与外交上制服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希望他只是友谊的态度而没有地盘的及势力范围的侵略,不象英日在中国用强迫的方法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能力进行一种独立的民族政策,他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主要的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取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机会,但这是一个空想。事实上除了在某一时期适合于某一大帝国主义(现在如美国)的利益以外,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新的“权利”。只就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南京政府所公布的关税细则看来,就可以知道南京政府不能够得着比这更大形式上的权利,帝国主义所承认的关税自主非常微弱。这种的关税税则仅只能相当的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而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软弱,在这一税则上得出了很明显的反映。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绝不反对中国有相当巩固的中央政府,反而要希望一切过去的及将来的借债都有保证。每一个关于保证债务的条约,都要促成中国更深入于殖民地的束缚。

去年一年中国的一切经济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在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可能的。因此,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将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独立的民族利益。假使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叛

变革命以后，已经买办化了，完全继续着以前的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但是这一政纲的本身，是一种经常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实际要使民族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相互的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现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民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与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使这些群众脱离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揭破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作用，指明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之表面的反对态度，来掩饰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使中国走到更陷入殖民地的奴隶地位。

无论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完全解放或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实现，对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政府，都是不能实现，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利益的任务。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仅只是口头上是一个全中国的政权，事实上并未曾统一全中国，而且不能统一全中国。不仅满洲，并且许多西南各省的政权，事实上是离开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国民党的军阀独立的管理他所统治的省区，差下多与旧式的督军一样，在全国经济不统一的状态中，这种军阀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应当注意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后面都隐藏着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希望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他们在将来的国内战争之中成为自己现成的工具，这样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掌上的玩物，

而预先执行他们的计划。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不仅是反映着中国各派军阀之历来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并且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参加这一统治联盟在此联盟之中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的斗争，但是若是夸大了这种现象的意义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力，那便是错误。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之中，曾有一处表现这种夸大，那里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样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也说资产阶级（并说到商业资产阶级）预备着“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没有愿心去这样做。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震动及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了的，确使当时阶级的矛盾，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斗争，走到最紧张的时候，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变表露出资产阶级最后的转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向帝国主义投降，放弃了彻底的肃清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国统一与解放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间的三大问题，只有革命高潮与工农专政的政府能够做到。至于现在的环境，则是农业危机的逐渐紧张，农民的状况日趋贫困，许多区域（山东，直隶，山西，甘肃等）的饥荒，据报告有两千万的饥民，不能说这种灾荒是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农村经济的崩溃有很密切的联系。中国农村经济需要改良灌溉耕种及整理水利等等，但是农民在地主高利贷及军阀无限制的掠夺之下，甚至于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使单纯的再生产也不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使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就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剩余土地的关系，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对富农与佃农的让步也是不可能，就是小的改良仍然没有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规定的减租，仍然被反动势力战胜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的密切

联系，使资产阶级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出〔人〕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就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去实行农村的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组的国民党政府来实行改良，更是没有希望的事。

因此，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这是很显明的事实。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不可免的走到新的革命恐慌〔慌〕的过程，而且比较以前更广大深入。

在每一时期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与正确的分析向党员〔的〕群众及一切革命的工人经常的解释这种过程及其前途。对此必须特别注意根据具体的观察去说明新的革命高涨发展的速度问题。

很明显的，关于这个（发展速度）问题，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已经给了答复，我们现在也只有很少的补充。六次大会说：“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并且说：“不可以过份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虽然在许多区域中发生了群众自发的斗争，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有了相当的转变，消沉的情绪已经开始转变到复兴的状态，但是这种估计，一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他的正确。

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一种倾向，以为高潮是一个“短的前途”（这可以说是革命的急性病），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也未完全脱离这种心理，因此有许多地方发现着夸大了反革命内部的分离矛盾的紧张。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按即第三号通告——译者）上，我们看出了这种意思，说：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政府更快的走向完全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结论是表现着相当的过于性急，我们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半年中间是“很动摇”，应当承认新的革命高涨的成熟还是走

得很慢。

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是会使革命的高涨牵延到很长的时期，这是同样不正确。一般的说来，理论上自然不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若以为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没有严重的经济组织的动摇（农村经济的危机，饥荒，个别民族工业的危机），没有帝国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没有军阀间的武装战争，没有无产阶级更大的斗争，没有乡村的农民暴动——以为这样，便是很大的错误。在这许多的危机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他们彼此正在互相斗争的派别可以暂时作更可耻的更卑鄙的结合，以延长他〈们〉的命运，但是因为他们每次的结合与妥协，都是要加重劳苦群众的负担，这自然要引起劳苦群众的反抗，这就造成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

共产党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不应当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的极端为出发点，而必须常常对于环境加以正确的明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现在是准备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应当使党的本身以及广大的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准备着将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革命的工农德谟克拉西的专政，假使共产党不预先整顿自己的队伍，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就是发生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客观的条件，来取得革命的胜利。

策略问题与党的最近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还未能很充分的使自己的革命工

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党很大的缺点。

中国党是革命高涨之中产生而发展的，他的斗争经验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及公开工作条件之下取得的，他并没有准备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秘密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进攻已经使他走到组织很涣散的地步，使他现在遇着非常大的困难，干部中之知识分子的过多，绝不能减轻他在工作中的困难，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能正确执行日常的革命工作，许多绝不是很坏的同志完全成了消极的状态。还有在中央的一次通告上所說的“等待”，如象许多等待军阀战争（蒋桂战争），以为战争可以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另外还有人等待着，国民党实行民主，以得着公开工作的条件。过去之“左倾”与右倾的残余与现在这种情势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都是过去的残余在新的形势上的表现。党应当很明显的认识，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危险。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中央在第六十九号通告之中曾指出过，是很正确的。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是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工作的可能，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假使只注意到这种策略的一方面，则只是指出了这一方面利益。但是，这种观点表面上是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新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会是放弃了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的任务。要使我们的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绝不是放弃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任务，他只是说在新的条件之下，为实现旧的基本的口号与任务起见，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这一口号只应当这样去了解。但是有许多公开主义者，得着相反的观点，他们为着不放过公开工作的机会，所以提议降低党的口号，以为这样不惊动政府，而避免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干涉。照这些人的意见，参加公开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实际上是作改良主义者的工作，于是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便变成了对于合法条件的屈服。拿这种公开

工作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相对照起来，则这种公关〔开〕工作绝不能使我们得着工作的成绩。合法主义者将要认为秘密条件下的共产党，一切原则上的批评是在实际条件下的不可能武断办法，而且中央的通告是不合于实际工作，障碍着工作进行。因此，这种合法主义在最后就形成了取消派的倾向，这是与共产主义的指导与共产党处于相反地位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国党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与威信，以及他的领导的影响，合法倾向在始而不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阻碍这种工作的进行，最后会走到与这种路线完全相反的地步。

现在中国革命中右倾的危险特别严重，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因为如此，所以一而对共产党（员）们屠杀政策，同时继续进行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如）南京政府立法院与上海社会局所公布的一些条例。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这种空想对群众的影响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为他在口号上与实际上的区别是非常显明。但是在相当的时期之内，他可以对群众发生影响，我们不能轻视这种危险。在现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国民党人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工具，利用一切统治阶级的权，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保持着一部分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假使在共产党员中（无论怎样少），对于国民党还有妥协的与尾巴主义的政策，那么，就可以知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劳动群众中间，自然更没有肃清对于国民党政策的幻想。

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的政策之假面具，发动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准备群众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就

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忽略这种任务，就是以上所说的右倾危险，应当有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完成，并不是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派别。党员在现在是有了个别的右倾的错误与动摇，党若不用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干涉他的发展，则他将成为很大的危险。去年一年中许多党员脱离党的现象（甚至于向国民党政府自首），这就是党内右派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在党外职工运动中将更有力量。无论在党内或是群众中，只要那里表现着有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都要用坚决的彻底的手段来反对他。这种工作，特别要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如象现在还有从左面批评国民党的第三党谭平山等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在中国党中央的一切通告中，我们没有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没有看见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

中国党六次大会坚决的号召全党起来纠正“左倾”的危险（盲动主义，军事投机，个人恐怖等）以及所谓国民党式对待群众的方法（命令主义）。因为客观条件的变更，盲动主义及军事投机的危险，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是假使以为“左倾”错误的残余已经完全肃清，这便错误的。在去年夏天中央所发的六十一号通告中，还写了许多盲动主义的计划，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准备着军事行动，还说首先要打倒最反动的桂系，又六十一及六十三号通告中还可以看见以许多“左倾”的话头，来代替实际的革命行动，如“杀死一切豪绅地主！”“消灭一切封建势力！”等等的口号。甚至最近一次中央所发出关于的年关（十二月到一月内）期内地方党部工作的七十一号通告中，我们还看见对农村工作有这样的号召：“都到豪绅地主家里去过新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以这种空自夸大的高调，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样决不能巩固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适得其反

的要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示与群众的隔离。六次大会说左倾是“不愿意进行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不承认部分要求争斗的必要”这种左倾的病态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不明了工会工作伟大革命意义；不知道正确的去利用公开可能；和不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等等的现象，正因为不会照着革命的原则去运用争斗的公开形式与方法，以为在运用这些公开形式与方法中，必将发生右倾危险与公开主义的幻想而裹足不前。

对于不觉悟或者半觉悟及动摇群众的革命教育和说服工作，本来是一种极难的艺术，若不从实际工作中去求了解就不会正确的明了这种意义与必要，因此现时中国党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其革命化，不了解这一任务而事实上仍沉溺于“左”的病态中，这种形式就等于怠工。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是完全正确的接受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关于获得群众的决议，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在认真的去执行。此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左倾”危险，党应当无条件的彻底的肃清。发展在劳动群众中工作的时候，党要特别注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性，因此，中国党要特别注意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特别指出本党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轻视反帝运动，及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了解我们参加这种运动决不是帮助国民党之反对派式的把戏。我们的参加是要使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之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中央在最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部分要求，他可以称为最近党一切日常活动的主要政纲。为揭破国民党的这种假民权主义的政策，唯一的动员群众与反对国民党，这些工农群众一切政治自由（自由集会出版等）的要求，将比以前有更大的意义。但是每个环

境中应当注意日常口号与党的基本口号正确的联系，中央通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时常是正确的。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日常斗争的口号，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党的基本的口号，这都不适合于党的斗争的利益。

有时候党的主要宣传口号很机械的与日常斗争的口号摆在一起，如有时写许多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同时又写一些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这只能加增群众心理中的糊涂。

在现在一切日常的斗争中我们注意策略路线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的准备我们党以及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时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根据这种观点使着这类部分要求（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武装，加紧在铁路工人及兵士中的工作等等），在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意义，党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罢工运动，农民运动，反帝的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应当是向着实现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庶可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结合城市与乡村广大劳苦群众都绕围着在工人阶级的周围，以保障着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并认真的组织群众。准备在某一适当的环境中来实现总的革命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斗争的方式，可以征集全国革命力量于无产阶级周围，于中国革命中将有极重大的作用。

工会工作

所有的党员都应当知道若是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握着领导地位，要使同志知道若是党现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及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在将来激烈的

阶级战争中，有更巩固的力量。

在六次大会前中国党的中央曾经指出革命工会自武汉失败以后，曾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到八十一个，当时中央说黄色工会有四十个，并且还有六十四个没有群众的，从这次通告之后，革命工会的环境自然是继续的恶劣，国民党工会继续增长，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假使我们承认在中国的条件之下，不允许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有广大的稳固的基础，那我们对于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估量就有极大的错误。事实上这类黄色工会是中国工运中革命发展的有力障碍。经过这种工会，反革命统治的政党，企图在工人运动中造成自己政权的巩固的基础。使他们的代理人包办工会中的领导，而有时用恐怖的手段，破坏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会，对付这种国民党式的法西斯蒂，共产党应用尽各种方法在工会外或工会内进行积极的有系统的反对他的斗争。

在现时环境之下，我们应当努力恢复并强固革命的阶级工会，在这不公开状况中，自然要使我们的工会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一面应当为我们秘密的工会找着公开的遮饰；一面加紧秘密工会的组织工作，使其强固而争得半公开的存在。在产业中应当进行反对压迫与限制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工会巩固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各个产业上，要受着党的支部的指导，可是我们的“党团”（甚至在赤色工会中）——在大企业中革命工会已有强固基础的地方，应当利用时机直接取得事实上的公开。最好的机会自然是当着革命分子领导罢工而得着胜利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许多公开的社会团体，如兄弟团，同乡会等（可组这类性质而名义不同的组织）的组织可以作为赤色工会的公开掩饰的工具。此外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是发展公开及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是非常错误的说法。不要忘记除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有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钻进国民党的群众工会中，而引导群众脱离黄色领袖的

影响。共产党员以及其他的觉悟的革命工人，无疑的应即加入黄色工会而进行反对国民党代办人的斗争，必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夺取这些组织中工人的大多数，以及使他们团结于秘密的共产（党）支部的周围。在工人罢工及一切的斗争中，必要揭破黄色领袖一切妥协的卖阶级的面具。必要要求工会内部实现充分民主化的方法，由大多数人自由选举自己相信的代表来参加工会的指导机关。应当坚决的反对“被选举的人一定要是国民党员”的条件，这样才能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使工人阶级明了国民党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反动势力。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工会系统而可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工会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宣传反对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反对亚姆斯丹国际，反对日本的改良主义者，苏德走狗，布基等所召集的亚细亚劳动会议。

在反对工会法西斯蒂主义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及巩固革命工会运动的斗争中，在这时期中罢工有很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及选择罢工时间的时候，应当正确的估计到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直接指导罢工的罢工委员会，应该完全离开黄色工会而独立，应当是在罢工开始的时候，便由当场的工人中直接选举出来。并且在选举的时候，应当预先在那个企业的工人中进行充分的宣传，指导罢工的工作，应当与当地的或最近的党部建立很好的秘密联系，在罢工工人每一个全体大会或是代表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积极的出来表示积极的态度，向这些大多数同情罢工的工人讨论他们的重要问题与提议。

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积极的宣传时，应当注意破坏仲裁法庭的威信和国民党的调和，并且指出黄色领袖的作用，是资本家与政府的走狗。在罢工中应常提出所以发生罢工经济的或政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当是罢工工人自己所叫出来的，是他们自己所感觉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应当尽力使罢工委员会及工人的代表

机关，使为资产阶级政府承认是代表工人谈判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在这时候，假使这个企业中有国民党的工厂委员会，便应当乘机宣传改选。即是当着罢工已经完结的时候，也应当使罢工委员会不立即解散，应当尽可能的使他事实上变成工厂委员会（或者需要改选他的成份）。

关于党之组织及思想的巩固

照中央的材料来看，党之组织之状况，可以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中央第六十九号通告说：“城市支部大部分都是散漫的，许多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找不着党，因此相续不断的都脱离了我们的组织，大多数的活动分子，都没有职业，脱离了群众，依党为生活”。照政治局的报告说全党的工人党员最高限度不过四千（其中上海占一三〇〇，香港占六〇〇，其他的大城市中更非常之少）。在大多数的城市中，甚至于在最大的工人中心如武汉，天津，广州，“什么工作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六十九号组织问题的通告上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指出首先要注意工业中心重要城市的工作，要注意重要的产业工人，要吸收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号召没有职业的失业党员到工厂中去，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健全地方党部，改良指导机关的工作等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中央所提出的这些指示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在中央所指出的这许多任务中，有两点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想特别指出这两点的重要。

第一、建设生产支部和其工作。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生产支部，他是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有领导的作用。生产支部的数目已经很少，并且还逐渐减少，在大而重要的产业，简直没有支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譬如在上海那里最多的是手工业

支部，店员支部，所谓产业支部，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完全没有”。支部内部生活在现在非常之薄弱，大多数的支部，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实际问题，没有集体的讨论，也没有支部内部的分工。在这种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是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又不能训练自己的党员（有时候说勇敢的工人入党以后反变成怯懦的了）。因此现在的任务，要用尽一切力量，坚决的去恢复产业支部中的支部生活。没有这个党是不能前进的，不是这样，党便会腐化，因为这样可以消灭自己之生存的一切的组织基础。对于这部分工作，在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集有极丰富的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学习这些经验，并正确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去应用，只有从建立这些积极的有能力的，虽然是小的秘密的产业支部才可以造成党可靠的基础。

第二个任务是加强全党之理论上的武装。这里首先就需要严重的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应当知道不仅在党的指导中间，并且在一切宣传煽动的人材中，若是没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的预备，则党员群众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在将来形势转变，政治问题复杂，对于党对于革命进程都有严重意义的时候，党一定不能正确的应用适合于环境的策略。因此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在现在特别要使全体党员认识国际的纲领，六次国际大会的决议，中国党大会的决议。忍性的，细心的，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在现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应当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方法。等于政治洗刷式的开除党籍，仅止是在他实际上屡次不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才能应用。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中对于这一种方法不能广大的运用。

六次大会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指示，中央以及一切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的去执行，只要是秘密条件下是可能的（譬如选

举制便不能在所有的党部都实现),在党内民主的口号之下不应当发展派别的意气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不幸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不少,党应当用尽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是说服的方法来肃清这种现象。全党的义务,要不动摇党的一致,党的纪律以及指导机关的威信,应当反对一切同志之破坏党之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努力党的巩固,应当知道没有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绝对谈不上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各省各地的活动分子都有机会来了解认识这一封信。

(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认为还有他的重要意义,这一封信上并没有说到。关于这个问题,在最近再给你们专门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九,二,八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共产国际十周年纪念宣言

(1929年3月2日)

各国的无产阶级！

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弟兄们！

十年之前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共产国际就诞生了。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果，使欧洲变成了余烬废墟。几百万人被杀，几百万人受伤，在战争的恐怖与毁灭之中奔跑的士兵们，回到家里来饿得冻得而且病得筋疲力竭，无数的人已经残废了。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剥削的群众都注意那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诞生于十月革命的暴风雨之中的国家。

俄国的工人是第一次做给全世界看，工人应当怎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伟大的十月革命把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割断，而且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成俄罗斯的国内战争，推翻了资本主义政权，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革命运动的广大浪潮翻腾起来，波及全世界。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被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都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人，反抗那些造成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凶手。

当时世界无产阶级的弱点是：在苏俄的边境之外，并没有有组织有经验的共产党。只有共产青年的组织在当时与资产阶级同盟之坚固的社会民主党斗争。在革命的危机到来时，这些社会民主党都急忙去帮助垂死的资本主义，并自告奋勇做资产阶级的走狗，为的是用武装的力量压服革命的工人。

共产国际的建立，为的是组织并领导工人及被压迫的群众，做

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为的是消灭社会民主党，为的是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在世界十月革命旗帜之下，达到最后的胜利。根据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训，共产国际做了马克思所手创第一国际的历史的承继者，因此也继承了大战前第二国际最好的精神。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造下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基础。第二国际在战前时期中，为扩大工人阶级运动与群众组织，也建立了一个根基。第三国际继续着第一国际工作，采取了第二国际最好的精神，而同时极力反对他的机会主义，便开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共产国际建立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之空前的英勇的斗争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全世界的剥削者压迫者都极其愤恨的反对共产国际。在他们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采用了而且仍旧采用着最野蛮最横暴的手段。资产阶级在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任何方法都用到了。法西斯蒂的恐怖，白色恐怖，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反对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之光荣和权力的赞美诗，反对苏联以及反对共产党的毁谤，造谣和咒骂——这一切手段，资产阶级都用过了，而且仍然用来反对革命运动。

但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手段都证明是白费了。共产国际，不拘有何困难，仍然继续发展，并且更加获得了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同情。

过去十年已经揭穿了并且毁灭了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帝国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都对全世界说：这次战争是消灭战争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就可以实现焕然一新的资本主义，实现一个永久和平四海一家的时代。但是，实际上，这个消灭战争的战争告诉我们说，旧的矛盾比从前更加紧张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愈发增大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正在聚集，特别是关于英美帝国主义争世界霸权的斗争。军备

比从前更加增多，在后台上外交家正在进行新的政治军事协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也正在发展。失业的人数激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加紧。苏联更在发展，巩固，并且动摇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无论是国际联盟或社会民主党之骗人的和平主义的宣传，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或改良主义者之建立产业和平的企图，都不能消灭正在增长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正在走近于一个新的世界大战，这大战结果就必使资本主义遭受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帝国主义的战线破裂，与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向苏联的进攻干涉，就要给资本主义制度以一个最后的打击。

资产阶级在他反对日见发展的革命危机的斗争中，已经在社会民主党身上找到了忠实的同盟者。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党，负着维持并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这种事实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毫无疑问的证实了。在外交上，社会民主党玩弄和平主义的字眼儿，但在实际上，他很努力的帮助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帮助组织队伍反对第一个工人的国家。在国内，社会民主党帮助资本主义实行合理化，增加对工人阶级的束缚。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出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的进步的过程，而且看出工人群众中日益显明左倾的过程，以及对共产国际之日益倾向的过程。共产国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表，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做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唯一力量。

共产国际是在反对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诞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也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发展并且巩固了。在这种斗争的火焰中，共产党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群众的党，联合于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党之内。

共产国际不但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发展了，健强了，而且在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动摇与盲动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公开的机会主义的右倾的斗争中，在反对左倾，掩藏在革命的字眼

儿之下的机会主义的左倾的斗争中，也是发展了，健强了。共产国际过去十年党内发展的历史，是肃清党内不正确的倾向与调和的倾向的历史。过去十年已经表明，反对这些倾向，特别是反对现时期主要危险的右倾之有系统的斗争，是使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绝对必要的方法。没有这种布尔塞维克化，共产党就不能铲除社会民主党的遗毒，就不能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党员，而且也不能产生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党的领袖，足以准备群众做革命的斗争，并领导他们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共产国际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加紧，新的革命时期的条件聚集之时，庆祝他的十周年纪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群众正在从防御的战线，走向进攻的形势。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新的革命斗争的高潮正在起来。在苏联国内，工人阶级得到了乡村贫民的拥护以及与广大的劳苦农民群众同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斗争，与苏联国内资本主义的成份斗争。世界革命的力量日见增长。共产国际号召各国的工人以及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团集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为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们，劳动妇女们！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抢夺了你们的力量，剥削了你们肌肉和你们的神经。资本主义更加把你们变成了他的机器中的一个轮，或一条带。他吸吮了你们的血，吸干了之后，便把你们无数的人抛掷到街上。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严密你们的队伍，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联合一致做革命的斗争！

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人们！世界资本主义仍然继续他野蛮的剥削压迫的政策。他把你们的血，你们的汗，变成了金钱。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就是你们得解放的时候！加强你们民族的革命斗争！拥护共产国际鲜红的旗帜！

苏联的工人们，劳动妇女们！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继续着

干！记着，每一个新的商店，每一个新的工厂，每一种新的苏维埃企业，每一种新的集体的企业，以及合作社的每一步新的发展，都证明是苏联的巩固，（这国家是建筑在你们和你们的同志的英勇的牺牲之上的）也都证明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巩固。

工人们，劳动妇女们！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记着，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准备一个反革命的队伍，反对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的祖国。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在现在仍然准备战争的，而社会民主党却空口说白话，要麻醉你们，使你们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的心愿，不要信这群骗子的话呵。要准备你们自己，把进攻苏联的反革命的战争变做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变做反对你们国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全世界的工人们！被压迫的人们！共产国际号召你们，联合起来一致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铁腕，反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干涉，反对和平主义的谎话，反对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的狼狈为奸，赞助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做反对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的斗争，做反对改良主义反对法西斯蒂的斗争，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世界共产主义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日莫斯科

（摘自《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

(1929年5月15日)

I、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一、国际二月八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他一方面证明中央半年来关于政治原则及斗争策略的指示和决定在根本上完全正确,另一方面更将中央对于政治上各种分析的缺点指出,这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二、依据国际的分析观察中国现实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日益加强;不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的发展,便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甚至其所号召承认的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也都是形式上公认中国某种主权,实际上则是加紧中国一层束缚,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的(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所统治的)过程。在这殖民地化的瓜分政策下,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正在加紧军阀战争的制造,与联系到世界大战的准备,所以他们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能巩固,主要的是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而都是一样地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然不应夸大这

一竞争的意义甚至以为美帝（国）主义会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美国会永远以和平侵略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不明了帝国主义本质的妄谈。或者更推论到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故美帝国主义用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以达到统治中国的欺骗政策在群众中实散布了一些幻想，因此，我们应对群众指出无论任何帝国主义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其目的都是一样地加紧对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和破坏中国的独立。

三、中国资产阶级自从背叛革命之后，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了。虽然因着生产力的推进，表现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发展矛盾，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政纲，但当着这种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妥协帝国主义，一步步地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故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便是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也就是阻碍为中国独立斗争的政纲，他实具有十足的反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在帝国主义竞争或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取得民族资本独立发展的幻想，正是改组派的理论根据。其实关税增加只能相当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用做战争的军费，美国借款即使实现也是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好便于外货商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固然客观上在将来是要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发展的，但他的发展前途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并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他更要加紧对农民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故他同样不能施行农村的改良，甚至连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最后一次的撕破。自然这决不是说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与封建制度的剥削关系会没有矛盾存在，而是说在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之下不但改良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

问题，便连小小的改良，中国资产阶级也很难求得地主的让步，所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在反动的联盟中进行夺取阶级领导的斗争是一显明的事实，但我们不应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认清无论封建半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都是一样不能统一中国不能使中国解放的。如认中国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封建势力的能力和愿心，更是足以助长右倾观念发展的极大错误。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又与各个帝国主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同样又因其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故使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与地主性，使他对于帝国主义或封建阶级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

四、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在现在的蒋桂战争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中，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固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固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但确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便是过去的军阀战争也同样含有相当的阶级矛盾在内），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亦不能有好长时期存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可避免的最高度的矛盾表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愈加紧，中国的工农劳苦民众的痛苦将愈加深。资本的进攻农村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灾荒的流行，在中国已经不是一时的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农村经济的崩溃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际的来信很明显地指出“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必不可免地走向新的革命恐慌的过程，而且比以前更广大更深入。”

五、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半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只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与工农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才能实现

这些任务，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工人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自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三月来将近二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纪念“五一”的盛举，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三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埃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的红军仍然在反动的统治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对于苛捐杂税的繁重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渐生不满，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在逐渐开展，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薄弱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便是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的确已争得了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自然还有许多错误）。香港从和平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发动和领导工人作小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地争得在群众斗争（中）的相当影响。这虽是极少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这几月来艰苦奋斗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很大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轻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潮〔潮〕是马上或很快地就要到来，很显然地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中央政治局更坚决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其进展，土

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必然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必又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这却是很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析方法，必须坚决地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I、党的最近基本任务与策略问题

六、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根据半年来党的工作经验，证明六次全国大会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路线与决议无疑地是正确适用，只是在执行的程度上还没见很大成效；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党内失败情绪与涣散状态之存在，无产阶级干部分子之缺乏，党没有充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以及党内不正确倾向之继续发生，这都是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极难苦耐心的工作精神才能战胜这些困难，故党在争取群众于党的周围之总路线下，应特别认清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发展群众斗争，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与威信及其在群众中的领导影响实是目前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七、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自从统治阶级以自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天地发展。在理论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中国资产阶级

可以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虽是很弱的）予以否认，甚至认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是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点上便是党内和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知识分子成分上，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而且目前已经开始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在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所不干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做去，不仅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阱。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

八、但仅仅站在党内去克服这一右倾危险是不够的，必须特别认清助长党内右倾思想发展的客观条件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统治阶级国民党除掉用屠杀政策外，还极力用一些改良欺骗的方法来扩大他在工农穷苦群众中的影响。虽然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很少发展可能，但资产阶级绝不会放弃一切民主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在社会上便要造成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以为

国民党还真要反对封建势力，还真要为争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幻想经过屡次的事实证明尤其是民众痛苦的日益加深，固不会长期存在，然在目前群众斗争中还存在许多弱点，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还薄弱的时期，他的影响的危险便不容忽视。最近半年来改组派的活跃（第三党的群众多跑向改组派方面），黄色工农会的增加，过去反日会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活动，都足以证明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并未减轻。且不仅群众，党内至今犹存在着在国民党下级党部做事，受国民党委派占领黄色工农会机关以至与改组派讲联合的等等现象，便可知改良主义影响与党内右倾思想有如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政策的假面具，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尤其是改组派以至第三党的欺骗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

九、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最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机会，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日益与群众隔离。故国际指出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实是现时党的第三个主要任务。不了解这一任务，便不能克服党内左倾危险的残余。

十、在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必不可分离地要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斗争农民争土地的斗争密接，但这是就中国革命任务的关系言，并不是说在工作上除了工人斗争农民斗争要一般的关联到反帝斗争外便没有了反帝的本身工作。恰恰相反，在过去

各大城市的反日运动客观上证明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确有发动的极大可能。只是党内存在着许多偏向如误解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以为工人斗争不起或是没有形式上的赤色工会加入反帝运动便不能树立起我们的影响，于是客观上便成为忽视反帝运动，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这需要党以极大努力领导群众加入并组织各种反帝运动，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工农劳苦群众之真正的反帝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十一、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已成为现时中国党的经常任务。在困难的工作环境下，极艰苦耐心地向前工作。在群众中很细心切实地提出各厂各业的部分的要求，做成目前党的经常工作的主要口号。但这些日常斗争的口号必须与党的基本口号有正确的联系，同时必须在日常斗争中解释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且不仅在宣传上便在实际斗争中也必须注意到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尽可能地准备我党以及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的任务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党应特别注意每个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都应当是向着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

十二、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雇农的分子必然是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农民对他们的阶级斗争。现时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

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党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现时存在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必须以党与工农群众为前提，必须与全国的劳动群众斗争联系起来，使他日益扩大和发展。红军的行动必须与军阀的土匪军队有根本的不同，他不应向农民派饷，不应向农民及当地穷苦民众征收捐税，必须做到使农民自愿地帮助红军并起来组织帮助红军的委员会。红军只应向豪绅地主派饷。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才能得到劳动群众的拥护，才能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

十三、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群众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去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崩溃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敲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的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

队的宣传，鼓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应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在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的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印度安南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党应一方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

十四、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青年与妇女亦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轻工业工人中，女工童工的激增，农村中青年农民斗争情绪之易于发动，农妇在农村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士兵群众中，青年士兵要占大多数，青年贫苦学生在革命斗争中，尤其在反帝与争民主自由的运动中还有他相当的作用，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不仅在工会农会以及一般城市贫民运动中，党应将各种斗争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并应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组织的周围。过去青年团在青年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软弱，妇女运动，尤其纺织女工运动一般的忽略，党应负相当的疏忽责任。

Ⅲ、职工会工作

十五、国际信中说，若是党现时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在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则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有巩固的力量。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的工作方针。现时各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但在这些斗争的统计中，

我党能起领导作用的居最少数，甚至有些党员虽处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但失败恐惧的情绪与新的策略的不了解和工作方法的缺乏常使他们表示出比群众还落后的态度。大产业中我们影响之少，赤色工会常常是退缩秘密到党的范围以内。这些都证明党在职工运动中，还没有树起他的中心工作，还没有能针对着统治阶级经过黄色工会扩大他影响造成他的基础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去建立我党的自己工作路线。虽然在过去半年上海香港北方的多次斗争中，党已学得不少在工人群众中如何争取自己地位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但还须认清职工运动是党的基本工作，应注意造成普及全党尤其产业中的这一工作路线。

十六、赤色工会是我们组织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在这非法的环境中，自然要使赤色工会的工作非常困难，但工人群众的斗争组织决不应安于秘密状态以与广大的群众隔离，故力争赤色工会公开和领导各种合法与半合法的（社会的相当容许的，并非以国民党登记的为标准）团体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线。不过赤色工会之公开存在与其他合法半合法团体在性质上的转变均须由斗争来争得来决定，他与公开主义合法运动没有一点联系。因畏惧这种左倾错误，便因噎废食的保持赤色工会单纯的秘密状态，不去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以发展工作，这很显然的是另一极端的左倾错误。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人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人组织，同时要尽量利用多少有点公开性和合法形式的群众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加重赤色工会的作用。但对于有封建性或半封建性的群众组织，我们只能利用加入的机会夺取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决不应保存或助长其组织上的封建习惯或性质。

十七、假使我们否认改良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我们便会对黄色工会的估量有极大错误，事实上，黄色工会在现在的确

已成为有群众的组织。因此，凡在黄色工会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工厂企业作坊之中，我们要有组织的加入黄色工会，进行反对国民党代理人的斗争，但不是做少数运动。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设法组织干部分子，其主要的工作应是：1. 形成强有力的工人党团；2. 综合工人的迫切要求，3. 将这些要求与揭露国民党及黄色领袖之欺骗政策联系起来，4. 要求黄色工会民主化（工会委员代表组长等由大会选举等等）。使群众赞助我们的政策，改变黄色工会，使之成为真正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工会。然当着我们在黄色工会已取得多数而仍不能推翻黄色领袖和改变整个工会性质的（时），即应将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多数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同时我们要在这些黄色组织中坚决的反对国际改良主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所施行的种种企图。

十八、在反对黄色领袖，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发展赤色工会影响的斗争中，群众的罢工，确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与选择罢工的时候，我们应估计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应尽可能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形势（即是直接选举代表，关车，关厂等等），在群众的拥护下，成立直接指挥罢工的机关以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

凡是遇到工人群众的罢工，尤其产业工人的罢工，党应动员所属地方的党员全体集中力量来参加指导和援助这一罢工，以影响其他产业与工人群众，因为这是党争得在群众中的地位的最好机会。指挥罢工的机关在罢工后应尽可能的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工厂委员会。不仅在罢工中，便在经常的小斗争中，也要设法取得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机会；同时必须注意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组织工厂委员会性质的工人组织。在工人运动中要使工农联合问题不仅得到宣传上的联系，并要与一切实际斗争密接起来。

IV、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

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极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上级组织有许多架空机关，巡视工作一般的缺乏，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在这些现象中的小小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中心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多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实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二十^①、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

^① 原文没有十九。编者注。

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生存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主义的倾向。对于不正确倾向，没有什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自然中央以及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

政治局为新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训令的时间虽然很短（仅只半年多），但已经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了。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的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

中 央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29年6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在上一次谈政治问题的信上，我们并没有说到农民问题，曾说关于农民问题需要写一封专门的信。经过一个时间，虽然我们已经有可能，经过相当的同志，在口头上传达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依然觉得口头的传达是不足的，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口头传达之外，实在还需要书面的形式。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必要写一封专门的信，就是到现在还有某几个负指导责任的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还犯有严重的错误。如象由我们最近所得关于中央工作的材料中(农民问题的通告，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和森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上的争论等等)，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党中仍然有许多同志，不能明了在现在环境中，党对农民问题所应采取的策略，不能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应当采取甚么样的态度。但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若没有正确的解决都可以引起非常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盼望你们很严重的再来讨论一次农民问题，同时注意到我们以下的意见。

在上一次的信上，我们分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便已指出了中国农村经济之正在增长的危机。帝国主义于中国之固有农产品(丝，茶等)的破坏，地主，军阀，高利贷对于农民之野蛮的剥夺，灌溉建设之绝对的没有，这些条件都逐渐的使农村经济

的生产力完全破坏，以造成非常广大的饥荒。农村经济之日趋严重的危机，一定要不断的更增加农村基本群众的痛苦，使他们不断的贫民化。中国的反动势力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过程，也没有能力削弱现在农村经济中的危机。很显明的，现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布满了一切封建关系的残余，这些东西阻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仅只有在彻底肃清各种封建残余的条件之下，才说得上农村生产力之真正的发展。同样更显明的，中国反动势力在这一方向上是不会有成效的。这个理由我们都很懂得。最大多数的中国资产阶级都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及一切封建式的剥夺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南京政府已经表示了他不能也不愿意甚至于半途的部分的去解决土地问题。

固然，南京政府现在也在预备一些农村的改良。以胡汉民为主席的委员会〔是〕正在进行这一件事。但无疑义的，这些改良将要使农村基本群众的生活更为恶化。很容易的可以预想到，正在起草的新的土地税则，将要使一切税务的重担都放到农村贫民（佃农及半佃农）上。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由政府估定价格以收买土地的提议，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剥夺小自耕农之一种新的武器。无论如何，国民党土地改良的草案，在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上说，还不会有俄国斯托雷平^①之土地改良的作用，他无论

① 斯托雷平是俄国地主的领袖，于一九〇五年俄国大革命以后，他提议了土地改良的计划，经俄国沙皇政府实行，这个土地改良政策的内容是将一部分地主阶级土地，尽量的转卖与农民（富农），另一方面创办农民银行帮助富农，以活动农村中的金融。这种改良方法的目的，是要收买一部分富农，破坏农村中之整个反地主的战线，同时用改良的和平方法使农村地主经济转变到资本主义，以根本消灭民权革命的过程。这种政策的结果，相当的在短时间以内，收买富农，缓和了革命前农村经济的危机，并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革命高潮延至七八年以后。但结果仍然又发生农村资本主义与地主经济的冲突，农民群众因斯托雷平政策而更加速度的破产仍然造成农村中新的革命高潮！——译者注

如何不会削弱农村经济的危机。假使他真的实现了，在改正土地税则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出，他只是一种使农民群众更加破产更加奴隶的工具。

对于一切稍有实际意义的土地改良在南京政府的计划中是不能的与不愿意的。因此，他的一切改良只是在淆乱中国农村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终是不能在现存制度之下得着解决的。一切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其结果都是对于这些绝无政治保障的农民，再加一层经济上的压迫。事实上现在中国反动统治的胜利，对于农民就是加增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一切新的负担（地主豪绅用以扩大武装），军事骚扰，残酷的压迫，“清乡”等等。国民党这些实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说不上缓和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在资产阶级地主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说不上可以缓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

农民群众之经济生活及政治地位的恶化，日趋扩大的农村经济的危机，必不可免的要加紧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一定要使农村基本群众及其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刻尖锐，这就是农民运动之新的高潮的前提，这就要鼓动农民组织的发展可以很快的使广大的农民群众都革命化。这种农民运动发展的前途，已经在现在中国各省之不断的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了。

甘肃回族的农民运动，就他所波及的范围来看，却已经表现有很大的意义。各处积极活动的有“红枪会”，“大刀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的秘密的团体。朱毛的游击队，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不独仍然保持〔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还得了相当的胜利。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其他各地也可以看见。甚至于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也看见了农民的暴动。虽然有很多的农民武装斗争是为反动分子所领导，但这决不应当因此而减少党对于他的积极注意。相反的，对于这种争土地反地主军阀的斗争，对于这种客观上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党应当坚决的为争取其领导而斗争。

我们指出以上的这些事实，并不是说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也不是说中国农民运动特别高涨。不是的，若这样说，是不与实际情形相合的。我们指出这些事实，只是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前面仍然有非常顺利的前途，以进行扩〔广〕大被压迫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党应当利用这些客观的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准备广大的革命高潮，以动员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指出国民党代表着地主的利益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饥饿，贫困，破产。

但是假使党对于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则党对于夺取农民群众的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就要提出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犯了实际的错误〔误〕。对富农的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讨论过。第六次大会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规定无产阶级策略是联合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富农不在内，因为富农在农民运动中时常表现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六次大会决定无产阶级农村中之巩固的基础是贫农，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在这里为什么要将富农与一般农民群众分开呢？许多中国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是仍然不能了解，仍然有人机械的去应用列宁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对农民的策略，而将富农看成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事实上列宁所规定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策略，对于中国也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联合富农。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从列宁所规定的策略中，也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在中国党的文件中都写得有联合富农。假使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国富农与俄国富农之不同的社会实质则尤其不能做出联合富农的结论。俄国富农在一九〇五

年革命失败以前，代表着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地主阶级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地主的经济势力完全建筑在封建剥夺上。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中国富农之这种社会实质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里，外国资本的统治自然有不少的作用。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殖民他〔地〕国家中，外国资本扶助与利用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关系，使这种东西服从他的统治。外国资本阻碍着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阻碍作用使农村中因商品货币经济而发生的阶级分化，表现着各种奇怪的形式就是由于保存着农村经济之半对〔封〕建式的关系。在这里再加中国土〔土〕地关系特点，使中国富农应用雇佣劳动所得利益反不如对农民群众用半封建式的剥夺。中国的富农，将土地出租兼放高利贷资本，在经营自己经济的时候，不愿将资本用在改良土壤及整顿水利上，他要使自己免除军阀战争及一切破坏的责任，不受饥荒的痛苦，将这些条件所造成的重担，一并放在佃农群众的肩背上。农村中之过剩的人口，大多数农民没有充分的土地，使富农以及一切地主，可以利用其资本与私有的土地，以施行野蛮的佃租与高利贷的掠夺。因此，进行自己的经济租取土地，努力生产而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在中国却〔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富农之另一种形式便是半地主。一部分中国同志对于列宁之联合整个农民的策略，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没有认识中国富农的特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可以使党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农民问题采取不正确的路线。这种错误尤其在现在有更大的意义，因为现在当革命失败以后，农村中的富农分子时常公开的站在反动势力方面而〔向〕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无疑义的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语句上并不十分明了与彻底，也给了这种不正确观点以相当的基础。在政治决议上曾说，当着这种斗争是淆乱农村中之农民群

众与地主阶级之基本矛盾的时候，不要加紧反对富农。这种断定之基本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他是说在中国农村中之中心的剥夺者以及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地主与军阀，我们党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要握住在这一阶段中之农村的主要冲突——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六次大会在最近阶段中所提出的要求不是平分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是，在政治决议上之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语句，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将其真正的意义表现出来，而反离开了原来的意义而变成了独立的口号，做成不正确的政治结论的基础。同时，可以使人在解释六次大会之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以为这是因为不要摇动富农的财产，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上还有更不彻底的语句，在那里说到反对反动势力的时候说是要使富农中立，甚至于说到对于还没有消失革命可能性的富农，要吸收他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争中，这些语句，都可以使人以机会主义的精神去了解六次大会决议以为必要联合富农。

不仅只是几个同志有这样的观点，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及文件中也可以看见，以为党应该将〔采〕取联合富农的政策。例如中共〔央〕给毛泽东的信上，我们看见这样的话：

“在总的策略上——反对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应当联合富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但是党绝不能因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便抛弃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上两段皆见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底致湘鄂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中央通讯》第三期第二集——译者注）

党的总路线明明是以贫农为基础而联合中农，在这里便以机

会主义的“联合富农”来代替了他。因此使一切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如和森及立三同志）都走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同志们不但没有改正六次大会决议上之语句上的不明了，反而在扩大这种错误，反而企图将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富农的论调给以理论上的充实（如引用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时期）。

这种错误特别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条件之下，有非常严重的危险。在施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农民运动正在发展的时候，在许多农民为反帝国主义一切反动势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在游击战争非常发展的时候，在还存在许多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时候，我们应当顾计，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及其富足的一部分，不能去促成更多的困难，应当承认在反帝国主义及反地主阶级的前面，使我们将与富农的冲突，不得不放到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我们一切革命的力量，首先应该集中起来以打击中国革命之最严重的根本的敌人。但是，即是说这个时候，若是富农已经出来与反动势力站在一起，则所谓“不要加紧反对富农”的说法，便会做成错误策略的来源。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

对于富农之不正确的策略，同时也就表示对贫农及雇农的策略不正确。很显明的，策略之总的路线是联合富农，则党决不能坚决的去组织农村工人，绝不能加紧他们的斗争，绝不能使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之最落后群众能提高他的阶级认识，但这部分群众正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基础。相反的，党只有坚决的防止一切关

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才能使农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能进行争取改善自己之经济的权利的地位，才能有胜利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

目前在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当着不少的富农已经被国民党利用以压迫农民运动的时候，这种畏惧是完全不正确的。

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要与我们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以夺取城市无产阶级的策略相适应，相配合。绝不是一开始农民运动便直接号召施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暴动等。相反的，现在中国客观环境，使党必然着重指导一切部分的小的斗争，扩大农民群众之日常的要求与斗争，反对一切的剥夺形式，使这种斗争的政治意义更加提高。为改良雇农的劳动条件的斗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资本，特别是抗租或减租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们斗争中〈的〉环练，党只有经过这种环练才能动员最大的数百万数十万的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而走到新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我们所向你们介绍这种策略路线，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这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一样的应用。对于他们，党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的活〈动〉受富农态度的支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于富农有任何的让步。即或富农还在参加反苛捐杂税及反军阀战争的运动，党对于这种富农仍然不能改变自己之一般的路线。党应当与他力争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了利用群众以扩大自己利益的可能。

农村无产阶级之组织，以及农村贫苦人民的联合，这是无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争取领导作用之必要条件。在雇农中间的工作，同样是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战士。雇农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不能也不应该离开了一般农民之争土地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这里不应当忘记，虽然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半地主时常是中国反动势力结成同盟以压迫农民运动，但无论如何国民党以及中国反动势力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依然是地主豪绅，这些是农村中的统治力量。因此，一方面要绝不掩饰农村无产阶级及富农之阶级之对立，不要糊模了他们这种觉悟；另一方面在雇农以及所有农民前面，要指明农村中之最中心之剥夺者是地主豪绅军阀以及站在他们上面的帝国主义，必要领导农民之部分的要求与斗争，使逐渐的觉悟到党的基本口号，同时必要解释国民党政策之反革命的实质。

无产阶级争取实现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领导，必须要坚决的为争取中农而斗争，使中农离开资产阶级及富农的影响，要在群众前面揭破各种各色（自蒋介石的以至谭平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指出他们是违反农村大多数基本群众之实际的利益。党应当找取一切的方法以巩固与中农的联合，吸收中农到积极的反军阀及反地主的斗争中。同时党应当加强雇（农）中间的工作，要注意有很多的中农群众有一个时期是出卖自己劳动力（所谓季候工人）而与雇农一样。

要使农民群众绕围着党的周围，绕围着党之一切基本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实际上解决农民群众组织问题的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农村无产阶级之独立的组织，同时要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以成为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之革命斗争的下层机关，以反对地主，高利贷，豪绅，富农等。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他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基本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群众之最近的

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之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的精力。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委员会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以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他们的群众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夺取在反动组织中之农民的重要工具。

我们再说到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必要指出，正确的在农村中工作的方向，需要很仔细的研究所有农村中的事实，所发生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还有许多为党的指导所不知道，不能在理论上去研究。这种现象不能使党的指导机关更具体去指导各地机关，也不能检阅自己的决议。

另一方面，党应当用很大的注意力以培养农民运动之专门的工作干部。照现在只是将城市中之一切不能〔没有〕工作的人员，知识分子送到乡村中，这是不能完成在农村中之巨大的任务的。在最近几个月内要加紧的准备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这是发展农民运动的实际步骤。

在最近短时间以内，党要派选能负责工作的同志去到回民暴动的区域，正在发展的回民暴动，党一点也没有注意，更说不上什么指导。在争取这些暴动的回族农民的斗争中，党首先应当认识这种运动之民族的性质。我们党对于这种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纲以及适当的斗争口号。在一切游击战争的区域，中央应当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根据六次大会的决议，加强对于他们的指导。

在发展农村工作中，党的最大的任务是要组织坚强的农村支部，以及在一切农民群众组织中之坚强的党团。最后，党应当特别注意农村手工业者，使他们尽量参加农村中之一般的革命斗争。在这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到农村妇女家庭手工业中的妇女。

在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富农的意见，可以〔能〕为一部分同志所曲解而做出不正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中国党六次大会关

于农村中之各个社会成分及我们对他的关系的决定，以及我们现在之反对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口号，决不动摇我们对于中国之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决不动摇我们承认现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矛盾（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推翻外国资本的统治，推翻军阀及统一全国）还没有解决，则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在中国革命将来高潮之第一个时期中一定仍然存在。但同时我们必要指出，在民权阶段中之无产阶级与农村贫民的联合，及无产阶级对整个农民之巩固的领导以及与其他条件的汇合必不可免的要促进革命转变的速度，使民权阶段可以很快的转入社会主义的阶段。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就是我们在这封信上想特别指出的。我们不怀疑的，中央一定能注意到我们的意见，改正党在农民问题中的路线，防止在这个问题中之机会主义的动摇，加紧在农村中的实际工作，利用现在农村中之一切顺利的工作条件，而保证着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队）的领导之下，促进全国扩〔广〕大的农民运动的高潮。

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部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 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1929年8月)

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过去一切决议案上通告上以及对各地的指导上所发生的语句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特通过下面的决议:

(一) 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

1.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方〔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

2. 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渐次打破中国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同时使广大农民群众急剧的破产。因此,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极大多数的农民沉沦到极贫苦的地位,同时也发生了极少的富有的分子(富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的剥削,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使中国农村经济,停留在半封建关系之下,极困难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3.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农村中发生广大的破产失业的群众,遂造成中国军阀军队的基础,帝国主义又利用军阀来统治中国,加以极力的维护,使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又恢复起来。于是军阀对于农村之各种各色的残酷的剥削,更加甚了农

村的穷困与荒废，因此军阀的剥削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最不能忍受的。

4. 中国土地的分配，各省的情形虽有不同，但是就全国讲，大部分的土地仍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同时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些中小地主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穷困，因此更残酷的加紧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并且地主愈小，剥削也愈加厉害。这样就使广大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更加尖锐，而积极的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所以中国的土地关系，在土地所有关系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森严（即是说富有的农民很易变为地主），但在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却非常尖锐。

5. 中国的乡村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手里，极力镇压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可以自由屠杀农民，抽收捐税等各种的特权，并且有他们专为镇压农民的武装（民团，保卫团……等），所以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时豪绅又为帝国主义在乡村中的买办，军阀的爪牙，常常还兼是高利贷者，所以中国农民反对豪绅的斗争更特别的厉害。

6. 中国乡村中的自然经济日益打破，贷〔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广大农民群众需要金钱日多，于是发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且这种剥削常常是极残酷的。在农村中高利贷与商业资本虽然与帝国主义城市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但是直接经营者还是豪绅地主与富农，绝少专营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人。所以农民群众反高利贷的斗争，常常与反地主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块。

7.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掠，阻碍着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日益残酷，高利贷的利息日益提高，于是使中国农民中的富有阶级，觉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利益还不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所得的利益多。所以富农有了资本便买土地出租，和投在

高利债上去，而不愿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这样，就造成中国富农之兼具半地主半封建性。

8. 经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把农村中最贫苦的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主要在南方各省；这样，一方面使土地革命的斗争，益加激烈，同时也就促进了农民中的阶级矛盾（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

9. 在中国北方各省（如河南，山东，顺直，山西等）土地关系与农村经济还有他的不同特点：第一，土地分配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比较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比较多，所以自耕农比较多，佃农比较少。第二，这些省份工商业不如南方这样发展，因此军阀的剥削大部分都是出自土地，于是军阀是经济上的大地主的意义更加明显，所以北方反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因此，农民群众与军阀大地主对抗的形势异常尖锐，而农民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南方这样激烈，所以现在北方的农民斗争，虽在全国土地革命的波浪之中，但还停留在土地革命的初期。

10. 满洲的农村经济在全国中具有稍异的形式。满洲除掉与北方农村中具有同样的自耕农较多的条件外，富农经济已渐发展，而“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亦渐渐向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进行，于是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农业公司已渐渐出现。但这种农业经济，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居多（即仍旧采用出租制度），且还遇着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如东三省的大小军阀多兼营地主经济，他们剥削而来的金钱大多用在扩充军队，以备争夺关内地盘上头，很少有余资投在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增高上头，且因其城市剥削的不足，必然要增加苛捐杂税及于乡村的自耕农，而军阀的地主经济亦遂多用租田制度以剥削佃农。因此，满洲农业的资本的发展仍然是非常之慢。南满一部分小农的破产与关内破产失业的农民不断的移到满洲去当佃农雇农之生活

的痛苦，都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动力。故满洲的反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地主的封建剥削，及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有相互关联而成为同等重要的斗争。还有一点，南满一带有日本资本投在农业上，组成很多的农业公司，如南满铁路会社，满洲棉业会社，关东厅等经营的烟草棉花等农场，以及其他方式的经营，而中国的富农经济亦多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所以满洲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亦必然要紧靠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上面这些农村关系的特点，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1. 目前中国农村中一般的主要矛盾，是反军阀地主豪绅之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并且这一矛盾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还是日益尖锐的形势。

2. 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

3. 农民中的阶级分化，已经日益显明，尤其是经过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地方，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已经日益激烈起来。

4. 托洛斯基主义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主要的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于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色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从上面分析的现在农村中经济关系的特点看来，充分证明是一种无稽之谈，这就是他们走上了取消主义的根本原因。

（二）现在中国农村斗争的情形

1.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的农民群众，虽然受到军阀豪绅地主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但土地革命的斗争，不只是没有消灭，而且是继续发展。农民的自发暴动，游击战争，从未停止，北方反军阀的群众斗争与南方各地红军活动的扩大，充

分证明农村中土地革命斗争尖锐的形势。

2. 国民党曾企图以各种改良的方法（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来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如各省正式宣布取消二五减租，百分之一的田赋政策一点没有实行）。这是由于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同时中小地主占优势，只有加紧榨取农民，以更残酷的方法来镇压农民的反抗，才能维持自己的崩溃，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这种改良的办法。因此，国民党这种改良的办法始终是一种企图，决不能解决农村中的矛盾与经济危机。这样就使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始终是建立在地主豪绅上，同时正因为他的阶级基础是地主豪绅，更不能实行任何改良的办法。

3. 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但是他极力想夺取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尤其在斗争失败的时候，便很快的走到反革命方面去；如鄂西富农实行对雇农的抵制，闽西暴动危急的时候，富农是首先主张调和者，平浏赣西富农首先“反水”都充分证明富农的动摇与反革命性。

4. 雇农要求改良劳动条件之反富农的斗争，在各省都已渐次发展起来。

5. 北方农民斗争还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形势〔式〕之中，广大农民的组织还多半是一种半封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斗争的主要内容反对军阀苛捐杂税等一切残酷剥削，斗争的领导还攥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手里。农民的阶级斗争，还不激烈，因此，斗争的形势便更易为中小地主与富农的领导而走人与军阀大地主妥协的道路出卖广大农民。同时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各派便看中了这一必然妥协的力量，常常勾结他们与另一派军阀冲突，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使农民解放的运动归于失败。又一年来西北的大灾荒，更加推动农民斗争激烈起来，因此遂发生陕甘等回民的大暴

动。

(三) 党在目前农村斗争中主要的任务与策略

1. 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彻底完成土地革命，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了〕乡村中之封建基础。

2. 完成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因为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帝国主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要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3. 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与他对农民的改良欺骗。因此对于现在资产阶级任何一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在农民群众中攻击他们的欺骗。

4. 因此，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

5. 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

6. 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虽还参加反军阀地主的斗争，但党必须看清富农反革命的不可免，坚决的领导雇农贫农的斗争，扩大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极力巩固与中农的同盟，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

7. 党应极力发展雇农独立的组织，领导雇农为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同时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之最积极的战士，要告诉他们不应该离开一般农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且在实际上，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必然要发展到反对富农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又多因富农兼有半地主的剥削，以至发展到没收他的土地，或者因其拒绝雇农要请增加工资而封锁农场，则结果不是由党引导雇农走上共耕的道路，便是由雇农自动手的没收其土地——这是在土地革命深入的阶段必然的现象。

8. 现在北方各省农村阶级斗争虽还不激烈，大多数富农虽还留在反军阀战线之内，但党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上面指出的路线，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以严防富农之必然妥协以至反革命，以斩断国民党利用农民的前途。当然整个斗争之主要口号，仍然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9. 在满洲的路线应该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反对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应当平列着互相关联着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雇农与贫农之基本力量的树立，中农的吸收，仍成为乡村中巩固的革命战线，而富农则毫无疑问要走向反革命方面。

10. 因此在组织上也是一样，农民协会必须以雇农贫农做基础，而吸收广大的中农加入，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如果富农现在还留在农协之内，必须坚决的加强雇农贫农在组织上的力量与富农争夺对中农的领导，以至肃清富农于农协之外。同时加强雇农独立的组织，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放松。雇农一面要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同时加入农协，形成雇农小组，以便在农（协）中起核心领导的作用。在苏维埃区域，如农协还有

群众所信赖而未取消，我们不应采取机械的取消办法，而应先加强苏维埃在群众中的领导与组织作用，以减少农协作用，以逐渐达到取消农协目的。雇农工会则应独立的永远的存在其组织。

11.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基础是雇农与贫农，但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与领导力量。党必须坚决的拒绝富农入党。

12. 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这就是说，现在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准备暴动的时候。自然在现在农村中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的自发暴动与游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不断的爆发。党对于这些自发的暴动与游击战争应当坚决的领导与扩大以深入土地革命，而扩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党必须使城市工作与农村农民斗争有适当的配合与发动，以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13. 党要实现动员广大群众的任务，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在农村中只有武装暴动，没有日常斗争，这完全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左倾思想。不过同时要认清现在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地主常常用残酷的武装压迫，所以农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因此，在斗争发动和深入的时候，党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去领导这种武装斗争。

14. 现在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群众日益穷困失业，军阀地主豪绅为着消灭农民的土地斗争，实行把农民向他处移殖(如山东顺直的移殖满洲，广东福建的移殖南洋)。党必须在农民中揭破他们这种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阴谋，告诉农民移殖他处，还要更加痛苦，领导他们向本地的军阀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以

争得土地与生活的改善，以深入土地革命。至于农民自动的移殖，党必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力争移殖的便利的条件（如提出地方公款津贴农民，轮船火车免费等），这样也就可以把他们消极的移殖，转到积极的向军阀地主豪绅进攻。

（四）过去的错误与现在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

1. 机械的把富农分成资产阶级性的与半封建性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在现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每一个富农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尤其是在他发展的前途上，资本主义的与半地主的两个前途，互相纠缠着。并且因为整个经济条件的规定，尤其是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控制，使他更易于走向半封建半地主的前途。这样就使富农更接近于地主阶级。过去这样机械的分划，的确是策略错误主要的来源。

2. 把富农的资本主义的与半封建的两个性质，机械的分划，于是得出了反对他的半封建性而不反对他的资本主义性之奇怪的结论。其实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同一富农可以兼有资产阶级的与半封建的两种不同的剥削，但是不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行动。既然因为他的半封建性走到反革命方面去，那么，我们当然要同时领导雇农贫农坚决的向他斗争。

3. 即使乡村中有很少的富农非兼有任何封建剥削，而只是拥有雇农，但他与地主阶级并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土地又分划的极小，大地主极少，使富农看着剥削富〔雇〕农与兼营商业资本高利贷，堆积金钱，以购买土地，而将自己也变成地主去剥削佃农，要比参加农民为土地的斗争，轻易得多，实惠得多。加以过去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深入的教训，使他更轻易了解妥协要

比革命还更有利于他自己,所以过分的估量他与封建势力的冲突,以为他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便不会妥协,以为他会因希望没收地主土地,而会放弃高利贷的封建剥削,实在是错误的。

4. 因此,党对富农的策略发生极大的动摇,或认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或认为“无条件的反对富农是不对的”(二中全会的总结通告);或使党的策略路线受富农态度的支配(六次大会农民决议案)。甚至提出联合富农的口号(如中央对朱毛的指导信),尤其错误的是因联合富农而牺牲雇农的利益(如江苏淮阳恐怕富农反革命而要雇农减低要求)。这些错误,尤其是联合富农的错误,可以妨害党领导农民斗争完成土地革命之急迫的任务,而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

5. 现在党内脱落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他们对于农民的策略上也是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但是他的观点与党的路线是绝对不同的。他们从他们抽象的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出发,因此不管事实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占优势,所以要反对富农,这是照国际来信指出现在中国农村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反对富农主要是因为富农是具有半封建性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因此他们对中农的策略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认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因此,他们的策略是使“中农中立”。很明显的在现在农村中,中农是一样的受军阀地主豪绅之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群众,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要求是异常迫切而坚决的,所以党必须坚决的巩固与中农联合。如果采取使“中农中立”的政策,客观上就是削弱土地革命的力量,使雇农贫农陷于孤立而失败,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的策略。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才能执行正确的策略。

这一决议案必须发到下级党部,特别是农村党部去讨论。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异常之复杂的,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

依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并须将当地的实际情形与讨论的经过及决议详细报告中央，然后中央才更能了解全国实际的情形，对各地作更具体的指导。

中 央

一九二九，八月。

（录自《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①

(1929年8月5日)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 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

^① 本文括号中的“编者”，是1929年10月出版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编者。

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 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

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漠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 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

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

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象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发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

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 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

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 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

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象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 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它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租，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你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

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豫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七 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

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

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〇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

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象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

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 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

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部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

下，党内德漠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Boy cott）特于政治的行动”（“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

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

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衍敷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 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

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 秀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

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

——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

(1929年8月21日)

中共代表团诸同志：

自从国际交通断了以后，你们便无法收到此间的文件了。所幸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秋白同志的来信都还能在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前数日到来，使我们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富农问题的讨论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东路问题发生后，中央曾得到国际一个短电的指示，告我们要加紧中小〔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我们在这个指示下，并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已经集全力向着这路线工作。关于八一示威，更曾用很大力量动员全党去发动群众，结果在上海香港是有较好的成绩，在其他城市，政治的宣传与其影响是有的，尤以满洲为能冲破党内两年来和平发展的空气，但动员群众的工作却极其微弱。农村的情形，凡有斗争及我们影响的区域而又得到“八一”工作之指示者，大都有相当工作。这次八一示威，恰当中东路问题发生之后，自然武装保护苏联的宣传乃成为这一示威的主要内容。且这一动员，不过从“八一”开始，自此以后的工作，从政治任务上说，从争取群众与全国的工作布置上说，都在日益加重，党正在以中东〔路〕问题为中心，从各方面加紧工作。

现时全国工农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是日

益向前开展。我们主观的力量在上海香港都有很多的进步，尤其是与群众的关系这一点，上海已有了一个包含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之赤色工人联合会，拥有近万群众，香港有一二十多个工会加人的赤色工人代表会，有群众四五千。在北方，一年来要算有很多的进步，只是秘密工作极坏，自首叛变的事又复开始，故机关的破获，干部的损失极大，现在有工作的区域为哈尔滨，奉天，抚顺，天津，塘〔唐〕山，北京，山海关，青岛，郑州，太原，信阳等地。长江流域有工作的为杭州，南京，无锡，安庆，九江，南昌，沙市，宜昌及四川几个重要城市，南方则除香港外，有福州，厦门，汕头，梧州，云南等处。在这些地方最大的缺点，便是群众工作的缺乏，许多工作还依然束缚在狭隘的支部范围以内。仅仅是顺直井陘的矿山，江西景德镇的磁窑，我们有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组织，——这不是说在其他各地客观上我们没有发动群众可能，而是我党在主观上还没十分懂得如何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如何去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最大的缺点便是经半年乃至一年的努力，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广州，至今犹未能将工作恢复，现今所有的仍只是很小的党的组织，长沙济南连这些很小关系都还没有，全国的重要产业海员，铁路矿山，兵工厂中的工作还不见多大进步，海员的关系并不少，只是陷入一种和平发展与无甚群众工作之不死不生的状态，党在铁路中的组织，按支部说，全国不下二十个，但群众的关系，则除掉唐山大厂外，我们仍没有多大领导力量，矿山以开滦五矿及井陘为较有工作，其他如抚顺淄川则仅具线索，安源大冶则尚未恢复，兵工厂的线索全国五大兵工厂都有，工作则还未做起。农村工作一般地说是相当发展的，但北方则陷入和平发展的状态，因之有许多可能去发展的机会都失去了，甚至旧有的基础都不能保存，特别是灾荒的区域，我们很少工作。南方的游击区域仍是发展的，现在最大的区域要算是闽西，赣西东江平浏，湘西鄂西，鄂东北豫东南，及赣东北，最近又有四川的发

动。兵运有相当进步，但仍不能抓着中心的有力部队。反帝运动在今年“五卅”以来，在几个重要城市要算有很大的进步，群众已逐渐能走到街上为有组织的示威，并且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行动起来。

党的现状经过不断的努力要算是大有进步。二中全会开在六月底至七月初，大家在一致的精神之下，同意于中央一年来的工作路线，决定了许多重要策略及实际工作方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央工作给了一个满意而更求进步的具体指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有更明晰的分析，对于党的任务与策略有更具体的规定，以利全党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之总路线上前进。对于组织问题集合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完成了六次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对于职工运动在斗争的策略上有更切实的具体的决议产生。这些会议中的成绩实成为加强中央指导之最有力的基础。党员数量在工人成份上较半年前并无若何增加，但党员质量却有很大的进步，许多产业支部现多能开会工作，过去许多挂名的城市党员现已渐能参加党的工作。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干部，现在仍有一小部分不能随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有些人专门愿意停留在上海，发表些离开实际工作实际策略的政治清谈——这还是上焉者，有些人更专门撷拾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无原则的个人的材料，来攻击指导机关攻击中央。这些人在数量上说并不多，且中央更不是不以教育的方法去说服他们的。但有些同志的确还保留着党内纠纷残余的成见，且在政治见解上更日益走向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道路。现在党内有两件较为严重的事实应该使你们知道：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

反对派的开始活动是由莫斯科学生带回来的，有些是已经被党开除，或回国后便脱离了党的，有的是尚存留在党内的。他们也如欧洲各党的反对派一样，有他们的党内组织，命名为《中国

列宁主义者布尔塞维克反对派》，有他们的出版物，《我们的话》，在党内秘密宣传。他们更着重了中国党内一般落后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与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他想利用这些分子，掀起反对指导机关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活动，以便他们得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以扩大他们的活动基础。他们的政治口号除掉一般的宣传脱洛斯基主义以外，还特别着重于中国问题的宣传。他们口头上确还嚷着革命，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不仅混淆了目前中国革命阶段的主要内容，而且仅仅是口头上的欺骗，实际上正如其他各国一样，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用以来反对中国党的领导，企图从党内分裂做到中国革命的消灭。中国党内的反对派的活动现在正向着这一目标前进。他们常利用目前的实际问题，不向着敌人进攻，而专门反对中国党的指导机关。中央现时对反对派的斗争路线，主要的还是反脱洛斯基主义的思想斗争，——尤其是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路线的斗争，以树立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在组织上，党自然毫不犹豫的要肃清党内这一分裂党的组织。如发现其活动的领袖必毫无留恋地将其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的承认其错误退出其组织，如被劝告无效，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至开除出党。如有同志在其理论之某一部分与托洛斯基主义相似，则党必与之作坚决的理论斗争，且要这些同志公开承认反对派的整个纲领与活动是错误的，是做成反革命的工具，同时在行动上要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绝不容许以自己错误的见解来代替或动摇党的路线。因为目前的确有些同志以为反对派在欧洲革命问题上的见解虽是错了，但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某些见解或许还是对的，这种观察完全是支解了托洛茨基主义且给中国党内反对派一个负隅自抗的机会，故我们也正在注意于这类思想的肃清。

但尤其重要的还是中国机会主义思想予他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已共同见解的赞助，陈独秀同志最近有数信给中央，其中有一

封较长的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及政治形式〔势〕之分析的讨论信，他指出目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是资产阶级政权，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特别在资产阶级胜利以后受着最后的打击，现在只是残余的残余。目前的农民土地革命，是要以贫农为柱石，中农是动摇分子，富农要当他是乡村中资产阶级来反抗（即是说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不承认目前中国有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象征，而只承认有革命高潮之反面——这些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他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在另两封信中，他关于中东路问题之宣传策略的讨论，也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认为这种宣传是“典〔曲〕线式的策略”，实则与列宁所讥笑少数派的策略过程的阶段论的内容毫无两样。他对于中东路问题，是将帝国主义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平列着看，并将战争灾祸统笼的反对，说无论那种战争在中国发生都将中国当作塞尔维亚，这显然没有一点阶级观念，并给群众以极不正确的暗示，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和平主义的宣传。独秀同志这些意见的发表，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是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这犹之社会民主党将布尔塞维克准备暴动永远认为是布朗克主义一样。独秀同志自新中央回国后，几次邀他赴莫直至上月犹作一度邀请，他亦曾几次允许，但总是迟迟不行，上月他又答应将日文的列宁马克思主义书籍看阅研究一遍，于年后再赴赤都，他同时却写来这三封信，狠值得中央注意，因为怀着这种观念的并不只独秀同志一人，我们常零零碎〔碎〕从直接间接方面得到同志中间一些这种类似的意见。我们决定将他的来信发表，公开的与之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指明他与中央与全党确站在两个不

同路线之上。这一斗争开始，一方面固引起党内某些不正确倾向的同志，借题发挥故意来推波助澜形成与整个党正确路线相对峙的活动，但中央坚决相信目前党内无产阶级正确的意识已渐渐的发展，群众的斗争生活已渐能强固地反映到党内，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已为党员群众所日益了解——这些条件的总和将成为党内战胜一切不正确倾向与思想之最强固的基础——中央并将很细心地狠坚决地善用这些进步的条件，引导全党向着更正确的道路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要使这一不正确路线的倾向与思想一齐肃清消灭，以求得党的巩固与一致。至于党内如有反对派以外的任何小组织的倾向与尝试，党必要坚决地予以反对予以制裁，尤其在目前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阶段中，更需要党的坚强与一致，故任何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与倾向，都是中国党所应极端排斥的！

这两种活动，我们相信也要反映到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望你们特别注意，并要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之下，为党的一致面坚决斗争。

目前国内各种工作均在发展，许多客观上的条件，均需要主观力量去推动，许多省份均缺乏工作人材，特别是地方党部的干部甚为缺乏，就是中央本身人亦太少，全总工作至今尚未健全起来，因为人力分配不过来的关系，实在失去了一些工作的机会，因此中央曾函催中夏同志及其他中大同志回国工作，现交通虽断，但仍有由欧洲回国路线，务望代表团了解目前国内革命之需要速与东方部商决一批得力同志于最近两月来中国至要。

再国内现在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和与党外思想的斗争，均极严重，万分需要材料的参考，中央除在国内努力翻译工作外，务望代表团注意经常给国内材料之供给，已翻译之材料务须由代表团自己设法马上由欧洲寄回国内，希望国际交通局寄是比较困难，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央没有收到莫方一本东西，可是有些同志由个人

的关系倒反得到了一些，这是要请代表团注意的。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政治局

1929, 11, 2。^①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年版)

^① 此文为1929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51次会议通过，成文时间是1929年8月21日。此“1929, 11, 2.”是1929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时，同时抄写此件所误写的日期。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青工问题的信

(1929年8月24日)

共产国际执委决议关于中国职工会运动的问题的决议案之外，还有下列各点，要中国共产党特别加以注意：

现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赤色工会里的工作，以及在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左派国民党）工会之中争取群众的斗争里都有特殊的意义。

赤色工会和共产青年团要取得青年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就应当加紧拥护青年工人利益的日常工作。因此，独立的青年工人工作，在职工运动里，现在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样工作，可以使党及青年团在青年工人群众里的影响，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赤色工会的指导机关，应当和青年团中央共同研究，设立赤色工会里青年部的方法，并且保证青年工人的代表参加赤色工会指导机关的方法。

此外，必须要党及工会和青年团的中央机关讨论，政府工会黄色工会里要求设立青年部及青年的代表机关，是否可能？而且必须注意到：如果政府工会黄色工会设立的青年部，是不是要加强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如果这些工会的机关里有青年的代表，是不是在青年之中反而提高这些工会的信仰？

至于吸收女工参加斗争，加入赤色工会和共产党，亦有极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妇女在共产党里的作用是很大的。必须加强党的机关的妇女工作，必须要赤色工会、党及青年团对于女工中的

工作，加以极严重的注意。

共产国际执委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

(1929年8月30日)

一、分析最近一年来的职工运动，可以有完全的根据，说中国工人运动的新潮是在成熟起来。最近一年的经济斗争里有几十万工人参加，而罢工往往明显的带着政治的性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般说来，的确在工会方面有正确的路线；别方面仍旧认为有必要使中国共产党要严重的注意到：共产党在工人群众里组织的工作，首先就是在工会里的工作——独立的赤色工会，以及国民党（政府）工会和黄色工会（“左派”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作——有极快的转变的必要。

二、中国共产党现在要用一切方法，去加紧赤色工会的组织，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群众的组织。这在现时经济斗争的浪潮里，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赤色工会在群众中有丧失一切信仰的危险，工人群众会感觉不到赤色工会在经济冲突里的工作。在目前阶段上，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组织日渐发展着的争斗。同时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党内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的倾向——这是纯粹机会主义的右倾危险的表现。不可以忘记：赤色工会有极大的政治资本，在革命斗争时期积聚起来的政治资本，赤色工会政治上的分量，比他们现在组织上的状态要重大得多。赤色工会是革命职工运动的根

本，应当到处尽量扩大，只有客观上有良好的基础，首先就是铁路工会，矿工工会，和海员工会，这些工会曾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骨干。

三、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应开始同样坚决的争斗，反对党内对于黄色和国民党工会之内工作的估量不够。一部分黄色和国民党工会，现在变成了群众的工人组织，中央应当提出在他们之中努力工作的问題。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有群众的，别方面，赤色工会组织上很弱。共产党在黄色和国民党工会里工作的转变，必须在事实上执行，而不单在议决上。因此要在党内实行一次宣传，解释党员和革命工人加入群众的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之必要。必须要打碎那些共产党员在工会工作里的宗派主义的残余。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遗传（虽然改良主义因〔用〕极大的努力要想钻进中国的工人运动），黄色国民党工会没有强固的下层机关，所以在中国现在罢工潮流成熟之中，在黄色国民党工会里，共产党员应当团结在党团里，共产党党团要把会里一切革命分子围绕着自己而组合起来。可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并不因此就应当负责宣传广大的工人群众去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因为这些组织是反阶级的性质。因此，凡是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没有群众性质的地方，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就不应当加入这些工会。我们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完全只因为他们之中有工人群众，完全只为着利用现在工人运动的浪潮而去争取这些群众。凡是有群众的黄色或国民党工会，而同时有客观上的良好环境，可以建立革命工会的地方，那么，革命工会应当同时组织。一方仍在黄色国民党工会里工作，以革命的政策去争取其中的群众，而达到消灭这些工会的目的。

四、群众之中的努力工作，要中国共产党经过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在工厂里巩固自己的立场〔地位〕。工厂委员会的意义，

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都没有全国范围，以及产业范围以内的集权组织。工厂委员会应当由全体工人选举出来，就是用自动的方式实行选举也好。工厂委员会有工厂里党的支部指导，能够成为工厂里工人群众日常斗争的组织者，如最近日益生长的自发的经济冲突的指导者。工厂委员会努力的工作，就使黄色国民党工会的会员有转到赤色的群众工会之可能。最后，工厂委员会能够成为工厂里工人群众和黄色国民党工会之间的隔膜。当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巩固起来的时候，在工人运动高涨的适当时机，工厂委员会能够并且应当成为阶级的赤色工会的下层机关，而且是产业式的工会组织的发动机，因此，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在有黄色国民党工会的地方，尤其重要。而只有赤色工会的地方，工厂委员会更是创造及巩固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的出发点。

五、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新浪潮的期间，应当提起〔出〕赤色工会公开起来的问题，就是用自动的方式，在各种别的名目之下公开起来。然而必须把这些工会实际上的指导干部秘密起来。赤色工会在以前公开存在期间，就没有工厂里下层的组织上的基础。这就使国民党的压迫，能够把赤色工会缩小，其中有许多甚至于完全消灭。所以现在占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建立赤色工会的这些下层的组织上的基础。否则，既然不能够造成稳固的赤色工会，亦不能建立工厂委员会，亦不能在黄色和国民党工会里工作，更不能独立的指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

六、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党内有无〔些〕党员的主张——主张〔不管〕赤色工会是不是群众的，能不能够成为群众的，有没有对于广大无党工人群众的影响，或者能不能够经过对于工人群众经济斗争的积极参加而取得这种影响，而要取消一切赤色工会。中国共产党正应当在没有群众的工会组织的城市和产业里，去组织阶级的赤色工会，甚至可不用赤色工会的名

称。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冲突，正是建立这种群众组织的适当机会。

七、然而，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取消最坏的遗传：命令主义和上层空机关式的工会建设办法。必须重新审查赤色工会的名单，审查他们工作的积极不积极，和活动不活动。而把那些非群众的无用的空机关，名义上纸张上的工会；而且在当地有黄色的或者国民党的群众工会的情形之下，不能发展成群众组织的工会——毫不游移的取消，这样，可以使在这些机关里的同志，出来到工厂里去工作，或者到黄色国民党工会里去工作。至于黄色国民党工会里赤色工会运动占着坚强的地位之后，中国共产党应当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驱逐黄色国民党领袖的问题，即使有一部分会员要跟着黄色的和国民党的领袖分裂出去，也不要停止这种运动。

八、同时，如果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我们能够取得黄色工会的下层机关，或者赤色工会里不管有没有工人斗争的浪潮，而在国民党的法律范围内得到合法公开的存在，那就是很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幻想。因此，必须会联结公开和秘密的工会工作，经过秘密的指导干部，巩固赤色工会和群众的联系，用各种方法去力争罢工结社的自由，不顾并且反对国民党法律而力争赤色工会的自动公开。

九、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独立的领导正在发展的经济斗争，最好的组织和准备这种斗争。因此，必须对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给以极坚决的打击——这些分子主张“不经过黄色国民党工会不能有所动作”，主张“要经过黄色国民党工会领袖执行我们的决议。”这是共产主义先锋能够占有现在工人运动浪潮的最重要的前提。

十、目前赤色工会应当准备经济斗争而领导这种斗争，经过工厂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工厂群众选举出来的斗争委员会等类的机

关，必须在这种方针之下，最大限度的发展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吸引革命分子，起来指导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
一九二九，八，三〇日通过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年版）

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社论）

（1929年9月25日）

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斗争。中国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的开始。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企图从肉体上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斩尽杀绝，一劳永逸地消除爆发新的革命动荡的危险根源，第二国际也与背叛了革命并被套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战车的国民党一道，庆贺刽子手们的胜利，声嘶力竭地狂叫共产国际在中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可是，与国际孟什维主义者的恶意预测相反，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不顾白色恐怖的猖獗，再次举起革命斗争的旗帜，正缩短着中国反动派的历史寿命。

中国反动派未能缓和或解决任何一个导致中国爆发革命的矛盾。国家没有统一，经济上的分散状态依然是中国军阀得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反动派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且毫无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在废除帝国主义特权方面，它毫无所获，相反，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更牢固了。以南京的资产阶级——地主联盟为代表的中国反动派把种种矛盾搞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加深了中国的普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更加剧了国内的困难局面。在军阀混战现象的掩盖下，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你争我夺，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各个不同阶层正在展开搏斗。

面对上述种种事实，山姆大叔的进取热情凉了下來。美国资本家在中国反动派得势之初表现出来的那种急不可待的侵略姿态再次被越来越严重的观望政策所替代。对明天毫无把握的心情不

仅给外国资本家泼了冷水，而且使中国反革命派阵营内部原有的得意心情也正为充满恐怖不安的烦恼情绪所取代。统治集团出版的报刊调子越来越低沉。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此伏彼起，更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根据国民党社会调查局公布的资料统计，仅上海一地 1928 年头九个月内即爆发了一百七十五起罢工事件，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二十三万三千人。根据该局宣布，10 月上海发生二十起罢工，11 月发生二十二起，12 月又爆发了十六起罢工。我们还获悉，罢工运动绝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一地。如果以大企业发生的罢工为标准统计，至少香港在 1928 年发生过十六起，满洲发生了九起。此外，天津、武昌和中国其他工业中心城市都发生过一系列罢工事件。简而言之，即使根据最粗略的而且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1928 年中国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也至少有四十万人。对于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中国来说，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的。

就 1928 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总数而言，中国仅次于印度，印度处于全世界的首位。但是，中国并不比法国、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逊色，而众所周知，这些国家 1928 年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声势是很大的。

我们手头暂还时缺乏 1929 年已过去的几个月中中国罢工运动的综合统计资料，但根据报道来判断，中国工业地区的工人自发性罢工浪潮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大有进一步高涨之势。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浪潮正向四面扩展开去，涉及到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工人。例如，1929 年头几个月上海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天津，香港的铁路员工举行了罢工，天津和上海的电车工人，发电厂工人、矿业工人、纺织工人以及缝纫工、店员也举行了罢工。

在这种不断扩展的罢工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显示出越来越顽强的精神和越来越高的觉悟。

从山东邮电工人的罢工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人已经学会了识别国民党，认清了他们的调解的真正价值。罢工的起因是两个工头对工人态度粗暴、蛮不讲理，引起工人的愤怒。罢工领导人接受了国民党工会的调解，工会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开除工头，增加快急邮件的传递人员人数，规定八小时工作日，改进对工人的态度等等（7月9日《新闻报》）。但是，过不多久，罢工很快就向另一方向发展了。最初提出的要求退居次要地位，工人们提出了新的、反对国民党的口号。

7月8—11日《天津时报》也以不安的心情报道了工人斗争趋于加强的情况。请看该报对中国矿业和纺织工业重镇唐山市京奉铁路车辆厂工人骚动事件的描写：

“自从唐山市国民党组织同当地商会发生冲突之后，工会和国民党在工人中的威信已大为降低。因为，不管这一冲突对工人有无直接关系，但工会既然为商人效力，它就必然威信扫地……工人对工会头头公开表示愤慨，他们散发传单，要求改组工会，而且提出了更为激烈的要求，号召工人打倒工会，靠自身力量争取解放。”

今年7月间无锡市发生的中国企业工人总罢工同样是极其引人注目的。7月12日《新闻报》列举了某些国民党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事例，并且提出，由于工人群众“完全受共产党影响，拒绝服从国民党工会，并且组织地下共产党工会，这种工会虽受到镇压并有多人被逮捕，但仍未停止活动，”所以局势是“严重的”。

然而，根据这类报道，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工会组织已经丧失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一切威信，已不成其为群众组织了。得出这种结论是过于仓促了。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阶级工会还不可能公开存在，因此，国民党的工会可以依靠整个强制性的国家机构的帮助去影响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干预发生的

冲突并在许多场合下依靠仲裁手段结束冲突。这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项任务：对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展开认真扎实的工作。很多地方已经成功地将这种工会变成了群众性的组织。

从另一方面讲，红色工会还较弱，不可能到处都站到罢工斗争的前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组织和领导经济斗争，还是一项远远没有解决的任务。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当前的形势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面前展示出越来越美妙的前景。通过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国民党充当工人阶级“保护人”的伪善面目正被揭开。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扩大的经济罢工斗争越来越多地发展为政治战斗，上述过程还会进一步加快。

国民党政府慷慨地向资本家企业主提供警察的保护；这就迫使工人们奋起同时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反革命当局。

警察参与镇压工人罢工的无数事例（如镇压无锡面粉厂工人罢工、嘉兴木匠罢工、广州汽车公司修理工罢工等）不能不加剧工人对国民党反革命的愤怒。罢工越来越多地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例如，据《天津时报》（1927年7月）报道，“开滦煤矿两千余名工人发生骚动，要求释放被怀疑为共党分子而遭逮捕的同事……为了争取释放被捕矿工，开滦煤矿五个矿并的工人采取统一行动。当局予以拒绝。局势仍很严重”。同一天的《天津时报》还报道了赵家矿发生骚动的消息，据称，该矿工人要求开除不准他们庆祝五一节的一位工程师。工会出面调解，结果事态更加扩大。工人们高呼：“打倒一切调和派和妥协派！”该报还报道了唐山车辆厂锻造车间因一些工人被怀疑为共党分子遭逮捕后发生的工人骚动事件。

示威游行已成为当前中国越来越经常发生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所占比重日益增大。

我们掌握的资料表明，今年7月间及五一节期间，上海、广

州、武昌、天津、北平都发生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工人阶级的上述行动都是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和保卫苏联的口号下进行的。值此山东铁路被强占和中国军阀横行无忌的时刻，工人阶级从后方的工业中心城市给了南京当局头领们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使南京反革命派本已动摇的地位更加不稳定了。

我们仅仅列举以上这些事实。从中可以看到，工人运动正处于发展和高潮之中，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1905年的革命遭到镇压之后，列宁曾在一篇题为《评当前时局》的文章中写道：“千百万居民通过‘总罢工’，驱逐地主，焚烧地主庄园及公开的武装起义等多种形式的真正群众性的和直接的革命斗争获得了实际经验。群众认识这一经验是一个无形的、艰难和缓慢的过程，与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许多现象相比，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要重要的多^①”

中国无产阶级虽尚年轻，但却经历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现正以更快的速度消化前一阶段直接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国工人阶级正通过艰苦而忘我的反对外国资本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斗争，捍卫并巩固自己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诚然，仅就上述有关工运之事例，尚难得出中国已出现巨大革命高潮之结论。但是，这些事实确实证明，出现这种巨大高潮的前提条件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变形成。转折的时刻已经到来。解放斗争下一步发展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尖锐的斗争条件下，通过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已经成长和壮大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中国无产阶级英勇的罢工斗争和上海、香港的一系列同盟总罢工，指导过上海无产阶级成功的武装起义以及农民的群众性武装发动，在广州公社的英勇战斗日子里显示了自己战斗的阶级面貌。通过这

^① 原文未注明出处。这段文字系就原文译出。——原编译者注

些行动，它赢得了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锻炼了自己的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现在，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能够高举自己的战斗旗帜，团结劳动群众，迎接决定性战斗的到来。

(马宝华译)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9年10月26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最近的事变，使我们不能等待你们方面关于现在条件之下中国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消息，就要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现时局势的估量，而给你们预先的指示，说明中国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个危机，表现在：

(一) 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重新爆发，而各派军阀的背后，站着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剧烈起来；

(二) “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的形成他们反对南京的国民党，现在得着一派军阀的帮助（张发奎）而走上政治舞台；

(三) 反苏联的冒险政策（中东路事变）引起一切矛盾的剧烈和全部局势的复杂化；

(四) 请求外国比较多量的投资，以及请求帝国主义方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一切尝试，都完全破产；

(五) 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也都显然的失败，既然没有能够完全压住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实行着空前的白色恐怖），亦没有在财政统一和军事统一方面，能够有稍稍有些意义的成绩；

(六) 许多工业正在衰败，而外国资本在全国经济生活之中的作用却在扩大；

(七) 农业危机正在延长而且深入，这种农业危机在现存的地

主资产阶级制度之下，是没有出路的；

(八) 工人阶级及农民主要群众的生活状况，本来已经是不堪忍受的了，现在更加是一般的恶化；

(九) 工人运动的新潮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

(十) 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正在复兴。

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要想在反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造成并且巩固“中央集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没有成功。如果南京政府的初期还能够造成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稳定之幻象，那末，现在我们显然看见：旧的矛盾在扩大的基础上重复产生着——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加强，经济危机的深入，统治着的上层有新的崩坏，工农群众革命的运动却在复兴。我们固然不能够预言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

二、一九二七年年底，为着镇压和摧残工农运动起见，形成帝国主义地主及全部资产阶级的统一的反革命联盟，这一联盟，继续的存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胜利的初期；现在，这一联盟之中的内部矛盾和分裂，却在生长并且深入。虽然一切剥削阶级一般的都是反革命性的，虽然他们这些阶级对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立场、相互之间的分别很不清楚——然而现在这个联盟始终分裂成为两个主要的派别。

第一派包含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极大多数是买办界和银行界的资产阶级，当然不是纯粹只有买办和银行界），这一派的政治上的代表，现在是执政的国民党和非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各小派别（蒋介石派，西山派，广西派，安福派，冯玉祥阎锡山等等），中国经济结构的极端复杂，以及中国各区域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小派别之中每一派的阶级性质各有特点，他们在各种不同的配合形式里，代表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他们共同在一起，实现中国的服从外国资本封建式的割据分崩，以及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斗争的舞台和目标的事实，正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政治营垒的内部没有和平，而有不断的军阀战争。

第二派企图在政治上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就是代表工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和商界的一部分。这一派，对于现在执政的国民党，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而散布自己的影响到中小资本的企业家，到不满意的小地主，以及城市和乡村的上层（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派的政治上的代表，是“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改组派极广泛的运用社会问题上的武断宣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斗争的虚伪口号，企图在现时，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广大群众日益增加的不满意，去达到改组南京政权，而预防新的革命爆发的目的。这一派以及他的代表“国民党改组派”是反革命的，极深切的仇视工农革命运动，仇视苏联，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制度，是极端的妥协和驯服的。这种情形很明显的表现于：国民党改组派靠着“自己的”军阀（张发奎）而且和北方军阀（冯玉祥等）联合来做军阀式的军事行动。这所谓第二派，在自己的企图之中，没有能力实现这种出路，他们即使愿意改变现存政权的社会性质，也同样的没有能力实现什么改变。独立的工农运动的革命高潮的将来发展的条件之下，他们很快的就要丧失他们对于现存政权的在野党态度，而在无产阶级农民起来实行第一二次的坚决的阶级战斗的时候，他们就要很快的和那第一派合并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

但是现在革命浪潮的初期，国民党改组派（集中群众之间还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幻想，而传布对于“维新的”国民党的虚幻的

希望)还没有来得及在劳动民众之前完全暴露自己的真相;在这种时候,实行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们的反动妥协的影响——是革命斗争将来的开展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之必要的前提。

对于这些反动的政治派别,立于反抗地位的,就有唯一的革命营垒——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个营垒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各种政治派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也就都变更了,一切种种没有批评态度的企图,要想把现在时期的政治派别,和武汉时期的政治派别,去相比拟——都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里暂时的很有条件的分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这种分裂,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或者解释成为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就是这样说法,右派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的群众斗争。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破产之后,这个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分裂出来,这个事实,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新的尝试,要想推延革命的爆发,如果可能,还想完全阻滞革命的爆发,这种尝试的方法,就是宣布改组国民党是政治上困难状况的出路,国民党改组派只是为着这个目的,所以自己宣传他们的军阀混战,是为着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而斗争,是为着恢复“真正的国民党”而斗争,他们举起改组国民党的旗帜,并不是为着要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是为着要救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三、统治阶级里面政治派别的变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表示中国深刻的全国危机。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

张发奎的发动,南京和冯玉祥的战争,指出全国危机的发展,又表现于军事政治冲突的形式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是地主

资产阶级联盟的反革命政策的直接继续，同时，这种战争，客观上削弱统治政权，引导群众到政治斗争里去，引起他们日益积极的反抗，去反对军阀战争及其结果，而帮助独立的工农运动开展。

中国的全国危机以及革命浪潮的另外一个特异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没有能够完全压住农民的革命运动，回民的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因为他们有群众的性质，所以虽然在反动领导之下，都是客观上的革命暴动，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埃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将要生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将来强有力的最高潮。

然而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罢工经济斗争，是在发展着这种斗争，表现着转变到政治战斗，游行示威的倾向。这些过程已经在工人运动之中，引导到共产党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很有成绩的领导今年“五卅”“八一”“九一”的罢工和示威。

可是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还是比群众不满意的生长，比积聚起来的革命能力的生长，比自发运动的生长，来得落后。赤色工会的大多数，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共产党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共产党自己里面，有严重的对于党的策略和政策的主要问题的动摇（陈独秀的取消派，联合改组派，和联合黄色工会官僚的倾向，否认帮助和指导农民战争的倾向）。这些动摇，妨碍共产党在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的新条件之下，去领导群众的独立斗争。

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将来的全部发展，最主要的危险，就在于这种现象：党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革命工会的组织程度，比起日益坚强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要来得落后。

四、上面所说的一切就可以规定共产党最近的任务。我们补充以前的信（关于农民的信，和关于工会的信）认为必须指出现在条件之下，党有下列的主要任务：

甲：必须以全力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战争，来向前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必须在报纸杂志，传单及口头鼓动里，最大限度的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党应当破坏一切军阀派别的政权，就是各区域当地军阀统治的政权（南方是南京派，张发奎派等等，北方是阎锡山派冯玉祥派，奉天派等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的口号，应当成为党在群众鼓动里的主要的紧急的口号。

乙：同时争取群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应当更加紧张，首先就是反对所谓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正在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意，他们现在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正是主要的危险。必须立刻发展最坚决的尽可能的群众的巨大运动，去破坏改组派的一切影响，暴露他们的反革命的真相，必须积极的暴露改组派的所谓“工人政纲”和“耕地政纲”。改组派事实是反对工人，反对土地革命——拥护地主的土地和私有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对于群众要指〔揭〕示改组派的奉承帝国主义，尤其明显的表现，就是改组派于中东路问题上，实行法西斯蒂式的造谣攻击，来反对苏联——这亦是非常重要的。要暴露改组派的假民权主义，他们认承以党治国的“党权”（而完全否认群众参

加政治生活)，他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在力争别的军阀的独裁。当然无论什么样的联合改组派政策，那是绝对不可容许的。这种联合，如果是要实现了，那么简直是把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去服从反革命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要使革命运动失败。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更加着重工农在我们党指导之下的独立斗争。

丙：共产党应当特别的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方针；应当在一切地方，只要那地方的国民党反革命政权削弱而革命斗争生长就要做革命的工会运动，走出秘密状态的尝试。

丁：共产党应当更加注意些：发展对于反帝国主义的领导，实行争取这种领导的斗争，反对一切列强的帝国主义，亦就一定要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方面一切强暴的表现，来发动革命的群众，组织政治示威和政治罢工，吸引工人阶级的极广大的群众，并且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到运动里面来，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反帝国主义的复兴，将要对于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又有很大的革命影响，使他更积极化。对于中东路问题上，满洲方面的冲突，必须用直接拥护的口号，组织一种运动，要暴露国民党的一切派别，改组派当然亦在其内，要暴露它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戊：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洲，以及朱毛的区域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队伍，解除军阀的武装，夺取交通的用具。军阀所抛弃的区域里，要取得并且巩固自己的力量。凡是群众农民革命斗争生长和扩大的地方，都要去创造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有的苏维埃区域里，应当积极的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武装农民，建立苏维埃，要使广东

福建湖南湖北的工农红军的零碎行动互相配合，全中国的农民群众斗争，都要积极化，应当去领导乡村里反对国民党地主军阀的日常冲突，而使之深入，党在红枪会等类的组织之中，工作更有变更。党在工人群众之中，要加紧解释农民斗争的任务，要以全力鞏固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里的领导。

五、这些任务，要能很有成绩的实行，就只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的战争力的巩固和积极化。新的条件之下，共产党的根本主要任务，就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现在不要重复这种错误；现在要以全力鼓动并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所有这些，都要求共产党队伍的团结和积极勇敢的引进正在斗争的革命无产者的最好干部，来充实党的队伍，要坚决的斗争，反对离开党的总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

现在比较任何时候，党都应当更加保证自己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统一。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这种政纲，不但否认正在生长的革命浪潮甚至于否认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客观上的前提。

必须继续加紧暴露托洛斯基主义的反革命的真相，同时指出托洛斯基派的所谓“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右倾取消派观点的补充。

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然而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些倾向：是要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是要承认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这些倾向，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都是否认中国革命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反革命的资

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共产党如果不在自己队伍里面，战胜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那就不能执行发动，组织和领导新的革命高潮的作用。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 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 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1929年11月15日会议通过)

中共党的六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综合全党同志的意见，依据历年来斗争的教训与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决定了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一年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变迁，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中央根据此路线而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在实际上证明了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并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现对六次大会决议的怀疑，对大会结果的不满。中央当时曾对陈独秀有过详细的解释与批评。

不仅在六次大会之后，更远在“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央曾根据国际的决定，屡次要陈独秀前往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独秀当时不仅不服从国际决定，且于同志间谈话，表露其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彭述之彼时在顺直省委工作，亦曾有不满意“八七”会议的宣传。嗣六次大会召集，国际及中央要独秀前往参加，且曾几次催促，但都遭拒绝。六次大会中及大会后，国际又曾数电促独秀赴莫。新中央继续向独秀解释他赴莫之必要，但他初则应允，继则取消，终则推延到明年开春。其实这都是他表面上的应付，他中心意见在他最后致中央的两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国际反党反中央的一贯路线出来了；他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他根本便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

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

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苏联，中央在此紧迫时期依据国际与中国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农民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陈独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并且离开中央的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东路问题之前途中，更认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见解的结论，除掉落后的群众会主张苏联退让外，便只会得出如独秀致中央信中所说“无论哪一种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于是我们只要反对战争的祸害好了，不必去问战争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进攻苏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所以“误国政策”的根本观点，即是产生于此。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众中间散布起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资产阶级左派的泥坑。他这种见解，完全表现他仍然固执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一点也没有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中央对于他的两次来信，曾在理论与实际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危险，并告诉他在这样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必须放弃这种错误思想，回到党的路线之下来一致行动。

陈独秀对于中央这样的指示，完全拒绝；且更进一步提出与国际及中国党的六次大会根本不同的路线，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他认为过去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乃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而不是当时他所领导的机会主义中央不执行国际正

确策略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由此便得出“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义的结论。于是他完全站在反对六大大会的观点上，认定“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因之他同彭述之便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策略上更攻击中央所领导的五卅与八一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动，而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这表示他已经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已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堕落到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去歌颂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之“稳定”(?)的统治。这与脱洛斯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这样极端右倾的思想，这样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助敌人。

并且他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并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开始，是坚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于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大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

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一、开除陈独秀党籍。

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

三、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

布尔塞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他的宝贵武器——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服从大会决议，服从指导机关的指导是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如果破坏这样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的力量。

“谁愿意稍稍削弱无产阶级党的纪律，谁就是事实上帮助资产

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左派幼稚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党的铁的纪律来巩固无产阶级的阵线。现在党内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阻碍党对于取消主义的斗争，帮助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党内发展，松懈党内铁的纪律。且这种调和倾向，根本便伏有右倾成分，如不彻底肃清，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机会主义走同一的道路。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同时要坚决反对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倾向。

党的巩固是建筑在党的统一的意志的基础上，“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不只是不会削弱了党，而且是加强了党，加强了工人运动与革命。”（列宁——虚伪的自由论）尤其在现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党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捣乱、毫无疑问的是帮助了敌人，如果不肃清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开除这些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领袖分子，决不能坚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为党的统一的意志而奋斗，为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的路线而奋斗，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肃清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肃清一切调和派的倾向，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党的铁的纪律！

中 央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

——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

(1929年12月14日)

共产国际最近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方面是对中国党二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一般说来，认为是正确的，加以批准，同时指示中国党在全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时期中之几个严重的任务，中央经过详细讨论，完全接受国际之指示，并根据国际正确指示和目前职工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形，更具体的作以下的决定：

(一) 全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

全国工人斗争，自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各地是继续向前发展，罢工运动更普遍于全国各地，如上海，江苏各县，天津，唐山，北京，青岛，周村，香港的海员斗争，景德镇等地罢工运动，至于斗争，在铁路，海员，矿山，及南北与长江各城市都是普遍的发展，最近北平人力车夫武装斗争，青岛日厂工人不断的反抗，武汉纱厂工人和哈尔滨铁路工人的示威，的确表示工人斗争更有力的向前发展。

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是证明工人直接斗争的行动增加，纯粹合法运动减少。反黄色领袖斗争，在各地已增加发展了，如上海模范黄色工会——商务南洋等，北方矿山铁路等都表现这种斗争的锐进，就连武汉工人也已开始这一斗争发展——如武昌裕源第一等纱厂，都表示改良主义在群众中日渐缩小的现象。

在全国罢工运动和斗争中，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加紧压迫，黄色工会日益反动，黄色领袖的官僚化，工贼化，更使许多罢工和斗争，往往明显的带着政治性质，至于党在各地所领导的示威运动，更推进群众政治斗争的发展。

工人斗争自去年以来，继续向前发展，且日渐扩大和深入，的确证明中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这一估量是非常正确的，是日益走向革命高潮的前途，特别在目前军阀混战日益扩大之政治混乱局势之下，将更要有力的促进这一发展的速度。

（二）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的工作

在工人斗争浪潮成熟中，群众斗争中的弱点，亦仍表现得很多，因为白色恐怖严厉，资本进攻，黄色工会之控制，群众的畏惧心理还未完全消灭，合法的倾向仍存在，对于国民党还有幻想（在北方表现得更厉害），故罢工运动大部分还在国民党控制或压迫的形势之下而至失败，或者是妥协下来。在反黄色领袖斗争中，还不能与反国民党直接联系而发展起来，且仍在国民党黄色工会范围之内而被国民党利用欺骗方法（掉换黄色领袖）妥协了事。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仅要正确的了解群众斗争发展的形势与前途，而且要认清群众在斗争中所表现的弱点，党要以自己的正确策略，在工作及群众斗争中来克服这些弱点，领导斗争更快的走向高潮，这是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和责任。

党自二中全会以后，对于职工运动的工作，虽在很短期内，在全国已表现相当进步，最主要的对于铁路矿山兵工厂等重要产业工人中已开始建立了部分的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至重要城市如天津武汉厦门北平都发展了一部分群众组织，上海在产业工人中也较前进步，其他如奉天，广州，南通，郑州，信阳都有群众关系建立；在斗争领导上，在铁路海员矿山以及重要城市工人斗争中，都表现党的领导作用增加，赤色工会的发展，在全国统计有

四万会员，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无疑的是扩大了，当然在目前斗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中，党的工作发展与进步，仍表现极其不够，不能随着客观的形势来扩大党的工作，最大的缺点是：

(1) 党还不能有计划去发展工作，不能充分运用群众工作路线去扩大工作，大部分还束缚在党的狭隘秘密范围之内，支部的党员大半不做群众工作，以致减弱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力量。

(2) 党还不能有计划的坚决的去建立和发展赤色工会，尤其是在对于黄色工会不建立赤色工会支部之策略的错误，在客观上自然走上取消赤色工会组织发展的道路，这是不可否认的错误。已有赤色工会的组织亦还不能成为广大群众组织，常表现组织的不固定性。

(3) 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极不充分，不能在工厂中运用一切机会去进行这一工作，特别在过去党对于工厂委员会的解释极不充分，因此发生只限于在斗争中采用这种方式，而成为一时策略的运用，无形中放弃工厂委员会的独立发展。

(4) 缺乏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去发动群众斗争，每每斗争发生之后，党与赤色工会才参加进去，充分表现群众的尾巴作用，这是极其严重的弱点。

(5) 在有些地方还束缚于日常斗争，不能发展成为大的斗争和罢工运动，对于斗争的联系，不是陷于机械，便是停滞在某一斗争范围之内，不能推进斗争更扩大的向前发展。

(6) 对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还不十分积极，缺乏有计划的经常的去发展这一工作，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的推动和领导都极其不够。

(7) 尤其是在黄色工会工作中，有的只重视上层机关的夺取，忽视最主要的下层群众工作，及赤色工会纲领的宣传，结果夺取指导机关之后，仍在黄色工会纲领之下，反使领袖变为黄色，有的获得群众的拥护，驱逐黄色领袖之后，不积极夺取领导地位，建

立赤色工会，反而使党员和赤色会员退出，让一般中立妥协分子选到指导机关去，使黄色工会继续维持下去，以致不能达到消灭它的目的。过去中央对黄色工会的策略，不主张建立赤色工会支部，党不公开的在群众中独立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和独立领导斗争，陷于单纯的转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的错误，当然更助长了在黄色工会工作中右倾错误的发展。因此在黄色工会的党员，党不能严厉的督促，随时纠正一切合法运动倾向，到了斗争发展时，不是与黄色领袖妥协，就是叛变成为黄色领袖。

(8) 公开活动的策略，不能充分的正确运用，有的发生合法倾向，大部分是仍死守着秘密的狭隘工作形式，不能运用一切斗争去争取公开发展，争取自由的斗争，以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活动。

因此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斗争中，还不能表现强大的领导作用，战胜国民党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欺骗和控制作用，还不能实际驱逐黄色领袖，消灭黄色工会组织，还不能有计划的去组织广大群众的罢工运动，以至同业的同盟罢工，冲破敌人个别击破的政策，赤色工会在组织上，还比黄色工会小得多多。这都是目前党在职工运动中严重的问题，应当严厉的纠正这些现象，才能使党在工人斗争浪潮成熟中，实现一切的任务。

(三) 目前党在职工运动中主要工作

二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在各地还没有发动全党党员热烈的讨论，充分的去执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各级党部应当严厉的纠正，并努力执行一切决议，依据目前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党的最主要工作是：

(1) 建立群众工作路线

在目前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在客观上极便利于党争取广大群众工作，党要实现这一任务，最主要的是建立群众工作路线：(一) 首先要打破狭隘支部的工作，动员一切工厂或工人支

部的党员去发展群众工作，每个党员都要成为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要认定群众工作是支部的中心工作；（二）要充分运用工会组织关系去扩大工会工作，要运用群众组织和关系去扩大在群众中一切活动（如反帝会罢工后援会等），使工会工作纠正过去党团代替工会的工作形式，充分在群众中发展工会作用；（三）要运用与群众接近的可能方式（如办学校读书班武术团等）尤其要在其组织的群众中，去发展和建立群众工作；（四）在一切运动和斗争中要运用群众路线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斗争。有了群众路线的建立，才能使党与群众建立广大而密切的关系，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和领导作用。

（2）建立赤色工会组织，加紧赤色工会的发展

赤色工会组织的建立，是党目前在职工运动中最中心的基本工作。在目前群众斗争发展中，每每因为缺乏赤色工会组织之强有力的领导，使许多斗争被国民党黄色工会控制，而多遭失败，因此赤色工会组织和发展是目前工人斗争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

党应有计划的用一切方法在工厂中工人中去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下层组织，应使目前各地的赤色分子将他正式形式〔成〕组织，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矿工以及市政邮电纺织工人中之产业工会的建立更为重要，这是党与全总在职工运动中的骨干与强固的群众基础。

赤色工会的建立，最主要的是建立强固的下层群众基础——基本组织，应严厉防止机关主义发生，凡是没有群众的空机关要坚决取消，使工作人员到群众中去工作，赤色工会要厉行民主化，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会生活和工作，更积极引进非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会指导机关，发展群众的积极性，肃清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残余。

赤色工会的建立必须由下而上，一个地方应以一个产业组织一个工会，同一产业的各厂，只能组织分会（即工会支部），必须

有了几个工厂建立，才可成立产业工会。每个赤色工会支部，在工厂中应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以团结全厂群众在其领导之下，这是中心任务之一。尤其在斗争中、更应召集全厂群众会议讨论和决定斗争方法，成立群众选举的领导机关，而赤色工会支部要起领导作用。

党与赤色工会在工厂中的支部除坚决的建立和发展赤色工会支部组织外，并需运用各种关系去发展和建立没有赤色支部组织的工厂中之赤色工会支部组织。

赤色工会虽在目前客观形势之下，不能得着很公开的发展，但应当时时争取公开的活动，且可运用其他灰色组织名义来活动，然必须在赤色工会纲领之下进行，必须坚信赤色工会在过去大革命中已在群众有强固政治地位，他的政治分量比在组织上更重大得多，要坚决的反对取消赤色工会组织的倾向。

(四) 对黄色工会的工作

黄色工会虽然因为群众斗争的发展，黄色领袖在群众中地位日益动摇，但在全国各地仍有发展（如上海武汉等地），特别是国民党进攻苏联以来，更加深的在群众中活动起来（如上海市总工会成立等），黄色工会仍包括有大多数群众在其组织之内，仍成为国民党统治工人运动之有力的工具。党不应存着丝毫的忽视。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仍为目前最主要工作。因此党在党员群众中，应实行一次宣传，和解释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参加黄色工会夺取群众的意义与作用，以纠正一切宗派主义的残余。

在中国工人群众中，过去完全在党与革命工会领导之下，没有改良主义的宣传（虽然改良主义用极大的努力，要想钻进工人运动中去），黄色工会没有强固的下层群众基础，特别在目前工人斗争浪潮中，黄色工会日益反动，黄色领袖官僚化，工贼化，党之夺取黄色工会下层群众的工作，更为容易。党必须有计划的经常的去

发动这一工作，特别是重要产业的黄色工会，是中心的工作。

要能实现夺取黄色工会内大多数群众，驱逐黄色领袖，消灭黄色组织，最主要的是建立赤色工会的支部组织。在过去的经验中，不靠建立赤色支部，仅成立附设组织，不仅在平常表现不出赤色纲领从中活动的力量。特别在斗争中表现放弃了赤色工会独立的领导。只是在黄色工会内建立赤色工会支部，不应放弃在黄色工会内进行工作，否则，仍然是走到另一错误放弃夺取黄色工会的大多数群众的工作。

在黄色工会内应当适用工厂委员会组织，去团结群众，脱离黄色工会，独立的领导斗争，并纠正一切要经过黄色工会去执行的错误，这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建立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独立领导地位，这是党与赤色工会在目前工人斗争浪潮中，取得领导地位的前提。

在黄色工会工作中，赤色工会运动应站在强固地位，坚决的领导群众进行驱逐黄色领袖斗争。即使有一小部分会员要跟着黄色领袖分裂出去，也不应停止这一斗争，然后才能实现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

在黄色工会中，不仅要坚决的反黄色领袖，并且要反黄色工会，以赤色工会的纲领，来对抗黄色工会的纲领。因此在反黄色工会与黄色领袖斗争中，不应与反国民党分开，只有坚决的在反国民党形势之下，才能坚决群众反黄色领袖的力量，达到驱逐黄色工会的领袖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才不致被国民党欺骗。在实现这一目的之后，应当在赤色工会纲领之下，坚决的选举革命分子来组织赤色工会领导机关，建立赤色工会的生活，领导群众作一切斗争，反对一切合法行动，成为赤色工会，以纠正退让暂用中立分子为过渡时候等等错误的策略。

在黄色工会中，主张民主化的策略，亦应有所纠正。党不应认为这是反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唯一的中心策略，是

领导群众自动的开会，以脱离黄色工会的范围；因此在黄色工会内主张民主化，仍然是易于在黄色工会范围之内使群众增加对黄色工会与其领袖的幻想。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假若被群众选举其为执行委员，他不应当在黄色纲领之下来行动，应公开的坚决的揭破黄色领袖罪恶，发动群众反黄色领袖斗争。对于此种工作，严厉的纠正一切黄色倾向和合法行动。

（五）广大的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

工厂委员会，是在目前斗争发展最能团结广大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领导之下，反黄色工会之最有力的一个武器。

工厂委员会，决不仅是在斗争中运用的一个策略，而是有他的独立发展与存在的必要。党与全总应当号召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开会讨论计划如何去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在群众中，作广泛宣传。利用文字的会议的方式来执行这一工作。并应由工会召集各厂工人代表开会，实际计划进行组织，每个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在工厂中都负有组织和发展工厂委员会的责任。

在工厂中已有工厂委员会相类的组织（代表会，斗争委员会等），要加重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在工厂中遇有斗争和会议机会即应实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在每一地方式的区域内，可以召集各工厂委员会代表开会，组织固定的各工厂中代表会，来讨论斗争和政治问题，督促工厂委员会的发展；同时这便是将来苏维埃的组织基础。

工厂委员会，不能与工会混合一体，在有赤色工会支部的工厂，工厂委员会组织仍然要单独存在。工厂委员会在斗争的领导中，将能够并且应当成为赤色工会之下层基础，而且是组织产业工会的基础。且这一组织的发展，将必然的成为帮助党在目前政治斗争形势中，组织同盟罢工之有力的组织基础。

(六) 有计划的去发动斗争 组织罢工和同盟罢工

在工人斗争浪潮中，党与赤色工会最能在群众中建立强固的领导地位，党应有计划的去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罢工和同一产业同盟罢工（如铁路，矿山，市政，纱厂，丝厂，米面粉等等），在目前客观形势上，群众斗争很易于走入罢工运动，尤其是同一产业的工人，每每因为斗争的发展，形成同盟罢工的前途。并且在目前国民党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及资本家采取有计划的进攻形势之下，个别的零碎的斗争，很易于失败。因此各地党部应有计划的去组织一厂罢工，以至一业同盟罢工，才能推进斗争浪潮更有力的向前发展，打破敌人个别击破的进攻形势。特别在目前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任务之下，只有广大罢工运动的发展，才能实现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而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因此目前对于这一策略的运用应是：

(1) 党与赤色工会在每一工厂应根据群众的实际要求，规定一厂工人的要求纲领，在群众中作广泛宣传。在日常斗争中，应与一厂要求纲领，密切的联系起来，然后才能使日常斗争更加发展，而成为大的斗争和罢工运动。

(2) 赤色工会支部在工厂中的发展，应注意各部门平衡的发展，使每一小的斗争中，在组织上可以推进全厂斗争的发展。每一日常斗争中，党及赤色工会都应注意罢工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才能有计划的去实现一厂的罢工运动。

(3) 为组织和实现同盟罢工，赤色工会应首先在各地召集同一产业的工厂代表会议，或赤色工会支部代表会议，制定同一产业的要求纲领，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在还没有赤色工会支部及工厂委员会的产业中，党之同一产业的各工厂支部，便应有一联席会议，先决定同一产业的工人要求纲领，进行宣传组织与发动经常的工作。即使有了赤色工会支部或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党

的支部也要加紧这工作。

(4) 要有计划去发展同一产业的重要工厂的工作，要发展和建立党与赤色工会支部组织，有了几个赤色工会支部之后，则应成立同一产业的工会。

(5) 为实现同盟罢工，最主要是在某一工厂发生斗争时，应号召同一产业的工人起来，使斗争上发生共同关系。在日常斗争中，要加紧到共同要求纲领的宣传。在各厂有斗争时，应互相联系起来，提出共同要求，以发展到同盟罢工。若是不注意斗争的联系，而仅和平的去组织，这不但是一个空想，而且是很大的错误。等于口头上接受同盟罢工，同厂罢工的策略，在实际中又来取消。

(6) 在罢工中要采用正确的罢工战术，使一切罢工要顾到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主观的斗争力量，使其可能发展，与继续的前途。尤其是斗争策略之适当的运用。

(七) 加紧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作

改良主义目前在工人斗争浪潮中，虽然日渐缩小，但是改良主义的活动与企图，反因群众斗争发展，特别是国民党进攻苏联以来，更加积极。在军阀战争中，改组派更在群众中积极活动，实行欺骗方法，企图利用群众来争夺反动政权，并且一部分落后群众中颇易于对改组派发生幻想。党及工会反改良主义的工作，不应稍懈，更要坚决的在群众中来揭破改良主义的面具，特别要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揭穿改组派的欺骗罪恶，同时更要坚决的反对一切合法运动。对于国民党各派在群众中的互相利用群众和夺取群众的阴谋，更应毫不留情的领导群众反对他们，并驱逐被他们利用的黄色领袖。

反改良主义，特别是反对改组派的利器，是宣传党的政纲及此次第五次劳动大会的斗争纲领，这才更有力的揭破改良主义目前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

(八) 发展工人武装组织和武装训练

在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行动之下，在群众斗争发展中，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是目前最迫切工作。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是党的主要任务特别在目前更要加紧这一任务的执行。群众斗争的发展，已自发的发生武装冲突（如青岛北平等地），在一般群众中已发生这种需要，因此各地在工人群众中，应立即开始有计划的去发展工人纠察队，成为经常的组织。这些组织，应在斗争中极力扩大，开始进行干部武装训练。关于武装暴动和武装拥护苏联的意义，在宣传上更为重要。在群众中，应求扩大和深入，尤其是目前改组派专利用武装暴动的名义，欺骗群众，实行土匪的军事骚动，更要坚决的揭破他这种阴谋和欺骗，正确的解释武装暴动的意义，及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对于黄色工会中武装组织，应积极参加进去，扩大赤色组织宣传，并夺取其群众，这是一个很中心的工作。

(九) 正确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与争自由的斗争

党与赤色工会要扩大在群众中的活动与领导，必须正确的运用公开活动策略：（1）以群众力量来争取公开活动；（2）在斗争中自动公开；（3）应运用一切可能机会（不是遵守国民党法律范围）求得公开，半公开活动；（4）运用一切政治问题，作公开的群众示威运动；（5）公开工作要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赤色工会中，党团组织是秘密的，指导机关也应是相当秘密的。

争取公开的活动，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即是争取革命工会一切自由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直接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应当在一切斗争中来发展这一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争自由的罢工与示威运动。这一斗争发展，才能引导工人走向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暴动前途。

(十) 加紧对于青工女工的工作

在目前资本进攻中之生产合理化，青工女工的工作更有重大作用与意义。过去对于这一工作还不充分，特别是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的斗争领导，更不能有计划的去进行。目前党与团和工会，都要特别加紧这一工作。有计划的运用各种方式，去发动斗争。在赤色工会的青工，女工，即要独立建立工作，纠正过去形式主义的工作。

党与团和赤色工会，应特别注意黄色工会内青工女工的工作与组织，坚决的发动青工女工的斗争，使他们能脱离黄色领袖领导，独立的斗争起来，这是反黄色工会之更有力的主力军。

(十一) 坚决反对取消倾向

机会主义——反对派，完全在他一贯的取消中国革命路线之下，否认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认为群众斗争还只是部分的反抗斗争的形势，反对进攻策略，主张合法运动；这简直与改良主义没有两样，并且在群众中，比改良主义还要危险。党及赤色工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坚决的肃清这种思想使它不能存留在党内。凡是主张取消赤色工会的组织和发展，放弃反黄色工会与其领袖的斗争，反对在黄色工会内独立领导斗争，放弃在黄色工会内建立赤色工会支部，怀疑目前斗争形势，都是最右倾的危险，必然的要走上取消派的道路，党应坚决与之斗争。只有严厉肃清这些倾向，才能够根本肃清取消派的思想，保证党在职工运动中正确策略的执行和实现。

中 央

一九二九、一二、一四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五、中东路事件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

(1929年7月12日)

全国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学生们！

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

自从国民党叛变中国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便更加紧的向中国一切劳苦群众进攻。两年以来，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卖国外交，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益发巩固。现在，帝国主义不仅是更残酷的剥夺中国劳苦群众的血汗，并且想更进一步的利用中国做反对苏联的根据地，帝国主义现在唆使他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很凶蛮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在今年半年间，中国国民党已经历次的向苏联进攻，最野蛮的便是现在的哈尔滨事件。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国民党无故的搜查苏联领事馆，拘捕三十九人，以后并假做许多污辱苏联的谣言。七月十日更进一步的以武装驱逐苏联在中东路上的一切职员，拘捕三百余人，公开的极野蛮的向苏联进攻！

中国国民党在向苏联进攻的时候，表面上拿着收回中东路口号，事实上完全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代帝国主义以夺取苏联在中东路的权利。苏联是革命胜利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第一个自动的放弃在中国之一切特权的国家。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东三省现在事实上是日本的殖民地，奉系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之最忠实的走狗，若现在将中东路交给“中国”政府，事实上是等于交给了日本帝国

主义。苏联为要保卫本国之无产阶级的政权，为要保卫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不能将进攻自己之一个武装工具交给敌人。现在国民党已经很明显的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加入了反苏联的战线，利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实际上是开始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进攻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拥护苏联。

中国国民党对于其他帝国主义作尽了一切无耻的卖国勾当。譬如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民众数千，国民党对日本丝毫不敢反抗。日本对东三省之积极的殖民政策，建筑铁路，扩大航权，增加兵备，建立满洲与朝鲜之经济的与政治的统一机关，中国国民党对于日本的这些行为，看成理所当然，不但不反抗，反而将日本帝国主义看成太上皇，反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夺取苏联的中东路。中国国民党情愿将整个中国送给帝国主义，情愿替帝国主义做反苏联的先锋！

武装收回中东路的事件，很显明的是整个中国国民党与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向苏联的进攻。奉系军阀固然是这一次事件的执行者，但若不得着整个中国反革命势力的赞同，则奉系军阀仍然不敢向苏联进攻。所以当张学良及蒋介石等在北京会面之后，便很迅速的执行了帝国主义的命令。

同样，夺取中东路的指使者也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乃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若没有得着英美等国的谅解，则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敢单独行动。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死敌，中国劳苦群众对苏联的同情，尤其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所最恐吓的事实。所以整个国际帝国主义都在尽力破坏苏联与中国劳苦群众的亲善，都想利用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

自然，狡猾的帝国主义者口头上是不这样承认的。帝国主义者还要假借这件事更向中国进攻。帝国主义将要借这件事来

作为反对撤消领事裁判权的口实，尤其是日本，将要借这事实来增加在中国的武装。这些都不能遮盖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野心，反而更加显明指出，进攻苏联及进攻中国是帝国主义者双管齐下的任务。

一切中国劳苦群众都记得：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只有苏联是中国革命之最真实的朋友。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的时候，首先便与苏联断绝关系，屠杀苏联在中国的领事。现在进攻苏联的中国国民党，便是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刽子手，便是剥夺中国民众一切自由的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一切中国民众之大小的革命斗争，反革命者都认为是：“苏联的指使”。这些都证明：在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来，中国劳苦群众及苏联都是他们一样的敌人。

苏联是反帝国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的任务是要帮助全世界被压迫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完成世界革命。同时，一切帝国主义都知道，苏联与被压迫劳苦群众的联合一致，便是帝国主义的末日。所以帝国主义在进攻苏联的时候，同时便积极的压迫中国革命，在压迫中国革命的时候，也就不忘记对苏联的进攻。

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苏联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就是苏联的失败！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也就是向中国革命的进攻。苏联及全中国的革命民众是在同一战线上奋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在国际反帝国主义赤色日——八月一日举行示威，来抗议哈尔滨事件，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

巩固苏联与中国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走狗——中国国民党！

苏联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七月十二日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8期)

撒翁^①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1929年7月28日)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

^① 即陈独秀。——编者

众多数心理又是怎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来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

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撤翁

七月二十八日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中央答复撒翁的信

(1929年8月3日)

撒翁同志：

读了你二十八日关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后，觉得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

一、中东路问题很明显的是反映着现在世界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斗争，帝国主义有计划的进攻苏联的表现。如果认为这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或者是“国际纠纷问题”，这就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

中东路问题既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所以这一事变发生〔展〕的前途，将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固然帝国主义间因争夺中东路引起了相互的矛盾，障碍着他们马上对苏联的武装攻击，但是他们在对付苏联的一致目标之下，仍然要企图以共管中东路以及其他的方法来暂时〔来〕调协这一矛盾。所以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如果解释中东路事件而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的两个前途平列起来，不只是迷乱了群众对于主要危险的认识，而且这一分析的根本就是离开了阶级观点得出来的结论。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虽然都是反革命的性质，但是他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势力内部的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

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的不同的策略。如果只是说“不管那一种，中国人都要受着直接的蹂躏”，那么，群众将要走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影响之下，盲目的反对战争，就会说“国民党和苏联都要不得，造出战争来蹂躏我们，双方都要打倒”。国民党马上来一个欺骗宣传，造一个假电报说“苏俄先开炮，战争的灾祸应该是苏俄负责”，马上可以把群众转移到仇视苏联。所以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结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

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我们目前的任务与广大群众的要求，都是为着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一方面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广大群众很容易认识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认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方面，决不是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只是为着自己剥削劳苦群众的利益，牺牲民族的利益。国民党虽然极力宣传他的虚伪的民族主义，拿出“拥护中国”与我们的“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企图欺骗广大的群众，但是，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指出这个口号的真实意义和利益，广大的群众很快的可以答复他：“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

你以为这种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的口号，广大群众不只是听到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且在过去革命时期（当然有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者除外）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中国大革命决不是空过了的，的确训练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只要我们的宣传能够深入，是不难揭破国民党的欺骗的。现在广大群众还没有

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积极〔起〕行动起来的原因，固然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还是白色恐怖的镇压与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十分深入。

就是中国群众真正如你所想象的这样落后，我们亦不应掩饰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尤其不应该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因为这样不只是不能取得群众领导群众，而且要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公开的揭出真理，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广大的群众必然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证明，而一天一天的团结到我们口号的周围。结果避免“拥护苏联”的宣传，首先我们自己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更无法使广大群众来了解这一真理！所以中央在宣言上这样的指出是毫无疑义的正确。

你所提议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意义就是说“你们收回中东路的政策定要引起世界大战，要使中国受到更大的损害”。在朝党蒋介石会马上答复说：“不会的，我们有世界列强的援助，苏联决不敢开战，列强因为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的敌视，他们也不敢自己打起来，我们便可以操纵其间，取得中东路的实际的利益”。这样便使广大群众对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实际利益的观点完全模糊了。就是单纯的提出“反对卖国”的口号也还是使群众模糊，国民党还可以用诡辩狡诈的方法来欺骗群众，一定要明显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利益，才能使国民党无法狡赖，使广大群众的认识不致模糊。

三、中央四十二号通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这是“必然”的，而不是“也许”。我们必须把这一前途明显的告诉群众，才更能使群众了解苏联的势力是建筑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上，在反苏联战争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的起来与反革命势力决斗，才更能

坚定群众以国内战争来答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决心。所以中央这一次的指出，也是毫无疑问的正确。

四、总观来信的内容，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

中央热诚的希望这一解答的信到达以后，很快的得到你取消这些观点的申明。

中央始终是希望同志公开的发表对于政治对于党的意见，并且始终是极诚意的来讨论同志们的意见，从没有甚么误会与揣测，尤其是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都不应恐怕他人的误会与揣测，而隐藏自己的意见。中央以布尔塞维克的热诚，准备接受你以后对于重要问题的意见。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央
八月三日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陈独秀 1929年8月11日 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答复，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割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赘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方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

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象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话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析，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析，‘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点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而是脱离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

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下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吗？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谈“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和“反对英美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说，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析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析的话再向中央解析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象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

英美两国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于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那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象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以“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到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

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口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自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 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 “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对于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析？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是否应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

南京在“耍弄手腕”(社论)

(1929年8月11日)

中东铁路事件的真正挑拨者有着—项深谋远虑的在远东进行反苏活动的广泛计划，南京政府现在正极其卖力地扮演着中东路事件真正主谋为它规定的角色。我国报刊前不久发表了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和事佬”和“调解人”的阴谋的材料，并指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朝枢通过国务院充分了解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采取的种种步骤。我们肯定，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是任何人不会，也不敢加以否认的。这些材料证实了我们原先发表的看法：南京正在执行着有关资本主义集团的特种使命——促使大国干预和实现中东路问题的国际化。

从纽约和北平获得的消息表明，伍朝枢正按上述方向开展频繁的活动。例如，日本驻北平使馆的半官方报纸就曾断言，伍朝枢正在仔细地研究国务院提供的关于由美国代表领导的国际委员会在解决南美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领土冲突时的活动材料，据美国报纸称，史汀生先生企图组织而未能组织起来的“不偏不移的”中东路“冲突调解”国际委员会就是以上述国际委员会为榜样的（事实上调解是为了把中东路移交给由摩根集团主宰的国际银行团^①）。同时，伍朝枢也是卖国将领和外国资本家可耻的代理人政府的一位称职的代表，1927年12月他担任外交总长之时，就曾按张伯伦的意志，从华中和华南驱逐苏驻华领事馆人员，现在，

^① 许多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情况——原作者注

这位代表又采取同样手法，利用完全属于捏造的、笨拙透顶的假文件（据说是搜查苏驻哈尔滨领事馆缴获的所谓材料，可证明我们在中东铁路进行的破坏活动），第一百零一次呼吁美国“舆论界”支持南京政府同苏联进行斗争。

我们重提这些连资本主义报刊都感到羞耻的（参加美国报纸对伍朝枢讲话的反映）、恬不知耻且荒唐透顶的言论，不是为了对其进行驳斥，因为谁会相信，那些与南京政府已重归于好并且和其他军阀一起参加反苏运动的“对叛将领”^①（以前南京对冯玉祥的称呼）的行动是受苏联领事馆和中东铁路苏方职工的挑唆呢？又有哪个傻瓜（除了第二国际的《前进报》之类的报刊）敢冒风险，去附和他们那种所谓苏方职工根据共产国际的布置策划破坏中东铁路的说法呢？须知中东铁路正是依靠苏方管理当局和苏方铁路员工的努力才取得惊人的成就，而现在中国军阀正在给这条铁路造成混乱，对它进行破坏和劫盗。但是，这些捏造出来的指责却足以证明，南京的冒险分子打算继续进行其旨在进一步加剧冲突的挑衅活动。

然而，南京方面不敢亮出它的底牌。整个中国的舆论（包括对苏联怀有敌意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除了一小撮封建地主和买办资本家以外，都要求根据北京协定和奉天协定解决同苏联的冲突，不许其他国家控制中东铁路。

奉天方面某些对情况有所了解的温和派军界人士也希望冲突获得解决，因此，南京方面不得不耍弄伪善手法，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随时随地同苏联进行谈判，和平解决冲突”，以欺骗国内舆论。也正因为如此，南京政府歪曲事实并不顾我方一再否认，竟继续散布所谓双方正在满洲里车站举行谈判，中方派出的代表是朱绍扬等等。

① 原文如此。——编者

这与苏联政府发表的斩钉截铁的毫不含糊的声明也是相违背的。苏联政府声明，进行任何谈判的前提是，必须履行加拉罕同志在致奉天政府首脑张学良的信中所阐明的最低条件。

中国的将领们自己也并不指望这种怯懦的、两面派的挑衅性政策能获得成功。他们知道，这种政策不可能不被戳穿。但是，他们指望通过这种“手腕”达到促使帝国主义大国插手此事的目的。发自东京的电报就说明了他们的真实意图。电报称，南京政府已致函“凯洛格公约成员国”^①中各大国，告知他们苏联政府立场僵硬，并提出种种“过分”要求，致使通过直接谈判以解决冲突的可能性遭到破坏。此类函件不啻是南京政府公开呼吁帝国主义者进行干预。而这些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讨论史汀生提出的不怀好意的方案。接近德国外交部的《科隆日报》这几天正在发出让人“宽心”的调子，说史汀生的方案旨在一旦失败，便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冲突。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同以往一样认为远东局势依然十分紧张和可能发生种种意外的原因所在。

可见，我国工人农民的行动是正确的，他们号召人们极大地提高警惕，坚决地给中国军阀以回击，并且毫不懈怠地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我国的国防威力。

(马宝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① 凯洛格公约又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条约，于1928年8月27日由美、法、英、德、意等国在巴黎签订，先后加入公约的国家有48个，此公约因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外长白里安而得名。——原编者注

是谁挑起冲突？（社论）

（1929年9月6日）

南京政府于8月28日向我国提出要求，就解决苏中冲突的基本原则签署一项联合宣言，可是，对苏联政府就南京所提宣言草案提出的修正和补充意见却至今未予答复。

南京方面作出一副要对苏联建议进行认真研究的样子。其实苏联建议的内容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中国当局至今仍未停止其具有明显挑衅性质的行动，苏联政府再次表示了它一贯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和平解决冲突的愿望。

据日本通讯社透露，南京似乎打算把苏联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为内容，召集其驻吉林、沈阳、哈尔滨的外事专员进行广泛的磋商（真够民主的！）和讨论。换句话说，南京企图在冠冕堂皇的籍口之下，无限期地拖延作出答复的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南京政府的诚意及其协商解决冲突的愿望。

请看下列事实。

就在南京向我国提出建议之后，满州掀起了一股疯狂的迫害苏联公民的白色恐怖浪潮，而且公开提出其目的是彻底清除苏联侨民。最新消息表明，中国当局正以前所未闻的残酷手段迫害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被拘禁和关押在集中营的苏联公民达二千人之多，他们遭到种种折磨和拷打。我们有数以万计的同志正在监狱和拘留所中受苦，凶残的刽子手们对我们的同志进行了中世纪式的审讯和迫害。许多苏联公民失踪。已查明被砍头的即有数十

起之多。苏联公民的财产成了战利品，此时谁敢表示一点和平的意愿，谁就会被押上绞刑架。如果诸如此类的事实就是“真诚地渴望和平”的表现，那么，请问，什么才算是挑衅呢？

最近几天以来，中国军队向我边防军开枪射击之事再度增多，白匪多次企图潜入我国境，遭到打击。如同前几次一样，对于挑起此类事件的“主谋”来说，其结果将是可悲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卑鄙无耻地践踏北京协定第六条的行为就是中国当局遵守协定精神和文字的表现的话，那么，怎样的行为才算是挑起战争的行为呢？

与此同时，由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颇有点名气的伍朝枢（此人1927年曾任南京政府外长，以极端反苏和公开充当张伯伦的走卒而出名）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居然敢于公开发表演说，以极其卑鄙龌龊的语言再次诽谤苏联，并在德国和法国社会法西斯分子及英国“工党”政府代表的热烈掌声中侈谈什么中国政府热爱和平恪守凯洛格公约。中国将领和政客们以及他们在第二国际中的忠实盟友们真是虚伪和无耻到了极点！就是这个伍朝枢1927年时曾包庇过折磨和拷打我驻广州领事馆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的刽子手，就是这个伍朝枢曾被人称作是中国外交官中卖国求荣和最不知羞耻的一个，现在，他又在日内瓦集市上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挽着胳膊一起进行表演，并且准备向国联递交一份关于苏联代表在中东铁路活动的“详尽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而且此事发生的时机恰恰是南京政府已经被迫承认，苏联政府根据1924年协定（该协定为中国当局所违反）要求任命苏联的正、副管理局长并改变铁路被强占后出现的状况，是合理而有根据的要求。

南京的代表正在国联作出新的尝试，企图取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军阀强盗般的反苏联计划的支持。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试问，南京的爱好和平的保证今后还能值几文钱呢！

我们已经提出过，南京政府通过德国政府转告的那些建议，完

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在形势日益严重和恶化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举动。我们无意历数形势恶化的各个方面，只需指出一点，即这些严重恶化的情况至今并未消除，也不可能消失，相反，种种消息表明，中国国内的危机还在不断发展和加剧之中。

然而，这并不排除南京政府挑起新的反苏事端以换取外界支持的可能。

从这个观点来看，南京政府的铁道“顾问”（嘿、嘿也许是主人吧！）曼德尔先生极端蛮横无理地声称不得恢复中东铁路原状的发言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不打算去分析英国铁路大王艾德贝利和洛利的这位代表为证实所谓苏联铁路管理局“巧取豪夺”而进行的恶意攻击和欺骗性地引用的数字，因为事实本身就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是根本无法证实的。中东铁路管理局长奇尔金同志应美国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请求而发表谈话时，已经运用确凿的，无可辩驳的数字，对这种恶意诽谤作出了回答。

帝国主义某些人士向南京政府发出了主子的吆喝声，这一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人士虽早已为我们所揭露，可是直至最近他们仍躲在阴暗处，甚至还以调解人和和事佬的身份出现，表示愿意效力。

现在，这些主子不得不公开露面了。他们感到，南京政府迫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压力，正开始采取某种步骤，以求和平解决苏中冲突，因此，他们再次企图破坏这唯一可能消除冲突的因素。

南京政府态度僵硬并再次挑起新的反苏侵略事件，其真正奥妙就在这里。是谁指使中国傀儡在日内瓦扮成和平主义的夜鹰，唱出美妙动听的歌声？又是谁为了引起冲突的再次激化和破坏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不惜一次又一次企图在最敌对的、卖国求荣的和冒险的中国军阀分子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这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曼德尔并非孤家寡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法国资本家也同他一唱一和，而他们又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美国“工党政府”代表的支持，一项新的企图通过中国军阀之手在远东燃起战火的冒险活动已在策划之中。

中国军阀们定会再次看到，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不愿冲突得到和平解决，正把他们推出来进行冒险活动，但愿他们不要觉醒得太迟了！

苏联公众从不相信南京方面的外交手腕，他们期望南京在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证实其爱好和平的意愿。

我国工人和农民在其通过的种种决议中一开始就提出，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措施保卫我国的利益和恢复我国遭到破坏的权利。

我们一如既往，仍应作好准备，给一切试图侵犯我国的图谋以毁灭性的回击，而决不可轻信甜密的和平主义空话。

(马宝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在莫斯科州苏维埃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1929年9月28日）

李可夫

苏联和南京的冲突

苏联和南京之间的冲突问题理所当然地使我国广大居民群众感到不安。更何况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爆发冲突已有相当时日，而且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至今仍十分紧张。

最近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您不采取能导致尽快解决这一冲突的措施呢。为什么您不能采取更坚决的手段呢？”……联盟政府没有采取更为坚决的手段是因为，它认为自己有责任利用一切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

我们在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组织了一个特别集团军并使它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今年冬季该集团军也将继续留驻这一地区。但是，只要和平解决冲突尚存一线希望，就不该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去解决冲突。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未给解决冲突提供任何基础的建议，因为中国方面想在保持中东铁路现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而这种现状是中国当局采取强占行动和粗暴破坏其自愿与我国签订的唯一平等的条约后造成的。在此情况之下，谈

判是不可能取得任何顺利进展的。

作为举行谈判的前提，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必须使中东铁路恢复到发生冲突之前的状态。只有在满足最低要求，即根据条约规定任命了我方管理局长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进行谈判。假如中国人撤换其曾直接组织这次中东路强占行动的管委会主席，另任新人担任此职，我方也可任命新的管理局长。只有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为解决冲突进行的谈判才有取得成果的保障。这是为解决冲突所需的最低要求，必须予以保证，南京政府不接受这一最低要求，说明它把谈判本身当成了拖迟谈判的手段。

中东铁路冲突引人注目的另一个方面是，这可以说是在蒋介石镇压中国革命并执掌政权以后，我国同南京政府关系中最后的一次交道。

自此之后，蒋介石对苏联的政策就表现为连续不断地策划了一系列反苏挑衅活动。十分自然，这些行动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

我请你们回顾一下广州发生的“事件”，我们的领事馆被捣毁，我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包括副领事遭到中国军阀的野蛮杀害，而这一切都是得到南京政府赞许的。你们想必还清楚地记得对我国全权代表机构、领事馆、经济机构的多次袭击，记得我国公民不经审讯便遭逮捕和拷打、折磨和其他种种事实。

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及其后发生的事件使所有这些反苏挑衅行动发展到了顶点。

透过南京政府这个在摧毁中国革命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疯狂地反对中国劳动大众的革命运动和仇视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将领们反对苏维埃政府，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概出了这一政策。可是，苏维埃共和国就制度本身而言，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广大群众心目中的理想，是鼓舞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苏中冲突是

在帝国主义者露骨的庇护之下，通过惯用的造谣诽谤苏联的运动，一步步策划起来的。中东铁路被强行占领及我国对华外交和商务关系中断后，中国驻美公使（顺便提一下，他现在也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曾于今年8月19日向美国政府递交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造谣和诽谤苏联的运动的集中表现。该文件声称：

“……（中国）地方当局搜查该（哈尔滨）领事馆时查获大量秘密文件，其中载有各种阴谋计划，如：

- （1）组织匪徒暗杀南京、奉天及其他城市之显要人物；
- （2）建立秘密部队，解除中东铁路的武装。（笑声）……

读了这段文字，事情就一目了然了，这是一种粗制滥造的反苏捏造，是以极端荒诞不经的说法为依据的。从这一谈话中也可以看出南京政府为其对苏政策寻找理由时所采用的方法的特点。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机构找不到别的合适论据，因此，凭空臆造已成为他们惯用的手法，在资本家对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发生陡然变化时，情况更是如此。南京政府是扼杀国内革命和为帝国主义利益所驱使进行反苏侵略的政府，因此，它在为其侵略苏联的行为辩解时搬用以制造反苏谣言而出名的张伯伦分子和希克斯分子^①的手法，这是毫不足奇之事。

这就是南京政府对我国的态度。但是，中国还有极其广泛的劳动大众，他们对我国的看法是与此截然相反的。前不久外国报刊曾刊载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遗孀发出的一电报，该电报称：

“……正当各被压迫民族组成坚强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之时，南京反动政府竟与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粗暴镇压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劳动大众。国民党反革命派领

^① 希克斯当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原编译者注

袖们的卖国面目从未象现在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背叛了中国革命。就必然成为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就必然企图挑起反苏战争。但是，中国的劳苦大众，不畏强暴，不受欺骗，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战斗。恐怖主义只能更有利于我们动员广大群众，更坚定我们在不长的时间内战胜现在这个实行血腥统治的反动派的决心……”^①

孙中山遗孀的这份电报实质上正是反映了中国劳动群众对蒋介石的情绪和对我们国家的看法。

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也同粗暴指责我们的一小撮中国将领一起，与蒋介石相配合，指责我们是“赤色帝国主义”。

将“赤色”和“帝国主义”摆在一起。本身就是毫无道理的。“赤色”一词显然是作为革命的同义语加以运用的，对于苏联来说，“赤色”即革命无产阶级之意，而“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外国财政资本对落后国家实行统治并加紧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现是什么呢？在中国，帝国主义表现为外国人享有所谓治外法权，也就是说他们不受中国司法当局的管辖。他们还可以不交直接税。而且常常可免缴其他税款。现在，中国仍然不享有关税自主权，关税由外国人控制，其收入不归中国人，而归外国人。

中国至今仍在偿付数额庞大的庚子赔款，这项赔款现在由关税收入押偿，而关税管理机构的领导权均握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手中。征收盐税的机构，邮政电报管理以及某些铁路管理机构同样处于外国控制之下。许多大城市（上海、天津、汉口等）都有大片地段被划为外国租界。这类租界各方面都不归中国当局管辖，它属于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就由那个国家独霸一切。这种租界

^① 未查到电报原文。这段内容系按俄文译出。一原编者译注

均由外国警备部队和外国警察守卫。

上海的国际租界或租界区的地位更为特殊，它实际上是由英国人管辖的、独立的“国中之国”。租界区内居住着百万中国人，只有几千外国人。可是，中国人在租界管理机构中没有任何势力。更有甚者，居住在租界区的中国人不受中国司法机构的管辖，而受外国人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临时特别法庭审判。

北京有一个使馆区，这个使馆区完全不受中国当局的管辖，中国警察和中国军队未经外交使团许可不得进入该区（顺便说一句，在外交使团存在期间，中国警察和军队只有一次被允许进入使馆区，那就是去袭击苏联大使馆）。

中国的领土也是向外国开放的。根据《辛丑议定书》规定，外国使团有权在北京以及连接北京和海路交通的铁路沿线派驻特别军队。除此之外，派驻上海外国租界这和其他任何租界的军队数量可不受限制，这些租界一直是由外国军队守备的。中国沿海地区及内河也都向外国军舰开放。尤其是长江，一直驻泊有帝国主义大国的分舰队。

最近几年来的实际事实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一遇机会就使用军队来维护其特权和蹂躏中国人民。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以前，几个大国曾在中国领土上炮轰中国城市，炸毁和平居民的大片大片房屋。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及其卫道士的羁绊，那么，今后还会重演这类事件。

外国享有的所有这些权利和特权保证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至于外国资本在经济上的势力，其表现就是采矿工业、重工业、大部分棉纺工业以及某几类轻工业的大型企业几乎完全为其所侵占，好几条铁路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极少数中国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属于例外，帝国主义的统治意味着整个中国人民的贫困和无权地位。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得到了第二国际的支持。这个国际的

头领都是欧洲主要国家政府的成员。

那些不仅对直接镇压中国革命,而且对帝国主义军队在别国,如中国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负有责任的人,竟厚颜无耻地指责我们奉行“赤色帝国主义”的政策。

我国对中国的政策早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由列宁直接参加起草的专门宣告中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宣言宣告,苏维埃政府:

“拒绝接受中国因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这已经是第三次作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华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

“苏联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①

苏维埃政府过去从没有,现在也不会从上述宣言阐明的政策后退一步。

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互惠的原则基础之上的,苏联坚决拒绝对中国主权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十分清楚,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苏联是中国唯一的盟友。苏联的政策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撕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① 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版,第14—17页。——原编译者注。

中国将领现在企图强行占领的中东铁路，其本身就是苏联政策带来的新原则的一个鲜明范例。

中东铁路是沙皇统治时期靠剥削工人和农民建设起来的，当时，沙皇政府不仅完全控制着铁路本身，而且控制着铁路线的大片地区，驻有自己的军队，建立有自己的司法机构。满洲的中国当局与铁路毫无关系，划归铁路的地带完全变成了俄国的殖民地，沙皇宪兵在那里主宰一切。

但我们根据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首先将这条铁路变成了商业机构，接着又把它变成为苏中两国共管的企业。

管理机构一名中国人任主席和一名苏联公民担任副主席，铁路管理当局局长由苏联公民担任，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铁路赢利由中苏两国分摊。

在同中国人共同管理铁路期间，对铁路本身进行了许多改进，使中东铁路变成了一条经营出色的头等铁路干线。铁路收入大幅度增加后，路局行政机构又化费很多精力去改善广大铁路员工（不分民族）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中东铁路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居住条件。在职务提升，特别是工资方面，中国工人享有与其他人完全平等的权利；在铁路服务不少于六个月以上的铁路员工每年规定有两周的休假；许多季节性开放的车站还拨出来供铁路员工免费休息。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最主要的条款，我们都实现了。通过中东铁路的事例，我们第一次向全世界表明，应当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的政策、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的政策。最近，报纸上时而出现一些消息，说在某个地方正在谈论什么中东铁路的国际化，而且据说中国某些人士似乎也倾向于支持这种措施。

确实，从国际资本的眼光来看，中东铁路冲突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方法扩展到中东铁路上去。这条铁

路要么根据奉天协定^①实行共管,使其为中国的民族利益服务,要么让它成为帝国主义者囊中之物,由帝国主义者按照他们剥剥一切租让的企业那样去进行管理,两者必居其一,这是完全无可辩驳的事实。

围绕国联例会的召开而发生的种种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对中东铁路的浓厚兴趣。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伍朝枢率领,此人向以恶毒反苏和南京政府中的崇洋派著称。伍朝枢在日内瓦受到了经过特意安排的殷勤接待,因此,毫无疑问,为的是以伍朝枢为媒介,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对苏联采取更富侵略性的立场。来自日内瓦的种种消息表明,国联的头领们对苏中冲突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国联虽未敢公开出面干涉这次冲突,但在私下却正企图把中国代表团的的活动引向加剧冲突的方向,借以转移中国代表团对令人不快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注意力。

众所周知,中国曾试图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要求根据国联章程修改国际条约),但却遭到国联中有势力集团极为消极的对待,因此,毫无成功的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一些人正在日内瓦十分起劲地要弄阴谋,希图进一步激化苏中冲突。不言而喻,这一阴谋的最终目的是与某些帝国主义大国利用这一冲突把中东铁路攫为己有的图谋相联系的。

中东铁路冲突是当前国际资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活动日趋活跃的明显标志。站在蒋介石政府背后给它撑腰的是国际资本,而国际资本企图用一只手勒紧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把另一只手伸向已打破本国和外国资本家奴役束缚的苏联各人民,正因为存在着这种情况,中东铁路事件才显得极为复杂,这一事件及冲突的结局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情况也是蒋介石政府

① 指中俄《暂定管理中东路协定》——原编译者注

推行拖延解决和加剧冲突的策略的原因所在。

中东铁路的现状如何呢？

苏中冲突已持续两月有余。苏联政府爱好和平，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即使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也在所不惜。这种立场一开始就使中国袭击者不仅在外部世界，而且首先在国内公众面前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由中国强盗们的疯狂冒险政策制造的苏中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内，特别是满洲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迫于这种危机的压力，中国当局为了安抚社会舆论，不得不提出较为和解的建议。例如，奉天政府在7月22日即已提出在恢复中东铁路原状及任命苏方管理局局长及其助手的基础上举行谈判以解决冲突。

然而南京对消除冲突不感兴趣，因此，尽管恪守和平政策的苏联政府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忍让精神，事情依然毫无进展，因为奉天政府仓促地收回了自己的建议。南京的外交官们后来曾向全世界炫耀，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总算说服了奉天方面，促使其放弃原先的建议。

《太平洋彼岸》杂志（东京8月29日号）对南京和奉天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描述：

“从中国强占中东铁路因而爆发中苏冲突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蒋介石将军力图排挤奉天的年轻统治者张学良将军对三省的领导，力图建立南京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控制。

“前不久南京决定派十万大军开赴东三省以援助张学良，这是一个阴谋，其目的是一旦中俄真正爆发冲突便可借口向奉天军阀提供援助而使南京军队涌入满洲境内，进而迫使东三省接受南京的政治和军事控制。

“从最初爆发中苏之间的中东铁路冲突时起，南京对苏俄一直采取极端僵硬的态度，据报刊消息称，其目的在于使奉天方而处

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因为冲突的继续使张学良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受到削弱。”^①

现在，南京政府出于内政的需要和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必须使老百姓相信：谈判已在进行，很快就要结束，全权代表已在出发途中，实质上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它企图造成正在进行谈判的现象，以便安抚国内居民。

有人对我们说，南京对我们公布有关苏中冲突的全部文件感到不满。产生这种不满是因为，公布文件本身就会彻底揭露南京政府的伪善行径。秘密外交一般来说是有害的，在当前情况下更是如此。南京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外交寻求欺骗公众舆论的手段。

南京企图促使苏联政府走秘密外交之途径，从而帮助南京掩盖其种种阴谋手腕，特别是掩盖南京政府出尔反尔的事实。你们大家通过报纸消息已经知道，中国政府是把恣意侮辱苏联公民(如冲突期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那样)当作向我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之一的。

我们获悉，有大批苏联公民被捕，不经审讯便予枪杀以及遭受侮辱拷打等等。

在中国军阀将领强占中东铁路期间，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以至杀戮、抢劫、殴打苏联公民的事层出不穷，其野蛮程度前所未闻。大批苏联公民被逮捕，不经调查审讯即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

与此同时，中国帝国主义者还组织了一批白匪，依靠这批白匪和中国军队袭击苏联领土。

我们不止一次提醒中国政府注意其下属地方当局在边界造成的极端危险的局势，并且列举袭击苏联领土的种种具体事实，要求对方解散白匪部队，停止袭击活动。中国政府无法否认我政府列举之事实，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

^① 原文无下引号。此处是根据上下文内容标的。——编者

对于我国领上的每一次袭击，对于我国边界发射的每一发炮弹，我们已经给予回击还将给予回击，以便使南京政府不敢再进行挑衅。

我在报告开头就概括地阐明了我们对国家政策的基本方针，我说过，鉴于秋季即将来临，我们不仅打算把布留赫尔的集团军撤回来^①，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和壮大这支军队，使它处于更好的战备状态。（热烈鼓掌）

只要和平解决冲突尚存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热烈鼓掌）

但是，我们决不会接受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向我们提出的，实质上意味着要我国政府屈服于中国军阀的要求的那些条件。（热烈鼓掌）

.....

（马宝华译）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① 原文如此，含意似不合逻辑。——原编译者注

南京在耍弄新的诡计 (社论)

(1929年11月30日)

11月29日,我国政府收到南京政府11月14日发出的照会。在我国政府收到该照会前数日,中国和德国报纸和通讯社便刊登和报道了这一照会内容,它包括:(一)建立双方人数相等的委员会,由一名外国人担任委员会主席;(二)双方军队从各自边界后撤三十英里;(三)将苏中冲突交由持公正态度的第三方解决。

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南京提出的建议及揭露这些建议的挑衅性质和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实质。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南京政府是怎样一个政府,他在内政和外交上追求何种目的,他按谁的指挥棒跳舞。我们也曾详细论述过南京政府自爆发冲突以来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出发点就是按照别人给它下达的指令,将苏联卷入军事纠纷中去,为对满洲进行国际干涉制造条件。

我国政府当天就对南京政府冗长的照会作出了简单明了的答复,指出照会所含建议于事无补,具有挑衅性质,而且是无的放矢。同时照知南京政府(它佯作一无所知),我国政府已得悉奉天方面同意接受我提出的能使直接谈判得以开始的各项先决条件。

这份标明11月14日日期的照会引人注目地与满洲的实际情况不符,与在满洲执政的奉系集团的决定相矛盾。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份照会是由于工作差错和误会才迟了两个星期递交我国政府,不能认为照会反映的只是南京政府的昨天。我们毫不怀疑,德国政府正是根据南京的请求将照会搁置至昨天并根据南京

的请求于11月29日，即我国政府已收到奉天政府正式声明之后，再递交给我国政府的。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围绕中东铁路事件而在西欧和美国再次繁忙起来的种种活动，就可以找到南京政府照会引起的种种令人费解的问题的圆满答案。

从韩德逊11月27日在下院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最近以来，英美两国曾就大国对满洲问题采取联合行动进行过谈判。韩德逊坦白地承认，英国愿意参加就这一问题可能采取的任何国际行动。这种谈判还不仅在英美两国之间进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最近以来，法国和德国的报刊正在掀起一场疯狂的反苏宣传活动，要求毫无作用的国联机构和在凯洛格公约上签字的大国出而进行干预。尽管如此，这类谈判依然进展缓慢，颇不顺利，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大国都象韩德逊那样愿意参加任何国际行动，它们对社会法西斯党刊物《前进报》发出的对满洲事务进行国际干涉的呼吁更不敢表示苟同。

南京的照会看来是备而待用，打算在大多数和平“保卫者”确信能够使固执的大国也同意参加联合行动时正式公布的。

奉天的电报提出在接受我方所提前提条件基础上举行直接谈判，这就完全打乱了南京政府及其主子的计划。

在苏联政府又一次表示了爱好和平的立场之后，在已有可能同挑起这次事件和引起事件一切后果的人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冲突情况下，提出将冲突交由第三方解决的要求，看来既是一项颇不光彩的任务，也是一项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

可是，南京既不肯，又不可能放弃其挑衅把戏。站在南京政府背后的，我们的其他凶恶的敌人也不会心甘情愿接受这一点，他们是迫不得已才咬牙切齿地承认，苏联的和平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政策提供了冷静与坚定相结合的最高范例，它既捍卫了苏联劳动群众的利益，又制止了敌视苏联和中国人民的第三势

力的干涉。

有人正不顾一切地企图破坏奉天方面提出的新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出于真心的话）。

南京依然发出了它的照会，其实，在奉天当局给我国提出建议之后，这份照会早已成为无的放矢之物，只能再次表明南京自爆发冲突以来推行的冒险和挑衅政策的破产，现在，连这项罪恶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也力图摆脱这种政策了。

在此同时，一贯反映那些与我国势不两立的敌人的情绪的帝国主义报刊如《时代》和《前进》等正更加起劲地力图把它们最近以来一直在狂热鼓吹的支持国联进行干预（或“任何其他国际行动”）的运动继续下去，可是，在获悉奉天已提出建议后的第一天，它们就不得不难堪地匆匆收场了。

但是，突如其来的冲击刚一过去，这些报刊又精神起来了，并且马上开始叫嚷要给南京以支持，企图以此为南京政府下一步破坏直接谈判的进行提供某种帮助。

正因为出现了不需要任何调解人和中国人而由有关方面协商解决冲突的前景，所以现在我们的敌人正在调动一切力量，以便进一步加剧冲突，使冲突更加复杂化，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南京政府同过去一样扮演的依然是执行者的角色。

说实在的，南京的冒险者们情况确实不妙，他们现在只好求助于递交过时照会之类可怜又可笑的办法，而这些照会只会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暴露他们扮演的挑衅者和卖国贼的面目。

但是，不能轻信，认为反苏势力当前所进行的绝望的努力不可能给我们造成新的麻烦，认为在最近几天出现的解决冲突的捷径和完全可行的途径中不会再产生新的困难。

我们必须警惕地注视我们敌人所耍弄的种种花招，随时作好准备，象远东特别集团军击退中国白匪的袭击和侵犯那样，成功地给帝国主义及其南京走卒们的阴谋以毁灭性的回击，其原因就

在于此。

(马宝华译)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时 刻 警 戒 (社论)

(1930年1月2日)

中东铁路的冲突得到解决。12月31日,中东铁路苏方正副局长开始执行职务。同一天,几个月来在中国反动派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备受折磨和遭到严重迫害的冲突期间被捕的苏联公民全部获得释放。中东铁路即将完全恢复到冲突发生前的状态。这一切说明,中国当局终于懂得了对苏联采取冒险和挑衅政策的无比危险和严重后果,他们没有听从苏联及中国的敌人的策划和背后挑唆,而是采取实际步骤履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协议规定的义务。

苏联政府等待中国当局继续采取措施实现自己的诺言,即解除白匪武装并将其首领和策划者解送出境。中国当局如今已没有特别的理由庇护自己的白匪盟友,许多年来他们都是由中国当局不顾苏联政府的多次抗议而拼凑起来,为其提供武器,并加以利用的。

远东特别集团军已用事实证明,中国将领把希望寄托在这帮雇佣匪徒身上是多么荒唐无稽。

中国将领曾一度听信高尔察克反革命残余分子梦呓般的自吹自擂,以为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以同红军作一番较量。现今他们已经遇到我军部队的毁灭性反击。我军部队汲取了国内战争的全部经验和宝贵传统,在技术装备上有了巨大的进展,并且毫不松懈地在加强训练。

总之,冲突已经消除。为此,我国和全世界的劳动者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起向红旗远东集团军致以热烈的革命敬礼。红

旗远东集团军向全世界表明，红军是维护和平的不可摧毁的强大工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攻破的盾牌。

这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在面临必须挺身抗击妄图干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入侵之敌时，向全世界显示了面貌崭新的英雄主义、炽烈斗志和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成果而战斗到底的决心。它所实施的突击，使敌人感受到决心对妄图使我们脱离和平劳动的一切阴谋给予最强烈最无情抗击的我们苏联劳动群众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红军仍然发扬了过去战斗年代的光荣传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开展，其中包括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防能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军队的进一步加强。我国远东集团军粉碎我们敌人可悲的预言和妄想的胜利，对于提供上述人所共知的事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直至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无休止地对我国的军队进行诽谤，叫嚷说我国的军队已经蜕化变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裂痕，等等，等等。在同苏联进行了多年“和平”斗争之后，我们的敌人第一次悍然出动，妄图认真地用刺刀试探一下我们的军队，想藉以摸清我军的团结程度、训练水平、协调状况，以及纪律性如何，是否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今谁也不敢否认，我们军队已经对于所有向它提出的问题作了详尽明确的回答，这个回答对提出这类问题的所有人都是一次威严的威胁性的警告。

远东特别集团军是我们整个英雄军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极其卓越地完成了苏联政府赋予它的任务。它使中国白匪仓皇逃窜。作为全世界劳动群众的一支武装的先锋队，远东特别集团军决心捍卫全世界社会主义堡垒苏联的十月革命的成果，被迫挺身应战。它高举我们党的旗帜，在一贯身先士卒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率领下投入战斗，广大红军战士表现为一个由共同的利益

和对胜利的强烈信念而团结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与此同时，我军自始至终仍然是国际主义的军队，即世界无产阶级的军队、为所有被压迫者带来解放的军队，它不容许在自己队伍中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骄傲情绪和民族沙文主义存在。

全世界无产者都将以自豪而欢欣的心情看到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无论在武装冲突之前、武装冲突期间，还是在武装冲突之后，中国的劳动者始终把每一名红军战士当作自己的朋友和保护者来欢迎。

毫无疑问，第一次见到我们红军战士的千百万中国工人农民都保留着关于他们所受到的同志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红军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仆从妄图挑拨我们同中国人民关系的阴谋。相反，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农民通过事实已经坚信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是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捍卫者，他们亲眼看到了那种对之不仅不必害怕而且从他那里只会获得帮助们友谊的“带枪的人”

我们的军队以自己的全部行动显示了我们一贯坚持奉行的和平政策。远东特别集团军虽然有可能歼灭敌人，但还是以极大的克制对待敌人的打击和挑衅，并不超越必须的自卫的界限。而一旦查明此类袭击和侵犯是为更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作准备时，我军就给以迅雷不及掩耳般的回击，迫使敌人放弃反苏基地而仓皇逃窜，但也并不继续追击已陷于全盘瓦解的敌人。

远东特别集团军的行动给全世界，首先是给我们的敌人留下令人震惊的印象。所有曾经寄希望于“热月政变”、蜕化变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出现“决裂”、红军将自行瓦解等等幻想的人，如今认识到：我军是在国内战争和无往不胜的社会主义建设烈火中锤炼而成的钢铁般的统一整体，而且坚如盘石，有决心有能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敌人进行回击。

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我们之所以能及时防止远东的战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和平政策是以红军的战斗威力和革命热情为依靠的。

党和苏联政府决心今后继续竭尽全力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竭尽全力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解决中东铁路冲突之后，我们将以更大的毅力和热情着手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任务。不过我们应当也一定会记住，这种和平劳动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我们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红军，以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支持红军。

中国冲突事件的教训说明，我们必须时刻警戒，一分钟也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随时准备进行还击。这次教训也十分明显和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英雄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忠诚可靠的卫士，它能够胜利地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世界范围的革命胜利也与它密不可分。

（乌传袞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附 1:

关于中东铁路事件^①

王正廷^②

本届中东路问题，同人等固深知其内容，但外间一般或有不甚明了其真相之所在，兹特说明其要点：

俄本为吾邻邦，其友谊之良否本与吾国有深切之利害关系。俄自一九一九年以来与吾国友谊向称敦睦，如首先抛弃领判权、租借权等，不能不谓为善意对吾。然为何近来屡有不能融和之事发生，实为俄人欲强吾实行共产之所致。在吾国固不愿过问俄之政治组织，但俄亦不应来干涉吾国之政治组织。现在中俄感情之所以日趋恶化，即为俄人强欲干涉吾国之政治组织，使与彼国相同。干涉不遂，甚至欲实行倾覆吾国之政治组织。吾国为几千年之文明国，对于政治组织自有利害之经验，断不能抛弃几千年经验所得之政治组织去学他杀人放火之共产政治。俄人如此不能有彻底之觉悟，故有今回不幸事件发生，其责任完全在俄。要知中东事件之发生，由于俄人在哈尔滨之共产密谋，吾国之驱逐俄人，是驱逐共产密谋之人员，不是要夺铁路。世界各国之对于共产宣传虽有禁有不禁，而吾国法律实在必禁之列。至于倾覆政府，则世界无论何国皆所不容。现俄之对于吾国不特宣传共产，更进而实行倾覆吾政府。是可容，孰不可容。中东铁路本为中俄所合办，吾

① 此文标点为编者所加。——编者

②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编者

国自有主权。即有纠纷，本可两国从长协议。故今日之驱逐俄员，不是要抢铁路，是自卫国家。不是以武力对俄，是和平方法之自卫。关于此点真相，最要使全世界明了的，吾国故不主张以武力对俄，想俄亦不能主张以武力对吾。中俄两国均为签字于非战公约之国，非战公约之规定一切争端须以和平方法解决，用武力为犯罪的行为，俄若对吾用武是对非战公约之犯罪行为。吾国历史固向重王道，总理主张亦一本于王道。故吾国不但合全世界潮流之趋势，且为非战公约之实行者。若俄必出于犯罪行为，则不特为世界公理所不容，而在吾国为自卫计，为民族地位计，“宁为自由鬼，不愿为不自由人”。

（录自《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3号，1929年7月）

附 2:

中东路之概况及我国不得 不收回该路管理权之理由^①

胡文柄

俄人利用中东铁路为宣传赤化之大本营，以中东铁路之收入为宣传赤化之经费，若任其妄为，则如毒蛇猛兽之赤祸必将弥漫于全国，而我国将有亡国灭种之隐忧，故不得不将中东路收回，藉以防止乱源。今将中东路之大概情形及我国不得不收回该路管理权之理由略述于左^②：

中东路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开车，即西历一九零三年，已历二十七寒暑。以迄于今几经变化，计干线共长一八三四俄里或一九七零公里，支线二二五俄里或二四二公里，干支线共计二二一二公里。此固我国东北重要之交通路线也。

中东铁路何自而起乎？前白俄帝国时代欲实行其海洋政策，初想在波罗的海寻一良港，但以丹麦德意志扼其门户，志不得伸。继想在黑海练海军，但以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之役败于英，一切计划都成画饼。俄国西不能出波罗的海，南不能出黑海，故不得不改变方针向东发展，既建海参崴为军港，以便其东洋舰队之集中。复建筑贯通欧亚之西伯利亚铁道，以便其军事上之运输。惟以我国北满领土向东北突出，如欲将其铁路完全由俄境直达海参崴。则

① 此文标点为编者所加。——编者

② 原文为竖排本，故此处为“左”。下同。——编者

路线迂回曲折工程费用势必大增，故通过我国吉黑两省以直达海参崴。当时清廷受俄人之威胁利诱，遂于一八九六年先后与中俄缔结密约及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且规定铁路附属地及铁路之组织设有民政、军事、航务等处，公然侵害我国之主权。故中东铁路乃白俄帝国胁迫我国而得之脏物也。

旧俄帝国之东下的侵略政策与日本帝国之北进的大陆政策本为历史上积不相容之仇，此两种政策之冲突于西历一九零四年爆发，日俄战争即于是年开始，结果俄国失败。由美总统罗斯福调停，遂在美国朴茨茅斯地方订结条约 Treaty of Portsmouth。该条约中关于中东铁路俄国失去其支线一大段，该约第六条规定曰：“俄国以中国政府之承诺，将长春（宽城子）旅顺间之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同地方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与其炭坑无条件让与日本。”此条支线便是今日南满铁路的前身。故日本在南满已有充分之活跃，而对北满亦未能一日忘怀狼子野心，欲壑难填。故日本于中东事件发生后全国异常注意，或增兵南满，或造出不确实之消息，其幸灾乐祸思攫得渔人之利尽不难想见也。

日本帝国主义抱定大陆政策。日本欲向大陆进展为其数百年来之传统政策，自丰臣秀吉征韩起，经中日、日俄两战以迄于最近之山东出兵，无一非其传统政策之表现，而于中东路亦未能忘情。如其攫得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相衔接，则朝鲜、南北满、蒙古、西伯利亚便可打成一片，日本雄飞大陆之霸图不难即日实现。如为苏俄取得，即可为向南发展之根据地。该路由我国收回，则为最合于正义之举动。我之土地岂可成为他人逐鹿之场，且日本欲北进，俄国欲南下，今此路由我国收回即可为日俄两国之缓冲地，故于国际上之和平亦极有关系。以上就中东路建筑之原因及其位置之重要而言之也。

一九一七年俄国实行共产组织苏维埃政府后，其国际地位甚欠稳固，亟欲求中国之同情，请求中国首先承认苏俄政府。故于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对中国发表宣言，内有关于中东铁路之言论：“劳农政府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矿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及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苛而恰克等贼徒与从前军民商人及资本家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交还中国，毫不索偿。”

当时俄国处于极困难之地位，急欲得中国之同情，故发表上列宣言。但一转瞬间态度即变，对于无条件交还中东路一层即欲自食其言。其外交之反复无常，于此可见一斑。一九二四年由顾维钧、加拉罕签订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宣言之旨趣大不相同。

自此以后，俄国专以中东路为在中国宣传赤化之中枢，而宣传赤化之资金则仰给于东路之收入。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十二时至下午三时，在哈埠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集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议，列席者为东路沿线各处之首领以及哈埠铁路人员，又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中央商业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贸易局等机关并赤塔伯力各地之共党首领均来哈参加，共约八十人左右。而东路商务委员司达祥维赤亦为重要首领之一，前驻辽俄领库滋聒毓夫亦与会。中国为贯彻自卫主张，始有搜查驻哈苏联领馆之举，所获确实文件种类极多，早已在各报登载，故不述。当俄领馆知悉中国当局依法派警前往搜查，急将宣传共产重要文件焚毁，但其来焚毁之文件为我国所搜得者已足以证明俄人之种种阴谋矣。我哈当局为自卫计，为消灭赤祸计，迫不得已遂驱逐赤俄共产党人并接管该路管理机关。苏俄对我苟具有善意，则对于此次我方行动当然认为合理，不致稍有抗辩。乃苏俄政府不但不承认其已往罪过，反蛮横异常，对我宣布绝交，在国境调兵示威，驱我侨民、没收财产、扣我商轮，似此非法行为，残暴举动，苟稍顾国际信义、图世界和平者断所不为。现由两国派代表商议，又提出最不合理之条件，以致会议停顿，施行种种恐吓手段。俄人之无恶不作、狡诈性成于此益信。

我国此次收回中东路之管理权实具有最充分之理由，今举其大者言之：

(一) 俄人违背协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第六条云：“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存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今俄人违背上列规定，专以中东路为宣传赤化之机关，在哈埠俄领馆搜出之文件可以证明。今略举数端于左：

俄人欲赤化中国之言论在上述文件中到处皆是，其所成立之共产机关名目繁多，今不一一枚举。

除欲赤化中国以外，尚欲实行暗杀主义。如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由哈尔滨经过海参崴向第三国际发出之长途电报内有云：“按诸本地形势，欲实行暗杀主义为时尚早，应于事先妥为筹备，其中不可缺乏者，即增加钱款购买爆炸物及其他与此目的有关系之材料，以备南京、辽宁及中东路沿线一带应用，目下仅可在南京至辽宁间及其他重要埠头实行暗杀主义，至中东路一带暂且除外，可斟酌情形进行。”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由海参崴致东铁电务处转第三国际之长途电报内有云：“尊处爆炸物是否足用，利用绿气之计划如何，按照阁下所报告可否及何时将所有暗杀材料供给南京方面，设使中东路沿线一带加算在内，何处可以集中钱款？”

不特此也，俄人又欲组织秘密破坏军。如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自莫斯科经海参崴致哈尔滨电内有云：“嗣后如有不顺利时，第三国际委员会应组织秘密破坏军以实行完全毁坏东省铁路各机关之计划，取得之军事机关，文件对于第三国际委员会有极大价值，故应积极设法将军事机关文件继续取出。”由此电观之则知，只要有利于苏俄，即破坏中东路全部亦所不惜，而对于军事方面之特别注意，亦可见其阴谋之一斑。

由上述观之，则知苏俄早已视中俄协定如弁髦。该协定第六条有“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俄在我国境内设立之共产机关岂非欲以暴力反对我国政府为目的乎？其所欲行之共产主义、暗杀主义，岂非欲破坏我国之公共秩序社会组织乎？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第九条第一项云“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今苏俄欲以中东路为中枢赤化中国，实行暗杀，此种行动岂可谓之带有商业性质耶？

俄国违背协定，以中东路为宣传赤化之大本营，已为举世所共知。我国国基甫定，反动势力潜伏思动，乃苏俄以中东路为根据地助长内乱，且欲实行暗杀主义，形势不可为不严重。我国为自卫计，为遏止乱源计，不得不为整顿肃清之谋。中东路管理权之收回与我国之治乱存亡实有极大之关系。故由俄国之违背协定上着想，我国实处于不得不收回之地位也。

(二) 中国理应自卫。俄国既无恶不作，且以破坏我社会、倾覆我政府为事。则我国当然有自卫之权。夫以个人言之，法律上有正当防卫之规定或称紧急防卫。所谓正当防卫者，对于现在不正之侵害因防卫自己权利所施之必要行为也。例如某甲遇某乙持凶器以相向，欲谋害其生命，斯时某乙当束手待毙乎？抑可用自卫之方法乎？曰可用自卫之方法，即不得已而加损害于某甲，亦为防卫上必要之行为，而为法律所允许。此项正当防卫甚为适法。其所以适法者，即因其行为系根据权利之本质而来也。盖权利本质不受侵犯，有加以不正之侵害者，得以相当之手段而排除之。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今苏俄欲倾覆我政府，暗杀我同胞，形势甚为严重，而又处于极紧急之地位，俄人方加紧其侵害我国之工作。一朝爆发为祸，将有不可胜言者。而又无其他可以阻止之方法，则不得不为断然之处置。我国对待俄人极其文明，仅为可以消弭紧急祸患之举动，而无丝毫过甚之行为。此不特为我全国国民所赞

同，而亦必为世界友邦所表示同情者也。胡汉民先生谓：“我们对于中东路局的处置岂是贪图中东路的经营的利益，乃扫除那倾覆我国家的乱党的大本营，乃我国国家和民族至小限度的自卫。”

俄人不肯悔悟其赤化中国之心，始终未改，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即如本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载：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氏电内有云：“近日驻伯力远东共产党总部电令哈埠共产党委员会云，此后在东省铁路党务工作应取一律方法：（一）暂时务须停止表面活动以缓中国取缔。（二）对于中国军警各下级官弁等施以金钱，以缓弹压俄侨手段，并收买言论机关把持舆论。第一期所需款项预算为金洋十万元，由远东政府汇至东省铁路各地，远东银行代理支出。（三）东省铁路与远东银行两处今后之联合不宜用书信往返，以免蹈哈埠领馆之覆辙。遇有重要事件，务派专人口头传述，免泄秘密。（四）使居住东路沿线女共产党员交际中国高级军警官佐以探中国对俄政策等情。”由此观之，俄人欲利用财色迷我军警，其计更毒，其心更狠矣。于中俄开始谈判之时，俄人要求再行任用俄籍局长及其他职员等为谈判之先决条件。此项要求之不合理固不待言，而知之矣。我国驻美公使伍朝枢氏谓：今有厨役欲毒杀其主人，故主人辞却其厨役。若再召之来，是主人不啻以生命为儿戏也。我国所处之形势正相类似。俄人利用中东路以图倾覆我国家，故我国为自卫计，不得不将该路管理权收回。若再任俄人妄为，是我置国家之生死存亡于度外矣。天下宁有是理耶？

上述二项情形实使我居居于不得不收回中东路权之地位，且自俄人把持中东路以来，该路之腐败状况又不可不一言及之。

著者于数月前曾译上海法文日报中东路现状之一文，今将其文摘录于左：

“中东路正式统计表业由该路中国当局宣布详加考察，则该路四年未由中俄之共管情形可知其梗概。

自一九一四年实行中俄协定将该路归中俄共同管理时，该路情形甚佳。嗣后营业又甚发达，理应得到多数纯利。不料目下之财政情形拮据万状，工程方面又极腐败，此则不能不加以注意者也。今将数年来该路以十万金卢布为单位之收支等项开示于后：

年 份	收 入	支 出	纯收入	修 理 费	纯 盈 利
1924	376	288	88	15	73
1925	487	303	184	29	155
1926	557	344	213	52	151
1927	604	461	143	52	91
1928	667	575	92	37	55

由上述数目观之，该路自受俄人管理后，收入方面增加百分之七十五，支出比前增加一倍，纯收入之加增仅为百分之十，扣去修理费用外，应得利益减少百分之二十五。

在一九二五年之初，对上年所获利益可对该路一切债务概行清偿。则据上列之表，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所得之利益计之当有四千六百万金卢布为该路余款。一年以前，因中国方面之催促，以二千四百万金卢布由张作霖氏与苏维埃政府分配，该路又以其余款津贴中国方面之各种组织，又对于改良工人待遇支出一笔费用，将上述各项数目除去后，应尚剩二千万以上之金卢布。乃事实上则大不如是，据确实消息，该路余款已丝毫不存，且向中国方面之银行借款三百万元以资挹注。

该路应有款项究竟若何处置，因调查各项账簿之结果则见有存放于不能清偿之银行者：十三万存放于实际上业已破产之犹太银行 Jewish bank，有预支于供给材料之公司者四百万元，支付于不能付款之西特而斯基行 Firme Skydelsky，其余数目则无从知悉。且违反一九二四年之中俄协定，中国方面之监查员占极少数目，此少数之监查员竭力搜查不知去向之款项，卒不能得要领，故中国政府方面甚为关怀。

以上就财政方面言之也。工程方面之情形亦极腐败。在一九二四年该路职员及工人之数目为一六六五七人，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则增至二〇一八五人。工作情形大不如前，车头之应修理者在一九二四年则为百分之一六三五，在一九二七年则为百分之二一一九。修理费则比前增加百分之五十，运输上之费用则在一九二四年为七百万金卢布，至一九二七年增至一千〇五十万，至于变故之发生，则在此四年中增加至百分之五十。”

由此观之，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该路情形日趋恶劣。盖俄国专以赤化中国为事，丝毫不注意于铁路之整顿，宣传共产费用又极浩繁。俄国自实行共产以来，民穷财尽，安有余资以接济？故惟有仰给于中东路之收入耳。整顿铁路则置之脑后，利用其收入则惟恐不速，故该路之日趋腐败乃为必然之趋势。若不急图设法后患奚堪设想。俄人已完全暴露其无管理该路之能力，故为该路本身着想，亦以由我国收回最为适当。

据上所述，我国收回中东铁路之管理权实为不得已之举动。维护国家独立，确保民族生存，皆不能不有此种处置。世界人士谁不赞同。乃俄人尚不觉悟，犹思用恐吓手段以作无理之要求。我国遵照非战公约之精神，固以维持世界和平为职志，惟俄国若恃蛮妄动，轻启战衅，我国为自卫起见，自当同仇敌愆以与之周旋。我国所持之态度固极光明正大，维持中俄之友谊，保全世界之和平，须视俄人之能否觉悟耳。

（录自《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2卷第3号，1929年7月）

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赫达罗夫在中国 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①

(1928年7月11日)

同志们：我已经是第二次在中国少共^②代表大会上来做报告了，每次我都是非常高兴。在第一次及此次我都特别指出就是中国少共对于少共国际的工作知道的很少，因此，须把我们国际组织的许多最必要的材料贡献给你们。

在一年多一点以前，我在第四次大会上曾代表少共国际作报告，时光如流水般地过去，中国少共在过去的这一时期中经过许多的艰难挫折，创造出最伟大的经验，做了最伟大的革命工作，同样，整个的少共国际在这一时期中也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但是在我未论到少共国际现状及其现时任务以前，必须供给你们以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工作的直接材料。

今天在大会上少共国际各支部的代表出来讲话，从这讲话的很少数的同志当中，你们就可以看出团结在少共国际周围的生活是如何的复杂，在少共国际旗帜之下的组织与国家是如何的不同，在少共国际的队伍中有各种不同的青年团，有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经过许多革命斗争的德国青年团，它是少共国际的最大支部之一。同时，有很幼小的不久才走上革命争斗的舞台上的英国、

① * 本专题资料均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美国以及中国的青年团。在有些国家中，我们的运动已经存在了很久，在那里我们有很大的经验，如瑞士及挪威的支部今年要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同时，在有些国家中，我们的运动才发生不久，但是在这很短时期，得到很大的经验。我再重说一遍：在少共国际的旗帜之下，团结了许多斗争条件不同及存在时期不同的许多国家的许多组织。

少共国际支部的大部份遭受反动力量公开的压迫，在秘密的条件下工作着。在意大利、波兰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中，我们的团是在法西斯蒂恐怖的条件下工作。在殖民地的国家中，我们的运动刚刚发生，我们的团也是在空前未有的压迫的条件之下做工作。在这些国家内，在这些最复杂的条件之下，少共国际是在统一的指导之下做工，是在少共国际指导机关（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所规定的一致的团纲及一致的路线之下做工。

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少共国际组织之内的四十个国家的四十个组织是一个统一的国际少共组织。这种真正国际的、真正战斗的和真正革命的组织已由它对于斗争的准备和能力之充分的证明。”当然，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学习，这一点我将要向你们说明。但是，在少共国际成为国际的九年当中，我们做出许多革命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勇敢地断定我们是统一的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我们的运动从内部巩固了，我们的运动占很有巩固的政治地位。现在，我们坚决地知道，在有我们工作的国家之内，我们的团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吸收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教育和准备他们来代替衰老的革命战士。少共国际就是在这种统一的革命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苏联列宁主义的少共^①也是少共国际队伍中的一员，这个包括两百万团员的苏联少共，是

^① “苏联列宁主义的少共”指苏联列宁主义的“共青团”。

苏联国家的一切劳动青年的指导者，是在苏维埃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参加者。这个组织可以说是少共国际的最主要的一部分。苏联列宁主义的少共根据其经验教练其他兄弟支部，他们从苏联列宁主义的少共的经验中得到许多知识。苏联列宁主义的少共尽一切力量使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弟兄们的斗争较易，用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与工具去帮助他们。

同志们，从此可见国际少共是一个国际组织，它在统一指导之下与一般斗争的旗帜之下，团结了苏维埃国家的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革命的青年。同志们，这就是对于少共国际在其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的状况的简述。

同志们，关于苏联列宁主义的少共及苏联的一般劳动青年的状况，可以在大会上作一个特别的报告或者在大会后与你们开谈话会，所以我的报告不说这个问题，而仅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青年斗争情形。对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我们的争斗和争斗中的一般问题（即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以及共产党当前的任务等问题，我也同样的不说，因为，关于这些东西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已经说过了。他的报告是现在到会的大多数的同志听过的。因此，我想对于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这些斗争条件的问题，同志们已经有了一般的概念，所以我绝对的只说到纯粹的青年问题，就是我们直接的青年工作问题。同志们，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的国家内的劳动青年的状况，当然不能说与中国同样的痛苦。在欧洲各国，技术物质的进步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一般的生活程度总要比中国高些或者高得多，所以，不能说这些国家的青年状况与中国一样。然而，同志们，如果拿青年的状况与成年人相比较，那么，就可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青年所受的待遇，与现在中国青年所处的状况相比差不了许多。

无论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青年总是被看做便于剥削的对象，青年的劳动是最便宜的，因此使青年到工厂作坊中去做工是

很有利的。此外青年工人反抗力较差些；坚持自己的利益的办法选出代表来，①成年工人得到的许多保护法令，②通常对于青年是无效的。因此，青年工人无论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遭受与一切成年工人同样的不幸，并且还处在特别被压迫的状况之下。举例来说，失业的青年虽在某些时期及某些国家对成年工人失业加以相当援助的情形之下，通常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对于限制工作时间的法律，常常对于青年是不发生效力的。选举法通常是不给予青年以选举权的，在加入职工会时青年多半要受限制。因此，可见青年在各种关系上都是比成年工人更受非法的待遇，更受特别的压迫，这种情形就证明特别的青年组织存在的必要。这些组织的任务就是与整个工人阶级联合，为解放青年而斗争。我们少共组织看待为青年经济利益的争斗是最主要的任务。少共组织希望经过日常斗争使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亲密地团结起来，在统一的战斗的领导之下向资本家争得法律，争得改良生活状况，争得人的生存条件。^①

现在改良青工经济状况的争斗，是在几个特别的条件之下进行。你们大概听说过，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现在正进行所谓“节省主义”(有译作“合理化”或“经济化”者——Payuohawzayug)，资本家实行节省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产品的价格更便宜，以便利到市场上去竞争。他们怎样能使产品的价格便宜呢？首先就是改良技术，应用新机器。这是办法的一部分，而且是有时很有效力的办法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别种办法，这些办法是资本家最高兴的。这办法就是降低工人生活程度，少付工人工资，使工人多做工，使工人在一定的短时间内多做出一些货物，这样就可以使产品价格减低了。此外，他们想出特别的生产方法，就是所谓“轮变制”，就是所谓不断地流转，就是每个工人只管一定的很少

①② 内容不衔接，原文如此。

数量的动作，于是货物的制出既快而又便宜。这种所谓节省主义，对于青年工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工厂作坊采用这些节省主义的方法，于是使劳动更简单。此处用不着任何特别的熟练，只要有几点一定的习惯和举上，便能够役使一定的机器或生产的一部分。青年工人对于这种轮变制的工作是最合宜的。他们很快而又很容易应付环境，他们不用长期的学习，他们马上就能工作。此外，青年劳动对于资本家比较有利些，因为他付给青年工人的工资要比成年工人少几倍。现时在许多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时常发现用青年工人代替成年工人劳动之事，就是时常把成年工人开除出去，而另找青年工人填补工作。

这对于我们是否有什么特殊利益呢？我们能否特别欢迎它呢？对于青年工人这并没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工资并未因此增加反而减少了，工作时间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增加了，剥削非常的增高，未成年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的苛刻，所以在资本主义工厂作坊里的新节省主义的劳动组织的结果就是增高对于青年工人的剥削。但是，同时还有其他的结果。青年工人在工厂作坊中的增加就是成年工人的减少，所以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关系看，青年增加了分量，青年在生产中的作用增加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因为这些青年是否参加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能否了解自己阶级的任务这一问题，与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斗争的胜利问题有极大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将来越来越大。我们青年工人组织的责任是随着青年作用的增长而增大的，我们应该把这些青年组织起来，吸收他们参加斗争，使他们与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我们不应当让成年工人与青年工人之间发生竞争，但是我们应当使一切对于这一点不了解的人了解，直到现在时常还有成年工人对这一点不了解，就是青年有特殊的利益，为这些利益应该斗争，而整个的工人阶级对于青年的这些特殊的利益的拥护是有利的。青年必须要有特别的组织，这组织能够团

结这些青年使之参加争斗。因青年在生产中作用的增长，我们的任务也随之增长了。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地更坚决地为青年利益而奋斗，应当特别地阐明青年这种斗争的必要和吸收青年参加一般阶级斗争的必要。改良派、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孟什维克）对于这一点是反对的，他们是工人阶级中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用一切方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改良派特别坚决地反对青年参加阶级斗争，他们想出许多理论，说明青年不应当参加阶级斗争，因为青年对于斗争还未成熟，成年工人才应作斗争；青年应该娱乐或受一般文化教育。我们对于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如果青年受工厂作坊的剥削已经成熟了，那么，为自己利益而争斗的意识当然也成熟了。坚决地反对改良派在青年中的影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些叛徒们对于工人阶级争斗怠工，特别企图妨害吸收青年工人参加阶级争斗，我们应当坚决地与之争斗。同志们，为青年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争斗是我们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战争危险的争斗。只要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还是在资本家手里，战争的危險总是经常地威胁着全世界。而最近几年以来，这战争的危險尤其是日益现实和日趋險恶。这一个战争危險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你们在中国比谁都看得清楚，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是怎样的为分赃而打架；为的每件小事他们可以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个战争之所以发生，还有就是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存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时时准备着用坚决的斗争反对它。为的反对苏联，他们准备着实行武装干涉，这一点对于任何人也无所谓秘密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给这种武装干涉以有组织的防备。最后，战争危險之所以发生，还因为帝国主义反对殖民地人民而采用的武装争斗，反对被压迫的人民（如中国民众）的解放斗争。

反对这一战争危险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伟大任务。青年在战争时比任何人都要受痛苦，因为青年是被赶到军队里去，青

年是所有军队的中坚人物，青年是挡炮灰的皮肉，青年是战争的牺牲者。少共国际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即把反对帝国主义及战争危险的斗争看成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少共国际在这一点上有了光荣的革命史绩，即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那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便首先为反对战争实行坚决的革命的争斗。少共国际继续了这一光荣的史绩，现在在一切有资产阶级军队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存在的国家之中，在资产阶级军队中我们的团进行着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这种工作已给我们实际的结果。这种工作做的特别好的要首推我们的法国同志。法国团员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地要占第一位。法国的资产阶级非常了解我们青年团的力量，他知道我们会从内部动摇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仅仅在去年一年当中，在法国军队中差不多有七十团发生风潮，发生士兵的骚乱。这些骚乱的主要原因，便是在军队中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的工作。这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现象，法国资产阶级未曾轻视这一现象，他对于这一现象的回答就是加紧压迫。还有一例，就是在不久的时候，在希腊宣布了总罢工，大家都知道，这罢工到现在还未完结。在罢工开始时希腊的几只兵舰曾与罢工的工人联合，所以致此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些兵舰上有少共支部，这些支部能引导海军作公开的武装骚乱。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其他许多国家中都正在进行着。例如，当英国的小舰队走向斯堪的纳维亚港时，我们的挪威、瑞典、丹麦的同志们用传单标语等给了英国海军一个很大的宣传，英国本国的少共^①在英帝国主义军队中进行着工作。当英国派遣武装力量去镇压中国革命时，我们英国的少共用尽所有的力量使英国兵士了解，派他们去是为什么，号召他们与正在奋斗的中国人民表同情。所有英国军队经行的港湾都充满了我们的英国少共同志，他们努力鼓动正在开拔

^① 指英国的青年团，下同。

的兵士。法国同志在中国作了同样的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工作已得到实际效果，如有一只法国兵舰的海军都要求离开中国海面回家去，结果竟达到了目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的工作。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对我们敌人的青年组织的工作。我们的敌人有很广泛的青年组织，特别是资产阶级有很大的资产阶级青年组织，还有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青年组织。不过，按其范围讲不见得怎样庞大。而在资产阶级的青年组织中集聚了几百万的青年群众，其中并且有很多的工农青年，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在这些组织中工作。最近以来，因为资产阶级实行节省主义，降低工人生活程度等等的结果，发生了工人左倾的一定的过程，使这种工作更加容易。关于这一点布哈林同志在其报告中已经说过了。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如：德、法、英）毫无疑问的这种左倾的征候已经显露。德、法最近选举的结果，证明共产党的影响是如何伟大的增长，而这时候恰是工人群众左倾的时候。这种左倾的过程也同样地反映到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当中去。在这些组织当中发现许多青年群众组员不满意的征候，发生许多反对派的倾向。在孟什维克的青年国际当中很明显地发生毫无疑问的恐慌和毫无疑问的低落。这些恐慌和低落在最近两年以来，使孟什维克派直接感觉到不安。这个孟什维克的青年国际（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国际”）是从几个很小的组织形成的，这些组织是脱离了原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在大战时转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实行社会爱国政策的。在1923年与1924年间，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组织之下大约有二十万团员。现在按它自己的统计材料，大约还有十五万团员。在我们算来它们的团员至多不会超过十二万，这就是说它的团员数量几乎减少到百分之五十，同时这种低落发生在它最主要的支部内，如德、奥等，这种低落的原因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已经加入这些组

组织的青年工人已经认穿了这些组织所实行的改良方法及变节政策，于是脱离他们而加入革命组织的队伍中去。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的这种低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少共组织^①在这些国家中，在孟什维克的青年组织之内直接实行的工作。在孟什维克的青年团中有了左倾的反对派，工人反对派，他们是在我们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他们想用我们的精神去影响这些组织中的青年工人。

这就是我们反对敌人的斗争，最近以来这种工作已表现出很大的进步。

在资产阶级的青年组织中，我们也设法组织反对派。现在这些资产阶级的青年组织正在荷兰召集国际和平主义的青年大会，他们曾经邀请我们，我们已决定派人去参加这个大会，以便揭破这些资产阶级的青年行动家的实质，揭穿他们的一切假面具，指出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尽的帮忙作用。我们必须到那里去把那些指导者的真面目揭示给这些组织中的青年看。那里我们想派我们最重要的支部代表去。或者将来中国少共同志有派一人去参加的可能。对于我们的殖民地支部代表，他们已赞成接纳。这种工作对于我们的一般工作应该有很大的作用。

同志们，这就是现时我们当前的任务。

少共国际的其他任务我不说了，我仅仅说几个最主要的任务，因为如果把所有的任务（如教育工作等）都一一说出，那我的报告就要占非常多的时间。我只说三个最主要的任务，这三个任务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斗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和与敌人组织的斗争。

少共国际的本身情形怎样呢？如果在我们敌人的青年组织中发现反对派的倾向，甚至时常发生许多破裂，而在我们少共国际

^① 指青年团组织。

方面的情形则恰与相反。最近几年以来，我们的组织日益从内部巩固起来，影响是不断地增加。少共国际在政治上差不多时时都是尽力负责，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举行的一切运动，各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事变，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一切争斗，我们的少共组织都是最积极地参加，成为党的最可靠的堡垒。

在反对各种反对派倾向的斗争中，我们的少共组织也表现出它的政治的成熟。例如在联邦共产党内^①发生及蔓延到整个共产国际去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派，我们能够在政治上巩固我们的队伍以反对之。托洛茨基主义无论在哪个国家未能在少共国际的队伍中形成多少有点力量的小组织，作为他们的助力。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在少共国际队伍中所遭受的失败，比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还要严重些。

当在某些党内发现反对派倾向时，或者当党的领导脱离共产国际的指示时（如中共），少共多半是站在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地位上来讲话。这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各国也是一样，例如在法国，我们的少共对于实行共产国际路线很多的帮助，在德国、英国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上毫无疑问地表现了成熟，这种政治的成熟受得住试验。对于经济斗争的工作，我们最近几年以来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青年工人的罢工，这些青年罢工表示出几点新的现象，即是青年（仅仅青年）走向斗争中去积极地为自己利益而战斗。这种青年罢工在最近一年中，在德、法等国均有过。差不多在所有这些罢工中都是我们少共同志做领导，而所有这些罢工都是我们经济斗争工作的直接结果。

在职工会中的工作也大大地改良了。在许多国家中我们在职工会内已取得地位。例如在英国，我们少共有职工会工作很好的

^① 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共产党（即苏共）。

经验，在德国，职工会中青年工作部分落在我们少共的手里。在这种工作中我们有了成绩。关于反军国主义工作的成绩，此地不说了，因为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除这些进步之点外，在我们团的组织中还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首先就从组织问题上表现出来。我们的少共同志在组织上还非常薄弱，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以发展自己的组织。差不多在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少共的组织力量与政治力量不符合，就是我们的影响总是比我们的组织力量大。从数量上看我们的团都还不算大，与党的百分〔比〕比较起来，团实在还很少。照说起来，团本来应该比党的组织广大些，但是，在大多数的国家中团的组织总是比党小几倍，这当然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为什么团的组织薄弱呢？这有许多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团的群众工作学习得不够，团还很少钻进工厂作坊的企业中去，还未以企业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在大多数的国家中团还是按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生产支部为基础。此外，我们在其他群众组织（如组织有几百万青年工人的职工会、体育会等）中的工作也还很薄弱，群众组织工作不够，这是一种原因。另一种原因是工作的特别疏忽，是团的工作方法特别疏忽。我们同志还很少知道青年的心理，还很少按青年方法去做工。团时常采取党所应用的方法工作，常是依样画葫芦，同时，常是党的再版，是青年的党，这当然是不对的。团应当是比较广大的组织，团是教育的组织，团的工作应当是会吸收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种非常疏忽的工作应当铲除。这样的工作可以引起团的队伍发生流动性，因为我们不会充分地把先进我们组织中的^①青年工人巩固起来，有时他们加入进来又退出去，结果使我们的队伍发生很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有时达到很大的范围。一年有百分之七

^① 应当理解为“已（或‘先前已’）加入我们组织的”。

十至八十的新加入成分。如果我们能够消灭这种流动性，那么，我们每年至少可以增加半数。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会消灭它，所以结果虽然我们内部的团结、政治的路线等在质量上有了进展，然而在数量上（组织上）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差不多很少增长。这种我们政治影响与组织弱点之矛盾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我们将来应当解决之。无论在哪一国差不多我们团员的数量都未减少，而且在有几个国家中还有增加，但是，一般论来，我们落后的程度都差不多。虽然我们的影响是正在增长，我们运动的这种流动性是坏的现象，因为数量虽然未变动，但是，团员经常地变动，加入的加入，退出的退出，这种不固定性应该消灭，应该使我们团的成分比较固定，应该消灭流动性，应该从组织上巩固他们，到那时候数量上更要增加。

少共国际之下团结了二百多万团员，差不多二百一十万，但此中有二百万是在苏联的领土之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仅仅有十二万到十三万团员，这当然是不够的。我们无论如何对于现在这种数目不能满意。当然，在白色恐怖盛行（如中国）及对我们加以残酷压迫的地方，我们很难得到很大范围的发展，因为这些地方很难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那里向前发展的可能还是有的。就是在秘密的条件之下我们也能够发展到比现在更广大的组织。在许多国家有发展的可能，我们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

这都是少共国际当前的主要的问题，它们应该由第五次少共国际代表大会来解决。第五次代表大会将直接在共产国际大会后开会。

关于少共国际的一般状况的这一部分可以完结了，现在直接的讲到中国少共问题。

同志们，少共国际对于自己的中国支部的发展曾加以最大的注意。少共国际对于中国支部的发展非常高兴。以前我们很少知道你们，很少与我们中国少共发生联系。我们只听到你们到此地

的代表的一个很少的报告。现在，最近两年以来，我们许多同志直接在中国工作，我们有与多数中国同志接触的可能，我们对于我们的中国运动的发展、任务、工作状况等才得到比较完全直接的印象。

我应当向你们说，整个少共国际对于中国发生的运动有最大的兴趣。当我在最近少共国际执行委员扩大会议^①上做关于中国少共状况报告时，听的人比对于任何报告都要有兴趣些，都要注意些，因为我们无论那一国的同志对于中国及中国少共工作的兴趣都是日渐增加。

现在你们已经不仅是我们家庭中全权的一员，不仅是少共国际的一支部，而且你们是少共国际的最主要的支部之一，你们是少共国际最关心的支部之一。对于这些最关心的支部的工作与任务我们经常地研究，我们希望首先赞助他们。以前我们相互了解很少，我们事实上的帮助是不够，现在或者我们相互间还不能完全了解，这都是庸庸讳言的，有时候我们与你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到十足。但是，根本上我们对于一切主要问题，都有了共同的观点，我们对于我们的运动的根本问题的估计都是一致的。这就是最主要的。中国少共已具有我们运动的根本原则，并且知道少共国际大概希望做什么及它应该怎样做。我今天不愿把我们对中国少共的一切希望说出，不说我们对于它的工作的估计等怎样，因为中国少共工作的估量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上将说到，在讨论中央报告时，我们也发表自己的意见，到那时这个问题便清楚了。我只想向你们〔谈〕工作的感想，因为我与你们是老朋友，我去年曾经有些时候直接参加你们的工作。我想指出你们工作中的加号和负号，就是指出中国少共工作有些什么优点和进步，同时指出它有些什么缺点和必须改正之处。

^① 指 1928 年 2 月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

你们有些什么优点呢？第一个主要的就是，你们的少共在最近两年以来，确切点说在最近一年半以来，可以勇敢地说已经再生了。现在的这个少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少共了。这已经完全是个整个的少共，完全另外的一个少共。以前的中国少共是什么样的？它是比较不大的学生组织，而经过许多革命斗争和从战斗中锻炼出来的。现在少共已经变成战斗的革命的组织了，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战斗的革命组织了。中国少共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巩固起来了，不仅获得完全固定的政治面目，握有工作习惯经验等等，它基本上已经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了。它的主要注意力已经是射向青年工人了。这是我们运动中一个伟大的改变。这样，中国少共在大体上已经变成青年工人群众的斗争的组织了。这就是第一个毫无疑义的进步，我们应该指出，我重说一遍，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崭新的少共。

第二个优点——就是中国少共的政治功劳。中国少共供给中国革命很多的战士、革命家、煽动员、宣传队、组织者。如果要问中国的革命的积极分子从什么地方产出来的最多？我想，可以给个完全明显的答案：就是从中国少共队伍中产出的最多。中国革命的最好的宣传者、煽动者、组织者，都是从我们少共队伍中产出的。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任何人不会争论的。这一点是我们少共的不可限量的革命功勋。同时，我们少共在过去有过明显的政治作用，在现时在政治生活上还是有明显的作用。在中国革命的最紧急关头时，它能表现出它自己的政治成熟性。当国民党叛变之时，中国党的领导表示出不能完成其应有任务，它破坏共产国际的路线，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实行妥协的政策，即是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的退步的与让步的政策。在这时候我们中国少共中央坚决地出来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拥护革命的政策，反对退步和让步，这是伟大的政治功绩，不容丝毫掩饰的。党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完全公开地承认了，承认这是我们少共的功勋。这

就是少共政治工作方面的第二点进步。第三点，少共曾经做过群众工作，少共已经不是作一般宣传与鼓动工作，它不简单地宣传共产主义，它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进行一定的群众工作，它用各种方法在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中工作，它已经找出许多具体的工作方式来进行这些群众工作。它已经很会适应环境，会适应全中国领土内这样非常困难的环境，适应这样空前未闻的白色恐怖的环境。简单地说，经过很多革命试验的少共已找出许多实际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并且日益发展。少共已经学习到怎样在群众中工作，因此，少共逐渐地成为群众的少共了，成为群众的组织了。它站在形成群众组织的正确道路上，它已经取得很大部分劳动青年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少共的这种群众工作在武汉时代开始特别的发展。在这时期革命失败的结果使少共的发展受到许多的危难，我们是被击退了，我们失去了原来团结起来的一大部分群众。但是，少共过去已得到的群众工作的习惯，成为不可分割的胜利，成为将来斗争的武器，成为用之夺取群众的武器了。

与这些优点同时并存的，中国少共还有许多很大的缺点，在这次大会上应该很清楚地把这些缺点说出，以便开始来逐渐地战胜它们。

据我看来，我们中国少共的主要的缺点就是少共还未充分地尽其青年组织的作用。据我的意见，同志们对于特别的青年组织的作用和任务还未十分了解，就是指导的同志们也不免如此，这是毋容讳言的。我在去年第四次大会上就看到这一点。当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讨论我们运动的主要问题时，有些同志竟表现出这种倾向，就是限制少共的活动，例如经济斗争都转交党去做。他们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年龄都是很轻的，如果我们在青年中作特别工作，则发生与党竞争的事。或者用这种理由来反对在工会、农协中进行特别工作，就是青年在这些组织中占极大的作用，青年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实这种论据恰好证明他们

意见的不对。正因为中国青年有极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少共就应更加负责，作用也应该愈大。中国的这些特殊条件，恰恰是告诉我们特别青年组织与特别青年工作的必要。同时，据我看来，这种思想对于中国的我们同志还未充分地了解。常有同志们企图用某种范围去限制少共的工作而反对特殊的青年工作。对于少共作用的不十分了解就使同志们有发生这样取消派的可能。例如去年在广东我们的同志们曾提出必须限制青年团的年龄到十八岁为止的理论，并且提议把一切政治工作交给党做。在中国必须消灭的第一点，就是对于少共的作用与任务没有清晰的了解。必须给所有团员同志一个很明晰和正确的了解。使他们了解少共的作用，了解为什么必须有青年的特殊组织，什么是特殊的青年工作应有的工作。如果我们对于这种思想解释了，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其他问题的解决都要容易些。

我们中国少共的第二缺点就是政治上还未充分巩固。在少共内还有许多的倾向，这些倾向是脱离共产国际及党的正确路线的。先锋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我们少共队伍中，的确还很有力量。有盲动主义情绪的同志在少共中特别的多，这是一件事实。这种先锋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历史来源的解释是在中国革命中我们的少共不是占最次的作用，有时候它代替了党，有时候它为反对党的指导而斗争。现在已经是事过境迁了，应当走上新的工作方向，应当与先锋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正当的倾向作斗争。同样的对于某个地方有时还发现的机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根据最近党大会的决议（党的代表将向大会作报告）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与这一点有密切联系的，就是加紧我们少共的政治教育工作是必要的任务。我们在团内的教育工作做得太少，我们对于同志的训练太少，而向他们要求的又太多。在中国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在这样荆棘的道路上，我们宣传品的缺乏，我们印刷品散发的困难，我们机关的薄弱，加上广大的群众不会读书和写字，所

以更必须加紧政治教育工作。最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组织薄弱。第一，团还很少钻进企业中去，它还未能以生产支部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中心、还有许许多多的企业中没有我们的支部，地方组织还未能充分地由内部地强固起来，时常因为压迫或其他原因而很快地塌台。团的各级委员会及整个团的机关还未十分强固，有时因为我们机关的薄弱，反动力量很容易把我们的组织破毁。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还未充分地建立起来。这些组织上的缺点应该被战胜和被纠正的，应当学习切实的做工，学习工作能适应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不要走偏方向，不要做一点多余的事情，不要讲空话。这些东西就是在很小的事情身上也应学习的。根据我个人观察所得，可以说，中国同志还很少会恰到好处地来做工，不善于做日常的经常工作。还有许多应该改正的习惯、传统、成见，工作不十分切实。关于这一点用不着丝毫怕羞，应该学习欧洲人和美洲人。^①我说这些话并不是称赞欧洲人，而只是说应该把有些中国的习惯抛弃掉，就是说应该抛弃掉我们所谓“中国的习惯”。如果你们想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党怎样工作，如果想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就应当学习切实工作，按部就班工作，不说空话，不咬文嚼字。时时必须按问题的实质提出问题，直接提出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同志还差得很远。所有亲身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有时开会迟延两三点钟，一点系统也没有，没有终止的闲话，不限制发言时间，谁愿说话，谁就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注意力不集中在某个一定问题的周围。写下非常多的通告，有时简直是用不着的东西，大部分通告当中有许多无用的内容。必须放弃这种通告癖，我们要活的工作，不要尽发通告，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也应当学习做工。至于学习秘密工作用不着我多说了。在这一点上团有时也是很薄弱，有时不遵守秘密的规例，有时同志把组织

^① 似应理解为“美国人”。

的名册藏在身边，自己被破获更牵连到破坏许多组织。这是完全要不得的东西。有时，同志们不注意自己的危险，没有相当的保障便召集会议，结果便是破获。我们被破获在中国已成日常便饭的事了。这是应当消灭的现象，应当把秘密工作改好些，应当学习自己的经验。据我的意见，少共同志在这些小事上应当去学习工作，这也与我们组织薄弱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再一次特别的指出，据少共国际的意见，我们运动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有一切根据可以说中国支部发展得很快。我们中国少共无疑的是走向劳动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组织的正确道路上。我们中国少共经过许多的阶段，积累了广博的经验，它已经创造出自己工作的强固基础，它已经能集中其精力于一定的方向。现在我们中国少共与少共国际密切地联系着，少共国际有可能去直接指导中国少共的工作，毫无疑义的，我们应该把中国少共当前的主要任务解决，就是中国少共能够取得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这是中国少共现时的主要任务，党的当前任务也与我们一样的。我们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我们必须取得这些群众。虽然在我们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我们必须亲密地与群众联系起来，必须引导他们作战，只有这样，我们的胜利才有保证。我以为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能够明显他说出，就是中国少共有一切把握向现在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说：当我们还未把你们彻底消灭和在中国建立工农政权以前，我们给你们还不止一次的致命的打击呀！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许勒^① 关于 中国和印度工作经验的报告^②（节录）

（1928年7月19日）

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我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工作经验。

首先谈中国。总起来说，在那里，我们在青年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曾有过极为良好的实际经验。中国共青团经历了蓬勃发展的过程。我举几个事实为证。

共青团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于1920年在中国建立，最初只代表人数很少的小组。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时，已发展到二千九百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九是大学生。后来，1927年7月达到三万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八是大学生。由此可见，团员数目逐年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而青年工人和农民的比例提高了。1927年7月，在所谓武汉时期，我们的组织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取得某种合法权利。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明当时中国共青

① 许勒（Шюллер 或 Шиллер），里哈德（1901—1957）奥地利共产党、青年共产国际和奥地利共青团的奠基人之一。1919—1921年任奥地利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同时担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南局领导人。1921年先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1933任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35—1945住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从事编辑和教学工作。1945年回国。1951年当选为奥共中央委员。

② 这是许勒代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所做报告的一部分。

团的发展情况。然而,我觉得下面的数字一定会使大家感到惊讶。1927年7月,我们曾有过三万五千名团员。以后,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时期,成千上万的同志被处死、砍头、溺杀。我们的组织成了极端秘密的组织,人数自然也就减少了。1927年8月,团员人数降到一万五千人。有些同志甚至认为,当时团员人数不足一万人。不过,无论如何也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1927年11月,共青团组织又增至二万人。而在1928年3月,在继续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国组织竟达到三万三千人。(掌声)广东省组织还不计算在这三万三千人之内。在这个省的一些地区,我们建立了革命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地方自治机关,还有四万五千名共青团员。由此可知,我们在中国就有七万多名团员。但是,即使不把广东的四万五千名共青团员计算在内,在当前中国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下,这里居然能有三万三千名年青的共产主义者,这乃是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这说明,甚至在极严格的秘密条件下,我们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仍有很大可能争取青年。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七万名中国共青团员中间有多少大学生呢?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农民。这就是中国共青团数量上的增长情况。

现在再谈谈中国共青团的政治路线问题。我只想简要地说明共青团在中国革命时期的立场。北伐时,共青团完全支持党的政策。共青团和党站在一起支持北伐,它和党没有重大分歧。但是,早在北伐末期,即1927年初,在党的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国民政府的错误和偏向暴露出来以后,共青团就提出了警告。1927年3月,工人占领上海时,以及在反对蒋介石叛变的斗争中,共青团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表现得非常英勇,当然,它毕竟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一切都决定于党的领导。在武汉,我们已看出共青团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这个时期,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青团

团的指示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能以为，中国远离这里，中国共青团都是一切自作主张，只不过将情况上报青年共产国际。不言而喻，工作的重担落在共青团的肩上。但是，我们与中国共青团的密切联系却从未中断过。我们在中国有自己的代表，中国共青团也有代表驻在我们这里。因而，特别是在所谓武汉时期，有过极其密切的合作。就在这个时期，共青团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为一方，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

当中国共青团看到党的领导日益屈从于国民党、屈从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时候，共青团和我们的代表就提出警告，以应付行将发生的背叛，而且共青团还发表了相应的声明。当时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共青团的警告，对它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的革命政策所抱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起初，陈独秀声称，根本用不着共青团过问。后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本人要向政府进言，他不仅没有得到发言机会，而且共青团旗帜鲜明的革命呼声竟至在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所设置的泥潭中淹没无闻。这种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绝不是党和共青团密切合作造成的，而是相反。它们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我们有权说，在武汉时期末期，中国共青团不仅没有参与中国党领导上的背叛政策及投降活动，而且相反，它竭尽全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当共产国际着手清洗党的领导机构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时，共青团也起了巨大作用。共青团不仅提供了政治上的帮助，而且还向党提供新生力量，协助充实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干部和领导。

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中国共青团的错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年青的中国共青团缺乏经验，共青团不可避免地要陷人另一极端。再者，不能不指出“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两个极端倾向的表现。我们所理解的“先锋主义”，就是不承认党的领导，企图对有组织的工人实行政治领导，从而有取代党的倾向。有

一种观点认为，党已无可救药，党已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共青团应当完全担负起整个的领导。我们谴责了而且也克服了这种偏向。至于“盲动主义”，这不是共青团所独有的错误，而是最近期间，即这年冬天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犯的错误的。这个错误显然是危险的，但是现在也克服了。

最后，我们有权指出中国共青团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它由学生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运动，由年青的、缺乏经验的小组成长为组织严密的共青团，由人数不多的小组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并在犯了种种错误和过失之后掌握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由中国的经验中取得重要教训，就是说，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在殖民地也同样能够建立起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这个问题以前仅仅是讨论的课题，而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我们看到，在殖民地可能建立共青团，而它甚至在非法存在的条件下，也可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同时，我还想谈谈国民党青年组织的情况。早在1925年，就有几个国民党人提出建立国民党青年组织的建议。当时，中国共青团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机会主义分子图谋建立一个机会主义组织，以抵消共产党员在青年运动中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也讨论过，而且有些同志认为这种组织有助于更加广泛地吸收青年。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最后决定是由中国共青团自己去做的，即继续坚持反对立场。我们现在可以说，当时不同意建立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组织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好处，而只会有害处。它势必很快就成为国民党机会主义领导手中的工具，用以在殖民地国家最棘手的青年运动问题上和我们作对。同时，我们现在已发展成为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性联盟，这多多少少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国民党组织的缘故。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 运动的提纲（节录）

（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三十一、在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青年的处境尤其恶劣。他们在殖民地国家工人阶级成分中的比重大大高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里，对青少年的剥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工作时间不限，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企业主和监工以非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青年农民的处境也是同样的恶劣。因此，工农青年积极参加当地国家的一切革命运动，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革命组织和农民军队、朝鲜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游击队、印度尼西亚英勇起义的参加者等大部分是由工农青年组成的。

青年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当前最重要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群众组织，即群众性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还要培养青年运动的真正共产主义的领导干部，这与保持共青团组织的群众性及其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成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除青年工人外，还应该适当地吸收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中优秀、忠诚的革命分子，并应加强共青团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成分。只有当共青团中的无产阶级成分已占优势，共产党的领导确已坚强时，才能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阶层的青年加入共青团。

共青团在参加共产党的一切斗争中，既应避免在领导工人阶级方面以团代党的倾向（即所谓“先锋主义”倾向）；又应避免独特的取消主义情绪，其表现为否认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把

共青团的作用贬低为青年学生组织或一般不定型的青年组织的作用。

为了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学生，为了使他们摆脱民族改良主义和假革命思潮的影响，殖民地的共青团还应该利用附属于共青团的各种合法的外围组织，按照革命纲领把它们建设起来，并保证使它们接受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

共青团应该到现有的这类相应的组织中去工作，吸引它们参加革命活动，并争取影响和领导它们。在利用这些组织和吸引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时，共青团组织不应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或缩减自己的直接工作。失掉共青团本来的面貌，以及因而可能丧失对青年革命运动的领导乃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此，共青团为了利用和发展外围组织而进行工作时，应该加强自身的直接工作，在劳动青年群众中公开进行活动，并把群众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团的队伍中来，这类组织应当包括：工会和农民协会内的青年支部、青年工人联合会、反帝同盟、体育协会、地方性的学生会等等。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责成一切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竭力帮助建立和发展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工人阶级和工会中各种忽视青年工人利益、不愿参与为改善被剥削的青少年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各种倾向和落后观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报告

(1929年7月9日)

定一：^①

我认为，许多殖民地国家的农业危机，特别是中国的严重饥荒，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殖民地国家的饥荒不是罕见的现象。那里年年都闹饥荒。可是今年饥荒空前严重。其原因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殖民地农民走投无路，必然招致各种连续不断的农业危机。在中国，遭受饥荒的地区逐年增大，而且无法加以限制和减少。可是这种危机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一方面，它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出外逃荒，另一方面，高利贷资本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的大量后备军则使得殖民地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恶化。当地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利用这支后备军的任何尝试，都将轻易地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打消。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要利用这支后备军来争夺当地的工业。帝国主义分子在殖民地国家造成农业危机，然后好利用这个危机。我们应当指出这一点，为的是反对我们队伍中那种非殖民化理论的残余，为的是说明帝国主义在第三时期的破坏性作用。

……^②

我来谈谈印度问题。革命发展的自发性是目前印度革命的特

^① 陆定一。

^② 略去的部分是讲从英国工党执政后，工人阶级开始左转时，英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

点，这与1925年的中国革命十分相似。比如说在孟买，罢工前只有几百名工会会员，但罢工以后会员增加到好几万人。不过有一点，印度的情况不同于中国以前的情况，那就是其本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革命了。在印度革命中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认为，在全会的决议中必须详细提出某些策略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印度同志的当前任务。我认为，中国党的经验，目前对我们的印度党来说，应当作为借鉴。我想指出中国革命的某些重要情况，其中的经验想必对今日印度大有用处。

第一，必须建立坚强的基层组织，如工厂党支部和工厂的工会组织等，以便建立强有力的党，形成坚定的革命工会运动。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借以强化印度的革命运动。这也会大大加强运动对反动势力的抵抗力。

第二，我想谈谈统一战线问题。为要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应当为统一战线建立极为鲜明的阶级基础，而且工作应当自下而上进行。不要象中国过去那样的做法。在中国，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最大错误，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忘却上述原则。

我们看到，印度是采取调停手段来取消罢工。有时罢工刚一宣布，政府或者改良主义分子就出来提议调停。这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很大坏处，这会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削弱我们的领导。在中国，我们犯过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在广州和武汉，我们不仅没有进行斗争，而且还促成了调停。在印度，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任何调停方式，不论是政府出面的调停或是改良主义者搞的调停。

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共青团在革命中的作用很大。印度共青团组织数量极少，而且十分软弱。因此，向我们的印度党提出这样一项任务——建立强有力的、群众性的共青团，是绝对必要的。

我再就中国问题说几句来结束我的发言。我们党已经摆脱了

困境，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已经恢复了对工人群众的领导。对于党来说，最危险的是今年三月间的势态，当时上海党委进行了旨在反对中央的派别斗争。各种派别斗争对于一个不合法的政党来说，当然是极端危险的。幸亏党中央能够迅速而恰当地结束这次斗争，共青团中央在这一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反革命事件之后，我们党认真地进行了反对悲观主义者、反对动摇分子的斗争。我们要继续清除一切动摇分子以纯洁我们的党，特别是现在，正当中国革命如此迅速复兴起来的时候。在这一年，许多工人，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了一些大城市的“五一”罢工和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特别是在上海“五卅”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工人以及大学生捣毁了国民党机关报和另一反动日报的报馆。这就是革命运动高涨的标志。党虽然增强了，但仍然跟不上工人思想激进的程度。原因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动摇分子，特别是右倾的危险还没有清除，同时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还缺乏新的方式方法。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会运动的软弱性，在这方面，正如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业已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具体的、有效的策略。我希望在议事日程第二项中，我们能讨论这个问题，并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应当更加重视中国革命，它不仅没有象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被摧毁，而且迅速地重新强大起来，并将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胜利的伟大动力之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届二中全会宣言

(1929年8月15日)

全国青年工友、农友、兵士、学生及一切被压迫青年兄弟们!

全中国无产阶级青年战斗先锋的代表，中国共产青年团的二中全会，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苏联战云密布，与强大的世界革命怒潮快要兴起的时候，高举列宁主义的红旗，热烈号召你们一致准备起来，对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努力制止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努力对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官僚迎头痛击。

中外资本家，都以最残酷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吞吸工人的血汗。加紧剥削工人阶级的合理化运动，对于青年工人尤其剥削到了极点，把我们发育未全的青工童工毫无顾虑地摧残，在大工厂中昼夜旋转不息的机器旁边，同样在手工业的作坊中，也惨遭残酷的剥削；把我们造成无数的失业者流浪于街头，黄色工会领袖更从而出卖我们的利益，常常把我们革命的青工代表无故开除出去。农村青年与青年兵士的地位同样悲惨，地主豪绅的强度剥削与军阀混战的连绵不息，灾荒的延长扩大，都直接把我们青年兄弟打入十八层地狱以下。大多数青年学生群众也非常痛苦，甚至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读书、行动的自由，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中国数千万劳苦青年兄弟，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强盗政府的野蛮统治之下，无时无刻不在白色恐怖野蛮剥削之中。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强盗，完全把我们青年当成

他们施行生产合理化和军国主义的牺牲品，用我们的血和肉，来填塞他们的其深无底的欲壑。他们把我们践踏在他们的脚下，一刻不懈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在疯狂地准备战争，大家都在竞争扩张军备，竞争建造战舰，竞争扩大海陆空军，竞争改组军队，改良军事技术和发明化学用品，竞争施行青年军国主义化。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新旧矛盾，已经到了异常剧烈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一天紧张一天了。可是帝国主义列强间在争夺市场重分世界的冲突虽然尖锐，虽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倾轧，但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更根本的却是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矛盾，所以现在最危险的也是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强盗，从强盛的美国到可怜的欧洲国家中之残破无用的奥地利，都从经济上军事上包围苏联，都同心合意地想消灭这一个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和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中东路事变发生以后，帝国主义正式把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入反苏联战线，在东方造成进攻苏联的堡垒。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刻刻增长，两月以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步步为营地向苏联挑战，雇用白党胡匪节节侵扰苏联领地，如果没有苏联和平政策与世界工农群众革命的威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定更大胆地妄动干戈了！

全国青年工友、农友、兵士、学生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兄弟们！

苏联是世界工人阶级第一个祖国，是真正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导师和好友，是我们劳苦青年兄弟利益的保障者。帝国主义国民党要镇压中国革命，必然要同时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也就是瓜分中国的施行；国民党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这样野蛮凶狠地进攻苏联，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和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利益；国民党进攻苏联正是它反革命后两年半来屠杀工农，把无量数的中国民族利益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一贯路线。因此我们站

在世界革命和中国民族解放利益的立场上，必须准备一切力量，武装起来保护苏联；准备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苏联的战争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反动战争为民族解放的工农革命战争。

为着进行这些伟大斗争，青年工人们必须在中国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更加紧发展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青年农民、青年兵士、青年学生更应该追随青年无产者努力去作争土地、争自由和改良生活的斗争；青年工农兵士兄弟应更积极团结在赤色工会、赤色农民协会，更积极团结在兵士委员会、红军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组织之中，青年学生及一切被压迫青年兄弟，都应更积极团结在赤色学生会和一般青年革命组织之下，一切青年工农学生战士都必须积极团结在青年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青年反军国主义大同盟和反对进攻苏联同盟之下，以巩固自己的革命战线，严整自己的队伍。同时更必须坚决与改良主义、和平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尽情把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中国的改组派、第三党等先生们的鬼脸暴露出来，把“非战公约”等类一切改良和平的面具撕得粉碎。

中国共产青年团是少年共产国际一个忠实奋勇的支部，九年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代表全国青年工农及一切被压迫青年兄弟利益和组织领导青年斗争的唯一的先锋。这次二中全会正当世界上充满着弹药气味，特别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苏联战云密布状态之下举行。历史昭示着我们需要担负起比以前更残酷更繁重的斗争任务，号召你们要更坚决地忠诚于自己的阶级任务，在列宁主义红旗之下，为反对世界大战，反对军国主义，反对进攻苏联斗争到底。

战争的危險威吓着我们，革命的火花也在照耀着我们，我们应该节节准备着走向新的时代。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

反对世界大战，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
反对军阀混战，变军阀混战为工农革命战争！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拥护中国革命！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
反对和平主义改良主义的欺骗麻醉！
反对青年军国主义化！
争取青年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读书、罢工自由！
青工女工与成年工人同工同酬，待遇平等！
青工童工有加入工会之权，在工会中权利平等！
反对国民党封闭学校，摧残教育！
改良兵士待遇，反对长官虐待兵士，要求加饷，并发欠饷！

中国共产青年团二中全会

政治决议案

I 引 言

一、一年来青年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青年斗争之左倾，充分地证明了少共国际与中国团五次大会路线的正确。同时二中全会亦认为中央大半年来对于青年运动发展的形势的估量与工作的指示，都是基于五次大会的立场，所以半年来青年运动的路线亦完全正确的。

二、党二中全会认为目前国际的政治形势与中心问题，是大战的危险更加紧迫，特别是反苏联战争的紧迫；另一方面各国工人斗争的左倾，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国际革命的危机一天一天地加深，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一天一天地尖锐，更积极地指使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进攻苏联（如哈尔滨事件与中

东路问题)与加紧地来准备战争(如中美航空合同、中英海军协定);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利益的冲突,以及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矛盾,愈加推动中国军阀战争的发展,这必然的是削弱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而走向动摇崩溃的道路,使中国革命的危机一天一天地加深。一年来中国资产阶级不只是不能解决这些根本矛盾,而且他企图解决的问题也一点没有解决。这就是客观上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的基本动力。事实上现在群众斗争从小的斗争到大的罢工,从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到争自由的斗争,改良主义影响渐次缩小,赤色工会影响相当地扩大,这些特征都证明群众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个政治形势之下,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战争危险,这一个基本任务,亦即是团的中心任务。团二中全会完全接受党二中全会的政治路线。

II 夺取青年的斗争

三、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特别的重要了!青年运动意义的增加,由以下两个原素决定的:

1. 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准备世界大战,特别是积极地准备反苏联战争,因此加紧了青年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尤其是以青年代替成年兵士警察的过程更加明显,所以从战争做出发点来看,争取青年群众是决定将来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

2. 中国现在已开始了合理化的过程,吸收了大批青年参加生产,增加了青年在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这两个原素决定了青年运动的重要,更加重了我们夺取青年群众的意义。

四、一年来青年运动的特征,是青年左倾过程速度加强,与青年斗争的积极性更加加强(如上海纱厂的童工斗争,劳动童子

团在一切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与青年学生反帝情绪的复兴)。

青年左倾的过程加速的原因：

1. 帝国主义加紧殖民地化的发展与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对于青年的进攻更加残酷，因此反映青年激进思想的发展；

2. 资本合理化的过程，加重对于青工的剥削，特别是青工经济生活的恶化；

3. 因为青年不是容受改良主义的基础，失败情绪反映青年方面较薄弱的原故。

这三个原因是推动青年左倾速度加强的动力。

五、正因为这样，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更加积极地企图消灭青年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夺取青年到他的方面去。他们用三个方式向青年进攻：

1. 用改良主义欺骗的方式，经过黄色工会以及青年各种的群众组织形式，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在工人斗争中则分裂青工与成工的战线；用所谓党治的名义剥削青年群众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自由。

2. 用白色恐怖的方式来屠杀与禁锢，并建立法西斯蒂的组织(如反共锄奸团等)，加重白色恐怖的进行。

3. 加紧青年军事化的过程，吸收大批青年参加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并宣传军国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吸引青年群众。

此外如第三党、改组派，在青年群众中活动与宣传的方式虽然不同，客观上他们都为豪绅资产阶级来征取青年群众，他们是豪绅资产阶级宣传改良主义的一个桥梁，我们在争取青年群众的过程中，应时时揭露他们的欺骗作用，彻底肃清他们在青年群众中的欺骗影响。

六、客观上豪绅资产阶级、改组派、第三党等，用各种方式来夺取青年群众，更加上青工本身尚有许多弱点，特别是：

1. 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以及斗争经验比较缺乏；
2. 青年本身组织的薄弱。

因此，青年运动的发展不是一个直线的向前进展，因为他在发展的过程中，时时会遇到障碍的。我们不能有一点的幻想，认为一切都是顺利的。青年运动发展的方向、力量等，都要靠我们主观的力量来决定，我们应更加紧主观的努力来克服这许多障碍，在不断的斗争中夺取青年到我们的旗帜之下。如果不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艰苦奋斗艰苦工作的意义。

Ⅲ. 青工的经济生活状况

七、各帝国主义剧烈竞争抢夺中国市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厂开始合理化的过程，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亦尽力挣扎，在竞争中谋建设自己的产业以图抵抗。竞争中的相同点都包含着增加生产力，减少生产费的企图。所表现的形式：

1. 输入新式机器与改良工厂设备；

2. 加速劳动力与减少劳动费（如象现在工厂内改用新式机器，从前一个工人管一部到二部车，现在由一部到七部以至五十部车，但工人的工资反而减少，工作时间延长）。

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资本家积极地向工人进攻，这一个进攻的方式就是合理化的过程，合理化在中国表现的特征，便是更加紧了对工人体力的剥削。这种生产程序与资本家的加紧进攻，对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是：

1. 个人生产力增大；
2. 失业的人数加多；
3. 劳动状况变坏。

对于青年工人的特殊影响是：

1. 青工童工的劳动力增加；
2. 青工代替成工；

3. 因而青工童工生理上的危险与疾病更加增多；

4. 青工到成工工资时也就失业等类（如轻工业方面）。

大规模的工厂，相当的采用新式技术竞争，逼着厂主及作坊的雇主，只有更雇用多量的学徒、青工，加强残酷的剥削，方能挣扎着维持自己的地位，因而影响到学徒的地位更加恶化。

八、根据这些事实的观察来推论，可以清晰地看出青年运动发展的趋势，斗争和组织的前途，可用下列的结论来表示：

1. 青年生活和工作状况是一天一天地恶化，政治压迫是一天一天地加紧，青年的痛苦加厉了；

2. 青年在产业中的数量，一天一天地增加，青年在生产中的比重亦加强了；

3. 因此青年的愤懑和需要组织与斗争的情绪也在尖锐化。

九、青工斗争的发展和需要组织的情绪虽然这样，但目前赤色工会的发展和他的力量，还是很弱，现在赤色工会发展的最大弱点，是不能与客观群众的斗争相适应。团在赤色工会的青工群众中的影响虽然比较好些，但都是间接的，很少直接的。因为：

1. 对于青工的特殊组织形式运用太机械，不能运用这个组织方式在青工群众中起实际作用；

2. 没有经过赤色工会在斗争中争取青工的特殊利益，即或提出青工的特殊要求，也把他看做附属的意义。

团以后应当经常经过赤色工会，扩大团在青工群众中的直接影响，团对于赤色工会的任务，应负责扩大赤色工会的发展，特别在青年工人群众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以适应青工的要求。

十、现在大多数的青年工人尚在黄色工会的组织里边。黄色工会与国民党的官僚工会对于青年的一贯政策是压制青工，青工在黄色工会内没有与成工同等的权利，并且黄色工会的领袖们，还进行分裂青工与成工的阶级战线。现在黄色工会的影响虽在群众中缩小，但一般地看来，大多数工人群众尚组织在黄色工会里边。

这因为：

1. 工人斗争畸形的发展，没有整个的汇合与适应；

2. 群众失败的情绪尚没有完全肃清。在这种情形之下，更加重我们在黄色工会中青工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反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与阴谋。

十一、我们总括一年来青年运动的形势，特别在战争危险紧迫的形势之下，青年左倾的速度加强，青年斗争更加积极化，促进青年左倾与推动青工斗争的基本原因，不但不能缓和且更加尖锐化。团应更加强自己的主观力量，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反对战争危险，这特别要加紧主观条件来肃清客观上一切的障碍，特别是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因为不加紧肃清客观上这些障碍，青年运动即不能很顺利地发展。

IV 大半年来工作的总结与教训

十二、大半年来全团在正确的青年运动的路线之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特别是领导团的青年化与坚决地与左〔右〕倾危险斗争两个条件之下，的确获得许多进步：

1. 纠正团内许多不正确的倾向，特别与右倾的危险斗争，将从涣散的状态中挽救过来；

2. 团的工作青年化的方式与方法能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

3. 在一切斗争中，团能够组织青年群众参加（如上海自“五一”到“八一”的斗争过程，香港最近青年反帝同盟与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在青年中的作用）；

4. 青年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自“五卅”以后更正确地表示出来；

5. 发展中心区域工作与巩固产业支部的工作，在上海、广东、江西、顺直、山东等地，获得相当的成效。

这一些进步有许多虽然是刚刚开始，但这个进步的基点，我

们是不能忽视的。这是我们工作进步的第一步，我们要抓住这个进步的基点，更加深入我们胜利的前途。

十三、但在过去工作中表现出来我们主观上的弱点，仍非常之多：

1. 特别是团的阶级基础仍极薄弱；
2. 因为主观上的弱点在工作中直接间接造成以下的缺点：
 - ① 忽视青工的特殊利益；
 - ② 忽视青工群众的组织；
 - ③ 没有扩大和深入黄色工会中的工作。

3. 全团工作发展不平均，这一个畸形的发展，只因为各地团都不能运用全团斗争的经验；

4. 青工政治经济斗争反映到团内大迟缓，团与青年群众关系不密切；

5. 对于农村青年工作，以及儿童运动亦缺乏积极的注意；
6. 反军国主义反战争的工作主观上的忽视；
7. 这一个期间太少引进新的干部到指导机关来；

8. 政治教育与宣传工作，尤其是对于有系统地反对三民主义以及与各种改良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斗争的缺乏与不充分。

我们今后应以最大的力量在工作中来克服这些弱点，使团的主观条件能适应客观青年群众斗争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些弱点，将使我们更落在青年斗争发展之后，这是团莫大的危机，我们要加倍努力来克服。

十四、团的工作青年化与青年特殊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各地很少了解他的实际意义，因此前一时代的第二党色彩在团内还没有完全肃清，因此组织青年群众的工具，如象青工部、青工委员会、青工代表会、学徒联合会，以及各种辅助组织，即或使用，也是很呆板的，不能在青年群众中发生直接作用。团的工作青年化仍是目前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团的工作不能很迅速青年化的原

因：

1. 团在青年工人群众中的基础太薄弱，青工干部引进太少，因此反映到团内的青年无产阶级意识亦极微弱；

2. 先锋主义的残留，特别是第二党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保留在团内；

3. 青年运动的理论缺乏。

这三个原因是团不能迅速转变青年化的阻力。因此我们应针对着这三个弱点努力，加紧团的青年化的过程，使团的政治力量，能充分地表示在青年群众的基础上面。

十五、大半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团内最大的危险是右倾思想的发展，因为右倾危险可以使团堕落腐化。革命失败之后，豪绅资产阶级用白色恐怖与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从多方面向群众进攻，因而反映到团内一部分团员失败的情绪与观念的动摇，一般的方面表现出来的如过分地估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革命前途的怀疑，否认群众斗争已开始复兴，否认党与团力量之存在，认为统治阶级已趋稳定，革命高潮的到来将是遥远的将来，因而便主张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表现在组织上的便是党内和平，企图把党与团带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右倾思想表现于青年运动方面的，便是取消主义的复活，否认农村中有青年的特殊利益。右倾思想的基础，一方面是机会主义复活的历史来源，另一方面是客观上改良主义进攻的反映。团内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政治水平线之低下，同样是助长右倾思想之发展。反右倾的斗争，目前在两个条件之下更加重要了：

1. 右倾的机会主义与国际反对派的汇合；

2. 战争的紧迫。

国际反对派与党内旧的机会主义者，共同认为南京政府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封建残余的势力了！我们应驳斥这种无稽之谈。我们一方面

要站在正确的路线上与右倾思想奋斗，另一方面，只有加紧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

十六、右倾思想是团内主要的危险，左倾的先锋主义虽然已失掉了许多发展的条件，而它的残余并未肃清，同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因为青工在数量上比重上的增加便有人主张“工会青年化”，同时各地团部，却依然忽视青年特殊利益的斗争，青年的特殊工作方式与方法，仍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就是明显的例证。如象不愿争取公开活动的机会，不发展日常斗争，不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内做群众工作，以及命令主义的残余，这些左倾的意识不能肃清，同样可以使团离开青年群众的，我们同样地要与这些倾向奋斗。

V 我们的基本任务

十七、目前战争危险一天一天地紧迫，青年斗争一天一天地左倾，在这个形势之下，我们应当根据五次大会的路线，加紧争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工作，加强领导青年群众反对大战与保护苏联的任务；更积极地来领导青工争取特殊利益斗争与扩大领导青年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活动，巩固团的阶级基础，使团迅速地转向青年化、群众化、无产阶级化方面来。为使我们的基本任务的实现，必须坚决地与团内右倾危险斗争，必须加重国际任务。我们具体的工作：

1. 反帝国主义运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加强，更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更加加紧对中国青年群众施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所以首先激起了青年群众反帝斗争激烈化。反帝斗争应当是团活动的中心，我们应坚决地纠正忽视反帝或把反帝看做是团次要活动的倾向。在青年群众反帝斗争激进化的过程中，团的任务应当在斗争中建立全国大规模的以无产青年做基础的青年群众反帝战线。这一个青年反帝战线应该：

①站在中国民族解放的观点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亦即是青年反对战争保护苏联的战线；

②同时是青年群众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战线。

团结青年群众的青年反帝同盟，是青年反帝斗争的主要组织方式，它应当汇合整个青年部、各种青年的辅助组织做基础成立起来，团应当是这一运动的轴心。

2. 反军国主义反战争的斗争——目前帝国主义战争一天一天地紧迫，特别是反苏联战争的紧张，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中更加紧青年军国主义化的过程，我们应在青年反帝同盟的战线上来扩大青年群众反战争的斗争：

①在青年群众中扩大反对大战危险，武装保护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战争的宣传与行动，并要坚决揭穿和平主义、爱国主义等欺骗作用的斗争；

②加紧反对军阀战争，在原则上对于军阀战争应采取失败主义，暴露战争加重于群众的痛苦，并应坚决地宣传只有群众的暴动才能消灭军阀战争，宣传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军阀战争中因为拉夫骚扰，加重民众的痛苦，我们应组织群众起来斗争反抗它的行动。

③反军国主义是团存在的基本条件。

一般地说来，我们过去是怠忽了这项工作，二中全会郑重地号召全国从速补救这一缺点。我们反军国主义的实际任务：

①在青年群众中做大规模的反国民党征兵运动的斗争；

②各级团部应健全士兵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必须有规律地计划士兵运动；

③利用各种方式加紧士兵宣传煽动的工作，并应派大批同志到军队中去工作；

④各地团部应建立特别的组织，经常地做外国海陆军中的宣

传鼓动工作。

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是过去士兵运动极错误的倾向，在军阀战争中来拥护苏维埃区域，我们不能无条件实行兵变，只有在敌人进攻红军，或军阀战争接近苏维埃红军区域，或在某一种非常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兵变。盲目的兵变只有削弱我们在士兵群众中的组织力量，应坚决地纠正这一倾向。

3. 青工经济斗争工作——领导青工争取特殊利益，是团的基本任务。发动青工群众积极参加日常斗争，与参加总的争自由斗争，在这些总的斗争中争得青工特殊利益的实现。团对于青工经济斗争的责任，不是等待斗争发生我们才提条件，这已经是尾巴主义了。我们的任务是去组织青工斗争，加紧青工特殊利益要求的宣传与煽动；并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斗争和怎样去斗争。发动青工起来拥护自己的要求，在罢工时团应集中力量在青工群众中工作，我们应有罢工行动的计划。争取青工特殊利益的斗争方式：

①发动青工参加一般的斗争，在斗争中同样要用青工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

②发动青工单独斗争，这个斗争的前途应与成功的斗争汇合起来。

4. 赤色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青年工作——团对于赤色工会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广大的青年工人加入赤色工会，扩大赤色工会在青工群众中的影响。在赤色工会青年群众中的特殊工作：建立青工的特殊组织形式，青工部、学徒部、青工委员会、青工小组等，经过这些组织形式：

①召集青工大会或代表会议，宣传青年工人特殊利益要求，扩大赤色工会对青工的影响，获得青工的拥护；

②举行反抗合理化的斗争；

③领导青工拥护并参加罢工斗争，引导青工参加工会各级组织，参加罢委会、工厂委员会等；

④经过这些任何的方式，发动青工在斗争中争取自己特殊利益的实现，在不能成立赤色工会的如小手工作坊，我们可以组织学徒联合会领导学徒起来斗争。

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目前的工作是要把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夺取青工群众工作的特殊方式：

①团聚左倾的与战斗的青工干部以及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

②向青工指出青工部、青工委员会、青工小组的利益，获得青工拥护去要求建立青工特殊组织形式；

③工会执委会中必须有青工代表参加；

④青工应减少会费；

⑤但在工会一切事务上有同样的发言权与选举权、被选举权。

⑥提出青年的迫切要求，宣传青工起来拥护。

这一切的要求，我们要迫胁黄色领袖执行，但这只是策略的运用，黄色工会领袖是不会执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斗争的策略夺取黄色工会中青年工人，戳穿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领袖的欺骗政策，驱逐黄色领袖，转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

5. 反国民党斗争——我们要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来肃清国民党残余的影响，不要放弃一点机会，在青年群众中来暴露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对于群众的残暴行为的罪恶。在一切斗争中都要坚决地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联系着国民党一切欺骗群众的事实，领导青年群众走向总的反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的前途。

6. 农村青年工作——一年来农村斗争仍是继续不断地发展，农村斗争在任何形式、任何条件之下青年群众都是做斗争中的骨干。团的任务应当有组织有计划地来发动农村青年群众，更有组织地来参加斗争，在斗争中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最主要的我们要建立城市无产青年对于农村青年的领导作用。这一个努力的方

向，一方面要加强团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农村青年雇工于乡村雇工工会之内，使其与城市青工发生组织上的联系，这一个联系就是我们组织农村青年，从青年雇工到中农青年于整个的从雇农到中农的联盟之内的领导核心。我们的工作：

①领导青农群众参加发动日常斗争，走向深入土地革命；

②在一切斗争中，特别在斗争胜利的地方（苏维埃区域）应争得青年特殊利益之实现；

③领导青农参加发动游击战争，扩大农村青年武装训练工作；

④扩大农村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的组织，并加强他们的教育训练与工作；

⑤领导农民斗争，注意农民中青年工作。

在这一切工作中，我们应特别反对农村正在发展的右倾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对于盲动主义的奋斗，使我们在农村中的工作更加深入下去。

7. 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一年来农村斗争继续不断地发展，并且这一些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的冲突，我们应当坚决地发动青年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在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①应坚决地照五次大会所规划苏维埃的工作计划大纲来执行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作；

②领导青年加入红军，扩大团在红军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③在苏维埃区域内应坚决地帮助实现分配土地的工作；

④扩大发展少年先锋队及童子团的组织工作。

8. 二中全会更严重地指出来目前团的阶级基础薄弱，仍是团目前最中心的问题，象现在团员的成分是革命发展中最严重的现象，这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因此二中全会郑重地告诉各级团部，建立团的阶级基础，巩固并发展产业支部，应以最大的努力做去，特别要注意在交通工业、矿山、军事工业、市政工

人、纱厂方面建立团的支部。

9. 宣传教育工作——从政治宣传上获得广大的青年群众，是目前十分迫切的工作。我们要在一切斗争中来扩大党与团的政治影响，目前特别是扩大反战争，保护苏联是中心的任务，在宣传中应坚决地打击改良主义各派，第三党、改组派以及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欺骗作用。团的宣传工作应该是青年化，宣传方式应适合青年的情绪，才能使宣传深入，政治宣传特别要联系到青年特殊利益的宣传煽动，尤其是在斗争中。目前团内教育工作，应提高团员的学习精神，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青年运动的理论教育，在目前同样的重要，中央以后应有系统地编译青年理论与国际青年运动的经验的介绍，经常地供给各地训练班的教育材料。

10. 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改良主义现在仍是我们夺取青年群众有力的敌人。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虽然渐次缩小，但并未完全消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纲还没有完全失掉欺骗群众的作用，因此我们的责任应当积极地消灭青年群众对于改良主义的一切幻想，指出改良主义的政纲是资产阶级妥协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工具，我们更须有系统地来驳斥三民主义的乌托邦的幻想，及其欺骗群众的作用。肃清青年群众对于改良主义的幻想，主要的方式是发展群众的直接斗争，在斗争中来揭穿改良主义的各派，如第三党、改组派等的假面具，只有在继续不断的斗争中，再加上我们极力的对改良主义的攻击，使群众在自己的政治经验中，去认识改良主义的作用，方能完全把改良主义从群众中驱逐出去。

11. 反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工作是我们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列宁主义的，他已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新工具，中国的反对派也演着同样的脚色。中国的反对派与机会主义残余互相利用，散布他们的荒谬主张。这个托洛茨基主

义与机会主义残余结合起来的中国的反对派，客观上显然是革命的障碍物，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良好工具。他们并且积极在我们青年团中活动，我们必须拿起列宁主义的武器，在思想上克服他，在组织上肃清他。

12. 青年学生运动——大半年来事实证明，青年学生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尚有反帝争自由斗争的作用，我们应纠正忽视这一工作的倾向。同时二中全会亦坚决地反对统一学生运动的主张，因为这是不可能，并且会帮助了敌人。我们应当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做争自由的斗争，做思想上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须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同时我们要认清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能存着过分的估量。对其他一般城市贫民工作，也必须加紧注意，注意领导他们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争自由斗争，争取他们到党与团影响之下来。

13. 中国青年女工及农村青年妇女工作——目前青年女工在轻工业方面占产业工人之大多数，她们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更加残酷，因此她们在斗争的时候，占极重要的地位；根据过去经验，农村青年妇女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作用极大，我们应积极地获得这大多数的青年妇女群众，并吸收积极的分子入团。二中全会指出，这一个工作过去做得太不充分，甚至于忽视，这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应当积极地争取她们特殊利益的斗争，在一切的斗争中，团应注意关联到青年妇女的利益，并提出青年妇女的特殊要求，在群众中宣传，引导她们自己起来争取自身的特殊要求，并获得一般工人、农民的同情。同样的我们要吸收她们在一切辅助组织中，以及用适合于青年女工的特殊形式来团结她们，最主要的是吸收她们加入赤色工会与农民协会。

14. 儿童运动——因为生产合理化，在产业中增加了大批的童工，他们需要组织与要求斗争的情绪更加迫切。团的责任，应

当很好地训练教育这般广大的无产阶级预备军，在一切斗争中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上海童工在斗争中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只要有了组织，参加斗争是群众的先锋。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劳动童子团的发展，在目前群众斗争开展的形势之下，这个组织更有扩大发展的可能，团应坚决地采用童子团的组织形式，将他们组织起来，并须极力争得公开的存在。

15. 各种反动的组织，如国家主义青年团、无政府主义黑色青年团、法西斯蒂等组织，我们在原则上应坚决地在群众中攻击他们，指出他们是残害工人阶级的反动组织，如果它们影响一部分群众的时候，我们要分化在它们影响下的群众，使群众脱离这种组织范围。

16. 团员军事化与青年群众武装训练的工作——这一个工作各地应积极筹备进行，在城市中我们应发展体育性质的青年团体，借以给青工的武装训练，或把他们编入纠察队中训练；在农村中经过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来扩大青年武装训练工作。

17. 二中全会委托中央局继续完成与各国兄弟团建立密切关系的任务，特别对于东方如朝鲜、菲律宾、南洋、爪哇，应当帮助少共国际发展当地团的组织，并供给他们一切工作的经验。

VI 争取公开活动的策略

战胜白色恐怖之摧残，以及在白色恐怖下从组织上政治上争取青年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最主要的是争取或是健全我们公开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形式与我们秘密工作配合起来。争取公开的活动，是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争取青年群众有力的斗争方式。争取或利用公开半公开的形式来组织群众所必须的条件。

1. 要吸收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
2. 要保证团的领导作用；
3. 要能在党与团的口号之下，作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拥

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斗争。但必须防止两个倾向：

①在此等组织中进行工作时，团绝对不能抛弃或隐蔽阶级斗争的口号；

②团本身组织以及一切行动，须保证绝对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就是坚决地反对降低我们的口号的合法主义。

VI 团内的组织问题

团的组织自五次大会以来，团员在数量上的确地削弱了，团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的薄弱，与群众的联系不密切，使团尚未有脱掉组织上的危机。但在质量上的确也得到了些微的进步，并且将团从涣散的状态中逐渐地拯救出来，如果否认了这一些微的进步，显然是一种取消派的倾向。我们现在根据团的组织“无产阶级化”，“组织群众化”的组织路线来确定目前团的组织任务：

1. 创造无产阶级组织基础；
2. 发展中心区域工作；
3. 发展产业支部，建立支部生活；
4. 巩固地方团部，加强各级巡视工作，正确地指导团员职业化；
5. 组织工作青年化，造就新的青年工人干部，加强团员政治教育，尤其是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际的教育，改变团的工作方式与方法；
6. 建立团与青工群众的密切关系，特别运用青工群众的组织方式，来团结广大的青年群众的组织——这是目前团组织上的中心任务。

团内的生活上，因为革命的失败，团〔内〕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反映出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如象消极悲观的观念与失败的情绪，破坏组织原则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在团内表现得尤其是清谈的毛病〔原文如此〕，对于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我们应当站在

正确的路线上公开地与之斗争，并须正确地执行团的纪律。中央号召团员群众，紧紧地抓住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进步的基点，坚决地团结在党与团正确的路线之下努力工作^①。

^① 该决议案于1929年9月10日通过。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书

(1929年10月)

亲爱的同志们：

看了中央的重要通告以及听了中国的同志们的口头的报告，少共国际主席团认为中国团的领导机关已经正确地了解了国际第六次大会、党第六次大会、团第五次大会的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决定，你们的领导机关已经正确地在团内实行并运用了这新的路线。中央的指示和工业区省委（香港、天津、上海）的报告，同样地证明出这新的路线不只是被几个单独的团部所了解，而特别是被几个主要的工业区团部运用了这个新的路线，在团的群众工作上得到了部分的转变。

在这些指示上充分地表现出中央在一种坚决的有力的布尔什维克的形式之下，同先锋主义的倾向及盲动主义的思想在作战；这种思想倾向是足以使团从广大的青工群众在许多的时机之下孤立起来的，并且团的中央也在和由这些倾向的结果所造成的工作方式作战。

无论怎样，我们的估计决不应减少对其余的团的组织在新的政治路线〔下〕斗争的注意力。即如拿我们所晓得的事实来说，在天津区的团部的盲动行动，虽然经省委对于这种组织和在浙江的右倾和取消主义、失败主义取了必要的手段，但这种事实在几个内地的省部都是很明显地在发展着（虽然你们已经开始对这在作坚决的争斗），同时证明党团的新的路线还只不过将开始被这些内地的省部所了解。

所以中央必定要用以前的布尔什维克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来执行党和国际的政治路线和新的策略路线。

我们对于中央根据国际和党的路线，使团很正确地和右倾的危险、取消的观念以及合法的观念在作战，是极为满意的。中央和上海团部对于发觉了江苏党省委中的某几个领袖的反党中央目前政治路线的工作，这种帮助和你们对于他的斗争都是有相当的劳绩的。

我们一般的结论是团的领导机关已了解了党和国际的路线及新的策略路线，并且在几个团部内帮助着推动了一种意识上的转变。中央已正确地领导团作争取群众发展群众工作的斗争，并且使我们的团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区域内巩固了部分成就。

我们说你们在重要的产业团部所获得的成就（虽然在实际上是很微小），是你们执行这新路线与策略惟一之结果。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对于你们在群众工作的范围内，一切在执行新路线的第二期内活动，下个严格的批评是必须的。

共产国际的第十次执委扩大会议估量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生长，其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国际性，并且也特别指出了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征兆。

在扩大会议之前，共产国际在给中国党的政治通讯上，有一个对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最近的事实证明了这估量的正确，这一估量在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与国际的指导上都明显地指示出来了。只有瞎子才否认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过程；只有机会主义者才相信目下的中国统治是“稳定”的。国民经济和金融的紊乱、铁路交通的破坏、农业上停滞着的危机，一切都是中国反革命统治政策与统治的结果。中国反动统治不但不能把这经济危机缓和下去，反而只会加强了它们。

农民问题到现在还是很重要，这一问题产生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所难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反动势力不但不能如机会主义

者所预言的，把这尖锐的矛盾缓和下去（机会主义者说国民党的改良，已把农民问题一部解决了），恰恰正相反，国民党在浙江二五减租的经验，同胡汉民的委员会工作的结果，都足证明南京政府对农民采取的改良手段完全是破了产。

同时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国际政策也得着完全的失败，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整个地投降在帝国主义的脚下，国际帝国主义还依然在中国加强和增进他们的统治地位。在南京政府以完全挑战的态度进攻苏联之后（夺取中东路），反动的营垒中的冲突只有更形复杂而尖锐。

在最近反动营垒中的内部矛盾，随着帝国主义的纠纷的发展而日益激烈化，而这内部的矛盾反映着帝国主义间的竞争和中国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在最近的电报上我们已经看到战争的消息，张发奎和冯玉祥已开始发动了，新的军阀战争一起，必然是给予反动势力的一个动摇。

中国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挑战的战争，背后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从这事实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洋矛盾的尖锐化，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

十次扩大会议对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象征的估量，完全是根据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的情形——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尖刻的危机，特别是自去年发展下来的罢工斗争，革命的工人运动是在发展着，但是大都带着自发的性质，党和团都不能抓住这斗争给以充分的指导，但到了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能清晰地看出：工人运动是从单纯的经济斗争渡入政治的斗争去了（“五卅”上海与天津工人的反帝运动，“八一”及国际青年节等等）。

革命高潮生长的主要特征是工人群众经过了自已亲身的经历，在工会运动中，在经济斗争中很明白地看清了国民党反动的真面目。

发展着的罢工斗争（大都是自发的）常常会走出到国民党领

导机关的前头去。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工人群众对国民党幻想的破灭，是要给以极大速度进行的。

另外的一个革命高潮生长的特征是农民暴动的激增（甘肃的回民暴动事件、红枪会的暴动、朱〔德〕毛〔泽东〕游击队的活动、苏维埃区域的扩大等等），中国的情形的开展更可给予我们党团活动的顺利的前途。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估量团的地位以及指出它重要的任务。

虽然你们因为执行了正确路线的缘故有多少〔一些〕成功，但少共国际的执委会还不得不指出团的一般的弱点，特别是群众工作上的缺陷。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使你们团部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的地位加强，你们也并不能努力去抓住青工的自发罢工。我们知道在工业中心区域内，青年工人群众为争取经济利益以及政治权利（组织青工加入工会权利）的斗争有很大的发展，在这时期我们需要是行动，而你们却费了很多的功夫去讨论青工有没有加进黄色工会的必要等问题。在今年的开始，我们同你们的代表，根据了少共国际五次大会和团五次大会的决议，用最透彻的方式讨论过了青工部的问题，而你们却并不执行起革命的行动来，反而拚命地作一种抽象的讨论，如：“青工部是什么，在中文应译成什么？”等等的问题，甚至在你们的通告第十二号^①上你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这我们已指出给你们了）。你们竟以这样的方式来提出这问题：“青工部青工小组等在黄色工会中无从组织起，也不需要组织，可是他们对于青工有什么欺骗时，我们却不能袖手旁观。”你们这一种观念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这在实际上表示出你们并没有工作的决心。我们以为关于这问题，你们最好是读一

^① 指1928年11月5日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五字第12号通告。

读列宁的小册子《共产主义幼稚病》^①。在这书中，列宁说：“共产主义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愚策可以表示出这些‘左翼’共产主义者对于群众影响的问题是如何的忽视，对于群众的叫喊是如何的误用，若是我们要帮助群众，要争取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我们绝不能怕麻烦，决不能怕与领袖们争吵、斗争、受毁谤、遭逮捕（因为领袖们大都是机会主义者，或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同巡警间接的或直接的是接得很密切的）。我们必须在群众所在的地方工作，我们应该冒着一切的牺牲去战胜困难，而能在各种的社团、工会中，有系统的坚决的耐心的鼓动、宣传，这种社团、工会，甚至是最反动的也不要紧，只要它里面是有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在着的。”^②在这书的起头，列宁对德国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讥嘲着说：“这些‘左翼家’以为在他们对这问题的否定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想对于‘反动的’或‘反革命的’工会的辩辞和愤怒的叱斥就足证明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在黄色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妥协的反革命工会中工作是怎样的无用，怎样的不可容忍（这特别是K. Homer 做得利害）”。但是无论这些德国“左翼家”怎样相信他们的革命的策略，而实际上这是虚伪且空洞无所有的。^③

你们实在也竟做到和这些德国“左翼家”一样了。

此种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据报告是包含着不少的青年分子的，固然我们把这组织忽视了，则我们怎样能转变群众工作的方向呢？并且这种没有获得权利的青年群众的地位以及剥削的情形，驱使着他们不得不走上斗争的路途，去为他们经济和工会的利益而作战，而这时，你们却等待着“国民党的开始”！只有中国团特有的在经济与政治的斗争之独占优势，才会在我们的指导机关中

① 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② 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08-209页。

③ 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02-203页。

产生这种缠夹的“理论”吧！但我们很惊奇，你们会盘算着走过去，却不会注意到，青年的活动在过〔去〕几年是开展了，青年工人群众是自发地在为经济的和政治与工会的利益争斗着了。

我们认为：指出你们组织上缺陷的情形也有必要。自然，上海、香港、天津团部的发展和改造，无疑地是你们团的成就。但是你们数量的统计（约一万零六百团员）依旧表现出：

1. 在个别工业中心，如汉口、广州等等区域内，我们的组织是没有。

2. 你们团的无产阶级基础是不足够（只有百分之二十），同时，即拿最大的工业团部来说，如上海的团部，其中青年无产阶级的成份也只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为，我们对于你们的指示：“无产阶级基础，在团的社会成份上相对地或绝对地须占高比例”是一些也没有执行。

3. 我们并不知道工厂支部及店铺支部的真相，但以我们所知道的讲，即拿上海说，实际也并没有真正的店铺支部或工厂支部存在。第一，他们数目非常少；第二，他们的存在，丝毫没有作用；第三，你们还没有开始在工厂大店铺中建立支部。

在群众工作的领域之内，团并没有把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或秘密的群众活动联系起来，去建立许多辅助的青年群众组织（如体育的、反军国主义的、经济的等等），没有这种组织，团的群众工作是很难有效地发展起来的。

在我们最好的几个支部中，对于少共国际五次大会宣布的“转变”之必要，还没很好的认识。在目前，在少共国际之内，在各个支部之内，我们都是激烈地讨论着转变的问题。自我批评在团内开始发展起来。团内广大群众的自我批判，应该发现出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式的制度以及各个支部的工作方式；团内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判，应该坚决地根本肃清这种保守的官僚派的干部，因为他们在我们行动上与工作方式转

变上有绝大的障碍。哪个如果不能认清，在目前革命高潮正在生长的情况之下，争取劳动阶级的群众必须依照了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决议的策略，以及十次扩大会议的补充而行的，或者哪个是不能把这策略运用到我们行动上来的，则他们必然不了解少共国际对转变问题所决定之路线之政治意义的。

我们能够把这“转变”问题特别地运送到中国团内来和一般地运送到秘密的几个支部里来的吗？对了，我们能够，也是应该的。因为这转变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团的工作系统上的组织技术问题，却和我们在革命运动中实现共产国际新策略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这样，转变问题是应该在你们团面前提出的。

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在革命高潮生长的情形之下，在现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罢工斗争日益发展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你们的要求是比以前要迫切一百倍。你们团五次大会，以及少共国际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新路线，必须在你们日常的工作与斗争中运用出来。

我们指出了团实现新路线——群众工作路线之两个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是：中国的团在中国革命失败后的几年内，并不能够适应着变更了的环境来做它的工作。中国的团都是在群众的迫切的催促之下产生与长成的。它在有力的革命高潮中，在公开工作的条件之下获得很好的战斗经验；但是团对于在恐怖与压迫情形下的秘密工作，却是不适合的，所以在过去组织上所受的严重打击，简直使它有重新建立的形势。假若在这革命失败的背景上再发生盲动主义、先锋主义、取消主义的倾向，则你们定可以知道要使整个的团重新走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及党的会议所决定的新的策略路线、新的政治路线上去，是多么的困难呢！对于这一切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这难道就是说把团当作一个学校来专门研究新的策略路线吗？不是的，团的新路线是只有在斗争和工作中才可以实践的。自然我们不能不顾实际，这是绝对清楚的，除非我们的干部，我们整个的团对于这路线有很好的了解，这

种在实际工作上、在革命的斗争上、在群众工作上的“转变”是来的很慢的。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见，中国团的主要团部对这共产国际及党所决定的新路线、新策略，已有认识；在与右倾思想——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合法主义等倾向——的斗争中，党与团都表现得非常坚决。在现阶段中，我们在党的政治路线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把群众工作，尽可能地发展到最高度，团必须站在前面，领导劳动青年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在这点上我们可说团已进入它第二个阶段——进入群众工作、实际的革命斗争、创造新的组织的阶段里去了，而在中央的通告里，我们看见中央还不过在宣传着那熟知的理论。

我们要责问中央：你们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讨论过当前的实际问题呢？譬如，工会问题，青工经济斗争问题，建立工厂及店铺支部问题，群众工作的目前任务问题，工厂及店铺支部的工作问题，游击队问题，战祸问题，反军国主义的实际任务问题等等。

关于这一点，少共国际的主席团要叫你们注意下列几个重要的问题：

在李立三关于“五卅”问题的报告中，有几桩事实使我们不得不警告你们，这里存在着一个危机。李立三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在“五卅”的示威中，青工参加的数目是很寥寥的，并且在别种党的文件中，我们也遇到一种指示，说明要加强学生群众的革命分子的工作。至此处的同志说青年反帝大同盟（这组织好象是由我们发起的）的成分，几乎全部都是学生。

我们并不反对学生的工作，有一部分学生，表现出他们对工农革命运动的绝对同情，并且踊跃地参加这个运动，与这种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连系起来，青年团无疑地要加紧在学生群众中的工作，去领导他们。

但是呢，假使我们把整个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学生工作上来，那么这就犯着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了，我们主要的战线，主要的基础还是劳动青年。我们应该时时记在心上：在目前的劳动青年，在这种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条件之下，已经是投在革命的工运中了。他们自发地组织罢工，他们自动地提出经济要求，甚至，他们不要我们领导会提出他们政治的要求来，若是你们想想我们工厂及店铺组织的薄弱，想想我们团内无产阶级干部的薄弱与微小，这些组织与干部与劳动青年群众有密切关系的，则现在的情形必然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团虽主观不盼望情形发生，客观上会削弱其工作的效能，团对斗争的青年工人的领导，这将是我们的事业上的一个大打击，我们必须叫你们注意的。

工 会 问 题

在革命的职工运动高涨的现阶段中，单是做到秘密的“姊妹团”或“弟兄团”是不够的。我们以为中国的劳动阶级以及劳动青年已开始认识劳动阶级的组织的必要了，而且也正已开始建立阶级的组织了。所以，团不应该再作为落后倾向的尾巴而钻在青工的后面，却必须起来站在这发展着的阶级斗争前头建立群众的组织，吸收广大的青工群众到无产阶级的组织里面来（党团工会，一切青工的经济组织、体育会、反帝社团、青工部等等）。

团必须以它的力量来抓住青工自发的罢工斗争，关于这一点日常工作，青工本身利益斗争的加紧是必要的。我们曾几次叫你们在各种产业部门中提出特别详细的青工的经济要求，对于青年工人的倾向，同他们在罢工中提出的经济要求，我们是必须细加考究的，这是非常的重要。在你们的材料中，我们常遇到这类似的条件。这弱点是在于：你们把经济条件大纲的宣传与日常斗争的条件混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日常斗争的条件，应该在日常斗争中单独提出的。

把青工的经济斗争和罢工行动领导到争取政治权利、工会权利的更高的水准去，也是我们重要的任务。

在这种场合之下，青工在职工运动中，争取斗争与工作的做工形式的问题，对于团，是很有意义呢！这是什么形式呢？这是我们的信念与大多数团的经验告诉我们：青工部和青工委员会对我们是极有意义的，这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们可以在青工群众中工作时，得到帮助，并且也可以把青工组织起来，去领导他们斗争，他们也可以提出青工的政治的经济的的要求等等。在公开的支部内，我们的经验是：青工部往往成为黄色改良主义官僚工会中反对运动的主要分子，揭破他们欺骗工人利益的信用，并且也能够号召许多的青年工人来参加团的组织，只有它是他们唯一的利益的保护者。我们以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青年工人被剥夺去了他们工会的权利（在国民党的工会与黄色的工会都是一样）的时候，我们若在国民党工会或黄色工会中发动建立青工部的斗争，若开始时由我们领导这运动，到后来组织形式成立，都将为我们党团在这工会中争取群众的帮助。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你们拘〔局〕限在我们提议的办法之内的，正相反，我们要你们，能尽量利用各种独立经济组织的形式，以及用其他使青工便利参加工会工作的形式（青工斗争单独爆发时，可建立青工罢工委员会，选派代表参加总罢工委员会，发动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或发动建立争特殊经济或政治要求的委员会的斗争，选派代表参加工厂或店铺委员会等等……），我们与青工密接着的团，依靠着青工群众的团在提出它的提议和要求时，须非常地公开，大胆而毫不犹豫地群众面前宣布。青工会议（在前上海的团部是做过的）的召集，也十二分的重要。

在我们的鼓动与宣传上，我们不须并且也不能把我们的面目隐蔽起来；反之，却正要使青工群众明白他们为本身利益的斗争是由团发动的领导的。

同样的，团应该坚决地与党内团内残留着对赤色工会问题的取消主义右倾观念斗争。在目前的团，一定要取种种的步骤，使赤色工会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尤其特别地要注意怎样夺取群众的问题，和怎样把广大的无组织青工群众组织起的问题。

团应该与党一致地、调动它的力量使赤色工会在高涨的斗争之中，作用与影响增长，而赤色工会呢，也应该协助着团，加紧保障青工和童工利益的工作，在赤色工会运动之中，我们要特别注重青工部，青工委员会，童子团的建立。我们主张关于童工和青工问题，团应该遵照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团 的 建 设

在现阶段中团的群众工作发展的时期，团的组织上之加强是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应该常常记起健全或建立我们工厂及店铺支部的问题。

到此地，我们希望把工厂支部、店铺支部的问题来讨论一下。我们认为你们自以为获得的成功是不充分的，工厂支部以及店铺支部到现在还不能象真正起作用的支部所做的那样有作用。第一，他们在数量上是异常的薄弱，第二，则是你们所有的支部不能在青工斗争中获得领导作用。所以，你们注意的中心应该转移到健全的工厂支部或店铺支部的建立，使他们在一切青工经济的斗争之中与日常斗争成为领导的力量，使青工群众能感觉到这支部的存在。

这个任务最先需要是同志的动员，支部的工作，只有使上下级一切同志都实际地参加，才有建立的可能，每个团员都应该是他特定的实际工作，他应该负起团体分配给他的单独任务，譬如，怎样去吸收青工群众加入团，怎样去把团的口号使青工群众从团进行的工作中去认识，怎样去拥护青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怎样去组织成领导青工的经济斗争等等，每个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

同志，应该经常地对群众解释团内的政治情形，做个别的或团的政治教育工作。只有这样，团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使每个同志都为工农青年的争斗中的战斗领袖。

关于干部的问题，我们认为也有讨论的必要，这在现在是特别严重的。你们提出“职业化”的口号，我们不明白你们这口号的确实意义，自然你们不但想每一个活动的同志应该有一定的职业，但同时又连带地引起与群众关系的问题。在实质上，问题并不错误，然而用这样的方法，你们依然是不能解决同志的问题的。我们看来，在几个地方内，你们这“职业化”的口号，却有很多曲解的地方，在许多文件中，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根据了你们“职业化”的口号，在农民区域中竟开起店铺来了，如果这事实继续下去，你们就有一个与工农无产群众隔离的危险，我们认为有叫你们注意纠正这错误，改正这现象的必要。

放在团前面的主要任务是从无产阶级的层中提拔新的干部来，我们应该更勇敢地，更坚决地从工厂中提出同志来参加指导工作，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最主要的解决与青年群众有关系的新干部的问题的路线。你们应该集中注意于下层工厂干部的训练，尤其是在工厂支部与店铺支部书记的造成。所以你们应该用一切的方法（训练班、团校、会议、谈话）去组织、训练工厂与店铺团部的下层干部。

我们应该把这发展的问题看得非常严重，就是拿上海团部的社会成分来说，也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你们不应该再如以前那般地只在旧同志中去找。在目前，新的青年群众是卷入斗争之中了，而且有许多是自发的。在这种斗争之中，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是养成了，这种勇敢的进步的革命青年，我们是应该把他提上组织里来的。在青工群众中发展团的组织，应该是我们工业区团部的中心工作。照这指示去勇敢地发展组织，该是你们团的中心任务。

在同时，我们也要叫你们注意农村团部中社会成分的整顿，在

这里，应该加紧吸收半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分子。

关于团的指导方法，我们也有要讲及的，根据你们的报告，在这半年内，你们对于指导方法，已有相当的进步，在这一点，我们完全相信你们实行的种种灵活指导方式的效能（指导员会议，以及巡视员的会议等等），但是我们还要警告中央，不要过于注重文字的指导，这倾向你们是还有着的，你们通告的大部分都是不实际，老生常谈式的。

我们希望中央能尽可能地减少通告的数量、对于地方团部的帮助，应该是给予它们以实际的讨论特殊问题的材料，或给予它们以指导的信件，或者是以活泼泼的方式来指导下级团部的工作（口头指导）。

反对战争危机的斗争

关于反动阵营中倾轧的尖锐化，以及军阀战争的开始，团的实际任务是：

一、团应该努力在群众中说明现在战争的阶级性，及指出这种反动势力的冲突实是帝国主义矛盾的反映，团应该坚决地在群众中，尤其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打破对于“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的幻想，指出他们一样的反动与反革命性。

他站在反南京政府的地位上，想用较左倾的口号来争取群众，在实质上，他们是代表中国另一个反动势力的，因此呢，他们对于我们在工人群众的斗争中比国民党更来得危险，因为国民党是已经暴露无遗了，把他们坚决地暴露出来，和他们无情地斗争，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阶级性，暴露他们左倾口号之实质——这是我们党和团目前的急务。

二、反军国主义工作的问题，我们几次都指出为我们斗争的任务。现在的战争和特别的中国反动统治对苏联的进攻，使反帝的工作与宣传成为我们战斗任务之一。

少共国际主席团主张，中国〔团的〕中央应该特别注意：1. 立刻加紧中国南北军阀军队中的工作（为这工作，团应该遣派相当数目的同志，加入军队中去）。2. 立刻在工农群众之中扩大反帝的宣传至于最大的程度。在目前最主要最坚决的口号应该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决拥护中国民众的唯一友人——苏联！”“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才能消灭军阀战争！”“国民党改组派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的反帝宣传，都应该和工人阶级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实际口号、实际要求互相联系。3. 和这一道，我们主张你们应该加强游击队的工作，把政治意识发达的工人群众和团的同志，送去参加朱毛红军的部队，是很重要的，用了朱毛的军队，我们也应该加紧在农民群众中的宣传与鼓动。

对两重战线斗争

在革命现阶段中，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是目前党和团主要的危机。失败主义、取消主义的倾向，和工运高潮的降低估量、进攻苏联战争危机的低估、（陈独秀）联络改组派的主张……等等，都是党团内右倾危机的主要表现。

所以，团必须根据了党及共产国际的路线，坚决地与右倾危机斗争。

但是，党和团依旧不能放松对托洛茨基派的残余，行严厉的争斗，反对他们还继续在党团之中加强着他们的活动。党和团必须暴露托洛茨基的反革命性。

在对机会主义与对反对派的斗争之中，中国团必须更加强它意识的坚硬度，以一种不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为党及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战。

关于反帝工作的问题，农村及农运工作问题，以及反军国主义的工作问题，少共国际将另外寄材料给你们。

少共国际执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接读青年 共产国际 1929 年 10 月来函后的决议

(1930 年 1 月 7 日)

少共国际最近致中国团书，一方面是在考核中国团在第五次大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指出中国 C. Y. 在坚决执行少共国际与党的政治路线之下所获得的相当成果及在工作中所表示的一些错误和缺点，同时更进一步指示中国 C. Y. 在新的革命浪潮正在生长中当前的实际任务。中央经过详细讨论，认为少共国际这一指示完全正确，虽然所根据的材料有些不甚恰当（有些是由于少数同志口头的误传，例如职业化开铺子等），但并不因此减少他的正确性。从少共国际这一指示更可证明二中全会所决定的几个中心问题的严重，二中全会所决定的主要路线与国际这一指示完全一致。中央除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这一指示外，并根据最近新的形势更具体地作以下的决议，作为团在目前的主要工作方针：

最近政局与青年斗争形势

一、根据国际的分析，使我们更加看清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亦即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等）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巨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目前帝国主义根本矛盾的发展，可以日

益明显看出，帝国主义第二次大战，尤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日益紧迫，和国际新的革命浪潮已在兴起和发展。

二、由国际形势来观察，目前中国实际环境也可更加明显看出，构成目前中国政局的杠杆，首先就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现存反动统治进攻苏联和帝国主义抢夺中国统治利益瓜分中国，造成中国不断军阀混战的形势。现在一方面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仍积极进行，军阀混战的局面继续扩大；同时反动统治更加动摇崩溃，新的广大群众的革命浪潮也正在成熟生长中，这种成熟生长可以直接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

三、上述政局在青年群众中的反映和表现，最主要的便是战争与资本生产合理化的重担更加重在青年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身上，青年军国主义化政策正在以空前的速率施行，广大青年工农兵上学生都处在高度危害困迫的境遇中。二中全会指出这一形势必然推动青年运动左倾过程的加速，现在事实证明完全正确。虽然我们主观的领导还非常薄弱，而客观上青工童工罢工的发展，青年农民参加游击战争土地斗争的热烈，青年兵士兵变与学生斗争的扩大兴起，已经成为新的革命浪潮的一个主要动力。

团在目前的基本任务

四、根据国际的指示，应该更加坚决地确定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目前在执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对世界大战，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斗争中，我们第一个基本任务，无疑的就是要以最大的努力发展青年工人运动，要以最紧张的毅力组织青年工人经济政治斗争与工会工作，执行这一基本任务的具体工作方针：

1. 要以最坚强的毅力组织青年工人群众切身经济利益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去组织并领导青工童工一切自发的斗争和罢工，并组织领导最广大的青年工人群众参加整个工人斗争和罢工运动。

在目前更重要的是各地团部要和党一致，立即有计划地积极组织同一产业和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团应调动最广大的青年工人群众起来热烈参加，在共同要求纲领中，团须坚决提出青年工人群众最迫切的特殊要求条件，尤其是要加强团在青年工人斗争中的政治领导，和在支部基础上去动员群众推动这一斗争转变和斗争深入。

2. 加强赤色工会工作。各地团部要和党一致切实建立赤色工会组织，加紧赤色工会的发展，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介绍广大青年工人群众加入赤色工会，首先每一个同志都要加入赤色工会，这依然是目前严重的问题。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执行这一决议，或者还存着一种只是帮忙不负责任的观念，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各级团部应坚决把介绍青年工人群众加入赤色工会，发展赤色工会基础，特别要〔把〕用一切方法在工厂青年工人群众中去发展赤色工会下层组织，看成是团基本工作之一。少共国际来信中说：“在革命的职工运动高涨的现阶段中，单是做到秘密的姊妹团或兄弟团是不够的”。在目前群众斗争中更证明这一指示的正确。因此我们更要把发展赤色工会基础的工作看得格外严重，各级赤色工会中建立青工部、青工委员会、青工小组以及发展学徒联合会、劳动童子团的工作更须加紧，不能坚决树立这些青工群众的基本组织，就不能推动领导广大青年工人的斗争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保证团在青年斗争中的政治领导。

3. 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工人直接斗争行动的增加，黄色领袖更加官僚化、工贼化，黄色工会日益反动，所以各地反黄色工会斗争也日益发展。因此我们更须严格肃清一切宗派主义的残余，加强在黄色工会中夺取青年群众，在有青年工人群众的黄色工会组织中，要坚决执行组织赤色青年部、青工委员会与赤色青工小组的策略。在青工部与青工小组中，一定要坚决提出我们的青工斗争纲领，积极发动青工斗争，在政治上必须坚决明显与黄色工

会对立。这种赤色青工部在还没有组织赤色工会的地方，可以代替执行赤色工会支部的一切任务，自然，同时在工作中即须负责组织赤色工会支部。已经组织赤色工会的地方，青工部与青工小组即是赤色工会之下的一部分，扩大赤色工会政纲的宣传，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总之在政治上必须明显与黄色工会对抗，以夺取青年工人群众到赤色工会方面来，以破坏消灭黄色工会及一切改良的欺骗。

4. 要特别加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中的工作，因为他们在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中有极伟大的作用，各级团部必须把这工作看成是一种中心工作，用极大的努力去进行。

5. 要广大地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形势之下，是最能团结广大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领导之下反黄色工会之最有力的武器。工厂委员会决不仅是在斗争中运用的一个策略，而是有它的独立发展与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和赤色工会并存。各级团部和各级青工部应有计划地执行这一工作。

五、团在目前第二个基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农村青年工作：第一，应当与党一致坚决采用各种方式，组织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发动到地方暴动，团应有计划地去组织广大青年农民群众起来热烈参加。第二，必须加紧组织领导各种农村青年的单独斗争，这一点各地团部特别忽视，很多团部都囿于农村青年没有特殊利益的错误观念，而根本放弃农村青年的特殊利益斗争，这是极大的错误，必须严格纠正。同时自然必须坚决动员广大青年农民群众参加各种日常斗争，在目前尤其要组织参加年关斗争以深入到土地的斗争。第三，应特别加紧城市四郊与沿铁道、河流、交通路线附近的农村斗争。第四，富农领导是目前各地阻碍土地革命深入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加紧团内及青年群众团体中反富农意识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把富农从农民组织中特别是党与团的组织中与苏维埃政权内驱逐

出去。第五，在苏维埃区域应当采用各种方法鼓动广大青年农民群众起来，到附近区域特别〔是〕所谓白色区域去宣传鼓动，发动他们的斗争，打破农民的保守观念，向外发展以扩大苏维埃区域，发展方向应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路线。第六，加紧发展赤色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的组织，建立农协和雇农工会青工部工作。第七，积极发展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和及其雇农和贫农基础，巩固雇农贫农对于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的领导，并极力扩大其战斗力量。

六、士兵运动在反军国主义的任务中是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团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任务之下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各级团部对于这一重要工作，都有一般的忽视，这是全团最大弱点之一。现在第一，须立即动员全体同志以至赤色工会会员、少年先锋队队员及其他革命青年团体人员向所在地的兵士群众进行工作，首先是宣传鼓动工作。第二，必须立即有计划地去组织兵变，尤其是在军阀战争已经爆发的地方与进攻苏联的前线，更要立即进行这一工作。当然在组织兵变的策略，要利用一切兵士群众的迫切要求，来鼓动广大兵士群众，但是必须特别注意中心口号的宣传，尤其是反动战争对于士兵群众的残酷牺牲。在实行兵变的时候，必须举起鲜明的旗帜，如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等。第三，现在对兵士群众宣传鼓动口号应该是：“不打自己的工农兄弟”，“不打苏维埃和中国红军”，“与红军联合起来”，“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各派”，“反对军阀战争”等，这些口号必须与当地兵士群众切身利益口号联系运用。第四，各地团部应有组织有计划地遣派同志及青年工农战士打入敌人主要部队，以深入到兵士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工作。第五，外国海陆军及水手工作须经常有计划地进行，特别是上海、香港、天津、武汉与各地青年反帝同盟，应把这一工作看成自己基本工作之一，而有计划地执行工作。

团的建设与团的生活问题

七、此次少共国际来信指出中国C. Y. 主观组织上的弱点,特别是团的青年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非常正确,这是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努力去战胜的,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紧张的斗争形势之下,主观力量的加强乃更加重要。现在第一,各级团部要大胆更向着产业青年工人开门,要有计划地根据中央的路线积极发展青工同志,打破机械限制入团的条件,尤其要加紧在斗争中吸收新的分子入团。在农村中要坚决地驱逐富农出团,向着雇农贫农发展,以树立团的青年无产阶级的基础。第二,支部生活要打破关门的狭隘的工作方法,要深入青年群众中去活动,使每一支部都真能成为青年群众的斗争核心,成为发动青年群众斗争,领导青年群众斗争的枢纽。第三,地方团部的工作要更集中在中心城市,沿交通路线的农村以至红色游击区域去,加紧充实我们对于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第四,团与青年群众的关系,必须更加紧地运用争取公开活动的路线,以扩大团在青年群众中的活动范围。第五,要努力发展赤色群众组织,首先是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农民协会。其次是青年反帝同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学徒联合会以至革命学生群众组织,都应加倍努力地去建立与扩大。只有在这些革命斗争主观力量更加强健之后,群众斗争才能更有力地发展。

八、跟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培养新的干部与加强团内政治教育问题,也一天天更加严重起来。现在团的干部还都停滞在旧的基础上,新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工人分子的干部产生的非常之少,因此使团内反映新的客观的青年斗争意识非常滞钝。因此现在必须企图在一切日常工作特别是各种大小斗争中加倍注意培养新的青年干部。为实现这一任务,团内政治教育特别是各种大小斗争中的教育更须十分加紧。各级团部应在反右倾斗争的前提之下,更

加发挥团内新的学习精神，加强同志中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理论上的武装。目前为适应客观斗争的需要，中央与几个主要省委的短期训练班应切实进行。

九、目前要加强对外青年群众的宣传鼓动也和加强团内政治教育有同样重要意义，这也是保证团的建设的主要条件之一。现在第一，要特别加紧反对爱国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目前动员广大青年群众起来武装保护苏联的最严重的敌人。我们应深入群众中去竭尽一切可能揭破他们的面具，指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阴谋。第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兼程并进，进攻苏联与军阀战争的战火交相弥漫，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侵略宰割民众的一切大小事实（例如增派海陆军来华，太平洋会议，万国义勇团警戒游行等）和军阀战争给于广大群众的痛苦，鼓动广大群众起来直接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国民会议与武装保护苏联的宣传鼓动密切联系起来。第三，要加紧武装暴动与工农武装思想的宣传，要积极宣传红军的意义，以激发广大青年群众武装斗争的热情，自觉地加入红军。第四，为保证进一步策略的执行，必须有同一产业、同一职业、一农村、一军队、一学校之共同斗争纲领之宣传，在〔宣传中〕更须与团的基本口号发生联系，以扩大团的广大青年群众的政治影响。第五，支部是群众的核心，所以建立支部的宣传鼓动工作，更万分重要，支部中工厂小报、壁报工作更须切实执行。

十、中国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派最近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发展，已经由机会主义走上取消主义，由党内右派走上资产阶级左派〔右派〕的地位。现在由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派所结合成的取消派已经公开在群众中破坏群众斗争，破坏C·P·、C·Y·，已经成为革命与阶级的敌人。所以肃清取消主义与取消派，成为领导群众斗争武装保护苏联的重要关键。现在取消派的首领如陈独秀、彭述之等，虽然已经被驱逐出党，但是因为

产生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客观经济基础，如战争的紧迫，改良主义的活动与革命斗争的艰难等的存在，所以党内团内右倾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还十分严重。目前在团内存在着的右倾倾向，如争取青年特殊利益的不力，忽视反军国主义斗争，忽视黄色工会中青年工作，便是最主要的危险。因此各级团部应坚决继续反机会主义、反托洛茨基主义、反取消主义与反对党内团内一切右倾调和倾向，及其他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以巩固我们的阶级战线。

十一、在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任务之下，发展红军及一般青年工农武装组织与训练亦更加重要。第一，要与党一致极力扩大与集中红军的组织与战斗力，尽量地鼓动广大青年群众尤其是青年农民兵士群众踊跃起来加入红军，并且要有计划地组织少年先锋队加入红军。第二，要在一切群众斗争中，一切日常工作中，宣传并组织工人纠察队，介绍广大青年群众加入纠察队。第三，要加紧发展少年先锋队、体育队、武术团及其他带武装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团员军事化更须立即开始。要使团员同志及纠察队与少年先锋队队员能得到实际的武装训练，要能有巷战及暴动技术的学习，纠察队与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更可举行群众集合的操演，以充实我们的战斗力量。

十二、学生运动在目前形势之下，还有他相当的重要意义，但是必须纠正少数同志中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仿佛认为学生还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如四川），学生在现在还是革命中一支有力的军队（如顺直），这种意见显然是一种右倾的观念。中央认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需要努力领导，但是绝对不可把团的工作重心移向到学生群众中去，幻想学生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现在我们对于学生工作的策略：第一，还是要继续发动学生切身利益的斗争，为集会研究自由与反对拘捕学生，反对国民党军事教育的斗争。第二，加紧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联系到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的任务。第三，加紧学生群众中的思想

斗争，要尽量揭破各派三民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基督教等反动思想的面目，加紧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第四，要注意在组织上夺取学生群众组织革命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青年团体以团聚学生群众，以便有力地推动学生斗争。但是这些工作，都只有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如何使团的工作走向新的时期

十三、中国团自五次大会后一年来在少共国际与党中央新的路线之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特别是领导团的青年化与坚决地与右倾危险斗争两个条件之下，的确获得许多进步，在工作中“证明出这新的路线不只是被几个单独的团部所了解，而特别是被几个主要的工业区团部运用了这个新的路线，在团的群众工作上，得到了部分的转变”。但是因为前一时期的旧的工作方式的遗留，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侵蚀，加以客观上工作条件的艰难，白色恐怖与改良主义的打击，在在都使团的新的路线与方式的转变受着极大的阻挠。经过一年以来艰苦斗争的结果，虽然已经开始很大的转变，获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严格地说来，这一种转变大半都还只帮助着团内推动了一种意识的转变，实际上的运用与收获还很微弱，尤其建立团的青年无产阶级基础的难产，对于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工作的缺乏，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忽视，成为团的中心弱点。

十四、在现在罢工斗争日益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进攻苏联战争日益紧张，新的革命高潮成熟生长的形势之下，更加重了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接受少共国际进一步的指示，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根据一年来工作的进步的基点，并针对着目前的主观弱点，动员全团同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尤其是青年工人群众中去，领导广大青年工农群众切身政治经济斗争。以最高度的毅力发展赤色工会与加强对黄色工

会的工作，尽量发展青年反军国主义斗争，极力发展我们的青年群众工作，发展青年工人团员，使我们新的路线能够由意识的转变进到实际的转变，使少共国际与我们中国团五次大会二中全会以来所决定的新路线确实实都能在一切实日常工作与斗争中运用出来，这便是使我们的工作真正进到新时期的枢纽。只有真正执行这种正确的路线，更特别注意在支部基础上推动工作，充分运用青年的工作方式与方法，才能实现我们的基本任务。

中央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1 9 2 7 - 1 9 3 1 ） （上册）

作者 =

页数 = 7 3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方针的转变

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8月7日）
讨论国际代表报告（1927年8月7日）
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关于1927年8月9日布哈林同志报告的决议（节录）（1927年8月10日）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1927年12月13日）&布哈林

共产国际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1927年12月15日）

附1：纪念广州公社（1930年12月12日）&雅罗斯拉夫斯基

附2：纪念广州公社四周年（1931年12月13日）&约尔克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1928年2月）&罗明纳兹

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1928年2月）&米夫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1928年2月2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1928年3月1日）&米夫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1928年4月30日）

共产国际对济南事变宣言（1928年5月）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节录）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节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10月）&米夫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土地问题（节录）（1928年10月）&米夫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2月3日、4日）&周恩来

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言（节录）（1928年7—9月）

共产国际的纲领——1928年8月9日在第六次世界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报告（节录）&布哈林

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对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节录）&布哈林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节录）（1928年8月29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

节录) (1928年9月1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宣言

四、共产国际“左”倾指导与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 (1928年1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29年2月8日)

共产国际十周年纪念宣言 (1929年3月2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 (1929年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1929年6月7日)

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1929年8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 (1929年8月5日)

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 (1929年8月21日)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青工问题的信 (1929年8月24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 (1929年8月30日)

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 (社论) (1929年9月25日)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9年10月26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1929年11月15日会议通过)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 (1929年12月14日)

五、中东路事件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 (1929年7月12日)

撒翁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1929年7月28日)

中央答复撒翁的信 (1929年8月3日)

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南京在“耍弄手腕” (社论) (1929年8月11日)

是谁挑起冲突? (社论) (1929年9月6日)

在莫斯科州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节录) (1929年9月28日) & 李可夫

南京在耍弄新的诡计 (社论) (1929年11月30日)

时刻警戒 (社论) (1930年1月2日)

附1：关于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 & 王正廷

附2：中东路之概况及我国不得不收回该路管理权之理由 (1929年7月) & 胡文柄

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赫达罗夫在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8年7月11日)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许勒关于中国和印度工作经验的报告 (节录) (1928年7月19日)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节录) (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报告 (1929年7月9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届二中全会宣言 (1929年8月15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团书 (1929年10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接读青年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来函后的

决议 (1930年1月7日)

附录页